

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

储安平文集

下

张新颖 编



东方出版中心

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

储安平文集

下

张新颖 编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储安平文集(下·全两册)

储安平 著 张新颖 编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6.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380千字 插页2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山亭林印刷总厂	印数: 1-15,000

ISBN 7-80627-294-1/1·113

定价(全两册): 54.00元

目 录

〈客观〉、〈观察〉文章及其它 1

“客观一周”专栏文章 3

第1期：第二次沦陷(3)一团糟(4)一团糟
的责任问题(5)用人(5)组织与力
量(6)阎锡山(存目)(7)国家的活
力(7)美国人与中国官(7)

第2期：理论与事实(8)国民党的病症(9)
进步与刺戟(10)共产党与中国政
治上的需要(11)某一种结论(12)
内战解决得了一切吗？(13)政治
上的责任心(14)

第3期：自相矛盾、不近人情(15)权力

(16)事半功倍(16)美人对华观感的动摇(17)美国的对华政策(18)中国未来局面中的一个安定因素(19)

第4期：共产党的前途(20)共产党与“国家”(21)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所走的途径(23)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存目)(24)

第5期：蒋主席的新演词(24)人民的才干(25)交通启蒙运动(26)耕耘方法的改革(27)卫生状况(29)住宅问题(29)

第7期：敬告马歇尔元帅(31)统一(32)民主(32)自由(33)政府改组(34)中产阶级与自由分子(34)

第8期：杜鲁门声明中的三句话(35)马歇尔元帅来华与中国(35)政府改组问题的核心(37)政治协商会议的成败(38)

第9期：又是一年开始了(39)以万变应不变(40)假如在野党派能采行我这个具体的建议,即可达到使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目的(41)

第10期：我对于所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的一个重要进言

(43)内战停止(45)谈人力车的
废止(46)

第12期: 停战令下,战仍不停(存目)(48)
协商成就(存目)(48)知识分子、
工商阶级、民主运动(48)告别读
者(49)

《观察》文章 50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50

 失败的统治 54

 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58

 论上海民乱 67

 论张君勱 72

 辛勤·忍耐·向前 76

 中国的政局 95

 施用网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 108

 323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 117

 大局浮动,学潮如火 125

 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 131

 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
 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
 表示的态度 136

 读孙科谈话 141

 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
 采取步骤表明态度 146

艰难·风险·沉着	150
《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	
刊出后的响应	167
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	
访华报告	172
白报纸!	179
评《出版法修正草案》	184
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	
入学之不妥	191
我们建议政府调查并公布白报	
纸配给情形	196
风浪·熬炼·撑住	204
论程孟明案兼论社会有心人能	
否合拢来做一些事情	222
国大评论	228
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	238
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244
评翁文灏内阁	248
吃重·苦斗·尽心	254
一场烂污	275
政治失常	278
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	
编辑方针	281
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	291

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 和监狱工作	298
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 税制、互助情况	309
其它	324
致胡适的信(三封)	324
致傅斯年的信(二封)	327
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330
新疆新面貌	333
新疆好地方	335
伊犁夜话	341
石河子新城	350
新疆大棉区的创造	356
访前景壮阔的克拉玛依油区	365
阿尔泰山一带	370
流散哈族的救济	383
在阿尔泰山之巅	388
欢乐的库尔班节	393
路中邂逅	402
在塔里木河的下游	407
一个村子的诞生	416
优先照顾民族老乡的利益	423

南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428
帕米尔高原上的牧业社	445
和阗的缫丝女工	450
民族师资的培养工作	455
教学结合生产	466
新疆远景	477
天山上的红领巾	488
从内地到新疆来的年轻人	492
从工人做起	498
编后记	519

《客观》、《观察》文章及其它



“客观一周”专栏文章^①

第 1 期

第二次沦陷

在 8 月中下旬前后,全国人民都沐浴在欢快及新生之中。在沦陷区的人,欢喜终于天亮,在后方的人,憧憬从此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但是结果大失所望,在这短短的几十天之内,那

① 这部分文章与后面的“《观察》文章”系作者于 40 年代后半期创办《客观》、《观察》两杂志时所撰的言论文章结集——主要是政论。储安平的这些文章由于仗义执言、饱含锋芒,对当时国民党腐败、黑暗的统治作了尖锐、有力的批判而产生极大的影响,赢得人们——尤其是知识界人士的好评。但由于历史环境和思想的限制,作者对当时的局势和某些问题的认识也有偏颇、不当之处。为了尊重历史,我们除没有收入个别文章(篇目仍列出)及对少数篇章的文字稍加删节外(删节的地方加省略号,并用※符号标出),其余的都按原貌收在这里了。——编者

些曾经沦陷了七八年的广大的土地，竟复宣告了第二次的沦陷！第一次，那些土地沦陷给“中国军事”的敌人，而这次，却沦陷给“中国政治”的敌人！第一次沦陷的结果，陷区人民身受日军的奴役，这次，则改而遭受本国官吏的那种无可形容的无能缺德的统治。重庆各报对于收复区混乱情形的暴露，竟使后方人士衷心震动。我们相信在现政府中，当不乏富有良知的爱国人物，我竟不知他们是否对于这种局面将顿脚焦虑扪心自愧。但是单单顿脚焦虑扪心自愧，仍无补于事。我认为有两事必须立刻做到：第一、一切缺德的行为，必须追究责任，整顿风气；第二、一切方法上的错误，必须改善纠正。改正在方法上所有的错误，最扼要莫过于一个原则，即各种接收工作，切莫只给接收人员接收时以便利，应当兼顾到人民的便利。进而言之，无宁说应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先最重，若能无扰于民，自然也就可以减少混乱和不安的程度。

一 团 糟

再说从我们后方的人来看，在任何方面，只觉得政府没有准备，没有办法。军事，军事处处仰求美国的援助：空中运兵坐美国的飞机，水上运兵坐美国的军舰，到头，还要美军在天津登陆。财政，财政弄得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收复区固然弄得怨声载道，大后方也是一片紊乱。工业，工业没有办法，到处是停业倒闭，请求救济。经济建设始终拿不出一个成功的办法；外国的工商业代表，到达重庆后，除交际外，竟无所事事，不得要领。交通，交而不通。迄今三月，连长江航运都未能恢复常态；最初是一片“管制”，现在则又一片“黑市”。这种一团糟的局面必须立刻打开，为了人民，为了建设，为了外交，都不允许长此这样糟下去。

一团糟的责任问题

但是上述这样一团糟的局面,究竟应该由谁负责?这实在是一件大可痛心的事:竟很少有人能出而公开追究这个问题,并加以指责。就我个人言,我认为无可推诿,现在的执政党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的。我相信,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没有一党有推翻国民党的企图(因为在力量上他们和国民党还不能成为一个比例),没有一个真正超党派的爱国的中国人愿意国民党崩溃,而形成中国政治上不可想象的混乱。绝大多数,还是关切国民党的,这不是基于任何理论或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原因。政治是一个现实。国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寄落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有这种优越的条件而不能好好利用,实为大可惋惜之事。国民党假如能够将党的利益稍为看得轻些,多为民谋利,多为民造福,人人之拥护国民党,国民党政权的既稳且固,那是毫无问题的。国民党即使不能完全凭借“权势”,但至少可以一半凭借“人心”,来统治中国,在中国历史缔造光荣的记载。我相信,有远见的人都希望国民党进步,因为在目前中国的实际局面下,国民党的进步或腐化,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民的幸福、希望和荣誉。

用 人

英国保守党在这次大选失败后,立刻组织了一个“保守党改革委员会”,在 Hinchiny Brooke 子爵和 Quintin Hogg 等的领导之下,从事改革,提携后进,增加党的新生。英国人夙有政治天才。我们抗战八年,经过八年战争后的中国,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

大都还是那些老人。“人老国不新”，国家始终不能增长新的血液。这次派往收复区的人员，有一部分操守不佳，以致引起人民对于政府的用人，时有烦言。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政府不愿用有操守有能力的人。事实上，现在的政府也许是很苦痛的，因为“没有人！到处感觉人不够”。但是这里面实在包括不止一个问题：第一、政府如何始能知道或鉴别那些分布在各方面各阶层的人才？第二、政府如何始能使那些人才愿为政府所用。要解决前一个问题，须得使有能力有操守的人，能得到一个在营营奔走求谋干托以外有以自见的道路；要解决后一个问题，政府须先有一种可以迎合人心使人人愿为所用的作风。

此外，政府应当在积极的、建设的、为国家前途的目标下，保障人才，培养人才。一切消耗人才的做法，都应该放弃。

组织与力量

国共双方均称内战可望避免，而墨迹未干，内战已起。老百姓简直干着急，除叹息外几乎没有办法。中央社有中央社的说法，新华社有新华社的说法，我们简直无法知道真正的内情。人人反对内战是没有问题的，人人希望停止内战，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如何能使内战因人民的表示，在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停止。这是中国政治里最最现实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其有办法，几乎也就可以说中国的政治有了办法。我是很现实的。我不相信在现在，人民说不要内战，要内战的人就会听命停止内战。但我们必须终有一日，这个日子越早越好，人民的公意能发生有实效的力量，我认为要达到这一个目的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组织”，没有组织的呼喊只是呼喊，不是力量，不是命令。

阎锡山(存目)

国家的活力

因阎锡山氏来渝而一述我如上的感想,但我显然并非独指阎氏一人而言。现在中国像阎氏那样应当退休的人,不在少数。先谈文官,若干机关已实行退休制度,这种退休制度急需推及全部文官,使国家对于多年劳役公务的人,有所酬庸,而年迈之人,亦得稍享晚年清闲之福。此外,尤其重要的,应当使那特任及选任的政治人物,到了相当的年龄,到了体力上,智力上已没有能力追随时代同进的年际,有一种退休的成规。国家需要新陈代谢,以增加国家的活力,过于老朽的人,跟不上时代的人,空占高位,必然阻碍年青后起之优出而为国的机会,因之使国家的活力减低,影响国家前进的速率。

美国人与中国官

鲁斯很轻悄地往南京打了一个转,却忙坏了当地的中国官吏,据《大公报》南京通讯,第一次是马超俊市长预备了盛宴,欢迎鲁斯,鲁斯飞机未到,但预备好了的盛宴不能不吃,据说要吃还要有个吃的名义,这个名义真来得冠冕堂皇:“代表南京市民慰劳何总司令”!第二次是何总司令预备宴请鲁斯,鲁斯的飞机仍未到,这次是“代表南京市民慰劳马市长”!好一个“慰劳”!真不懂,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国官吏见了外国人就要那样诚惶诚恐。鲁斯是一个美国人,无论他有多大声誉,说到后来,他也只是一个美国公民,要接待美国人须先了解美国人的观念,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公

民就是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都是平等的。鲁斯来中国,不是代表美国,不是代表美国的总统,不是代表美国的国会,鲁斯就是鲁斯,鲁斯所代表的就是鲁斯,他在中国不是一个“国宾”,只是一个游客,实在无须中国官吏那样小事大做。马市长、何总司令,都是国家大员,待办的要公不知有多少,你们哪里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抽出来应酬一个美国游客!中国现在有多少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你们怎能忍心为了一个美国游客浪费那么许多金钱。我愿意在此率直地奉告所有中国的高级官吏,每当有外国人来拜访你,你顶多和他寒暄五分钟,(据说有一次某大使抵任后首次拜访某要人,那位要人大谈其天,有30分钟之久,此之谓缺乏常识!)假如来和你接洽公事,除公事外,你千万别和他说超过10句的寒暄话,假如为了交际,最好以茶叙为限,非特别必要,切不要请他吃饭。你想,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吏,哪儿有那么许多时间去和外国人应酬?和他谈公事时,要坦白、扼要、正确、恳切,承认我们的国家贫穷、腐败、分裂、没有组织,但表示愿以最大的努力和决心使中国进步。假如这样,即使你不请客吃饭,他心里尊敬你。否则,他吃了你的饭,他心里还轻视你。是否影响国家争面子争人格,也决不是在请人吃饭这一件事上能够达到的。

(原载《客观》第1期,1945年11月11日出版)

第 2 期

理论与事实

目前中国最切迫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所谓政治问题,大体上

说来,也就是一个国共问题。而所谓国共问题,在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国共的军队问题。国民党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则全力挣扎,要保全甚至增强共产党所已有的实力。在法律上,在理论上,在国共两党种种生命的斗争中,共产党都是居于劣势地位的,因为在理论上,没有人会赞成共产党可以自蓄军队,没有人会赞成任何一个政党可以自蓄军队,从而破坏国家军令的统一,造成分裂割据的局面。全国只有一种军队,即国家的军队。这个原则,应为今日人人所拥戴,应为今日人人所遵守。共产党最近替政府军队加了一个新名称:“国民党军队”。这个名称,在理论上,实不可解。因为假如凡是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都是“国民党军队”,则今日之“十八集团军”以及“新四军”等,固无一非政府军队的番号,岂不是“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等都变成了“国民党军队”?但是实质上,在“党治”之下,国民政府既须对国民党负政治上的责任,因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从政治的意义看,固已二者合而为一,国民党之将使政府军队受其决策,而为合于国民党利益的行动,实为自然之事,这当然是国民党所占的便宜事;此项便宜,出入非小。不过国民党既掌握今日中国之政权,则他之在此种微妙处占有优势,亦为事实问题。

国民党的病症

在原则上,我当然是反对共产党拥有军队的,我之反对共产党拥有军队,正如我之反对国民党或其他任何政党拥有军队。军队若不与政党分手,则国家政治终无安宁之日。所以在国共会谈纪要中,政府公然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共产党保持 20 个师,实为违反现代政治原则之事。不过政治终是一个现实,有时并不允许我们侈谈理论,政府竟不得不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共产党保持 20 个

师,自然有政府的苦衷。但是在我们人民方面完全根据事实,客观论事,是不是假定在某种情形下,可以赞成共产党拥有相当的军力,实亦不失为一可以研究的问题。我个人不相信共产党在最近的年月中能取得政权……※但是我绝不愿见中国长此混乱。我们有1万个理由要求中国政治安定,全力建设,以恢复国力,富裕民生。政治力量不能没有重心,现在中国政治力量的重心无可否认仍在国民党。所以我们能尽力来帮助国民党,努力建国大业,也就是我们尽了为国家服务的责任。虽然各人的方式不同,有的人直接参加国民党,担任职务,有的人站在国民党以外,从事批评,固无一不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与服务,国民党非无主义,非无人才,也非无有希望有朝气的优秀的后进党员。世上原无十全十美的主义,过去20年中,三民主义若能实现了一半,则今日中国亦必不复是今日之中国。论人才,今日国内人才固未必全为国民党所用,但国民党执政前后已达20年,为国民党所吸收了的人才数不在少。国民党中也不乏朝气焕发思想前进的后进党员。我们和他们谈时,发觉他们的观点和我们大体一致,而其对于本党的批评,有时尤甚于我们党外人士。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国民党有两大病症,一是腐化,一是党缺少一种高度新陈代谢的作用,有能力有朝气的有为青年党员,竟不易在党内发挥积极的力量,以增加党的活力,这虽是两事,实则互为因果,或者毋宁说仍为一事。国民党统治的腐化,是无可否认的。也正因为有重重的腐烂的覆盖之下,使潜有新生的力量不易芽长,使许多有为纯正的青年国民党党员,终而消极地说:“我只是一个挂名国民党党员。”

进步与刺戟

但是这种现象不仅是国民党的不幸,抑复为国家的幸,我

们必须在多方面努力,以促进国民党的革新与进步。对外战争原有推陈出新的功能,没有一事可以刺激一个国家从头改过有如对外战争一样。但是不幸经过八年的抗战,我们大家看看我们国家政治的进步到底在哪里?我常认为,在政治的技术上,中国是越来越进步了,因为一切好听的名词及办法都运用得应有尽有,但是在政治的本质,中国的政治是越来越退步了。贪污腐化的程度日见其深,而民不聊生的程度也日益严重,我们必须督促国民党进步,而要督促国民党,则非拥有一种足以督促它的力量不可,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只有两种人说话发生力量,一是美国人,一是共产党。美国人有飞机大炮和金钱,共产党则有枪杆子。但是在国家的立场上,我们绝对反对任何外国人来干涉我们的内政,控制我们的内政。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管。

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上的需要

因此,我希望中国新产生一个反对党,一个有力量的反对党,所谓“力量”,原非指军队而言,而不幸在中国竟多少有一种无枪杆子即无力量的形势存在。正巧现在共产党拥有相当武力,他似乎可以成为想象中的中国政治上的反对党。共产党当然有共产党的长处,也有他的缺点。共产党的主要缺点即是过度的宗举外邦。一味视外邦为宗主,则不免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志与独立人格。我相信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丧失了不少中国人的同情,假如《新华日报》上的苏俄气息能大大的减少一点,恐将发生更大的作用。但是共产党有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他的社会主义。我并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用于中国。同时,我也不相信,假如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话,他能完全

实行他原来的主义。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它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打一个大折扣,然而打了一个大折扣以后的共产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我们都是有理性的,假如能有一个可以使大家有饭吃,大家过得好一点的社会制度,我们为什么要反对,为什么要自私而不乐观其成。贫富悬殊的社会终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其次,共产党的刻苦精神,实有可取之处。我是不赞成一味以吃苦为号召的,我希望能使个个中国人的生活标准提高,政治的目的是要使人民快乐而非使人民苦痛。但是在一般人的生活犹在水平线以下时,政治上的领导人物应先能刻苦自励。如此方能造成新的风气,而达政治清明之途。共产党这种长处正就是今日国民党的短处。以彼之长,补此之短,正是合作之道。假如共产党扩大适当军力,我们不希望他运用这种武力来直接从事军事的斗争。我们希望能使一种军事的消耗行动,变而为一种政治的建设行动,那即是说,要共产党虽有军力而能不用其军力。共产党仍当在正常的民主宪政轨道下,一方面宣传他的主义,一方面利用他的实力,使其发言获有力量,监督执政党,使执政党不能胡作胡为。一在朝,一在野,岗位虽异,而目的则同,各尽本分,以求国家的富强,民生的康乐。

某一种结论

但是希望共产党有军队而不用其军队,共产党的活动仍仅限于和平的宣传,仍应在民主宪政的正轨上活动,这一点能不能做到?是的,这是一个触及着问题核心的问题。在根本上,共产党的做法本来出乎传统的英美民主国家一般政党的做法,所以要希望他拥有军队而不利用军队,恐不免流入幻想。在另

一方面，共产党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是一个政党，我们本来不要军队，无奈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无军队即无法生存。要我们放弃军队，毋宁说我们要消灭我们党的存在。”共产党说他们本来不愿有军队，这是一句很漂亮的漂亮话。所不幸者，我们竟然能让他们说这样的漂亮话，因为在今日中国，确有无枪杆子即无法生存这种情形存在。但是真的一到了双方有军队，还要希望彼此互信互助，实未免近于理想。因为军队这样东西实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军力小的一方面，必日日担心着被他人消灭，而军力大的方面，必日日恐惧对方之扩张；担心被他人消灭者，必用种种方法以保全并增长他的实力，恐惧对方实力扩张者，必处心蓄虑以消灭对方的力量。事实上，共产党恐未尝无以暴力夺取政权之念，而国民党则卧榻之旁，当然不令他人鼾睡。所以国共两方，纯粹从“党”的立场着眼者，似乎走上了这样一个看法，以为非用武力不足以打开当前的局面。内战，内战！内战就是他们对于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一个结论。

内战解决得了一切吗？

但是从我们人民的立场看，谁愿意内战？谁不反对内战？而且，即使退一万步说，中国局面终非出乎一战不可者，但是第一个问题：现在是不是进行内战的时候？第二个问题：内战究竟能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就前者论，和日本打了八年，总算邀天之幸，靠别人的福气，未蹈亡国之祸，可是国力民力，已是筋疲力尽，怎么还经得起内战！日本已败，中国在各方面都到了千载一时的复兴机会，国际友人也殷殷以中国自强为念，而我们自己岂竟自暴自弃一至于此？就后者论，凭借军事究竟能解决得

了一切吗？否则打了一半，终出于妥协，则所有死者伤者，以及遭受军灾者，他们所受的苦痛损失，究为何事，岂非天下之大大滑稽？要不然，弄不好，恐怕中国不免要变成了西班牙第二，然到做今日之西班牙者，究竟有什么趣味？可是悲哀得很，一谈到现实，人民虽然反对内战，而舍呼吁之一途外，竟无他路可循，呼吁始终是呼吁而不是命令，今日中国人民还没有力量可以命令要打内战的人停止内战！

政治上的责任心

目前停止内战的主要希望，还是系于国共两党对于人民的责任心。很明显，人民反对内战，今日之中国也再经不起内战，国际大势也不许我们再作内战，共产党为了要获取来日的政权，实不能任性行动，漠视民意，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国民党身当执政，且已执政了20年，对于今日国家的治乱，所负责任尤重于他人。再进一步说，今日国民党要打共产党，可是请问共产党在中国之有今日，究竟是谁的责任。假如国民党20年来的治绩是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生康乐，今日的共产党的势力会不会膨胀到这样大的地步。我对国民党如此责备，有些党员恐不免感觉愤愤，但是我相信有识见的国民党领袖，必将衷心接受，而自承其过失。国民党今日只知攻击共产党，企图消灭共产党，而竟不反躬自省釜底抽薪，在本身改善革新做起，实可谓缘木而求鱼。即使共产党短于实力，完全打垮，而若政治依然黑暗，人心如此涣散，民穷财尽，鸡犬不宁，如此国家，尚有何为！国家治乱，系于一念，悬崖勒马，固未为晚。

（原载《客观》第2期，1945年11月17日出版）

第 3 期

自相矛盾、不近人情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韩雷生最近自美来华，并于本月 13 日偕蒋廷黻署长至各收复区实地考察。10、11 月两月间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载运物资自美驶华的船只，已有六艘，并均已抵沪；上载粮食、衣服、医药，以及车辆等物，总量达 3.7 万吨。战事虽告结束，美国援华会仍拟续办四五年，以为中国复员建设之助。在英国，克利浦斯夫人主持的援华基金上星期还在阿尔倍脱大厦请世界闻名的巴黎弦乐队演奏，为中国灾难募捐。全部援华基金现已超过 150 万镑之数。英国援华基金运动因战事结束，有停止之意，但中国至少半官方面仍希望英国友人再继续努力相当时候。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受难的时间最久，范围最广，程度最深，所以友邦人士对于我们的灾难与苦痛亦最为关切。战争本是凶事，人类遭受战祸，实为不幸。能不发生战争最好，到打过仗以后再从事救济，已是下策。对于外国的侵略，在求异族独立主权完整的原则之下，起而抗战，事非得已，然而我们今日为什么还要兄弟阋墙，自相残杀？对日抗战所造成的创伤苦难，救济唯恐不及，我们今日又何忍再扩大灾难，加重损失，加深苦痛？我们一方面要外国朋友来救济我们，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却在那里破坏消耗，制造战祸，这种现象，不仅在理论上非常矛盾，在人情上亦不可通。

权 力

“政治”本来是一种权力，但权力的获得与权力的增强，并不全凭政治斗争，或单单在政治一方面着眼。执政党可以用各种方法以巩固并扩大其权力：可以用社会服务的方法收揽人心，用普及教育的方法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准，用经济建设的方法充实国家的基础，用发展海外贸易的方法富裕一般国民的财力。民智愈高则国力愈强，民生愈裕则国力愈富，国家富强，也就是执政党的威望愈隆，权势愈大。在国际上，国家地位高，发言有力量；在国内，人心归附，令出必行，而且大家蓬蓬勃勃，日新又新，一番光明，何等气象。假如投身政治生活的人，都能如此放眼，有此心胸，则他执政以后，必能知道他所应努力者为何，所应争取者为何。只知在政治斗争一途争取权力，实在已是一种非常落伍的观点，一种非常低能的做法。

事半功倍

即以今日中国情形而论，频年战祸，民穷财尽。人民对于政府几乎已无所求，但愿能安居乐业，无所骚扰。一般老百姓只要年长、保长、税吏这一类人物少上几次门，就已心满意足。假如能对他们的生活，稍有改善，必将喜出望外，感激涕零。这种良善顺从的人民，真是再到哪儿去找！就是知识阶级，对于政府也没有多大苛求，我们今日并不希望家家有汽车、无线电、牛奶、地毯、壁炉以及一切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所应享受的物质生活。我们都知道自己国家的贫穷和落后，我们都愿意吃苦，都愿意忍受这一个从旧的中国走向新的中国的过渡时期里所不可避免的

种种牺牲。我们并都有耐心，期待国家在多年的乖运里终能走上平坦的大道。我们只要求政治清明，提高效率，少作党争，少在人事问题上盘旋，少有一切消耗人力物力的消极行为，多做建设性的事业，多多注意人民的生活。这些基本条件的目的不是为一己一私的富贵荣华，而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前途，后世子孙的幸福。只要这些最基本的要求能够实现，全国必定另有一番气象，人人将乐观奋发，个个愿刻苦自励。日本的战败正是中国的千载机会，不仅在我们自己国内的市场，已无日货倾销的威胁，就是从中东到南洋各岛，有许多市场，英美仍不足与中国为敌。中国政府只要稍为上轨道一些，便可把国家弄得像像样样，只要把许多用在政治斗争上的心血精神收起，转用之于澄清吏治，增加效率，便可大有作为。假如有这样优越的形势而犹不屑一顾，唯知政治斗争，实在愚不可及。

美人对华观感的动摇

中国经过八年战争，对外战争甫告结果，内战即接着而来，盟国友人，特别是在美国，对于这种不幸的现象，大概无不感觉失望。假如中国的内战再不停止，美国人对中国将造成一种不可改变的印象，即不仅不能和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合作，而且根本不愿和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做朋友，因为中国这种分裂而不能合作的性格，实已超出了一般常情。在战争未结束以前，一般人以为一俟战争结束，中国和外国贸易即将恢复，并以为中国将成为一个主要的世界市场。现在，大家才知道事实完全相反。在英美自身，在短时间内并无余力来争取中国的市场。在英国，有许多工厂所接受的欧洲、中东、埃及、印度等地的定货，已足足够他们忙碌五六年，一般工厂在生产上大都已无余力再来招顾

到中国的市场。但因英国目前财政的收支不能平衡,所有出国货物,均须现交,而大数目的现款交易,在目前的中国也极少希望。在美国,过去几年中工厂生产几乎全部为军用品,现在一旦和平,日用品的生产,对于本国的供应,恐须二三年以后,才能达到饱和点,故暂时亦并非急急要到远东来推销。再加中国政局的不安定,使美国商人格外缺乏来华贸易的兴趣,而一切投资更无希望。所以,在过去几年中,中美两国感情虽较自有中美历史以来任何一个时期为密切,但最近中国政局的发展,假如不能在最短时期改观,可能使美国一般人民对于中国的观感,发生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一经成熟,即将极难挽回。

美国的对华政策

至于美国官方的对华政策,我们都知道这已不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外交问题,而已经成为了美国整个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部分。就中国言,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中国已引起了一种复杂错综,而且表现着极其严重的分歧的反响。我们对于美国在战时所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当然是非常感谢的,在战后中国复兴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仍需要美国在各方面物力人力的友好援助。美国的对于中国前途的关切,自亦在人情之中。不过在目前中国这种微妙的局面下,美国或其他任何一国运用他们对华政策,均须极端审慎。我们以为美国或其他任何一国,对于中国的关切援助,似不宜操之过度,因为这将引起两种反应,这两种反应都足以造成与美国关怀中国原意相反的结果。第一,假如一个外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过分援助,将易于引起中国人民对于本国政府的责怨。因为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总应当像个样子,所谓像个样子,即大体上这个政府有能力完善地行使他

的治权,有能力完善地执行他在责任上应该执行的一切事务。假如这件事要外国代劳,那件事又要外国代劳,样样都要外国代劳,那末中国人民必将发生一种感觉,即“我们自己的政府,究竟所管何事?”这种感觉可能引起一种对于政府不满的情绪,而此显非美国之原意。第二,一个国家虽然庸弱,但他的国民仍有一种无可摇撼的自尊心,他们不喜欢外国人过度过问他们本国的事情。假如美国对于中国的事情关切过度,代劳太多,可能使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发生一种恐惧的感觉,而这种恐惧的感觉,即使是一种误会,也大足影响中美两国所已有的友谊。

中国未来局面中的一个安定因素

当然,美国希望有一个安定的中国。安定不仅对于中国自身是一种莫大的需要与福利,并且对于整个远东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都将成为一种重大的贡献。但是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关切中国前途的国家应当进而研究,若向远处看,究竟哪一部分中国人可以对于中国的安定作更大更多的努力。在目前,美国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因为要能安定,须先能有一个强有力而足以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同时还需要在这一个国家里面有一种可以造成社会安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大率寄托在思想开明,拥戴民主,爱好自由,憎恶党争的有科学头脑的进步分子身子。我们历观中国最近二十余年的历史,深感过去中国政治上的人物对于党争的兴趣太浓厚,排除异己,不择手段,一切施政,常以私党的私益为首要,对于真正有关民生的建国大业,大都缺乏兴趣,缺乏热忱。政治上这种人一多,国家即易陷入乱境,而不易纳于治途。因为政治不清明,社会无是非,秩序不安定,民生不改善,而却希望这个国家稳定,是诚难乎其难。所以就今后中国治乱

而论,应当鼓励一切对于党兴趣淡薄的人,出而参政,尽量减少磨擦的空气,多从事改善民生的工作。所以,无论是美国,其他友邦,或中国国内,都应当认清:未来中国的安定和希望,实多少系于今日中国这一批进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应当用各种方法来鼓励他们,使之成为中国未来局面中的一个重要的安定因素。

(原载《客观》第3期,1945年11月24日出版)

第 4 期

共产党的前途

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下院议席仅获二席。二十余年后,她在下院的议席增至191席(1923),为她二十余年前在下院所得议席之九十余倍,并于翌年(1924)在自由党的支持下组织政府。在不到50年的时间之中,工党复进而以392席之绝大多数,掌握政权。1906年工党所得选票,仅为323 185票,40年后(1945)增至11 982 874票,几达40倍之比率。在近代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能不凭借武力与阴谋,完全依靠人心的背向,而能在如此一个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充分的权力,有如英国工党之成就者,实不多见,英国工党的成功,使身为一个中国人的我们,常常容易联想起中国共产党的前途。

我个人觉得,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共产党掌握政权之迟或

早,是和以后中国的执政党的政绩如何互为因果的。即以国民党言,假如国民党过去能依照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切实实行,政治开明,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则今日许多人也不致倾向到共产党方面去。但在过去 20 年中,国民党大部分的人力物力,都耗费在“政治控制”一方面,对于民主的改善,成绩很少。今日国民党不仅在政治方面害着很重的病症;整个行政陷入于一种高度腐化及缺乏效率的状态中,就是在经济方面,也潜伏着极大的危机:党的经济政策未能与民生主义相配而行。一般中国人民不一定欢迎“共产党”。但中国人民生活的艰难,以及在重重压制和剥削下所遇有的种种无可言说的苦痛,实为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必须改善,中国人民的一般生活水准必须提高,又为全世界人士所共同承认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本是两件事情,赞成实行社会主义并不一定就赞成共产党,因为并不是必须共产党的政治能实行社会改革的。但至少到今日为止,国民党既不实行各种社会主义的改革,甚至即使温和的社会改革,则在今日中国的局面下,似乎大家只能将实行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事实上,共产党这几年来对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那种政策政令的能够自上至下贯彻到底,也还有相当成绩。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徒依赖那种旧式的仅靠政治控制可以维持国家局面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必须以能改善人民生活来维持其政权的时代。在这种意义下,至少就今日中国情形来看,共产党是很有前途的。

共产党与“国家”

但就共产党本身言,有若干问题,尚须进而加以检讨。第

一,在国家的立场上,共产党究竟是否以中国为立场;这一点极其重要。共产党之崇奉苏联,是众所共知之事。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每一个国民都有其好恶的自由,甲可以特别崇拜美国,乙可以特别崇拜英国,丙可以特别崇拜德国,凡此既俱为法律所不禁,则共产党党员之特别崇拜苏联,亦属合乎情理。问题是崇拜为一事,立场又为一事,二者截然不同,绝不能混而为一。我们可以崇拜任何一国的政治思想、社会制度以及民族性格,但我们绝不能忘了我们自己仍是一个中国人。假如忘了这点,则将莫知自己努力之意义究竟何在,而不啻成为了他国的工具与傀儡。在这一点上,我个人对于共产党感觉不能满意。六七年以前,中国要求英美的援助时,共产党报纸高呼中国抗战不要变质,谓中国之抗战为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之战,英美为帝国主义国家,故中国不宜接受英美之援助。可惜没有几年,苏联与被共产党报纸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英美,即同立一线;英美对苏联的援助,且数十百倍于英美对中国之援助,而为共产党所崇奉的苏联亦未尝加以拒绝。德国之为侵略国家,世所公认,并奥吞捷,灭波,而苏联竟与之缔结互不侵犯之约,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未尝敢对苏联有一言之不敬。……※在许多地方,常常使人觉得,中国共产党较之苏联似尤“苏联化”,而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恐怕比苏联的报纸更像一个苏联的报纸。我们看英国,英国工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实因英国工党固未尚忘其本身为英国的一个政党,而非英国以外任何一国的政党。他们的立场是“英国的”。工党执政后,英国与苏联的外交,不仅未比保守党执政时的对苏联外交更为亲密,而且两国之间的争执且更加多。我认为今日中国共产党的党人必须明白,我们都是中国人,共产党是一个中国的政党,任何人忘了这一点,无论什么政党都不会得到成功。

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所走的途径

其次,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究竟是走的宪政的路线或是革命的路线?易言之,经由军事的途径抑或经由政治的途径?前者以暴力为手段,后者以和平为方法。这一点也极其重要。我个人不否认共产党有革命的权利,但问题是今日的中国再受得了受不了再发生武力革命。二三十年来内战不息,人祸天灾,年年都有,再加上八年抗战,国力民力,实在已经凋颓到了极度。中国今日需要休养生息,需要和平建设。共产党亦会承认:国民党既不足以武力荡平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足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所以双方诉诸武力,并不足解决国是,徒然糜烂地方人民,噩丧国家元气。毛泽东氏在重庆谈话,亦一再表示以和为贵,则今日中国共产党似乎宜不以暴力推翻政府为可行。但今日中国共产党拥有如许武力,并无阻止地加以扩张,究欲何为?当然,若仅一味偏面地斥责共产党,亦实有失公道;因为今日共产党之所以拥有军队,国民党也应负一部分责任。但现在单就共产党一方面讨论,则我认为在根本上,今日共产党应当在原则上来努力限制国民党的权力;而不宜以自卫为名,自立军队。以自卫为名,自立军队,实已颠倒本末。共产党应当努力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民主,主张军队国家化,由种种合法的程序来限制军队为国民党所利用,提倡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这才是根本的做法,才是一个大党的做法。此亦即我们所以对于在国共会谈中,共产党之只知斤斤计较于自己一党的地盘与势力表示失望。因为以拥军为自卫,在逻辑上将造成伊于胡底的形势。假如以拥军为自卫,或为求自卫必须拥军,则这个“军”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足以自卫?假如(借用共产党报纸的名词)“国民党军队”有 100 个师,共产党有 20 个

师,40个师,60个师,甚或80个师,此即能算“自卫”乎?在量上说“国民党军队”有100个师,固仍可打垮共产党的80个师。假如国民党军队有100个师,而共产党亦非有100个师不可,否则不能“自卫”,然则假如“国民党军队”有1000架空中堡垒,共产党亦须有1000架空中堡垒乎?“国民党军队”有1000架火箭炮,共产党亦须有1000架火箭炮,否则即不足以“自卫”乎?照这样讲“自卫”,则在逻辑上是无法讲得完的。而且,共产党为要“自卫”,甚至到处拆毁铁路,破坏煤矿,就我们一个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看,共产党所用的手段,终不免失之过度。因为共产党这一切行为,其目的固为对抗国民党,而受其损害者,实为国家全体。今日中国,埋头建设犹恐赶不上人家,何能再来恣意破坏。我对于国民党之强欲以武力统治全国的论调,固然反对,对于共产党之以拥有为自卫的论调,亦不谓然。

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存目)

(原载《客观》第4期,1945年12月1日出版)

第 5 期

蒋主席的新演词

杜鲁门总统私人代表洛克,于10月8日自美来华,考察中国经济状况,历时月半,于11月26日离华返美。在洛克离开中

国这一天，中国政府成立了一个最高经济委员会，其目的“在实行民生主义，帮助人民使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今后伟大的和平建设及发展的工作上”。在这次战争之中，中国所受的破坏糜烂，时间最久，程度最深，范围最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已较现代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为低，而经过八年战争的消耗，人民生活的能力，益觉艰难。战争结束，国家人民，均望徐躅苏复，不料又起内争，人民怨愤，友邦失望。然而中国之亟需建设，民生之亟需改善，又为不可再缓之事。政府成立这个最高经济委员会，表示政府正在努力打开目前这种阴霾的局面。

在最高经济委员会的成立会上，蒋主席发表了一篇长达5 000言的演说。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一篇新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具体问题的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人民生活的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物质建设的演说。也可以说，这是一篇象征我们的国家在结束结争以后必须步入另一个新的时代的演说。一个国家固然不能缺乏道德生活的标准，但是一个国家亦不能缺乏物质生活的标准。假如一个国家缺乏物质生活的标准，那也将无法建树道德生活的标准。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社会一般道德生活的破产，也似乎可以说就是因为人人不能足衣足食安居乐业之故。今日中国亟需全力加紧，用种种经济建设的方法来改善人民的生活，以滋养国家的生命。

人民的才干

蒋主席这篇演词里有三处提及“人”的问题。（一）蒋主席述及“我们现在没有充分的有训练的管理及技术人员，去接受并经营以前日本人所办的事业”。（二）在这次经济建设中，蒋主席表示“绝对不能容忍缓慢、贪污、或自私自利的人来榨取人民，以图

谋个人的富贵。这种人员必须铲除，并严加惩办”。（三）蒋主席承认“私人的才干及经营能力是一个民主国家经济进步的原动力”。

上列三点引起我三种感想。第一，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之功。政府固应注意培育人才，政府尤应使有能力的人能够自在地循其才智，自我滋长。有天赋的人，即使不得到政府的培育，也是能自发地得到成功的，只要环境不加阻碍，不加阻止，不加斩伤。同时，培育人才，应多培育“管事的人”，少培育“管人的人”。假如在一个社会里，“管人的人”多于“管事的人”，则这个社会，建设的速率必定降低，而停滞不前及财政消耗的程度必定增加，此实有违现代“经济与效率的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 and Efficiency）。第二，贪污舞弊侵公饱私的人，必须严惩。但事后惩罚，究为下策，与其事后追惩，不若事前预防。任用人员，能力固然重要，操守尤其要紧。今日天下非无洁身有为之士，只看政府如何使他们除奔走蝇营之外能有以自见。目前用人，既大率用推荐之制，则至少在消极方面，一员失身违法，推荐的人也应连带负责，俾推荐用人，可以不致过分徇私。第三，社会乃人之积。国民能力愈强，国家力量愈大，所以政府总要曲尽公道，鼓励人人向上，使人人的智慧的及身体的能力，能作充分优性的发挥。使社会因而得到健全的发展，国家亦可日新又新地向前迈进。

交通启蒙运动

交通是流通金融传播文化的血脉，必须全力加强。但是建筑公路铁道，不要太着眼政治价值，应多注意经济价值。同时，不要只顾到全国性的大动脉，应同时顾到城与城之间，城与镇之间，镇与镇之间，以及乡与乡之间的短途交通。乡村城镇之间的

交通发达以后,农村间的养鸡,种菜,水果种植作业,自可逐渐发展,而农村经济亦得日渐苏复。此实大有助于一般农民的生活;生活裕后始能谈教育,讲卫生,增加常识。所以这种乡村城镇之间的交通,就整个国家的进步与安定而论,其重要性并不在全国性的大动脉之下。这种地方交通,可由地方政府负责,只须中央政府加以督促与指导。但是单单造路浚河,还不够。必须以政府的力量来改革一般民间的交通工具。不要说自国民党执政的20年来,就是自康梁变法图强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一般民间的交通方式,固未尝有何新的改革。河流上航行的依旧是用竹杆与木橹的旧式民船,路面上的交通工具依旧是两人肩抬的轿子。这种一般民间的旧式的交通工具,实为使中国社会不能加速前进的另一原因。行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之路,即须消耗一天的光阴,这在时间上精力上是何等的浪费,政府必须用全力来推动一个交通启蒙运动。乡村间的公路上即使还不能行驶汽车电车,但至少可以制造大量的自行车及三轮车,以行驶于乡村间的道路之上。船舶也应竭力利用比较简单的摩托机器,以增加航行的速率。这些事都须政府来做,大量制造,低价出售,在自然淘汰的原则下,一切旧式的交通工具自然会淘汰。我们应当设法将“机器”插入人民的实际生活中,我认为这是使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耕耘方法的改革

蒋主席在演词里又提及农村的情形,说“我国没有充分的现代农业原料,例如肥料,杀虫剂,与良好的种籽,也没有充分普遍的现代耕耘智识”。蒋主席认为最高经济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就是“应立即筹划一个增进我国农业的切实方案,并付诸实施”。

这一个方案当然应当包括改进农民的耕耘方法在内。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不能和现代各国社会同样进步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做到“以最少的金钱做最大的事业”、“以最少的人力得到最大的效果”这一个原则。在一百多年以前,英国农民的耕耘方法,无论是耕地,下种,收成,储藏以及运输分配等,固无不是依靠人力,依靠手工。但是今日英国农民已知充分利用机器,用机器耕田,用机器下种,用机器翻土,用机器收掘番芋或收割麦子,甚至就在收割麦子的机器上,一面收割麦子,一面将麦穗和麦秆分开,而分开后的麦秆在同一时候经过同一架机器,捆成了一捆,并砌得四四方方。这种科学的耕种方法,简直令人观止!大约估计,在这种机器化的耕种方法之下,一个英国农人的工作效率至少抵得上300个中国农人的工作效率。这种耕种机器化的改革,当然不是在一个短时期所能完成的。同时,我也不相信在最近的20年内,中国农村可以大量利用机器。因为这种耕种方法的改革,所需的条件很多,非像我们在纸上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但是今日我们对于农事的改革,至少应当具有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下,向农村机器化的方向进行。我们一时之间固无法完全仿照高度工业国家之那样什么都用机器,但是我们应当考虑,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以达到节省人工增加效率的目的。举例言之,是不是我们可以利用橡皮管输水的办法,以代替完全用人工戽水的办法?是不是我们可以利用比较简单的器械,以马或牛来拖行,从事翻土耕地以及收割谷子?是不是我们可以相当地扩大农村田亩的平面,减少交错在田亩与田亩之间的田埂,一方面减少废地,增加耕种的面积,同时可以适宜于利用各种比较简单的器械或车辆,以从事耕种。凡此种种,在技术上都有赖专家的研究与设计,我们在此地所能贡献的就是一个原则:“用最少的人力求最大的效果。”

卫生状况

蒋主席又提及人民的卫生状况,认为最高经济委员会“应该集中精力以改善国内的卫生状况”。在中国的建国工作中,卫生状况的改善应该占据重要的地位。前天还有一个英国人问我,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弄得清洁,在 100 年以后中国能不能弄得清洁?这种公用事业,自然应当由政府出面主持,一切污水池塘的填平,内地河流的开浚,垃圾的运输及消灭,传染病的隔离,时疫症的扑灭,鼠的杀灭,公共厕所制度的建立,以及医学的研究,药品的研究与制造,医院的设立,医师的培育,护士的训练等等,都非任何单独个人之能力所及。国家必须对于这种卫生费用,给予很大的预算,并能认真从事,勿徒作为门面的点缀。但是上述种种还都是治标的办法,我们必须同时从根本上着手,来减少疾病的发生,提高国民的健康。因为若是只从医病着手,而不从防病着手,则一面医治疾病,一面制造疾病,不仅对于国家财政是一重永无尽期的负担,并且亦不合乎近代政治的意义。近代政治的意义是要提高人民的知识,使人民能自发地追求其幸福。所以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从事广大的卫生消防工作,同时我们要在根本上改变人民的生活头脑,使他们明了日光,空气,及水的价值,使他们觉得卫生的重要,而养成一种自我清洁的习惯。假如一般人民对于卫生生活甚至一般生活能有一种新的观念,一种新的头脑,他们自然而然地会爱好清洁,减少疾病,提高一般国民健康的水准。

住宅问题

与卫生有密切关系的是住宅。现在中国除了新式都市里的

一部分住宅以外，在一般城市及乡村间，对于住宅的结构与布置，大都没有什么新的改革。这种情形亟需加以注意。对于一般人民的住宅，我们至少应当先做到之事：第一，应力求每一幢住宅的独立，勿与他人的房屋接连，如此可以增加房屋四周的空地，减少污浊的空氣的密度。第二，应当增加窗戶的数量，并改大窗戶的尺寸，使室内容易吸收較多的日光与新鲜空氣。第三，在一般农村之间，应竭力设法使厕所和猪栏和正屋分开，以减少臭味及疾病的传染。

我认为我们既想努力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府似乎应当至少推行一个温和的社会改革运动。今日中国社会急待改革的事情当然很多，但不妨先就几件较为切迫而实在的项目，认真做一下。就说建筑房屋，现在各地地方政府也有工务建屋的管理，但事实上，那种工务管理，恐怕不仅无助于社会的改进，容或反有扰于人民。我认为，一方面，城市应有城市的建筑设计，乡村应有乡村的建筑设计，这些设计总应力求其合乎现代社会的要求，同时，对于一般人民的住宅，也应加以指导，这种指导决不是问他要几个钱才肯给他建筑执照，而是在房屋的结构上，如式样的美丽，避寒避暑的程度，日光的吸收，空气的流通，耐久与安全，对于外部风景的煦和等等，作合理的指导。近代政治原则，所以要求政府指导人民的生活，是因为政府能集国内外专家的研究而得到比较完善的途径。所以政府必须发挥这种任务。

此外，我认为各级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督促与监督下，可以运用地方造产所得，帮助人民改建新屋，或者全部由政府建筑，再以低价租给人民，或者以分期归还的方法，贷款给人民，在政府规定的条件下自建房屋。房屋问题实在也是今日中国民生问题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凡上所述，都是我读了蒋主席最近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上所

致的一篇演词以后的意见。我相信,凡是对政治有抱负的人,对于这些有关民生的问题,都是应该感到极大的兴趣的。

(原载《客观》第5期,1945年12月8日出版)

第 7 期

敬告马歇尔元帅

马歇尔元帅奉命使华,日内可抵重庆。以马歇尔元帅的身份与才识,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中,出使一个情形极其复杂棘手的国家,美国及全世界对于马歇尔元帅信仰之隆,以及马歇尔元帅此行使命之重,殆可想见。中美友好,已成为一种传统。在过去几年的战争中,中国所得力于美国之援助及鼓励者独多;而美国关切中国来日的命运之较他国为尤甚者,亦为情理之自然。我们于马歇尔元帅莅临国都之日,愿以一个在政治党派关系上无所属的自由人民的身份,就国家前途,略贡所见,以为参考。

国民党一党执政,前后20年。20年专政的结果,使国家的生命愈来愈隐弱,人民的生活愈来愈艰难。时至今日,使友邦的元首,也不得不对中国多年以来这种一党专政的局面,表示“必须修改”。中国政治上的改革兴替,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到今日,弄到友邦元首虽不欲出面一言而竟不可得,就我人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国家的耻辱。在历史上,必有人负这种国耻的责任。但是经过多年的一党统治的中国,从各种要求上看,必须进行改革。中国民生之苦,已超出了时代所容许的程度,但

是要改善民生,先须有一个有较强行政能力而又有良好政治道德的政府;世界经过两次大战,必须进入于和平稳定的局面,但要使世界和平稳定,必须消除一切威胁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国的分裂和混乱,足以威胁世界的和平。所以,我们必须希望并使中国能成为一个安定、团结、民主、强盛的国家。

统 一

中国需要统一。但是:

第一,所谓统一,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最高立法权、行政权(包括外交权与军事权)及司法权,属于这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但这个中央政府必须是建筑于大多数的人民的公意之上的。这个政府中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如立法机关的议员及行政部门的行政首长等,必须容许人民或其代表对于他们的进退任免有最后表示意见的权力。这个政府的一切施政,必须以国际及全国人民的福利为目标。统一不是将国家的各种最高权力给予任何一部分少数的特殊阶级,而使他们得以利用这些权力以达到他们这一批少数人物为谋取他们自己的特殊权势及特殊利益。

第二,“统一”的本身不是一个目的,“统一”只是一个条件,一个达到国家的政治目的的条件。国家的政治目的乃在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快乐,文化进步。我们要求国家统一的目的,乃在使国家能于统一以后得以履行其所应负的各种责任;“统一”本身并不是一个最后的目的。

民 主

中国必须走民主的路。我认为:

第一,从事民主的运动,不应当仅仅视之为一种政治运动,应更进一步视之为一种文化运动。我们当然要求在政治上,建立一种民主制度,但是要使这种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根基巩固,必须使人人在日常生活及日常意识中,充分有民主的修养。要人人爱好自由思想,人人有容忍异己的态度,人人能凭理智讨论及处置一切事务。假如人人有民主的头脑及有一种民主的思想方法,则在我们的国家中才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才能根深蒂固而不致徒有其名。

第二,要实行民主应先使人民能自由言论。中国目前第一步应使知识分子能充分自由地表达其意见。其次再求一般人民有自由表达其意见的能力。关于后者,要使一般人民食能饱衣能暖之后,他们才知什么叫“意见”,才能进而希望他们表示意见。所以,来日的中国政府必须实事求是,选几件与民主最有关系的事情,下决心,立勇气,大规模地改革一番。这是充实中国国家生命的一个根本办法。

自 由

任何一国的舆论,大都均系出之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其在今日中国从党治到宪治的过程中,对于知识分子之出而领导舆论,尤感切要:

第一,要使人民有言论之自由,须先能切实保证人民有合法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假如人身自由没有切实的保障,则其他一切自由都不会真正存在。

第二,言论自由包括在公共场所演说的自由,出版报纸及刊物的自由,采访新闻及拍发新闻电报的自由,私人通信的自由,印刷著作物的自由,演戏的自由。凡上种种,俱不受官方或半官

方之任何公开的或不公开的限制,干涉,压迫及威胁。行使上述种种自由权利时,如有触犯法律之处,政府得依法于事后追惩之。

我认为:国民党为表示其倡导民主的诚意起见,应于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以后及国民大会召开之前这一段时间内,通知国民政府废止一切限制上述各种言论自由的法令,并明令允许人民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都可自由出版报纸,出版刊物。

政府改组

为求国家进步及加强进步的速率起见,政府即须加以改组,以容纳有下述四种条件的人才:

1. 有现代的头脑者,
2. 有良好的行政才干者,
3. 有良好的政治操守者,
4. 能将国家及全国人民的利益置于党派的利益之上者。

但是,我们应当充分注意:今日中国的人才并不完全吸收在各党各派之间。在多年的反常的统治之下,有操守,有政治才干及政治抱负的人,大都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今日中国各党各派之间,人才固然不少,但网罗人才并不能完全就各党各派之间求之。我们应尽量鼓励在党派以外的民间人才,参加政府,使他们得到机会以增加其种种有关实际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以为未来的国家之用。

中产阶级与自由分子

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

法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

(原载《客观》第7期,1945年12月22日出版)

第 8 期

杜鲁门声明中的三句话

这一周,重庆的政治热浪正急剧地向上上涨。数月来密云不雨的局面似乎已到了必须打开的阶段。两周以前(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发了一篇长达1500言的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这篇声明不仅非常明确,而且相当硬性。据未证实的传闻,杜鲁门总统这篇演词,就是奉命执行这一声明的马歇尔元帅所起草的。这篇美国对华政策声明,拆穿了讲,只有三句话:

1. 中国内战必须停止;
2. 中国政府必须改组;
3. 能够做到1、2两点,美国就借钱给中国。

马歇尔元帅来华的使命,就是促使中国实现上述1、2两点。

马歇尔元帅来华与中国

我们对于马歇尔元帅的使华,有三层感想。

第一,马歇尔元帅的使华,对于中国及中国的人民,是有益

的。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建设,不希望再有内战;中国人民希望改组政府,使政治上可以有一种新的刷新:政策的刷新,作风的刷新,才干的刷新,以促进国家的进步,繁荣,及强盛;马歇尔元帅此行的任务,正与中国人民上述的愿望相符合,并可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其愿望。所以中国人民对于马歇尔元帅的来华,不仅表示出乎衷心的欢迎,而且满怀期望,希望马歇尔元帅的任务能圆满完成。

第二,现代文明国家已很少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内的政治纠纷,独中国为例外。民国以来,几乎年年有内战。经过八年抗战,世人对于中国的耳目一新,以为中国从此变成了一个新生的国家,向现代政治迈步猛进。不料日本甫告投降,中国即起内争,实在使全世界大失所望。不该发生内战的,竟发生了内战;内战应由中国人自己起而制止者,竟还要劳神友邦,从中调解,可谓丢尽国家的体面。至于政府改组,更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多少人早就要求结束党治,开放政权,铲除贪污,吸收贤能,可是执政当局,一意孤行,置若罔闻,弄到现在,外国人也出来说话了。虽然杜鲁门总统声明:“美国政府素来主张一个原则,即内政处理是主权国家的人民自己的责任,”又说:“美国政府认为关于中国团结的必要的详细步骤,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拟出来,任何外国政府干涉这类事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大家看看这几天来重庆的局面:马歇尔元帅抵渝后,今天接见这一党的代表,明天接见那一派的代表,目的虽为交换意见,而一般印象,马歇尔元帅俨然成为了一个有关今后中国政治前途的中心人物。而且,当杜鲁门总统的声明发表了,马歇尔元帅已启程来华后,我们就听到已有人在作“行政院改组不成问题”的表示了。自己人作合理的要求,硬是“相应不理”,一定要“洋大人”来了,局面才有打开之望,中国人的自暴自弃,想不到竟一致于此。

第三,话虽如此,但目下毕竟是中国政治改变的一个机遇。我们为国家前途着想,就不得不希望在这样一个难再的时期中,朝野各方,相忍为国,和衷共济,不要太重视自己一党一派的利益,能为国家开一个新局面,打出一条新出路。我们希望在野各党各派不要太诉诸感情,趋向极端;同时我们更特别希望专政20年了的国民党能反躬自省,检讨在这20年的大好光阴中,究竟替国家人民做了些什么事情。不满国民党的潮浪,现在泛滥全国,泛滥各阶层,甚至泛滥于大多数超然于政治以外的人民的心底。国民党应当平心静气的检讨:为什么会弄到这样一个局面?是不是许多人不满国民党纯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得失、利害或野心,或者国民党执政的成绩确实难以令人满意?国民党还是有前途的,只要党能够去旧布新,淘汰渣滓,提携有操守有才能的优秀后进党员,以最大的勇气来一次革新运动。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马歇尔元帅的来华,谋促进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进步,那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不过,能够达到民主、和平、团结、进步,也正就是目下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正是平行的,相符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目前这个机会,以促进国家的安定与进步。

政府改组问题的核心

改组政府这一原则,现在大体上已不成问题;问题是在政府如何改组。国民党与反国民党者之间的政治斗争,目下不仅已到了前所未有的那种澎湃的程度,而且在内容上,甚或在性质上,似乎已进入了另一种新的阶段。执政党方面似乎倾向以“改组行政院”作为“改组政府”的解释,而在野党派对此恐难接受。因为就在野党派的观点而言,单单改组行政院并不能达到实现

民主政治的目的。改组行政院仅仅是各党各派,说得好听些是共同参加政府,说得不好听些是彼此分赃,与所谓“民主”者,固仍相去甚远。今日在野各党派,似乎已经认清,“政治精神之改组”较之“政府形式之改组”为尤重要。说得明白些,在野各党派企图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其目的在使人人能服从这一个民主制度,受治于这一个民主制度,无有一人能高出这个制度而站在这个制度之上。这是今日所谓“政府改组”问题的核心。

抑有进者,仅仅是形式上的改组,如传说中的行政院改组等,对于今日之在野党派是大不利的。因为行政院改组的结果当是各党各派共同参加政府,但各党各派参加政府后,未必能贯彻他们原来的政策及作风。经久之后,他们在各种实际的环境里,反而失去主动,同时将因他们在政治上的无作为而失去人民对他们的原有的信仰。这一点,大概也是今日在野各党派所已经看透了。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败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乍寒乍暖,已酝酿了好几个月,现在大概快要举行了。一般人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前途,看法不一。有些人悲观,有些人乐观,甚至有些人且表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些意见,都不免失之偏激。我觉得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或失败,是一个程度问题,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所以我们即使退一步说,政治协商会议若能召开,其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亦无不可。民主政治本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英国今日的民主制度,自古代之贤人会议,以迄今日之国会,亦莫不是一步一步演进而来。民主会议的目的,乃是以多数制服少数,以公意制服独断。中国素乏此种传统(Tradition);故传统本身的建立,在历史上亦

自有其意义。政治协商会议究将得到何种结果,现在言之尚早,我们对于出席会议诸代表的希望是,第一,固然不宜太迁就现实,但也不宜过分诉诸理想;第二,总要先把一党一派甚或一己的小利益放在旁边,然后能发言出乎至诚,论政顾及大局。政治协商会议是一种争取民主的会议,我们实不欲漫无标准地评其为成功或失败,而只希望它所争取得到的“民主”愈多愈佳。

(原载《客观》第8期,1945年12月29日出版)

第 9 期

又是一年开头

又是一个年度的开始。我们在岁尾年首,总不免要对过去有一番检讨,对未来满怀若干希望;这也是人情之常。以我们的国家来说,去年后半段,真是一段富有戏剧性的日子。日本的投降在不到一个星期的短促日子之内,骤然而至,使我八年抗战,也骤然宣告终止。一般人民的欢悦情绪在意想不到的环境下升腾到了极点。可是接着而来的失望也就够惨。最初以为在极短的日子内即可还乡的,到现在还是一步不能动;甚至有些人过分乐观冲动,竟将衣物用具悉数变卖,到头弄得在重庆过不得冬!又有些人对于传说中的“胜利奖金”抱大希望,结果只落得春梦一场。而且各种恼人的消息接踵而来,物价则又于回复到了8月投降时候的指数以后,再作努力上涨的趋向。人民从大高兴跌到大失望,又在大失望中,渐渐麻痹了起来。

然而局势终于在穷则变、变则通的公式中，开始放射出新的希望。政治上风云际会的人物，目下都集合在重庆。民主运动已达到空前高涨的程度。杜鲁门发表了一篇美国对华政策声明，五星大元帅马歇尔奉命到了中国，最近的三国外长会议又对中国大局下了一道虽然简短而极硬性率直的“眉批”。客观环境现在已充分成熟，只待我们变，向好的方向变了。

以万变应不变

国家政治，从政党的角度看，是一种看法；从人民的角度看，又是一种看法。我个人对于“政党活动”的兴趣十分淡薄，而对于“福利政治”的兴趣异常浓厚。政府的组织可以变，政府的政策可以变，政府的人选可以变，但政治的目的不能变；政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障并增进人民的自由、权利与幸福。不论哪一批人来，哪一个党来，总要认认真真拣几件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业，在为民谋福利的原则及目标下，大刀阔斧做一下。“福利政治”在各国都是占第一位的，而“福利政治”在中国的需要尤为切迫，因为中国一般人民的生活实在太无保障，和现代国家的生活水准实在相差太远！在我们记忆中，在中国，政治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少数人，并且也只是做给少数人看的。因为只是做给少数人看的，所以在这一批少数人的心目中，他们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都是好的；他们觉得他们所用的人员，也都是有德之士。因为国家的政治都只是为了少数人，于是这一批少数人便越来越肥，而全国的百姓便越来越瘦。为卡莱尔所称的“人民状况问题”，是历来的英国内阁的第一件大事，而在中国，则很少从事政治的人注意这个问题。若问我的良心，我仍然相信在中国，绝大多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都乐见中国之强

盛,都期望中国之强盛。盖事实上,未有民穷而国可富者,亦未有民弱而国可强者。“以不变应万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以后应当“以万变应不变”——什么都可以变;在政治上应以人民的公意为第一,在经济上,应以人民的生活为第一。政府总要使人民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食粮吃,有工具用,有工作做!

假如在野党派能采行我这个具体的 建议,即可达到使政治协商会议 新闻公开的目的

政治协商会议决定1月10日举行。大家希望政治协商会议举行时,能够允许新闻记者自由采访,让人民能够知道政治协商会议每天在讨论些什么,各党各派或无党无派的代表们在会场上说些什么话,表示些什么意见,从而使人民对于这些代表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所发表的意见,有批评及建议的机会。据报纸所载,在野各党各派都不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新闻公开。政府方面则有人表示恐怕会场狭小,不能容纳新闻记者。这个理由当然极牵强,如因会场太小,则选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做会场好了。所以看上去,大概是政府方面不愿新闻公开。我以为单单“希望”新闻公开或“要求”新闻公开,仍嫌过于消极,我们应当想一个有效的办法,使新闻非公开不可。我现在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既然在野党派赞同新闻公开,则只要在野党派采纳我这个建议,便可达到使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目的。

我认为假如因为政府的反对,致使政治协商会议举行时,不能允许新闻记者自由采访的话,则在野党派可以每天在会后自行招待新闻记者,因为政府可以不许新闻记者旁听政治协商会议,但政府可不能禁止各在野党派,自由招待记者。这种在野党

派招待记者，可以在野各党各自单独招待，或在野各党联合招待。假如是前一种办法，则决定每天在会后招待记者的各党派，可于事前自行排定各党招待记者的时间，务使彼此不相冲突，并将各党招待的时间稍加限止，以便让各报记者回到报馆后有充分的时间写稿子。如甲党定下午 8 时至 8 时 30 分，乙党可定 8 时 30 分至 9 时，丙党可定 9 时至 9 时 30 分等。（假定招待记者在同一地点举行，如在同一地点举行，时间便须另行酌量排定，使记者们有交通往返的时间。）当日会场经过的本身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各党的解释和观感彼此不同，新闻记者及全国人民便可从些不同的各党记者招待会上对于当天的政治协商得到一个轮廓，并从不同的党派的报告，得到一种比较与研究的机会。假如是后一种办法，则可由联合招待记者的党派互推一人，对当天会议情形作一叙述报告，各党可以各派代表在场，如有需要的话，可再补充该报告员报告之不足。这两种招待办法，各有得失，但只要能采行一种，即可使每天的会场详情，传布全国。新闻记者纵使不免太为辛苦，但职责所在，这种招待会即使迟至午夜 12 时，也必不会放弃机会，宁愿减少睡眠出席采访的。

当在野各党派自行招待记者，报告当天会场经过时，在报告中，各在野党派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或多或少地宣传他们本党的观点；这不仅是不可避免之事，而且是极自然之事。这样一来，政府就决不会“相应不理”了，因为假使只让在野党派天天向记者宣传，而自己反而不急起直追，未免吃亏太甚，必不甘心，于是其结果，必定：（一）既然这样，那就不如干脆新闻开放，让各报记者直接到政治协商会议来旁听，自由采访；或者（二），在野党派每天招待记者，政府亦规定时间招待记者。不论出于哪一种，总之，我们完全得以实现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目的。

假如在野党派有诚意使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话，他们

应当不具任何成见,认真考虑我这个切实具体的建议,而很乐于接受去实行。

(原载《客观》第9期,1946年1月5日出版)

第 10 期

我对于所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非政府代表的一个重要进言

政治协商会议开过以后,政府殆将进行改组;改组的方式和程度,尚不详知,我愿就此事,对所有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进重要之一言。

我认为在未来的政府改组中,所有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能竭力避免参加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为最上策。这有几个理由:

第一,中国社会上有一种传统的观念:以为在野的人物批评政府,其目的即在“做官”。这一种观念当然是不正确的。一则所谓“做官”,就是参加政府;参加政府是对国家的一种服役,并不是一件坏事。二则批评政府的人,并不一定只是为了想“做官”,自亦有人确以国事为襟怀,以民生为痛痒,作为放言发论的目标。但这种观念虽不正确,而却极普遍。并且不幸在中国,做官虽非坏事,而做官人的德行,则常不为人民所器重崇服。假如现在这些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在野党派领袖,在政府改组时,立刻参加政府,闻此一事实,极易被人民误解,以为这一批人之所以高喊民

主,其目的即在“做官”,使向为一般人民所有的那种虽不正确但却极普遍的传统怀疑,得到了新的证实。而且,许多内心反对民主的人,借此亦可大事宣传:“你们看,这一批人今天民主,明天民主,结果还不是想做官?”这种误解和破坏,其不足取,固无待论,然而对于整个的民主运动,却将发生极不利的影晌。今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都是以实现达到民主政治为任务的,为了“民主政治”的前途,他们似乎应当考虑他们的出处,务使不要因他们之参加政府而使民主运动遭受误解与打击。

第二,从事政党活动的是一种人才,从事实际行政的又是一种人才。前一种人才的条件是头脑敏捷,口才伶俐,文笔锋锐,行为果敢;后一种人才的条件是精细周详,宁静任怨,有条理,有效率,有操守。这两种才干可以兼长于一人,但不一定为人人所兼有。故今日之从事政党活动者,以之司组织,策纵横,事宣传,感绰然有余,如一旦身负实际行政责任,是否能有有条不紊,洁身自持,尚难断言。国事体大,从政者幸而成功,国家人民两受其赐,不幸失败,国家人民两受其累。我们从事民主运动,其最高目的是希望将国家弄好,因之我们每人在有机会参加政府时,仍不得不慎审自省,自问其行政才干是否胜任;其立身操守能否自持,而勿眩于功名,贸然决定。我们总当以国家的得失为前提,视一己的富贵如浮云。

第三,一年以来,我们若从另一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平心承认,今日之非国民党党员,其言论实较之一般国民党党员为自由。这有两大原因:一、一般国民党党员未必对本党执政的成绩感到满意,譬如前年湘桂战役的失败,以及去年接收人员的不法等等荦荦大端,都使一般国民党党员无法为其本党作正面的辩议;二、国民党党员在党内种种环境及顾忌下,反不能自由发言,不论此项发言是批评本党或攻击敌党。倒是在野党派或超党派

的人,可以对现局自由评论。可是政府一旦改组以后,这种情形便将发生改变。再说实际参加政府,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单纯。要具备许多条件,参加以后,始有成功之望。就今日在野党派言,恐怕只有共产党推举出来的人,参加政府以后,较有站得住的把握,因为共产党在组织、群众及主义三者,均有根基。在组织、群众及主义三事上没有根基的人,一旦参加政府,则向之处于主动地位者,必一瞬间而处于被动地位;向之批评他人者,恐不数日即将成为被人批评之对象。若无把握,与其进,不如不进。此中机微,似宜慎审而熟虑之。

但是,平时要求政府改组,政府真正改组了,又辞而不入,言之似难成理。因此,我有一个较为具体的建议,即各党派如决定参加政府,可由今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党派代表,就他们本党或党外,推荐他们所熟知或钦佩的贤能,参加政府。果能如此,则一,仍达到了各党派参加政府的目的,二,推选出来的人才必定更为客观,三,各代表虽替国家开了“民主之门”,而自己并不走进这扇门去,亦大足表示吾人平时批评政府,要求政治进步的胸怀。好在各党派都是济济多士,所网罗的人才,必不仅限于今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这几个代表,而此种举贤荐能的风气若能形成,则亦大可一扫多年以来争官夺位的现象。我作此进言,容不免有浇冷水之嫌,然其初衷,确是为了爱国家,爱民主,爱人才。若有不以余言为是而急功好利者,则他们将来之得失毁誉,吾人可以拭目待之。

内 战 停 止

内战终于1月10日宣告停止,化干戈为玉帛,这实在是天字第一号的可庆事?共产党提出无条件立刻停战后,政府曾提

出了一个对案,其后共产党又提出了一个对案,凡此报端均有记载,此处不须复述。据传,政府方面对共产党所提出的对案,原拟再提一个对案,但当共产党的对案提出后,中间人即认为已到了可以谈判的程度,所以终于能在7日上午10时,在“重庆东端的石屋”中,由政府及共产党的代表,协同驻华特使,就有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协议讨论。据悉,内战的停止,并不单单依赖命令行之——不单单由冲突双方的司令部下令停战,并且将由美方派人会同双方代表驰赴每一战场,切实执行,使从桌面上的“停止内战”变成真正的“停止内战”。

我们真是欣幸内战终能停止。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都反对内战。完全凭借武力来解决政治纠纷的时代,业已过去;此路实不可通。我在本刊第2期“客观一周”里说:

凭借军事究竟能解决得了一切吗?否则打了一半,终出于妥协,则所有死者伤者,以及遭受军灾者,他们所受的苦痛损失,究为何事?岂非天下之大大滑稽?

现在翻读前文,再看到报纸上所载胜利大厦的一片干杯声,真是感慨系之。这次内战总算停止,我们现在应当更进一步,从根本上想法,不使将来中国再有内战。截至8日止,大局趋势虽已极明了确切,而热河方面的战事依然激烈,甚至有些人认为非进占承德,不足以保军事形势上的需要,只此一端,即可见凭借武力来控制政治的意图,在今日中国,仍极浓厚。今日中国的政治家,应贡献其智慧,替国家打一个千秋万世之基,希望这一次的内战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内战。

谈人力车的废止

报载交通当局即将废止人力车的通行,拟分10期,至三十

七年底,全国禁绝。此一计划,其动机及目的所在,不甚详知。人力车当然是一种不人道的交通制度,所以在原则上,予以禁绝,无人异议。但此事牵涉到许多有关问题。若说为了人道,则今日中国,比人力车还要不人道的制度和情形,恐还不少,假如政府的眼光确已转向到了这一方面,准备一一改善,这自是人民之大福,大可额手称庆。人力车这种交通工具存在东方各国,自有其社会背景。落后的国家缺乏应用机器的能力,依赖人力的交通工具,自然应之而生,同时,欧美人力比较珍贵,东方国家,民生凋敝,生活困难,用人力来拉车,亦即成为一种生活的方法。所以,在国家既一不能负责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二又不能供给人民的交通工具,则人力车的存在,也是一种极为自然的现象,而人力车夫不仅以此解决他们的生活,对社会言,抑不失为一种服务。政府现在既想禁绝人力车,则第一,政府对于这一批失业的人力车夫,应有一种合理的处理。一方面不要使这一批人力车夫因之而生活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要使这部分有用的劳力,旷费不用。第二,对社会言,政府既想废止人力车,在废止人力车以前,政府应设法供应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假如来日城市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是以电车及公共汽车为主,则政府应负责供给这种公共交通工具,务使这种供给能符合实际上的需要为止;否则,必致引起社会秩序的扰乱,影响人民的工作效率。至于私人的交通工具,政府要是鼓励人民用小汽车,三轮车,或自行车,则政府应有计划地大量生产这些交通工具,以供应人民的需要,单单在报纸上说以后人民交通工具以自行车等为主,而事实上,人民并无自行车等可购,则不当解除人民所仅有的交通工具,而使不能利用交通工具以节省他们因步行而耗费的精力与时间。我是最注重“经济及效率的原则”的,我认为国家应当负责来改进我们的交通工具,使我们可以以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工

作,但要改进我们的交通工具。乃是提倡并供应比人力车更有效率的交通工具,而非单单消极地废止人力车的通行。

(原载《客观》第10期,1946年1月12日出版)

第 12 期

停战令下,战仍不停(存目)

协商成就(存目)

知识分子、工商阶级、民主运动

最近中国政治运动里有一个以前未有的特色,即工商界的过问政治。过去工商界大都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关起大门自己经营他们的事业。然而现在他们之过问政治,也是环境使然,因为各种苦痛的经验,使他们明白政治不上轨道,一切事业筑于沙滩,不能得到确切的保障。近代的民主政治可说是一种以中产阶级为骨干的政治,自本世纪以来,虽然社会主义的思潮汹涌澎湃,劳工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日见重要,但政治运动,大体上仍由中产阶级在领导着。中国的知识阶级素来关切政治,民国以来的几件大事,几乎没有一件教育界没有参加——不仅参加,而且居于领导地位。只是单单由教育界参加政治运动或发

表对国是的意见,其影响虽至远且久,但在组织及持久上,总觉得较为消极,由教育界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来势纵猛不久又趋平静之感。政治运动不能缺乏“组织”与“经费”,则此即为教育界人士的短处,因为大家忙于研究学术,没有时间经常从事学术以外的实际活动。除非实在看不顺眼,才出来说话。至于财力,教育界人素极清苦,糊口已属勉强,焉有余力负担经久的费用。现在工商界人也出来过问政治,争取民主。工商界人在经济基础较有底子,所以以长补短,正补上了民主阵线里原有的缺陷。工商界人如能与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易发生有实质的力量。要中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先得使中国有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正在缔造之中。

告 别 读 者

本刊原定在重庆出 12 期。政局变化莫测,我们当初误以为不待 12 期出完,政治重心或已东移了。现在 12 期已出完,而政治局势则正在高速度发展之中,本刊自不宜就此中断。但编者个人则因计划已定,即将离渝,本刊编务不能兼顾,因自 13 期起,改由吴世昌先生主编。过去 12 期的稿费,(副叶及珊瑚例由各该编辑人发付)早均随时发付。凡是直接寄给我的信,大都均经亲复;最近 10 天内收到的信,也必将于离渝前一一答复。未用各稿,以及继续收到的投稿,已转吴世昌先生,由他决定。以后读者投书投稿,请径寄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吴先生。在过去三个月中,前辈先进,友朋读者,都给我不少指示、协助和鼓励,我在此表示无限感谢。

(原载《客观》第 12 期,1946 年 1 月 26 日出版)

《观察》文章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一

本刊筹备多月，历经艰苦，终于今日问世。创刊伊始，兹谨一述我们出版这一个刊物的志趣、风度和立场。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

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但要抗御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难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

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但是这个刊物也不仅仅是一个论评时事的刊物。我们还有另一个在程度上占着同样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对于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多年以来,青年实在烦闷。在多年的烦闷中,意志软弱的,渐渐趋入麻痹、消沉及自我享乐的道路;刚强的则流于偏激。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厉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们瞻念国家,中心忧惧,莫此为甚!我们都是爱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言,我们对于青年,一无成见,他们信右信左,尽可信其所信;而且他们能够信其所信,无宁且为我们所鼓励并器重者。我们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发较之思想的归宿,远为重要,所以信从一种政治上的思想,必须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而于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们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人生的目的非仅图一己的饱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现代化的头脑——思想的方法现代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我们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足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我们极望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影响。

二

其次,请一述我们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约:

一、民主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拒。我们不

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须经济民主。

二、自由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三、进步 我们要求国家进步,我们绝对反对国家停滞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我们希望人人都有现代化的头脑。唯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并世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我们反对一切的停滞不前,故步自封,甚至大开倒车。停顿、落后、退步,都是自杀。我们要求中国在各方面都能日新又新,齐着世界主流,迈步前进。

四、理性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

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唯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我们谨以上陈四义,作为我们追求努力的鹄的,并本此以发言论事。我们的态度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发刊之始,谨述其志趣与立场如上。尚祈全国贤达,不吝指教,惠予匡助,本刊幸甚,国家幸甚。

(原载《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出版)

失败的统治

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20年。20年执政的结果: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国民党有主义,有理想,当初也是满怀热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何以执政20年,反弄成今日这样一个局面: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见衰落,就国家社会,也给弄得

千疮百孔,不可收拾。其中症结,实堪研究。

一个政党执政的成败,原因既多且极复杂,非执一言所能论议;然其成败之键,必有最基本的原因可寻。作者以为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用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着,毁坏全局。政党要获取政权,原为题中必有之义:在野的要想法获取政权,在朝的要维护其既得的政权;中外古今,无有例外。但欧美政党,恒以施政的政绩来维护其政权:国防务臻安全,外交总替本国说话,政治力求清明,经济尽量求其繁荣,一切在交通、教育、治安、卫生、房屋、休闲各方面,无不用最大的力量向最好的目标做去。所以欧美各国,无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就是苏联,其政体虽然另树一帜,但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励精图治,到底把国家弄得像个样子,在国内,能使人人衣食不愁,在国际上,能够打退强敌的侵犯。只要政绩良好,人心自然归附;人民拥戴政府,政权自然不愁动摇;而朝野分头努力,国家因亦可抵昌盛康乐之境。

不幸中国国民党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我们先看这20年来,我们的国家有什么进步?言军事,我们根本谈不上“国防”,人家已走进原子和雷达的世界,我们还停留在步兵和机关枪时代。言政治,这几年来政治的技术大有进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无不随时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质上则愈来愈开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则尤见江河日下。言交通,20年来我们曾铺了多少铁路,造了多少轮船?甚至到现在为止,不仅还不能制造一架飞机,甚至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言教育文化,20年来我们的科学发明在哪儿?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在哪儿?音乐和绘画有何成就?其尤甚者,

一般的教育水准及文化水准是在向上升还是往下降？至于经济建设，土地改革，这一切有关民生的大问题，大都空言多于事实，计划多于实效。然而 20 年来我们的执政党到底在做什么工作？一言蔽之，这 20 年来国民党只聚精会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加强消极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权的巩固。养许多兵，是为了巩固政权；一切党团的组织、活动、训练，是为了巩固政权；特务和各种检查制度的施行，是为了巩固政权；就是公路的开辟、电话网的布置，也无一非出自军事及治安的观点，其目的仍是为了巩固政权。20 年来，只有这项消极的政治控制工作，吸引着国民党无比的兴趣和重视，表现着国民党最大的勇敢、决心和魄力。20 年来，我们做百姓的，只有这一个项目，使我们到处听得到、看得见、嗅得着，并感觉到它的紧张、严密、认真，和不放松。但是也就在这一个项目下，这 20 年来，不知消耗了国家多少金钱，雇用了国家多少人力，浪费了国家多少智慧，糟塌了国家多少光阴！当前的执政党既倾其全力于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大大影响他在积极方面的种种建设工作。所以，20 年来，我们的交通和水利没有高度的建设，土地制度没有革命性的改革，耕耘的方法和耕耘的工具依旧墨守陈规，种子和肥料毫无新的改进，人民的居室依然黑暗而污秽，民间的代步工具仍然滞留在原始阶段，一切近代的机器生活从无机插入乡村，保健事业和社会救济有名无实，疾病与贫穷仍弥漫全国，一般人民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苦痛，以及生活的观念，毫无改变，毫无进步。凡上所述，俱属琐碎，而无一非建国元气所系，但从来没有见到政府有兴趣和决心推行过任何全国性的温和的社会改革。20 年来中国的执政者，只有在征税和壮丁两件事上才思及人民，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几不复占到任何重要地位！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

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治生活中本来潜有物理的作用:政绩腐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须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循环,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

抑有进者,太重视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同时促成道德的堕落。政治控制是以力取人而不以德服人,主使这种政策及执行这种工作的人,必为无道不德之徒,流风所至,遗害难言;这是一层。其次,在一个以力而不以德治人的社会中,有骨气的人,心难甘服,于是偏激者“逼上梁山”,中庸者洁身自好,柔弱者颓靡消沉。国家尽失梁栋,社会无复正气。其三,在唯力是视的社会上,断无非公平可言。我们看这几年来,国人的意见,政府置若罔闻,而美国一言半语,当局无不重为考虑,因为美国有飞机大炮和金钱;无党无派小党小派的人,喊破了喉咙也是白费,而共产党的意见,就不能相应不理,因为共产党有枪杆;甚至教授罢教,政府可以听其自生自灭,而工人罢工,有司不能不管;一切只讲强力。只讲强力的社会必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同时亦即为一个乱的社会。其四,要求政权巩固,自然不愿政局发生不必要的波澜,于是老朽之辈,虽庸碌一无成就,亦可尸位十载而不易,“忠实”之徒,虽恶行多端,众口所诛,亦仍能安如磐山,行其所行。贤不肖不复有别,而国家取士之道尽失!

在一般国民党人的心目中,以为今日党的生存问题,其重点莫过于敌党之消灭。作者则以为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今日国民党的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党,自然更不是如何消灭敌党,而是自己能不能认认真真硬硬扎扎实实赶快做几件像样的事情。今日一般人民所要求者,是(一)没有房子住的能有房子住,(二)没有衣服穿的能有衣服穿,(三)没有饭吃的能有饭吃,(四)能让他们和平

地安于他们的工作,乐于他们的工作。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则更进而希望国家有尊严,有前途。假如大家有屋住、有衣穿、有饭吃、能乐业,人心自然归附,社会自然安定,国家自然结实,国际上自有地位,整个国家的前途自然充满着光辉与希望,而今日批评政府者,亦必将拥戴政府之不暇。今日之世,未有国家垮台而政党可以站住者,亦未有人民贫穷而国家可以富强者;富国先富民,兴党先兴国。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20年的时间不算短;20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一个执政的政党,必须以政绩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能如此,国家有利,党亦有利;否则,国家也许有前途,而党决决无前途。

9月9日

(原载《观察》第1卷第3期,1946年9月14日出版)

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分。在战争中,美国援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除了在日后发觉的雅尔达会议一次以外,美国没有背负过我们。我们赖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紧牙关,撑过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获取最后的胜利。美国

一般社会平时所有的那种浅浮、放狂、享乐的生活方式，向不为世人器重，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所充分表现了的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获有深刻印象：美国男女竟然不仅仅是“公子哥儿”，亦复为有血有汗的英勇斗士。无论是美国国内的生产速率、社会管制、团结合作，或在全球各区战场美人所表现的冲刺力、组织力，以及勇敢坚毅的牺牲精神，俱有超度成就，赢得全世界的敬服。罗斯福总统不仅使大局从逆势中扭转过来，并且赖有他所独具的崇高的人格和理想，使这个战争，从一个实际上纯然是一个利害冲突的战争，变成为一个有理想、有原则、有灵性的战争。他所领导的大西洋宪章以及他所号召的四大自由，成了无论在前方后方直接或间接参加战争生活的千万男女心灵上所共有的一个神圣的鹄的。当中国的政府、人民、军队，依然被驱于中国西部的山谷地带时候，罗斯福总统去世的噩耗传来，不知引起中国多少男女的悲悼哀思！中国人感激美国，器重美国，甚至崇拜美国！这种广泛普遍的友情，在国际历史中亦不多见。

但是这种感情在过去短短几个月中，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复杂的，然而却是苦痛的。我们不满意目前美国种种对华做法，但我们不忘情在战时美国给予我们的同情和援助；我们无可抑止地仍然缅怀故罗斯福总统的崇高伟大，但我们明白今日之美国已非昨日之美国。这诚然是一个不幸的变化，不幸这又竟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变化。

二

在过去数月中，美国对华政策，引起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摘。美国在华活动，大别可分两项，一为美军驻华，一为参加调解。

先说美军驻华。美国驻华的理由,根据去年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声明:

“为了继续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此次战时经常的合作,为了符合波茨坦宣言,并且为了清除在中国境内日本势力残留的可能性,美国特定一种确定的义务,使日军缴械和撤退。

“因此,美国曾经,并将继续,协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使被解放地域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美国海军现留华北即是为了这个目的。”

在同一声明上,又说:

“美国已经为了恢复因日本侵略东北而首被破坏的和平,被迫付出巨大代价。除非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除非中国取得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地位,则太平洋的和平即使不被破坏,也将遭到危险。这是美国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的目的。”

我们根据上引美军驻华的理由,陈述下列意见:

1. 在理论上说,世界和平不可分。美国牺牲了多少生命,耗费了多少物资,其目的在求世界的和平。凡足以威胁或破坏世界和平者,美国有发言的权利和义务。这个理论,我们不欲否认之。在战时,中国和美国同为盟国,并肩抗敌,这是事实。这个事实,我们承认之。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承认美国有在中国境内使用武力以协助中国国民政府使日军缴械和撤退的权利和义务。

2. 美军驻华的理由,既为协助中国国民政府在中国境内使日军缴械和撤退,则我们认为,此项使中国境内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显然应以中国国民政府为主体,美军处于协助的地位;充其量,中美双方平肩协力共同合作,使日军缴械及撤退。

3. 但是我们愿意知道,在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上,中国国民政府有未充分发挥他全部的心力和能力,以尽他应尽的义务?我们同样愿意知道,日本受降已逾一年,日军的缴械和遣散

的工作,迄今有未全部完成?如已完成,是否美国即可认为“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而撤退驻华美军?如其尚未完成,何以中国国民政府不先尽其全力以从事他应负担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反以其力量从事于国内其他与日军缴械撤退工作无关的军事行动?

4. 假定美国容许中国国民政府不先尽其全力以从事他应负担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分用其力量从事于国内其他与日军缴械和撤退工作无关的军事活动,我们不得不认为:此即足以表示美国谅解、默认,甚或鼓励中国国民政府得先不履行其对同盟国并肩对日作战中所应负责任,而以其全部力量从事于自相残杀的内战。

中国现在在事实上已是一个全面内战的局面。在这一个内战中,无论美国有未在任何形式之下给予内战中两造之任何一造以任何直接的支助,但至少,美国有未考虑过:美军驻华、物资转让、经济贷款,以及其他行为,在事实上,足以使今日中国内战中两造的任何一造在心理上得到一种倾向内战的鼓励?美国有未考虑过在这方面美国所负有的道德责任?

6. 假定美国认为:即使“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而中国尚未“取得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地位”,美国是否仍将“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统一与民主是两件事,假定中国业已统一,而并不民主,则美国是否继续“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直至美国认为中国既统一而亦民主时为止?

我们即使在十分心平气和的检讨下,亦不得不说:美军继续驻华确是一种不合事宜的行为。美国也许认为,在华驻军,可以有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但事实上,这个假定无法成立。这几个月来,中国的“和平”绝无任何足以令人安慰的进步,内战的范围和程度反而与日俱深;这足以表示美军继续驻华绝无助于中

国的缔造和平统一的工作；美军继续驻华这一行为，仅仅使在中国内政上业已非常复杂混乱的局面，因此增加若干更多的意外的纠纷，同时并因此引起许多在中美国民邦交上所不必要的批评和指摘。在理论上，除了战胜国驻军战败国以外，我们亦绝难承认，乙国之国内和平，可以以甲国之驻军而赢致之。

三

其次论参加调解。根据上文所引同一声明，美国参加调解中国内争的目的，是要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强盛、团结、民主的中国”。调解的原则为：

“美国认清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是一个一党政府，并且相信，假使这个政府基础能扩大，包括国内别的政治分子，则中国的和平、团结与民主的改革将被推进。因此，美国强调主张国内各主要政治分子的代表的全全国性会议协议办法，给这些分子在国民政府中一种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

这一段文字在政治方面的主要意思，就是希望修改 20 年来中国一党训政的政治，使之从一党专政的国家变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该声明最后并说：

中国如照上述路线走向和平与团结的时候，美国准备以各种合理方法援助国民政府，重建国家，改善农工业经济，建立军队组织，足以为维持和平与秩序而尽其国防上与国际上应有的责任。

“在推进这类协助之中，对于中国在合理条件之下为了用于中国全国的健全经济及中美间的健全贸易的发展而计划的向美要求信用贷款及借款，美国准备加以有利于中国的考虑。”

去年 12 月 15 日杜鲁门总统发表的对华声明，确是非常公

正、合理、友好的；它符合今日绝大部分中国人民的愿望。今日中国人民所要求者，在政治上是民主自由，在经济上是民生改善。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除了这些基本民权的要求，中国人民并进而要求政府（无论执政的是甲党或乙党）能对人民负他在政治上应负的责任。消极方面要肃清贪污、提高效能，积极方面应有所建设，这些建设并应与他执政时间的久暂成为比例。在经济生活方面，中国人民切迫希望政府能施行若干全国性的温和的社会改革，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限制一切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国人民非常切望在政治及经济方面都能得到改革，发生不流血的革命；而努力寻求这些改革，目前最切迫的要求是和平安定。内战绝对打不得。打内战要死人，要烧房子，要掠夺农民嘴里的米粒；打内战使币值愈来愈贬低，工商业愈来愈萧条，一般国民的情绪愈来愈消沉；整个国家因内战而陷入于恐惧、怨愤、悲观、麻痹、苦痛、绝望的境地。这是全无意义的大消耗大浪费，这是误国害国、灭国的大悲剧！

上面这一段最简单的陈述，我们相信就是今日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呼吁和要求。但是我们正视今日中国的大局，不要说毫无开

国规模,甚至亦无建国气象,一切活动作为仅仅是在撑持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当前中国政府上的最有声色的滑稽杰作,就是政府说的都是甜的,做的却是辣的。当政的人物嘴里天天在喊民主,但是一切真正的民主活动,在中国却普遍而无例外地在各种不同方式的压迫下,遭受限制、阻碍、取缔和威胁。这简直是不可理解并亦不可信的作风。在现行政治风气下,贪污已经成为常态,不贪污反成为变态。公家机关的腐败黑暗,已至难以想象的程度。然而人民除叹息并默默地忍受外,竟无一点有实质的反抗能力!经济生活愈来愈恶劣。蒋主席今夏在牯岭声称,如若中国尚有一人无衣无食,即是国民党的革命使命尚未完成。这真是仁者之心!可惜国民党执政20年的结果,本来有白米吃的,现在已无白米吃了;本来可以一天吃两餐饭的,现在只能吃一餐饭了;本来穿长衫的,现在不穿长衫或是穿不起长衫了;本来有房子住的,现在没有房子住了!我们看,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里,不知有多少人沉沦在饥馑和寒冷的死亡线上。就是在这不夜的城市里,街头巷尾,也到处都是无食无宿的流民乞丐。在这样一片锦绣山河的土地上,竟有万万以上的人民,过着与畜生生活无殊的生活。而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局面下,还要从事内战,活生生的把人民的血、肉、皮,掺着人民的汗、泪、血,建筑少数人的“权力之殿”!人道!人道!人道何在!政治家的良心何在!

一如上面叙述的这样一个落伍、黑暗、悲惨、无人道的国家,假如美国确是关切中国的前途,关切中国人民的幸福,显然不是美国所希望,并所能坐视的。美国参加中国的和谈,在政党的纠纷上,企图调解国民党及其反对党之间的冲突;在统治的精神上,企图使中国变独裁而为民主;在国家的內容上,希望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繁荣。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是中国之幸,美国之幸,世界之幸。调解党争的本身显然不是一个目的,调解党争的目的,仍

在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进步、繁荣。同时,今日中国全盘的政治问题,不仅仅是党争问题;不是党争的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解决中国党争问题仅仅是改革中国政治问题的一项,甚至可以说,这一项,确是非常迫切的一项,但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项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劳苦大众的生活,培植中产阶级的力量,鼓励开明进步而有现代化头脑的民主自由分子的抬头。中国的乱,在经济上的原因,是大家太穷了,绝大部分比的人民都沉沦在生活的水平线之下;在政治上的原因,是中产阶级没有力量,没有组织;在道德上的原因,是有抱负、有操守、有能力的人无法为国家服役。(为国家服役绝非任官之谓。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即在一个部长之下。)对于这样一个总括的目的,美国既然过问中国问题,就须一方面调解目前中国政治上最切迫的党争问题,一方面亦须从根本上压迫政府作事实上的种种改革。一切民主活动,只要合理而无损于社会的安全,应当容许其存在。但是我们回顾过去几个月中,美国对于为作者所重视的一部分,可谓一无努力。在法律上,美国承认的中国政府是国民政府,美国当然尊重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我们绝对非常公道地同情:美国之欲支持国民政府,诚亦事理之常。但是,美国之支持国民政府应该是有条件的。易言之,美国之支持国民政府,必须这个政府真能向民主之路进行。而我们历观往事,面视实际,我们实难发见任何足使美国必须支持今日中国这样一个政府的理由。

四

再进一步说。在原则上,我们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过

問中國的內政。但是我們政治上那些人物，自己沒有能力，20年的統治造成了今日這樣一個局面，到頭要外國人來“調解”，使外國人來要“調解”，甚至使中國問題竟成了莫斯科三國宣言中所包含的一端，我們全中國人民的人格尊榮，實在給那些台上的人物剝光剝盡了！但是尊榮是一種感情，而政治卻是一種現實。我們很含羞地說，假如因外國的插入過問，而使中國人民獲得和平、民主、自由，則亦不失為一項“滿意的交易”。不幸今日中國人民，已被動地做了一次“無所獲的拋出”。1766年美洲的獨立革命，產生了一個新的自由民主的美國，但歷史家告訴我們，1766年美洲的獨立革命，同時也促成了一個近代的自由民主的英國。喬治三世時代的英國是最反動頑固的。美洲殖民地的稅收，要由威司敏斯特決定，這一原則，廣泛地說，就是人民的意志權利一無保障，統治權悉操於少數專制人物的掌中。賴有英國軍隊在美洲殖民地吃了敗仗，於是皇黨的威風大殺，人民的力量抬頭。在中國，單說抗戰期間，亦有同樣的事實：“武漢時代”在當時中國政治上，却成一個局面，另有一番風氣，時正承南京淪陷，徐州被圍之後。三十三年中國軍隊自長沙至貴州作瘋狂的潰敗，日本進叩貴陽之戶的時候，政府威風稍斂，民氣一度昌揚。歷史說明：一個以軍隊為統治資本的政府，當他每打一次勝仗，他那捏緊不放的心理亦必隨之增強。所以鼓勵這種政府在內戰中取得勝利，就無異鼓勵這種政府加強他加緊控制的傾向。在另一方面，現在美國是有錢的國家，中國是貧窮的國家；美國是強大的國家，中國是衰弱的國家；假如美國在此時間，欲使中國為其尾巴，成其工具，是直乘人之危，非盡友邦之道。我們看到現在中國的美國人，橫沖直撞，任意毆打學生，調戲婦女，碾死行人，簡直目無“中國”。我們的政府，在外交上，一味的跟着美國走；在经济上，沒有錢就向美國要；在內政上，請美國參加和

谈。我们几乎可以夸张地说，今日中国在精神上实已亡于美国了！我们不欲否认，美国之过问中国政治，到头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国一方面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同时也须真为中国的幸福前途公道打算。能如此，中国人民会得在心底里感激美国，否则，美国必将失去众多中国人民对于美国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就是多年以来美国的政治家外交家所要获致的。

三十五年十一月 上海

(原载《观察》第1卷第11期，1946年11月9日出版)

论上海民乱

本年7月，上海市政当局，认为摊贩有碍观瞻，妨害交通，决予取缔。据吴市长12月1日广播：“警局对摊贩之处罚，第一第二两次违章设摊者处以罚款，第三次给予拘押。”又称：“当市府决定取缔摊贩时，亦曾充分顾及彼等(摊贩)之生计问题，故给予8、9、10三个月之限期，劝令于此时期内，迁地营业，或另谋生计。”在最近三四个月中，一般摊贩，因为政府将予取缔，生活发生问题，大都感觉忧虑不安。

11月26日，上海警务当局，开始严格执行命令，拘捕小贩。被拘小贩，据报导约达七八百名；分押黄浦老闸两区分局。适值寒流袭沪，气候骤降。被捕小贩家属，送衣送饭，狃于积习，诸多干格。同时谣传被捕小贩已有数人因饥寒死于拘留所中，群情激愤。11月30日清晨，被捕小贩家属多人，前往黄浦分局请愿，要求释放。其后闻风往者，愈聚愈众。警务当局，运用各种

警卫方法，防止弹压。在这激荡的骚动中，若干商店被群众捣毁，全市歇业，交通阻断，警察鸣枪多次，多人受伤。全市陷入极度的混乱、动荡、恐怖、不安；详细情形，业见报载。这次骚动，延续至 48 小时之久，牵连的地区几占上海全部商业区域。直接参加这次骚动者，约在 5 万人左右，间接受此次骚动影响者，约在 100 万人左右，而同情关怀这次骚动者，至少在 300 万人以上；这些还都是最保守的估计。

我们对于这次骚动，默察其间因果趋向，不无感触。第一，这次骚动的性质，不仅仅是经济的，亦复为政治的及社会的。摊贩摆摊，为了生活。市府决心取缔，摊贩设摊如故，此非藐视政令，实为生计所迫。市府虽然“给予 8、9、10 三个月之限期，劝令于此时期内，迁地营业，或另谋生计”，但“迁地”一节，当局迄未指定地点；同时摊贩经营，全靠闹区，如果迁他地，是否仍有“营业”，亦为问题。至于改业，国内经济萧条如此，遍地失业，空言改业，谈何容易。摆摊的人数所以越来越多，殆足说明找寻职业之不易；走此一着，聊以糊口；市府虽宽以时限，但政府给予摊贩的，只是改业的“时间”，而非改业的“职业”。政府若能解决摊贩的职业问题，则摊贩何乐而不改就他业？这种由摊贩事件所反映的广大的失业问题，牵涉到政治不安，币值不定，工商濒危，百业萧条；时论已多发挥，此处不赘。但此次骚动，除了经济意义以外，还包含有政治及社会的意义。就政治意义言之，今日人人需要和平，而内战烽火遍地，一切人力财力，都用以维持少数人的权力利益，竟将绝大多数人民的死活，置之不顾。政府官吏，发威作福，仗势弄权，贪污百出，无人过问，独子子小民，摆一个摊子，混一口饭吃，亦所不许，严为限制，人孰得平？据党部当局报告，骚乱群众中有呼“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为什么不让我们吃饭”等口号者。此说果确，则这些口号无不带有浓厚的政

治意识。同时在这次骚动中，亦流露着阶级的意识。大商店的被打，跳舞场电影院的被打，过路汽车的被打，都是出于一种贫者仇视富者的心理。然而凡此现象，未尝不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就后者论，贫富阶级的悬殊本不合理，贫民阶级开始了解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并以行动表示其意志，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已有进步。就前者论，我们一向认为 20 年来国民党的“训政”，无甚成绩可言，而现在一般民众居然敢公开抗议“为什么不要我们吃饭”，国民党当局亦大可引以为骄，因为“训政”的目的，乃在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行使政权，而人民所以要取得政权的目的，终其极无非是为了要保障人民的权利与幸福。现在一般人民，受了 20 年的“训政”，终于能提出“为什么不要我们吃饭”，我们竟因此不得不承认国民党训政 20 年，非一无成绩可言者。

第二，地方党政当局，都将此次骚动，归之于“异党”的阴谋。我们始终认为，这一次骚动，完全是逼出来的。在这次骚动的后期，是否有外力参加，我们没有充分根据，可作论断；但这次骚动的发生，完全是自发的。党政当局认为，骚动的第一天（11 月 30 日），摊贩即已释放，则此事件应已过去，而第二天（12 月 1 日）骚动的程度和范围，反较第一天为烈为广，显有“暴徒”从中阴谋煽动。我们以为若就群众心理来观察，此亦事理之常。因为群众的感情一旦掀起，这种感情必须达到最高点，始能下降。骚乱的第一天，群众的情感刚被掀起，群众感情一被掀起，感情的发扬即愈来愈高，所以第二天的骚动情势，较之第一天反更严重。在第二天的傍晚，一方面地方当局采取了最严厉的处置（即“格杀不贷”），同时群众的感情，已因经过三四十小时的宣泄，达到高潮，所以自第三天（12 月 2 日）起，全部骚动，戛然而止。我们很怀疑，假如这次骚动，确是有“异党”在后面作严密而大规模的发动，这样一个严重的局面，是不是能在一夜之间，从最高潮一

下子回复到原来的平静局面。以常情推测，在政争如此剧烈的今日，在任何社会骚动中，“异党”之插入，事属难免。但若谓此事纯为“异党”之阴谋造成，如非失之夸大，亦属有欠公允。至于就“异党”煽动一节而论，我们亦可附带一述我们的感想。我们一向主张民主法治，我们绝不同情任何政党，任何集团，任何个人，从事于破坏社会治安，有损公共福利的行为；凡此皆法所不许。但就政治的观点言，在野党派之借机生事，以与执政党为难，实为事理之常。在野党如不处处与执政党为难，他将永无取得政权之一日。无论英美，莫不皆然。执政党唯一对付的方法，就是励精图治，拼命建设，提高效率，改革政风，以政绩和事实来对付反对派，来赢致人心。即以摊贩事件而论，摊贩要生活，如其政府能有办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则何来此次的骚动；“异党”纵欲借机生事，亦将无机可借；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所以党政当局，应当将注视此案的重心，转个方向。不要单在消极方面攻击“异党”，应该反躬自问，多在积极方面，做一点建设工作，改善民生；民生改善，社会自可安定，国家自趋太平，而执政党的政权，亦易巩固。

第三，在此次骚动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而为其他任何社会骚乱案件所无者，即凡谈论此次骚动事件者，大都对政府表示不满。不过我们在此应当说明，“不满政府”与“同情摊贩”应为二事。先就一般人对于摊贩的态度来分析；从正面说，有许多人是同情摊贩的，因为摊贩设摊，无非迫于生计，其情已极可怜。从反面说，在此次的“摊贩事件”中，无一人对于摊贩表示指摘。不仅社会一般舆情如此，就是官方态度也是如此。无论是吴市长的谈话，或市党部、市参议会、江苏监察使署等重要机关主管人对外的谈话，都无直接指摘摊贩的言论。由此可见，大家在良心上都承认着一个原则，即人人总得有饭吃，总不能逼人饿

死。因为大家在良心上,无法否认此一原则,所以大家不得不想到一个极为实际而又极为严重的问题,即今日中国没饭吃的人实在太多了。目下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在饥饿线上挣扎着:寒无衣,饥无食,住无屋,病无药。我们不能不承认,20年来的统治是一个“失败的统治”。无论是国民党员,不是国民党员,看到今日中国的局面,无不叹息焦虑。经济愈来愈近破产,社会愈来愈趋不安,而劳民伤财,人人咒诅的内战,仍在进行。我们相信,凡是尚有一点良心血性的人,对于现在国家的局势,定必感觉苦闷,感觉愤懑。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骚动中,人人不满政府,批评政府。一般人不满意政府,批评政府,怜惜摊贩尚在其次,主要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太不像样,当前的危机太多太危急了。人人要求在要求着政府能立下决心,拿出办法,来挽救当前国家的危机。

此外尚有一点,我们愿意附带一述者,不满政府不一定就是不满市府。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只能在其职权范围以内,尽其职责。若以指责整个政府的理由,指责地方行政长官,或者要求一个地方行政长官负起非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力量所能办到的责任,均欠公允。就原则上言,这次上海市政府在取缔摊贩一事上,无可非议。而且在这次骚动中,我们对于吴市长的处置,不能不加以公道的称颂。社会应当充分明白,当吴市长全力制止警察当局使用武力对付群众时,他本人也是受着他下属的不满和抗议的。然而有远见的人不能不承认他这种处置,具有高度智慧。在这样一个混乱激荡冲动中的骚动,造成“惨案”,易如反掌;设若如此,其后果诚难想象。我们所唯一批评吴市长者,即在这次骚动中,吴市长对于“暴徒”“阴谋”,强调过度,不免有损政治家的风度。关于警察,群情指摘。我们觉得这种指摘,亦属感情太重。一般下级警士巡官,他们也未尝不在自我良心和服从命令之中,感觉苦痛,以他们月入之微,职责之重,社会对于他们的要求不免

过高。这一切如众所非议的情形，警察本身，不能全负其责，其中大部牵涉到社会风气及全盘政治的问题。我们现在愿意总结言之，这次上海的群众骚动，实含有极严重的意义；假如这仅仅一种地方事件，我们绝无意思浪费这许多篇幅加以论列。我们认为这次上海的民乱，就是一种国家将要遭遇革命的象征。我们如此看法，其意非谓这个将要来临的革命，将由这次骚动中的人物发难完成，而是说这个将要来临的革命，其客观的社会条件，已一天成熟一天。我们读报，这几个月来，这种大规模的骚动，何止上海一地？广州、福州、杭州、重庆，以及湖南、江西各地，迭见不鲜。大公报高唱“要变不要乱”之论；既然不变，那就势必于乱了。这次上海的民乱，对于当局是一个极其明白重要的教训。当局将因此项教训而加紧其政治控制，抑或反躬自省改进政治，那就得看执政当局的智慧、修养及造化了。

12月9日

(原载《观察》第1卷第16期，1946年12月14日出版)

论张君劢

国大召开，民主社会党提名参加；该党领袖张君劢以此大受物议。一部分报纸在其电讯、评论、漫画之间，对于张氏备施讽刺，似非将此人前途毁灭，不足快意。每日读报，感触万端，谨一论之。

先论民社党参加国大问题。在民社党本身，他们对于参加国大与否，可能有两个立场；一个是“政协立场”，一个是“宪法立

场”。就“政协立场”言，这次国大的召开，确与政协程序不合。民社党领袖张君勱参加政协，系以民盟代表的资格为之。以民盟内部政团关系的复杂微妙，民社党是否必须遵守民盟的约束行事，本为一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至少在道义上，张君勱既为民盟盟员，并以民盟代表资格出席政协，似宜忠于守约，尽量避免使其领导的政党参加与政协程序不合的国大。至言“宪法立场”，严格言之，在“政协立场”上既无参加国大之理，亦即无所谓“宪法立场”。但此处却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政治家的理想与感情的问题。我们查考张氏一生，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立宪运动，几乎无不有其参加。今春政协审议宪草，张氏独多贡献；重庆白象街张氏寿会，到者无不以此为颂。张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国有一部好宪法；张氏参加议宪，有所贡献，在张氏，可谓学有所用，在国家，可谓实受其惠。这次国大召开，拥护政协者，均表反对，但事实上，国大势在必开，宪法势在必制；就说现在，国大业已闭幕，宪法亦已通过，不论将来和谈是否重开，政府能否“联合”，我们怀疑这次国大通过的宪法能被推翻（依法修宪为另一事）。就是民盟中最急进的罗隆基，在答复记者询问和谈前途时，也不得不说：“最伤脑筋的国大及宪草问题，将暂予搁置，放在最后再谈。”（12月22日《文汇报》）可见政治这样东西，一方面是原则，一方面是事实，国大既然势在必开，宪法既然势在必制，而张氏又复一生献身立宪大业，则他自必较他人更关心于这部宪法的内容，更期望一部较为理想的宪法能够制成，所以他仍参加国大召开前夜在南京举行的几次审议宪草的会议，并与国民党总裁交换函件：假定国民党总裁能保证这部宪法在国大通过，他声明他将同意他所领导的民社党参加国大。张氏主要的目的：和谈须待从长努力，先将宪法通过了再说。由于这一种“理想与感情”的背景的不同，他遂走了与民盟不同的道路。我们对于民社党的参加国大是不赞成的，但是对于张

氏的用心和动机是了解的。

次论政治权术问题。我们提出三点来讨论。(1)现在大家都在争取民主,争取民主的总目的是要把国家弄好,提高人民的生活。在现阶段上,争取民主,就是希望国民党开放政权,使国内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机会过问国事,为国服役。就与国民党的关系言之,在这个争取民主的运动里,并非要打倒国民党、排挤国民党或消灭国民党,而是希望能联合国民党共同从事建国大业。但国民党是20年来的执政党,在人情上,掌握着权力的人总是不肯轻易放手的,所以一切国民党以外的人,需要联合起来,造成一个足以与国民党相抗的力量,俾在此种相抗的力量下,使国民党不得不放弃其既有的一部分权力。因之,在这一个争取“民主”的运动里,国民党以外的力量,不能自乱步骤,自相分化。这次民社党参加国大,主要地就是犯了这个毛病。我们看到国大召开前夜,国民党对于民社青年两党之全力罗致,情急可知。在此关口,民社党参加国大,不啻捧国民党的场而拆盟的台,在大战略上,实欠明智。(2)张氏希望通过一部近于理想的宪法。但是我们很怀疑,今日国大通过的这部宪草,是不是因为有了民社党的参加而始得通过的?据我们看来,国民党之不能通过《五五宪草》,必须通过如此次国大通过的这部宪草,实出于一种“时代压力”。这种“时代压力”,一部分发于国内,一部分来自国外。国民党的领导层,环顾大局,不能不顺应潮流。国民党之不能采用《五五宪草》,决非为了张君劢一人,也非为了民社党一党,它之非通过一部较为民主的宪法,实势有所必然。当张氏既与国民党总裁交换函件,双方提出保证后,他自不能不履行其诺言(民社党参加国大),然而此举是否必要,仍可辩论。就政治权术言之,我们认为此举实属缺乏经验。(3)张氏既同意其领导的政党参加国大,而其本人又不参加,此种处置,中外不多。张氏原意:他本人不参加国大,保持一种“超然身份”,俾于来日和谈,能有所努力。但实际反

应,与张氏想象者,甚多出入。各方指摘,纷至沓来,竟使张氏在和谈运动中的根本地位,发生动摇,由此可见今日中国的政治斗争,愈来愈尖锐,政治家所能走的路也越来越狭窄了。今日政治家一言一行,竟不能不极度审慎,以免一失足而成千古之恨。

三论各方面对张氏的批评观感问题。(1)实行民主政治不能没有良好健全的舆论,我们既要求有一个有风度的政治,我们就得先希望有一个有风度的舆论。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可以冠冕堂皇的反对他人,批评他人,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人。我们可以反对国大,但不必看见有人不参加国大便私心窃喜,捧他一下,有人参加了国大,便一股醋味,挖苦他一下。论政的人与从政的人都须度量宽大,心平气和。这次民社党参加国大,张君劭当然负很大的责任,但我们也不能以全部责任归之于张氏一人。张氏可以左右他所领导的政党,但他不能绝对命令他的党员,因为民社党不是一个领袖独裁制的政党。同时就张氏个人而言,我们还须查考其过去,默察其动机,论政的人,绝不能幸灾乐祸,滥施诛伐,对于有希望有操守的政治上的人物,我们应当鼓励他,劝勉他,安慰他。这是我一个月来每天读报的感想。(2)这次民社党单独参加国大,在感情上自足引起旧日第三方面其他同志的愤懑。对于最近民盟函请民社党退盟一节,我们认为其事亦甚合理。合则合,不合则分,毋须勉强。不过我们愿作一言者,即解决今日中国的政治问题,只有两条路线,一是协商路线,一是革命路线。就国家情形说,只能走前一条路线;就是共产党也未主张要走后一条路线。既然要协商,便希望各方面的力量团结合作起来。这次民社党参加国大,各方表示惋惜,但张君劭个人的学问、操守、私德,在今日中国,还是属于第一流的。我们对于张君劭之是否继续为民盟盟员一节,不欲置议,但我们希望在来日的和谈运动中,大家捐弃成见,放平感情,集中人才,以收

事功。民社党单独参加国大，不啻分化自己阵线，他们做错了；但第三方面若因此分裂，也就完全中计。张君劢一生从事民主运动，尽心尽智，不计一私名利，若因此次挫顿，竟然被摈于民主运动门外，我们不免要感到这个社会的太残酷了。

最后我们愿对张氏进献一言：报载先生一月以来，闭门家中（12月27日《大公报》），一月来先生之心情，吾人不得知之，但一个有抱负有信心的政治家，对于一时的得失毁誉，当不介意。先生今日须坚守者有一事，即绝对不参加传说中的政府改组。民社党参加国大后，各方对于先生均表惋惜，但对于先生之人格，仍持信仰。人之相交，贵相知心；若先生自问一切为公，则先生之苦心终必大白于天下。权术可以不深，人心不可不察。

（原载《观察》第1卷第19期，1947年1月4日出版）

辛勤·忍耐·向前

——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

本刊年出2卷，每卷24期。一卷出完后，休息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第2卷第1期定3月1日出版。

我们除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以外，在这一卷中，未尝有一字涉及本刊自身；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先让读者自己就本刊的言论、风度、水准、内容，获取一个大概的了解。在这半年中，我们得到许多前辈、朋友、读者的爱护关切，使我们增加不少工作的兴趣和努力的勇气。在这第一卷的最后一期，我们谨述本刊诞生的经过及半年来的各种情形。

发起·筹备·诞生

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16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须发6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11月11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10月8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个星期的筹备时间。那时正是抗战刚告胜利，政治酝酿改变的时候，多年以来，在“抗战第一”的大帽子下遮盖着的许多积郁，我们这时秉笔直书，亦确能言所欲言。我们愿意毫无夸张地说，那时确有许多读者，每星期都在等候着星期六《客观》的出版。——这些读者后来都成为《观察》的读者，今日《观察》在四川及西北一带有广大的销路，一部分亦应归因于《客观》的影响。有许多朋友至今或者未能明了为什么我们骤然放下《客观》，另立《观察》。我们无意在此追述那些业已过去的琐碎事情，只能就原则上补叙一笔。我们平常有一种基本的理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论机构，在纸面上，它的评论写得头头是道，极其动听，而这个言论机构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则和办事精神，与它所发表的议论不能符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假如我们主张政府负责而我们自己做事不负责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们自己腐化，这对于一个怀有高度理想的人，实在是一种难于言说的苦痛。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

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

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天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

第一次的发起人会议于三十五年1月6日在重庆举行，决定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关于这个刊物的生命能否维持，当时我们笼统地建筑在两个假定之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当时国内还缺少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在抗战中，昆明重庆等地都有水准很高的刊物，但因战时邮递困难，环境限制，都未能布及全国）。假如我们自己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各方面的前辈及朋友，无论识与不识，一定乐于支持我们，为本刊写稿。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我们的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则本刊当可获得众多的读者。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并与各方取得初步的接触后，决定以全副力量并持久决心来创办这个刊物。我们认为像这样一种工作，有以全副精力去努力的价值。我们认为今日中国实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个刊物，并可鼓励一般自由思想学人出而说话。而我们之所以要想供给大家一个说话地方，并鼓励大家说话，实因我们深切相信，这种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今日中国的言论界实具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此种稳定的力量正为今日中国所迫切需要者。

关于编辑部分的筹备工作，大体上都是在重庆办理的。我们拟了一张“拟约撰稿人名单”，分别函洽。函洽时，一共附去印件三件：一、缘起，二、“拟约撰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函附“拟

约撰稿人名单”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于考虑允任或不允任时，获得一种参考材料。拟就之复信，则请收信人在“履约担任”或“不克担任”上作一符号，可免另写复信之烦。但是我们认为单单这三种印件还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长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共同为国家的福利努力。

拟约的撰稿人原不止于那张名单上的几十位，但因我们对于撰稿人负有赠阅刊物的义务，所以不能不竭力缩减。在那张拟就的名单上，有一小部分仍未发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接洽的许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复函“不克担任”，有八位先生迄无复信（各信托人转致，是否转到，不明）。其余大都函复“履约担任”。并除寄回印就的复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励我们。有许多刊物常常不得到本人的允诺，就将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为“特约撰稿人”，我们深不以此种态度为然，故凡非确实函允担任者，我们未敢贸然将其姓名列出。我们不用“特约撰稿人”一词，一律称为“撰稿人”，目的在使本刊的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本刊发生更关切的感情。现以第一卷而论，封面所列 70 位撰稿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给本刊写过文章。

事务方面的筹备工作，较为艰难。第一是股款不易措筹。我们预定的股额是 1 000 万元，当时（三十五年 1 月）根据上海方面的报告，我们估计每期的总成本是 50 万元，如有 600 万元，即可着手（200 万元为开办费，400 万元为八期的周转金）。措筹此数应无困难，但事实上不若想象的那样顺利。我们这批朋友，多是以教书为生的。读者一定充分明了，在抗战的八年中，教育界人员是如何的在饥饿线上挣扎。所以到真正收款时，常常止于“口惠”。其间还遇到使人极其难堪的事情。

但是也有令人感动的事情。我有一个学生竟然征得了他父

亲的同意,卖掉了几亩租田,来助成我们的刊物。还有好几位《客观》的读者,知道我们另筹《观察》,愿意入股。我们那时筹款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请他们再为考虑。我们表示:一、一般公务人员都非常艰苦,若是生活优裕,略出余力,以助文化,自然不失为一种义行,但若仅从生活零用中,节省出钱来入股,我们实在感觉不安,不忍接受;二、现在社会诡诈百出,读者和我们向未谋面,似亦不能单凭我们的文章就相信我们,我们劝他们慎重出之。结果还是有一位读者在薪水中抽出了五万元入了一股。

我于去年3月中旬,由渝飞沪,只带来一小部分股款。那时物价激涨,一般言之,似非有2000万元不能出刊;但是我们连1000万元,尚感不易。正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在去年4月5月,南京方面两次以高级公务员见委;但我实乐于有这样一个艰苦的时期以锻炼自己的情操。我们做人做事,说不该半途而废,见异思迁。就在这一个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我落寞地守了好几月。这些日子是黝暗的,但我还有着一盏明亮的灯,这盏灯挂在我的心底里,吹不灭,抢不掉;这盏灯发射光亮,冲散着周围的昏暗。

到6月中,股款渐渐像个样子,7月底,大体已近收足。事务方面的第二件大事是“房子”。在上海,房子就是金条。以我们这戈壁之数,绝对放不得手;但是没有金条弄房子,几如登天之难。后来幸得朋友之助,租到了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总算贯彻初衷,未出金条,月付租金20万元,说定以半年为期。刊物出了几个月,前途如何,较有眉目,到那时,我们容易放手做事;所以只租半年,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条件。

各事进展到八分程度时,我们开始发函约稿。我们最初原想在7月出版,但是酷暑将至,学校放假,各地复员,我们深感此时出刊,“天时”不利。考虑再三,决定守到9月1日创刊。这个

夏天确是一个热闷的夏天,但是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夏天!

发行·定阅·财务

刊物出版以后,各方面的反应非常良好。发行情形完全超过我们预期的数目。第一期究竟应该印多少份,事前无法得到科学的根据。一部分朋友甚至怀疑我们这样一个硬性的高级刊物,是否可以销过3 000份。我们第一期决定印5 000份。我们虽然定9月1日为本刊的创刊日,实际上创刊号的出版日期是8月30日(星期六)。在8月29日,我们已发出4 700余份。可是在第二天的下午,本埠批销人立即电话添批,本社驻京办事处于9月2日3日连发两封快信,4日并用电报催促加寄,据说第1期700份在南京两天之内全部售出,各书店均派人至本社驻京办事处添批,无以应命。第2期我们仍印5 000份。这个决定,实在属于一种“商业政策”,在各方面极其切迫需要的时候,我们仍旧控制印数,控制批数,使在发行方面造成一种抢购的现象,增强购买人与批销人对于本刊的心理重量。第3期增印至7 000份,第5期增印至8 000份,第6期增印至9 000份,同时创刊号及第2期在各方的殷切需要之下,再版、三版终至四版。在再版三版之中,许多读者亲至本社索补,即使只剩了破缺的,读者也一律愉快购去。至第10期时,9 000份仍有不敷分配之势,自第13期起,遂增印至1万份。其发行数列表如下:

第1期	初版	5 000份	再版	1 000份	
	再版	1 500份	3版	1 000份	
	3版	1 000份	4版	1 000份	
第2期	初版	5 000份	第3期	初版	7 000份

	再版	1 000 份	第 13 期	1 万份
	3 版	1 000 份	第 14 期	1 万份
第 4 期	初版	7 000 份	第 15 期	1 万份
	再版	1 000 份	第 16 期	1 万份
第 5 期	初版	8 000 份	第 17 期	1 万份
	再版	1 000 份	第 18 期	9 000 份
第 6 期		9 000 份	第 19 期	9 000 份
第 7 期		9 000 份	第 20 期	7 000 份
第 8 期		9 000 份	第 21 期	7 000 份
第 9 期		9 000 份	第 22 期	7 000 份
第 10 期		9 000 份	第 23 期	7 000 份
第 11 期		9 000 份	第 24 期	8 000 份
第 12 期		9 000 份		

出至第 17 期后,销路渐趋下降。下降的原因是多种的:一、在水准上,我们自己检讨并未下降,但在读者的心理上,或许感觉本刊内容,已不若最先几期的齐整。正如一位读者所说:“刊物办久便老了”!我们自己并未因销路的下降发生忧虑。我们有我们的水准,而我们对于水准的是否下降,远较销路之是否下降为关切重视。不过因为稿件不宽,我们在编辑时,亦确有窘促之感,因之亦难免影响刊物的生气。但我们并未以不合水准的文字填凑篇幅。在那几期,在编辑技术上仅仅可以批评的一点,即是不该同时刊载二篇续稿(自 15 期我们同时刊载了两篇续稿)。这两篇长稿都是高度的硬性论文,本刊本已极其严肃沉重,同时刊载两篇长篇论文,对读者的口胃,确是过重的担负。二、季节关系。天冷了,跑书店、跑报摊的人,渐渐减少,据内行报告,在这个时候,一般刊物的销路,都向下跌。三、自 18 期起,我们增加了售价。四,而最重要的原因,则为邮资的涨价,每一

份的航空邮费，自 122 元增至 310 元。本刊是一个全国性的刊物，有半数均散布在川、黔、滇及西北、华北一带，这一带都是需用航空寄递的。邮资的加价，对于京沪杭一带的批销，自然不受影响，对于后方远地一带则影响颇大。在后方远地一带，邮资的涨价对于直接定户一部分，尚无显著的影响，而对于同业的批销，则影响极大。一方面是售价增加，一方面是邮资涨价，遂使后方同业的批销成本提高，因亦使刊物在后方门市的售价增加。后方的生活程度本较上海为低，以生活程度低的地方的购买力来购买生活程度最高地方的书刊，再加上批销书店的利润，自然要影响售卖的数量（所以我们希望后方读者均能向本社直接定阅，在经济上合算得多）。五、最后一个原因，接连的阳历年关和阴历年关，各地同业大都不能按期汇付货款，我们因为放出各地的账目为数太大，本社经费有限，已有难于负担之势，遂不得不自动减少批数（因为垫付的邮资，其数可观）。我们可以说，销路即使稍降，8 000 份的数目应可维持，但因我们自动减少批数之故，所以我们自第 21 期起即减印至 7 000 份。那时正是阴历年底，又是第一卷最后的几期，我们存意平平维持过去，以待春天来到，自第 2 卷起，重行推动。最近几天因年关已过，各地同业陆续有款汇到，本期回复增印至 8 000 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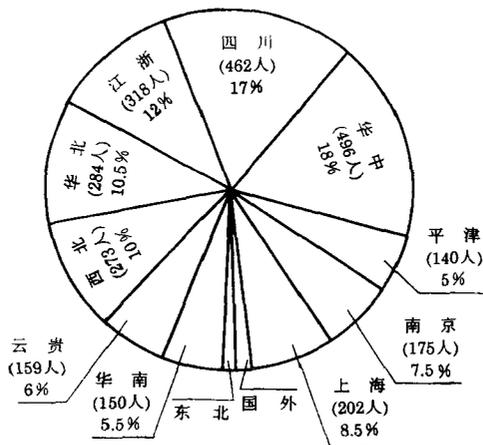
关于发行方面我们尚须顺便一提的：一、上述发行数字，都是实在的，并无一般虚报的习气。我以发行人的身份，向社会报告这个发行数，我负人格上的责任。二、我们在发行方面可谓未曾尽力推动，这个发行数是一个自然的发行数，非已极尽其力之结果。我们所以未能极尽其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本刊草创，一切开支力求节省，故办理发行的职员，是兼任而非专任。这一兼任的职员，他本身另营书刊业务，以致事实上未能全力顾到本刊的业务。我们现在深感兼任之不妥，故已另聘职员，专职办理。

三、发行是经营一个刊物最感棘手的一部分工作。各地同业虽然纷纷批销,但大都不能预汇款项,或者第一次汇了一笔货款来,而以后不按期源源汇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如因为货款已完,停止寄刊,则刊物的发行数字势必渐渐下降。但如继续寄刊,则飘荡在外面的账,越放越大,纵然每一客户所欠数目为数不大,但全部欠款的总数,实在可观;其中邮费都是我们垫付的。一个刊物总希望和各地同业,维持联系,非不得已,不愿中断;其间实极焦人。

关于直接定户,截止本年1月31日止,共为2709名。正如批发一样,这个定户数也是自然的,我们并未出以人力的推动。我们除在创刊前分散过一次宣传品以外,以后即未再在此方面有所努力,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事繁人少,每日应付日常的工作,已经筋疲力尽,分不出精力再来从事推广工作,另一个原因,我们认为要推动定户,必须先有通盘的计划,中途零零碎碎的做,无甚补益。定户的进度表则如下述:

创刊号出版前	63人	第13期出版日止	1910人
第2期出版日止	141人	第14期出版日止	1985人
第3期出版日止	306人	第15期出版日止	2073人
第4期出版日止	513人	第16期出版日止	2151人
第5期出版日止	676人	第17期出版日止	2266人
第6期出版日止	855人	第18期出版日止	2347人
第7期出版日止	977人	第19期出版日止	2433人
第8期出版日止	1139人	第20期出版日止	2506人
第9期出版日止	1293人	第21期出版日止	2563人
第10期出版日止	1174人	第22期出版日止	2610人
第11期出版日止	1682人	第23期出版日止	2709人
第12期出版日止	1794人		

2709名定户的地域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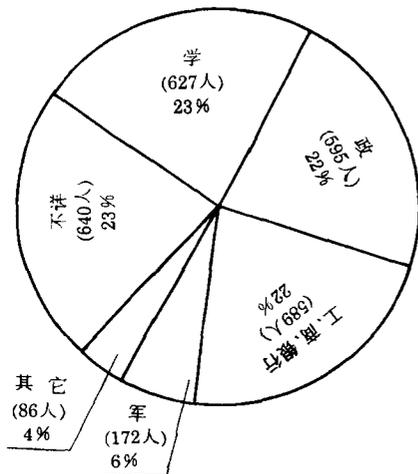
注：“华北”包括冀、鲁、晋、豫、绥、察、热等省。

“西北”包括甘、陕、新、青、康、宁等省。

“华中”包括湘、鄂、皖、赣四省。

“华南”包括港、粤、闽、桂、台等地。

2709名定户的职业分类



注：“其他”包括律师、医生、教师等。

本刊未曾向读者调查职业，此项统计，系根据定单存根而制，故一部分定户职业，无法分类。

这 2 709 名直接定户,其地域分布及职业分布,我们统计制表如上。

直接定户是一个刊物的基本读者,也是这个刊物最忠实并最关切这个刊物的读者。现在有些刊物,号称拥有数万直接定户,或征求数万直接定户,我们对于他们的气魄,只好敬佩。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能有 2 700 余名的直接定户,已是得之非易了,因为现在一般刊物,很少能得到一个像样数字的直接定户。不过若就本刊基础而论,目前的定户数,显然是不满足的,我们呼吁各地的零购读者,都能早日直接定阅,并希望已经是我们的直接定户,能再为我们多介绍几个定户。一般读者所以宁愿零购而不愿定阅,主要的原因是恐怕这个刊物中途夭折。但是我们相信,当读者读了这篇报告书后,或者可以了解,我们主持这个刊物,不是一件随便轻率的行为,除非因政治打击而遭封闭,我们决不中途停止。很公平地说,在任何理由之下,直接定阅均较零购省事省钱。特别是外埠远地的读者,论迅速,寄给远地书店的刊物,因系成捆,邮递间有延搁等情,而单册刊物,则甚少延搁,必可早到。(此系指邮运而言,至于本社寄刊,寄户及批发,均系同时提前一日付邮。)论经济,远地书店出售本刊,因为利润关系,常售 1 500 元或 2 000 元一册,而直接定阅,连航空邮资仅须 1 100 元左右(第 2 卷第 1 期起售 1 000 元一册,定户八折,实收 800 元,外加航空邮资 310 元),定阅实较零购合算得多。

关于财务,按照本社“征股简约”第四条:“出版满一年时,主持人应向出资人提出财政报告”,我们应于今年 9 月,向股东提出财政报告书。但我们愿意在此提出简略的报告:本社的资金是 1 000 万元,但是现在在账面上,本社的资金已超过 2 000 万元。我们愿意向股东说明,我们在筹备时期,从未开支过一文车钱,也从未开支过一文交际费。第一次租屋及最近的迁移,我们都没有

用什么钱。甚至在开办的时候,我们也几乎可以说,没有用过什么开办费,一切家具都是借用旧的,借以节省支出。而且我必须说,我们是绝对“干净”的。一切比较大的支出,如买纸、付印刷费等,都由我亲自经手办理,在良心及人格上,我们可说绝无弊端。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社会上主持独立的事业,我们认为我们的信用及前途较之金钱远为珍贵。至于刊物本身,可以自给。

作者·读者·编者

编辑经验是一种苦痛的经验。读者的立场、口胃、期望、要求,各各不同,任何一个刊物,都无法使每一个读者完全满意。读者对于一个刊物的要求,都是从他个人的角度出发的,而一个编者,他必须从全盘着眼。举一个最普通而最为一般人所忽视的例子:京沪一带的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大后方的读者的阅读心理,有很大的距离。通常一个刊物编者,最容易犯一个毛病,即只顾这个刊物发行地带附近的读者,而忽略远地的读者。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性的,发行数的一半都在后方远地,我们在地域上必须以全国的读者作为对象,而不偏重于某一地区的一部分读者。

我们这一个刊物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刊物。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许各人陈述各人的意见,在今日这种“两趋极端”的局面下,我们认为最最需要提倡这种“自由”与“宽容”的精神。所以我们一再申述我们的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中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意见不同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非非得编者同意不可。我们最注重者,是文章的内容与态度,亦即文章的水准与风格。许多人认为我们的文章,各言其是,无统一的论调。在我们自己,我们不以此为病;甚至可以说,我们且以不一致为贵。(假如以后我们有

几个朋友发表意见相同的文章,那也仅是偶合,而非设意如此者。)记得有两位读者曾来面谈,问本刊有无具体主张及能否对于青年作进一步的具体指示(指组织而言)。关于第一点,我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无具体主张;关于第二点,我说我们无意为此。曾在或将在本刊上写文章的人,他个人或许对于国事有具体的主张,但是“我们”,或者说本刊,至少至目前为止,还谈不上这点。我们自承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些基本原则,论评国事。但我们做的是一种言论工作,而非组党工作。中国“热心”于组党的人太多了,你一个党,他一个党,我们认为在中国现行局面下,党派的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乱。就编者个人而言,我极其赞同张东荪先生所言: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见第13期张文)。“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执政”必须是一种“组党”的做法。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谈不上“具体主张”;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无意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我们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了“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

许多读者感到本刊的“分量”太重,太严肃,甚至说太枯燥了。有的说本刊不够“刺激”,说“刺激”的文章太少了。关于这点,须分层说明。第一、本刊是一种高级刊物,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在本刊的基本编辑方针上,中学生不在我们的读者对象范围之内。)一个高级刊物是显然无法“轻松”的;我们绝对拿定这一方针,不稍动摇。其次,我们是一个理性的刊物,我们绝不感情发言;一切感情冲动的文章,概所不取。就事论事,本刊过去确曾发表了几篇“斤量”相当重的文章,在我们看来,有时严

厉的八个字,其斤量远在看似泼辣而实无重量的 8 000 字以上。不过这几年来,大家太苦闷了,以致人人都希望读到所谓“刺激”的文章,感情越冲动的文章越容易吸引读者;但此与本刊的基本精神相背,我们无意如此,更无意仅仅为了吸引读者而向此方面发展。我们创办本刊的目的是替国家造福,我们绝不忘怀我们最初的动机。因此,据我们的一般印象(我们尚未做过读者调查的工作),本刊的读者,大部分是在 30 岁,或者至少是 25 岁以上的读者。我们不拟迁就读者的口胃而改变我们的方针。第三、一般读者都感觉本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即没有时事短评,因而使这个刊物大大减低了接触现实的程度。关于这点,我们完全承认,并亦充分同感。我们愿意在此坦白陈述我们的困难,而困难的症结,在于人力的限制。不仅本刊的撰稿人都在外埠,就是本刊的发起人,也都散处各地。这种时事短评,要认真写,固可由一人执笔,而必得至少有两三个人经常讨论,才能避免过偏或不及的弊病。现在全部的编辑责任都在编者一人肩上。要约稿,要复信,要阅稿。退稿不算,就是单单发表的稿子,每一篇稿子要读三遍。第一遍是初读,大体决定可用与否。第二遍是精读,间或修饰其文字,并计算其字数。在发稿之前,还要最后认真地读一遍。特别是通信,要做大标题小标题及文内子题,平均一篇通信,至少花费三小时始能编好。而最主要的,是编者不仅仅是主编这个刊物,实际上是主办这个刊物;我十分之六七以上的精力还是花费在事务方面。调度款项、核对账目、管理人事、购买纸张、兜拉广告、各种设计、校阅大样,以及对外一切有人事关系的事务,这些都是我的责任。

自从本刊创刊以来,我每日工作的时间,平均在 11 小时左右,有时多至 13 小时。半年以来,我们虽然心情宁静,意志坚定,但是身体疲乏,精神困顿,我们实已尽心尽力;而这一切显然

是为了我们的理想,为了我们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编者已无余力构思,也无必须的时间以获取为撰写时评所必要的情报与根据。我们又不愿草率落笔,宁缺毋滥。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但我们赧赧地说,至少在第2卷中,我们还无法增设时评的一栏。

我们过去退掉的稿子很多。有前辈的,有多年友谊的朋友的,有股东的,有撰稿人的,有读者的。有第一篇用第二篇退者,或第一篇退而第二篇用者。有一次,有一位前辈,我们向他求了四五次稿,他确是爱护本刊,在忙中抽暇给我们写了一篇,而我们仍未能刊载。在人情上讲,退稿确是一件不甚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于稿件的取舍,绝无偏私;而且我们事实上稿子常感不敷,但是为了刊物,应退者还是应退。我们希望各方面能鉴谅我们。至于本刊篇幅,绝对公开,毫无门户之见。在第1卷中,在投稿中录用的文章,共为35篇,约占所刊文章总数百分之二十五(通信及尾页犹不在内);第14期新疆专辑就是投稿。这个数字足以证明我们用稿绝无成见,只要文章在水准以上,无不采用,特殊有价值的文字,甚至为之出一专辑,亦所不辞。

有许多人批评本刊每期的作者履历介绍,我们在此解释几句。一般刊物每期都可由编者写一编辑后记,编辑后记主要的目的在介绍本期作者。但这种介绍,时有失之“肉麻”或轻重不匀之弊。我们仅仅简单地刊出作者的身份或职业,实是一种比较大方的作风。有人以为有许多作者已经大家知道,无需介绍,或无需每次介绍。但其间包括几个问题:一、有一部分作者虽然大家知道,但也有一部分作者,读者对之尚不十分熟悉。何人应介绍,何人不应介绍,并无客观的标准,故我们一律介绍。二、京沪平津一带的读者,也许对于许多作者,均极熟悉,但大后方的读者,未必熟悉。本刊遍布全国,不能亦不应仅以东南一带的读

者情形为标准。三、有人主张每一个作者第一次为本刊作文时，介绍一次，以后即不必再为介绍，但是在理论上，我们无法承认每一期的读者都是读过以前各期的。每期有每期的新读者，所以每期的作者均应介绍。四、在编辑技术上，假如只介绍第一次给本刊写稿的作者，则这一期也须只有一个新作者，而我们决不能在介绍作者的那个方框里冷冷落落地只排一行，稍有编辑经验的人，即知绝无此种做法。批评这一点的朋友，大都根据其自身的知识程度或社交地位而有这种意见，但我们当事人是从全盘着眼的。而且我们这样做至少并不“伤雅”，我们愿意就让这个办法成为本刊的一种刊例。而且我们愿意再报告一点：这个办法对于我们的业务，未始无助；内行的朋友们甚至还赞赏着我们这种做法。

编辑部分需要报告或解释的，已如上述。我们愿意在此向所有为本刊写稿的先生及各地的特约记者表示最大最热烈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本刊未由获得为本刊所已获得的那些荣誉。我们要求各地的撰稿先生及特约记者，继续支持我们，源源以大稿见惠，充实本刊的生命。在编辑方面，伍启元吴世昌两先生给编者很多帮助。创刊以前一部分稿子是伍先生代约的。创刊时，伍先生正在上海候轮赴英，我们共同讨论最初几期的编辑计划，他并作许多有实质的协助。其后吴世昌先生复员东下，他经常提出建议，并在各方面协助，以迄于今。

自第2卷起，我们又增约了胡适之先生等几位为本刊撰稿人，均经函允担任，并此附告。

办 事

我们的办事基本精神是负责、迅速、公平。不过在中国社会

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希望贯彻这种精神了。我们自己检讨,实在愧惭得很,一切还不能做到理想的地步。

先说我们和作者的相处。我们对于作者,都是最尊敬并最热诚的。我们向作者索稿,从来不写“八行”信,从来不叫人代笔。我们每次去信都是恳挚的,而且大都是长信。说实在话,有时一位作者给我们写4000字,但我们前前后后所给他的信,恐怕有时竟不止4000字。有些作者有时或者不免要感到我们迫稿迫得太厉害了,但是我们相信,当他一想到我们一切都是忠于一个刊物,或者会同情我们,原谅我们,而不加责怪。作者的来信,我们大都立刻作复。稿子来后,大都立刻汇奉稿费。当我在筹备时期,常常上午9时收到稿子,上午11时就立刻跑到银行里去将稿费汇出了。那时也毕竟比较空闲,常常在收到信件的10分钟以内,就写了复信,立刻跑到邮局去。(当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行为,几乎近于疯狂!)现在事情一多,时间已不够用,但重要的信仍旧立刻作复,延搁的情形难免没有,大体上不多。对于稿费,我们相信为本刊撰稿的先生们,不甚关心,但在本刊一方面,我们必须时常顾到作者的利益,我们已提高过三次。就中国社会情形说,稿费的菲薄是最不合理最不公道的。我们自愧尚无力量作何改革,我们每次提高的数目,均极寒酸,我们仅仅只能使作者获有一种印象,即我们确是在认认真真的努力事业。

一般读者和我们的信函往还,可分两部分来说。一是写给编者的,一是关于定阅的。关于投稿,不用的稿子我们大都立即退回,甚少压搁。可用的,稿费亦提前汇出,只有可用而在最近一、二期中尚无刊出可能的,则稿费延至刊出后再寄出;此因本刊经济有限。稿费项的周转金数目不大,故未能无限止的一律先付。关于建议改善内容的信件,我们大都一一保留,供为参考。编者个人过去的习惯是“有信必复”,近来事实所限,无法一

一遍复，所以凡无特殊需要者，即不再复。编者愿意在此对于过去惠函诸君，一并表示谢意。最使编者烦恼的，便是若干读者提出种种问题，或关大局，或涉人生，如要复，非1万或8000字不能毕辞，在这种情形下，编者实在无法答复，只好写一封短信去道歉。

关于定户的来信，本社也尽力查复或照办。定户的来信是本社同人目前最感繁重的一项工作。有的是改地址的，有的是改寄递方法的，有的是补购以前的刊物的，有的是中途未收到要求赠补的，有的是续定的，有的是托代购其他书籍的。每一定户，当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后，他当然希望我们立刻将他所嘱咐的事情办好。但一切困难都由于一个单纯的事实，即绝大多数的定户来信时，都不注明他的定单号码。续定刊物，必须知道他以前的订费至何期截止，始可前后衔接，补购刊物的须在他名下上账，至于更改地址或更改寄递方法，更须知道他的号码，以便寻觅签标。我们现在有二千七百余名定户，要在二千七百余名中去找寻一个人，何等困难。要是再写信去问，则往还需时，读者总觉得我们服务不周。现在我们有一个职员，专门负答复读者来信之责，他有时整整一个下午只能复三封信！这真是不合理，不经济！有的读者来信，字迹潦草，甚至他们的签名及地址，无法辨识，以致无法答复，在读者是不满，在本社更是不安。有时读者从银行汇款订阅，常常不注明起寄期数及寄递方法，甚至根本不注明汇款人姓名及地址而又未另函通知者（关于此点，也许是解款的银行将汇款人的附言单失落了），以致读者久候无复信，而本社亦苦无法作复。有些读者的刊物中途间有邮失，或被他人擅取，来函责难，我们只好再补他一份。……像这类事情，日有数起。我们特为陈述，希望以后定户惠函查询，务须注明定单号码，如其定单遗失，可阅封套上所贴签条上的号码，以利查

复。我们愿意为读者服务,并尽量提高服务的效率,谨请读者协力合作。

本社过去在办事上最弱的一环是发行课(定户课与发行课分开)。前已言及,协办发行的职员是兼任的,事实上未能全力灌注,因之各地同业来函,时有搁置不复之事。我们对此极感不安,已分函各地同业致歉,并说明正谋改善。现已另聘职员,专任办理,希望以后各地同业来函,能够随到随复。

关于本社同人福利,我们尽力顾到,自从去年8月成立以来,迄今为止,已调整过两次(编者自己的薪水,从未调整,现在还是拿去年8月份的数目),每次调整的数目虽然有限,但是因本社经济有限,一方面要顾到同人,一方面也不得不顾到社本。每次调整都是我们自动的,并非出于职员的要求。本社职员对于这个事业,有兴趣,有热忱,物质生活虽苦,精神生活却很愉快。

关于我们对外应付的款项,从无拖欠或延搁之事。过去24期中的稿费,除有二三笔因去函作者询问汇款正确地址,尚未付出外,其余均已随时汇出。如有尚未收到者,请即函告,以便查理。纸张费,广告费,印刷费,都如期一一照付。承印本刊的印刷所老板,他说他做了二三十年印刷生意,还没有遇到像我们这样的顾客。我在任何忙碌的情形之下,总于应该付款的时候,在社里恭候他来取款。

此外,还有一件事,该在此报告,即在过去半年中,本人从未参加任何政治的集会或活动。此事包括着两个原则:一、一个刊物要维持他超然的地位,这个刊物的编者必须是真正绝对超然的,二、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这个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的理想,这个刊物绝不能成为编者个人活动的工具。大家支持这个刊物是为了要

支持这一个理想,而非支持任何个人;任何个人都不该利用这个刊物以达到他为了他私人利欲的目的。

尾 语

在这严冬的寒夜,我已费了整整两个通宵,向社会报告我们这半年来的经过。行文至此,东方微白,实已不胜倦困。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紧牙关从事这样一种清寒艰苦的事业。读者先生,让我们大家鼓舞起来,挺起我们的胸膛,睁开我们的眼睛,冷静我们的头脑,坚定我们的意志,来从事具有新理想的新社会事业。大家来鼓励我们,协助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愿在这儿毫不害羞地向广大的社会宣告:我们认为我们今日所做的一种工作,就是一种真正的“建国工作”!

三十六年2月1日

(原载《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出版)

中国的政局

一

大局已到了穷则变的阶段;虽未变出,确已穷极。

在最近几个月中,南京的高级核心人物,在心理上已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自国民党执政以来所未有的。这个变化

就是：他们已深切感觉大势之日非了。迫使他们心理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种的：马歇尔的高华，共产党的不妥协，一般舆论对于政府的抨击，民心的涣散，经济的崩溃，军事上的没有把握。南京显已沦入黯淡与苦痛之中。

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我们可以一一分析。先说青年。青年本来纯洁，对于政治初无成见，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国家有前途，他们自然拥戴政府。但是政府种种表现，无不使人失望；这已是了不得的大危机。而还要花样百出，“帽子”乱飞，无异火上加油，以致造成今日青年清一色的厌恶南京政权的局面。再说中年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痛恶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今日全中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现政权中的人，恐怕也未尝不顿脚叹息：为什么这些人都“左倾”了！假如不满政府就是“左倾”，那末老实说，在 20 年来国民党这种统治作风下，假如还不“左倾”，那这个人即使不是奴才，也是个大大的糊涂虫。就思想左倾而言，思想左倾和信奉共产主义本为两事；思想左倾不一定就是附和共产党。但在共产党与国民党政争之中，一切不满现政权的情绪，其无异间接增涨共产党的声势，确为事实。共产党是有组织的，一般人是没有组织的，没有组织之人之渐渐被有组织的人吸去，已为事理之常，而当局还采行“逼上梁山”政策，遂使一部分人在感情上愈来愈和共产党接近。不

论这些不满国民党的分子和共产党有无联系，或在感情上是否附和共产党，总之在国共的斗争中，凡此皆对国民党为大不利。然而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可是在这样一个极为明显的大势之下，现政权当让不让，可和不可，应改不改，要做不做，还是迷信武力，图以武力解决一切。不幸得很，现在已经开始感觉武力解决不了一切！武力肃清不了病入膏肓的贪污风气，武力振作不了推拖鬼混的行政效率，武力挽救不了已如堤决的经济危机，武力收拾不回麻痹死去的人心，甚至武力也决定不了前线的战局。美国军火快用完了，日本军火也维持不了好久，自己制造则远水不救近火。虽然大帅出巡，而未必有补于士气，因为将军们都吃得饱饱的，而士兵们已无意为少数人送命了。

二

据我们观察，现政权业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局的力量，最近且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局的自信心。就政治说，从抗战末期起，政治上的主动攻势，迄在反对派一面，特别是中共一面，国民党始终处于招架的地位；直到国大开会前一两个月，国民党突然争取主动，但国大一开，局势大僵，最近渲染政府改组，闹了几个月也无甚成就。再说军事，军事之不可恃已如前述，而2月17日蒋主席在中枢纪念周上论及临沂之战时说：“不管是共产党自行撤退或国军进攻，总之现已占领”（2月18日《大公报》），在过去蒋主席的演说中亦从无如此的语气。经济更是束手无策，上海的金价跳到960万，南京还在指派人员，组会研究。出口补贴，令甫

10日，即行取消，简直不怕痛，自己打自己的巴掌。最近又想抛售救济物资，现政权的穷形极相，实已毕露。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由民选出来的政党，为了顾全本党的前途，搞不下时，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个以武力争得政权的国家，一个执政党，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挣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挣扎。在正路上挣扎，成败另为一事，要亦不失为一种努力；若走错了路，则所有的挣扎，都成为了一种浪费和罪行。据我们的观察，现政权的挣扎，显然并未针对病源。举例言之，现政府目下努力的是改组政府。但我们不知照现政权最近两三月来努力改组政府的做法，这种改组，在政治上有何意义？还是想以此使国内人民一新耳目呢？还是为了对友邦一种表示呢？在我们看来，目前这种改组，无甚意义。第一，要改组政府无非要刷新政治，振奋人心。那就得大公无私，唯贤是用。被延揽的人总要德才孚望，能胜重任。可是现在政府所拉拢的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有的是臭而不可闻也，有的根本不在算盘子上没有地位。拉这些人入府，不足为国民党之助，反足为国民党之累；不足以见国民党开放政权之诚，反足以见国民党开放政权之伪。这是就改组论改组。第二，要使改组政府获得成功，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同时改革政治作风。而在我们看来，改革政治，远较改组政府为重要。一般人民所期待的不是随便换几个部长，添几个委员，而是改革政治的根本作风。老实说，单替国民党设想，国民党果有决心打开当前的局面，振奋人心，则改组政府，尽不必向党外拉那些不相干凑凑数的人，国民党里面未尝没有优秀开明的自由进步分子。给他们权力，给他们机会，接受他们的观点，接受他们的作风，全国耳目，也会一新。今日国人，深受“训政”之赐，政治的经验与政治的认识，确已不如中山先生制订建国大纲时所认为那样的简单幼稚了，他们所要求的不再是

政府外表上的改变而是政治本质上的改变；何者为假改革，何者为真改革，他们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但是事实上国民党有无此种远见，有无此种胸怀，有无此种决心，我们简直怀疑。就说最近上海发生的劝工大楼血案，还不是一套老办法？工商界人平时对于民主运动，本来不甚关心，处于旁观地位，可是给这一打，又平空替政府增加了许多反对派，真是目光如豆，愚不可及。一方面通令保障人权，一方面在北平大举逮捕。我们别的且不说，就说蒋主席所提的四项诺言，若能兑现，人心亦可渐渐拉回过来。诚则灵，只要国民党有诚意，有决心，民心未尝不可收拾。传说当局对于目前局势，非常明白，忧虑焦愁，倍于常人。但是觉悟而无行动，这种觉悟仍是属于私人的，而无任何政治上的价值。20年的时间不算短，病得太深，走得太远，要拉回来，须费大气力，我们怀疑现政权的人物有没有这大气力。

三

共产党是要获取政权的。一个政党当然要努力获取政权；争政权是一个政党的常情，政党不想争取政权才是天下大荒唐。共产党的坚主组织联合政府，只是他们的一个步骤，并非永远满足于这个联合的方式。能用政治谈判方式，插入政权阶层，徐图后举，自然最好；否则只好硬硬头皮用武力来夺取。我们在原则上是反对一个政党蓄养军队，以武力来夺取政权的；为中国的元气设想，我们也不希望共产党采取武力革命的方式。但这是就理论而言。就事论事，共产党的不肯放下枪杆，也未尝不能使人同情，因为在国民党这种政治作风下，没有枪，简直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生存的保障。所以国民党主张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共产党则主张先政治民主化，然后军队国家化，各人

的出发点都是由于双方的猜疑，而双方猜疑的根据则为过去种种事实。在政协阶段，共产党表示愿意还军与国，但须得到保障，这就是所以中共和民盟要连合在国府会议中取得否决权的背景（当时民盟力劝共产党放下军队）。后来这个计划固未实现，就是实现了，共产党到底放不放心交出军队，还是一个大疑问。

计划中的联合政府，至今未能实现。实在说，即使联合政府成立了，参加各方面如何合作，如何发挥有效能的政治力量，还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们相当赞成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我们希望在这个联合政府里，发生一种政策上的制衡作用。在这个拟议中的联合政府中，共产党（即使联合民盟）也只是一个少数派，容能 check，未必能 balance。但因为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坚强的党，是一个有整套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政治计划与政治作风的党，所以在政治做法上，在这个联合政府中，或能发生一种领导作用。现在人民实在太穷太苦，政府应当推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借以改善今日一般穷苦人民的生活情形。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低层人民的生活，不啻缘木求鱼。我们希望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后，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一切社会主义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为最广大的穷苦人民造福，国民党为了要争人心，虽非所愿，亦难固拒。共产党既以争“民主”为号召，加入联合政府后，必不致倾向统制，国共双方且均欲尽量提倡“民主”，以博民情。今日中国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这两样东西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在此。

在过去一年多的和谈，共产党一直把持攻势地位。他们一再要求和平。国共双方对于“和平”究竟有无诚意？有人认为国

国民党是有诚意的,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有诚意的。我们认为国共两方面根本就无所谓诚意不诚意。我认为只有“顾到自己,也顾到对方,更顾到国家”,这才算是“诚意”,专门替自己打算,都是为私,绝不足以语“诚”。即以“和平”而论,以前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最近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有什么不同?最妙的是双方的主张停战,据说都是为了人民。既然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没有什么不同,则为什么共产党要求“无条件停战”时,国民党不接受,国民党要求“就地停战”时,共产党不接受?原来停战与张三有利时,张三即要求停战;停战与李四有利时,李四即要求停战。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幌子。现在我们看得很明白,共产党对于“和平”是越来越不发生兴趣了!要和平,从前是“无条件”的,现在是有条件的了;或者从前的条件低,现在的条件就高了;从前共产党反对美国调解,主张美苏英根据莫斯科三国宣言共同调解,可是现在,共产党宣言反对任何外国的调解了(2月22日合众社延安电:周恩来谈话)。在过去和谈一年中,在共产党自身看来,他们也是失望又失望,苦痛又苦痛的。但周恩来氏返延后提出的和谈两前提,他们又何尝不知道其事之甚少可能。既无可能而仍提出,也是有意使马歇尔和南京方面难过难过而已。共产党是现实的,所提和谈的前提,在我们看来,也只是一种幌子。即以国大及国大通过的宪法而论,周恩来氏既然同意由沪去京,至少表示共产党有一种“有条件的”参加国大的可能。假如共产党参加国大,通过的宪法其内容容有变更,但共产党之不参加国大,并非为了宪草,而是为了宪草以外的其他条件没有讲好。要是讲好了,还不是一样可以参加国大?而且去冬国大之所以开得成,也是因为政协承认了那批旧代表的原故。要知这批旧代表,本无承认之理,但绝无承认之理者,政协那些代表们也居然承认

了——只要自己的党得到利益，牺牲人民亦竟不顾！去冬国大之能开得成，至少与政协的承认这批旧代表有关；而关于这点，共产党也是同负其责的。老实说，宪法不宪法，共产党并无太大的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军队和地盘两者之上。就军队论，他们显然不愿再接受过去整军协议中所规定的国共军队的比例了。就地盘论，他们有他们的价钱。他们在过去至少希望得到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要具有三个条件：第一，要能自给自足。第二，要交通工具便利。第三，要四地能连为一气。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地点，他们不要。哪四个地方，他们不说，但是照上开三个条件，似乎是指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四省。然而要南京给他们这四个省，在南京看来，这不啻要南京的命了。

四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困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困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朝气和生命的力量。不过上年他们在苏北一带的作风，却大失人望。苏北的作风，究竟是中共的政策改变了呢？还是中共在延安一带是一种做法，在苏北这一类地带又是一种做法呢？还是苏北一带的作风非出自延安的命令而是下级干部干出来的呢？我们未能了解。但是中共必须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他的党员是中国人，他所企图起而统治的一个国家是中国。中国有中国的民性，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完全不顾他们所属于的这一个国家的民性传统，必将

减少他们成功的希望而拉长他们离开成功的距离。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下,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都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哪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自利分子外,哪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假如共产党能在政治生活方面,修正其政策,放宽其尺度,则将更能增加他们获得成功的希望。我们对于共产党,私人方面无恩无怨,我这一番意见,我并不认为仅仅是一种消极性的批评,毋宁说是一种积极性的建议。

五

现在再来观察国共以外的一般自由思想分子。“自由思想分子”这个名词,本来是很笼统的。若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则中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自由思想分子。若以政党为别,则不仅国民党中很有一些开明进步的自由思想分子,就是在共产党中,恐怕也有这种分子。马歇尔的声明中曾抨击过共产党里的极端分子。按照逻辑说来,根据马歇尔的声明,则共产党中也是有温和的自由分子的。据我们所知,恐是有的,问题是

数量的多少,以及在那种严密的党纪下能否自由表示其意志而已。本文是一篇论述政治形势的文字,所以我们在此讨论“自由思想分子”,大体上系指国共两党以外的自由分子而言。在中国,散布于国共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为数极多,不过他们较为散漫,甚少严密的组织。其中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我们现在先就民盟作一个大概的论述。我们可以拿两句话来批评民盟,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民盟里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各有各的历史环境,他们只是在一个相同的情绪下集合起来的,就是“反对国民党”,这是他们唯一联系的心理中心。民盟到底是一种政党的做法,还是一种运动的做法呢?就过去情形观之,似属于后者而非属于前者。民盟的历史已有数年,而其出头则为前年的政协时期。不过在过去,一般人似乎有一种印象,即政府来借重他们时,有了“民盟”,不来借重他们时,就没有“民盟”了,所以有“和谈”,民盟就大大热闹,没有“和谈”,民盟就冷清清的无事可做;这情形至少在过去是如此。照近来的趋势看,他们似已企图改向政党的做法一途发展。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味道本来还很重,民盟的领导人物还大都是前一代的老辈。我们若将民盟的领导人物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政团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像张表方(澜)、沈衡山(钧儒)等几位老先生,实在都是过去的人物了。民盟领导人物中实际政治经验最丰富的当推黄任之(炎培)先生,但是我们不能不说,黄先生也是过去的人物了。张君勱先生(现已脱离民盟)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宪政学者,一个最好的政论家,然而他只是一个论政的人物,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物,他至多只宜于任国会议员,而不宜于掌行政责任。张东荪先生也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

想及言论方面。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煽动力,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从各方面分析,民盟实是一个貌合神离的团体,而所以能勉强集合起来,完全是由于实际的政治环境逼成的。但单靠对国民党的一种不满情绪来维系一个政团,这显然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结合。照我个人的观察,民盟诸君子,可以共患难,不一定能共富贵。这句话或许说得太率直,我们将来再看吧。

至于现在一般人都说民盟太左,成为了共产党的尾巴,关于这种批评,我认为无甚价值。凡是进步的政治集团,当然是比较左的;世界大势如此。成为了共产党尾巴一点,纯然是恶意的侮蔑。要知实际政治不能完全摆脱权术,从战略上说,民盟和共产党互为呼应,实为必然,两者的目的都要削弱国民党,在这个前提下,两者当然要并行联系的。假如一定要说如此就是民盟被共产党利用,则我们也未尝不可说,民盟也利用了共产党。故此事不足奇,亦不足为民盟之病。只要国民党一日保持其政权上的优势,民盟与中共可能继续维持其联系的步调。但是一旦国民党在政权上已不占优势时,在那个时候,中共与民盟恐将分途而未必再能互相呼应了。

六

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从无足以重视的组织。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

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马歇尔在中国时,曾竭力鼓励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分子组织起来;无论马歇尔如何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形,马歇尔到头还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头脑,所以他还是隔一层的。自由思想分子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有各种原因:一、过去自由思想分子的彼此相通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自由思想分子的长处是背脊骨硬,交情可以拉得长,其短处则为胸度狭窄,个人主义。中国有句话:“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自由思想分子的重心人物大都是文人,即使今日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都受过现代文化的洗礼,但那个“相轻”的老根性,尚未完全洗脱。譬如这次民社党和民盟的脱辐,政治上的看法固为主要的原由,人事上的摩擦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事政治,必须有政治家的修养。第一要看得远,认得清;大的要争,小的就不该争。第二要有气量,唯气量大,才能放弃自己的成见,抑平自己的感情,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此才能顾全大局,争取目的,团结合作,开创前途。政治活动不能没有领导人物,但是因为“相轻”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分子中很难产生领导人物;政治活动是必须有组织和纪律的,但是因为自由分子的相通大都是道义的,不是权力的,所以很不容易发挥组织的力量。这些是自由分子根本上的弱点。二、今日中国极其需要自由分子的抬头,但事实上自由分子的抬头非常困难,这与国民党 20 年来的统制有关。国民党 20 年的统制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抬头的限制,是三方面的。1. 政治方面的限制。这点大家都明白,不必再解释。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其他自由自然都谈不到。2. 经济方面的限制。政治活动必须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八年抗战,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个个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上,以致大大削

弱他们在政治方面所能发挥的积极力量。3. 在思想散布方面的限制。20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党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义,做国民党的孝子顺孙,不料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越搞越不像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厌恶国民党不要紧,党化教育给青年的并不是一种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教化,于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满现实而日益泛滥。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须在理性上有修养,始能接受自由主义的熏陶。情感泛滥的结果是趋于极点,不是极点的右就是极点的左。但现实环境逼得青年左,于是青年越来越不易保持其冷静的头脑而对各事作沉着的思想。在国民党,可谓自食其果,而在自由主义的传播上,也同受其害。同时,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我称那些只知享乐百事不管的青年为浪才。浪才越多,对于自由主义的传播也是一种限制。自由主义是最讲是非的,那些浪才什么都不管,哪还管什么是非呢?

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受着上述种种限制,而客观地说,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长之中。但我们还不能将这种力量的滋长归之于他们的努力,而实系由于时代的使然。……※我们说过,今日中国这批自由分子是很散漫的,他们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看不见,抓不着,但其所发生的力量,则深入而能垂久。这股力量在社会上有根,在人心里有根。不过若从目前中国的政治局面看,这种仅仅限于道德方面的力量显然失之消极。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这个要求是时代逼出来的。我们认为中国在最近的几年之内,一般情景还是很黯淡的;说得远一点,则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

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原载《观察》第2卷第2期,1947年3月8日出版)

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

这是一篇记录。我草拟这篇记录的目的,在希望这篇文字能够成为医学心理学家或普通心理学家一份有用的材料。事实上,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这样一种材料,或者这样一篇记录对于他们是否有用。因之我对于应否草拟此稿,犹疑不决。最后还是出于主治医师的鼓励,他认为这种经验非人人所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种经验的人又未必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能把这种经过记录下来。他认为这不是一种寻常的经验,所以鼓励我把它写出来。

这篇记录包括“感觉”与“心理”两个部分。关于“感觉”部分,我想凡是用过闷药的人,他们当时所感觉的,大致不会有太大的距离。至于“心理”部分,则要看各人的教育,职业、性格、环境等等情形而定。

关于我的病症及投住医院的经过,此处一概从略。我和我的主治医师约好于3月31日上午9时施行手术。我并在前一天知道,我们将施行全部麻醉。在13年以前,我曾在沈克非大

夫的主治下,割治过盲肠炎。那次用的是局部麻醉。我在那间四周都是玻璃窗的宽大的手术室里,在那没有一点声音的寂静严肃的空气里,听到那低微而清晰的剪刀声音。这次我似乎乐于施行全部麻醉,借以减少我对于痛苦所发生的恐惧情绪。

3月31日,星期一。这是江南最标准的春天,满天的好太阳。我在上午8时3刻以前,在病房里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于8时50分被抬进手术室。我的主治医师周寿祥大夫早已完成了他所需要的准备工作,坐在椅子上等候我。当我被抬进手术室时,我以很愉快而自然的表情向他招呼“早安”。

我被抬上手术床后,各种工作即开始进行。直到此时止,我还不知道施行全部麻醉,是用打针的方法,还是用嗅觉的方法。我非常希望知道闷药的有效时间是多少。他们说五分钟。我说五分钟内可以完毕一切手续吗?主治医师说五分钟内可以完毕。我虽然不再追问,但是心中很疑惑。他们的意思显然是企图安慰我,表示手术在很快的时间内(五分钟)就可以完毕。事实上,手术的时间曾经延长至10分钟至12分钟之久。假如他们当时告诉我手术需要10分钟始可完毕,或者可以提高病人相信的程度。

另一位医师开始在我的口部四周涂油,并将脸罩罩住我的脸部,只留出鼻孔让我呼吸。我此时已知闷药将用嗅觉的方法施用。我那时唯一的希望,(在这儿,我只用“希望”两字,不用“要求”两字。因为“要求”是一种含有“意志”成分表示,“希望”则仅是一种“感情”成分表示。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被安排在一种不能让我有任何“意志”的环境之中!)是希望闷药不要用得过早,以致手术尚未完毕,而闷药药性业已终止。但是在我自己觉得一切尚未准备完毕时,他们已经向我施用闷药了。我在一种微微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中被动地吸嗅闷药。

据我自己的估计,从我吸嗅闷药至失去知觉时止,只有三四分钟的时间。三四分钟是一个极其短促的时间。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心理状态纵然十分复杂,因为时间太局促,所可能引起的心理活动,毕竟也是有限的。我现在尽我的能力来记述我当时所体味到的奇异的感觉和当时的种种心理状态。

关于闷药的气味,我还不能用“痛苦”两字来形容。假如我在此用“痛苦”两字,我势须责备我自己近于夸张,因为这种气味是可以忍受的;虽然这种气味至少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气味。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起来。这种情景很难描写。平时我们在白天,或者在有或强或弱的灯光的夜晚,即使闭上眼睛,但多少还有一种“光”的感觉。除非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闭上眼睛后,才觉得当前确是一片“纯黑”。在那时,我的感觉,似乎只有真正在“一团漆黑”的夜晚闭上眼睛时的感觉,仿佛近似。但是更进一步剖析,上述比拟还不能完全尽意,因为我们即使在一团漆黑的夜里,闭上眼睛后,觉得一片“纯黑”,但这种“感觉”,似乎还是以眼睛为主的感觉,换言之,即那种感觉,还是一种经过“视觉”的判断的结果。而我那时的感觉,似乎已经超出“视觉”的范围,而是觉得整个的脑袋所感觉的是一片“黑”。而且这种“黑”的感觉,因为闷药在了一口接一口地吸嗅下去,所以一步逼一步,愈来愈深。我们平时在电灯光下,骤然之间电灯灭了,那时候所感觉到的“黑”,还多少有一种“光”的比例作用在内,从原来的有光程度,变到骤然的无光程度,遂觉当前一片漆黑。而我那时所感觉的“黑”,那种难于形容的黑,是愈来愈黑,一阵紧一阵的。我们通常总爱用“如堕深渊”四字来形容这种情景,但这四个字并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感觉。实际上,我们也很少人有过真正的堕入“深渊”的经验,普通用“如堕深渊”来形容一种心情,多少只是一种象征的用法。

“如堕深渊”，就逻辑上讲，本有一点一点“下沉”的性质，而我那时，显然并无“下沉”的感觉。“下沉”是一种自上向下的活动，而我那时并无自上向下下沉的感觉。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的样子（实际上我并无走入非洲森林的经验，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经在新闻片上看到过纳粹罪犯被施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记忆骤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无论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无将我自己和那些纳粹要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这个联想的发生，虽然是由于我看过那张新闻片的关系，而形成这个联想的中心则为“权力”一事。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事后分析，这种联想显然并不牵涉到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者政治上的成败的问题（政治上的成败本是相对的）。这个联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说，那批曾经赫赫一时有大权力的人物，这时竟毫无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于他人掌中，而将在顷刻之间结束其生命。我们平时，凭这支千钧之笔，发挥我们的理想，陈述我们的抱负，替一切受难的人们呼吁，抨击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和扫荡各式各类的人渣，抱持有一种虽然飘渺而不可捉摸但其坚硬却胜过钢铁的意志，而在这时，整个的生命（包括寄托在这个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权威、品格），都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将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机会，心里充分感觉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在那种情形下，亦不能自己地发出一种对于人生的轻微感伤！

在我当时的心理上，一方面占据着由于有如上述有关“权力”一端而迸发出来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时联想到一切被迫即将伤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而迸发一种深沉的同情。我所谓“一切

被迫即将伤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所指范围极广，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刑的那些人们。罪犯犯罪，原都由于现代社会的罪恶，而由于政治上的斗争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开或不公开的处死，更是人类社会里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当他们从囚房提到刑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时，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究为如何，而他们自己显然也不再获有机会向他人报告他当时的心理。无论电刑、绞刑，或执行枪决，行刑的本身虽只是一霎那之时，而自囚房至刑场这一段，总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路程。当我被闷药的药性，一秒钟一秒钟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时，我深深体会到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内心的悲哀。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不是留恋他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们竟活生生的被人强制结束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是否热泪盈眶，他们的悲哀终是一种绵绵无尽期的悲哀。

我说我当时有一种“轻微的感伤”！这种感伤是一种属于人性的感伤！然而这种感伤竟很“轻微”，主要的功用应归之于我们的常识。因为常识告诉我们，这不是“死”，而是一种知觉的暂时的停止。所以一切引起的联想的，都是一种属于人性的联想，而非利害的联想。我当时几乎纯然没有一点涉及私人利害问题的联想。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我的孩子。我是一个离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爱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识礼，年龄虽小而已表现一种善于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则天资颖慧，聪明玲珑，具有一种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触便会欢喜他的魔力。我非常爱他们。可是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的感到，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使我不能“瞑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

有走上轨道的一点。因之我在事后感到,对于一个真正的忧国之士,我认为在三十四年8月至三十五年2月之间年老寿终者,实不失为一种人生大福。因为那时抗战终获胜利,政协亦庆成功,而为日后发生的种种纠纷与悲观,尚未显露。在那时死去,可谓心情宁静,无所遗憾。到现在,假如我们竟然因病身故,实有死不瞑目之感。

以上是我在施用闷药那短短的三四分钟以内的心理活动,事实上,在那后半段时间,心理活动已渐渐趋于衰颓。最初的一阵“黑”的感觉过去后,意识一点一点柔弱起来(此处还不能“迷糊”两字,这时意识还是很清楚,但不活跃,故用“柔弱”二字)。我遵从医生的吩咐,嘴里轻轻地数着“一、二、三、四”。心头似乎有一阵轻微的难过,左脚脚趾部分曾有发麻的感觉。在那快要失去知觉之前的极度短促的时间里,我还意识到我的两手不知如何安放才好(我这时心性微微有一点紧张),后来就有两旁两个人将我的手捏住。在我知觉尚未丧失之前,我还感觉到医师已用一种液质在施行手术的地位四周涂抹。这时我已渐渐地快要丧失知觉。当时我似乎对于一切都自愿地同时又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自愿”指自愿施行手术而言,“无可奈何”指用闷药后情形而言。前者属于意志部分,后者属于感情部分。)我没有放弃的只有一点,就是嘴里仍继续的在数着“一二三四”。我那时又忧虑,不要一切都已失去感觉,而独独我的神经不能停止,则我仍将受到手术的痛苦。这当然是一种由于没有经验而发生的过虑。至少那时,我是一切“听天由命”了。数着数着,我似乎竭力叮住这个“一二三四”,以挣扎“我”的存在。但是我终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 my 知觉了,就像一个小孩在哼着山歌时忽然睡着了一样。据医生告诉我,我最后还要经过嘴里乱哼,手脚抽动,表示心头非常难过的一个阶段,如此以后,全身

筋肉才开始松弛,真正失去了知觉。但是这一个阶段,我自己已经不知道了。

*

*

*

当我已被闷昏以后,甚至说一个人死去以后,究竟他的灵性仍旧有无活动,我不易作确定的回答。关于一个人死后究竟仍旧有无灵性一节,亦即通常一般人所涉及的有无灵魂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至少到今日止,尚无任何确切的结论;而人死了又再活,以便叙述其死后的经验者,其事显亦不多。我这篇记录,其中有两点与张东荪先生即将在本刊发表的一篇监狱回忆录中所记他自杀的经验,可以互相印证。这儿先说一点。据东荪先生报告,他某次自杀以后,他“觉得”非常舒服,好像一个身子很轻,在云端里飘着似的。他既然自杀了,何以又“觉得”非常舒服,好像身子在云端里飘着,这似乎说明人死后多少还有一部分灵性的存在。我亦似乎感觉,我在被闷昏以后,仍有一种灵性的活动。不过这种灵性活动的内容、性质及情形,我于醒后亦不能详细记忆。我至少在刚刚醒的一霎那,确是感到我在昏睡中似乎仍有灵性的活动。而且我觉得在昏睡中的情境,极其甜蜜,而且极可留恋。至少并无任何苦痛,似乎即永远停留在那个境界里,亦是很好的。假如我于刚醒的时候,即运用我全部的脑力来捉捕我在昏睡中的种种情境,是否有所收获,关于这一点,我很难答复。我当时至少并未企图这样做,同时我当时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势须斫伤我的脑力。我只能很不确切地说,我似乎感觉,当我在昏睡中,仍旧是有一种灵性上的活动的。

*

*

*

我终于醒了过来。当我醒过来约摸 10 分钟后,我立刻在极度疲倦的情形中,睁开眼睛看我的手表,时为 10 时 20 分。因之我估计我醒来时,大约为 10 时至 10 时 10 分之间。易言之,我

至少在昏睡状态中延续至一小时之久。(据医师报告,在施行手术期间,继续施用闷药,故至此时始醒。)我醒来时,正巧外面有哭声,我第一个反应是:“隔壁的人开刀开死了,我开刀没有死。”而立刻接着而来的第二个修正意见:“隔壁的人死了(因为不一定是由于开刀而死),我刚刚是上了闷药,现在醒过来了。”这个反应是很单纯的;即我庆幸我自己的没有死。但是据我自己的分析,我不承认我这个反应是出于一种意识的活动,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我愿意在此表示,关于这部分的解析,恐怕有不少需要斟酌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我在这方面没有学力上的根基,故引用名词(term)或有错误之处。因之我这篇记录,还只能算是一种 raw material,心理学家如欲采用时,尚须详为订正。)何以言之?因为施行手术是我自愿的行为,而施用闷药无伤生命则为一种常识,故我绝未发生任何对于“死亡”而起的恐惧,因之醒后也不致有庆幸未死的意识。所以我认为我那时庆幸自己没有死,并非一种智力的活动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为一种生物所有的自然反应。此处即欲述及与东荪先生自杀经验可以相互印证的另一点。东荪先生在自缢之后,被他人解救时,发现他的两手在拉着套在颈子上的绳子。既欲自缢,而何以在自缢后又要将两手去拉开颈子上的绳子?由此可以证明,一个人在意志的支配下,可以求死,所以在社会上有各种自杀案件的发生,他们都无“意”于生,唯求一死。但是作为一个“生物”,人是不愿意死的,所以蓄志自缢者,于自缢后,仍以两手去拉开颈上的绳子,这完全是一种生物的自然行为,与意志无关。

还有一事可以证明我当时之私幸未死,完全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即我当时一方面有私幸未死之感,一方面我尚未恢复我的意识,因为当时我甚至对于我究竟身在何处一节,亦茫无所

知,而对于以前一切事情也是一片模糊。大约经过四五分钟的有思路后,我才大约想起我自己是睡在一个医院的病房里,其后一二分钟,我又努力睁开眼睛一看墙壁上的颜色(墙壁上白下绿),以求证实我确是睡在病房里面。

在醒后最初的五六小时内,整个人感觉非常疲倦,昏昏欲睡。此时发生一件意外的插曲,即在我醒后还不及一小时的光景,我的助手照例挟了一包稿子来医院看我,履行我们习以为常的接洽工作。他或者未能知道我是刚刚上了闷药才醒过来的,但是无论如何,由于星期一上午是每期的最后发稿时间,当时有一篇稿子非我看过不能付排。事实上,在任何情形之下,我当时都无力阅读即使是一封短信,何况是一篇稿子。我当时非常虚弱,面色惨白,我甚至即使闭上眼睛,亦觉光度太强,故须用手遮盖着我的眼睛。结果我只好招呼我的助理读给我听。(我实在很希望他能够读得响一点,借以节省我因听而需要花费的精神,不过我并未如此表示。)他显然未能了解我当时是虚弱到如此程度,并拆读若干来信,我也竭力支撑地听下去。我相信这一个插曲增加我脑力受伤的程度。

在当天下午4时以前,我始终在沉睡状态之中。闷药的气味,那令人不快的气味(近似火油的气味),时时逗留在我的嗅觉里,令人厌恶。一直到晚上9时以后,我才忘记这种气味的存在。

在下午四五时,我大体上已清醒之后,忽然怀疑到刚醒时我所听到的哭声,是否仅仅是我当时的一种幻觉。事后追问看护,始知当时有一个病房确是死了一个病人,而所发的哭声确是一种真正出自内心的悲哀的哭声。

4月18日追记

(原载《观察》第2卷第9期,1947年4月26日出版)

323 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

本刊于第 1 卷第 24 期上,附刊“读者意见书”表格一纸,征求读者发表意见,以作本刊改进的参考。这个“读者意见书”原是为我们自己参考用的,因为我们非常希望知道读者对于本刊一般编辑态度以及各栏所刊文字的反应,借以改善我们的缺点,或者增强我们的自信。我们并无意思要将它公开发表。我们并不认为读者的意见有整理后公开发表的必要。但是一部分读者来函要求发表,我们在冗忙的工作中抽出了两天的时间才写成这篇报告。

发表意见的读者共为 323 人。这个数目还不到本刊第 1 卷平均发行总额的二十分之一(第 1 卷的平均发行总额约为 8 000 份左右,现在已上升至 11 500 份)。发表意见的读者在发行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不过就实际情形说,有三百多位读者热心将意见书填就寄回,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通常情形之下,一个刊物如不能赢获读者的爱好,当它征求读者意见时,可能根本没有人理会。应征人在地域上的分布还算普遍,远至迪化、雅安、绥远、兰州、昆明、峨眉、太原等地,都有寄来。应征人的年龄,最大的是 64 岁,最小的是 17 岁(在高中二年级读书),18 岁的则有 11 个人。绝大多数的则在 20 岁至 40 岁之间,其统计如下:

20 岁以下	19 人
20 岁至 29 岁	143 人

30岁至39岁	90人
40岁至49岁	32人
50岁以上	5人

(表中各栏,间有不填者,故各类统计的总数,并不符合应征人的总数。下同此。)

关于教育程度:

曾受或正受高等教育者	218人
曾受或正受中等教育者	73人
自学或仅受初等教育者	23人

年龄和教育程度两项的统计,使我们以前的估计,略须修正。我们以前估计本刊的读者“大部分是在30岁,或者至少是25岁以上”,现在至少说明,30岁以下的读者,占着很大的比率。(我们不承认这个读者意见表的统计,可以作为完全正确的根据,一则应征人数在发行总额中比例不到二十分之一,二则可能30岁以上的读者,应征的兴趣不及30岁以下的人高,应征的比较少。)至于中学生是否为本刊的读者一节,我们曾说过:“本刊的基本编辑方针,中学生不在我们的读者对象范围之内”,这个基本方针,我们不拟改变。但我们从读者意见书中,则知中学生中仍有不少阅读本刊者。

发表意见的读者所服务的方面,非常广泛。除了注明“政”、“学”、“商”、“军”、“警”等笼统名词者外,有主任科员、税吏、××警察厅秘书,新自美国归来、银行行员、军佐、××农民银行主任、工厂技术员、上海××日报主笔,医师、纱商、著作家、警察、“由前清两江师范学堂毕业担任中学教员二十余年后到粤参加北伐担任各师师部秘书多年后任皖苏等省县长六任”、大学讲师、留法、新闻记者、会计、气象员、×××师参谋、教授、邮务员、上海××报总编辑、矿局职员、律师、××青年会总干事、空军通

信员、××铁路局秘书、南京市参议员、××省政府秘书、小学教员、荣誉军人、合作社社员、电报局报务员、陇海铁路××车务副段长、法院推事、电力公司职员(以上职务名称,均摘自意见书,其中一部分地名或军队的番号,编者改用××代替,以免引起当事人发生意外的牵累)。其统计如下:

学	102人
党政	63人
工商	56人
军警	31人
自由职业	28人

关于本刊在各界传布的情形,我们愿意在此顺便报告几点。(一)据新自华盛顿返国的顾翊群先生谈,据他在南京与各方接触的结果,南京的高级政界,大都阅读《观察》。他甚至说:“华莱士主编的《新共和周刊》在美国的地位,还不及《观察》在中国所获有的地位。关于顾先生所说的后面的一点,我们愿意在此谦虚地表示:我们认为他这句话只是一种鼓励。我们目前还不能十分正确知道南京高级政界阅读本刊的情形,我们仅仅知道立法院孙院长曾经专函本社订阅本刊。可能有六位到八位的特任官员经常阅读本刊,司徒雷登大使可能间或披阅本刊。此外在当地零购或不以真姓名或自己姓名来订阅的,我们无从查考。实际上,今日中国身负高级行政责任的官员,到底有几人还能保持阅读的习惯,也实在是一个疑问。但我们相信,在有阅读习惯的高级官员之中,本刊的传布似已相当普遍,并受到广泛的重视。至于全国各地的中上级及中级官员中阅读本刊的,则为数甚夥。××省政府的秘书处一处即有12个人直接订阅。(二)工商银行界阅读本刊的极多。无论1卷24期所刊2709名定户职业分类表中所载,或如此次323名读者意见统计中所载,工商

银行界阅读本刊的,都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年来工商银行界所吸收的人才,较之10年以前,素质提高不少,所以本刊在工商银行界受到极大的欢迎。前次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先生认为本刊富有阅读价值,曾派人来社订阅本刊多份,分寄该行上海总行及各地分行的高级干部阅读。(三)最可注意的一个现象,即在军警界中,本刊亦拥有很多的读者。上次发表的定户职业分类表中,军警约占百分之六,这次的统计约占百分之十。军警界中的读者,常有信来表示对于本刊的拥戴。有一位驻在河南的师长,曾来信表示,认为军界同志应当多读本刊,他在信内并附了4万元,订阅两份赠给另外两位军人。至于教育界人士阅读本刊之广泛,则已不需在此多述。据说北京大学学生宿舍某一间房间内每期均人手一册。

关于“读者意见表”中所列各栏,读者的答复统计如下:

态度:中正	243人
稍偏右	46人
稍偏左	32人
太偏左	2人

认为本刊态度“稍偏左”者,大都为军界读者。

内容:大体满意	195人
很充实	95人
不够充实	33人
专论:大体满意	109人
颇多精彩	176人
略嫌空虚	37人
观察通信:大体满意	126人
精彩的通信很多	143人
精彩的通信太少	25人

关于科学文字及国外通信,大多数的读者都赞成每两期刊载一篇。关于“观察通信”,大多数赞成每期刊载两篇。这三项答案,可以证明发表意见的三百多位读者,他们在填表时都是很郑重的。他们的意见也都是很正确的。假定科学文字及国外通信能够交换地每隔一期刊载一篇,确最理想。可惜实际上还不能做到如此程度。科学文字的难处在深入浅出。本刊不是一个专门的科学刊物,不宜刊载过于专门的科学文字。最理想是那位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有文艺修养的人,这样用文艺的情调来写科学文字,合“专门”与“通俗”于一炉,始能使一般的读者都能接受。过去戴文赛先生在本刊所写的几篇科学文字,曾经广获朋友间及读者间的好评。戴先生是本刊的基本撰稿人,所以能够比较经常地为本刊写稿,此外则我们还没有得到其他科学家的合作。在没有把握之前,我们也不敢冒昧去请人写稿,就怕寄来的稿子太专门,不宜刊载。至于国外通信,住在国外的朋友们,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兴趣,都和在国内时不同,他们为本刊写稿,完全是基于友谊,所以不易作硬性的规定,除了时时去函催稿外,只好有刊无缺。至于观察通信,则尚能符合读者的希望,经常每期两篇,间或三篇。

关于文艺,赞成刊载论文的120人,赞成刊载游记、传记及散文的209人,赞成刊载小说的只有54人。其中关于小说一部分,大多数反对刊载连载的长篇小说。在“意见表”里,编者曾说明:“四五千字可以一次刊完的小说,极难得到,二三万字的小说较易得到,务请读者发表意见,是否欢迎刊载须分五六次始得刊完的小说,以为编者参考。”赞成刊载小说的人,所以如此少,主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不赞成“连载”的缘故。赞成刊载游记、传记、散文的人所以特别多,显然是因为大家想于读了前面严肃的论文以后,能够读到一篇比较轻快的文字。关于文艺部分,当第

一卷快结束时，我们原拟自第2卷起增加篇幅，同时也就打算扩充文艺栏的地位。这个计划后来因受金潮影响，未能实现。在那时，袁昌英先生本已说好要寄一篇小说来，我们临时只得去函请其停寄。李慕白先生这篇《海外忆》，还是在第1卷时寄来的，我们当时决定留至第2卷陆续刊载。就前后连贯而言，《海外忆》包含一个发展着的故事，但就每篇言，又近似一篇散文。所以我们仍照原议刊登。不过关于李先生这篇《海外忆》，却引起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三位撰稿人及一位读者曾特别来信批评编者选用此文。在本刊过去，还从未有过特别反对某一篇文章之事。我个人对于这三位朋友及那一位不署名的读者，都表示感激，因为他们能够坦率相告，足以表示他们对于本刊及编者的关爱。我并愿乘此表示，我永远欢迎并希望朋友们能随时告诉我他对于本刊所发表的任何文字的任何意见。另一位撰稿人则来信说《海外忆》写得很好，又有一位朋友则又特别说起有许多人（他并举出了几个名字）很喜欢读这篇《海外忆》。意见的不同，实由于各人的标准和兴趣的不同。由此亦可以知道，编者在选稿时应如何的斟酌审慎。

又有很少数的读者根本主张不要文艺栏，认为文艺稿子应由其他专门文艺刊物发表，不必在本刊占据篇幅。但是绝大多数的读者显然同意本刊辟载此栏。

在“趣味”的一项下，“过去《观察》分量太重，太严肃，但我可以接受”者，为227人，“希望稍为轻松一点”者，为100人。这一项答案使我们大大满意，并增加我们的自信。这表示本刊的编辑方针是健全的，而大多数的读者亦能够接受我们的编辑方针。事实上，自第2卷起，我们增加了“观察漫画”、“观察文摘”、“读者投书”三栏后，当可使本刊较第1卷为活泼。就一般言论态度上言，第2卷亦略较第一卷为积极。

关于办事精神一项：

很认真	180 人
不认真	1 人
去函即复	70 人
去函缓复	13 人
去函不复	1 人

未和本刊发生接触或函件来往的读者，此栏大都未填。

关于寄刊是否按期收到一项：

按期收到	152 人
不按期收到	18 人
常常失落	11 人

我们对于定户寄刊，是很认真的。所谓认真，一指不使遗漏，二指不使脱期。本刊出版以来，从未脱期。无论是去年的中秋节，双十节，阳历年，阴历年，以及这次的五一劳动节，印刷所尽管放假停工，装订所尽管放假停工，而本刊总尽力赶办，按期出版。此处所谓“不使脱期”，系指星期五的邮班而言。定户刊物，都是提前一天，在星期五付邮的，在星期四的晚上和星期五整天，本社全体同人，犹如在 frontline 作战，汗流浹背，紧张万分，务使应寄各地刊物，能在邮局或火车打包以前交柜发出。

关于“推荐第 1 卷中最好的五篇”一项，我们郑重考虑后，决定略去不刊。第一我们那张“读者意见书”是在很匆忙之中拟成的。所谓“最好的五篇”，这“最好”两字实有语病。就字义上，“最好”应系指最有价值而言。但是“最有价值”与“最受欢迎”是截然两事。最有价值的文章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文章，反过来说，读者最“喜欢”的文字亦不一定就是最有“价值”的文字。并且专论、科学、通信、文艺等，性质不一，亦很难使读者作公正的选择。如要合理，我们应当将各栏分开，至少也应当将读者“最

喜欢”的和读者认为“最有价值”的分开。若笼统地要读者推荐“最好的”五篇，出发点既然有问题，所得的结果亦必不能正确。这个错误应由编者个人负责，而错误的造成，实由于未能深思，而且缺乏经验。第二、1卷凡24期，读者对于后面几期所刊的文章比对前面几期所刊的文章，所得的印象较深，而且有许多读者甚至并未能看到前面的几期，有许多则并未24期都看过，这样的原因亦易使这个答案的统计减低价值。第三、就编者个人言，亦愿略去这一项统计，以为回避。不过编者愿意在此笼统地提出，在第一卷的写稿人中，张东荪、潘光旦、吴世昌、伍启元、戴文赛、王芸生、戴韬龄等先生都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其中除王芸生先生外，其余都是在第1卷中撰文比较多的人，此点亦不无关系。读者对于周东郊先生写的《新疆变乱记略》专辑，均一致推崇，并认为是三十五年度国内报章杂志上最难得的文字。此外，读者认为“观察通信”是本刊一大特色，而对于边疆报道之详细，尤为一般报纸或刊物所不及。

我们从读者意见书中，可以看出目下一般的需要与倾向：一、大家要求每期有时事短评，要求专论触及现实，这表示今日一般国人非常关切国事。二、很多的读者要求多刊学术性的文章（指第1卷中的“特稿连载”而言）并愿意分期刊完。在“推荐”的名单中，张东荪先生的《中国之过去与将来》、《士的使命与理学》，潘光旦先生的《派与汇》，《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荀子与斯宾塞尔论解蔽》，胡先骕先生的《思想之改造》，萧公权先生的《圣教与异端》都有多人推荐，张先生的两篇及潘先生的前面两篇，得票尤多，这足以表示今日一般读者的求知欲很高。三、很多读者都推重本刊有关边疆的文字，并希望本刊继续多刊有关边疆方面的文字，这足以表示今日中国一般人的民族意识很强很普遍。

读者其他的建议很多。其中关于“漫画”、“文摘”及“读者投

书”三部分,我们已一一实现。关于“观察一周”(即时事短评)的困难,已详1卷24期“辛勤·忍耐·向前”一文。我们愿意在此报告,自第3卷起,可望增设此栏。有几位读者主张增加股额,由读者入股,扩大事业基础,并主张自办印刷所,甚至主张将来办一日报及通信社。这些建议固然意思很好,但是目前言之不免过早。英镑有云:不到桥边,不想桥对面的事。编者个人做人做事,受英人的影响甚深,请读者相信我们,我们办事绝不感情冲动,绝不夸大,绝不乱来,沉着努力,量力行事,一步一步走,一切慢慢来。

最后,编者愿意在此向应答的三百几十位读者表示出乎衷心的感谢:你们给我指示,你们给我鼓励,你们之间有许多位以那样的热情,写那样的长信,并替我们介绍定户,给我们种种有实质的帮助。我在此一并表示我们最大的谢意。编者只是一个舵手,这只船的前进,要靠大家撑持,大家努力。当编者想到,他在这样一个芸芸众生的大城市中的这样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希望娱乐没有娱乐,需要休息不能休息,在这样惊风骇浪的波涛中,在这样长夜漫漫的黑暗中,苦苦地撑着这条船,他虽不禁感触多端;然他相信:他必终能噙住眼泪,带领着他那数以万计的读者,向那光明的前程行进!

5月12日记

(原载《观察》第2卷第12期,1947年5月17日出版)

大局浮动,学潮如火

大局浮动到了极点。到处不安,到处忧惧。旧局面正在瓦

解之中。

一个局面趋向瓦解,总由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所致。一个局面的瓦解,非一日之事。在开端时,昏庸之统治人物恒不以为意;但当它挟狂风以骤至的时候,台上的人物遂惊惶失色而莫知所措。近一月来泛滥全国的米潮和学潮,无不表现当前局面之岌岌不可终日。我们早就认为这次政府的改组,无甚意义。现在改组已逾一月,改组后的政府在任何方面尚无任何作为。张群内阁一上台,物价就抢先贺喜。米价在半个多月内陡涨至一倍以上。上海、杭州、无锡、芜湖、宣城、合肥、吴兴、衢县,以及远至四川的成都,无不有抢米的风潮;甚至堂堂首都,亦竟不免。子子小民,不惜冒一死以挣扎其生命,这说明民间疾苦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抢米行为不限一地,竟然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现象,这说明我们的国家已经乱到什么程度!到处骚动,到处愤怒。政府害怕人民革命,然而政府似乎无一天不在逼着人民要起来革命。

这次各地学潮,原因不一。教育经费问题,教授待遇问题,学生副食费问题,男女分校问题,会考问题,人权问题,校长问题,迁校问题,护校问题……一连串的“问题”。本来是一些个别的局部的问题,经过多日蔓延演变的结果,据今天(19日)报纸记载,似又进了一步变成为一个更扩大更严重的问题,在南方变成为一个“抢救教育危机”的问题,在北方变成为一个“反内战”的问题。这次学潮开端于教授的要求改善待遇,“停教待命”,其后接上几个大学的学生为争取他们本身各别的目的,请愿游行,而现在则在一种更大更普遍的呼吁与要求下,形成一种狂风雨式的全国罢课局面。从中国的南部到北部,东部到西部,几乎整个的国家都受到这种学潮的激荡,沉沦在一种无底的动乱与忧惧之中。我们无意在此就每一学潮一一论评,我们认为从

整个大局的观点来观察这如火如荼的学潮，其意义远为重要。我们首先要问，这种汹涌澎湃的学潮，其包含的政治意义究为何如？我们认为在这些学潮的底层，都潜伏着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即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对于现状的普遍的不满。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对于当前局面实在怀有一种彻头彻尾的高度反感。我们先就教育本身来说，为什么多年以来，军费党费团费以及一切有政治性质的费用，动辄巨亿，而独独对于教育经费如此吝薄？为什么那些达官贵人，汽车洋房，享受优裕，而一般公教人员却不能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生活？为什么教育不当教育办，要任命那种有党办党有官做官的人物来做大学校长？为什么不能让青年的智慧思想自由发展，而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加以限制？为什么不能在根本上来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整理课程，充实设备，增加经费，培养学风，使青年在校四年，在知识上能有所得，在做人上能有所立？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是衣履不周，三餐不饱，身体疲乏，精神萎顿，而一想到来日，则尤中心徬徨，莫知所往。在快要毕业的阶段，没有一个人不感到自己空虚，没有一个人不感到前途茫茫。这些还是在学校范围以内分析。要是再将视线放远，看到国家一般情形，更是绝望苦痛，欲哭无泪。八年抗战，幸未覆亡，国家总算乘此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为什么不好好努力，埋头建设？没有一个国人不在呼吁和平，没有一个国家同情中国这种内战，为什么内战不能停止？物质这样涨，涨到骇死人，为什么一天一天的过去，政府当局总是没有一点办法？为什么有些人的财产越来越大，而一般人则越来越没有饭吃？为什么政府对于那些最大多数的穷苦百姓，总没有一个办法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在今日这种社会上，那些一肚皮草的逐臭之徒，反可招摇过市，优游自如，而一切有智慧有人品的人物，反而在水准之下的生活中挣扎？这是不是

社会的不公平？为什么政府容许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为什么汉奸大到像周佛海，竟然不死？为什么只要是有枪杆子的人，翻来翻去总是“忠实同志”？为什么种种贪污不法的事情，报纸抨击，众口指摘，而政府对于这些案子总是雷大雨小，不能痛痛快快惩办一下？为什么有些人只要愿做尾巴，便可分到洋房，配到汽车，做到大官，占到地盘？整个局面，混混沌沌，良心丧尽，道德荡然，纲纪废弛，人心麻痹，人人只知混水摸鱼，取巧为私，国运日敝，民生日蹙，凡此种种，对于那些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青年，请问何能使之甘心！请问何能使之甘心！……无论从国家大事，或者到个人生活，今日一般青年的情绪是苦闷，徬徨，失望，愤怒。他们看不到一点光明，看不到一点希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在内心中渐渐郁成一团怒火。这一肚子气，这一肚子火，碰上机会，自然得发泄出来。这是多年以来他们耳闻目击身受种种反感所累积而成的一种反应。反感越多，累积越久，在发泄的时候，其情绪也就越激烈，其态度也就越倔强，其意志也就越刚毅，而其汹涌澎湃，奔冲激荡的力量，也就越凶猛而难于遏止。

英大交大两校学生的赴京请愿，在当时看，实已构成极度紧张剧烈的场面。但事态发展到今天（19日），英大交大事件在这个还在发展中的学潮中，显然业已退到次要的地位，而仅仅成为这次整个学潮中的一个序幕。但我们即使就以旬日以前当局对于英大交大两校学生的请愿，彻夜奔走，如临大敌，甚且不惜拆断铁路，阻止请愿学生的前进为例，亦可想见这种“恶性学潮”是如何的使南京当局心惊肉跳。各校学生请愿，都有他们各别的请愿目的，这些目的，若就整个大局的观点来说，大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局对于当时英大交大的请愿，所以心惊肉跳，乃是因为这些学潮，在表面上，虽然只限于它本身所揭示的要求，

但从一种更广大的时代背景来看,它还包含着更重要的政治意义。英大学生在杭州车站所表现的力量,并非纯粹来自那几百个英大学生;同样,交大学生在上海北站所表现的力量,并非纯粹来自那一二千个交大学生。几百个甚至几千个,那是看得见数得清的。看不见数不清的是在那些学生的后面,还有着更大更不安的社会。为学潮所连带反映的那种社会的不安,才是使当局所以为之震颤恐惧,日夜不安的原因。他们深恐此波引起彼波,尤怕因学潮而引起其他更可怕的风暴。果然如他们所恐惧的,这几天的学潮比英大交大请愿时,范围更扩大,性质更严重,来势更凶猛。照这两天(18、19)报纸消息,学潮显然已从局部的变成为全面的,从分散的变成为团结的,从不公开提到政治问题而趋向公开提到政治问题。历史上的事实,有时恒非当时所能预料者,共产党的拆毁铁路竟亦大有助于国民政府,目下以京沪杭为中心的学生运动,业已携手,若非津浦铁路不通,恐怕南北两地的学生亦已携手同行。这次这个全国性的学潮,南方先走了一步,现在北方正在接踵而来。照蒋主席的谈话以及国府公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政府对于学潮似将采取严峻处置。我们除了感觉当前的学潮似乎正在发展扩大之中,尚未达到最高阶段之外,尚难预料这个学潮将在什么时候以及何种情形之下始能结束。只是我们愿意向政府进一言者:凡是一个社会现象,必有这个现象的原因。不在原因上补救解决,一切处置徒然使事态更趋恶化。要知今日中国的学生已非严厉斥训或强力弹压所能骇退得了。政府必须在学潮中获取教训。政府必须明白,无论学生本身承认或不承认这点,这次学潮的主要意义乃为对政府过去及现在的作风表示不满。他们显然在示威,在抗议。用着愤怒的呼声,愤怒的眼光,并以一种挨饿吃苦的精神,来诉斥并鞭策台上的人们。他们明言或默言,大家一致

地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使国家像样,而进入于康乐富强之境。在台上的人们要知今日中国没有一个人不讨厌你们,仇视你们。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绝大多数人在心底里都以白眼报答你们。只是你们有权有势,有枪杆,有钞票,一般老百姓虽然受你们压迫,受你们欺骗,受你们侮辱,受你们剥削,但在你们的淫威之下,无可奈何你们。在这种局面下,学生挺身而出,对国是表示一种抗议,实亦为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肩负的责任。他们所以能肩负这个责任,一方面因为青年都怀有理想,都追求光明,都有一种不平则鸣的性格,一方面亦因他们幸而能有一种组织,在集体中表现其意志,以幸免头颅与身体脱离的危险。每当我们目击青年学生游行示威时,无不衷心激动,热泪盈眶。这些青年何不幸而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竟使他们不能安心在校读书,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声嘶力竭,奔走终日,曾不顾一己之疲惫与饥饿,凭着一股热血,以寻觅国家的光明。我们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内,亦何幸尚有这一批热血青年,能责无旁贷地起来呼唤我们国家的灵魂!南京学生饥饿请愿的主席团说:“现在公教人员和老百姓不敢喊;他们不敢喊,我们要替他们喊出来!”(16日《文汇报》)这是多么勇敢的一句宣言!今日这一代学生,无论是他们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处理能力,或是宣传能力,都远非20年或10年以前的学生所能比拟。他们已建立他们的尊严。在多年多种的锻炼下,他们不仅完全成熟,而且他们那样沉着坚韧,竟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象。他们有感情并有理智,并且能使他们的感情约束于他们的理智之中。政治上的种种现象诚然常常使人失望悲观,然而赖有这批青年,才使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一点国家新生的希望。我们承认学潮的起伏足以增加社会的不安,但要使社会得到安定,先须使人心能平。要使人心能平,决不是大官的训话或一纸

命令所能奏效，这要执政当局拿出良心和办法来，一一见之实行。今日中国最迫切需要者，实莫过于执政当局之能够牺牲他们已得的一部分权利，唯有这样，人心才能平，社会才得安定！今日这批青年都是来日建国的梁栋，如何使这批青年的力量不致在消极方面消耗，就全看政府当局如何的领导这批青年。

5月19日

（原载《观察》第2卷第13期，1947年5月24日出版）

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

我们在上期本刊论评学潮，叙至5月19日止。我们当时陈述三点：一、这次学潮的主要意义是对现状不满；二、目下尚在蔓延之中；三、学生非强力所能慑服。现在忽忽又过一周，在这一周间，大局发展，和我们前述三点，大致吻合。就第一点论，学潮已从非政治性质转入政治性质；就第二点论，不仅在京沪平津一带，罢课声援的学校越来越多，就是远至昆明广州各地，最近亦均纷纷响应；就第三点论，国民政府虽于18日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而19日上海依然有五千余学生饥饿游行，20日南京六千余学生依然在水龙、皮鞭、木棍之下冒死请愿，同时北平万余学生亦仍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下游行全市。日来各地当局虽已开始以行动来制止学潮，学生被捕被殴之事，陆续发生，但是学生情绪依然高涨，心中愤怒只有更甚。

这次学潮，最初是局部的、个别的、分散的。自从中大学生倡导“吃光运动”以后，遂使学潮在横的方面发展开来，形成为一

个学生间的共同问题。京、沪、杭、平等地学生大都响应这个运动。其后上海学生又改名为“抢救教育危机运动”，俾使这个运动的目标更加扩大，意义更加严肃。“吃光运动”和“抢救教育危机运动”，多少已牵涉到了政治问题，因为学生没有饭吃与当前教育的种种危机，无不与内战问题有关。北方的学生在这个时候直截了当的提出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认为“饥饿源于内战”，要活非先停战不可。这个“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立刻为南方学生所接受。南北两地的学潮发展到这个地步，目标趋于一致，步骤亦渐统一，而真正成为有一个历史意义的学潮，遂开始在南北两地，并肩迈进。

当学潮公开涉及政治问题以后，政府即认为学生的行为已越出应有的范围，并认为此次学潮，完全受人利用。政府对于学生这种指摘，我们难于同意。一个青年在求学时代，他虽然是一个“学生”，同时也是一个公民。法律并未规定，一个人要是入了学校读书，他就将丧失他公民的资格。现在的大学生，大都已过法定年龄，他们绝对有过问国事的权利。今日国人，大都不满现状，对于内战，尤其痛恨。因为在这种内战的局面下，无论是国家的或者是个人的前途，都被内战打得一干二净，没有一丝生路。我们曾在上期本刊分析今日青年学生苦闷失望愤怒的种种原因，并谓这种种原因逼得他们不得不挺身而出；而最近王芸生先生在我看学潮一文（见本期观察文摘栏）里，叙述这次学生喊出“反内战反饥饿”的背景，尤其针针见血。学生在中国业已传统地成为了政治上的寒暑表，在过去，学潮的激荡无不反映当时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在这种全国怒吼的局面下，当局不反躬自问：为什么那些学生要喊出“反内战反饥饿”的呼声？为什么全国的学生都那样万众一心地游行示威？还是一味训斥学生；训斥不足，施以残暴；这种态度，绝对不能使人同情。我们亦绝

不承认,此次学生请愿,系受他人利用。学生目击国家危急,身受饥饿苦痛,痛中思痛,一切罪恶皆源自内战,起而呼吁,起而反对,为什么一定要说他们受人利用?老实说,在今日这种局面下,假如还要受了他人的利用,才喊“反对内战”,我们真要向苍天呼号:“人心何在”了!

政府又用了许多大罪名加诸学生,认为学生的行动,破坏交通,妨害秩序。关于破坏交通,姑以交大学生赴京请愿一事为例,交大学生实难担负破坏交通的罪名。交大学生本拟购票乘车(14日《大公报》第4版),晋京请愿。为什么政府不准他们购票?公务员可以购票,商人可以购票,农人工人可以购票,为什么学生就不能购票?赴京游览可以,赴京访友可以,赴京经商可以,为什么去教育部请愿就不可以?从法律观点看,交大学生购票赴京,并不犯法,为什么政府要命令车站拒绝购票?政府禁止学生购票,在我们看来,无宁说是政府在破坏交通。交大学生认为政府剥夺他们购票乘车的权利是非法的,自然心有不甘。政府既然蓄意破坏交通,他们只好自己出来维持交通;自驾火车,离沪驶京。本来只要他们的火车一开,交通亦即不难恢复。不料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又拆起铁路来,致使交通陷于停顿。无论如何,交大学生绝无存心破坏交通之意,事实上破坏交通的是政府,而现在政府反将破坏交通的责任,加诸学生,孰能得平!再说社会秩序,政府定出了一个“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维持社会秩序”而要“临时”定出“办法”来,大家想想看,这个“社会”还谈得上什么“秩序”。在我们看来,所谓“社会秩序”,决不仅仅是指汽车可以在马路上行驶,火车可以在铁轨上行驶而言。“社会秩序”的意义非常广泛,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使人人安全,都有饭吃。去年5月上海的客饭只有500元,今年5月上海的客饭涨至4000元,请问政府有没有维持这个“社会秩序”?深夜

捕人是维持秩序吗？任意搜查是维持秩序吗？现在有许多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亦没有看见政府负起责任来维持这个“社会秩序”。社会本来是比较安定的，就因为政府无能缺德，所以弄到今日，社会越来越没有秩序。今日扰乱这种社会秩序的决不是那些学生，制止了学生的请愿游行，也未必就算维持了社会的秩序。政府不尽其本身的责任，停止内战，稳定经济，而独独以妨害社会秩序的罪名加诸学生，是不能使学生心服的。

政府认为学生请愿，是“聚众威胁”。我们认为“聚众”则有之，“威胁”却未必。学生手无寸铁，政府有的是骑兵宪警，学生对于政府，何“威胁”之有？乡间的百姓，看见军队来了，要米不敢不拿米出来，要柴不敢不拿柴出来，要他们去挑箱挖土，他们不敢不去挑箱挖土，这才是“聚众威胁”。政府认为学生请愿，便是“聚众威胁”，未免夸大其辞。有人又劝学生要体谅政府。老实说，假如政府处处体谅人民，不要人民去当炮灰，不要征人民的食粮，人民哪有不体谅政府的道理。“体谅”是相互的，在过去，人民“体谅”政府已“体谅”到有许多地方的人民连裤子也“体谅”光了，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赶快体谅体谅人民，先把这个万恶的内战停了下来再说吧。现在人人饿得慌，他们一天到晚只想吃饱，他们还有什么闲心情来和政府有意为难？

总之，我们认为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学生的意志绝对是自发的，而非被动的；他们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非卑鄙的；他们的精神绝对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钱端升先生说：“今天的学生，比我们的学生时代进步多了。第一、现在的学生了解人民痛苦，已与人民痛苦连在一起。第二、现在的学生无领袖欲，群众化了，无个人风头，所以组织力强。第三、学生的见解进步，老实说，已走到我们的前头。”我们完全同意钱先生的看法。我们在上期本刊就说过：“今日这一代学生，无论是

他们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处理能力,或是宣传能力,都远非20年或10年前的学生所能比拟。他们已建立他们的尊严,他们不仅完全成熟,而且他们那样沉着坚韧,竟非老年人或中年人所能想象。”从前的学生运动,是学生跟了先生走,现在则是先生跟了学生走了。我们看这次学潮,在南京,中大的教授虽然发动于前(要求提高教育经费等等),结果是学生一开动就跨过了教授一大步。在北方,学生走在前面,教授不甘落伍,虚心而又热情地牢牢的钉在学生的后面。在上海,教授似乎永远被学生所遗弃了。这是青年人的骄傲,也是中年人的悲哀。也就这一点,更足证明今日学生之绝不轻易受人利用。在这次学潮之初,学生似乎都是为了自己的问题,然而经过水龙先生、皮带先生、木棍先生、石子先生的教训,学生在心灵上又骤然跨前一步,孕育出一种更为崇高更为伟大的精神。他们了然他们在今日这个时代中已肩负一种新的任务,亦即历史的任务。他们现在正企图以他们的热血来转旋这个天地!南京学生饥饿请愿团的主席曾说过:“现在公教人员和老百姓不敢喊。他们不敢喊,我们要替他们喊出来!”本刊北平通信亦说,北平的学生都以为这一次的学潮,就是一个“新五四运动”的序幕,他们要替人民呼喊。他们已深深觉得,单单为了自己的利益争,这个争是渺小的,必要替广大的人民争,这个争才是伟大的。现在全国的教授,特别是北方各校的教授,都站在学生的后面,全国的开明的进步分子,也都站在学生后面,这是一个坚强的阵线,一幅动人的图画,一首伟大的史诗。从各种形势看,当局显已开始用铁腕来冲散这一个阵线。我们尚难逆料一切前途的演变。但是我们相信,当学生在极端的团结之下,意志坚定,组织严密,胸脯挺起,脚跟站牢,这一条铁链,绝不是木棍所能打得断的,这一股洪流,绝不是几辆警备车所能拦得断的。我们绝不相信政府能把天下的学生

都捉进监牢。我们看,5月25日在上海被捕的学生宣传队,那样义无反顾,从容地走上警备车的神情,这是多么壮烈的场面。被捕的八九十位学生,在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里,依旧慷慨高歌,声闻户外,这是一幅多么感人的情景。我们坚信,在当前这种黑暗危急的局面下,学生将永远发挥其力量,以挽救国家的命运。在这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终会爆出光彩夺目的火花,而新的中国就在这火花中孕育生长!

5月26日

(原载《观察》第2卷第14期,1947年5月31日出版)

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 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

5月24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令文如下:

查该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本市为戒严地区,应予取缔,依照戒严法规定,着令该报于明日起停刊,毋得违误,此令。

这被封的三家报纸,在一般人心目中,都是左翼报纸。所谓左翼报纸,大体上是指这家报纸在思想上比较前进一步,在言论上比较激烈一点。按照出版法规定,报纸的负责人是“发行人”。据我们的看法,这三家报纸的发行人,大都只能算是经营商业的

人物，他们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还是如何能够多赚几个钱的问题——进一步，希望多赚几个钱，退一步，至少希望收支平衡，能够维持这一张报纸。若说他们有“颠覆政府”的意图，那真是捧了他们。至于这三家报纸的编辑人员，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大都是些比较进步而有独立意志的民主分子。这是很正常而且很自然的事情。一个国家若想进步，便需要多几个这种分子。假如一个国家的人民，个个都是唯唯否否，请问这个国家还有什么生气？我们所以能够抵抗日本，苦战八年，不为暴力屈服，就靠我们国民有这一点独立意志。若说“左”，老实说，这三张报真不够“左”；若说激烈，这三张报亦不够激烈。要是比起南京那位泼妇骂街的反共专家某大炮，文汇报新民等两报上的文章简直是“温吞水”。我很坦白的说，我对于文汇报新民两报的作风（我不常看《联合晚报》），有许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态度不够壮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我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有重量的文字。

我认为这三家报纸被封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他们的言论，而是由于他们的新闻。这被封的三家报纸都有一个共同的脾气，就是专门喜欢刊载那些为政府当局引为大忌的新闻。他们所登的大都是事实，无奈今日发生于社会各方面的事实，都是政府所不愿让大家知道的。政府所愿让大家知道的事情，统统已归中央社独家发表了；假如这三家报纸专门刊载中央社的消息，我敢拍拍胸脯担保这三家报纸绝不致被封。无奈中央社的消息许多人不要看，而且不要看中央社消息的人愈来愈多，而这三家报纸的编辑部同人，又都不识时务，自以为负有神圣的新闻使命，拚着命要在中央社的新闻眼以外去找新闻。不幸他们所登的新闻，政府越顾忌，读者越要看。政府既无力在根本上防止那些“新闻”的发生，于是只好设法来制止那些“新闻”的发表。

这次学潮，当局弄得焦头烂额。查封报馆，而且一封三家，这本来是一种希特勒式的作风，报载中国现在正由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主席领导我们步人民主之路，大概若非走投无路，绝不致走此一着。不过我们不承认这被封的三家报纸有任何“阴谋”要煽动学潮，甚至“意图颠覆政府”。当然，报纸在任何公共生活中都是要发生一种消息传播的功效的，但我们不承认，有了这几张报，就可以掀起学潮，没有这几张报，就可以消弭学潮。据我们所知，《文汇报》屡有查封之说，恐怕还是因为上海幸而有这位开明民主的吴国桢市长，所以《文汇报》至少还能出版至5月24日。这次大概正如The Evening Post主笔先生所感觉的：“政府的重要领袖们多少有点孤注一掷的情绪”，而终致出此一着。三报被封的理由是“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及新闻”，对于这个理由，各有各的看法，我们亦无意在此辩论。只是我们要公开宣称：我们在同业的立场上，不能不向被封的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同人，表示我们最大的同情。查封已经是一个事实，我们希望政府善为补救，设法使上述三报早日复刊，以恢复民主国家新闻事业的常轨。

*

*

*

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学潮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亦愿略加论列。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英大事件和交大事件都是局部问题，姑且不说，就是15、16两日南京中大金大两次饥饿游行的新闻，不编在第二版要闻版中，亦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可是5月20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版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按：21日该报第二版因参政会开幕，新闻确极拥挤，但假如《大公报》重视这次学潮的话，该日该版其他零星新闻，都是可以腾让出来的。）同时，像

南京五二〇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5月21日的短评论南京的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卒至演出惨剧。”全国青年听着:你们同意《大公报》的话,承认今日在上者还有一点爱护你们这批青年的意思吗?你们承认,当有人用木棍铁棍在你们头上劈打下来,这就是爱护你们的表现吗?在5月19日的社评中,《大公报》视学生请愿为“暴力的革命”,5月22日的社评中,认为“学生近来的行动”“太天真幼稚”了,认为“青年人太简单了”,认为学生在请愿中“充分表现其行动的儿戏性”,而且甚至认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读“大公报”前后十几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当然,我不能不在这儿提出,这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如此灰色,不能领导当前的潮流,亦许与王芸生先生的适有北行有关。假如王芸生先生在上海,在他的主持下,我相信《大公报》的言论决不致摇摆怯弱到如此程度。不过这次《大公报》在上海及南京两地的采访同人,都甚忠实,热忱,前进,此可于他们的报道中见之。他们的努力多少替《大公报》挽回一部分读者的感情。

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亦不能不出而一言。在5月25日《大公报》第4版上,《大公报》只以三号字的标题,平平淡淡地刊出文汇等三报奉命停刊的消息。《大公报》的编辑先生大概对于电影明星及歌唱明星都是非常发生兴趣的,凡是外国什么一个电影明星有了一些什么新闻,《大公报》照例要加上“花边”登出来(请阅最近数月《大公报》第三版下半面,其事数见)。在《大公报》的编辑标准中,大概像在一个城市中同一天封了三家报纸这样一个消息,其

重要性还不如一个电影明星的私人轶事。《大公报》对于文汇等三报的被封，始终未发一言，以示同情。5月25日是星期，该报例刊“星期论文”，但为什么不写一篇短评呢？25日不写短评，为什么26日不写一篇社评呢？今日为28日，文汇等三报已被封四日，《大公报》对于此事始终不置一辞。且不说别的，至少站在同业的立场上，《大公报》也应当写点文字，向当局抗议一下。《大公报》所以默无一言，还是认为文汇等三报应该被封呢？还是吓得不敢说话呢？（《文汇报》被封后，《大公报》对于学潮的新闻，已有改变）。还是幸灾乐祸，坐视不救呢？上述三因，必居其一。我觉得《大公报》这次的措置，显然失态，至可遗憾。

最后我不能不声明一二。我和《联合晚报》里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八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里面，我仅和《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分服务的，就有六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

5月28日

（原载《观察》第2卷第14期，1947年5月31日出版）

读孙科谈话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6月20日在南京接见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同月22日在同一城市，又对《新民报》记者发表谈话。谈话内容先后见6月21、23两日上海《大公报》。我们披诵孙氏谈话，滋多疑惑，谨评论之。

一、根据6月20日对合众社记者谈话，孙氏认为：（一）目前中共在东北反攻，系受苏联之赞同与指示。（二）中共军队优良之军火均为前日本军队之配备，盖胜利后日本军队向苏联投降，苏联遂将日军配备移交中共。（三）中国军事当局业已获得证据，有半数受苏联训练及配备之韩军参加中共作战。（四）旅顺及大连现被中共用作关内外军需之给养转运口岸，故苏联不允中国军队开入该两地，实违反1945年8月之中苏条约之精神。22日孙氏对《新民报》记者的谈话，则称：“余日前对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在唤起英美之注意，中国之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中共在东北之活动，完全受苏联支持，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该条约上订明苏联应协助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而苏联容许中共军队前往，不许国军登陆。大连虽为自由港，然属中国之商港，中国军队自海道前往，因苏联阻碍，乃拟改道营口登陆，而苏联忽在国军欲登陆之前夕，自营口撤退，交与中共，致国军不得已始改由葫芦岛登陆。又如外蒙问题，阿尔泰区显为中国领土，外蒙军队如无苏联支持，亦何能侵入。故国军之不能接收大连，反让共军先行入据，均在于苏军之占领期间内，其责任应

由苏联负之。大连为我领土，我们为何不能在大连登陆，这是根据什么条约？苏联已违反中苏条约，亦等于否认大连之领土主权属于中国。苏联支持中共、韩共、外蒙，为人人皆知之事实。因此东北已成为国际问题之所在地。中国军队至今不完全接收东北，除中共负直接责任以外，苏联应负间接责任。”孙氏接着说：“中国若失东北，即对美国为威胁，对世界和平亦为威胁。美国应有所表示。”归纳上引孙氏两次谈话，可得三点：一、孙氏认为“中共在东北之活动，完全受苏联支持，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二、孙氏认为“中国之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三、东北既已成为国际问题，美英两国领导下之西方强国，应加以注意，特别“美国应有所表示”。我们要提出来的问题是：孙氏既认为“中共在东北之活动，完全受苏联支持，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并称：“中国军事当局业已获得证据，有半数受苏联训练及配备之韩军参加中共作战”，然则孙氏有无向国民政府建议：由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假如没有，孙氏为什么不提出这个建议？假如孙氏已提这个建议，政府是否业已采纳履行？这是一层。其次，假定我们承认孙氏所述：“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但在这一个“国际问题”中，中国的交涉对象是苏联而非美国，我们应当找苏联说话。孙氏于指摘了苏联种种罪过以后，除了忽而上下文不接气地说了一句“深信建立中苏间之友谊与合作为可能者”之外，并未对苏联作一句正面的责难，却侧过脸来专门向美国说话，可谓文不对题，找错了对象。其三，在这一个“国际问题”中，中国显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假如在这一个“国际问题”中居于最主要地位的中国，不首先负起责任来直接和苏联解决困难，却只希望美国有所表示，我们认为此种态度，既不勇敢，亦欠公道。我们应当自己先挺起来，然后希望人家来支持我。自己挺不起，只想人家来替我们撑腰，替我们

收拾,这种心理和作风是要不得的。

二、孙氏在谈话中所希望获得美国(或美英两国领导下的西方强国)的“援助及鼓励”,包括军事给养、借款及政治支持三项,其中尤以军火为最重要。孙氏说:“中国之美式训练及配备军队,现缺乏军火,故亟需自美国获得接济。‘东北之得失’端赖于此。”又说:“华盛顿与伦敦之支持南京政府之宣言,当有裨益,然亦不能代替军火。”这恐怕是孙氏谈话中最实在的一部分。我们的意见是:孙氏有无考虑,美国所愿意“援助及鼓励”之中国政府,究为何等情形的中国政府。照我们的意见,美国所愿意援助及鼓励的中国政府,必须为一个建全的及民主的政府;建全系指行政效能而言,民主系指政治作风而言。现在的南京政府是否符合这种条件?本刊本期所载 N. Peffer 这篇论文,官方想必早已读到。美国官方及一般舆论,对于中国的现实情形,相当了解。近一年来,南京政府天天在喊宪政,可是宪政宪政,实际上哪儿有半点宪政的影子?在这次学潮中,世界各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现存政权的真面目,必可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麦克阿瑟在日本事半功倍,把日本人统治得乖乖的,而马歇尔在中国,七上八下在大热天跑庐山,花了这么许多冤枉钱,到头悄然而去,反弄得一般民间对于美国的友谊,一落千丈,美国所为何来?费孝通先生说得好:“马歇尔应当已经明白,他本来要扶植的对象实在不太扶得起。”“更使他(马歇尔)失望的是在这个政治权力下,连美式装备都全失其效力。”(阅本刊 2 卷 16 期文摘栏费文)。近来国内国外都有美式配备落入共军手中的传说,一方面希望美国供给军火,一方面原来慷他人之慨,将整批的美式配备送给中共,这个问题美国不能不考虑。现在据一般的看法,认为即使美苏不幸终致战争,美国也不是非有中国不可。政治家策划国家大事,不能失之“幻想”;自己这样腐烂,这样堕落,一味巴望别

人援助,实在近于“一相情愿”。孙氏关于这一部分的谈话,仅仅公开了一个秘密:即今日南京政府军火的缺乏已到了如何严重的地步!政府大员在谈话中如此露骨的代表切望美国军火的接济,尚以孙氏此次谈话为首。

三、在孙氏22日一次谈话中,记者曾询孙氏,如其美国反响冷淡则又如何?孙氏答称:“美国反响冷淡,即等于放弃中国,是在中国之外国势力,惟有苏联,则政府将重新考虑态度。”我们认为孙氏此言,甚不得体。孙氏所谓“将重新考虑态度”是指什么呢?这可分内政外交两部分来推敲。若从内政上说,所谓“重新考虑态度”,当系指目前的内战而言。目下的事实是“战”,则所谓“重新考虑态度”在逻辑上当系指“和”。但中国的内战,公平地说,并非美国所要求者,故我们不能认为“战”即为对“美国支持”的一种义务,“和”即为对“美国不支持”的一种报复。况且孙氏已斩钉截铁地说:“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所以所谓“重新考虑态度”当不是指内战而言。就外交上说,按照孙氏语气,在逻辑上似乎是:假如美国放弃中国,则中国只好倒到苏联怀抱里去了!我们觉得此种谈话,甚成问题。在常识上,孙氏一面表示“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一面又假定假如美国放弃中国,中国即将倒到苏联“势力”中去,其事是否可能,实可怀疑。再进一步说,中国自有其主权,自有其独立的国格,对于任何一个外国的对华关系,根本上谈不到什么“放弃”“不放弃”。按照孙氏谈话,不啻公开认为中国已是别国“势力”之内的东西,所以假如甲国放弃中国,中国只好投到乙国的“势力”中去。我们相信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孙氏这种论调。在国际社会中,外交运用,当然极尽奥妙,但如公开宣言,便近似无赖。我们很坦白的说,我们认为孙氏此种谈

话,已经迹近一种 blackmail“敲诈”。孙氏为今日国民政府的副主席,以国府副主席的身份发表此种谈话,孙氏个人声誉的损失,其事小,国家国格的堕落,其事大;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郑重提出,表示异议的。

四、只有一项事实我们尚难判断:即孙氏此次谈话究竟是授意的,还是自发的?假如是授意的,那就是代表国民政府的。假如是自发的,那只是代表孙氏个人的。但即使是后者,孙氏既身为国民政府副主席,我们亦不得认为他在这样严重的政局中发表这样露骨的重要谈话,仅仅是代表他个人的见解,而一无政治意义。照我们的看法,这次孙氏的谈话,只有一个意义,即孙氏谈话的目的显然在观测美国官方及一般舆论的反响。因为从技术上说,假如南京政府真正不能支持,它尽可以以最机密的外交通牒照会白宫,正如英国在 1947 年 2 月 27 日正式照会美国它不能继续担任它在海外的任务,要求美国先来接受它在希腊的任务一样。南京政府派往华盛顿从事外交接洽的人员很多。假如仅仅是对杜鲁门和马歇尔等呼吁,实无须孙氏公开发表那样毫无掩饰的谈话。美国朝野对于孙氏谈话,将作何种反应,须由日内的电讯报道说明之。不过一个国家由其副元首发表语气如此坚决,无甚转圜余地的谈话,事不多见。然而我们亦正可从孙氏的谈话中,明了今日南京政府业已面临如何严重的政治关头。

6 月 23 日

(原载《观察》第 2 卷第 18 期,1947 年 6 月 28 日出版)

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 采取步骤表明态度

7月1日纽约《下午报》(PM)刊载合众社中国区经理伦道尔所撰一文,指责“蒋主席之姻亲使美国公司遭受损失而致富”,其言有曰:

蒋主席之姻亲能获得 25 000 美元之外汇以输入化妆品,而化妆品为中国政府所颁布之紧急经济措施中所严格禁止入口者。同时美国进口商则无从获得 31 万美元之外汇,以输入能使中国工厂复工之机械器具。中国政府之购料机关,曾输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例如汽车、收音机、电气冰箱及照相材料,以供私下分配。同时美国公司则申请中国煤矿复业所需之抽水机之入口执照,而竟未获准。中国豪门第一家,即蒋夫人之昆仲及远亲等所办公司,则能借其与政府之关系获得特权,并向在中国历史悠久之美国公司之经销商人勒索。豪门利益之支派不胜枚举,例如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及孔祥熙所办之中孚公司,宋氏弟兄皆蒋夫人之手足,而孔氏则为其姊丈。宋子文所经营之南洋烟草公司,其另一兄弟宋子安之中国建设银公司,蒋夫人之弟兄姊妹合办之金山公司,宋子文宋子良所办之中美橡胶公司,宋子文所控制之扬子电力公司,宋子文之中加公司,蒋夫人之外甥孔令侃所经营之扬子建业公司,其他远戚疏亲所办之公司,亦不胜枚举。

遭受不道德方法失去代理人之美国厂家,据悉计有西屋电气公司,该公司之经销权已由历史悠久之店号转予中孚公司,威利斯汽车公司可贵之吉普车经销权,亦由其美籍代表让予宋家。美国安纳康达铜矿公司则在宋家压力之下,取消其美籍代表。其他类似情形尚不知凡几。

年来美国报章杂志所刊指摘中国局势的文章很多,而伦道尔此文,其性质实较其他指摘中国现状的文章为严重。第一,伦道尔此文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广泛空洞的指摘,他文内所涉及的都是有姓有名的人物以及具体的事实。第二,伦道尔此文所涉的不只是政策上的问题,而已涉及了政治道德上的问题。第三,伦道尔此文所涉的人物,包括曾任中国前后 10 年以上的两任行政院长,并涉及国民政府主席的夫人。我们认为此文已经不能仅仅视为是一个批评任何私人的问题,它实已涉及中国国家的荣誉。正因此种理由,我们对于此事不得不出而一言。

我们认为国民政府以及“蒋主席之姻亲”,其中以孔祥熙宋子文两氏为代表,对于伦道尔此文,不能不出而有所表示。伦道尔此文的主要动机当然是替美商争取利益,但该文所涉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商的利益问题。孔宋两氏虽然先后曾任中国行政院长长达 10 年以上,但我们不能谓为一个行政院长卸任以后即无经商之自由,但伦道尔此文所涉及及孔宋的部分,并不是一个行政院长有无经商之自由的问题。伦道尔此文所涉的问题,约如下述:

(1) “中国政府之购料机关曾输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以供私下分配”的问题。

(2) 有助于中国工业建设之正当器材,无从获得外汇及入口执照,而用以购买化妆品及奢侈品者,反能获得外汇及并能入口的问题。

(3) 豪门“借其与政府的关系获得特权”，向外商“勒索”，并以“不道德方法”压迫正当商人的问题。

我们认为伦道尔文中所述，或者是事实，或者是虚造，二者必居其一。假如是虚造，我们认为伦道尔此文对于孔、宋两氏及蒋夫人，已构成严重的毁谤状态，孔宋等氏对于伦道尔应即提出法律控诉，借以维护其私人的名誉。同时，因为孔宋两氏曾先后担任中国行政院院长多年，而蒋夫人则为今日中国国民政府主席的夫人，国民政府应即循外交途径，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责令伦道尔及刊载伦道尔此文的《下午报》正式向中国政府道歉。假如伦道尔此文所述，确系事实，国民政府应对此事严格惩处，俾在外交上维护国家荣誉，在内政上以申政府的纲纪。

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对于此事应即迅速采取适当步骤，以澄清国内国外因伦道尔此文所引起的混乱的观感。我们建议由监察院单独组织，或由监察院会同立法院及参政会会同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办理此事。在欧美，当国会自身发现国家机关或政治人物发生重大过失或不道德的行为，或外间舆论对于国家机关或政治人物的行为有所指摘时，不论此种指摘发自国内或来自国外，而那种过失或行为足以损及国家的尊严及荣誉者，国会常常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彻查此事。我们认为政府应当采取下列步骤：

(1) 彻查国民政府购料机关自胜利以后自国外购入器材用品之全部单据，查究是否有为伦道尔文中所述“曾输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例如汽车、收音机、电气冰箱及照相材料，以供私下分配”之情形，并公布彻查之结果。

(2) 政府曾经明令禁止奢侈品之输入，但事实上，奢侈品之输入并未绝迹。其中单单汽车一项，最新式之汽车时有输入。上海报纸对于此事屡有记载。政府应彻查此种明令禁止之奢侈品究由何人在何种方式下输入，并追究其责任。

(3) 政府应即公布自胜利以来核准外汇之全部情形,其中包括:(一)申请人全部名单,(二)核准购买外汇者之全部名单,(三)核准之数目(包括申请人原申请之数目),(四)核准之理由。

(4) 政府应查究为伦道尔文中所举之豪门,有无“借其与政府之关系”,获得“特权”,其所获得之“特权”,其内容与性质又如何?

(5) 政府应令伦道尔负责供给更多之材料与证据,以证实其所指摘之事实。并要求伦道尔文中所涉及的若干外商如西屋电气公司,威利斯汽车公司及安纳康达铜矿公司等,提出材料及证据,借以决定伦道尔文中所述者是否为事实。

无论如何,对于伦道尔此文,即使为了政府自身的名誉,政府亦应采取步骤,表明态度。除非政府默认视政权的存在确是仅仅为了维护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政府对于伦道尔一文不宜默无一点表示。我们愿意借此向政府进告一言:八年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健康,以及他们应有的幸福,从事抗战,以争取国家的生存。但是我们争取国家的生存,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要替少数特权阶级保护并扩充他们的利益。现在中国的一般人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被摒弃于购买圈外,沉沦在生活的水平线以下。不仅民怨沸腾,到处是“反饥饿”的吼声,据我们所知,就是在国民党党团内部,最近也发生了“这个党到底是代表哪几种人的利益”这样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现实环境,看来是越逼越紧了,事实上已不容许豪门逍遥自在。假如政府自身缺乏勇气,不能采取剧烈措置,其结果那就势必只有等待别人来采取措置。只是要铲除豪门,须知孔宋只是豪门的代表,豪门初不限于孔宋两家。一切既成的豪门及正在生长中的豪门,俱应在铲除之列。同时铲除豪门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单单消极的行为无补于今日国家的大局,豪门在性质上

是一种特权阶级,我们必须同时在根本上消灭一切足以产生特权的制度。豪门的象征是少数人饱死,多数人饿死。我们一方面铲除豪门,一方面需要努力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今日中国政治,如其不从解决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下手,则社会将永远不能得到安定,一切建国的工作亦即无从获得成功。

7月17日北平旅次

(原载《观察》第2卷第22期,1947年7月26日出版)

艰难·风险·沉着

——本刊第2卷报告书

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宣布:本刊第2卷业已出齐。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息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第3卷第1期定8月30日出版。

这半年是一段风暴的日子。无论经济环境或者政治环境,都使我们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只是我们虽然精殚力竭,然而心情却极宁静。我们认为只有以单纯始能应付复杂,以沉着始得克服困难。我们能够撑过这段日子,应归功于作者的支持,读者的爱护,和本社同人的合作。

开 支

我们仍旧先从业务方面说起。这半年使我们最透不过气的,就是各种开支的激增,纸成为目前本刊最大的一笔支出,在每期

成本中占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在第1卷结束时,纸价尚未超过5万元一令,但到第2卷第1期付印时,纸价狂涨到每令15万元左右;在短短的半个月內,纸价的上涨竟达三倍以上。2卷1期以后,纸价继续上涨,自15万到20万、25万、30万,目前则在32万元左右;较之第一卷结束时,纸价上涨八倍。本刊是一个纯粹民营的刊物,既无政治集团在后指使,亦无经济集团在后支持,平时用纸都是向市上纸商零购的,因之纸价激涨,对于本刊实为一种难于忍受的打击。

排印工及装订工一再涨价,上涨的比率也不在纸价之下,其统计如下:

种 类	2卷1期起	2卷10期起	2卷15期起
五号字排工(千字)	18 000元	24 000元	43 000元
六号字排工(千字)	21 000元	28 000元	50 000元
印工(每令)	32 000元	43 000元	80 000元
封面印工(千页)	11 000元	15 000元	27 000元
订工(每册)	2卷1期起	49元3角	
	2卷6期起	59元	
	2卷10期起	78元5角	
	2卷13期起	88元5角	
	2卷17期起	115元	
	2卷22期起	131元6角	

本刊每期出版,例在上海《大公报》封面地位刊载广告一次。2卷1期出版时,《大公报》的广告费每行仅26 000元,现在则涨到每行7万元。本刊稿费2卷1期时千字1万至12 000元,现在提高到千字3万至4万元。本社同人的薪金,现在较之2卷1期出版时,亦提高至百分之二百以上。检查上列数字,本刊各种开支,2卷结束时较之2卷开始时,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

以上。而本刊的售价,2卷1期时为1500元,现在为3000元,仅增一倍。在第1卷中,我们还经常保持两页地位的广告,借以增加本社的收入。自第2卷起,因为要增加文字的容纳量,广告所占的篇幅,已自二页减为一页,甚至连一页也没有,所以本刊目前广告收入,已降至微不足道的地步。

销 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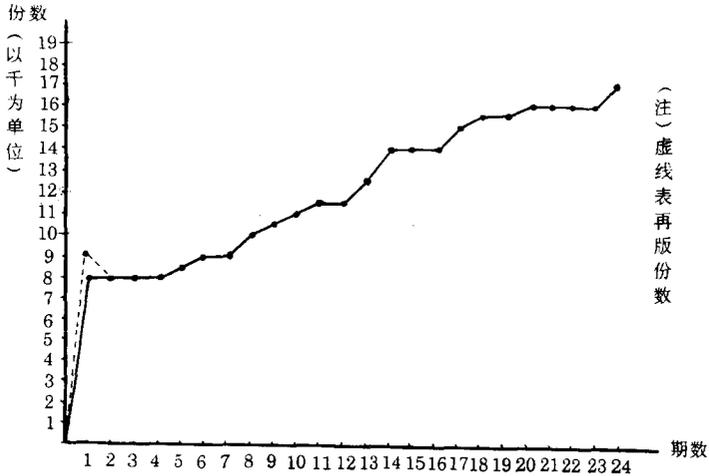
然而我们能够有这样困难的情形下支持下去,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销路的增加。我在第1卷报告书中曾经提到,当我们创刊号试印5000份时,即使是我们最关切的朋友,甚至亦怀疑本刊是否能够销行到3000份。当我们后来印到1万份时,在出版界中有经验的朋友们,一致承认我们单在这方面,已经是一种成功。因为照一般估计,像我们这样一种刊物,销行到1万份几已达到了它“可能的发行数”。我们自然希望一路向上加,但也不敢存太大的希望。因为我们深切了解当前的环境太艰难,许多条件都是不利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刊物的发展的。从政治环境说,本刊是一个政论的刊物,许多意外的阻碍自在意料之中。就教育程度说,本刊是一种高级刊物,自不能像软性刊物之那样易于吸引读者。就经济情形说,现在一般读者的购买力非常薄弱,特别是公教人员和学生,而本刊的读者,公教人员和学生占很大的比率。再从业务环境说,交通如此困难,邮资一再加价,都是影响刊物的发行。只是种种不利的情形虽如上述,而实际上,第2卷本刊的发行数,始终在很稳健的增加状态之中。本刊第1卷最高印到1万份,其后降到7000份,其中原因曾详第1卷报告书(1卷24期)。所以2卷1期出版时,我们很谨慎地只印8000份(其后再版1000份)。因为第1卷时期,各地同业拖欠的货款太多,所以

自第 2 卷起,采用“现批”政策,不先汇款来的,即不发刊。又因为第 1 卷时期,印数与实销数常常脱节,故自第 2 卷起,严密管理,印数多少,纯视实际需要,决不多印,以减浪费。就在这样发行紧缩印刷紧缩中,本刊的发行额仍然逐步上升。到 2 卷 11 期,已从 8 000 份升至 11 500 份。2 卷 13 期因有评论学潮的文字,我们放胆增印至 12 500 份,2 卷 14 期印至 14 000 份。实际上,我们虽然增印至 14 000 份,但仍不敷市场上的需要。别处不详,单在上海 2 卷 13、14 两期,都是在出版后两天之内全市抢购一空的。2 卷 14 期后,发行数继续增加。至 2 卷 20 期,增印至 16 000 份。2 卷 21 期发行时,16 000 份已不敷分配,但因邮资加价及售价加价的原因,我们采取保守态度,暂不增印,以覘外埠各地发行的反应。迄至本期,复增印至 17 000 份。兹将第 1 卷各期再版数暨第 2 卷各期发行数列表如下:

第 1 卷	第 1 期	4 版	800 份	
	第 2 期	5 版	700 份	
	第 3 期	4 版	700 份	
	第 4 期	3 版	600 份	
	第 5 期	3 版	600 份	
第 2 卷	第 1 期	初版	8 000 份	再版 1 000 份
	第 2 期		8 000 份	
	第 3 期		8 000 份	
	第 4 期		8 000 份	
	第 5 期		8 500 份	
	第 6 期		9 000 份	
	第 7 期		9 000 份	
	第 8 期		10 000 份	
	第 9 期		10 500 份	

第 10 期	11 000 份
第 11 期	11 500 份
第 12 期	11 500 份
第 13 期	12 500 份
第 14 期	14 000 份
第 15 期	14 000 份
第 16 期	14 000 份
第 17 期	15 000 份
第 18 期	15 500 份
第 19 期	15 500 份
第 20 期	16 000 份
第 21 期	16 000 份
第 22 期	16 000 份
第 23 期	16 000 份
第 24 期	17 000 份

第二卷各期发行曲线



实际上，在发行方面，由于种种限制，我们并没有能够达到最大限度。第一、我们为稳扎稳打起见，采取“现批”政策，凡不先汇款来的，我们一律不批。或者汇款已完而未续汇的，我们即停止寄刊。此种办法，虽然稳，但亦势必因此放弃了一部分市场。第二、我们规定货是不能退的，因之各地同业实际可以销 100 册者，也只愿批 70 册或 80 册，这个情形也大大减低了我们的发行数。第三、有少数地方的同业，高抬本刊售价。据我们所知，当本刊售 500 元时，贵阳昆明一带已售 1 500 元，本刊售 1 000 元时，贵阳售 8 000 元一册。此种情形，对于当地的读者固为极大的剥削，对于本刊的销路，也有不良影响。第四、在若干地方，本刊遭受不合理的压迫，如长沙、衡阳、芷江、济南、太原、三原、建瓯、沈阳等地，本刊均被禁售；对于本刊当然也是一种打击。

在发行上，本刊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分布普通，关于这一点，今日国内恐怕没有一个刊物甚至一个报纸，可以和本刊比拟，平津出版的刊物大都局促于华北东北一隅，上海一般刊物的发行，亦多以京、沪、东南一带为主要市场。我们很难相信兰州、成都、贵阳、昆明的读者能看到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有上海、天津、重庆 3 版，3 版若合为一体，其分布之广，便约与本刊相似，但若三版各自分开，我们便难相信台湾的读者能看到重庆《大公报》，昆明的读者能要看到天津《大公报》，西安的读者能看到上海《大公报》，本刊虽在上海发行，但其分布并不限于东南一隅；以京沪杭为中心的东南一带，在本刊的发行额中，仅占 1/3，其余 2/3 都是分布在华北、华中、华南及西南西北各地的。这是本刊在中国出版界中最特殊的一个情形。

定 户

直接定户是一个刊物最基本的读者，也是最忠实的读者。每一个刊物都希望获得更多的直接定户，以巩固刊物发行的基础。当本刊第1卷结束时，我们曾经进行过一次征求定户的工作。我们的办法是，在平时不零零碎碎的征求定户，到每卷结束时，才征求一次。我们所以如此，一则本社同人平时很忙，已抽不出时间向此方面努力；二则零零碎碎的征求定户，看不出征求的成绩，集中一次做，容易看出征求的结果；三则旧的一卷业已结束，新的一卷即将开始，在心理上这个时期最适合征求定户。上次我们征求定户，大体上向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我们想经过本刊撰稿人的帮助，在各学校征求一批学生新定户，二是我们吁求本刊原有的直接定户，就他们的同学、同事、朋友、亲戚之中，替我们介绍几个新定户。我们最初对于前一方向怀有很大的期望，因为本刊撰稿人遍布国内各大学，他们对于本刊大都关切，假如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以为可以征求到一批新的学生定户。不料事实与理想相反，这一方向征求的结果，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的惨败。无论在哪一个大学，我们都没有能够得到任何收获。这事实使我们第一次开始了解：今日一般学生是生活在何等贫穷之中。各方面都说学生没有钱定阅刊物。那时我们定阅还只先收2万元。2万元在当时充其量只合到战前的一块钱。我们很难相信，在战前，大学的学生竟会拿不出一块钱。然而现在，大学生拿不出2万元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这事实也深深影响了我，使我在5月学潮中对于学生抱持同情。这次我到北方来，我和学生接触的结果，使我相信，要他们拿出几万元来订一份刊物，已近乎一种奢望。可是第二方向，即吁求本刊原有的定户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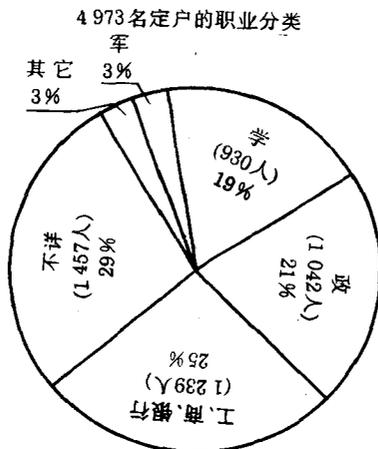
我们介绍新定户,却又出乎意外地获得可观的成就。竟有不少读者,那样热情地无条件地支持我们,替我们分头介绍。他们真是尽心尽力,竭诚竭忠。有不少位读者附来长信,慷慨陈辞。他们认为,在平时,是我们在服务,他们在享受,而他们欣慰他们亦终于获得一个机会,让他们也能对《观察》尽一点力量。他们认为,假如一个人永远只是享受他人的努力,坐视他人的努力,那是一种不可恕的自私,因之他们非常高兴他们也有机会略尽一点义务。这些信件,使我们极度感动,并且获得更大的力量。我们深切感到:在这种混沌的,常常令人悲观的中国社会里,仍有公道的存在。我们并且认识:这一种无私的同情与援助,就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进步!

第1卷报告书中定户的号码是2709(至1卷23期出版日止)现在则已增至7682号。各期定户的进度表则如下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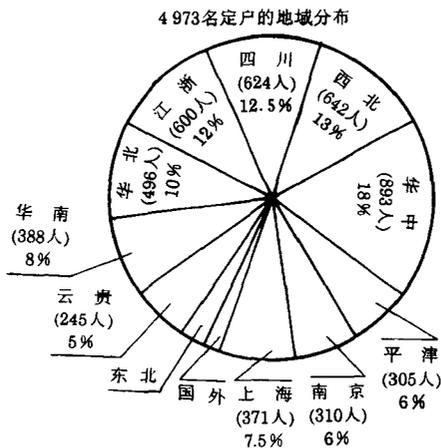
第1卷	第24期出版日止	2 800
第2卷	第1期出版日止	3 311
	第2期出版日止	3 541
	第3期出版日止	3 802
	第4期出版日止	4 005
	第5期出版日止	4 157
	第6期出版日止	4 258
	第7期出版日止	4 425
	第8期出版日止	4 656
	第9期出版日止	4 796
	第10期出版日止	4 934
	第11期出版日止	5 052
	第12期出版日止	5 191
	第13期出版日止	5 369

第 14 期出版日止	5 558
第 15 期出版日止	5 757
第 16 期出版日止	6 025
第 17 期出版日止	6 276
第 18 期出版日止	6 572
第 19 期出版日止	6 842
第 20 期出版日止	7 094
第 21 期出版日止	7 269
第 22 期出版日止	7 489
第 23 期出版日止	7 682

所以第 2 卷的定户,应为 $7\ 682 - 2\ 709 = 4\ 973$ 名。这 4 973 名直接定户,其地域及职业分布,我们援例统计制表如下:



注：“其他”包括律师、医生、教师等。本刊未曾向读者调查职业，此项统计，系根据定单存根而制，故大部分定户职业，无法分类。



注：“华北”包括冀、鲁、晋、豫、绥、察、热等省。

“西北”包括陕、新、青、康、宁等省。

“华中”包括湘、鄂、皖、赣四省。

“华南”包括港、粤、闽、桂、台等地。

关于下列统计,有几点须加解释:(一)我们说第2卷的直接定户的数目是4 973名,并非表示本刊现在拥有4 973名直接定户。定户无论是新定户,或是旧定户来续定的,每天汇款来订时,我们都增加了一个新号码。据我们统计,凡是本刊旧定户,订费用罄时,大都是续订的;中止的为数很少。所以这4 973名里,有许多都是业已满期的定户,本刊目前的实际定户,仅在2 500名左右。(二)在第1卷和第2卷两次报告的定户地域分布统计中,各地的百分比,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仅四川省,第2卷较第1卷为小。可能的解释是原有一部分定户已移到了东南或华北一带。西北及华南两地的百分比,第2卷较第1卷为大。可能的解释是本刊在西北一带的读者渐渐普遍,由于西北交通不便,许多地方的读者不一定能够买到本刊,所以直接定户

的数目增加。至于在华南一带,我们在过去迄未推销,定户的增多亦足表示在华南各地,本刊渐次获得较多的读者。(三)职业分类中,第1第2两卷的统计,第2卷学界定户的百分比降低。第1卷统计学界定户占百分之二十三,第2卷统计仅占百分之十九。工商银行界定户的百分比增加。第1卷为百分之二十二,本卷为百分之二十五。这个变动最可能的解释是学生的购买力越来越薄弱,工商银行界的定户大体上尚未受到此方面的影响。(四)我们很抱歉定户职业分类表中的“不详”部分竟达百分之二十九,致使此项统计的正确性大大减低。主要的原因是本刊初创,各事缺乏经验,我们过去始终没有举行过读者调查。此种统计大都是根据本社的定单存根制就的,但在定单存根上,有许多定户无从判断他们的职业。我们现已开始补救,在以后的定阅单上,都附有定户调查一栏。我们希望读者合作,于定阅时,顺便一填,以便我们在第3卷报告书中,对于定户的职业,能有比较正确的统计数字发表。

现在第2卷业已结束。我们援例在此向全国各地广泛征求新的定户。我们仍旧吁请本刊原有的定户,能替我们介绍几个新定户,我们并欢迎原有零购读者直接定阅,变成我们的定户读者。读者先生:我们在期待着你们的支持和合作。

编 辑

关于编辑部分。第1卷结束时,我们打算自第2卷起,增加篇幅至32页。在我们的编辑计划上,自第2卷起,我们打算增辟“读者投书”、“观察文摘”和“观察漫画”三栏,并扩充文艺栏的篇幅。在此种计划下,原有的24页自然不敷分配。但就在第1卷出完,休息的两个星期中,金潮泛滥,百物齐涨,其中纸价的上

涨最可骇人。在这种情形下,扩充篇幅的计划只得收起。但原定增辟的投书、文摘、漫画三栏,则决计使之实现,文艺篇幅无法扩充,而刊载学术理论文章的“特稿连载”一栏,不得不暂时取消。“尾页”也随之取消。并腾出一页广告地位以容纳读者投书。照目前情势看,恐怕我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无法考虑任何涉及增加篇幅的计划。

一般说来,第2卷的言论态度较第1卷为积极。“专论”部分,学理的文章减少,触及现实的文字增加。我们极愿保持这个趋向。“观察通信”亦较第1卷时期为能配合时事。“读者投书”,据各方面报告,甚受欢迎,甚至本刊所刊的读者投书,并已成为其他刊物发表的论文中所引用的材料。本刊所刊“读者投书”所以广受欢迎,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短,二则因为大体上每封投书尚能言之有物。不过我们总觉读者投书,还是冗长的多,所发表的投书,大都要经过删节修饰的功夫。我们希望以后读者投书,尽量简短,即使仅有一句,亦无不可。“观察文摘”未能做得理想,总因人力有限,篇幅有限,所以选摘的范围太狭,也无法每期都有。

稿子经常不宽裕。但稿子不宽裕是一件事,稿子选择的水准又是一件事;这两件事应该分开。照我们大约统计,全部来稿中,刊载的约占百分之四十,退还的约占百分之六十。我们自信我们用稿在大体上还能保持客观的标准,避免偏私。稿件用否与是否是“撰稿人”或是否是“教授”并无必然关系;“撰稿人”中的稿件也有许多退还的,外来的投稿,只要重量够,我们极愿采用,并给以应有的地位。譬如2卷10期所刊钟伯平先生的“学潮平息以后的认识”,就是投稿;这篇文章应当刊第一篇,我们就给它排第一篇。我们十分欢迎全国作者读者惠稿,共同来充实本刊的内容。

本刊是一个政论刊物。刊物本身的性质注定了它是无法逃避现实的。因此环境越艰难,本刊所可能遭遇的风险也越大。在5月学潮的一段动荡环境中,我们几乎每一期都是处身于死亡的边缘上的。我们当然欣幸我们终于平安无事,但是来日大难,真正的困难恐怕还在后面。我们说过,我们愿以单纯应付复杂。我们将继续本乎我们的良知,发为言论。我们相信我们一切发言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愿意在此吁求政府当局,尽量放宽宽容的尺度,容许国内继续有无私的公正的言论。

本刊自第2卷起增加漫画一页,由孙方成先生执笔。读者对于本刊漫画的批评,我们还不甚清楚。相熟的朋友如钱钟书萧乾等先生都曾表示称赞。然而孙方成先生和本刊的合作,却近乎传奇。我们在第1卷中,曾经采用周东郊先生的投稿,并为之出了一个“新疆变乱记略”专辑。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用稿及对人都能尽力做到无所偏私。第2卷中类似的情形就是孙方成先生的漫画。在第1卷快结束时,我们收到孙先生投来的两帧漫画。那两帧画并不好,但其中略略有一点点“味道”。我就约他来谈,并请他将他过去所爱的画稿全部带来。他的通信处是由一个朋友转的。他并没有照约定的时间来,但终于在迟了几天以后来了。他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化学,毕业后曾在黄海化工研究所任实验工作五年。可是他忽而希望在漫画方面寻觅他的前途。他带了一点仅有的旅费便到上海来了。他说他在上海人生地疏,到上海后第一个给他同情的是西风社的黄嘉音先生。我检查他的画稿,大部分都是我不喜欢的。但是我发现有两帧,造意和技巧都已够得上英美报纸上的漫画的标准。我考虑了一下,我便答应给他一页地位。我只说了一句话:“我希望你能了解,像《观察》这样一个刊物,给你一页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很感动。他默默地说:“我了解这点。”最后他走

时,我劝他,我希望他专心替《观察》画,不要再向别处投稿,因为“一个人的意思只有这么一点。一个人的精力应当集中,集中便有成就”。本刊所载的漫画不完全是成熟的。然而我知道孙先生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并尽量做得最好。我当初决定给他一页地位,仅仅是因为我在他的画里发见一种“希望”。我们在生命中奋斗了多少年,可是我们很少遇见有力量帮助我们的人,给我们热情,给我们鼓励。在这个社会上,不知有多少青年,仅仅因为无法得到一个机会让他一试,就此埋葬了他的天才!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坟墓,充满了冷酷,充满了阴沉,它只毁灭人,它不创造人!我是在这种情绪下毅然给这个漫画家一页地位,让他一试。而我所以在这篇报告书中花费这么多字记述这段经过,亦仅仅因为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凡有力量帮助他人的人们,能够对一切有希望的青年及其事业,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支持;至少给他们一试的机会。

本刊立场编制,大体上业已定型,我们在此已无新的事情需要报告。原定自第3卷起增辟的“观察一周”,经同人考虑后,决计展缓实现。但自第3卷起,将增设“书评”一栏,业已经约好几位先生分别担任。

事 务

一、一年以来,本刊各期幸能按期出版。无论是过新历年或旧历年,中秋节或端午节,印刷所及装订所尽管放假停工,我们总在事前作适当的布置,以免脱期。去年过旧历年时,印刷所放假至五日之久,但本刊亦未脱期。一切能在事前知道的问题,我们都设法解决;最困难的是临时突发的问題,有时使本社同人手脚无措。譬如自6月中旬至7月中旬,上海的印刷业及装订

业,经常在罢工状态之中。有时正巧我们要上印了,印刷所罢工了,或者正巧要送装订所了,装订所罢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本社同人只要有法可想,总是多方设法,以求按期出版。装订所送刊,经常分为三批,即星期四晚上送一批,星期五上午送一批,星期五下午送一批。有时星期四晚上的一批送了来,我们照例是先将直接定户的刊物漏夜封好,有余再将一部分外埠同业批销的包好。可是星期五突然接到通知,说装订所罢工了。以致定户的刊物虽然全数发出,而同业批销的刊物却大部分不能发出。最不巧的,同一地点的同业,有一部分凑巧在星期四晚上打了包,其他一部分原定在星期五上午打包的,临时因装订所罢工,无法寄出,以致该地同业,一部分早收到,一部分迟收到,以致引起误会。这种情形虽属意外,确是遗憾。我们希望各地同业赐予体谅,我们并将努力避免再发生同样的情形。我们愿意向读者及各地同业诚恳表示,在一切可能的环境下,我们必定竭尽我们的能力,总期各地读者及同业都能按期收到。

二、关于售价,本刊大体上要比其他刊物定得低些,并涨价涨得慢些。譬如别家售2 000元时,本刊仍售1 500元;别家售2 500元或3 000元时,本刊才增售至2 000元;现在有许多刊物已售4 000元,本刊只售3 000元。(本期篇幅增加,改售4 000元。)即使有几家刊物目前售价仍与本刊相等,但因本刊广告篇幅少,六号字用得,本刊容纳的文字数量至少要比别的刊物多五分之一,我们亦仍然可说本刊的售价较他家为低。其实就开支说,本刊开支要比其他刊物略重,但因销路较大,所以售价虽低,亦能维持。我们认为办刊物不是做买卖。我们一方面要顾到本社的收支平衡,一方面也愿意顾到读者的负担。

三、关于稿费,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已调整过七次,自去年今日的千字4 000元,提高到目前的千字4万元;增加十倍,约

等于一年来一般物价的上涨比率。我们所以经常提高稿费，一方面希望借此使各方面获有一种印象，即我们确是当一件事业在办，另一方面也表示我们时常顾到作者的利益。我个人的办事性格是干脆明白。我平时最讨厌“稿酬从优”四字，因为“从优”两字并无明白的标准，稿子到了你手里，你爱给多少就给多少，这不是一种公道。所以我们的稿费虽然菲薄，但是向例公开宣布，而不半吞半吐不着边际的说“稿酬从优”。不过我们虽然经常在提高稿费，无奈物价跑得太快。自第3卷起，我们再将稿费提高到千字5万至6万元，以后当视实际情形随时调整。

四、定户的来信，仍然是我们事务上的一重负担。我们当努力在最快的效率下一一答复。我们要求读者来信时，姓名及地址的字迹务必不要过分潦草，我们有时收到读者的来信，因为字迹过分潦草，竟致无法复信。有的读者甚至连地址也不附。有时读者在信封上是一个名字，信纸上又是一个名字，我们复信时不知究竟应写哪一个名字。（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只好把两个名字都写上。）又，我们希望各地读者汇款订阅的，最好不要在各省的省立银行汇款，因为省立银行汇款时，他们常常不将读者的附言一并送来，以致尽管收到了款子，还是无法寄刊。有的省立银行甚至仅仅通知本社有款到，何人所汇，甚至款数多少，也不通知，要本社自己去认，符合的就付款，不符的就不付款。但订阅的读者又不一定另外来信，以致我们根本无法取款。目下本社尚存有这种汇款通知单好几笔，都搁在抽屉里。至于来函续订或更改地址而不附定单号码的仍旧很多，要使我们七千几百号中去找出一个名字，确是一件难事，我们为补救这个缺陷起见，决定开始编制全部定户索引卡片。但是我们仍旧要求读者来函时，尽可能的体谅我们，将各种必要的事项都注明出来。

一 年

我们原定以一年为试办时期,现在一年匆匆过去,我们愿就一年来的经过,综合说明几点感想如下:

第一,本刊创刊之初,各方面纷作推测,或疑本刊与张三有关,或疑本刊与李四有关。今日中国一般社会,似乎一致假定:办一个刊物一定有背景,一定有什么人在出钱。这是一种成见。我们相信一年来本刊所发表的文字,足以证明本刊不仅是一个“无党”的刊物,并且也是一个“无派”的刊物。本刊确实是一个独立而无任何党派关系的民营刊物。在经济上,本刊的发行数足以证明本刊可以自给,无须仰求“外援”,因此我们认为,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并给一切怀有成见的人们以新的认识:即办刊物不一定要靠津贴,刊物本身是可以依赖发行收入自给的。

第二,目前一般社会虽然充满着混乱,到处是不合理现象,种种事迹令人悲观消沉,但是我们感觉:假如我们真能正正经经,认认真真,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我们仍旧可以获得若干成就。无论在哪一方面,我们都可以以自己的意志、信念和力量,去开垦我们的前途。我们希望一般年轻的朋友不要消极。我们一面争取更大的目标,一面在自身范围内切实奋斗。政治的改革是一个方面,社会的充实又是一个方面,两者是并行的,互为辅助的。我们希望各方面的有志之士,大家鼓舞起来,沉住气,在本身的岗位上努力,以充实我们国家的生命。

第三,一年来的经过使我深切认识一点:假如一个人他本身是持正的,他在无形中可以抗拒许多邪道的侵袭。我们过去常常听到许多传说,说什么人被“收买”了,或者给他官做,或者给

了他钱。我们愿意在此向读者报告，一年以来，政府方面从来没有任何人，无论直接或间接，明示或暗示，向我们有过任何接洽。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绝对维持本刊的超党派性和纯粹民营性。我们并愿在此附带报告，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对本刊施用过任何压力或干涉。

本刊草草，已出一年。在这一年中，本刊的立场、态度、编制、风格以及做人做事的一般原则，大体上已树立一个规模，我们愿意遵循这个传统及方向继续努力，为中国的前途奋斗！

三十六年8月1日 北平旅次

(原载《观察》第2卷第24期，1947年8月9日出版)

《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 刊出后的响应

本刊3卷3期刊载了李克佐等留美八位读农同学的一篇《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他们预备明年夏天回国，回国后预备创办若干生产农场。在那篇文章里，他们大体上陈述了他们的理想和计划，在字里行间，他们充分表示他们有一种新的建国精神，想以实际的工作来改造社会，充实社会。他们希望在回国以前，能先得到国内人士的赞助支持，共同为理想而努力。本刊的一贯态度：对于一切怀有新理想、新计划、新精神的人或事业，赞助支持，愿意尽力给他们各种便利。所以在那一篇文章的后面，我们表示：假如政府当局，社会各界，或本刊读者，愿意和这八位留美同学通信商讨，或给予赞助者，本刊愿意代为转

达，俾使双方可以直接通信。

3卷3期出版后的第三天，我们就收到沈亦云夫人来信，表示赞助，原信云：“安平先生：昨日课毕归家，见案头《观察》3卷3期，急取《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及衡哲先生的前置辞二文先读。通篇似言我所欲言，示我所欲知，不觉兴奋累日。云以不辨菽麦、畏牛羊为异类之身，孜孜不舍于一隅之农村，原因固多，以知识阶级了解困苦之农村及与无告之农民为友之意，实居大半。自问工作同人，咸具灵魂，惜以外行之故，似土地庙中供的关公，致文武不相称，用力多而成功少。今之为农村事业者，或出之政府，视人事为转移；或出之商人，以余唾为农民之福利，养猪食肉，养鸡生蛋而已；亦有借以号召，强购民地，此则等而下之矣。此三者，云所幸免者也。对此八位青年及其同志，彼决心，彼办法，无不钦佩赞同，祝其成功。敝山（编者按：莫干山）先准备其所需一单位之地亩（编者按：240市亩），供其实验，欲稍多亦可。即不来敝山，亦愿为棉力所及之援助。舍下除山中公益事业外，无一亩私田，故以此相邀耳。附《莫干山小学15年》一册，敝山内容历史略可参考，并烦转寄。（下略）”

其后又收到教育部中等教育司职业教育科陆厚仁先生致留美八同学信云：“仆在教育部办理职业教育行政工作，内心希望于各职业学校者，正如尊论中之能于校内有质际的生产农场和生产工场之类。只是目下极难推行，其主因还是在缺乏真诚实干不移之人才。先生等既志切实干，鄙见极盼将来初步能在几处农业职业学校内来实行。在南通现在办有一所‘国立南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内设农艺、园艺、畜牧、农产制造四科，在南通有实习场地200亩。另在如皋还有田2000亩，正可作新式生产之实验。此外海南岛有国立琼山高级农业职业学校，陕西有西北农学院附设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目下国内各农

校所用教材，恐怕都是旧的，教育恐怕也大都还是以书本为主，纵有广大场田，但设备恐亦陈旧贫乏。先生等如不嫌屈就，极希望将来能替这些学校革新一下，一面也好把生产农场实验推行出去。……”

又收到前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王公珩先生致留美八同学信，大意叙述辞官之后，正有“田园将芜胡不归”的计算。王先生并已拟有一套计划，就他自己的计划及留美八同学的意见，一一提出商讨，并认为政府方面，社会方面，甚至金融机关方面，都可设法请求协助，对于留美八同学的需要，王先生说可以负责设法代为进行。

又收到南京姜国楹先生囑转的信：“我的家乡在湖南邵阳，那儿的教育颇发达，土地也还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现在善后救济总署设有一个乡村工业示范组织在城里，正在进行创办肥料厂、炼油厂、碾米厂和其他乡村工业。不过那儿是山地，没有广大的平原。山上可植桐，平地可种水稻，其他副产物也很多。如果你们认为这种环境可以适合你们的需要而又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即刻回乡去做开路先锋，宣扬你们的主张，假我半年时间，便可组成一个合作农场，筹集资金。你们回来后，我可以陪同你们去参观设计，正式进行工作。”

又收到南京司法行政部聂健英科长囑转的信：“司法行政部近年来在各地创办外役监，利用人犯，开办农场。现有安徽宣城一处，定于明年1月成立。该监有耕地5000亩，土壤肥沃，交通便利，犯人生活，职员薪俸，以及一切设备，全由国家供给，收获除以百分之十缴解国库外，余者供扩充农场之用。若得志同道合之士数位，认真合作办理，三五年后，不难使该监成为一理想之模范农场，并可以此处为基础，向附近农民推行尊文中所述之理想。”

又收到镇江江苏省地政局郑君平先生囑转的信：“本人年来对于土地农村正作积极研究。苏省淮安县丰太乡有滩田七千余亩，土地肥沃，战前计划开殖，嗣以军兴未果。刻仍拟继续前愿，业经拟就复兴合作农场计划（兹附上一份）亟欲征求同志合作。兹读宏文，尤钦钩见，愿让地千亩，以为君实验农场之需。有关各项手续，容俟诸君海外归来，再行面洽。”

又接常熟张礼纲县长来信：“编辑先生：读贵刊3卷3期创办生产农场刍议一文，深佩李君等真能为中国农民谋出路，为中国农村谋复兴，为中国建设作打算。礼纲从事县行政工作前后八年，由黔而苏，无时无地不感觉知识分子未能负起其应负之责任，以致无知无识之农民，经常在水深火热之中呻吟。前在贵州时，试探以教育为中心谋农民生活之改善，在江苏太仓时，亦曾试探以乡村工业及棉作改良为中心，谋农村经济之复兴。终因为时间及人力所限，未能收效。阅此文后，大意与礼纲所见者不谋而合。乃乘县参议会开会之时，提议将县农场借与李君等作为试办生产农场之用（场地约80亩，位于常熟小东门外），该议案已经大会通过。特函奉闻，并请转函李君等，如其志已决，场地大小适宜时，即进行议订详细办法。礼纲籍隶江阴，距常熟城仅40里之遥，且与地方人士颇为熟悉，即离职后，仍可用私人身份进行是项事业，深愿能用此办法，求得中国农业一条光明大道也。”

又接重庆民生公司缪成之先生致编者信：“……鄙人愿向李先生介绍，在重庆北碚地方有两处可供他们理想之经营。一在北温泉斜对面大渡口处，有二百六十余亩。地临江边，前由慈幼院植有果树三千余株，地面年可出包壳将近100老石（即300市石）。近为一友人购得，正感无法经营，如李先生等有人愿意借作试验，决可办到。又鄙人在北碚相辉学院附近有山林及

熟土约 100 亩(其中有田 20 亩),极愿让供李先生等试验,如需贷款,亦可设法。北碚为名胜区,有卢作孚先生之乡村建设及前中央农业试验场与相辉学院农艺系,一切实验,可收相互观摩之效。

又上海中央银行业务局朱汉民先生,愿意介绍李先生等分租露香园畜植公司杭州集团农场,并表示可以不受其原有计划之限制。

又天津南开大学张俨先生,愿意将他们兄弟所合有的四百多亩田,在粤汉路湖北蒲圻茶庵岭车站两侧,供给李先生等作生产农场。

此外,陕西泾阳吕致芳先生愿以全部田产约 200 亩供作试验农场的基础。南京余棣北先生、杨作仁先生,上海张光华先生、严沛然先生,九江芳英先生,丽水潘瑞沧先生等都有信和八位同学讨论,严沛然先生并附有他的计划大纲。北平杨姿蕊女士则以封好的一封信托我们代为转美。

以上这些信件我们业已分别用航空挂号或普通挂号寄美。我们所以除了将信件直接转美之外,还要在此地摘述如上者,主要的意思,希望全国广大的青年认识:我们今日所处的这个社会,虽然是处处黑暗,处处腐败,处处不合理,但是仍旧有许多有热血有志气的有心人士,散布在全国各地及各职业阶层。只要我们自己有理想、有计划、有决心、有勇气,我们仍旧可以凭我们的热血、决心、智慧、人品,创造事业,改革社会,充实国家的生命。单单消沉、悲观、牢骚、愤怒,是无用的。我们不当向消极的方向走,应当向积极的方向走。以后读者有信囑转寄美者,我们当随时代转,不再在本刊上披露。我们要求留美八同学的是:你们收到本刊转寄的信件后,对于他们的意见或帮助,不论你们同意与否,接受与否,均请一一

答复，使寄信人能早日收到回信。

(原载《观察》第3卷第5期,1947年9月27日出版)

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William C. Bullitt),本年7月,衔《生活》、《时代》发行人亨利鲁斯之命,来华考察,10月10日在《生活》杂志发表访华报告(China - A Report to the American),长达万言。中央通讯社不惜工本,全部用电报拍回,各报纷加披露;官方及官方的报纸一致颂扬。吾人披诵之余,谨述其意见如下:

第一,我们统观全文,蒲氏的中心思想是反苏防苏。蒲氏以这一个中心思想为出发,他认为目前最有“统治中国的威胁者”就是苏联;他认为中共是“苏维埃强权政治的工具”,他认为苏联意欲利用中共这一工具把中国沦为“苏联的附庸”;他痛责故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会议中的错误;他认为在1947年2月12日杜鲁门总统演说以前的美国政府一直采取着“可笑的态度”;他叙述马歇尔于1946年1月10日使中国政府与共党签订了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协定,但是“苏联的计划是利用马歇尔所斡旋的停战时间,尽量把共军自华北运往东北,而把接收自东北日军的大量武器,配备共军,利用停战时间,到中共军队装配齐全的时候,苏军再行撤退”;他又叙述马歇尔使华失败返美后,美国对华抱旁观政策,停止在军火上及财政上支持国民政府,但“苏联在另一方面却装备了我们的敌人”——蒲氏此处所谓“我们的敌人”,显系指中共而

言,这表示蒲氏业已认为中共同时亦为美国的敌人——,蒲氏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政策”;蒲氏认为假如斯大林控制了东北,“对于中国将来的发展,关系异常重大”,最后对于美国本身也有严重的后果;因此,蒲氏认为美国必须对于国民政府作立刻的全盘的援助,“仅仅取消美国对华禁运军火的命令还嫌不足”,蒲氏认为杜鲁门总统应该像罗斯福总统在邓克尔克撤退后英法严重缺乏枪炮弹药时所做的一样,采取迅速的行动;蒲氏述及现在美国有数十万吨积存的弹药,弃置在世界各地,任其霉烂生锈,他主张将这些物资宣布业已不适美军使用,作为废弃,然后以一元作价五分,售给中国。同时为避免中国的“通货膨胀瞬即会像脱缰之马”起见,美国政府应即在后此的30天内贷给国民政府7500万美元。除上述立刻的援助外,更就经济财政军事方面作全盘的援助,以三年为单位,在三年以内,由美国贷给国民政府13.5亿美元,其中6亿元作为三年计划中的信用贷款,用以购买美国的物资,如美棉、烟草、小麦、石油、汽油以及机车、铁轨、卡车等,另6亿元为三年计划中军事方面所需的费用,用以装配旧的军队,训练新的军队,再加1.5亿元作为外汇平衡基金。这是蒲氏援华方案的纲要,而所以要全力援华,其目的乃在“把每一个武装共产党徒驱除于中国领土”,“阻止斯大林霸占中国”。

我们无意在此讨论蒲氏所攻击苏联的种种事实是否正确的以及蒲氏所建议的各项办法能否实现,我们在此所欲讨论者,乃是蒲氏的议论的动机和态度,是否健康,是否公道?其间牵涉到许多问题:一、蒲氏不愿中国沦为苏联的附庸,然则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二、在过去几年中,到底是苏联控制中国的色彩浓厚,还是美国控制中国的色彩浓厚?三、今日美国,如蒲立特先生者,因为恐惧苏联,主张全盘的援助国民政府,反苏反共,但过去几年中,美国在中国势力的膨胀,以及这次像

蒲立特先生这种建议,是否可以使苏联感觉愉快,感觉安全?凡上三题,蒲氏一字不着。蒲氏一开头就说:“防止任一国家统治中国而动员其4.5亿人民来对抗我们,这是最关美国切身利益的事情”。蒲氏既然可以如此说,苏联又何尝不可说:“防止任一国家统治中国而动员其4.5亿人民来对抗我们,这是最关苏联切身利益的事情”?蒲氏可以说:目前有统治中国之威胁者是“苏维埃帝国主义者”,苏联又何尝不可说:目前有统治中国之威胁者是美国帝国主义者?蒲氏可以说:“我们(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苏俄统治中国而动员其人力来对抗我们”,苏联又何尝不可说:苏联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美国统治中国而动员其人力来对抗苏联?假定苏联亦发表与上列蒲立特所宣称的相同的议论,至少在我们看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间并无任何轩輊。然而假如每一个国家,都恐惧别的国家控制中间某一个国家,大家都要“采取行动”以防止对方国家统治这某一国家,则世界还有什么和平?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中,美国之在各方面牢牢的威胁着中国的独立与自主,业已成为一个世人共同感觉的事实。蒲氏在他的文章中,建议由美国贷款给中国,卖军火给中国,替中国训练军队,帮中国打垮共产党,监督贷款的用途,管理军队的给养,而且主张“派麦克阿瑟将军于现有职务及权力以外,加上大使衔的总统私人代表的称号,飞往中国,和蒋主席拟订一个共同的计划,以防止苏联的征服中国”……蒲氏之企图由美国来控制中国,已极明显。蒲氏一方面不愿中国陷入斯大林的“掌握”,一方面却企图使中国陷入自己的掌握;一方面在事实上美国业已独霸中国,一方面蒲氏还在大声疾呼,宣称苏联企图“独霸”中国,蒲氏这种议论,实在有欠公允。就我们中国人自身来说,我们久已苦痛于我们有这样一个落伍的腐败的政府,在20年的统治中,把国家搞得越搞越穷,越搞越弱,越搞越乱,以

致引起强邻的窥伺。我们自己心里明白，一个略有野心的国家，不论是过去的日本和英国，或者今日的美国和苏联，哪一个不对中国转念头，打主意？不过彼此的方式不同，程度不同罢了。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权利指摘对我们有野心的国家。老实说，美国 and 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卫星，成为他们的附庸。而在这种情形下，蒲立特先生有什么面皮猜猜然一面倒的抨击苏联？蒲立特先生为什么要援助中国，他有什么理由要独爱于中国？拆穿了说，他不是要利用中国，正如他在他的文章里开头所说的，动员中国的人力来对抗苏联，以保障美国的利益罢了。美国有钱，美国企图用金钱来收买中国，要中国人替美国牺牲，为美国而死；除此以外，他还有什么理由要独厚于中国，要借钱给我们，援助我们？统观蒲氏全文，我们认为蒲立特先生的整个出发点是偏的，而他的动机是自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第二，蒲立特先生主张援助中国，实际上，他要援助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国民政府。理论上，政府本来是代表国家的；但在历史上，政府常常是不代表国家的；目前的中国，就处于后一种情形。就对外关系上讲，今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愿意反美，也不愿意反苏，都主张同时与美苏友善，甚至希望中国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中国有无能力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这是另一问题，但至少表现于近两年来中国的言论者，大多数人都不愿中国成为美苏双方任何一方的尾巴。但是中国的现存政府，因为要维护他们个人或集团的权势利益，他们坚决排斥共产党；因为排斥共产党，连带仇视苏联；因为仇视苏联，所以一味的投入美国怀抱，甚至一部分人幻想挑拨美苏之间的感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做法，并不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所附和。至于在内政上，中国现存政府之业已失去人心，其明显确切，一如

在太阳底下的影子，无须我们再在此处浪费笔墨。魏德迈将军在致美国援华会柯立芝夫人的函件中声称：中国人民只求能供给粮食与居住之任何政府，对于倾向苏联一举所包含之种种复杂问题，不暇顾及。（美国新闻处华盛顿 10 月 16 日电）魏德迈将军这种观察是正确的。对于中国一般穷苦的老百姓，国民政府也好，共产政府也好，或者其他什么政府也好，他们都“不暇顾及”，他们所急切关心的是能让他们活得下去，让他们有果腹之粮，御寒之衣，以及躲避风雨的房屋。这同时也就说明：这 20 年来的中国执政的人物，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尽其应尽的职责，甚或根本对于这种基本问题，没有作任何有分量的努力。20 年来南京的官员所发生兴趣的，是政局的演变，权势的得失，而非一般社会经济生活的改革与改善。今日中国人民生活的艰苦与凄惨，业已到达为一个大文学家所无法描写的地步。在内地城乡以及偏僻的角落里，民生的艰苦，更不必说，就是在这个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一到晚上 11 点以后，许多街道上，在那冷冰冰的容易招致疾病的水门汀走道上，躺着手脚蜷缩的无数贫民，就在这萧瑟的秋风之中，获取他们为维持他们像游丝一样的生命所必须的睡眠。这些人本身并无罪孽，然而他们却过着罪孽的生活；即使我在此叙述我每晚所目睹的这种凄凉景象，我亦仍然不禁热泪盈眶，悲从中来。然而一切对于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真正具有兴趣具有抱负的人物，他们无法获有机会为祖国服役，而掌握权力的人，则仅知如何巩固并发展他们自身的权势与利益。在政治生活方面，我们依然不能获得我们应有的各种基本的公民自由，而且一般反对派人物经常生活在恐怖与不安之中，政府经常用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来限制反对派的活动和存在，而其方则花样百出，巧妙无穷。然而政府还要扯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大旗，表示政府的倾向民主和决心实行宪政。若从

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 20 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没有路轨,可以向外国买钢轨枕木,无法耕耘,可以向外国买种籽肥料,要发展工业,可以向外国买机器原料,要改革币制,可以向外国贷款,惟有道德的堕落,非一时所能回复,也非向外国借贷所能改善。因此我们很公平地说,这个政府确已与人民脱节!与人民的需要脱节,与人民的福利脱节,与人民的意愿脱节。在法律上,它迄今仍然是国内国外所公认的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不能满足中国人民。这个政府不仅已与人民脱节,而且照目前的情形来看,这种脱节的程度,也将愈来愈深。在它的统治下,人民将愈来愈没有希望,饿死的人必然愈来愈多,自杀的人也必然愈来愈多,而原有一块钱的,在它的统治下,亦将渐渐变成为五角,变成为二角五分,变成为一角二分五厘,以终于变成赤贫。这个政府业已成为中国人民所不能忍受的政府,但这样一个政府,就是蒲立特先生主张美国支持援助的。蒲立特先生建议援助的,就是这一个“政府”,而非中国这一个“国家”。蒲立特先生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要使这个政府成为美国的工

具,代美国来驱使中国的人民为美国牺牲,为美国而死。

蒲立特先生的动机既然如此,既然企图利用国民政府为保护美国利益的工具,因之他便大捧其国民政府及其领袖人物,一面倒的敌视中共。蒲立特先生可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能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20年来政治清明,民生康泰,中国何致弄到今日这样民穷财尽的地步,替共产党造机会?假如20年来政治开明,胸度开阔,何致要把许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产党增加声势?假如20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徬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我个人很率直的说,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制造共产党培养共产党的因素不先消灭,哪里能消灭共产党?照现在的样子,消灭了一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10个共产党,消灭了10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100个共产党。在蒲立特先生的建议里,他建议由美国来训练中国的军队,供应中国的军队,指挥中国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与膨大,并非由于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脆弱,反过来说,并不因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增强后,共产党就将消灭。今日中国的问题之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者,已为识者所公认,而这个曾经两度做过一个大国的外交大使的人,仍然这样近视,这样胡想,我们真是替近代人类社会文化水准的低落伤心!蒲氏又建议大宗贷款中国,以解救中国的财政危机。他主张在三年内贷给中国信用借款6亿美元,用以购买美国的食物、原料与机器;他实在是间接替美国货做买卖。我们不相信在这种混乱的行将崩溃的局面下,单靠外国的贷款就可在根本上稳定中国的财政,改革中国的币制。在抗战中,政府曾经发行大批关金,企图稳定当时日

益贬值的币制,但今日的关金价值如何?前车不远,昭昭可鉴。我们认为整个的局势不趋稳定,一切改革币制的努力都属白费。因之我们认为,在蒲立特先生的访华报告里,不尽他的动机是偏私的,就是他的看法也是不健康的。

总之,蒲立特这篇文章并无任何可取的建议。他是一个反苏人物,他之有他这一套,实极逻辑,而他之能洋洋洒洒发表其意见,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下,亦极自然。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他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却是一种投机。照最近各种趋势观察,美国殆将改变自马歇尔返美以后以迄于今的那种袖手旁观的政策。美国政府之将积极援助国民政府,虽其方式、数目、条件如何,尚不可知,但援助之来殆无异疑。蒲氏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种建议,又于来华以前,先访东京,其间机微,至堪寻味。

10月17日

(原载《观察》第3卷第9期,1947年10月25日出版)

白 报 纸!

最近物价腾涨,其中以纸价涨得最凶。当前几天其他各物逐渐回跌时,纸价仍然继续上跃,冲出100万元大关(每令),最高叫到120万元。这种上涨的情形,实已超乎情理。在8月15日前后,纸价约在二十七万八令,到9月15日前后,纸价就涨到五十三四万左右,在短短一个月中,上涨百分之百。这时出版界已经透不过气,许多刊物不得被迫提高售价。一直到10月5日,纸价尚逗留在60万元一令之数,但自10月7日起,纸价即

作高速度的上升：

10月7日	68万元
9日	70万元
11日	80万元
13日	87万元
14日	90万元

自15日起,报纸的商情表上已无纸价的记载。16日《大公报》第2版报道纸价已涨到一百十几万元一令,同日我们向纸商打听纸价,已叫到120万元。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尚未在报纸上看到主管当局对于纸价的抑制的消息。18日《大公报》第4版始有警察局出动彻查纸商的记载。并载纸商同业公会的理监事,于17日召集同业,决定切实减低纸价,并规定门市售价每令为85万元,只许减低,不准上涨。

中国杂志界的经济力量大都非常脆弱,没有巨额资本可以购存用纸。期刊又例不作新闻纸论,享受不到官价纸的配给,只得向市面纸商购用。本刊用纸,存底素薄,最近恰巧用完,而在这种疯狂上涨中,又无法购买。但本期在21日必须付印,我们在18日动员全社同人,出外购纸,经整天的努力,结果还只买到22令,只够一期印刷需要量的三分之二(因此本期只出20页)。我们在河南路、交通路、福建路、山东路、广东路一带的纸店都问过,有的说95万一令可以卖十几令给我们,有的说85万元一令,限购一令,有的则干脆说没有货。结果我们在山东路的怡成纸号由三位同人以不同的时间去买到了三令,在山东路汇丰纸号由三位同人以不同的时间去买到了四令,在广东路涌生泰纸号买到一令,交通路震泰丰纸号买到一令,福建路义昌兴纸号总算卖给我们三令,广东路万亭和纸号买到两令,广东路德泰丰纸行买到两令,以上都是85万元一令。另外一家江西路五马路口的程梅记纸号,最

初去时,说95万元一令,可卖十几令。但因看见我们出门时抄录他们的店号,再回去买时,他们便说没有货了。吵了好久,最后大概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抄录他们的店号,不晓得我们什么来路,好歹总算以85万之价卖了五令给我们。广东路河南路口的志成纸号,我们过去一年来,大部分的用纸都是向他们买的,最初讨价95万,后来我们说报载同业公会限定不得超过85万元时,他们便说“没有货”了,最后顶多只肯卖半令给我们。而且许多纸号都要我们出具正式函件,他们才肯卖“一令”给我们。

照目前这种纸价,实非中国的杂志界所能忍受。假如一个刊物的发行数是5000份,则其成本为:

纸8令(以85万计)	680万
排印工及装订	约550万(排印工日内又将加价)
稿费及行政费	约800万
广告费及杂费	约200万

共计2200万左右,假定每册售5000元一册,再扣除一个七折的批销佣金,即使完全收足,也只能收入1750万元。假如一个刊物的发行数是1万份,则其成本:

纸16令	1360万
排印工及装订	约750万
稿费及行政费	约800万
广告费及杂费	约200万

共计3100万左右,如完全收足,亦只能收3500万元。事实上,上述估计,在支出方面是最节省的,实际上的支出或者不止此数,而收入方面,绝无每期可以一本都卖得不剩,或每一本的钱都可以收得回来。而且支出都是现款,收入则常常在一二个月以后,甚至三四月以后或永远收不回来,收入时与支出时,其间的币值又不知要打了什么一个折扣。因此杂志的经营,在这

种惊风骇浪的物价中，苦痛不堪。印刷所是做买卖，纸商老板也是做买卖，但杂志的发行人，他和读者的关系并不是纯粹一种商业关系。这是一种文化事业，他们要顾到读者的购买力。

我们总希望民营的报纸或民营的刊物越多越好，同时亦希望每一个刊物都能逐渐增加他们的发行数，替我们国家的出版记录增加光彩。但是要希望民营的刊物多，要希望已有的民营刊物能够存在下来，就得使它能够自给，能够收支平衡。要希望刊物的发行数增加，就得顾到读者的购买力。刊物的售价越低廉，购买的人越多；购买的人越多，成本便可减低。我们不希望看见一个一个民营的刊物都垮下去，到后来只剩了官营的或党营的刊物；这不是国家的体面。我们不希望各种物价的重压，使每个刊物隔一个月或几个星期就得要涨一次价，弄得读者都买不起。现在一般刊物的发行数，向不公开，我们不知其他刊物的发行确数，但现在大多数刊物的发行数，均在1万份以内。按照上述成本，可见今日中国一般民营的刊物，都在极其困难之中撑持着。有许多刊物，确是成绩昭著，极其努力，假如政府眼看这些优良的刊物一个一个消灭，政府在道义上似亦未能尽其维护文化事业的责任。在纯粹民营，纯粹依赖发行收入自给的许多刊物中，如《世界知识》，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在社会上素负声誉，而且他们十年如一日的精神，确可矜式，但他们在一个月前，即已从每册4 000元增售至6 000元，在最近的纸价上涨中，恐怕他们又非涨价不可。刊物为了要平衡收支，不得不涨价，但读者的购买力有限，其结果势必使发行数降低。而且在上海售6 000元，在华北便须售7 000元或8 000元，在后方恐怕售至一万元甚或一万数千元。以后方生活程度的低，要读者以一万元或一万数千元来买一册刊物，实已超过他们的能力。又如《时与文》周刊，虽只出版半年，但是极其努力，业为目前许多领袖刊物之

一,我们虽不知他们的经济情形,但在这种纸价的狂涨下,想亦深感艰难。就是已有30年历史的《密勒氏评论》报,在昨天(18日)出版的一期上,第一篇社论就是陈述该刊在纸价暴涨下的压迫(该刊现已售一万元一份)。许多优良的刊物,都困于经济,不能维持。我觉得政府对于有成绩的文化事业,不能漠视不顾,虽然政治上的看法彼此不同,但大家都是同样抱着一腔热忱,为祖国的前途努力。目前对于一般刊物的生存最大的威胁就是纸价。以本刊而论,现在每期纸的费用,即使照85万元一令的价格,亦已达3000万元左右,占到每期总成本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纸价的波动,简直影响到一般刊物的能否生存。本刊在5月间曾向中央信托局申请购纸40吨,公事搁了两个月,到7月中旬才批下来,准购两吨。纸是日本报纸(纸质较差),但须照加拿大报纸的市面行情七折购买。5月间我们申请购纸时,市价仅20万元一令,7月间批准时,市价已超过30万元,即使打了七折,还比5月间申请时的价格为高,而两吨纸不敷本刊一月之需。最近上海市书业公会才准分给我们300美元的配额,这批纸何时可到,尚不可知,而300美元的纸,亦仅敷本刊半月之需,因此本刊过去所有用纸,纯系照市价向纸商门市零购。本刊发行数略较其他刊物为大,其间已比其他刊物稍占便利,然而在最近纸价的腾涨下,亦已难于支持。其他发行数较小的同业,其困难更可想见。这次纸价的暴涨,显然出于人为。我们希望政府,一方面使纸价回复到一个合理的价格,希望能回复到9月底以前价格,同时对于官价纸的分配,亦应求其公平。外间早有传说,说政府听任纸价上涨,间接以陷与政府政见不合的言论刊物于自行消灭之境。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传说。

10月19日

(原载《观察》第3卷第9期,1947年10月25日出版)

评《出版法修正草案》

10月24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出版法修正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送立法院审议。本刊函约韩德培先生撰文评论,以供当局参考。韩先生这篇文章,是从政治的和法律的两个角度上着笔的,所论极为详尽,我们极望立法院审议这个《草案》时,对于韩文所论,能予采纳。我现在再就条文的本身,就韩文未触及的地方,补充意见如下:

一、《草案》第二条:“出版品分下列三种:(一)新闻纸,指用一定名称,其刊期每日或隔六日以下之期间,继续发行者而言。(二)杂志,指用一定名称,并装订成本,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间,继续出版者而言。(三)书籍及其他出版品,凡前款以外之一切出版品属之。新闻纸或杂志之号外或增刊副刊等,视为新闻纸或杂志。”

上文发生下列疑义:

1. 用一定名称之出版品,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间,继续出版,但并不装订成本,在此种情形之下,是否即不作为“杂志”论?

2. 用一定名称,并装订成本,其刊期在三个月以上,(如每100日出版一期,或每四个月出版一期)继续出版之出版品,是否即不作为“杂志”论?

3. 有一种出版品(如市上流行的一种“丛刊”),其编制与杂志相仿,其刊期大体上每隔10日、半月或一月出版一次,但并未

明白规定,在此种情形下,该出版品究为“杂志”,抑为“书籍”?

4. 《草案》第二条最后一句:“新闻纸或杂志之号外或增刊副刊等,视为新闻纸或杂志”,所谓“视为新闻纸或杂志”,其义含糊不清:视为“新闻纸”或“杂志”乎?抑视为发行该项号外、增刊、副刊之该新闻纸或杂志之一部分乎?如系前者,则该“号外”“增刊”“副刊”之出版,必须按照《草案》第九条规定,于事前申请登记,非奉核准,不得发行。如系后者,则报社(新闻纸)即可出版各种副刊(即“杂志”),杂志社亦可每日出版增刊(即新闻纸),或其他副刊(即杂志),而不须另行申请登记。

上举四点,足见原文用字,颇多含糊。立法院于审议时,应求其明确清楚。

二、《草案》第九条前半段:“为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者,应由发行人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于10日内转呈省政府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核准后,始得发行。省政府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项登记申请书后,经审查与规定相符者,应于10日内予以核定,并转请内政部发给登记证。”

上文发生下列几个问题:

1. 按照上引条文,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核准与否,其权在省政府或直隶行政院之市政府;但同时又须获得内政部发给的登记证。这儿发生的一个问题:即省政府或直隶行政院之市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的“核准”,是否即为最后之决定?抑或须俟获得内政部发给的登记证以后,才算获得合法的发行权?如系前者,则内政部登记证之获得与否,便无意义;即使没有内政部的登记证,亦无碍于该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果系如此,则又与《草案》第10条,第15条所规定者不符。如系后者,即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须于获得内政部发给的登记证后,才算完成依法

申请登记的最后程序,才算取得合法的发行权,但《草案》只说“省政府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项登记申请书后,经审查与规定相符者,应于10日内予以核定,并转请内政部发给登记证”。而对于内政部发给登记证的时间,却无明文规定,实有不妥。因为既然认为要俟取得内政部的登记证,才算取得合法的发行权,则该新闻纸或杂志,虽因省市政府的核准,可以先行发行;而如内政部的登记证迟迟不发,该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始终在一种尚未获得合法根据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势必影响该新闻纸或杂志的业务计划。按照过去情形及《草案》规定,内政部的登记证应当是依法声请登记证程序中的最后一步,因此我们认为:修正的出版法对于内政部发给登记证的时间,亦应有明文之规定。我们认为内政部于接到省市政府的公文后,应于30日内发给该项登记证。

2. 按照上引条文,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人,应于发行前填具登记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主管官署,于10日内转呈省政府,而后者应于10日内予以核定。是则自申请至核定,前后仅有20天的时间,不能谓不迅速。新闻局董局长10月30日在南京发表的谈话中,并特别提及此点,谓以前的规定为“15日”及“28日”,现在一律均为“10日”,使核定期间缩短一倍以上。但是问题不在核定时间的缩短,而在假如不在限定时间以内核定,又怎么办?按照过去经验,新闻纸或杂志的发行人,最感苦痛的,是依法申请以后,常常石沉大海,迄无下文;甚至有经过六个月以上而仍不见批复者。因之,为解除这种情形,并减少新闻纸或杂志的发行人的困难起见,我们认为:修正的出版法应当规定:假如在向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申请登记,于30日后仍不为核定者,该申请人即可迳行发行该申请登记呈文中所指之新闻纸或杂志。

3. 按照上引条文,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核准与否,其权在省市政府。但细查《草案》,关于此项核准与否的标准,只有一条,即:“经审查与规定相符者,应于10日内予以核定”。这个规定的反面应当就是:只要不是与规定不符者,即应核准。但是问题不在此;问题在假如声请登记,与规定并无不合,而省市政府批驳不准登记,则其补救办法应为如何?在原则上,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其核准与否的权力,完全操之于地方政府,是否妥善,很可研究。在京沪平津一带,地方政府在各种顾虑下,人民要求发行报纸或杂志,比较上或尚容易,而内地及后方边远省区,如将此种权力,完全交于地方政府,则人民发行报纸或杂志的权利,恐将遭受更大的限制。因为内地的民主空气比较稀薄,中央也不能处处顾到,在此种情形下,恐将发生亲我者予之,不亲我者拒之的情形。就理论上说,宪法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之自由,行政官吏如侵犯人民这种权利,是为违宪,人民可以向司法机关进行诉讼。实际上,今日中国人民是否能行使此种方式,殊为疑问。因此,我们认为,是不是在修正的出版法中,应当更积极地明文规定:只要与规定相符,即应核准;同时规定:地方官署无故批驳,不准发行新闻纸或杂志,申请人可以向更上级的机关诉愿,以为补救?我们愿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供立法院审议此案时的考虑。

三、《草案》第九条后半段:“登记申请书应载明之事项如下:(一)新闻纸或杂志之名称;(二)发行趣旨;(三)社务组织;(四)资本数目,器材设备及经济状况;(五)刊期发行新闻纸者并载明其版数;(六)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七)发行人及编辑人之姓名、年龄、籍贯、经历及住所。”

《草案》第十条:“第九条所定应申请登记之事项有变更者,其发行人应于变更后七日内,按照登记时之程序,申请变更登记。……”

《草案》第二十八條：“……不為第十條之申請變更登記，而為發行新聞紙或雜誌者，得於其為合法之申請變更登記前，停止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

按照上引條文，凡第九條所載各項，如有變更，便應申請變更登記，否則即將遭受停刊之處分。我們參以實際情形，此種規定，困難滋多：

1. 資本數目，器材設備，經濟狀況。先說資本。在幣值這樣不穩定的狀態下，任何事業，它欲繼續支持，勢須時時增資。其事至明，不必舉例。再說器材，譬如一家報館，本來沒有汽車，今年買了一輛汽車，這算不算增加了“器材”呢？至於經濟狀況，含義更不清楚，上一個月稍有盈餘，這一個月勉可維持，下一個月或者虧折甚多，這算不算經濟狀況有了變動呢？假如上述的例子都算，則一家報館或雜誌社，恐怕一年到頭，每個月都要申請變更登記。其事之不易行，昭昭甚明。

2. 發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所謂“所在地”，不知如何解釋。“所在地”之變更，可能有下列三種情形：

- a. 自甲省甲市甲縣遷至乙省乙市乙縣。
- b. 在同一城市，自甲街甲巷遷至乙街乙巷。
- c. 在同一街道，自甲號門牌遷至乙號門牌。

條文中所言“所在地”之“變更”，不知究係指上列三種情形中的哪一種。若係第一種，則猶可說。但因為發行所所在地既自甲省甲市甲縣遷至乙省乙市乙縣，則照本《草案》第7條第29條等之規定，其“地方主管官署”業已變更，自應變更登記。但若包括第二種第三種，則對於新聞紙或雜誌的發行人，便極困難。（按照我們的經驗，所謂發行所所在地之變更，包括第二種第三種情形在內。）譬如在上海這種大都市里，搬個家是極尋常的事情，而且照一般租賃契約，都規定期限，期限滿後，房主可以叫你搬家。在此

种情形下,关于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即须申请变更登记,未免使新闻纸或杂志之经营,太不稳定。至于印刷所之变更,也属同样情形。特别对于杂志,它可以这一个月交甲印刷所承印,下一个月交乙印刷所承印,再下一个月又交丙印刷所承印。假如每换一家印刷所,便须申请变更登记,亦未免骚扰太甚。

因之,我们认为:“登记申请书应载明之事项”中,当应求其简单。即以第九条第六款而论,需要在登记申请书中载明印刷所之名称,但事实上,办一个杂志,核准与否,尚无把握,还哪儿谈得到交哪一个印刷所承印呢?至于变更登记,应当仅限于发行人之变更为限,因为“新闻纸或杂志之名称”若有变更,则一方面对于旧的是“注销登记”,对于新的是“声请登记”,不应作为“变更登记”论。其余社务组织、资本数目、发行所地址等若有变更,应令发行人呈报备案,不宜作“变更登记”论。关于此点,我们希望立法院审议时,能作合理的修正。

四、《草案》第15条:“新闻纸或杂志应记载发行人之姓名、登记证号数、发行年月日、发行所、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我们以为关于“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并无记载之必要。我们认为新闻纸或杂志,其责任已由发行人负之,印刷所不应再分负任何责任。既不分负任何责任,亦即无将“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记载之必要。这次上海市节约运动委员会通过杂志用纸节约的办法,不正正当当的通知各杂志社,(本社至今未收到任何用纸节约的通知)而却规定叫各印刷所不得承印超过页数之杂志,企图通过印刷所来控制杂志,我们甚以当局不走正路而走邪路为可惜。印刷所和杂志社的关系是业务关系,除此以外,即无其他。我们希望政府在合法合理的程序下管理出版事业,而不企图通过商业性质的印刷所来控制言论性质的出版物。

五、《草案》第17条:“新闻纸或杂志登载之事项,本人或直

接关系人请求更正或登载辩驳书者，在日刊之新闻纸应于接到请求三日内更正或登载辩驳书，在其他新闻纸或杂志应于接到请求后第二次发行前为之。……更正或辩驳书之登载，其地位应与原文所载者相同。”

上文最后一句，发生困难。举例言之，假如一个报纸的头条新闻，有记载错误，被记载错误的本人或直接关系人请求更正或登载辩驳书，是否应在头条新闻的地位，将该更正或辩驳书登出来呢？按照《草案》，是应当这样办的，因为《草案》规定：“其地位应与原文所载者相同”。但考诸古今中外，从未有一个报纸，其头条地位是登载更正或辩驳书的。

同时又可能发生一个问题（虽然在事实上不致于发生），即假如有一项记载，被记载的人认为记载错误，提出辩驳书一篇，竟长达 10 万字，则这个新闻纸或杂志应否予以刊载呢？如不刊，则违反法律。如刊，则照目前报纸或杂志的篇幅，恐非为之出一特刊或专书不可。（假如是杂志，则它又违反了“纸张节约”的规定。）关于辩驳书字数的问题，亦应有补充的规定。

六、关于《草案》第四章（21 条至 27 条）出版品登载事项的限制，韩德培先生文中已有详论，我们完全同意。其中关于第 26 条：“战时或遇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中央政府命令之规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政治，军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项之记载”，此条假如不能完全取消，我们主张在这条条文之后，加上下列文字：“中央政府此项禁止或限制之命令，应于命令发布后一个月内，咨请立法院追认；立法院应于接到咨文后 10 日内决定对于此项命令之追认与否；如立法院不同意此项命令时，该命令应即作为无效。”

关于《出版法修正草案》的批评，本人仅补充陈述几点意见，主要的部分均包含在韩先生一文之中。在根本上，我们反对另

设《出版法》来约束出版事业；出版品的一切责任问题，尽可照民刑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假如在实际的情形之下不能达到这个理想的地步，则出版法的制订，应力求其合理。我们竭诚希望立法院审议此案时，能考虑并采纳我们的意见。

11月29日

(原载《观察》第3卷第15期，1947年12月6日出版)

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 准其入学之不妥

11月21日上海《新闻报》载该报11月20日南京专电：“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开除后，必须呈报教部，并由教部通令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对此项开除学生，不得准其入学。此项规定，因日久不免忽视，现教部已重申前令，飭令各专科以上学校今后应严格执行，绝不准通融，以整学风。”我们认为此事深有不妥，爰为文论述，并为青年学生呼吁。

一、学校开除学生，总不出下列两种原因：或者认为该生学业太坏，不堪造就；或者认为该生品行不端，不堪训诲。社会生活中不能没有惩戒，超过了某种限度，自然应该予以处罚。但是今日中国一般大学，关于课业及训育的标准，并不一致。先说课业。有的学校学术水准高，有的学校学术水准低；有的学校功课严，有的学校功课宽；有的学校以学生有无特殊心得、是否能融会贯通来衡量学生的造诣，有的学校只以机械的考试、学生是否

能背熟笔记或教科书来决定学生的成绩……在这种差别里，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今日中国的一般大学之间，甲校与乙校之间，乙校与丙校之间，丙校与丁校之间，甲校与丁校之间，在学术水准及学生程度上，是有距离的。因之，在甲校或许是一个“低材生”，但这个在甲校不过是一个“低材生”的学生，可能转到丁校之后，却变成了丁校的“高材生”；至少，这个学生在甲校是被认为成绩低劣者，他到丁校后，不一定同样被认为不堪造就。这一点，我相信无论教育部当局或一般供职教育界的人士，不致认为我们这种说法为无据。因之，在甲校因学业太坏而被开除的学生，他的实际程度，不一定比丁校的在校学生来得坏。但程度还不及这个甲校开除学生的丁校学生既然仍可在大学读书，而程度比在丁校在校学生程度好的学生，反而因甲校之开除而不得转入其他学校，永远剥夺了就学的权利，我们认为这是不公道的。再说操行。今日中国一般大学，由于各校的历史、环境以及主持的人物的不同，在训导方面，其标准和作风，也并不全国一致。有的学校采取严格管理制，有的学校采取自由发展制；有的学校所希望培植的学生就是上课下课、按部就班的学生，有的学校所希望培植的学生就是有创造力有新理想的学生；有的学校对那些对于国家大事关怀热心的活动学生，总是不甚放心，处处加以管束，有的学校则对于有领导力有活动力的学生，中心赞赏，处处予以鼓励和指导……因此，同样一个学生在甲校可能成为校方最顾忌的学生，但在乙校可能成为校方很赏识的学生；同时同样一个行为，在甲校校方可能认为这个行为超越了常轨，破坏了本校的秩序，但在乙校校方，可能认为这个行为是无所谓的，可以原谅的。在这种差别之下，一个学生在甲校可能是一个“败类”，但到了乙校可能变成一个“人才”；在甲校，他的才智迄被埋没，在乙校，他竟然获有机会发挥他的才干。同时，一个学

生,他的品行(包括他的思想、胆识、组织能力、服务精神等等),在甲校可能被认为不堪训诲,而到了乙校可能被认为后生可畏、大有作为。因之无论从学业或操行的观点看,要使一个学生,被一个大学开除后,全国其他大学便不再准其入学,这是不合理的。教育的目的在发挥理性,理性的目的则为求合理,求公道。因之我们认为教育部规定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的学生,全国其他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这一规定,与“教育”本身的意义,背道而驰。我们希望教育部对于这种规定,能重作考虑。

二、在从前君主时代,地方上出了一件命案,就成为了一件“大事”,有司可以因此丢官甚或搬动脑袋。共和以后,民命反而越来越不值钱了,试看今日,民命与蚁命,究有何异!在学校里,情形亦正相仿。在我们做学生的时代,可能一年之中没有一个学生记大过,两年三年中没有一个学生被开除;开除了一个学生,那就全校骚动,极端严重。可是现在,学校开除学生已是家常便饭,不仅如此,而且现在又有了新名字,叫做“集体开除”,一开除就是十几个或几十个;学生成了韭菜根,一刀切下去就是几十根。我们不知道这还是教育的权威“涨价”了呢,还是学生的价格“贬值”了呢?从前开除一个学生那样郑重,现在开除一个学生甚至几十个学生这样轻易,难道现在的学生,无论就学业的原因或品行的原因,真的那样不堪造就吗?假如说真的学业不行,为什么不在录取的时候,将录取的标准尽量提高?假如说品行不端,然而各校训导,平时对于学生在做人做事方面,究竟有没有切实的指导。三四十年来中国的新教育,名为德智体三育并重,但体育不过做到开运动会,德育不过做到上纪念周。现在的学生,伙食这样坏,有的学校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合住一间宿舍,基本的营养、空气、日光都不够,还讲得上什么体育。要学生帮政府忙的时候,如发动青年从军等类,于是把学生大大捧一阵,学生要是对国事有所

表示,而不利于政府时,便把学生大大打一阵,这还讲得上什么德育。三四十年来中国的新教育,大体上说来,不过是一种“书本教育”而已。按时上课就不扣分数,考满60分算及格,读完多少学分升级,读完四年拿到文凭。请问今日中国有几个大学能注意到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些大学,比较有一种优良的传统,学生沐浴在这种传统里,经过四年的熏陶,使他在做事做人上渐渐地得到一种正常的训练;或者一个学生幸运地亲近了一位优良的教师,受了他的影响,在性格上渐渐定型。但就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看,这种情形是占极少数的。(这也就近似牛津导师制的精神。中国有许多人很向往这种导师制,后来教部也规定各大学设立导师,但是中国大学里的导师是“带兵式”的,或者“保甲长式”的,凡是教师都是导师,每个导师带上几十个学生。不说在各种条件上根本无行“导师制”的可能,因之有导师而不知其所属的导生有多少者,导生经年犹不知其导师为何人者,就是中国导师制的真正目的,亦不过是要叫这个导师管管几个学生,不要他们乱惹是非,闯出乱子。所以结果中国大学里的导师制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至于一般大学里,除了上课、考试、分数、文凭外,还有什么做人做事的训练?一年复一年,墨守陈规,一批一批的毕业,糟踏了青年的生命,糟踏了国家的光阴。现在许多学校,这样容易地开除学生,可是学校当局是否已经尽了“教”与“育”的责任?在目前这种教育制度之下,大学的主持人,纵然有这方面的理想,但事实上又是否能够有所作为,贯彻他们在这方面的理想?同时政府当局所行所为,又是否能够激发青年向上,能使青年身心安定?大环境恶劣如此,却希望学生乖乖如彼,其可得乎?青年容有错误,也当网开一面,让他有条路走。越是开除学生容易,越不能实行一校开除他校不收的办法。这种一校开除他校不收的办法,是迫人堕落,迫人自杀,迫人走险,其结果与教育的本义完全相反;所以我

们对于教育部这个规定,不能赞同。

三、但是教育部为什么要有这种规定,而且认为此项规定,日久不免忽视,又要重申前令,飭令各校严格执行,绝不通融,以肃学风?假如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的学术水准和训导作风都是一致的,则施行这个统一的办法,犹有可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此事教育部非不知之,但仍有此种规定,而且重申前令者,据我们的观察,其动机不是教育的,恐怕仍然是政治的。政府显然企图用这种严峻的措置,以压制对于现实日益不满的学生情绪,希望学生只管书本,不管国家。我们认为政府用这种严峻的手段来对付有热血而无凭借的学生是不公道的。而且在原则上,我们反对政府用一切以政治控制为出发点的办法来控制教育。政府应当让大学学生在学术上自由发展,在思想上自由发展,在公共生活的训练上自由发展,只要这种发展是合理的,合法的。我们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样保守消沉,我们也不能希望青年人像中年人那样稳定谨慎,青年人可贵的就是那一股活力,这种活力就是国家的活力。没有活力的国家是一个死的国家,没有活力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社会。政府应当自疚自省,尽量刷新政治,缔造一种光明而有朝气的社会风气,使一般纯洁而有理想的青年在这种有光明有朝气的的大环境下,潜移默化,培养成为建国的良才。我们对于年来各大学学生的活动,素极注意,对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竞选这一类事情,亦不惜篇幅详加报道,这就因为我们认为:今日这一批青年在这种校内活动中所受的民主的训练,与20年以后中国政治的趋向大大有关;历史家及政治家的任务就在要能看到每一个社会现象它在日后所可能发生的社会影响。我们衷心希望政府当局能创造一种新的风气,以这种新的风气来积极地激发青年的抱负,熏陶青年的操守,而不要单在消极方面以种种方法来限制

青年的活动,削弱他们的活力。

12月5日

(原载《观察》第3卷第16期,1947年12月13日出版)

我们建议政府调查并公布 白报纸配给情形

最近英商《字林西报》、美商《大美晚报》和上海报业公会,因为白报纸配额问题,引起严重纠纷;上海报业公会于三十六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42次会员大会决定第四季白报纸配额时,认为《字林西报》和《大美晚报》在纸张篇幅上,未能遵守公会公约,故将《字林西报》的白报纸配额,按照第三季配额减去百分之九十,即自9400元美金减为941元美金;《大美晚报》的配额按照第三季配额减去百分之五十,即自8458元美金减为4229元美金。被处罚的两报连日以极大的首页新闻地位及社评地位,向报业公会提出抗议。在性质上,这本来是一个同业公会之间的内部问题,但在趋势上,几乎变成为一个涉及国际性质的外交问题。输管处主任委员张公权于12月20日致函《大美晚报》,谓白报纸配给额之最后决定权,在输管处而不在报业公会,并谓该处对于《字林西报》及《大美晚报》之配额问题,将有公平之解决;遂使情形略趋缓和。我们现在愿就一年来白报纸配给情形,陈述意见,希望政府能使白报纸的配给制度合理公平。

白报纸的价格在三十五年一年中,极其平稳。从三十五年底起,开始波动:经常在25000元一令的白报纸,5万、10万、15

万, 跃涨不已。在白报纸曾经最高涨到 150 万元一令的今天来看, 15 万一令的价格, 不啻是黄金好梦, 令人恋忆不止。但在三十六年 2 月间, 一般文化事业的经营者, 对于这种涨无止境的白报纸价格, 已都惶惶不安。在这时候, 政府决定以国家的力量来扶助文化事业, 遂有白报纸配给制度的施行: 在政府每三个月一次的进口限额中, 以一定的数目, 配给文化界出版界, 使得到配额的出版机构, 可以向政府购买外汇, 订购报纸。其后白报纸的价格, 一日千里, 20 万、30 万、50 万、80 万、100 万、120 万, 一直到最近最高的 150 万(一令), 白报纸的价格越涨, 白报纸配额的重要性便越增加。正如《字林西报》在这次的配额争端中所说的, 假如他们不能获得他们原有的配额, 他们势必被迫停刊: 这话既非夸大, 也非威胁, 在实际上确有可能。事实上, 今日中国的出版界, 无论是报业、书业、或杂志业, 无不为此高涨的纸价压得透不过气来。以本刊论, 我们在三十五年 9 月创刊时, 纸价只有 25 000 元一令, 现在涨到 150 万元左右, 约涨 60 倍之多, 但是我们创刊时的售价, 只有 500 元一份, 即以本期增售 7 000 元一份的售价言, 本刊的售价亦仅上涨 14 倍。这个在同一时期内, 纸价已涨 60 倍, 售价只涨 14 倍, 都是确确实实的事实, 而其对比的强烈, 则令人看后不禁心弦震荡。除非报纸、书籍, 或者杂志, 它的销路或者它的售价能与白报纸的价格作比例的增加, 否则终将血干汗尽, 垮了完事。但是报纸、书籍、杂志, 无论是销路或者售价, 要和白报纸的价格作比例的增加, 均不可能。普遍的贫穷使报纸、书籍、杂志的销路越来越呆滞, 一切出版物的销路, 不仅无增加之望, 反有下跌的趋势。经营门市的人都在叫苦: 看书的人多, 买书的人少! 肚子都吃不饱, 还有什么钱买书呢? 支出的增加, 使出版品的售价必须增加, 售价的增加使买得起的人越来越少, 而销路越少则售价更越须增加; 如此循环, 出版业的前途便越来越黯淡消沉。所以现在大家

都希望获得白报纸的配额,借以减少出版品的成本,勉力撑持,以维护文化事业的生存。

过去一年中政府所实行的白报纸配额制度,我们认为其中最可批评的地方,即上海一地在全部配额中所占的比率,实在太太。据我们所获得的材料,即以最近这一季,即第四季(包括三十六年11月12日及三十七年1月)的白报纸配额分配情形说:第四季的配额总额是二百五十余万美元,但上海一地的书业分到八十余万美元,约占总额的三分之一;上海一地的报业分到六十余万美元,约占总额的四分之一;国民党党办报纸刊物分到三十五万余美元,约占总额的八分之一弱,上海的纸商业分到二十余万美元,而除上海以外的全国各地的非国民党党营报业,包括北平、天津、汉口、广州等地,一共亦不过分到三十余万美元。易言之,在全国的白报纸配额中,上海一地所分配到的,几乎占到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三十六年夏天我在天津旅行时,平津同业大都表示上海书报业享受的配纸数额太多。在同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李俊龙副部长视察河南一带时,当地的同业也一致呼吁,要求享受白报纸的配额。这一年来,内地报业因受纸价的重压,被迫缩小开数甚或停刊者,时有所闻;西安纸荒的严重,几乎使西安全体报业解体。再以上海报业的分配情形而论,即以本季(第四季)而言,据我们获得的材料,其分配情形如下:

《新闻报》	147 544 元(美金)
《申报》	91 577 元
《大公报》	83 533 元
《正言报》	29 100 元
《东南日报》	28 700 元
《和平日报》	26 262 元
《前线日报》	22 157 元

《益世报》	22 157 元
《商报》	22 157 元
《大陆报》(英文)	20 919 元
《华美晚报》	10 223 元
《新夜报》	10 223 元
《时事新报》(晚刊)	10 223 元
《大晚报》	10 223 元
《新民晚报》	10 223 元
《大众晚报》	10 223 元
《自由论坛报》(英文)	9 172 元
《中华时报》	7 911 元
《金融日报》	7 064 元
《立报》	5 935 元
《大美晚报》(英文)	4 229 元
《俄文日报》	2 764 元
《字林西报》(英文)	941 元
《英文回轮日报》	400 元
《铁报》(小报)	5 960 元
《飞报》(小报)	4 305 元
《小日报》(小报)	2 500 元
《力报》(小报)	2 500 元
《罗宾汉报》(小报)	2 100 元
《诚报》(小报)	1 600 元
《活报》(小报)	1 500 元
《风报》(小报)	1 500 元
《东方日报》(小报)	950 元
《辛报》(小报)	920 元

上列数字可以帮助我们明了目前上海报业白报纸配额分配的一般情形。但以整个国家为单位来看,我们不能同意这种分配是公平的。北平、天津、济南、青岛、汉口、开封、西安、兰州、迪化、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桂林、长沙、南昌、广州、福州、沈阳等地,各有其优秀的报纸,在各区域的地理岗位上,负其传播文化的使命,我们绝不能如此厚于上海一地而薄于全国各地。我们认为这种分配比率,未免太偏。政府应以全国为单位,就各地报业与出版业的需要与贡献,衡量实际情形,作合理而公平的分配,不宜将感情完全侧重于京畿附近的一二个都市。

再就上海一地而言,在过去一年中,白报纸的配额情形,物议甚多。最通常的两个毛病:第一个是分配不平,有的人家配得多,有的人家配得少,多的多到超过其实际的需要,少的少到远不敷其实际的需要;第二个是分到白报纸配额的人,当他利用所分到的白报纸配额时,不一定能符合国家所以要分给他白报纸配额的本意。国家所以要给各报馆各书店各出版机构白报纸的配额,其目的乃在减轻报业、书业、出版业在用纸方面的负担,亦即间接减轻读者的负担,用以传播有益于社会的文化及思想。白报纸配额的目的,并非借此以补贴各受配对象的庞大而近于浪费的行政开支,或借此以肥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囊。白报纸的配额不是一种分赃、救济或补贴,受配对象应当将所配到的白报纸,用之于印刷报纸或出版书籍,不得将配到的白报纸作为受配对象在业务上的一种资金,发生买卖行为,以此周转或以此赢利。但一年以来,实际情形与原定目的,未必能完全符合。无论报业或书业,有些人所分到的配额,是否不超出其实际需要,不免令人怀疑。在报业方面,据我们所知,曾有人提议在报业公会内组织一个小组委员会,调查各报的实际发行额,用以决定该报所得到的白报纸配额是否超过其实际需要,但这个提议始终行不通,因为大多数

的报纸都不愿公开其实际发行数。12月27日出版的《密勒氏评论》周报第一篇社论中就有这样的叙述：上海每一家报纸都虚报他们的发行额，用夸大的发行额以便招揽广告。《密勒氏评论》周报甚至怀疑，上海有些报纸，为了要求配纸，夸大他们的发行数。《密勒氏评论》周报的记者说：他们曾经听说，有一家报纸自称日销6万份，但报业公会于分配配额时，知其数不确，所以打了一个对折，只给了那家报纸相当于日销3万份的配额。那一家报纸发行人，一方面向报业公会抗议其议决的不合理，一方面心里却十分高兴，因为实际上这家报纸仅仅日销2万份（《密勒氏评论》周报108卷4期108页）。张君劭先生有一次告诉我：他们所需要的白报纸是一家半官方报馆分给他们的。一般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印象，即单就上海一地言，白报纸的配额并不是完全公平的。这种不公平的情形同样见之书业方面。我们甚至又可以说，书业分配白报纸的情形，比报业更坏。报业每一次决定配额后，其配额清单虽不向社会公开，但在报业公会的会员之间，是公开的，各会员还有机会知道每一家所得到的配额。书业公会则除了理事们之外，其他会员很少知道每一次白报纸配额的实际情形；一切都操之于少数理事们的掌握之中。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先生，曾有一次口头要求书业公会公开白报纸配给的清单，但被询问的人则要求巴金先生用书面提出来。其后文化生活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万有书店三家联名正式致函书业公会，请求公开白报纸配给账目，但书业公会迄无只字答复。有许多人都怀疑书业公会的理事会员，利用其自身为“理事”，都能分得相当多的白报纸配额。这种怀疑有无根据，只须书业公会一方面公布其理事名单，一方面公布其过去各次配纸的清单，便可证明。在书业中，有许多的的确确在认真出版有价值的书的出版业，他们所分到的白报纸配额，非常微小，远不敷其实际需要，以致有许多稿子，业已排

好,打好纸型,而没有白报纸付印。但有些出版色情书籍的书店,却可以获得为数甚大的白报纸配额。又有些书店,白报纸配额虽然分到不少,但极少出书,就靠分到的白报纸“坐吃”。所以现在上海有一个新名字,叫“吃白报纸”。前几天,上海《新民晚报》上有一段新闻,说有一家书店,要抛出白报纸,价达200亿之巨。这个消息假如是事实,则大可证明书业中的确有人配到了白报纸而并不用以出版书籍。政府以国家外汇购进的白报纸,配给出版业,原是鼓励并帮助出版书籍者,而受配者却用以作为他们的业务资金,移作非与直接付印有关之用;这实大违政府施行白报纸配给制之原意。更进一步说,我们认为白报纸的利用,应以有益于社会的文化事业为限。我们绝不同意以国家艰难的外汇购进的白报纸,浪费在印刷大篇幅的商业广告或娱乐广告,或者印刷色情诲淫的文字。前述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三家致函书业公会,一方面要求书业公会公开配额清单,一方面曾质问书业公会为什么出版黄色色情书籍的书店却可获得极大的白报纸配额。我们认为这种质问极其重要。白报纸的配给,既要公平,亦须合理。一切分配超过了其实际需要,或用分配到的白报纸去印刷无益于社会文化的图书,或者干脆分到报纸而不出版书籍,“坐吃白报纸”,这一切情形我们都认为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情形,不仅浪费着国家的外汇,并且间接剥削了全国学术界文化界的作者读者的利益,有害于整个国家的文化事业。我们更须进一步地明了,目前白报纸价格的如此飞涨,亦与这种配额制度有关,因为绝大部分的白报纸配额都给“既有对象”分去了,所能剩给纸商的数目也就有限,所以纸商在供需不平的情形下,囤积居奇,高抬售价,其结果,使一切不能获得政府配额的出版业,统受其累。

关于本刊自身,我们亦愿在此略述数语。我们过去的用纸,

都是向市上纸商零购的。我们在三十六年5月曾一度向中央信托局购纸,请求购买40吨,公事至7月才批复下来,准购两吨。中央信托局的纸是日本纸,但须照加拿大纸的市价七折计算。事实上,我们申请时,市价仅20万元一令,但批准购纸时,市价已超过了30万元,即使打了七折,其实际支付的价格,还比5月间申请时的价格为高,而纸质则远不如市上所购的西报纸。据说最近上海有二十几家科学期刊联合向中央信托局购纸,只批准了一吨,每家只分到二令左右,我们觉得这简直是滑稽。我们于加入书业公会后,书业公会在第三季配额时,曾给我们300美元的配额,仅敷本刊半月之需。我们因为书业公会的配额不敷本社实际需要远甚,故于三十六年11月27日以双挂号公函一件致书业公会,正式请求该会派员惠临本社,调查本刊的实际需要。我们的挂号信收据是上海第五邮局第0147号,并于翌日(11月28日)收到书业公会的“收件回执”。但迄今一月,书业公会既未接受我们的请求,派员调查,亦未有只字之答复。我们致函书业公会的态度是诚恳的,而且我们认为我们这种请求乃是基于一种合作的精神,愿意协助书业公会明了其会员的实际需要,以作为该会下次决定配额时的参考。本社现除出版周刊外,并将出版丛书,丛书的原著且已陆续寄到,本社对于配纸的需要,比以前更为迫切。我们绝对不能承认,那些色情的书报,在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中,比本刊所作的贡献更为重要。那些色情书报都可获得为数可观的配额,为什么我们所分得到的独如此之少!我们对于这种不公允的情形,难于缄默!

白报纸的配给制度已行一年,现在又是一个年度的开始。我们认为政府对于过去一年白报纸配额的情形,亟应加以调查:究竟过去一年中的白报纸是如何分配的?其实际用途的情形又如何?在书业方面,到底过去一年中出版了多少书籍?哪些书

籍？其用去的纸量与配给的纸量是否相符？我们希望政府加以调查，并公布其调查结果，使一般社会都能明了这一方面的实际情形。对于过去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情形，政府应根据调查所得，作进一步的改善。

12月30日

（原载《观察》第3卷第19期，1948年1月3日出版）

风浪·熬炼·撑住 ——《观察》第3卷报告书

经过这紧张的、困顿的并且富于戏剧性的半年，我们欣幸我们终得向读者宣布：《观察》第3卷业已出齐。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刊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本刊第4卷第1期定2月28日出版。

这半年真是一段熬炼人们灵魂的日子，既需要勇气，又需要忍耐。一面是政治性的危机，一面是经济性的压迫——后者尤较前者使我们疲惫吃力。但是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风险，经费如何艰难，我们的一贯方针是：撑住舵、沉住气、向前撑。我们相信，这还仅仅是遭遇困难的一个开始，更大的困难也许还在后面。

开 支

我们仍旧先从业务方面说起。整个的局势愈来愈摇摆颠

荡,反应在经济生活方面的,也必然是大家愈来愈困难。法币愈来愈不值钱,物价也就愈来愈跳得快。就本刊说,创刊号每份售500元,1卷24期售1000元,在第1卷的半年之中售价只涨了一倍。2卷1期售1500元,2卷24期售3000元,在第2卷的半年之中,售价亦仅上涨一倍。3卷1期售3000元,3卷24期售1万元,在这一卷的半年之中,售价却涨了三倍多(如将发行数的增加和篇幅的减少两点一并算入,这半年间售价的上涨,并不止三倍多),这也可以反映最近半年来各种物价及工价激增的程度。在这一卷中,我们最感重压的就是“纸”的负担。我们曾在3卷9期和19期上两次专文陈述此事,纸的问题确已成为目前国内文化界出版界最严重的问题。在3卷1期时,纸价为30万左右一令,其后40万、50万、70万、80万、90万、100万、120万、150万、180万、200万,最高曾一度冲到230万一令,在六个月内大约上涨百分之七百。现在本刊每期纸的成本,占到每期总成本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这半年来,我们几乎天天在为着纸的问题焦虑紧张。

排印工及装订工也一再涨价,兹将3卷1期和3卷24期各种价目比较如下:

种 类	3卷1期	3卷24期
五号字排工(千字)	4万3千元	13万2千元(日内又将加价)
六号字排工(千字)	5万元	15万3千元
印工(每令)	8万元	26万元
封面印工(千页)	2万7千元	9万元
纸型(每页)	3万2千元	10万元
订工(每份)	131元6角	307元

根据上表,排印工及订工的上涨,在这半年中,为百分之三百多。稿费3卷1期时为千字5万至6万元,现在提高为千字

15万至20万元,亦提高百分之三百左右。本社员工的薪金开支,在这半年中,增加的比例很大,在三十六年9月份(3卷1期时),每月员工薪金总额仅七百余万元,现在(三十七年1月份)已达5000万元,一方面薪金本身调整了,一方面由于业务上的需要,职员的人数也有增加,因此每个月的薪金开支,也成为本社目前一项不轻的负担。其他一切杂项的开支,都随着增加。全部开支合拢来算,在这半年中,增加的比率当在百分之五百左右。但售价的增加则仅为百分之三百三十。因为第3卷的发行数,比较第2卷的发行数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所以收支两方面还勉可求得平衡。

销 路

本刊的发行数,第1卷约为8000份,第2卷16000份,第3卷25000份,增加的比例约为“一、二、三”之比例。本刊销路如此激增,我们自愧并无任何足堪重视的贡献;一切应归功于作者的支持和读者的爱护;同时也可以说,这充分反映今日国内对于这样一个真正没有背景的言论刊物的需要。

本刊第2卷临末各期发行16000份(2卷24期发行17000份)。自第3卷起,另在北平出版“华北航空版”,委托北平新实书店代理发行,每期发行3000份。华北航空版发行后,在平、津、华北、东北一带,上海本社即停止寄发,但3卷1期,上海仍印16000份,沪平两地合为19000份;“华北航空版”的发行,使本刊自第3卷第1期起,发行数即从2卷24期的17000份跳到19000份。华北航空版在这半年之中,根据北平代理发行人新实书店的报告,迄为3000份,未能有何增加。这可能因为东北及华北各地的战火,使刊物的销路愈来愈狭,因之难望推广。上

海方面的发行数则自 3 卷 1 期到 3 卷 11 期, 迄在上涨的趋势中, 3 卷 11 期以后, 发行数即停滞不前, 逗留在一万四五千份左右。战火的蔓延, 交通的阻隔, 以及售价及邮资的增加, 都足以影响刊物的销行。兹将第 1 卷第 2 卷各期再版数及第 3 卷发行数报告如下:

第 1 卷	第 1 期	5 版	1 220 份
	第 2 期	6 版	1 220 份
	第 3 期	5 版	1 220 份
	第 4 期	4 版	1 180 份
	第 5 期	4 版	1 300 份
	第 6 期	再版	1 500 份
	第 7 期	再版	1 300 份
	第 8 期	再版	1 160 份
	第 9 期	再版	820 份
	第 10 期	再版	1 010 份
	第 11 期	再版	1 050 份
	第 12 期	再版	730 份
	第 14 期	再版	1 200 份
	第 20 期	再版	1 200 份
第 2 卷	第 21 期	再版	1 220 份
	第 22 期	再版	810 份
	第 24 期	再版	830 份
	第 1 期	3 版	1 200 份
	第 2 期	再版	1 330 份
	第 3 期	再版	1 200 份
	第 4 期	再版	1 500 份
第 5 期	再版	1 500 份	

	第 6 期	再版	1 160 份
	第 7 期	再版	1 250 份
	第 8 期	再版	1 060 份
	第 9 期	再版	1 000 份
	第 10 期	再版	900 份
	第 11 期	再版	1 020 份
	第 12 期	再版	650 份
	第 13 期	再版	1 200 份
	第 14 期	再版	800 份
	第 14 期	3 版	600 份
	第 15 期	再版	1 000 份
	第 16 期	再版	900 份
	第 17 期	再版	800 份
	第 24 期	再版	500 份
第 3 卷	第 1 期		19 000 份
	第 2 期		19 500 份
	第 3 期		21 000 份
	第 4 期		21 500 份
	第 5 期		21 000 份
	第 6 期		21 000 份
	第 7 期		2 2000 份
	第 8 期		22 000 份
	第 9 期		23 000 份
	第 10 期		24 000 份
	第 11 期		25 000 份
	第 12 期		24 000 份
	第 13 期		25 000 份

第 14 期	24 000 份
第 15 期	24 000 份
第 16 期	25 000 份
第 17 期	25 000 份
第 18 期	25 000 份
第 19 期	24 000 份
第 20 期	24 000 份
第 21 期	24 000 份
第 22 期	24 000 份
第 23 期	24 000 份
第 24 期	25 000 份

按照上表，本刊第 3 卷的发行情形，前半期是上升的，后半期是稳定的。但是本刊第 4 卷的发行数是否能够再向上增加，或者是否能够保持已有的数目，我们不作任何乐观的预期。主要的原因是战争使大家越来越穷，而普遍的贫穷使买得起书刊的人越来越少。一方面书刊本身的售价，由于成本的增加，势不能不一再调整，另一方面邮资的加价使书刊在发行上遭受极大的不利——后者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尤较前者为甚。售价的增加，在京沪东南一带比较说来还不发生任何太大的影响。即以本刊目前售价 1 万元一份来说，现在这 1 万元在一般都市人民的生活中已无任何重量。在上海，看一场电影连车钱就要花到五六万或七八万，吃一碗最起码的肉丝面连小账就要花到两万元，坐一次公共汽车也要 1 万元，三轮车夫或黄包车夫对于 1 万元的生意简直已经不感“兴趣”；说到后来还是刊物最便宜，花 1 万元买一份《观察》可以消磨一个宁静的周末。但是在远地，情形就不同。远地寄刊，势须航寄。定户航寄，航平每份就要四千多元，航挂每份要七千多元。同业批购，用航

挂寄递，每份的邮资平均均合 3 000 元左右。这一笔邮资的负担可观，而这笔负担最后当然仍落在读者头上。远地同业还要加上他们的利润，这样一来，本刊在后方各城市的零购价格，亦就可观。后方的生活程度本较京沪一带为低，现在却要他们付出较京沪一带读者所付出的更高的代价购买书刊，这个情形所发生的困难，可以想见。本刊在发行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全国性，发行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散布在大后方各大小城市乡镇之间以及边远地区，因之邮资的加价对于本刊业务上所生的影响，大于仅仅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发行中心的其他刊物。因之我们一方面希望后方的读者尽可能的向本社直接定阅，同时我们也吁请全国各地同业，并和我们合作，尽各种方法以减低批购的成本，从而减低门售的价格。我们希望各地同业尽可能的用“航空图书小包”寄递而不用“航挂”寄递，因为“航空图书小包”的邮资只合到“航挂”邮资的三分之一。用“航空图书小包”寄，不一定比“航挂”慢。假如当地同业共同约好，都用“航空图书小包”，则大家仍都同时收到，亦不致增加业务上的竞争困难。此外各地同业在规定本地的门售价格时，我们亦希望他们尽量采取薄利多销主义。过去有些地方的同业利润定得太高，比如在贵阳昆明，本刊售 500 元时，他们已售 1 500 元或 2 000 元；这样的情形，对于读者、经售书店及出版者三方面都是不利的。我们又希望各地同业对于本刊的门售价格有一个标准，不要把《观察》像一般商品似的有早晚市面不同的价格。譬如在台湾，就有这种现象。当我们售 6 000 元一份时，最先到的一批《观察》，在市面有时喊到台币 150 元一份（合国币 14 000 元左右），过了几天，售价从 150 元减为 120 元，100 元，或 80 元。这种情形也非我们所愿闻。其实当本刊售 6 000 元时，在台湾售 80 元台币，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平时一

贯的方针是想尽可能的减轻读者的负担，我们要求各地同业在精神上能和我们配合作。

自从“华北航空版”出版后，华西及华南的读者来函希望我们出华西航空版及华南航空版，以期减低内地读者的负担。在原则上，这不仅是我们愿意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但是出航空版有许多条件，不若想象中那样简单。本社目前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直接派人到各地去自己发行航空版的程度，航空版的发行势非委托当地书业代理不可。但我们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代理对象，代理对象最主要的条件是负责任，守信用，按期和我们结账。假如我们不能按期收回账款，而在各地出版航空版，这不啻是一种“自杀”。我们当然愿意随时留意并尽可能接洽此事，但至少目前还无任何好的消息可以宣布。不仅没有好的消息，我们反而要向华北读者宣布：我们的华北航空版也终于只能出到3卷24期，自第4卷起，不拟继续发行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代理发行本刊华北航空版的北平新实书店未能履行契约，按期和我们清账，拖欠的数目在全部应付的账目中所占的比例太大，而且势必越欠越多。新实书店也有新实书店的困难：战火的蔓延使他们无法推广销路，收款的困难使他们周转不易，北方纸价的昂贵也加重他们的负担；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是同情的，了解的。但就新实书店和我们的“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讲，这样越欠越多的情形，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所以我们考虑结果，只得将华北航空版暂停发行；将来如有可能，再设法恢复。

定 户

关于订阅部分，第3卷中最大的改动是将“按期计账法”改

为“硬性规定法”。以前是预收若干订费，一期一期的扣除，款尽通知续定。但定户对于这个办法，感觉不便，一致要求硬性规定：三个月多少钱，六个月多少钱。因为照以前的办法，定户都不容易知道自己的订费什么时候完，以致续定时常常中途脱节。况且硬性规定以后，刊物假如加价，读者即可不受加价的影响，多少可以得到一点保障。我们认为读者的要求非常合理，所以自3卷5期起，即改用硬性规定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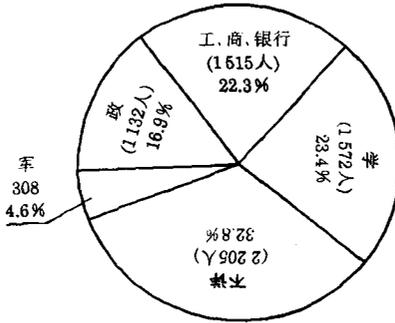
定户在这半年中仍有增加。兹将过去三卷中增加的情形列表如下：

卷数	定单号码	定单数目	实际定户
第1卷	1~2709	2709	1600左右
第2卷	2710~7682	4973	2500左右
第3卷	7683~14414	6732	3300左右

根据上表，在第2卷的半年中，定单的数目为第1卷的180%左右，在第3卷的半年中，又为第2卷的180%左右；增加的比率稳定而有规律，与1、2、3三卷发行数的增加的比率大体近似。我们向例每一个读者来订，不论是新定户或旧定户续定，每次都给以一个新的定单。一卷有24期，但定户有定三个月12期的，所以每卷的定单总数，并不表示就是每卷的实际定户数，绝大部分的定户在半年中都占着两个定单号码，因之我们在第1卷中，实际的定户在1600左右，第2卷的实际定户在2500左右，第3卷的实际定户为3300左右。第3卷因有华北航空版的发行，华北的定户大都迳向北平方面定阅，不再直接向上海定阅，其间减少了一部分可能的定户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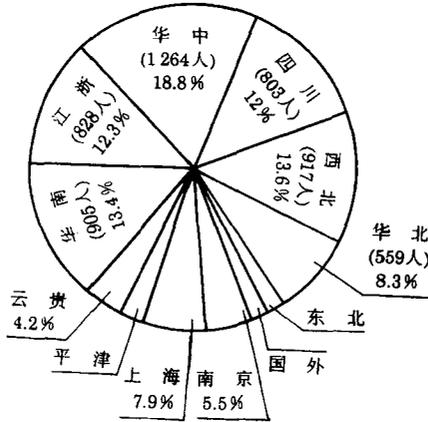
第3卷定户的地域以及职业分布我们援例统计制表如下页：
关于征求定户的工作我们实在没有尽力去做，没有主动地

6732名定户的职业分类



注：此项统计，系根据定单存根编制，故大部分定户职业，无法分类。

6732名定户的地域分布



注：“华北”包括冀、鲁、晋、豫、绥、察、热等省。

“西北”包括甘、陕、青、宁、新、康等省。

“华中”包括湘、鄂、皖、赣四省。

“华南”包括港、粤、闽、桂、台等地。

去争取。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人手太少,没有专人负责设计推广的责任。我们仅仅在每一卷完了以后,向本刊的读者呼吁一次,希望读者帮我们介绍几个新定户。过去两次呼吁的结果,成绩很好。由于最近物价的波动,我们现在益觉有增加定户的迫切需要。本外埠同业和我们来往的虽然很多,但总不免有拖欠货款或延期付款的情形发生。譬如有些同业,特别是本埠的同业,总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算一次账,而结账时还要给我们“期票”。以目前物价的波动,上一个月的法币价值和下一个月的法币价值,相距极大。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非常吃亏:有时在账面上不赔,而在法币的实值上,等于赔了。这样做下去,我们的资金势必愈来愈小,而终有一天不易维持;事实上,我们现在也越来越感到周转的困难。因此在本刊一方面,只有设法增加直接定户,才足以保障我们的财务基础。至于在读者方面,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定阅总比零购为便宜。既可避免按期零购之烦,又可避免中间书店所增加的一层负担。譬如以台湾来说,以零购八期的代价,至少可以订阅 12 期,定阅明明比零购为合算,为什么不直接向本社定阅呢?汇款即使麻烦,每半年或三个月也只麻烦一次。我们对于直接定户的刊物,向例提前付邮,比较当地书店早日到达。特大号对于定户并不加价,售价涨了定户也不受影响。本社自 3 月底起,又将出版丛书,所有本刊定户,一律可享八折优待。我们在此特别向广大的读者呼吁,未直接定阅的,希望赶快向本社直接定阅,已经定阅的,希望再帮我们介绍几个新的定户。本刊的定价,大体上总比别的刊物便宜,就是涨价也比别家涨得慢,这就因为本刊销得多,成本合得轻。所以一个刊物的销路大,刊物与读者两方面都是有利的。帮助本刊增加销路,也就是间接减低自身的负担。一件社会事件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携手合作,大家合作于大家都有利,希望所有关切爱护本刊的朋友们,给我们帮助,自动

的、出于本心的、尽可能的替我们多介绍几个新定户。

最近我们常常收到读者来信,建议我们接受读者捐款,以增加我们的经济力量。我们对于这些热心的读者先生,心中不胜感激。但是我们总不敢接受这个建议。一方面,事实上我们到底还没有到非向读者呼吁捐款的地步,一方面我们平时一贯的做人原则是要求公道。“公道”之一,就是权利与义务必须平衡。在读者,无条件的捐助我们,固然是出乎一片热心,但在我们,则不免受之有愧。我们凭什么白白地收读者先生们的捐款呢?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公道,违背我们的良心。我们现在想起:一切愿意捐款帮助我们的朋友,与其用捐款的方式帮助我们,不如用介绍定户或赠送朋友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你们可以订阅几份,分送给你们的朋友亲戚,一方面我们增加了收入,增加了定户数量,一方面你们的朋友又可因你们的赠送而读到本刊,同时也就扩大了本刊言论的影响。中国还没有赠送刊物给朋友的风气,而这风气在欧美早已十分盛行,并可作为过年、过节或庆贺生日喜庆的馈赠礼品。现在正是阴历年关,订阅本刊赠送朋友最合时宜。一切愿意支助我们的读者先生,请考虑我们的建议。我们需要更多的定户! 我们需要更多的定户!

编辑检讨

关于编辑部分,在内容上,大体说来,第3卷要较第1、2两卷充实。假如拿第3卷和第1卷一比,印象就极明显:第1卷显得疏落,缺乏劲儿,第3卷似乎紧凑得多,味儿浓一点。虽然自3卷10期起,我们因故不得不将篇幅自24页减为20页,但自3卷1期起,我们即已一方面扩大版面,增加每页容纳的字数,特别是尽可能的多排六号字,另一方面我们除了封面一页以外,自第2页至

第20页,每一页都已充分利用,整整的19页都是文章,没有一点浪费的地方。所以,平均讲来,本刊所容纳的文字数量,要比其他页数相同的刊物所容纳的文字数量多出百分之十至三十。我们每期平均总刊载10篇左右文章,有时候登到13篇之多(读者投书不在内)。这种充分利用每一寸篇幅的结果,至少在数量上可以帮助刊物充实其内容。

专论部分是我们最感困难的一栏。说起来,每期3篇,一个月也只有12篇,但是每期在编辑时,常感捉襟见肘之苦。稿件的不宽裕,一方面使编者不能就各篇的性质加以配搭,一方面多少影响专论栏的重量。我们自问还没有随便发稿填凑篇幅的行为。但是专论栏的不够结实,却是我们自己深深感觉到的。编刊物的工作,本来是一件“看人挑担不吃力”的工作,事实上,要期期精彩,篇篇精彩,也确是一件难事。但读者可以如此原谅我们,我们自己不能如此解释。我们应当再加努力,来增加专论栏的分量。

关于“观察通信”这一部分,成绩比1、2两卷为佳。在第3卷中,大体上,每期的“观察通信”都还站得住。其中有若干通信相当出色。1、3两期中的三篇有关魏德迈的通信,都包含若干特殊材料,特别3卷1期的第1篇,有许多都是根据原始材料——直接从魏德迈嘴里得来的材料写的。3卷7期的“刘伯承南下记”,博得广泛的重视和赞赏,3卷21期上的两篇沈阳通信和22期上的成都通信,也可算得好通信。而第3卷“观察通信”栏中最出色亦最受读者推崇的,当然要推本刊专稿关于战局分析的文字。我们希望本刊第4卷在通信方面仍能保持第3卷的标准,除了我们自己继续努力外,还希望全国读者源源惠稿,大家来充实本刊的内容。

国外通信第3卷远较第1、2两卷为充实。在24期中一共登了17篇国外通信,这个成绩不该算坏。除美、英、法三国本刊原有的通信网外,第3卷的通信网复伸展至印度的新德里和日

本的东京。国外通信不若国内通信那样容易接洽,我们希望国外的朋友们继续帮忙。

外论选译这一卷只登了七篇,太少,希望自第4卷起,增加这方面的材料。根据第2卷“读者意见书”的统计,读者对于这一栏都有热烈的要求。我们现在已约定专人分担这一部分的工作。

书评是第3卷开始的,在24期中登了16篇,也不算少了。

关于科学与文艺,第3卷比较第1、2两卷有显著的减少。这也是我们根据第2卷“读者意见书”的统计而决定的。读者大都不欢迎本刊刊载科学文字。关于文艺,也有许多读者希望减少,主张由其他文艺刊物负这一部分的责任,认为《观察》应当多腾出篇幅来登政论的文章。因之我们在第3卷上,即很少刊载科学文字,文艺则不规定每一期都有。文艺在第三卷中,平均每隔一期有一篇。同时我们乘此向读者表示:我们的确相当接受读者的意见,并见之于事实。

关于投稿的情形,我们也愿在此附带报告。一个言论刊物本来应该是为全国作者读者所共有的,我们极其诚恳的希望本刊能成为全国作者读者共同发表意见的园地。我们自问在取稿上并无成见,只要文章好,有分量,我们都登。这一卷中,在投稿中录用的很多,尤其是观察通信。我们现在发表统计如下:

栏 别	第3卷所刊文章篇数	投稿录用篇数	百分比(约数)
专 论	72	17	25%
观察通信	80	39	50%
其他各栏	85	37	45%
共 计	237	93	40%

读者投书一栏本来是供给一般读者发表意见的,但发表的意见应以与公共生活有关或有公共的意义者为限,纯然属于个人生活的诉苦,不在录取之列。提出的问题太限于地方性质的,

我们也不一定能发表,因为投书很多,其间不得不有大小轻重之别。对于任何个人的批评,应以政治性质的批评为限,不应涉及法律性质的私人攻讦。最不能使我们同情的一种投书,就是不负责任的攻击任何机关或个人的投书,投书人既不署名,也无地址。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极其自私,极不公道。投书人如有必要,可以不署真名,但必须将真名及地址,让编者知道,投书人至少应对编者负责。这一点我们希望读者能够接受。

政治危机

在第2卷报告书中,我们曾宣布:“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对本刊施用过任何压力或干涉”。三十六年11月初旬,我们第一次遭遇政治性的困难。毛病出在3卷9期编者所写的一篇《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上面。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物对于这篇文章,引起极大反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行文上海市政府要求停止《观察》的发行。主管官署上海市社会局曾以公函召本刊发行人于11月7日在社会局谈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秘书长于10月27日来访未遇,后来约期于11月9日谈了一次。两次的谈话都没有什么严重。除此以外,则未有任何人(无论是否代表政府,代表国民党,或以朋友身份)和我们谈过有关《观察》的问题。正在社会局和市党部方面约我谈话的时候,听说中枢已有急电到沪,致吴国桢市长、方治主任委员、潘公展议长及吴开先局长四人,不主张查封本刊。这个案子似乎应该可以过去了,但11月11日的晚上,编者个人的安全发生困难,不得不被迫暂时离开原来的寓所。

新闻界有许多朋友对于本刊极其关切,上海市党部要求查封本刊的消息最初是一位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们的。南京的急

电,不主张查封本刊的消息,也是另一位新闻界朋友告诉我们的。11月7日,南京天津两地的报纸首先揭露本刊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其后上海、香港、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报纸陆续记载此事。新闻报道引起各地前辈、朋友,以及读者的殷切的关怀。由于各方前辈朋友发乎内心的支持所形成的道德力量,使事件至11月下旬渐渐地缓和了下来。

在这一个风浪时期,本社同人始终照常工作;编者虽然暂时离开寓所,但工作并未中断,因此本刊仍得照常按期出版。环境纵有波折,我们的心境始终宁静。在我们的心底里,我们有一种无可摇撼的信念:我们必须本着我们的良心,为祖国的前途努力奋斗。我们一切都为了国家,除了国家,我们另无其他。请看今日天下,芸芸众生,奔波终日,究为何事?争得脸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还不是为了几张钞票,为了若干权势。可是国家已经糟到这个地步,假如我们每个人还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盘、转念头、绞脑汁,我们的国家怎么得了?假如人人只知为私,国家的事情谁管?我们不敢妄自菲薄,随波逐流,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我们也有我们的勇气,向前迈进,义无所辞。人与人的相交,经久知心;刊物与社会的相交,亦复如此。只要我们自问无他,我们亦不需战战地顾虑他人有无误会?仅仅站在一党一派的利益上来打击我们的,那只是一种过失;国事靡烂,已至于此,我们还有何暇来计较这种过失!

我们今日所处的一个社会,是一个神经极度衰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充满着谣言、曲解和没有根据的忧虑。各地既遍传本刊被封的消息,而又看到本刊仍旧按期出版,于是以为其中必有“道理”。这情形可以香港读者梁子奇君投书中所引12月15日中共主办的香港《华商报》所刊的消息为代表。香港《华商报》的记载云:

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曾于9月25日出版的第9期上刊载了储氏所作的一篇《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痛骂美帝国的援华是要变中国为美国的附属，顺便骂了南京政府。……南京当局在10月10日左右就下令封闭《观察》。此时储安平就以“失踪”闻，但是《观察》并未停刊，反出了一个“言论出版自由”的奇迹。奇迹的出现，是因为储安平“失踪”到陈立夫李惟果公馆里请罪悔过，表示改变言论态度的结果。CC们所以能允储安平悔过自新，是因为《观察》已拥有三万个读者，是全国第一流的杂志，CC们如不加利用，不是饭桶了吗？而储安平亦可利用已在读者中获得的“公正”态度，在《观察》上发表“偏私的不健康的”言论，以赎前愆。……（按：本刊3卷9期的出版日为10月25日。要求封闭本刊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不是南京的中央党部。要求封闭本刊当在11月初，不是10月10日左右。去年12月27日纽约《华侨日报》也刊有与香港《华商报》同样的记载，文句一样，大概是同一来源。）

在通常情理之下，假如编者真的到过陈立夫李惟果公馆去“请罪悔过”，假如本刊真的出卖给什么人了，我们还居然刊载梁子奇君的投函并一字不改的转载香港《华商报》的记载，那我们假如不是天下的大奸雄，亦必为天下的大傻瓜。可惜我们既然才不及奸雄，自问亦不致愚如傻瓜。编者和李惟果先生是在最近一年中新识的，编者和陈立夫先生，至少到今日为止，无论在私人酬应或公共集会上，还没有晤过一面。编者在那一个时期也没有去过南京。我们的一贯态度是我尽我心，不求人谅。打击来了，以宁静坚定应变，不以张皇失态应变。当11月11日夜晚11点多钟，我因为无处可住，要到某处寻觅一宿，踽踽独行，经过外滩江边，想到这地方白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何等热闹，

而这时江水泊泊，大地如死，整个的人世被托在一片月色中，构成一幅凄凉的人生画图时，我心中亦仍宁静雍容，既不悲伤，亦无忧虑。意外的风浪竟然使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假期，利用难得的闲暇，整理学校的讲稿，写信和朋友叙旧，并获得机会在太阳中作时间较长的沐浴。好汉做事，来去光明，用不着鬼鬼祟祟，而我们对于一切误会、传说、曲解，也不急急于辩护、辟谣或解释。只要我们自己脚跟站定，我们相信，“时间”终将替我们洗刷一切谣言。

刊物幸能继续存在，但许多人又说我们的态度已经“转变”了；这也是目前这个神经衰弱的社会中极易发生的心理状态。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你批评国民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左倾”了；要是你批评苏联或者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右倾”了。整个的社会已陷入一种严重的神经错乱程度。譬如本刊第2卷第21期登了读者杨光时君等十位投来的一篇文章后，许多人便传说《观察》右倾了。这次查封之说既成过去，便有人以为《观察》转变了！我们对于这一切传说，素不作任何辩护，我们认为最好的解释与辩护就是每期《观察》的内容。举一例言之，当我们业已知道本刊已发生政治危机时，我们对于北平周炳琳等48位教授寄来的关于民盟事件的宣言及董时进先生投来的对于民盟事件的评论，毫不犹豫的照常发稿，在心中绝无任何有关利害得失的考虑。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糊没有斤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

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已遭遇政治危机,但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满,也不因此事而减少我们在理智上对政府的批评。假如有人想煽我们,我们不会被人煽得冲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们,我们也不会被人吓得后退一步。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尺度,无论我们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震荡,我们必能撑住我们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张皇中失去其方向。

我们认为我们在第3卷中所遇的风浪是一个极寻常的风浪;大的风浪也许还在后面。我们在此感谢一切在此次风浪中,无论是出面的或不出面的前辈和朋友,他们的支持使本刊终得解危。我们同时感谢一切关切本刊的读者,他们的热心和同情增加我们努力的勇气!一切帮助本刊的朋友们,我愿我们的努力不致辜负你们的期待!

三十七年2月1日 上海

(原载《观察》第3卷第24期,1948年2月7日出版)

论程孟明案兼论社会有心人 能否合拢来做一点事情

1月27日上海《大公报》载:律师程孟明去年12月26日接到邮局“欠资”1500元的一封信,程律师认为邮电加价还没有完成立法程序,邮局补收“欠资”等于收受“不当得利”,因于第二天向法院控告上海区邮政管理总局局长李进禄,要求“返还欠资”1500元。这个案子经上海地方法院推事凌元庆“不经言词辩

论”，判决程孟明败诉。判决理由，认为此次邮电加价，系经国务会议第 16 次会议通过，国务会议依法为国府之最高国务机关，有制定立法原则之职权，并依历办成案，国务会议以修正法律规定而先饬执行者已有实例……因此认为国务会议有权宜处理之权，也就是说，邮局执行法令加收邮资，非不合法。

1 月 28 日同报又载：程孟明律师经地方法院判决败诉后，复亲撰诉状，向地方法院控告承办此案的推事凌元庆渎职，原文如下：

为自诉渎职事，按有审判职务之公务员为枉法之裁判者，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定有处罚明文。被告为上海地院民庭推事，有审判之职权，其审理自诉人与上海邮政管理总局为欠资不当得利事件驳回自诉人之诉，应认为枉法之裁判。查原判所持驳回自诉人之理由，系采本月 8 号南京之电讯，谓国务会议有制定立法原则之权；邮电加价案既经国务会议通过，即可生效，且已经有实例云云。而判决之时间系在本月 20 日；自诉人曾于本月 9 日具状续陈理由，驳斥该项电讯（即原判所持之理由），被告不得诿为未睹。于本月 20 日作判决时，对该状只字不提。盖自诉人在该状申述国务会议固有制定立法原则之职权，但无制定法律之权，立法原则并非法律，故国务会议之权宜处理似不能发生法律效力之效力，即不能认为有法律上之原因；已往实例，显属错误，宪法公布以后不容再误，理由至为充分；一经斟酌，即无从驳回自诉人之诉，久为被告所深悉。故一笔抹煞，只字不提，竟以驳回，实属故为枉法之裁判。

我们对于程孟明律师个人，一无所知。我们在此要评论的是

这个案子所代表的精神：

一、这个案子的法律目的在要求“返还欠资”1 500元，而在这个要求的背后，表示自诉人否认这次邮电加价为合法。我们若以常识判断，将无人能承认：程孟明律师控告的真正目的乃在追回那“1 500元”！程孟明所争的，不是那“1 500元”的法币，而是“不承认任何非法行为”的一个原则。他争的是原则，不是金钱。

二、程孟明第一次控告的对象是上海邮政管理总局局长李进禄。但是我们必须假定：程孟明和李进禄之间并无任何私人的恩怨。程孟明所要控告的是上海邮政管理总局局长李进禄，而不是李进禄先生。控告上海邮政管理总局局长李进禄与控告李进禄先生，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公事的，后者是私人的。这个案子，程孟明要控告的实在是上海邮政管理总局，而这个被告上海邮政管理总局的代表人恰巧是李进禄。这个案子虽然涉及李进禄，但与李进禄私人并无任何关系。我们已假定程孟明与李进禄私人之间素无恩怨，因之，程孟明不因与李进禄个人无恩无怨而不控告上海邮政管理总局局长李进禄，同时控告了上海邮政管理总局局长李进禄后，并不表示程孟明和李进禄在私人之间已有任何纠葛介蒂。我们必须分清，这是两件事。程孟明在第二次控告中控告地院民庭推事凌元庆，其意义同。

三、这次的邮电加价，即使在政府自身，也曾引起极大的波澜，立法院和监察院都强烈表示过反对的意见。但是在我们这个“法治”二字已失去严峻的解释的国家里，各种事情都在糊里糊涂中混，在邮电加价业已在“无声”中被普遍接受的事实下，程孟明律师独独要提出法律控诉，否认这个邮电加价的合法地位；这就表明，程孟明律师这个行为在这个混乱、消沉、没有是非的社会里独具一种意义。程孟明律师大概是一个个性坚强而又具有正义感的人，再加上不幸他又是一个律师——一个以维护法

律为终身志职的人物,使他在良心及性格的混合感情中,很自然地发生这种为维护法律争取正义的行为。在常识上,在目前这种社会情形之下,他这个“官司”打得赢打不赢,恐怕人人都不能卜先知,但是他却要干一下,干一下不算,还在干下去,连判决他败诉的推事他都控告起来。他第一次的控诉业已败诉;他第二次控诉的结果如何,现在不知。但我们要注意的,不是他那“官司”的赢输,而是他在这个案件中所表现的精神,一种争是非而不计成败的精神。

我们于叙述事实并加分析以后,兹愿一述其感触。我们认为程孟明这种精神,正是今日中国最缺少并亦最需要的精神。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已是一个只有权力而无是非的时代。一切有权有势有钞票的人,都可横冲直撞,逍遥自在。甚至知识在这个年头也变成了压迫弱者的工具,知识已与道德脱离,良心与公道在这夜雾中几乎不能发光。前些日子,上海有一家正余纸烟店藏有白银1万多两,被官方没收,当局竟拟处分:银圆每枚以法币一元强制收兑。照这个办法,那一大箱白银,只能换得1万元法币两张,该店店主19年的积蓄,到头落得只够买一包香烟。然而当局却说,这个强制收兑是有根据的,因为民国二十四年11月3日使用法币以后,当时规定法币一元兑银圆一枚,三十二年9月23日财部公布的“银币银类兑换法币办法”也是规定法币一元兑换银圆一元的。合理不合理是另一问题,法律如此规定,是没有办法的。(见三十六年11月26、27上海《大公报》)执行的人只管根据法律,然而存在的法律是否合理近情,却无人过问。一切与人民福利利益脱节的法律,竟没有人加以废止或修改,而一切剥削人民福利权益的法律,则如雪天的雪片,源源而降。社会上不是完全没有正人,但法律不能保障正人,结果正道被邪道压伏,谁出头谁就倒霉。在这种情形下,大家都惶惶恐恐,战战兢兢,到处是“明哲保

身”。好人既都明哲保身，坏人自然越来越无法无天，以致造成了今日这样一个完全失却了道德樊篱的没有生气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政府正用各种力量以求社会的安全，企图维持现存的局面，但在现局下，却到处潜伏着不平、积怨，和难于遏制的愤怒。目下到处流露着不稳的情绪，而有为都变成为消沉，建设都变成为破坏。照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怎么得了！但是国家到底是我们大家的。有志气有血性的人还是应当自动起来，为正义争一争，为是非争一争，成功失败是一件事，我们责无旁贷又是一件事。今日中国最缺乏的精神就是一种战斗的精神(fighting spirit)；全神贯注，勇往直前，或者与恶势力奋斗，或者向新事业创造，方面虽异，战斗则一。这种战斗的精神是今日拯救我们国家的唯一力量；假如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完全没有这种战斗的精神，我们的国家实已名存实亡，毫无希望！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家有其前途。就我们的体验言，在今日中国，无论哪一地域，哪一阶层，哪一职业，哪一年龄，都有不甘自弃的有志之士，凭其热血，希望把国家弄好。我们号召今日中国一切有志气有血性的人们，应当提高我们的情绪，坚定我们的信念，唤起我们的勇气，不要放松我们的劲道，向我们的理想迈进。程孟明律师这种打官司的精神就是我们极好的榜样。在落伍的、没出息的人的想法中，以为这是胡闹，以为这是神经病，听说上海有些报纸记载此事，所用标题，都带些挖苦味道，但在我们看来，这是头等有价值有意义的行为。我们并不知程孟明律师为如何人，但这个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无关，我们不管这个人姓张或姓李，我们所提倡的是这个案子所代表的精神。我们要将这个社会从旧变到新，必须先使我们自己的观点从旧变到新，我们对于一切事情应有一个崭新的看法，一个跳出旧圈子的看法。我们要和旧的奋斗，战胜旧的，打倒旧的，才能将新的提长出来。时局越来越使我们苦闷！但苦闷何用！苦闷是消极

的,我们要从苦闷中冲出来!

本人心中有一个意思,多年迄未吐出,现在乘此一述,请求读者指正。我常感今日社会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太多,我们遇到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应当使之合理公平。改革社会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以暴力在根本上推翻这个社会,一个是在既存社会制度中求其改变。现已有一部分人走着前一条路,我们没有走前一条路,但我们应该在后一条路中多做一点事情。做总比不做好,多做总比少做好。现在一般老百姓受的欺侮太多,受的委屈太甚,“法律”究有多少尊严,此处不谈,但我们的正路是在法律之下控诉。“打官司”有三个条件,即有钱、有时间、有法律知识。这些条件非人人所能具备,因之,我们认为,在律师界中,不乏有志之士,他们是不是愿意牺牲一点时间和收入,来做一点公共事业,替我们的国家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在理想上,一切受非法压迫而打不起官司的人,我们应当替他们打官司,为他们申不平、雪冤枉、解苦痛。这个理想是伟大的,但在实际上,也许一时未必办得到,因为今日一般人民中要申雪的冤枉苦痛实在太多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规定一个范围,挑几件有关大原则的事件做一做。譬如政府如有任何违宪违法的行为,我们即进行法律诉讼。打官司要钱,但我们相信社会各界必有很多热心的人士,愿为这种为公共福利而奋斗所需的费用,捐出钱来。新闻界言论界的朋友也必有人愿意参加,来共同讨论诉讼的应否进行或传播案件的情形。官司一级一级打上去,一直打到底。打赢了,全社会有利,打输了,至少可以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与了解,从而促进法律的改革。这是一个促进法治的运动,也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

我们愿意再进一步说,在争取言论的自由上,本人一向认为言论界自身所负的责任,比其他任何人都大。同样,在争取司法的独立上,司法界的朋友所负的责任也比其他人士为重。司法

界的朋友不要以为我们这种建议是和司法界为难,我们的目的实在毋宁说是帮助司法界的朋友争取司法的独立。所谓司法独立,就是要不受权势的干涉。按照戴雪教授(Albert Veuu Dicey)之言,法治的真正意义是“武断权力之不存在”。要争司法独立,必须坚决抗拒任何武断权力的侵犯。司法界的朋友假如感觉力量单薄,我们全社会来做他们的后盾。我们上述的建议,乃在引起社会广泛注意今日中国法律的效力及其尊严。我们要帮助司法界的朋友在法治的精神下完成其任务。我们和司法界的朋友是合作的,不是处于对立的。和我们处于对立地位的乃是坏的法律、坏的法官,以及一切破坏法律侵犯法律的人,而非法律、法官,或一切维护法律的人。

1月30日 上海

(原载《观察》第3卷第24期,1948年2月7日出版)

国大评论

一、训政问题

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很糟,糟到连国民党的党报都不得不出而指责。据我们所看到的京、沪、津各地报纸所载有关国大会场情形的记载,字里行间,大都含讽带讥,印象不好。有人认为国大有二千多人在一起开会,会场秩序不易控制,一切情形难望理想,这是第一次的民主学习,大家应将期望的尺度放宽一点。不过我们应当指出,天下的事情,不像样也有一个不像样的限度,在限度以

内,大家可以原谅,超过了某种限度,便使人难于默缄。像这样一个二千多人的会议,要希望每一议事,每一发言,都按规就矩,有条有理,自然未免求之过高。但是动辄起嘘,随便喊打,亦未免失之过分。国大代表来自各地,所受教育,程度不一,我们亦不能希望每个代表的发言礼貌,都能符合水准,但报载居然有人高喊“妈他民的主”,则未免相去更远。本人目睹会场情形,一言不合,四座喊打,意气之徒,直奔讲坛,若无职员劝解,定必扭成一团,偌大一个会场,东一簇,西一簇,乱哄哄,气冲冲,尽管主席嘶哑喉咙,要求维持秩序,可是无人理会,一片喧嚣,一团乱糟,使我们这些旁听之士,除了微微一笑之外,简直无感可想。我们细加分析,造成这种不体面的情形,一部分是知识问题,一部分是修养问题;而两者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教育问题。就知识言,本人亲耳听到一个代表发言,谓“国大有修改宪法之权,如其我们这次不修改宪法,就是我们没有尽我们的责任”。此种逻辑,不知何来。修宪之案,均须三读通过,举行二读会时,有一位代表大嚷,说上次业已通过(所谓“上次”,实际上是一读会),为什么还要讨论?有人告诉他议案须经三读,始能通过,这位代表还是不服。国大代表,不远千里,进京开会,而不肯在事前稍为补充补充自己的知识,严格言之,可谓有亏职守。就修养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讲理,喜欢打的朋友何必竞选国大代表?要讲理就得听反对的意见,不愿意听反对的意见的人何必竞选国大代表?民主国家的会议代表,都应具有某种水准以上的教育素质。我们应维持这种水准,我们应提高代表的素质以符合这种水准,我们不应降低这种水准来迁就代表的素质!

这次国大开会之糟,业已众口一辞。但是大家都在议论国大代表的品质,而很少有人追究这一个失败的国大的责任应由谁负。本人认为这次国大开会情形如此之糟,从历史的眼光来

看,国大代表所负的责任小,20年实行训政的国民党应负的责任大。议会的成就如何,就得看议员的素质如何;议员的素质如何又得看选民的素质如何以及国家政治上的风气如何。选民的素质高,产生出来的代表的素质自然也跟着高;国家在政治上的风气好,选举的成绩自然也跟着好。国民党训政前后20年。经过这20年,本来是30岁的人,现在已经50岁了;本来20岁的人,现在40岁了;本来是10岁的孩子,现在也变成为30岁的人了;至于30岁以下的青年,差不多完全是在国民党的训政阶段中长大的。在这次的大选活动中,无论选民或竞选人,大多数都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的公民,这些选民与竞选人的素质的高下,不能不说与20年来国民党训政的成绩无关。当初中山先生遗教,认为“由国民革命所产生之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生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所以训政的目的,即在训练人民如何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然而我们现在从国大的选举以及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来看,国民党训政20年的成绩究竟在什么地方?众所周知,这次国代和立委的选举,弊端百出,弄到发生命案、选官被控、绝食抬棺,笑话之多,开中外古今纪录。选举的成绩如此,国民党对于这20年来“训政”的这段历史,何以交代?再说代表素质,今日国大代表的素质,难道都是理想的吗?难道都够得上国家的水准吗?假如国内还有素质更好的公民,何以那些素质更好的公民无法产生,因之使国家的政治水准得以随之提高?国民党对于此点,有何自解?我们很坦白的说,从这次国大选举和国大开会情形来论,国民党20年的训政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国民党要是勇气,对于这点应当坦白承认。也许他们看到这二十几天来国大的情形,内心里也在惭愧。但惭愧是消极的。过去的

虽然过去了,假如国民党能够从过去的失败中得到一种教训,则过去的失败犹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失败。行宪以后,实际上掌握权力的党还是国民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拿出良心来,拿出勇气来,全盘改变作风,真正替国家做点事情。只有以国家为第一,才能大公无私;只有大公无私,才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只有有成就的人、团体、党派,才能在这时代的洪流中立脚!

二、总统问题

关于总统问题,我们要分几点来议论。

第一,在现实政治里,第一任总统是蒋主席,几乎成为一个不移之局。4月4日蒋主席正式表示不愿出任总统,一笔惊人,于是各方揣测丛生,有的认为这是一种姿态,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表示。据我们所知,蒋主席这一着绝对不是“姿态”,这也不但不是一种消极的表示,而且相反,正是一种最积极的做法。这是一着棋,一种政策,绝不是“姿态”,而是一种“决定”。何以言之?原来在政协时代,大家制宪,都以蒋主席为对象,想用各种方法来限制他的权力,因为当初大家假定,将来的总统一定是蒋主席。蒋主席宣布不出任总统,这是一种战略,企图使围扑他的人扑了一个空。据说这是蒋主席在牯岭静思以后的决定。蒋主席是喜欢负责任的人,宪法给总统的权力加上种种限制,这一点,就蒋主席的性格来说,是他受不了的。同时,至少在蒋主席看来,在目前的政治局面下,仍须由他来主持,总统既无权,他只好改任有权的职位,这就是早在一个月以前,本刊4卷4期所载蒋主席可能不做总统,改做行政院长这一报告的根据。所以,不做总统做行政院长,绝不是消极的表示,而是十分积极的决定。无奈国民党的党人不了解他这一政策,这一谋略,还是哭哭啼啼的认为要

是他们的蒋总裁不出任总统,他们的党就完了。听说蒋主席这次非常生气,认为他的党人不仅不能帮他的忙,甚至还不能了解他。但是结果呢,各种实际形势,仍然要求非由蒋主席出任总统不可,而其救济的办法是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总统以非常的大权。蒋主席不愿出任总统,本来是为了总统的权力太小,现在“权力”的问题既然有了补救办法,蒋主席自然可以“俯顺舆情”,出任总统了。这就是这次总统之选所生的曲折的一个最客观最正确的分析。而在这个分析之中,我们应可得到一个结论:蒋主席不拟出任总统,改长行政院,这多少还近于“人迁就制度”的精神;现在,为了要蒋主席出任总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以大权,则就又走着“制度迁就人”的老路了。

第二,大家都说,现在中国,除了蒋主席,还有什么人可以出任总统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着两个问题:一、在现实的国民政府政局里,还有哪一个人能有像蒋主席所有的那种统筹全局的权力呢?二、竞选就是一种比赛,也可以说是一种挑战(challenge)。现在有哪一个人敢起而与蒋主席挑战(竞选)呢(陪选另作别论)?由这两个问题,引起了一个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这一个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进而研究的,即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除了蒋主席之外,竟然没有一个人,在声望和权力方面,可以勉强和蒋主席偕与并列的地位呢?十几年来,社会上对于中国的政局有一种笼统的印象,认为当局御人,常采“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办法。我们看,在党务和教育方面,这一面有一个陈立夫,那一面就有一个朱家骅;财政经济方面,这一面有一个孔祥熙,那一面就有一个宋子文;军事方面,这一面有一个何应钦,那一面就有一个陈诚;派系方面,这面有一个CC,那一面就有一个政学系。使各方面都造成一种均势的局面,大家都环绕着一个人,任何方面都再也跳不

出第二个全国性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形,据我们所能了解的,对于要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实在是一种基本的、十分严重的缺陷。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全国性的领袖必不能仅限于一人。所以我们看,在英国,保守党有保守党的党魁,工党有工党的党魁,两个党魁在个人的才能上容有高下之分,而在国家的活动中,都能保持独立的地位,所以一旦丘吉尔内阁垮台,艾德礼也一样能起而组阁,掌握国家的大舵。在美国,现在正忙大选,我们看,共和党、民主党、第三党,都各拥有全国性的领袖,一旦事势需要,均可起而执政。假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领袖,或者只容许产生一个领袖,这种国家绝对不够条件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现在蒋主席业已当选为总统,我们希望以后政府当局,能多替国家培养几个政治领袖,特别是反对派的领袖。

第三,纯粹从政治制度着眼,这次我们选举总统,是很滑稽的。我用“滑稽”两字是因为我想不出其他任何更适当的字眼。总统选举法里虽然规定可以自由签署提名,实际上那是给无党派的独立人士一种机会,以便没有党籍的独立人士亦可竞选总统,至于政党方面,按照各国通例,其候选人仍应由政党提出。这次国民党没有提总统候选人,由签署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也没有发表竞选演说,这些已是出乎常例,而最妙的,国民党里竟然有两个人出来竞选总统。这算什么一回事呢?我们学政治学的人简直没有法子解释。而尤其妙的,居正最初表示竞选总统,其后又说不能竞选了。不竞选,且罢了,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余不揣庸朽,偶听朋友劝告,出而竞选总统。嗣经记者围绕,率作片面谈话,虽曰吹笙引凤,识者已窃笑矣。兹幸经本党全会深切研究,郑重决议,一致恳请总裁出而应选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舆论既有所归,说论衷于一是,余身为党员,应即服从党议,再不作竞选言说,以淆视听。”读了这个声明,简直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居氏身为司

法院院长多年，总统之选，何等郑重，而忽竞忽不竞，真是使人迷惑；而结果呢，读者也许不免要捧腹大笑，因为居氏仍旧是竞选了！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即今日政治上的人物，是如何的随便！政治如此，安得不使今日一般青年对于政府失望！

第四，这次参加国大的政党，除国民党以外，还有青年党和民社党。这两个党这次都没有人参加竞选总统，这也是奇怪的事情。组织政党的目的何在？曰，希望掌握政权俾可实现本党的政策耳。竞选总统，本党不提候选人，而去支持他党的领袖，政党史上，事不多见。去年4月，国、民、青三党共同执政，共同拥戴蒋主席，是犹可说，现在行宪，三党各自独立，法理上的立场已变，哪还能承袭三党共同执政时代的作风？曾琦还要发表声明，说什么总统要具五个基本标准，五个附带条件，真可谓“其臭不可闻也”。假如这批臭虫都赶不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请问中国的政治哪有清明进步的一天？

三、副总统问题

第一，关于副总统，国民党一党有四位候选人，其不合理，正如国民党一党有二人竞选总统一样，已详前论，此处不赘。严格言之，国民党应当只提一个人出来竞选副总统，现在搁起不管，听他们去自由竞争，无非顾全事实。由此可见，今日中国的政治，一切还是以顾全事实为主，以顾全制度为次。在这种政治作风之下，还谈得上什么实行“宪政”！

第二，关于选举副总统，在国大代表之间，我们最容易听到的一种论调是：“糟糕，这几位候选人都是朋友，叫我到底选了哪一个好呢？”我们愿意告诉代表诸君：“你们错了！人民选举你们，是委托你们，要你们替他们挑选一个最好的副总统，你们不

应当从‘朋友交情’的观点来作投票取舍的标准。你们这种话，初听好像没有什么，细加研究，就十分严重，因为这牵涉到你们对于‘代表’职责有无基本的认识了。”

四、宪法问题

第一，国大一开，就有许多代表要求修改宪法。宪法应不应修改，此处不谈，而会场上所以闹得如此一团糟，归根结底，还是吃了宪法 174 条的漏洞的亏，宪法 174 条文云：

宪法之修改，应依下列程序之一为之：

一、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之提议，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四分之三之决议，得修改之。

二、由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得拟定宪法修正案，提请国民大会复决。此项宪法修正案，应于国民大会开会前半年公告之。

上文第二款，立法院依法议决之修宪案，应于国民大会召开之前半年公告之，这是十分合理的，其目的在使国人注意，有充分讨论之时间，并使国大代表及政府当局都能明白一般舆论的背向。但是同条第一款为什么不作同样的规定呢？这是一个漏洞。宪法是国家大法，绝大多数的公民没有机会表示意见，由二三千个代表一下子便可随便修宪，这是很危险的。假如 174 条第二款，也规定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所提议的修宪案，应于国大召开前半年公布，至少这次国大召开后，便不致因修宪问题弄得“满屋皆嘘”了！

第二，政协时代，按照张君勱的主张，将四权散布于人民，人

民直接行使四权，是谓国民大会，即所谓化有形之国大为无形之国大。其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坚决反对，国民党与非国民党终于妥协，保持国民大会之形式，而减削其权力，使其职权仅限于（一）选举总统副总统，（二）罢免总统副总统，（三）修改宪法，（四）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这次国大召开，总统副总统尚未选出，第二款“罢免”一项自然谈不到；新的立法院尚未成立，第四款复决立法院的修宪案也谈不到；宪法尚未实行，利弊得失尚不可知，一般意见都不主修改，所以真正的任务，乃在选举总统副总统；除了选举总统副总统外，并无其他权力。但国大代表，不甘寂寞，一开会就要求讨论国事，听取施政报告。从法理的立场言之，凡此皆与宪法规定不合；在宪法的条文中，国大代表并无此种权力。政府当局宣称，此次召开国大，即为行宪之始，而不料国大一开，国大代表本身即做了破坏宪法的行为，同时政府居然接受国大代表的要求，各部会首长一一到会报告施政，亦即不啻政府也跟在国大代表的后面，从事破坏宪法。所以这次的国民大会，在政府的原意，也许视之为行宪之始，而事实上，这次的国民大会，却变成为毁宪之始，国大代表和政府步伐一致，领导毁宪，这一点是使一切爱护宪法的公民，都引为遗憾的。

第三，国大代表要求修改宪法，主要的动机是认为国大的职权太小，要设法增加国大的权力。就人情言，他们这种心理我们是极能了解的。可惜国大代表忘了一件事，即他们只站在“国大代表”的角度上看国大，而没有从整个国家制度的角度上看国大。为欧美民主国家上下议院所有的种种职务和权力，在现行宪法上，已分由监察立法两院行使，无需再半空中杀出一个国民大会来分权。这个国民大会在现行宪法中，本来是一个很特殊的组织。为什么有这个组织呢？最初因为中山先生的遗教中，有“国民大会”这一名目。张君劢主张人民直接行使四权，即称之为“国

民大会”，其实，人民行使四权，就是人民行使四权，直截了当，还叫什么国民大会不国民大会呢？这无非是为了顾到国民党的面子，保存了中山先生“国民大会”这一个名称。后来因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反对，故仍使国民大会变为有形，而改变了它的职权。这就是现在“国民大会”的来历。现在许多人，包括国民党和政府里的开明分子，想来想去，还是张君勱的办法高明，即化有形之国大为无形，认为国民大会是不需要的。这次国大代表的选举，已在宪法颁布之后，既然竞选国大代表，理应当对于国大代表的权力，有一了解。假如认为国大代表的权力太小，太空，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则当初为什么不去竞选立委，而却竞选国大代表？在国家的整个制度中，国民大会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不站在国家整个制度的角度来看，却仅仅站在自身权力的角度来看，闹着要增加国大职权，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合理的。

第四，国大通过了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理由是现在是一个“戡乱”时期，应当给予总统以非常的权力。我们对于这种理论，不敢苟同，理由如下：（一）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算不算是宪法的一部分呢？假如认为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是宪法的一部分（4月19日王世杰在国民大会上解释，谓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是一种宪法的补充条文，既称为宪法的补充条文，当然也就构成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则我们认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个根本大法理应笼罩到一个国家无论在战时或在平时的一切统治的原则，决不能说，这部宪法，平时可行，战时不可行。美国在最近30年中，两次参加世界大战，我们也没有看到一到战时，美国宪法便要增加补充条文，授总统以特殊的权力。假如认为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是宪法的一部分，则为什么要由国民大会来通过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欧美各国在非常时期，虽亦有授权行政首领以若干特权，

但此种权力,均由立法机关所赋予,国民大会非立法机关,由国民大会来授权行政首脑,于制不合。(二)目前政府已把共产党称为“共匪”,动员戡乱。我们现在即从政府的立场来说,则我们认为,政府出兵清剿“共匪”,和政府派一团兵到太湖去剿匪,在性质(nature)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匪”的数目的多或少,“匪”的组织的松或严,至于政府出兵剿“匪”这一行为,其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假如今日政府打“共匪”,要增加什么“临时条款”,授总统以非常之权,则岂不是将来政府要派兵到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去围剿湖匪时,也须增加什么“临时条款”,授总统以大权吗?要是这样,则我们的国家也就永远没有回复到平时的可能,我们的宪政也永远不能走上正轨了。所以就纯粹的法理立场,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理不通。(三)中国今日需要努力者,即是要大家来推动,使这个国家进入于法治境界。要讲法治,即须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迁就制度,不要制度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不要因人授权。假如我们随随便便,今天一个特殊条款,明天一个特种法律,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不能达到法治的境界。所以在任何理由之下,我们认为国民大会通过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都和宪政的精神不符。

4月21日

(原载《观察》第4卷第9期,1948年4月24日出版)

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四大学教授90人的来函,已刊本期

投书栏。编者另接北大一个学生来函，内云：“目前的情势愈来愈严重，陈雪屏吴铸人一再扬言学运由共党操纵，并竭力分散师生之间的团结，煽动学生与难民之间的仇恨。吴铸人并公开警告出席学生集会的三教授（指许德珩、樊弘、袁翰青三先生）。这虽是恫吓性质，亦未始不可能造成闻一多事件的重演。”这个学生又说：“各种事实的教训，已充分证明：要在现政府下求改革，只是一个幻想。”

这一年来国内的情形变化相当大。军事上的变化和经济上的变化是大家看得到觉得出的，大家看不到觉不出的是一般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情绪上的变化。去年5月6日，南北各地都沉沦在排山倒海的学潮之中，那时参政会正在南京开会，一部分参政员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希望促成国共之间的和谈。一般社会，包括学生在内，亦都衷心希望和谈恢复。希望和平不仅仅是为了任何个人的利害，大家都是为国家着想。其后参政会开会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使人悲观，极端分子在会场中占着压倒的优势。那时我们就接到北平方面的来信，说这是大家（包括教授和学生）对和平最后一次的呼吁，这个阶段一过，学生的情绪可能要转入另外一个更积极的阶段了。去年7月作者在北平耽了三个多星期，听说许多学生都“走”了！其中甚至有快要大学毕业的学生，也丢开一切，头也不回一回地走了！他们觉得在“这一个”区域里耽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们已不愿再将精力和时间浪费在那种毫无实际效果的呼喊上，他们决定去做一点更实际的工作，做一点更有效的工作。当一些朋友谈到这些情形时，一方面在心底里佩服这些青年有勇气，有决心，一方面都叹息当前的环境竟把青年逼成这个样子。有一位先生恋恋地说：“走的都是最优秀的！走的都是最优秀的！”

这一年来，就学生一部分说，最触目的现象，是学生与政府

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敌视的程度越来越深。在政府一方面，只要学生一有什么活动，就恶意相视，咬定他们受了共产党的利用；在学生一方面呢，则对于政府，已老老实实，直截了当，指这个政府是一个反动的政府。政府和学生，实际上已俨然成为敌人。为什么会弄到这个样子呢？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政府实在使人太失望了。作者对于国民党 20 年来的执政有一个一贯的看法，用一句话来点穿：即政府什么都不管，只管他自己。一切措施都是以他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的。假如政府要修一条铁路或筑一条公路，那就因为这条铁路公路可以给他运兵；假如政府要兴建一个广泛的电话网，那就因为这个电话网可以加强他的政治控制；假如政府在财政制度上有什么更张，那就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多征一点税，多弄一点钱；假如政府颁布一个新的法律，那就因为这个法律可以防止人民若干活动，或作为政府某种行动的一种法律根据。总之，一切都为政府自身设想；凡是和这个政权没有直接利益的事，他都没有兴趣，或者装聋作哑，或者敷衍了事，或者干脆不管。人民没有饭吃，他管吗？他不管。人民没有衣穿，他管吗？他不管。人民没有房子住，他管吗？他不管。政府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政府只管束穷人，不管束富人。在重庆时代，威尔基、华莱士要来了，就实行清街，一切没有饭吃的穷人都在被清之列，以免有碍观瞻；国大开幕了，下关和浦口的难民都被驱逐出去，以致发生蚌埠的抢案。大家痛恨豪门，要求动用他们在国外的财产，可是政府不敢碰一碰既得利益阶级的利益；大家要求实行民生主义，使耕者能有其田，可是政府没有决心，不敢有损地主阶级的利益。这样的统治怎能叫人拥戴！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没有一件事使人看了顺眼，没有一件事使人听了高兴。一切公共的舆论都不能改变政府的作为，官做他的官，党办他的党，脸皮老老，肚皮

饱饱,这叫人怎能服气!不仅一般青年学生越来越趋极端,就是一般中年人,据我们所了解的,心情和思想也都一天一天的在转向变化:本来对于政府感觉失望的,慢慢儿的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对于政府感觉绝望的,终于对于政府“不望”(不再存什么希望)了;本来无所谓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的左倾了;本来稍稍左倾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左得厉害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也在努力了解共产党了;本来不大喜欢共产党的,现在也渐渐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了。这一种变化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变化,然而却是一种重大的变化。这一种变化,决不是基于任何个人的利害而发生的,这是一种客观的环境所促成的。而且,我们还应该说,这种变化正在“时间”的推进中加速其程度。本刊4卷7期刊有一篇读者投书,说:“北方情形已成等待局面,倒过来了!一般空气很紧张,但在表面上却很平静。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似的。”这最后的一句,极堪玩味。据我们所能感觉到的,现在北方一般青年的心情,都在期待着一个“新的社会”的来临。为什么大家期待着一个“新的社会”的来临?就因为今天我们所见所闻,不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社会上各种恶势力、恶习惯的根基实在太深了,这使我们简直不敢希望在这个现状下可以把一切不合理的事情改革过来。最近国内一般言论界,大都非常消沉,这消沉是一种可怕的消沉,这转向也是一种严重的转向,可惜政府不努力去了解这种消沉,不在根本上设法挽救人心的转向,而仍然走着老路,一味的想以强力去压伏人心!

在这一个无声的变化中,唯一可以觉察到的,就是学生的态度。在这一年中,学生运动有几个引人注意的特征:第一、学生已经成为了人民利益的发言人。综观年来学生运动所争取的,归纳之不外两点,一是人人要有饭吃,能够活得下去,这就是他

们所喊的“反饥饿”；一是人人应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不能无故遭受迫害，这就是他们所喊的“反迫害”。他们所争取的内容，已不仅仅限于他们自身的权利，他们的呼喊业已成为一种“时代的声音”。第二，在学生运动的技术上，他们业已到达为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是他们所常常歌唱的“团结就是力量”。他们的团结程度，确为前所未见。政治是有物理性的，压迫愈大，反抗亦愈大，他们的如此团结亦可反证当局压迫的厉害。不仅是一校一地团结，他们业已做到了全国团结的程度——至少在精神上，他们的团结是全国性的。所以一校出了事，他校立刻响应，几个学校宣布“联防”；一地出了事，别地方的学生立刻响应，呼吁、控诉、捐款、全力支持。第三、勇敢，坚定，他们完全成熟。他们在现实的分析，理想的追求，办事的能力，奋斗的精神上，均已表现出惊人的成就；他们已隐然成为一个推动时代的巨轮。

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政府如何对付学生呢？据我们的观察，政府对于学生已怀有一种超出常态的恐惧心理，因之政府对于学生的态度，完全陷入一种变态的状态之中。政府业已有一种牢不可拔的成见，认为学生的一切具有政治性的行动，都是受共产党利用的。在这一个大前提下，于是政府对于一切“闹事”的学生，完全不把他们当作“学生”看待。我们看，这一年来，只要学生有什么公共集会，政府便是出动大批军警，架起机枪，如临大敌。上海（同济）的案子，成都的案子，北平的案子，政府用刺刀，枪柄，麻绳，木棍，石子，机枪，马队，飞行堡垒来对付学生，造成极度紧张的空气，引起社会极度的不安，发生令人难以相信的残暴行为。学生无论闹得如何凶，讲到后来，学生总还是徒手的，以有武器的军警来对付没有武器的学生，无论如何总是残忍的。成都的警察甚至用刺刀在女学生的阴户里拌搅一下（见本刊上期成都通信），实在惨绝人寰。只要一个政府稍为有一点人

道的精神,我们相信绝不致用这样残忍的手段去对付学生。

我们认为政府遇到学生有所抗议时,应当很冷静地考虑学生的抗议有无理由。我们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者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他们希望人人能活得下去,难道我们可以说他们错吗?他们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难道我们能够说他们做得过分吗?他们不满意这个政府,难道这个政府是能使人满意的吗?今日政府所要做的,所应当做的,不是防范学生,不是压迫学生,不是打击学生,而是自己反省,自己改革。政府应当自问,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否可以使人民满意,如其不能,人民当然有权利表示反对。这是现代政治潮流中的不移之论,没有什么稀奇。假如政府希望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应当多听一些人民的意见,多做一些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尽量减少人民的苦痛,增加人民的福利。政府果能如此,还有什么人要反对政府?就是有少数被野心家利用的学生,要闹也是闹不起来的。

这次北平和成都两地所发生的暴行,实在使我们难于缄默。而据北平来信,似乎第二个“闻一多事件”正在制造之中。我们认为这种事件,即使替政府着想,也是万万再发生不得的。政府希望安定,但是政府难道觉得今天的局面还不够动荡吗?政府今日的处境还不够危急吗?政府已经做了许多错事,远者不论,即以近事而论,国代和立委的选举,都增加了政府及国民党自身的离心力量,这次副总统选举,又发生了这样大的风波,这事的后果目前还没有露骨表现出来。假如什么地方还要再发生类似闻一多的案件,我们敢说立刻要闹出大乱子来。我们希望政府及各地地方当局,能够慎审处置,不要操切用事。闯祸容易,收

拾乱子就难了。

4月27日

(原载《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出版)

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后,连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又盛传本刊将继《新民报》之后,遭受停刊处分。我们业已在多方面证实此项传说。听说当局最初曾想一口气“解决”几个在他们认为眼中之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其后因为《新民报》的查封令发表以后,各方反应不佳,所以第二个查封本刊的命令迟迟未下。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存亡难卜;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

一、政府现在自称“行宪”,并在“行宪”以前,大吹大擂,说得一般人心痒痒地,好像从此中国,就要换个局面。其实,上海人一句话,大舞台对面“天晓得”!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抚心自问,你们行的到底是什么“宪”!人身之无保障如故,集会结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论之遭受摧残,只有变本加厉。即以本刊而论,虽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所受迫害,可说一言难尽。或者禁售,或者检扣;经销《观察》的,受到威胁;阅读《观察》的,已成忌讳;甚至连本社出版的《观察丛书》,也已成为禁书,若干地方的邮检当局,一律加以扣留。读者申诉,日必数起,谅解我们的,把政府痛骂一阵,不明实情的,责怪我们何以款到而书不寄;每读来函,如坐针毡。此种情形,不仅《观察》一家,其他同

业，亦有同样经验。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全赖所有分子，群策群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之，各尽一己之献，合而言之，充实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而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后主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亦复为我们的义务。在朝执政和在野论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的贡献则一。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所以英国反对党的官衔是“英皇陛下的反对党”，而英儒戴雪复称公共舆论为政治的主权者；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义所在。今兹政府既称行宪，不可昧于此义。若以为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之，未免昧于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议政，务使一切民间报章杂志归于消灭，尤可谓糊涂太甚。抑有进者，批评政府与不忠国家绝为二事。《出版法》上有一条，谓不得有“意图颠覆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的记载，这种限制，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所谓“颠覆政府”者，亦即叫旧有的政府下台，让新的政府上台之谓也。以言英国，丘吉尔执政时，工党固无时无刻不处心积虑以求丘吉尔政府之颠覆，现在工党上台，保守党人又肆意攻诋，以求工党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礼无罪也，今日之丘吉尔亦无罪也。再观美国，杜威华莱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帜，以求杜鲁门之垮台乎，未闻有美人入杜威华莱士于颠覆政府之罪者。就说中国，数月以前为“国民政府”，现在则称为中华民国政府，此岂非旧的“国民政府”已被颠覆，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谓乎？此

“国民政府”既被颠覆矣，然则亦有人蒙颠覆“国民政府”之罪名乎？说来说去，实在说不通。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看见有人批评它，便脸红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颠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无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不可更改者。拆穿了讲，毫无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毛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拖下来，于是今天想封这家报馆，明天想封那个刊物，说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就得把国家放在第一，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发言论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办刊物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人民这种权利。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

二、现在大家不满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静气的想想，你们过去所作所为，对于国计民生，有何改善？今日所作所为，对于当前局势，又有什么补救！今日一般国民，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的流离，无不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讲话，不出悲愤之言，这是做得到的事吗？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的朋友，平时一开口就希望我们多作建设性的建议，其动机固不能谓不善，但是请问，今日的时代是一个建设性的时代吗？今日政府又是一个建设性的政府吗？请问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们发点建设性的言论，政府能采纳吗？又能实行吗？我们一贯的态度是希望结束内战，这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我们这个建议吗？今日普天之下，皆无饭吃之民，无衣穿之民，无屋住之民，我们现在建议，请政府给无饭吃的人以饭吃，无衣穿的人以衣穿，无屋住的人以屋住，这不是又一个天字第一号

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之而一一见之于行吗？再退一万步说，就说本刊3卷13期所刊陈之迈先生所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此文曾引起国内外读者广泛的重视，并誉为一极有建设性的文字，然而该文发表以来，已有日矣，政府果曾采纳实行吗？政府果能励精图治，做几件福国利民的事，则又何惧乎民间舆论之抨击；假如政府百事不为，只管自私，则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怨诟！今日大局日非，政权浮动，政府欲加紧其政治控制，取缔一切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就其自私之立场言之，固未尝不近情近理，但就解决国家之困难而言，固南辕北辙，无补实益。假如政府害怕一般社会的动乱因而影响其政权，则政府应以有效方法，以苏民困；民困得苏，社会之动乱自平，此与封不封报纸杂志，风马牛毫不相关。重庆抢米，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宁波抢米，又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老实一句话，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不平之至。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了！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

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一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原载《观察》第4卷第12期，1948年7月17日出版）

评翁文灏内阁

从5月20日总统就职的一天算起，经过10天以上的时间，到5月31日，所谓“行宪首届行政院”的组织工作，才告完成。我们谨就此事发表评论如下：

一、在这次行政院的组织过程中，这个过程本身，饶有政治教育作用。如众所知，这次行政院院长一席，总统本来属意张群，其次则属意何应钦。张何都谦辞不就，才邀翁文灏出长行政院。在过去，我们看到外国一些国家（最好的例子是法国），总统邀张三组阁，张三辞谢，邀李四组阁，李四辞谢，或者一个奉命组阁的大臣，邀此人入阁，此人辞谢，邀那人入阁，那人辞谢，心中

十分纳罕。因为在中国,照过去大家所看到的,只见你抢我夺,唯恐做不到大官,哪有请他做大官而居然不做的道理?这次请张群做,张群不做,请何应钦做,何应钦也辞谢不就;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可说是新鲜的事情。张群何应钦为什么坚辞不就,原因很多,此处不暇详论;我们在此处至少有一点可以说的,即张何两人,都觉得这个行政学院院长,不容易做,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就不敢随便受命,这点极为重要。所以这次张何的坚辞不出,至少使一切热中仕途的人物,或者我们应当更广泛一点说,使一切人民,认识一点,即做官要负责任。调子高一点说,做官要对国家负责任;调子低一点说,做官也得至少对自己的声名前途负点责任。没有把握做好,干脆还是不做。对于国家政治言,这是一种新风气,这是一种新教育。同时,十余年来,中国政治上最有权力的人当然是蒋先生。想做大官的人,最后一关都得要获得蒋先生的同意;蒋先生要派什么人担任什么职务,在通常情形之下,也很少有人辞职不就的。但是这次希望张群蝉联,张群却坚辞不就,请何应钦出长,何应钦也表示万难胜任,弄得这个行政学院院长,一天两天三天的过去,始终提不出人来。对蒋先生言,这也不失为一种新的经验。

二、我们在这次行政院的组织过程中,看到中国的政治,毕竟还落后得很多。总统虽然是5月20日就职的,但是总统的选出却为4月20日之事。新总统产生后,旧的行政院即提出总辞。按照欧洲各国常情,新阁应在一两天之内组织完成。假如在时局特别动荡的时候,新阁甚至希望能在数小时之内组成,使国家的神经中枢不致因政潮的波动而中断太久,俾可应付瞬息万变的局面。我们的新总统和过去的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是一个人,按照正常情形,新的行政院长人选应于总统就职的当天或第二天,由总统咨文立法院,请求同意。这次新的行政院长

人选，直到总统就职后的第五天（5月24日）才提出来，这种情形假如发生在外国，早已构成极度严重的政治危机了。不仅如此，院长人选的提出既已如此迟慢，而翁文灏院长的组阁工作，竟达一周之久，亦属少见。而且这次翁氏的组阁情形，与欧洲一般内阁制国家的组阁情形，很不相同。在外国，我们以法国为例，总统授命某人组阁，此一拜命组阁之大员，必须在数小时或十数小时内，决定他的“内阁”组得成或组不成，以便向总统复命。假如组得成，他当然是首相，假如组不成，他便必须辞谢，由总统另邀他人组阁。所以此人是不是首相，还要看他的组阁工作顺利不顺利而定。这次翁氏出长行政院，是先做“定”了行政院院长，然后再进行组阁的工作；这是和外国一般情形不同的。

三、因为张何不干，结果跳出了一个翁文灏，这在一般人说来，是出了冷门。就一般观感而言，翁氏出长行政院，要比张何出长行政院，情形好些。现在一般人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八面玲珑、遇事敷衍的官僚。官僚最不愿意得罪人，但是怕得罪人就干不出什么事情来，大家总觉得张群圆到有余，劲道不足，所以不一定希望他再做下去，希望愿意做一点事情的人上台做一下。何应钦本人的性情，尚称平和，但他是一个军人，中国人现在都不愿意军人过问行政，所以何应钦出长行政院，一般人也不欢迎。翁文灏的廉洁，是没有问题的，他过去的作风，亦比较朴实。由这样一个人来试试，就事论事，在现局面下，还不失为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不过这次翁氏组阁，不仅没有引用新人，而且完全是旧瓶旧酒；除了副院长顾孟余和秘书长李惟果两位有重量的新人外，其余几乎全是原班人马，这点实在使大家失望。我们并不是说，在翁氏所发表的这一个名单之中，完全没有清廉自守、饱学有识之士，但是这里面也不

见得个个都有良好的政绩，能孚国人之望。不管人民对于政府的观感如何，至少政府自己总应当利用这一个时机，调整人事，使人耳目一新。大家都希望有新人出现，并希望新人越多越好，因为大家对于当前这个局面实在厌倦灰心，总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可是搞了10天，结果还是这样一个名单。是不是没有新人可用呢，还是现在这一副班底就是最好的班底了呢？我们对于这事，简直弄不明白。我们甚至不能了解翁氏这次出长行政院的目的究竟何在！我们看这个名单，哪儿有一点“翁文灏内阁”的味道？不仅人是旧人，最妙的是大都蝉联原有的部会。这样一种组阁，可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没有个性(character)的组阁，或者我们也可说，这个内阁，就是一个没有张群的张群内阁。为什么翁文灏上台，而带领的仍然是一个张群内阁呢？一个新的内阁总理上台，带领的竟是一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旧内阁，我们很少听说过。组了一个星期的阁，到头还是这样一个名单，真是怪事。

四、关于行政院院长的成败问题，我们一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任何人来做行政院院长也都是没有办法的；谁上台就谁倒霉，谁来做就谁牺牲。现在分两层来说。第一，我们认为，除非行政院院长有左右大局的权力，否则他就没有办法来打开当前的局面。在理论上，行政院院长在国家的制度里，是一个负有极大责任的人，也就是说，握有极大权力的人，但是实际上，他到底有多少权力呢？现在政府要打共产党，要打共产党，自然就得用军事，在外国，首相对于军事的得失是负全部责任的，而在中国，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对于军事方面有权力过问吗？没有。假如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打垮共产党，为了爱惜国家的元气，解除人民的痛苦，就应当和共产党和谈，化干戈为玉帛，可是今天做行政院院长

的，有这个魄力使这个战的局面变成为和的局面吗？不像。假如真正要实行宪政，最起码的条件就得使宪法上面所规定的各种基本民权，获得有效的保障，但事实上，人民究竟有无真正的人身、居住、言论、信仰、集会、结社的自由，其权操于党部及特务之手，行政院长有办法把这种权力从党部和特务的手里转移过来吗？没有办法。行政院长是一个政务官，而且是政务官的头儿，然而事实上，中国的行政院长常常只是一个事务官。他所能有的权力，远比他所应有的权力为小，他所能做的事情，远比他所应做的事情为少。假如一个行政院长，他没有权力来决定整个的局面，他怎能有力量来维持这一个局面，或者打开这个局面？第二，我们认为，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要建设就得先求安定，要安定就得先解除人民的苦痛。现在一般农村之间之最大苦痛是征兵征粮，假如内战不停，征兵征粮能够停止吗？一般市民阶级最大的苦痛是币值低落，物价日涨，假如内战不停，币值能稳定吗？物价能涨吗？要改善一般社会的情形，就得增加生产，大规模的着手建设，但是在这烽火遍地的局势下，谈得上建设吗？战火不停，政府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不到全盘的改革。战火不停，政府只能消极地东拉西扯，剜肉补疮，谈不到根本的建设。建国，建国，哪里会在烽火中建起国来！现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内战，一切的困难出在内战，这个僵局的“结”就是内战，只有停止内战，才能救活中国。但是由于前面所述，行政院既没有决定大局的力量，他有什么办法使战乱变成太平？他既没有力量使战乱变成太平，他有什么办法来稳定物价着手建设？现在的行政院长只是一个账房先生，他充其量只能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零用中，撙节一点，他有什么权力可以使这

个破落的门户变为一门昌盛的人家。翁氏出长行政院后，做事情也许可以认真一点，一切中国官场的虚文俗套也许可以减少一点，整个的行政情绪也许可以提高一点。但是要希望翁氏来转捩乾坤，改变一个局面，那假如不是一种幻想，就是一种奢望了。

五、事实的分析是令人悲观的。但是就国家的前途看，我们今日有一点是所能做所应做的，就是我们应当使一个行政院院长是一个行政院长。这就是说，行政院长应有其独立的政策。就行政院长和总统的关系言，应当是总统支持行政院院长的政策，而非行政院长执行总统的政策，就行政院长和立法院的关系言，按照宪法，行政院长应对立法院负责，但行政院长仍然可以在“坚持自己的政策”和“辞职”之间选一条路走，自己的政策不为立法院同意时，即挂冠而去。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上台又下台，两个上台又下台，政策才有改变的可能，局面才有打开的希望。行政院长固然要努力赢取总统的信任和立院的支持，但行政院长最要紧的是要知道人心的向背，得到民间舆论的拥戴。假如前前后后的行政院长都能有这种作风，合则留，不合即去；则即使总统的意志和立院的意见，不与人民的要求符合，迟早也会迫使他们跟上民间的公意的。整个的局势和人心业已动荡到了极点，我们当然希望内阁能够稳定。但是希望内阁不要和人民脱节，较之无条件的企求内阁的稳定，尤为重要。翁氏出长行政院，一般说来，都没有什么异议，我们当然希望翁氏多少有一点成就，但是假如翁氏失败了，我们也不一定就认为是翁氏个人的失败。大势如此，这已不是翁氏等一两人所能撑支得了的了。

6月2日 中山医院

(原载《观察》第4卷第15期，1948年6月5日出版)

吃重·苦斗·尽心 ——《观察》第4卷报告书

我们在一种既无幻想、亦不泄气的情境下宣布：《观察》第4卷业已出齐。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刊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本刊第5卷第1期定8月28日出版。

这半年是一个苦痛的半年。物价的高压，带有政治意味的中伤，以及当前政治环境的险恶，无不使我们在这半年中，身心交瘁，困惫不堪。然而我们在无比的忍耐和沉毅中，终于又苦斗了半年。照大势看，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写《观察》第5卷的卷终报告书，但是我们愿意向读者保证：只要本刊存在一天，我们必定努力一天。

开 支

我们仍旧先从业务方面说起。我们在第3卷报告书中，已经盛言物价波动和币值贬落的情形，可是在第4卷中所遭遇的困难，远较第3卷为甚。在第3卷的6个月中，支出方面，排印工及订工仅上涨300%，稿费上涨300%，员工薪金增加700%，占支出中最大比例的纸，亦仅涨700%，收入方面，售价上涨率为330%。在第4卷中，情形大大不同，在第4卷的六个月中，各种支出，增加的比例，要较第3卷的六个月中所增加的比例，大上六七倍。现将各项数字列表于下：

种 类	4卷1期时	4卷24期时	上涨百分比(约数)
纸(每令)	250万	4200万	1600%
五号字排工(千字)	20万	450万	2200%
六号字排工(千字)	23万	530万	2300%
印工(每令)	42万	950万	2200%
纸型(每面)	75000	170万	2300%
订工(每本)	308元	8000元	2600%
稿费(千字)	20万	400万元	2000%
员工薪津	5000余万(2月份)	14亿(7月份)	2800%

上列开支,排印工及订工的价格,在六个月内一律上涨2200%以上(即22倍)。纸的上涨虽然仅达1600%(16倍),但由于发行数的上升,纸在整个成本里所占的比率,愈来愈高,目前纸在每期全部成本中,已占到65%左右,所以纸价的上跳,我们感受的压迫极大。稿费的调整,上涨率为2000%(20倍)。员工薪金的增加,一方面包括待遇的调整,一方面也包括人员的增加:业务既繁,人手势须比例增添,所以薪工的总开支也跟着增加。至于其他杂项开支,如水、电、电话、煤气、房金、文具、车费等,上涨的百分比也很大。全部开支合拢来算,在这半年之中,增加的百分比平均当在2000%以上。

销 路

本刊的售价,4卷1期是15000元,24期是20万元,上涨的百分比是1300%强。本刊是一个民营刊物,平时全赖业务收入。但是开支在半年中上涨20倍,而售价仅上涨13倍,这个差额,就靠由于发行数急剧上升所增加的利润来弥补。本刊的发行数,第1卷平均为8000份,第2卷16000份,第3卷24000

份,照过去3卷的比例,第4卷的理想发行数应为32000份。但是刊物的发行数越大,它的上升的可能比率越小,加之售价一再调整,所以我们从来就不敢希冀第4卷的发行数能够超过3万份。当4卷1期印24000份时,我们心中,以为假如在第4卷中,万一能够销到3万份,那就是很好的了。但是在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形下,本刊的发行数急剧上升,终于造成5万份的纪录。但是至少在编者自己,对于这种销数急剧增加的情形是没有什么兴奋的;相反地,销路的急剧上升,只有增加我们的不安。我们平时一向愿意“向最好的目标去努力,向最坏的结果去着想”。我们愿意事业循序发展,不愿意一步跨得太快。至少上海的许多书报业同业可以证明,我们曾一再要求他们减少批数,因为我们并不愿意销路跳得这样快。无论是个人,或者是事业,我们应当求根基的牢固,不应当仅求表面的膨胀。爬得快的人跌得也快,膨胀得快的事业垮得也快。也许编者这种性格太“保守”了,但是对于一个务实重行的人,过分意外的膨胀,确不是他心理上所能骤然接受的。同时,销路的增加也增加了编者所担负的担子,而这种担子,事实上已超过了 he 所能负担的能力!销路越是增加,编者发稿的斤量越重,他深感每一篇文章,每一句子,发到印刷所去,无形中负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摆在编者面前的情形,常常使他深夜自省:他已经不适宜做这样一个5万份刊物的主编,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已经跟不上刊物的发展了。他常常在脑子里思索,有没有什么适当的人可以来主持这个刊物,他愿意做一个助手。这绝不是夸大的谦虚,编者的确常常为此惭愧,他觉得他已力竭智拙,有些对不住这个刊物。

从另外一点来说,一般朋友都认为这个刊物确已打进了社会。本刊的主要读者约可分为三类:即青年学生(包括教育界人

士)、公务员(包括军人)以及工商界人士,除这向来有的三种主要读者以外,这个刊物的影响已向多方面放射出去。政府高级官员的阅读本刊,已极普遍。我们并不是说,政府高级官员阅读本刊,足以增加本刊的身价;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讲到后来,本刊究竟是一个政治性的刊物,本刊应当打进他们的阅读生活。军人方面看本刊的也越来越多,多到几乎要在本刊原有的三大类主要读者以外,成为另外独立的一类了。广大职业群众,这些群众平时甚至可说没有任何阅读习惯的,现亦接受本刊的影响。湖北沙市的一个香烟摊贩曾有读者投书寄来(未刊),台湾一个农夫,受了当地党政人员的压迫,也有投书寄来(未刊),南京一个印刷所排字工人也有文章寄来(刊4卷19期),我们在上海亲自知道的,确有许多平时根本没有阅读习惯的群众,现在也要每星期买一本《观察》看看。去夏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招生,公民试题有《试评日常所阅读的日报及刊物》一题,绝大部分的投考中学生都阅读《观察》。我们两年来夜以继日的努力,总算收到了一点小小的效果,但是树高招风,影响越大,招的忌讳也就越大,这也是无可避免的。

回到发行数上说,目前虽然销到5万份,但是由于航空邮资的一涨再涨,以及售价的期期提高,我们相信第5卷的本刊(假如不被查封的话),发行数是一定要下降的。在我们自己,我们希望回跌到3万份左右,假如我们能够稳定在3万份左右,我们就已经很满意的了。究竟如何,且看事实。现在将这半年来本刊各期印数附刊如下:

第2卷	23期	再版	860份
第3卷	第1期	再版	1200份
	第4期	再版	750份
	第6期	再版	1100份

第 4 卷	第 7 期	再版	1 100 份
	第 10 期	再版	1 100 份
	第 1 期	初版	24 000 份
		再版	1 500 份
	第 2 期	初版	25 000 份
		再版	1 000 份
		3 版	1 500 份
	第 3 期	初版	27 000 份
	第 4 期		27 000 份
	第 5 期		28 000 份
	第 6 期		30 000 份
	第 7 期		30 000 份
		再版	1 000 份
	第 8 期		31 000 份
		再版	1 000 份
	第 9 期		32 000 份
		再版	1 000 份
第 10 期		34 000 份	
	再版	1 500 份	
第 11 期		35 000 份	
第 12 期		36 000 份	
第 13 期		40 500 份	
第 14 期		41 500 份	
	再版	1 500 份	
第 15 期		44 500 份	
第 16 期		45 000 份	
第 17 期		46 000 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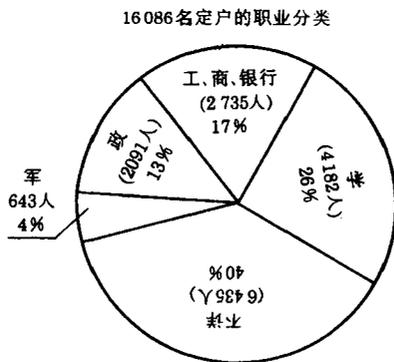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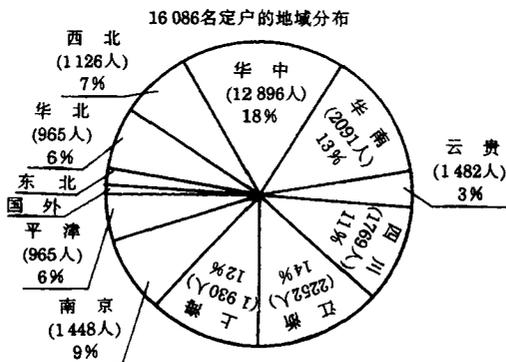
第 18 期	48 000 份
第 19 期	48 000 份
第 20 期	50 000 份
第 21 期	50 000 份
第 22 期	50 000 份
第 23、24 期	50 000 份

定 户

在第 4 卷中,定户也增加得很多。我们过去十分希望我们能实实在在有 6 000 个甚或 8 000 个定户,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定户和我们所希望的数目相差很多。第 1 卷中的实际定户约为 1 600 名,第 2 卷约为 2 500 名,第 3 卷约为 3 300 名。我们在第 3 卷卷终征求定户的目标是 8 000 名,由于许多读者的热烈支持,这个目标终得在第 4 卷中实现。在没有举办半价定户以前,定户数已接近 7 500 名,半价定户举办后,定户的名额骤然增加了 1 500 多定户,达到了 9 000 名左右的纪录。在整个的发行数目中,定户数目在全部发行数中所占的比率,大体上亦甚稳定,兹列表如下:

卷数	定单号码	定单数目	实际定户	发行数	定户数在 发行数中的 百分比
1 卷	1~2709	2 709	1 600 左右	8 000 份	20%
2 卷	2710~7682	4 973	2 500 左右	16 000 份	15.6%
3 卷	7683~14414	6 732	3 300 左右	24 000 份	14.7%
4 卷	14415~28946	16 086	9 000 左右	50 000 份	16%
半价本	1~1554				

关于定户部分,这半年中最大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停收六个月的定户,一件是举办半价定户。停收六个月的定户,完全是因为物价波动得太厉害,为保障本刊的健康,不得不如此。举例言之,当4卷1期未出时,预定六个月仅收20万元,但现在一期就



要售20万元,读者可以想见,假如我们再继续接受六个月的定户,则本刊不知要赔累到什么地步,实际上,照最近物价这个样子的波动,我们连预定三个月都有些踌躇,不过为顾到读者的方便,不好意思再将三个月一定改为二个月一定罢了。(最近日报

已决定半个月一定,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足见物价压力之深。)不过自4卷18期起,我们已将过去“12期收10期的钱”改为“12期收12期的钱”,借以略略弥补由于物价波动太烈而致蒙受的损失。凡此都是很不得已的,只好请定户原谅。

我们久想为清寒读者有一点服务,所以决计在福利金项下拨一部分款子出来举办“半价定户”。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半价定户自4卷13期起举办。我们原定名额1000名,但事实上,超过了预定名额百分之五十,共计1500余名。“半价定户”,我们的本意是为清寒读者所设的,我们并希望以三分之一给予清寒的学生,三分之一给予清寒的公务员(包括军人在内),另以三分之一给后方小城市中的读者,但事实上很难做硬性的分配,而且,这1500名的半价定户中,是否个个都是“清寒”的读者,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证实,所以我们只好在增设半价定户的启事中,最后一条提出良心的呼吁,希望“如非经济极端困难者,幸勿占取‘半价定户’名额,以免剥夺真正经济困难的读者的权利。”但是“良心呼吁”在这个年头,到底有多少效果,实可怀疑。譬如上海一些商业公司里的职员,也来定“半价本”,照普通情形来说,以上海生活程度之高,又在商界供职,论理可以订阅普通本,不必订阅半价本。又如同济大学有一个寝室里倒有四个人来订阅四份“半价本”。照我们的意见,假如他们经济宽裕,便应各定普通本,假如经济困难,便应四人合定一份半价本。但是现在社会上,有便宜货便大家搨拓,既不尊重举办人的原意,也不顾到是否剥夺了他人的权利。这种情形都使我们伤心。此外,定阅“半价本”的,上海因为近水楼台,容易捷脚先登,所以这次的半价定户中,上海及上海附近的读者,占绝大多数。真正后方偏僻角落里的读者,能享受“半价本”权利的,反而寥寥。我们心为不平。我们现在决定,自第5卷起,仍旧继续举办“半价定户”

1 500名(额满截止,不再通融)。但为保障真正清寒读者的权利起见,过去那种自由写信来定,没有一点限制的办法,势须修正。我们现在业已印就一种表格,凡是清寒的读者,希望享受“半价定户”的权利的,请先来函索取表格,填就寄下,由我们审查,通过后才给予订阅“半价本”的权利。这个新办法当然增加我们自己很多的麻烦,并亦增加我们的开支(如表格,复信,审查的人工等),但我们举办“半价定户”的目标既在使真正清寒的读者得到阅读的权利,所以我们亦不避麻烦,务使订阅半价本的读者,都是真正清寒的读者;同时使我们为真正清寒读者服务的初衷,亦得贯彻。

观察丛书

《观察丛书》虽不属于“观察”周刊的范围,但《观察丛书》和《观察》周刊是配搭平行的,成为本社目前两大主要业务,并为一般读者共同关切,所以在此略作报告。我们出版丛书有几个动机:(一)周刊只能刊载短文,并且大都是有时间性的,所以我们另出丛书,以便容纳较有系统,字数亦较多的著作。(二)有许多作者,有著作物出版,而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出版人。所谓合适的出版人,包括水准严谨,出书迅速,印校认真,版税正确等等条件。由于我们过去一年多来和各方作家的合作,他们对于我们业已建树良好的友谊和充分的信任,所以我们愿意来担当这个任务,为许多作者服务。(三)现在一般出版界都很消沉,大家都很少出书,《观察》周刊略有赢余,我们的目的既然不在谋利,愿意以周刊的赢余来帮助丛书的出版,使读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粮,并为消沉的出版界增加一点生气。

《观察丛书》已出九种,大体说来,各方对于我们的努力,批

评良好。各位作者对于我们的出书迅速,印校认真,以及版税的迅速,一致表示满意;读者的反应可于各书预约之多及销行之畅见之。吴恩裕先生的《唯物史观精义》在10天之内销完初版3000册,现已出到四版。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载誉一时,现已出到四版。张东荪先生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一个月以内销完初再两版5000册,现已三版。其余各书大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再版。这些情形在目前的不景气的出版界中,都算是不多见的。

不过,《观察丛书》也不是没有缺点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新写的太少,大部分都是集子。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困难,由于环境的动荡和生活的不安,已很少人能够好好地坐下来写整部头的新书了,这也是一时之间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我们以后当尽力设法增加新写的数量。

此外,还有几件事要一提的:(一)通常出版人和著作人所签订的出版契约,都是由出版人一方面拟就印好的,开列了几十条,把保护出版人的利益的地方,想得周周到到,而著作人只有在印好的契约上签字盖章,毫无发言的余地,甚至契约签了,书隔了两年三年不出版,著作人也毫无办法。我们认为这种情形是不合理的。出版一本书,乃是著作人和出版人的一种合作,对于契约,应当双方都有发言机会,所以我们这次的契约,是由我们先起了草,寄张东荪、潘光旦、朱自清、费孝通四位先生,请他们发表意见(就请他们四位代表后来的作者),然后才缮写签字的。(二)我们的版税最初规定是一年结算四次的,于3、6、9、12四个月月底结算之。第一批六册是4月5月出版的,第二批是7月8月出版的。在通常情形下,第一批六册的第一次版税一定是在6月底付的,第二批四册的第一次版税是在9月底付的,但第一批六册的版税,我们在3月底就付了,第二批四册在7月里

就付了,原因是因为各书发行预约,预约收入中的百分之十五应归作者所有,应归作者所有的,出版人不应搁下不发。在目下物价的情形下,假如应当3月底付的款子搁到6月底再发,那作者真是损失太大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信用及公道的问题,我们办事或做人,都应当Fair。(三)不仅如此,关于版税的结算,我们鉴于6、7两个月中物价上跳的情形,认为三个月一结还是太慢,作者吃的亏还得太大,因之,在7月底我们又进一步的,又一次为中国出版界创一个新的纪录,决定自8月份起,《观察丛书》的版税每月结算一次。我们希望我们这种努力能够对于中国的出版界有一点影响。(四)《观察丛书》出版后,我们收到许多书评,投寄《观察》周刊。但我们为避免嫌疑起见,我们已订下一个原则:《观察》周刊不刊观察社出版的任何书籍的书评。以上数事,都与整个出版界的风气有关,所以我们愿意提出报告。

最后,《观察丛书》是赔本的,即使销路如此好,也还是赔的(因为纸价跳得太快了)。但是在业务上虽然是赔的,在精神上却是有收获的。关于丛书的出版,我们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计划,只是照目前的物价情形,我们简直不敢再在此地有所报告,举例言之,我们出版何永佶先生的这本《中国在戡盘上》,成本要用到25亿以上!事情真不好办!真是太难办了!

业务上的苦痛

业务上的苦痛,一言难尽,现在择要分述如下:

1. 照编者两年来的经验,纯粹就业务的观点说,上海出版事业最大的致命伤就是本地同业的结账办法。上海本地的习惯,是先将刊物或书拿去,隔若干时候再结账付款,在半年以前,我们要在出版以后一个月,甚至一个多月才收到钱。假如物价

不跳,出入还小,现在物价波动得这样厉害,这种结账办法,就变成了我们的生存威胁了。举例言之,今年阴历年关一过,纸价陡然的一百七八十万(一令)跳到500万一令,在短短半个月中上涨三倍;6月里,纸价又在短短半个月中,从600万跳到近2000万;7月初,又接连从2000万跳到4000万。物价这样一日三涨,要在十几天后才收到货款,在收到货款时,一块钱只值半块钱甚至只值三角钱了,所以在2月及6月的两次纸价大涨风中,本刊亏折很多。有一次《大公报》举办出版事业座谈会,文摘社的贾开基先生说:现在销路越大的刊物其危机越大,碰上涨价风,赔得越多。这是内行的话,一点不假。在读者方面,他们都是按照刊物定价实付的,在我们的账面上,也是有利润的,但是实际上则赔了本,就因为十几天后才能收到货款,那时物价已涨了很多,收到的钱甚至补不进原来用去的纸张,以致不能维持再生产的程度。假如一直这样下去,刊物迟早要弄到关门的。所以这半年来,我们在这方面费尽口舌,力求改善。上海同业事实上也有他们的困难,我们也十分了解,所以我们愿意和他们一步一步改善,我们总期我们能够维持再生产的最低要求,因为假如这个最低要求不能达到,出版事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2. 这半年来业务上第二件最伤脑筋的事情,就是有许多地方的定户,收不到刊物。最大的原因就是有许多地方已有出面或不出面的邮政检查制度,经常的或间或的检扣本刊。这种现象很普遍,其中以沈阳、天津、青岛、西安等地情形最严重。这些地方的定户纷纷来函责难,并要求补寄,但补寄的事实上仍旧不能收到。弄到后来在我们方面是复不胜数,补不胜补,在定户方面是责难四起,一片怨声。我们真是苦痛极了。除了“邮检”的原因以外,也有由于中途遗失或者被人误取,因而使定户不能收到本刊的。在读者方面,他们的观点很单纯,认为凡是收不到刊

物,好像责任就得由我们来负。又有些地方,竟会两期同日收到,甚至先收到下一期,后收到上一期的,在这种情形下,读者总疑心是我们没有准期出版。在9 000份的定户管理中,我们也不敢说我们绝无错误或疏忽,假如真是由于我们的错误或疏忽,我们应该向定户道歉,并力求改善,但是假如把一切收不到,或者不能按合理的时间收到的责任都归之于本社,那是冤枉的。从本社发出到到达定户手里,其中要经过许多路程和阶段,在这些路程和阶段中所发生的意外,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这样解释,目的非在推诿责任,我们仅仅希望定户能够了解事实并给予我们体谅。至于我们有错误或疏忽的地方,我们自当随时改正。

3. 定户的来信始终成为本社工作同人最大的负担。来信的内容很杂,最主要的两类就是查失索补和更改地址。刊物遗失的责任不完全在我们一方面,前已言之,但是除了像沈阳、天津、青岛、西安那种大批邮扣,无法补寄以外,其余零星的索补函件,我们大都体谅定户,设法补寄。不过我们愿意在此说明,关于补刊这个问题,我们是非常苦恼的。不补吧,定户自然不满,而且他们残缺一期,定觉遗憾,补吧,不仅是刊物本身的成本,还要包括信袋和邮资,我们的损失是很重的。这个问题真是无法两全。

至于更改地址,我们当然应该照办。不过我们也要解释几句:一、我们每收到一个定户,就要给他一张定单,同时根据定单用蜡纸写成签条,然后油印。所以定户更改地址,我们必须重行写印,所需的人工、蜡纸、油墨、纸张,这笔额外的负担不轻。二、我们每次寄刊,虽于星期五付邮,但是由于定户太多,剪贴标签的工作,在星期一,甚至在上星期六,即须开始,标签剪下以后,即按平寄、挂号、航平、航挂四种分类,分类以后,要在几千个份

数的标签中寻觅一个,就不容易了。所以,举例言之,即使在星期三收到一个定户的来信,要求更改地址,在这个订户自己,以为本星期六的一期必可按照新地址改寄,而事实上,我们要到下星期出版的一期,才能照改。定户不知实际困难,每多来函责难。三、有些定户,在订阅三个月中,要更改地址二次甚或三次的,我们虽然应当照办,但是对于我们确是一重负担。(譬如在7月,由于学校放假了,平均每天都有20个至30个定户来函更改地址。)四、目下交通情形并不正常,刊物的改寄和定户本人的移动,有时不免要脱节,这种情形也只好请定户忍耐原谅,不要一味的责怪我们。

4. “复信问题”是最难使读者满意的一个问题。许多读者为了此事对本社表示不满,或者因为我们搁而不复,或者因为我们复得太迟。我们愿意说明几点:一、我们承认我们过去的复信工作没有做好。编者自己是最恨有信不复的,所以平时一再叮嘱本社同人:读者来函,务必答复。工作同人当然有他们实际上的困难,如来信太多,来不及复等。但是事实上有困难,应当设法解决困难,这是本社内务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内部的困难就将读者的来信搁置不复,(实在没有复的必要的信可以不复)因为假如复信工作做得不好,则无形中就等于在破坏本社的信誉,减低读者对于本社的信任,并抵消本社全体同人在其他方面的努力。所以我们从第5卷起,决定将复信工作,另派专人负责,以免延误。二、来信的太多,其中一部分责任仍应由我们负责,因为假如我们能改进我们的工作效率,如减少错误,避免疏忽,复信迅速等等,则亦可减少来信的数目,所以我们仍应在根本寻觅原因,以期减少来信的数量。(因为大部分的来信都是查询或质问的。)三、我们虽然尽我们的本分,力求改进,但同时也希望读者和我们合作,有许多信件可以不写的,最好不写,俾可节省

双方的时间,现举两例说明:芜湖安徽学院有一位朱建纲先生,3月24日来函查问4卷4期为何没有收到(他是挂号的)。查4卷4期是3月20日出版的,在目前的环境下,上海到芜湖的邮件,偶而不能在四天之内到达,也是一件很可能的事情(挂号本比平寄慢),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希望定户稍为等待一下,勿迳函查询。(像这种信件,我们认为可以不复的。)又如,广州中山大学有一位定户,是新定户,当他看到广州市上已有《观察》出售,而他的一期尚未收到,便来信质问,实则广州市上出售的是航空寄去的,而他的一份是注明要挂号寄的,挂号的当然比航寄的慢。像这类自己没有弄清楚而即来信责难的,例子很多。至于因不注明定单或字迹潦草到无法认清,以致我们无法查或无法复的信件,为数尤多,凡此我们都希望定户体谅,能自行注意,俾间接增加我们的办事效率。四、我们虽然对于复信问题,力求改进,但我们也愿让读者知道,我们复一封复信,成本也是相当大的,平均言之,复一封信至少要花成本15万元左右。假如以7月份为标准,一个职员月薪是1亿,则每天的薪金是330万,一天平均复40封信(因为不仅复,还要查),则每封信的人工成本就要8万元,再加上信封、信纸、邮资及收发人工,当在15万元以上。这样的负担也不算轻了!

5. 最后我们自己也知道,在最近三四个月中,我们得罪了不少读者,这是我们极其苦痛,而又无法可想的。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物价的过度的波动,几乎使我们无法维持正常的营业,特别是购买丛书的,款到时,书价又涨了。假如买二本以上的,还可以以书款迁就书价,譬如本购五册的,给他买四册,本购四册的,给他买三册,购者虽然扫兴,但总算有一交代,最困难的是只购一册的,于是只好去函请其补款,可是购者并不立刻将款补来,搁上10天半月才补,补到时,书价又涨了!像这类情形,真是伤

透脑筋。定户也是如此,由于物价变动太剧,本社登记定户,计算刊费,均照款到时订费为准,但由于定价变动太快,以致定户来款,常常不足,只好酌扣寄刊,读者每不了解,表示不满。

编辑检讨

关于编辑部分,这半年也是苦痛之至。先说专论。按理说,本刊是一个政论刊物,重心应当在专论部分。可是事实上呢,本刊的重心现在已移到“观察通信”上面去了。读者来信或朋友见面,都盛称观察通信的精彩,但是我们读了这种信,听到这种话,内心暗自惭愧。当然,我也愿意很公平地说:专论不像“观察通信”那样容易“讨好”读者,因为通信是雅俗共赏的,专论是硬性的,高级的,不容易使个个读者接受的。不过,本刊专论的不够充实,也是事实。一个原因是好文章本不易多得,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大家对于写政论文章,已经没有什么兴趣。编者在4卷20期《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所说,现在大家都十分消沉,没有兴趣批评政府,这话确是:实际情形。像我们这些办刊物的人,因为职责所在,不能不写,但是一般而论,现在许多人对于当前的局面,都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张东荪先生最近在《增产与革命》一文中开头有几句话,很可代表这一种趋向。张先生认为“时局严重已超过了说话的阶段”,而“向现实的当局说话”,则“自政协被破坏以后久已不做此想”。这一种趋向也多少影响到稿件的来源。编者自然应当尽心尽力,广征佳稿,但是有无成就,不敢先说。

第4卷中比较满意的仍推“观察通信”一栏。编者在第3卷报告书中说:“我们希望第4卷在通信方面仍能保持第3卷的标准。”大体说来,这点算是做到的。观察通信中最出色的当然是

军事通信,也就是这些军事通信,使政府一再对《观察》表示不满,而企图加以封闭。据在政府供职的人说,为什么《观察》的军事通信写得那样好,又详细,又正确?他们说,假如《观察》的军事通信写得不那样正确,政府倒可以不必那样怀疑了!这个逻辑似乎是:政府认为一般社会上的人都是饭桶,只有共产党不是饭桶,所以《观察》的军事通信因为写得太好了,就不免要疑心到共产党一方面去了。其实真是天晓得!过去《观察》有几期军事通信对傅作义稍有颂扬时,左派的记者(《时代日报》)还公开的不负责任的说,说《观察》是傅作义的宣传机关呢。此话真是从何说起!

除“观察通信”外,第4卷中的“国外通信”和“外论选译”两栏,还算正常。国外通信在24期中登了16篇,平均每三期中有两篇。“外论选译”在24期中登了13篇,平均每二期中有一篇。我们希望第5卷中也能保持这个状态。

一般读者对于“书评”一栏的兴趣都不高,本卷24期中只登了六篇。

由于物价的高压,自4卷19期起,篇幅减少,仅出16面。减少篇幅的目的是为了不愿增加读者的负担,但是在编辑上,对此苦痛不堪,因为篇幅减少了,容纳的字数比例减少,文章不能多登,无形中使读者容易发生内容不够充实的感觉。有许多读者来信表示反对,愿意多负担售价,不愿我们减少篇幅。但是来信的读者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读者,不知后方的读者对于这个问题意见如何?第5卷起,究竟恢复20面或仍出16面,我们希望读者表示意见,以供我们参考。

关于投稿录用篇数在全卷所刊文章中所占的百分比,大体上和第3卷差不多。我们愿意在此说明,《观察》的篇幅是绝对公开的,我们十分希望这个刊物能够真正成为全国读者所共有

的刊物。我们不希望一个刊物仅仅只有少数的作者在写稿,而且为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公共舆论,也必须有广大的群众大家来参加,才能增加其力量,因之我们经常盼望有新的作者来参加这个写作的阵营。我们对于投稿,认真阅读,取舍绝无偏私,只要合乎水准的有重量的文章,我们无不乐于刊载。我们希望各地作者读者踊跃惠稿,共同来充实本刊的内容,第4卷中投稿录用数在全卷所刊文章中的百分比,现在统计如下:

栏别	第3卷所刊文章篇数	投稿录用篇数	百分比(约数)
专论	62	18	30%
观察通信	76	29	40%
其他各栏	90	41	45%
共计	228	88	40%

流言与警告

在政治上,这半年来我们始终蒙受不利的打击;大别言之,可分两类。一类是飘浮在空中的无根的流言,一类是当局对于本刊的警告,甚至有查封本刊的意图。先说谣言部分。谣言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笼统的怀疑我们和当局有什么“勾结”,一类则简直很具体的传说本刊已出卖给什么人什么人了。怀疑我们和政府有“勾结”的人的理由是:假如《观察》和政府当局没有“勾结”,为什么《观察》会出版到现在?特别是4月8日《大公报》登了《时与文》和《世界知识》被政府警告以后,这种怀疑格外普遍。因为《观察》不仅没有“问题”,甚至警告也没有,其中必有“花样”。其后我们又听到更为具体的谣言,谣言竟然肯定地说,说《观察》已经出卖给CC了。凡是一种谣言,向例当事人是不大容易听到,或者听到时也已谣传很久了,因为只有很好的朋友

才愿意将这种谣言告诉当事人。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流言时,也只是淡然一笑,其后传说渐盛,有一位关切本刊的读者写了这样一封信来:

编者先生:最近好多人都纷纷地说《观察》月前曾经与CC派谈判过出顶事宜,结果以CC只肯出价60亿而未果。我倒不相信这些话,我只相信你的人格和脾气,但是,为了正如你所说过的“这社会是一个神经极度衰弱的社会”,而且人言可畏,我劝你不要太对这种已经散布得颇广的恶意流言不理不睬。最好你能在4卷13期中拿一小角来辟谣。

PS 记着,一定要辟谣啊!

一高中学生

5月17日

我们读后,对于这位“高中学生”当然是很感激的,但是冷静考虑后,我们仍旧不愿有所表示。其后又有朋友自南京来函,文云:

久不晤教,近况何似,念念。近日道路流言,于先生颇为不利,金言贵刊因已得官价配纸,态度渐趋转变。先生之清操亮节,弟所深知,然啧啧烦言,三人成虎亦不免于惶惑矣。弟于此事,至为关切,盼能以详情见示,用释鄙怀,忝在知交,当不以为渎也。

谣言是哪一方面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也无意知道,假如是由配纸而起,则4月26日苏联方面在沪主办的《时代日报》的出版

消息有下列一段记载：

《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日前赴京列席国大，已于昨日返沪。闻该刊自下月起，新增配纸 180 令，合共 300 令，故将在百物飞涨时维持旧价云。

编者曾在 4 月 24 日出版的 4 卷 9 期上写过一篇《国大评论》。编者为了想评论国大，曾去南京，借了朋友的来宾证，到国大会场旁听一次。就是中共办的《华商报》，也常刊南京通讯，所以到南京去采访新闻，想来不致被视为和政府有何勾结。编者在《国大评论》文中曾述及我曾到国大会场旁听过的话，故《时代日报》所刊编者赴京一节，仍系根据编者《国大评论》一文而来。但在普通常识上，旁听与“列席”有很大的分别，《时代日报》称我为“列席”，究系笔误，还是另有意昧，我弄不清楚。至于配纸，众所周知，都是每季一配，向无每月一配之事。这半年来，我们向书业公会提过好几次抗议，就是 6 月 25 日，我们还去了一封信，说我们在 4、5、6 三个月中用了 1 100 令纸（周刊及丛书），而他们仍给我们 300 美元配额，只够买六七十令，仅敷本社实际需要量的十六分之一。说到头来，自有配纸制度以后，截止今日为止，我们一共还只拿到 130 令纸（仅敷本刊半月之需）。假如《时代日报》该项记载，是一种恶意的中伤，那末我们承认，他们的确相当成功了，因为文化界中到处都在传说，说“《观察》配纸增加了，态度转变了”。最妙的是，天津《益世报》的上海记者，把《时代日报》这个全无根据的消息，全文照抄，打了一个电报到天津。我们曾分别正式去函《时代日报》及天津《益世报》更正，除此之外，我们无意作任何辟谣的解释。我们还是一贯态度，如我们在第 3 卷报告书中所说的：“我们对于一切误会、传说、曲解，不急急

于辩护、辟谣或解释。只要我们自己脚根站定,我们相信‘时间’终将替我们洗刷一切谣言。”

关于政府方面对于本刊的种种,编者不十分详细,兹谨就所知者,报告如下。3月20日,编者接上海市府新闻处来函,邀去一谈,当在上海市府新闻处看到了内政部给《观察》的警告,罪状是“言论偏激,歪曲事实,为匪张目”。这个公文是我亲眼看到的,不过有一个谜始终不能解答,即这个公文我们始终没有收到。当4月8日《大公报》载《时与文》和《世界知识》受到警告时,我们心中还暗自疑心,以为新闻登错了呢,因为内政部警告本刊的公文,是编者亲眼目睹的。不过我们后来也没有去查理此事。由于最近传说政府打算查封《观察》,我们才知道在2、3月间,有人已想查封本刊,但内政部未将查封令发出,可能这就是那个警告令的来历。目前政府对于《观察》最伤脑筋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军事通信,据说在最近半年,政府中好几方面的高级会议,几次讨论到这个问题。政府把这个问题看得极其严重。我们的军事通信实际上也只是报道事实,但事实的发展,常与政府不利,所以政府认为我们这种暴露性的文字,颇足影响士气。最近南京《新民报》被封,政府曾公布一篇罪状,据传《观察》也有同样的一张单子,把过去我们所刊的文字,一一开列。对于封不封的问题,编者已在《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表明态度,此处不赘。政府对于《观察》当然是讨厌的,也许从“军事通信”开刀,在技术上最为顺口。不过目前所有的刊物,大都刊有有关战局通信,假如因为刊载有关战局的通信而要查封,则恐怕将来所有的刊物,都只好被封大吉。我们不知政府对于这种情形,即每一个刊物都有战局通信这一情形,如何处理。至于本刊,这半年以来,有人好几次劝我们不刊战事通信。我们的原则很简单:封或不封,那是政府的“权力”,但我们绝对不愿因为外来的意见而改

变我们的编辑政策。我们的编辑政策是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我们在商标上标明 Nonparty 和 Independent 两字,Independent (独立)是我们的主要精神之一。而我们所以如此者,就因为我们认为:要维持完整的人格,必须保有独立的意志。这个原则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

1948年8月1日

(原载《观察》第4卷第23、24期合刊,1948年8月7日出版)

一场烂污

在全国空前骚动、朝野争战多日之后,政府终于放弃了他那“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限价政策!这是20年来这一个政府第一次在人民前面低头的一个纪录!在这20年中,这一个政府,凭借他的武力,凭借他的组织,凭借他的宣传,统治着中国的人民,搞到现在,弄得民穷财尽,烽火遍地。这次,在全国人民不可抗拒的普遍的唾弃下,他终于屈服了一次!

过去一个月真像是一场恶梦!在这一个月里,数以亿计的人民,在身体上、在财产上,都遭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损失。人民已经经历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可怖的景象。他们不仅早已丧失了人生的理想、创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兴趣,这次,又丧失了他们多年劳动的积储,并更进一步被迫面临死亡。每天在报上读到的,在街上看到的,无不令人气短心伤。饥馑和恐怖、愤怒和怨恨,笼罩了政府所统治着的土地。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金圆券”。抢购抢购,逃卖逃卖,

像大洋上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抢购是一种“无言的反叛”,这是 20 年来中国人民受尽压迫、欺骗、剥削,在种种一言难尽的苦痛经验中所自发的一种求生自卫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自发的,所以这种行为能同时发生在政府统治区域中的大小各地,因为这个风暴已是全国性的,所以这个风暴已经威胁到政府政权的安全。中国的人民是可怜的,在政府种种秘密的监视下不能有什么大规模的组织,因之也不能发生任何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有效力量。这次的全民抢购,骨子里的意思是人民不相信这个政府,然而可怜的久在淫威之下的中国老百姓从来不能正面站起来对政府表示不信任,全民抢购从政治的观点来说也只是一种人民不和政府合作的消极反叛,然而只要是真正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存,即使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或者如我前面所用的一个名词,“无言的反叛”,但也足够震撼政府的命脉。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这是一次崭新的教训。

“纸币”本来只是一张纸,它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的价值都系于发行这个纸币的政府的信用。有一个“市民”曾在上海各大报纸登载大幅的广告,质问一般市民:为什么美国人民有了美钞不去抢购呢?为什么英国人民有了金镑不去抢购呢?为什么中国人民拿了金圆券就要去抢购呢?这问题真是问得漂亮!可是我们反问一下,为什么中国人民在以前(在 10 月 31 日以前),有了美钞英镑并不一定要去抢购物资呢?为什么在中国的美国人英国人有了中国的金圆券,也一样的要把它用掉,不要放在手里呢?稍稍一想,这里面自有道理。严格的说来,要以改革币制来解放中国当前的经济危机,本来是个幻想。发行法币的是这个政府,发行金圆券的也是这个政府,这同一个政府,法币的信用既然不能维持,难道金圆券的信用就能维持了吗?有人认为这次的改革币制和最近的放弃限价,

都是为了人民。实际上真是如此吗？老实说，无非因为当前的经济情景实在不太像样，有点可怕，假如不改，恐怕政府要站不住了！改吧，改吧，乱七八糟先改它一下，暂时麻醉一下人民；后来弄到全国抢购，乖乖不得了，看上去可能要出什么乱子，威胁政权，所以只好放弃限价。这一切，说得漂亮是解除人民的苦痛，骨子里还不是要安定自己的政权？而在改革币制时，政府命令人民将平时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金钞，一律兑成金圆券；政府只要印刷机器转几转，可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了。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战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上海的老百姓都在回想他们在敌伪时期所经过的一切，日本人管得再凶，也没有弄到连饭都没有吃，连买大便纸也要排队的程度；日本人逼得再紧，也没有把民间的金银收完——就靠这点元气，胜利后各地慢慢恢复各种小工商业的活动。现在呢，一切完了，一切完了，作孽作孽，每一个吃亏的老百姓心底里都在咒诅，有一肚皮眼泪说不出来！

70天的梦是过去了，在这70天中，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米油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还有不知多少悲惨的故事报纸上没有传出来。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死难瞑目，阴魂不散的。许多良善的小市民，都听从政府的话，将黄金白银美钞兑给了政府，可是曾几何时，现在的金圆券已比八一九时期打了个对折对折了！惨啊，惨啊！冤啊冤啊！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疾于中吗！

70天是一场小烂污，20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20年来拆足！烂污！

(原载《观察》第5卷第11期，1948年11月6日出版)

政治失常

最近政府有几件事情做得实在不成体统。第一件我们要说的当然是11月11日行政院通过的“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政府在八一九发行金圆券时,规定黄金一两兑换金圆券200元,美金一元兑换金圆券四元,这次的修正办法改为黄金一两兑换金圆券1000元,美金一元兑换金圆券20元,将金圆券贬值了五分之四。政府在发行金圆券时,大唱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调子,并且说谁破坏了金圆券,谁就是国家民族的敌人!现在,我们看,政府自己率先破坏了金圆券,政府自己先就做了国家民族的敌人!当10月杪11月初全国骚动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当局宣布即将有“更好”的办法颁布,所谓“更好”的办法,大概就是这个金圆券发行的修正办法了,其中决定将民间缴兑的金钞吐还出来,以便取之于民者,仍用之于民。然而吃进去的时候,黄金一两只兑金圆券200元,美金一元只兑金圆券四元,现在吐出来时,黄金一两却要金圆券1000元,美金一元却要金圆券20元,一“取”一“用”之间,赚上了五倍,这笔没本钱的买卖真不坏。抗战末期,政府财政困难,宣传黄金储蓄,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到真要支付黄金时,却来了一个六折,凭空扣去四成;这事大家当还记得。现在旧戏新编,又要一手。多年以来,政府把人民当着一团米粉,捏在手里,要圆就圆,要扁就扁。良善的老百姓,一再吃亏,心里恨透,可是没有办法。再说八一九政府的经改办法,规定人民所存金银外币,一律须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逾限而未兑者,即视为触犯刑法,现在又允

许人民持有金钞，并将金钞的价值，提升五倍，以前服从法令的，信任政府的，都算倒了霉，不服从法令的，不信任政府的，反而大大沾了便宜。政府这种行为，一方面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不啻叫人民以后不要再相信政府。事实也一再证明：相信政府的最初总是给政府利用了一下，以后就给政府扔下不理睬了。修正办法第 11 条又说：“凡以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指定之银行，存期满一年者，除照章计息外，并得于存款时以与存款同额之金圆券向存款银行兑换金圆。在金圆未铸成前，得按规定比率兑取黄金或银币。……”一年之后情形如何，谁都不敢说定，而一年以后的金圆券贬值到什么地步，尤其不能想象，假如今天真还有人到中央银行去定期存款，此人殆为白痴无疑。所以这条条文，撕破了脸皮来说，就等于要花 2000 元金圆才能兑到一两黄金；这叫做强明吃一半，暗吃一半，真是算盘精极！

第二件我们要说的是翁文灏内阁的辞职问题。这件事也出乎常情之外。我在 11 月 3 日写了一篇论翁阁辞职的文章，可是 4 日中英文日夜报一律报道，翁氏坚辞，并已不到政院办公，翁阁的总辞书也已全体盖章，即将送府，翁阁之辞，似成定论，深恐文章刊出时，已成马后炮，所以在付印前数小时又临时抽了出来。不料我的文章刚抽了出来，翁氏却又回行政院去办公了。这次经改失败，翁氏的责任无可推诿。真正的来说，这个大责任假如要由翁氏一人负之（财政部部长当然有责任，但财政部隶属于行政院，在政治上，政策的失败，行政院院长的责任远大于部长的责任，故此处不独立论财长的责任），有欠公道，因为拆穿了说，翁也不过是一个账房先生，既不是当家人，也作不了多大主。但就宪法的原则言，这件事总是要翁负责的。所以从政治的责任言，翁的一辞二辞三辞坚辞，都对。问题是他虽坚辞而当时竟未能坚辞到底。这次经改的失败，其性质不可谓不严重，其影响不可谓不广

远,无论就个人的操守言,或就政治的责任言,翁氏绝无继续负责的可能。严格言之,就是10月31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有关经改的补充办法一事,亦属不当。内阁的存亡,主要就看它所执行的政策的成败,政策既败,内阁即垮。八一九的经改办法,政府亦已自承失败,在此种情形下,行政院应当立刻呈辞,任何补充或修改的办法,都应由后来人决策办理。当翁氏上台之初,胡适之先生捧场,谓翁氏有勇气。我觉得当时翁氏并不是有勇气接受那个阁揆大任,他只是没有勇气拒绝总统这个组阁大命罢了。翁氏既无勇气拒绝任命于前,亦无勇气坚决呈辞于后。不错,当前的局势是危急的,政务不宜一日无人主持,但是从宪法原则来说,这个责任是属于总统的,而非属于行政院院长的。易言之,时局既然紧急,总统便应早日另定阁揆之选,已经呈辞并且理在必去的行政院院长,不能因为总统的迟疑不决而勉力维持下去。至于总统先生,行政院院长既然有这样严重的政治责任,其辞呈应无不批准之理;因为假如这样一个有重大政治过失的行政院院长,还不使之去职,则所谓“政治责任”也者,岂不成了好听的空话?翁氏一辞再辞,总统一留再留,已足充分表示总统对翁氏信任之重,以及对僚属气度之厚,假若一味坚留,则既破坏宪政的原则,亦置纲纪于不顾,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都是不当的。

第三件我要批评,而为一般人不注意的,就是中央所赋予傅作义的权力的问题。按照报上的记载,要点有二:一、以后华北军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权处理,不须事前请示中央;二、假如傅氏所颁布的法令与中央所颁布的法令有抵触者,以傅氏所颁布的法令为准。凡此记载,虽未见之正式公报,但也未见政府有何否认更正,想为事实。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举例言之,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议,不得变更之”。现在假如傅氏要变更中华民国固有之疆土,则中央是否承认

傅氏之变更为合法？宪法第 171 条，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假如傅氏所颁布的法令，有与宪法抵触者，则是否仍以傅氏所颁布者为准？凡此都是大有问题的。退一步言之，上面的例子或许不成立，因为只说傅氏的法令与中央的法令抵触者，以傅氏的法令为准，并未说到与“宪法”抵触的情形，如与宪法抵触者，自然无效。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宪法第 116 条明确规定：“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第 117 条说：“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无抵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院解释之”。宪法明白规定地方法令不能与中央法令抵触，抵触者无效。假如今天中央有人主张傅氏的法令如与中央的法令抵触者，应以傅氏的法令为准，这种事情完全是违宪的。在正常情形下，地方法规与中央法律抵触发生疑义时，应由司法院解释之，现在假如硬性承认傅氏法令与中央法令抵触时，即以傅氏法令为主，这是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违宪的。

大局越来越紧，各种现象日见失常，但失常也有一个失常的限度，当权者虽然希望保持他们的政权，但政治的常规究竟不能不“永矢咸遵”。上述三事，都是荦荦大者，实际上，近来当局各种措置，大都有失体统。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然而处此危局，几乎无政可论，无政足论；仰望长空，废笔三叹！

（原载《观察》第 5 卷第 13 期，1948 年 11 月 20 日出版）

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 任务·编辑方针

1946 年元月，我们一些朋友在渝倡议发刊《观察》，以人民

身份,论议国事,期对国家,有所蒞献。经过八个月的筹备,于同年9月1日,在沪创刊。其后历经为公众知悉或不知悉的艰辛颠困,于1948年12月24日出至第5卷第18期时,终遭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迫害:刊物被封,同人被捕,资财损失,社务解体。上海解放以后,在各方的鼓励指导之下,本刊决定复刊,现自11月1日起,继续出版;并为顾到各种实际情形,暂时改为半月出版一期。在本刊停刊的10个月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空前的伟大的具有历史性的变化,为人民多年切恨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之下,终被击垮,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建国的政治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在这个伟大的历史革命中,社会上的一切都跟着时代向前发展。复刊后的《观察》从解放前的《观察》中发展来,成为一个新的《观察》。我们谨于复刊之初,一述我们在这个时代洪流中的新的转变,以及今后的工作方针,借求全国读者的指正。

一、自我批评,学习改造

我们倡议发刊《观察》,正在日寇投降之后,旧政协召开之日。蒋介石窃国当权,前后垂20年,20年专政的结果,民生日敝,国运日蹙。日寇既告战败,正是中国翻身的千载良机;毛主席赴渝商谈,尤为国运黯淡中最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筹出《观察》,是想稍尽人民责任,加强民主力量,督促国家建设。无如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一意孤行,逞强作乱,撕毁政协,迫害民主。他只顾他一己的权势,无视国家的前途;纵容他的皇亲国舅,家奴党棍,到处搜刮,吸吮民脂,对于人民苦痛,漠无所动。还要昧尽天良,舔着美帝的屁股,残杀本国的人民,使人切齿痛

恨。忧国之士，目击这种腐败黑暗的反动统治，迫于义愤，誓难缄默。自从本刊创刊以来，我们始终以人民的身份，一本正义，满怀热情，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痛加抨击，坚决斗争，即使特务环伺，刀枪当前，亦仍言所欲言，一往直前。

坦白言之，我们在政治上不是没有理想的。在那个时候，消极地，我们认为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是绝对要不得的，绝对没有理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积极地，我们希望改造我们的社会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境界。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上述的理想，走怎样一条道路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在我们的内心里是空洞的、徬徨的。我们有理想，但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

解放以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都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这个新的境界和我们过去所接触的、所了解的、所追求的，在基本是完全不同的。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每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但是由于中国有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恩列斯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以及由这样一个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武力——人民解放军的日益壮大，今天，武装的革命力量打垮了武装的反革命力量，把中国的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中解放了出来，使一切在怀疑中的、苦闷中的、徬徨中的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正确的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而中国的人

民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却是由中国共产党介绍的。“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次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帮助了所有的中国人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重新来确立自己的人生观。我们现在大家得到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机会,我们应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觉悟,并进而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我们在各种实际工作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学习与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开始走第一步。在我们开始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去解剖揭发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自己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致我们在客观上不知不觉地好像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我们的确是具有一腔热忱,愿意献出我们所有的生命与智慧为人民服务,但这几年来,我们并未和日益壮大

的人民力量联系起来，只孤立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因之这些工作，便都不免流于自流，不能建立有组织性的群众基础。……这一切，在今天，我们应该勇敢地毫无保留地给自己以无情的批评。有些朋友认为在过去的那种环境中，我们只能做到那样程度；朋友们用环境的困难来原谅我们或者慰励我们的这种好意，我们是感激的，但我们自己不愿用“环境”来掩饰、来辩护我们过去在工作中所表现的缺点，因为造成我们过去在工作中所表现的缺点的，基本的原因不是环境上的困难，而是我们思想上的落后。

现在，我们大家找到了新的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给我们介绍了马列主义这一普遍真理。马列主义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或者呆板的条文，我们学习马列主义，要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实际的具体的工作里去。在中国，把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我们的伟大的领袖，他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历史革命中，把革命理论和具体实践结合了起来。他是中国人民的灯塔，他是中国人民的舵手。他带领中国人民从黑暗渡到光明，从旧的社会走进新的社会。我们应当在他的伟大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自己，改造我们的国家。

我们还愿在此更进一步告诉所有国内国外的人们：今天中国的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共和毛主席的，这种拥护完全是自发的，出于真情的。在过去，我们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受尽了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欺侮、污辱，但是今天，我们这 47 500 万中国人在中共及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站起来了。在国内，由于长时期的反动的封建的统治，我们的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已腐败溃烂到了极点，到处是恶势力，到处是不合

理,若干爱国之士,左思右索,东撞西摸,总找不到国家的出路,总看不到国家的生机,但是现在,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一切旧的、腐烂的、黑暗的,即将全部加以拔除,使新的、健康的、光明的,洒遍在中国的大地之上。这真像是一次奇迹,但却却是活生生的事实。毛主席及中共许多领袖先生的阔大深厚,人民解放军的严明坚强,中共同志的刻苦耐劳,使中国人民倾心折服,一致景从。帝国主义者还想在中国觅求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一方面暴露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未死,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实际情形。今天中国的人民,都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克勤克俭、务老务实地从事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本社同人,将在这样一个新的认识下,站在文化岗位上,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民主事业努力。

二、工作任务

《观察》过去发行了两年半,它的最高发行数是 105 000 份(包括华北航空版及台湾航空版)。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刊物复刊的主要意义不是在延续它过去的纪录,而是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分担一部分工作任务。复刊后的《观察》的工作任务,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说。先说对读者的部分。《观察》过去的读者,就数量上说,假定每份平均以 10 个人阅读计算,它的实际读者约在 100 万人以上。就读者的阶层来说,它的主要的读者包括着广大的学生群众、公务人员、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就发行的分布来说,除华东、华北、华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以及华中、华西、西北、西南的内地大城市以外,它的发行广泛地渗入了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一直达到边疆省份的辽远角

落。在这样广阔地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数以百万计算的读者群众中,在解放以前,在思想上,已经有一部分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读者,他们早就跑在我们前面了;解放以后,这种跑在我们前面的进步的青年的读者,在数量上更加多了,但是我们相信,在广大的地域、广大的群众中,像我们自己这样在思想上比较落后,而又有一种要求进步的意愿,决心努力学习、加紧改造自己的朋友,也一定是很多的。今天政府的政策,除了对那些少数的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以外,对于广大的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域中的人民群众,都是要照顾的。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思想上、知识上、工作上、生活上,各人的情况彼此不一,因之这种照顾的工作,也就必须要有很多的人在一个总的方向和不同的方式下,来分工负担。在我们这方面,本刊应当特别照顾的,就是那些和我们自己情况相近,即思想上比较落后而又具有要求进步的意愿的广大读者群众。在我们自己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带着我们的读者一起学习;在我们自己力求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带着我们的读者一起进步。互相勉励,互相教育,互相督促,互相帮助,使大家在现有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提高。

对于那些跑在我们前面的进步的青年学生读者,我们在此对他们表示最大的最热烈的敬意。在他们面前,我们是惭愧的,但是一想到我们的国家毕竟进步了,我们又为国家的前途和光明而庆慰。对于这批进步的读者,我们一方面敬重他们,愿意跟在他们后面学习,一方面我们还诚恳地希望他们继续鼓励和帮助我们,帮助这个刊物以及这个刊物所带领的读者,是他们的一种工作,一种责任。由于今天中国社会上封建主义的余毒还很普遍,前进青年在和旧社会的斗争中可能还会遭遇到困难和挫折,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保证我们一定热情地支持这批前进青

年,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来鼓舞他们的勇气,坚定他们的信心。同时,在知识上,我们也将就力之所及,不断地继续供给他们,以弥补他们有时工作和文化不能兼顾的缺憾。

其次说我们的任务中对政府的一部分。人民解放战争在基本上已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全面的建设工作即将开始。我们应当多方面多地联系一切进步的学者、专家、工程师、对于主办生产事业有实际经验的人,以及目前正在主持实际生产事业的人,根据他们过去10年20年30年以上的研究生活,根据他们过去多年从事实际工作的宝贵经验,在即将到来的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的高潮中,撰写专文,提供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计划、方案、报告,以供社会讨论,以供政府参考,使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进行,尽可能更完美,更迅速。此外,我们应当介绍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家的各种事务中所反映的意见,使政府得到更多的机会了解民间的意见以及他们在工作及生活中所存在着的种种困难。对于各级政府有违反政策或有所偏向的行为,本刊亦应根据具体事实,提出积极性的批评,帮助政府推行建国的工作。本刊并将站在舆论的立场,协助人民监察机关,监督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忠实执行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及一切决议。

三、编辑计划·工作态度

本刊过去编制上的特点是综合性,分栏选材,力求多样,借以照顾到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本刊今后的编制仍拟维持这一个原则,务使每期内容,不致流于单调。从本卷起,我们决定增设社论一栏,陈述本社同人对于半月中所发生的国内外大事的意见。“专论”栏包括马列主义理论的介绍研究,思想改造的讨

论,以及对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各种问题的论述。一个建议而附有具体的计划或方案者,列入“建议与方案”栏;这栏是新增的,但这栏的稿件也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又新增了“报告”一栏,包括工作报告、学习报告、调查报告及参观报告等,目的是希望各方面把实际的工作经验、学习经验或调查参观所得,提供出来,彼此交流。又新增了“介绍与翻译”一栏,希望对苏联及东欧各人民共和国多做一点介绍工作。特别是对于我们伟大的先进的友邦苏联,无论在政治理论上、科学技术上、建设经验上,我们以后必须对他们多学习,多了解,所以对于苏联的介绍,更为切要。“观察通信”仍旧保存,不过内容上有了根本的改变。过去的通信大都是暴露性的、批判性的,今后的通信应该是积极性的、鼓舞性的。只要我们能深入群众,联系群众,通信的题材应当是比过去更为广大的。国外通信需要时间联系,一时不可能多刊国外的通信,我们当逐渐地努力去建立我们的国外通信网。“人物及事业”一栏,侧重介绍战斗、生产、劳动、妇女各方面的代表性的英雄人物,并介绍有利于人民的各方面的有全国规模性的各种生产事业。我们打算把过去的“读者投书”一栏改为“读者讨论”栏,供给读者讨论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或其他关涉国家各种事务的片断的建设性的意见。关于这一栏,我们当在下一期或下二期再作比较详细的说明。本刊过去有一个时期曾按期刊载一页“观察漫画”,后因篇幅缩减,未能继续,现在决定恢复。本刊过去又有一栏“观察文摘”,摘刊刊载于全国各地报刊上的重要文字,使本刊的读者阅读本刊时,能同时阅读到散布在全国各地报刊上的有价值的文章。我们决定继续保持这一栏。以上是本刊编制的一个轮廓,在实际编辑中可能还要有一点灵活的变通。这些栏目我们究能做到多少,一方面要看我们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要看各地作者读者能给我

们多少帮助。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向这样一个目标去进行我们的编辑工作。

在工作中,我们将充分建立集体主义的工作态度。在我们编辑部的内部,各种编辑工作都将在集体讨论的方式进行,希望在这样一种工作态度下,能减少或减轻我们所可能发生的错误。这种集体主义的工作态度,我们希望能够同样应用到我们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上,对于文章的内容彼此能有交换意见的机会,使我们的编辑工作不致流入自流。我们顺便在这儿说明,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今后处理稿件的时间,包括用舍的决定及稿费的致送,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迅速,这点请求作者原谅。最后,我们还希望更进一步把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广泛地扩大到本刊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希望读者一方面踊跃惠稿,一方面能对本刊的内容经常提供意见。意见从读者群间提出来,到达编辑部,经过编辑部的讨论研究,再传达到作者群间,最后,把反映了读者意见和接纳了读者的意见的刊物,仍旧送达到读者之前,使这个刊物能成为读者、作者、编者三方面努力合作的一个结晶。

此外,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将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时时接受群众的意见,时时检查自己的缺点和可能发生的错误。我们将小心谨慎,实事求是,在最大的努力下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我们深知在我们的工作中是存在着许多困难的。掌握问题能不能正确?稿件来源有没有把握?业务收入够不够自给?这一切困难都活生生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应付困难的唯一道路,是面向困难,提高耐心,在一点一点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去完成我们的工作。

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广大的读者们!我们从我们的心底里发出一股凝紧而热烈的感情,在这儿遥遥地向你们招手,呼唤。我

们很坦白率真地向你们陈述,复刊后的《观察》,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十分软弱的。但是我们努力学习、改造自己的意愿却是坚定的。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希望我们大家结合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教育,一步一步的前进,一步一步的提高。我们也希望一切先进的朋友带领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是国家的工作,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读者进步,也就是帮助我们的国家进步。

1949年10月16日

(原载《观察》第6卷第1期,1949年11月1日出版。

本文是《观察》的复刊辞,发表时署名《本社同人》)

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30日闭幕;在它最后一天选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正式诞生,中央人民政府也在同一天公告成立,并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秘书长,任命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政务院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又任命了政务院的副总理、政务委员、正副秘书长,及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委员、正副总参谋长,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副检察长和委员,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正副主任。除了某些部门的副职尚在协商以外,中央人

民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员，绝大部分已经任命公布，各部门并已先后成立，开始工作，负起为人民服务、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艰巨任务。我们于庆贺之余，谨述我们的认识如下：

一、这个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坚强的政府。单从负责人员的数字上说，就已发表的名单计算，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包括了：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 人、副主席 6 人、委员 56 人；

政务院总理 1 人、副总理 4 人、政务委员 15 人、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 5 人；4 个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共 170 人；各部、会、院、署、行的部长、副部长，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院长、副院长，署长、副署长，行长、副行长等共 175 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 30 人；

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委员 17 人；

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委员 14 人；再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主任、副主任 5 人，正巧是整整的 500 名。这样一个堂堂阵容，负责人员达到 500 名的中央政府，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的，在世界也是少有的。

这样一个大阵容的中央政府是在什么一种政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呢？组成这样一个大阵容的中央政府的主要政治基础就是由各革命阶层各革命党派构成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远在大革命时代，即倡导统一战线；这次召开的人民政协就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是统一战线并不限于召开政协，协商国事；统一战线的工作将扩大到、贯彻到国家事务中的各种部门和各个方面。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这次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任命，是在统一战线这一基础上

进行的。无论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院、署等，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及各方面的专家共同参加的。甚至10月28日政务院发表的32名参事名单以及后此可能陆续发表的其他人员名单，都是、或将都是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任命的。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是事前协商，这次政府各项负责人员的名单，就都是事前经过各方充分协商的。

在这样一种根据统一战线的基础、事前经过各方充分协商而组织的政府，无论在政策上或行政上，都将表现出它出色的特点。就政策方面说，由于统一战线的确立，由于事前的充分协商，所有参加政府的各党派各分子，在没有参加政府以前，在政治上就必须先已达到共同的了解，这一个共同的了解，就是1949年9月29日下午3时55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七天会议上所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后此参加政府的各党派各分子共同遵守的、服从的、忠实执行的政治纲领。这个《共同纲领》，在日后当然会因社会本身的发展而需要适当地修改，但这种修改的工作也必然是在统一战线事前协商的精神下进行的；因之，这也就保证了我们政府的政治纲领的连续性、一贯性，以及各党派各分子忠实遵守的一致性。在行政方面说，由于政府的组织是在统一战线之下进行的，由于参加制订《共同纲领》的各党派共同参加了政府的各个部门，因之，这就避免了将政府的工作人员分为政务人员和事务人员两类，使政策的制订者及政策的执行

者分裂为二；在新成立的政府中，由于统一战线的确立，执行政策的人和制订政策的人是贯通的、一气的、在一个总的政治认识下推进行政工作的。

二、统一战线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组成分子包括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而领导这个统一战线的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在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组成的政府，也必然是有领导的；领导这个新成立的政府的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恩列斯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在他过去 28 年艰苦困难的奋斗中，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及人民大革命中，具体的事实一贯地证明了他领导的正确性，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找寻真理。那时大家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以为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可以救我们的国家。但是中国人虽然向西方学得不少，可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的奋斗，多次的尝试，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性的运动，都失败了，大家产生了怀疑。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广大人民的心目中开始破产。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俄国人的介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这次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中国的广大人民，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介绍，得到学习马列主义的机会，坚决认识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文化救不了我们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必须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必须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只有这样，才能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

阶级的消灭和世界大同的境界。而领导我们向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进的,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因之,在我们讨论政府的时候,从行政的观点来说,无论是哪一个党的党员,当他在政府中工作时,他应当按照行政组织的系统,发生领导与服从的关系;但从政治的观点来说,无论是哪一个党的党员,或者是没有党派的人士,无论他在哪一个政府部门工作,在政治上,他是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领导的。

从这次公布的政府各项负责人员的名单来看,人员的配置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中,是切实地负起了巨大的领导责任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政府中切实参加、切实负起了领导责任,这也就保证了我们新政府的稳定性、坚强性,和前进的正确性。由于中国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必然赢得中国广大人民的全力支持的。

三、我们的新政府业已成立,各项负责人员的名单也已公布,政府各部门已先后开始工作。我们一方面庆贺我们国家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方面也愿意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政府表示一些我们发乎心底的期望。我们的国家,在长期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特别是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二十多年的当权下,百政不举,疮痍满目。讲人民的生活,则人民的生活苦到了极点;讲国家的元气,则国家的元气斲丧殆尽;讲工业的建设,则工业的基础薄弱得可怜。建国工作,千头万绪;建国责任,斤量艰巨。今天中国的人民,在黑暗中熬忍多时,终于等到天亮,对于新成立的政府,是一片赤心,爱护支持,但是同时,对于新成立的政府,也就必然怀有很高的期望。我们真是在这儿流着眼泪写这篇文章,中国的人民是何等热情

地、殷切地期望着我们的国家能够一天一天的进步，一天一天的富强。今天我们的中央政府的负责人员凡达 500 人之多，这 500 多人都是国家人才的精华。我们绝对信任他们，信任他们都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管理国家的事务，一方面要有热烈的、坚决的、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一方面也要有丰富的、结实的管理国家事务的经验和才能。这次政务院所属 30 个行政部门，有的是接收原华北人民政府的机构的，在执行业务的条件上，多少有了些基础，有的则是完全新创，一切都要经过摸索与创造。在 500 名左右的负责人员中，大都具有了丰富的政治或行政经验，但对于掌理国家全面事务，也还是一种新的经验和新的学习。越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在物质基础上太落后了，在建国的工作中也就越会感到困难；越是因为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太殷切了，今天负责掌理国家事务责任的人也就越会感到自己责任的艰巨。但是毛主席号召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努力赶上。我们希望我们的新政府在用人上，尽量注意人才；在行政上，总期提高效率。我们赤诚地希望他们尽心尽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使我们的国家早日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境界。

四、对于国内广大的人民，我们也愿意说几句话，以求互相教育，互相勉励。我们的国家经过长期的、黑暗的、腐败的、无望的统治，今天终于获得了新生、希望和光明。中国广大人民，在这样一种境遇和心情之下，不免满怀兴奋，感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一下子就能变好。不过我们在感情上尽管热烈，但是在理智上还是需要冷静。须知我们的国家，地区是这样广阔，人口是这样众多，而国家的元气又是这样虚弱，工业的基础这样单薄，要把这样一个国家，变落后为先进，变破坏为建设，变贫穷为富裕，这不是一个短时期内所能实现的事情。建设一个国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天下没有奇迹，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全凭感情上的主

观期望,希望我们的政府在一夜之间就把我们的国家搞好。说老实话,我们今天还谈不到全面性的建设,按照我们今天国家的条件,我们所能做的工作,还是属于恢复和整理的阶段;甚至即使恢复和整理,今天摆在政府面前,急切需要去做的工作,也还不知有多少,一切都要在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原则下,稳步地做去。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可能照顾了全面的,暂时照顾不到局部的;照顾了大的重要的,暂时照顾不到小的次要的;或者这一部门多照顾一点,那一部门少照顾一点;或者这一部门早照顾了一点,那一部门迟照顾了一点。照顾是都要照顾的,但是为了顾到实际的条件,不能不有缓急轻重之分。个别人民从他个人的利益、环境、观点出发,看若干问题事象,一时期内可能会感到不满足的。但是假如我们能冷静地,放开胸境,抛弃小我,就全面看一看,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国家毕竟得到了新生,毕竟有了光明的前途了。在目前这过渡期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许多缺点和困难的,但是只要在大前提下,国家是在一天一天进步,政府是真正在替人民做事,我们就应提高耐心,体谅政府。我们应当帮助政府解决困难,而不是替政府增加困难。今天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敌对的关系。对于国家的事务,我们也不应再抱一种袖手旁观,或者一切依赖政府的态度。政府人力有限,他并不能承揽国家建设中的全部工作。政府的主要责任乃是领导人民来从事国家的建设,主要还是要靠人民与政府结合起来,打成一片,大家来积极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只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经过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初步地建立成一个健全的国家,而一般人民的生活也将在这种情况下之下一步一步的提高、改善。

11月5日 北京

(原载《观察》第6卷第2期,1949年11月16日出版)

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 工作和监狱工作

本文为记者所著《东北参观报告》一书哈尔滨一章中的第二篇。参观时间是今年5月，记述时间是今年8月。

一、哈尔滨人民法院的工作

我们没有去东北以前，早就听到朋友传述关于东北老区中司法的改革的情形。传说的人都盛称那种以人民利益为本位的司法精神，以及以“司法的最高任务在改造”为出发点的监狱工作，所以我们到达哈尔滨后，了解哈市的司法工作及监狱情况，便成为我们参观日程中一个很突出的课目。

司法是国家制度中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他们的学者虽然极力辩护，说司法并非单为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设，而是为了保障全体公民的公平的法权，但事实上，在那些国家中，法律只是保障既得利益阶级、剥削劳动大众的工具，而司法就是现实这样一种性质的法律的制度。中国俗语有云：“法院大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14个字说得透彻之至，钱就是“理”，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受到法律的保障，没有钱的人就变成法律欺侮的对象。再进一步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得到知识，才能利用他的知识去保障他自己的权利，反抗他人的压迫，没有钱的人就没有得到知识的机会，就要受人的剥

削,就要终身为资本家流血流汗,牺牲至死。旧的社会制度既然是剥削劳动大众的,旧的社会制度中的一部分——司法制度,也必然是保障有钱的资本家,剥削没有钱的劳动大众的。革命的目的在推翻这种剥削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司法制度也势将有个彻底的改革,以符合保障人民利益的目的。

新中国的新的司法制度,目前尚在创造之中,所以我们对老解放区中的司法工作及监狱工作的状况,先有一个参观了解的机会,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 * *

哈尔滨市人民法院是 1946 年 8 月 23 日成立的,他的任务在维护革命法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及国家利益。哈尔滨过去本来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名的复杂的坏码头,各种不良分子都聚集在这个城市里,各种犯罪的行为,都发生在这个城市里。但自从中共进入哈市以后,总的来说,社会秩序有很大的改进。自从哈市人民法院 1946 年 8 月成立后,到 1949 年 3 月为止,共审判刑事案件 4 896 件,民事案件 3 900 件,非讼案件 3 501 件,三项共计 12 297 件。其中的民事案件虽然数字上升,但犯罪案件则逐年减少。1948 年度的刑事案件是 1 827 件,比 1947 年度的 2 055 件减少了 228 件,亦即下降了 11% 强。在监狱收押犯人人数上,1948 年度共收 2 688 人,比 1947 年度的 3 581 名减少了 893 名,亦即下降了 25%。以哈市人口与收监犯人的比例来说,1947 年度的收监犯人仅占哈市人口的 0.44%,1948 年度则下降为 0.33%。

我们现在分五点来叙述哈市人民法院两年半以来的工作情况:

一、法律问题。一般人不明实情,以为解放区没有法律,或者不讲法律,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解放区是讲法律的,而且是很尊重法律的。在解放区中,一般人对于法律的看法是:法律是

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不可侵犯，所以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当然也不可侵犯。

不过由于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还在研究设计之中，所以统一的法律尚未订出，新的司法制度确立有待，在一切都在摸索与过渡的阶段之中，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一部分人不根据具体情况，仅仅笼统的按照过去的形式来测量今日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以为解放区没有法律，这是错误的。哈市人民法院的王怀安院长说，他们审判案件，大都是有法规作根据的。总的来说，东北施政纲领是今天东北解放区的根本法。个别的来说，关于财产人权，有人权保障法为根据；土地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土地法大纲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补充办法；债务则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处理债务的条文……当然，这些法规条文，都是单行的，今天还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全盘的法律，但是全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目前这个过渡时期即成过去，自然会有一套系统的法律产生。

有明文规定的单行法规，即照单行法规审案，没有法规根据的，就根据政策审案。判决的轻重，要看：（一）所犯的罪行违反人民的利益到什么程度；（二）犯罪行为的性质，如所采的犯罪手段、犯罪的动机等，恶到什么程度；（三）犯人对于自己所犯过失的态度如何等，来分别处理。同时，即使有条文根据者，审判时，亦应入情人理，耐心说服，不应官僚主义地完全死背法律条文。

二、审判制度。仍旧是三级三审制，即县市法院、省法院，东北人民法院，一共三级。关于律师，在原则上，仍旧承认律师制度，但是暂时不准律师出庭。旧社会中的事实说明法律上虽然规定人人均可聘请律师为其辩护，但由于律师业务是私人经营的，取费甚昂，所以只有有钱的人才能请得起律师，没有钱的人就没有力量去聘律师为其辩护。而且在过去，由于律师品质

的不齐,有的律师名为法律的保障者,实际上成为法律的破坏者,从中制造纠纷,剥削当事人,对于社会破坏多而贡献少。东北当局,在这个过渡时期,决定暂时不准律师出庭,俾使司法工作更能接近群众。为了便利当事人诉讼起见,1948年5月2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指示各地法院可采以下办法,即(一)设立缮状处,免费或低价代人民缮写诉状;(二)准许人民以言词控诉,由法律人员加以笔录,不必拘泥状纸形式;(三)监狱设缮状员,专为监犯免费写诉状。这些办法都是使司法工作直接深入群众,使人民处处便利。

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现在还没有能够推行。按照苏联的办法,苏联宪法103条规定:“各级法院之审理案件,除法律特别规定之情形外,由人民陪审员参加举行之”。按照1938年苏联法院的组织法,凡享有选举权的国民,皆得为人民陪审员,而且这种人民陪审员的选举,是采取全民普选制的,即由各区公民按选举区选举的,也并无财产、身份、教育等等限制。而且其他各国采用陪审制,通常仅限于刑事一部分,其权限亦有一定,不参与案件的审问,在苏联,人民陪审员,民刑事均可参加,并在执行职务时,享受法官的各种权力,即对于庭审的延期与否、证人应出席与否、犯罪者应逮捕与否,以及证人与犯罪者的审问,人民陪审员都有发言的权力。这种人民陪审员制度,使人民直接参加司法工作,使司法工作直接深入民间,将来中国可能也要采用。但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在东北老区中,还未能试验推行。

三、案件情况。两年多来,哈市人民法院处理的民事案件,以婚姻案件占大多数。婚姻案件的内容,包括离婚、解除婚约及姘居案件,而姘居案件在婚姻案件中又占到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是哈市特有的现象,因为哈市姘居情形比较普遍,假如姘居几年后不愿再姘,那就要要求分散。婚姻问题中包括着虐待、重婚等

等问题,所以婚姻案件的增加,也可以反映女性群众的觉悟,要求从旧的封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民事案件的第二位则为房屋案件,包括租权上的纠纷等等。此外则为商业性案件及一般财产纠纷。

刑事案件中最多的偷窃案件,这类案件在刑事案件中占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哈市有一种惯窃,他们有句俗话:“娼妓是他的妈,监狱是他的家。”这种惯窃,毫无生产技能,只有偷窃技巧,生活堕落,意识无赖。最初人民法院采取宽大政策,加以说服,稍押即释。但他们出狱后,还是继续偷窃,老百姓提抗议,说捉了又放,放了又偷,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对于这些人,刑期较长,可能长到二年三年之久,并重视改造,进行教育,教他生产技能,改变他的劳动态度。这些惯窃都是有组织的,一人入狱,其他同党即担任输送,常常送好的东西给他吃,所以虽在狱中,生活仍很舒适,现在已禁止送东西给惯窃吃,并要求他们长期劳动,希望在劳动中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哈市人民法院成立以来,以处理案件的总数来说,可说是一年比一年多,但其中主要增加的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则显示下降的趋向。刑事案件的数字下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表示社会的治安在进步之中。民事案件的增加,要分两层来分析。第一先分析民事原告的阶级,以1949年前三个月哈市人民法院所处理的1040件民事案件为例,在这1040名民事当事人中,工人234人,占22.5%,城市贫民269人,占25.9%,独立劳动者132人,占12.6%,三者合计占当事人的61%左右。这些劳动大众,在旧社会中,是被剥削的、被压迫的,现在社会翻了身,这些一向被人踩在脚下的人,也抬起头来,不愿再受人家的欺侮、压迫、剥削,所以大部分的民事案件都是由他们原告,这是社会翻身过程中必然的现象。第二个原因是诉讼的程序非常简单,不用状

子,不收讼费。在审判的过程中,法官也没有什么架子,以亲切谈话的方式来调解民间的纠纷,人民因为“打官司”太方便了,以致过去许多不必要打的“官司”,如夫妇之间的一时口角等,现在也牵到法院里来。

现在结案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一般说来,根据过去的经验,案件在一周内结案者,占到 46%,二周内结案者,占 30%,案件中的 90%都可以在一个月內结案。过去那种打官司要打上十年八年,甚至子承其父地打下去的情形,现在是没有了,这也是新社会中新司法的特色。

四、外侨案件。哈尔滨 80 万人口中,外侨有 3 万,国籍有二十几国,其中以苏联波兰二国侨民最多,这两国的侨民占到外侨总数的 90%。

外侨人数在哈尔滨总人口中,虽然只占到 4%弱,但在司法案件中,外侨案件却要占到 20%左右。在外侨案件中,根据 1948 年度的统计:

原告华人	被告外人	占 18.1%
原告外人	被告华人	占 37.5%
原告外人	被告外人	占 41.5%

对于外侨诉讼案件,是根据主权独立、民族平等,及劳动人民间的国际主义精神来处理的。凡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者,统予保护,违反法令者,统予制裁。审判外侨时,法官用中文,外侨可用该国语言,另再翻译。在 1948 年度外侨民事案件 253 件中,当事人有苏联、朝鲜、波兰、匈牙利、日本、伊朗、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腊九个国籍,再算上非讼案件,则还要加上南斯拉夫、葡萄牙、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一共 15 个国籍。在 1948 年度审理的刑事案件 127 件中,因违反我人民政府法令而被判处刑者,有 172 名,其中六名被处极刑。外侨在中国的法院的判决下,被

处死刑,在中国的司法历史上是新的纪录。

五、监狱问题。新社会中的监狱作风和旧社会中的监狱作风在基本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新旧政权的性质在基本上就彼此不同。在旧社会中,监狱的作风是恐怖与黑暗,在监狱中严刑拷打,有时肚子也吃不饱,卫生方面则又脏又臭,不通空气,整个的环境使人恐怖畏惧,利用恐怖来使人不敢犯法,这种情形完全是消极的。新社会中的整个司法的精神是教育和改造,在监狱中,给犯人以“人”的待遇,顾到他们的饱暖,顾到他们的卫生,告诉他们犯罪的原因,提出新的人生态度,要他们改造,要他们重新做人,变成社会上积极有用的人,教他们生产的技能,要他们从事劳动,并提高文化的学习,积极实行了“通过劳动改造犯人”、“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结合”的方针。执行这样一个监狱工作,最初是会遇到许多困难的。首先要使在监狱中工作的干部,面向犯人,要爱护犯人,照顾犯人,教育犯人,把犯人当做“人”来看待。八一五后修理监狱时,他们先修监房,办公室和职员宿舍则放在最后修。去年有一次扭秧歌时,也扭给犯人看。最初有的干部不愿意,说平时审问犯人,现在在犯人面前扭秧歌,下次再审问他们时,岂不是没有“尊严”了吗?但是为了要贯彻干部面向犯人的作风,所以决定试一试,结果犯人大乐,犯人看到推事也居然来扭秧歌给他们看,犯人觉得人民法院看重他们,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关于生活上一些问题,如大小便、灭虱子等,均由监狱干部和犯人在一起讨论,共同努力,力求改善。大概犯人初入监狱,一天到晚就只想出来,可是经过半年的教育,劳动成了习惯,都愿在狱中学得一技之长,以便期满后出狱后可以自力谋生。犯人有各种生活小组与生产小组,力谋自给自足,借以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犯人经过教育后,都能自发工作,并努力立功。狱中的外侨犯人,在生活上、劳动上,都和中国犯人同样

待遇,同样管理,外侨犯人中也有立功的。至于在监狱中组织生产,应该实行“组织在监生产与社会就业相结合”的原则,换句话说,教犯人生产技能,并不应从监狱本身的条件或利益为出发点,应顾到犯人出狱后就业的难易,以及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需要。举例来说,为了适应北满条件,最近哈尔滨监狱中除了已有的许多工场以外,又增设了马尾工场,一方面使学会了这项技能的犯人,出狱以后,就可以立刻得到职业,另一方面社会上也确实需要这种技术工人。

二、哈尔滨监狱参观记

哈尔滨监狱可实在不像一所“监狱”。当我们刚刚进门的时候,这就像一所住宅,或者说,一家“公馆”,门口及周围气象,没有一点“监狱”的味儿。最出乎意外的是:我们进去后先在他们的会议室休息,这间大会议室,四壁和天花板都油漆一新(是紫罗兰色的图案),天花板上垂下的电灯罩也是富丽堂皇,比普通机关里的会客室或议事室漂亮得多,而这样一间漂亮的会议室,就是监狱中的犯人合作修起来的。

在监狱的内部,也不像监狱,而是像一所学校,或者充其量像一家工厂,除了部分犯人,如特务、重犯、未决犯等,还像是在“监狱”中的样儿,固定地被看守在监房中以外,其余绝大部分的犯人,都在各工场做工,是很自由的。监房共分老监房、已判监房、未判监房、病监、女监五种。一般说来,监房里的光线和空气,都是足够的,只有一两间监房里面的犯人比较拥挤一点,这多少是受了房屋限制的影响。一律是双层大铺,被褥整齐。我们去参观时,被看守在监房里的犯人,有的在读书(课本是“犯人初级读本”),有的在记笔记,有的在下象棋,在一个走廊的角落

里,还有两个犯人在那儿编剧本。有一个未判监房中,有一个犯人正在读报给其他犯人听,大家脸上都显出津津有味的样子。有犯人俱乐部,下分四系一室,即福利系、卫生系、教育系、文艺系,及资料室。犯人有犯人的壁报,我们看到犯人写的字,画的画,都不差。另外有一大间图书室,有书1500册左右,犯人可以借到监房里去阅读,图书室的管理人员也是由犯人中推选出来自动担任的。每天午后1时至2时半,是学习时间,学习的内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学习、文化学习、业务学习,晚上或者讨论,或者娱乐。女监也非常干净,女犯大都坐在铺上做缝纫工作,其中还有几个苏联女犯;女犯案件中最多的是通奸,其次是偷窃。生了病的犯人另外有病监,使病犯和普通犯人隔离,以便治疗。

哈尔滨监狱的主要特点,除了我们上面所提到过的“通过劳动改造犯人”,“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结合”之外,最使人钦佩的,就是监狱能自行组织,从事生产,在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增加国库的负担。哈尔滨监狱中的生产组织,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值得广为宣扬的经验,可供全国各地的监狱引为模范。1947年春天以后,东北当局决定监狱要搞生产,以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这样,可以使国家对于每个监狱只要负担最初一个时期的经费,不致长期支付,借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哈尔滨监狱于1947年7月,领得生产基金500万(东北券,在我们参观东北时,折合人民币约为16600余元),就以这个500万元起家,搞到1948年10月,已能达到经常1000个犯人的经费自给。这500万在当时只能用来购买一些简单的工具如斧、锄等,当时就由犯人出外去做零工,在劳动所得中,慢慢儿的把生产资本累积起来,才能慢慢儿在监狱内建立工场。工场中的机器则由政府拨给。现在监狱内已有猪鬃、被服、印刷、织布、铁工、木工等六个工场。织布工场中就有30架织布机,织白布及毛巾等物,我们

是5月9日去参观的,看到墙上所张贴的前一天(5月8日)的生产纪录是五四式布65匹,毛巾40打。在印刷工场中,排字部、印刷部、装订部、绘版部、制版部,设备粗具,印刷机有七架,切纸机有二架。在被服工场中,缝纫机多到50余架,做军服及子弹袋等。不仅工作的人是犯人,就是管理及记账的人也都是犯人。犯人一般工作时期是每日八小时,另加学习二小时,但与军需有关者,可能每日工作10小时。在这种生产努力中,到1947年冬天,在监狱经费上,办公费及犯人菜金即能达到自给的程度。1948年10月,就达到了经常1000犯人的经费自给,包括着1000犯人的囚粮、菜金、囚衣、取暖、医药、办公、修葺各费在内。1949年起,除了上述各费的全部自给外,还有盈余。根据1949年4月的统计,生产的收入共达4054608分。每“分”按照当时哈尔滨的物价,约值东北券8000元左右,这就是说,哈尔滨监狱1949年4月的生产收入,当在东北券300亿元以上(这是一个不精确的约数,目的在使读者有一个概念)。在这个收入里,分配开支如下:

犯人经费自给	25%
再生产投资	40%
房屋修葺费	26%
现金周转金	9%

监狱生产在性质上是一种国库收入,所以在法院及监狱中的工作干部,他们是国家的公务员,他们的薪金费用由政府负担,并不在犯人生产收入中支付。监狱生产收入仅限于上列三种用途,即经费自给、扩大生产及修理监狱,这三种用途以外,再有多余,即归国库。监狱的会计是独立的,除了政府指派的会计外,日常账目都是发动由犯人自己来管理的。犯人因为知道有人在剥削他们的劳动生产,所以生产情绪都普遍提高。

在监狱中,劳动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教育,但各工场的生产都有一定的标准,超过了标准的,可以得到奖励金。犯人工作好不好,以下列四点为标准,即数量质量、节省原料、互助精神及学习成绩。好不好先由犯人开会公评,最后由监狱决定。去年有一个犯人,他的母亲去看他时,千方百计凑一点款子,想带给她在狱中的儿子零花,因为在旧社会中,犯人没有钱便要在狱中吃苦头的,不料那个犯人非但不要他母亲带来的钱,并且因为狱中刚刚发了他7000元的奖励金,反而分给他母亲4000元。他母亲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有这样的事,回去后就到处说,现在的人民政府真好,犯人进了监狱,不仅不吃苦头,还会挣钱,她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到了极点。犯人得到奖励后,最初大都用来买零吃的东西花了,最近在监狱的教育下,都改变了,都用来作购买书籍文具了。

犯人的劳动收入虽然很多,但犯人的生活标准,不能超过普通的老百姓,因为假如超过了老百姓的生活标准,则老百姓就要说话,说他们犯了法,可是生活倒反而比老百姓好了。这样就要犯脱离群众路线的错误。不过由于监狱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犯人都生活在有组织的情况之下,所以卫生水准要比外面一般老百姓为高。在伪满时,犯人的死亡率高到15%,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百分比。由于人民政府重视人民的生命,改善卫生环境,哈尔滨监狱1947年的犯人死亡率为1.8%,1948年则更降为0.8%了。

犯人期满出狱时,除“出狱证明书”外,还有一个由狱中发给的“鉴定书”,说明他在狱中的各种情形。他出去报新户口时,邻居都会要求看这些文件的。

在东北解放区中,不能以金钱来代替刑罚,所以在监狱中,还没有罚款代刑的事情,但是假如犯人的在狱已超过原判的三

分之二,他的坦白态度和工作态度特别好,也可酌量予以减刑。

1949年8月记于北京

(原载《观察》第6卷第4期,1949年12月16日出版)

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 劳资、税制、互助情况

本文为记者所著《东北参观报告》一书大连一章中第三篇。

一、生产情况

旅大地区,在行政上自成一个单位,它的农村情形和东北一般地区不同,记者现在根据在大连参观时所得到的一些材料,对旅大地区农村中几种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旅大地区解放以后,农村中一度发生一种不安的情绪。由于辽南海南等周围地区都进行了土改,一般农民以为其他解放区既都实行了土改,旅大地区想来不久也要实行,于是没有土地的贫雇农,就放下荒地不开,有的甚至因为久等不见分地,把自己已经分到的荒地抛弃,跑到别处去等待分地。地主富农阶级则心里发生恐慌,“反正我的地保不长了”,“快卖掉,先落几个钱再说”,发生卖地、抛荒、杀牛、卖马等不好现象。地主富农对于经营土地既不积极,恐惧雇工要很高的工钱,提很多的条件,也就不敢、不愿多雇雇工。这种现象都足以影响农村的生产,并形成雇工的失业和劳动力的流散,面对这种情形,旅大当局对于农

民,积极进行教育与说服。一方面由关东公署(后称旅大行政公署)出了布告,明文保障土地的所有权,使地主富农安心,一方面又召开农业生产动员大会,并深入农村进行视察,告诉一般农民,由于旅大环境的特殊,目前还不能像其他解放区一样的实行土改。旅大当局希望一般农民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安心生产,大力开荒,多生产粮食,生活自将得到改善。对于地主富农的生产情绪,当局认为必须有很好的掌握,因为他们在农村中占有百分之三十的良好土地和充分的耕畜力,在增产粮食的任务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应该多方面的向他们解释政府现行政策法令,使他们不要对生产徘徊不前,无中生有的顾虑得失。对于贫农的生产情绪,应加以鼓励发扬,使他们开荒拉粪,样样努力,对于他们缺粮、缺耕畜、缺农具、土地不足的等等实际困难,应该帮助他们解决。

旅大地区既然暂时还不能实行土改,因之决定把官有土地无代价的分给农民。旅大地区的土地不多,但荒地却不少。要农业生产,必须大力开荒,将荒地变成良田。旅大地区 1948 年的经济建设计划大纲中关于农业部分,决定本年度开荒 7 万亩,其中金县 3 万亩,旅顺 2 万亩,大连县 2 万亩,由公署规定凡是公有荒地或闲地,本区居民都可以呈请区县政府批准开垦或耕种。对于有劳力而无土地的贫农、贫苦失业的工人,以及缺少土地的中农,更应予以开垦或耕种的优先权。每年开公有荒地生地三亩以上,熟荒六亩以上者,不但免征农业所得税,并且予以土地所有权。开私有荒地者,业主不得横加阻拦,要订立契约,限定期限,不收租粮,不得无故抽回土地,开荒人也可以取得永佃权。此外,为了帮助农民解决有关肥料、种籽、农具等的困难,公署除了贷给农民麦种 50 万斤,苞米 75 000 斤以外,并准备了农业贷款 14.775 亿元(关东券),此外又购办了 5 000 吨的肥田

粉,200吨棉种,以及很大数量的板车,贷给或卖给农民。

按照旅大地区1948年经济建设计划大纲中农业部分的计划,预定(一)1948年度要比1947年度的粮食总产量14.3万吨增产4万吨(18万石)。(二)开荒7万亩。(三)恢复旧有的水田6000亩,水田的收获一般说来要比旱田的收获多一倍以上。(四)解决肥料问题,努力积肥,本区各城市之粪便全部投入农业生产,积极争取所需肥田粉之进口。(五)扩大雨季作物面积,普遍提倡种棉、种麻、种花生、种地瓜。地边草格,广植瓜豆,增加副食品生产。其中关于植棉部分,打算植棉三万亩。对于植棉者一律免征农业所得税,棉种由政府免费发给。收获时,可以拿棉花向政府交换食粮、布匹或其他物资,如果年成不好,收获减少,受有损失时,政府还要按照标准产量,补偿他的损失。花生也是旅大地区的特产之一,在生活上,可以供给油类,在贸易上,可以换回更多的必需物资,所以政府对于种植花生的利润,也将给予保障。(六)奖励与培植果类生产,整理果树园,除供本区需要外,争取出口。公署规定,已经经营的果树园是不能随便改种大田的,若须改种大田,须在事前请求政府批准。至于果树所用的各种农药喷雾器,已由政府和工厂联系嘱其制造。生产中所遭遇的困难,政府答应随时为之解决,将来收果时,公署亦将计划帮助运销其他地方,或加工制成其他物品,所以希望经营果树的,照旧经营。(七)为增加粮食生产,适当的缩小原有菜园面积,因为蔬菜和其他大田不同,有土就可以种,大家应当多利用闲地、荒堰、草格,栽植瓜菜。特别是城市里的居民,更应设法自力更生,不要只依靠农民,应该实行寸土必耕,多采野菜、海菜,补足副食品,以资备荒。(八)要保护森林。(九)要奖励畜牧事业,增加牲畜繁殖,提倡养猪、养羊、养鸡、养蜂等副业生产。

1948年度的施政总结,在基本上都超过了原来的数字,原定1948年度增产粮食4万吨,结果则增产了65 035吨。开荒原定7万亩,结果开荒95 119亩。投入全区农民的肥料,除大粪76 181吨,农村积肥1 087 736吨外,实发肥田粉4 955吨,平均每亩得肥田粉5斤、大粪80斤,农村积肥1 142斤。农民一般的意见,认为1948年度增产之多,肥田粉起了很大的作用。

旅大地区1949~1950两年经济建设计划大纲中所规定的农林畜牧生产,其数字如下:

	1949年	1950年
食粮	212 000吨	223 000吨
稻子	1 237吨	1 583吨
地瓜	46 000吨	90 938吨
花生	6 200吨	8 640吨
水果	16 722吨	17 767吨
蔬菜	76 573吨	103 783吨
植树	200万株	200万株
育苗	1 000万株	1 000万株
耕畜	4 500头	4 500头
猪	4 500头	4 500头
鸡	40万只	50万只

1949年投入农业生产的资金为10亿元(关东券)。

二、租佃关系

旅大地区在目前阶段还不能实行土改,必须团结农村中各阶层,共同为农业生产而奋斗,为了加强农村各阶层的团结,

使大家能安心生产，公署于1948年2月19日制订“关东地区农村土地租佃关系调整暂行办法”，一方面保障土地所有权，一方面保障租地人的租耕权，并规定，业佃双方应协同农会于春耕以前，订立与更换契约，于土地所在村公所备案。租约的期限可由双方议定，但租约期限，一般应在三年至五年，世代佃租土地及种满20年的土地，承租人得要求订立10年以上的租约。

“暂行办法”规定：出租人不得无故抽地、撤地，或增加不利于承租人的租佃条件。承租人原有永佃权及依法取得永佃权者，应保留其永佃权（无永佃权者应再另定）。主佃租约期满时，出租人有自由处置之权，如出典、出卖、自耕及雇人耕种等，但如继续出租时，原承租人有租种之优先权。同时，出租人如必须出典、出卖租期未届满的土地时，原承租人得依原租约的继续租种该项土地，并有权优先典买此项土地。如出租人收回自耕时，原承租人对出租人要求赔偿契约规定之损失。

租约尚未满期的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将土地收回：（一）承租人自愿放弃其租种权者（应于秋收前三个月通知出租人）。（二）承租人无故不耕，荒废土地达一年者。（三）承租人有力交租而故意不交者。（四）承租人耕作怠惰，致产量降低至公署规定标准产量半数以下者。

出租人因无法生活，要求将尚未满期的土地收回自耕时，应由各县市政府调查业佃双方实际情况，进行仲裁，并将结果报告公署。

严禁包租、转租。如承租人将土地转租时，出租人应即将此项土地直接租与第二承租人，其转租而致租额加重者，加重部分须由原租人如数退还第二承租人。

关于租金，在佃农方面，自然是要求能够减租，甚或不交

租，而地主方面，想多收租，或者害怕不交租。关于这个问题，公署也有规定，在春耕以前，业佃双方会同农会，三面谈妥，希望你不多要我不少给，公署认为从地主方面来说，应照顾农民生产情绪，不应多要，在佃农方面，签字订约后，应按约交租。

三、劳资关系

和前述《关东地区农村土地租佃关系调整暂行办法》颁布同日，公署为了调整农村劳资关系增进农业生产，保障雇工生活和雇主经营利润，加强主雇团结，又制订了一个《关东地区农村劳资关系调整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对于旅大地区农村一切园艺、庄田、畜牧等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都是适用的，办法内容如下：

一、雇工等类：凡服役于固定雇主半年以上者，称为长工；凡临时服役于一定雇主者，称为短工；凡具有农业经营技术者，称为农业技术人（俗称把头）；凡成年身强力壮从事于一般农艺劳役者称为一般雇工；凡老弱、童工、女工等从事于杂役劳动者称为杂役工人（俗称小工）。

二、雇工工资：凡雇工均依习惯由雇主供给宿食及习惯待遇。此外另按雇工平均工资，规定中等工资标准如下：把头，每年800斤（以苞米为计算单位，斤为市斤），一般雇工每年600斤，杂役工人每年250斤，短工依照市价由主雇双方按期协定之。

三、工资支付：长工工资支付期得按照农家过去习惯每年三大节（春节、端午、中秋）前支付之。短工不论日工月工。均应按日按月付清。雇工因婚丧家属疾病等需款时，雇主得预支工资一部分，在工资支付时扣除之，但不得加算利息。如遇欠收之

年,雇主无力付资外,其工资支付由主雇双方协议之,凡丰收之年,雇主得予雇工以适当奖励,以保证其劳动情绪。

四、工作时间与假日:雇工劳动时间,依农业经营之需要,视农忙或农闲而定。雇工休假日,除依习惯规定外,并得于“五一”劳动节、“八一五”、“八二二”、国庆日各放假一天。凡经协议规定假日,工资照发。

五、病伤:凡雇工因疾病暂时不能工作者,得依契约规定民主双方协议解决之。雇工因工致伤者,有权向雇主请求全治疗费,因工致死及致伤而成残废丧失工作能力者。得按雇主之经济能力给予埋葬费、抚恤费,其数目由主雇双方自行协议解决之。

六、劳动权利与义务:雇工有参加工会农会进行一切民主建设活动,及在农闲期工闲期参加学习知识技能之自由权利,雇主不得干涉,但以不妨碍生产工作为限。雇工如故意怠工经劝说仍不改悔者,或雇工不受雇主及把头正当指挥,妨碍生产经劝说仍不改悔者,以及雇工有不正当行为情形较重者,雇主有权要求村政权机关协助解雇之。主雇双方发生纠纷时,得经村政权机关调解,调解无效时,由区以上政府处理之。

七、劳动契约:主雇双方应订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契约,约满时双方都有宣告解雇之权。如在契约执行期间,双方同意解约时,可行解约,如一方认为必须解约而发生争执时,得由村政权机关调解解决之,如调解无效时,呈请区以上政府处理之。

四、农业所得税

一、征收范围及减免条件

旅大地区农业所得税征收的范围,按照旅大行政公署颁行

的 1949 年度农业所得税条例，分为两类，甲类包括花生、地瓜、地豆、菜园、果园、稻田等，乙类包括高粱、苞米、谷子、大豆等。

但是有几种情形是可以免征或减征农业所得税的：

一、凡遭受下列灾害的作物，可以免征农业所得税：

1. 被水灾全部淹没的各种作物。
2. 被台风全部摧毁的各种作物。
3. 被海雾全部吹死的各种作物。
4. 遭受其他灾害而全部毁灭的作物。

这些灾害按实际受灾面积免除负担。

二、凡种植下列作物者，予以奖励，免征农业所得税：

1. 栽植纤维作物如棉、麻等的土地。
2. 新立果树园由第四年至得利期间(苹果八年，梨六年，桃四年)。

三、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得将土地扣除之：

1. 新开生荒未满四年及开熟荒未满二年者。
2. 宅地、墓地、交通用地及公用泥场、石场。
3. 林野及未开垦的等外地。
4. 在一个地号耕地内不能开垦的部分。
5. 政府经营之试验农场、种畜场、苗圃、采种圃。

四、凡属下列人员经该管辖市县府核准，得减征或免征农业所得税：

1. 贫苦之鳏、寡、孤、独、废疾、其生活无法维持者。
2. 烈士及军警外调干部之贫苦遗属及家属。
3. 对人民有特殊贡献及勋助者。

二、土地等级及产量标准

旅大当局把旅大的农耕土地分为若干级,各级土地都规定了一个标准产量,按照 1948 年关东公署所颁布的农业所得税条例中,各级土地的标准产量规定如下:

一级地	每亩 60 市斤
二级地	120 市斤
三级地	190 市斤
四级地	250 市斤
五级地	300 市斤
六级地	370 市斤

不过 1949 年度旅大地区各地产量不一,具体规定固定统一的标准产量,困难很多,所以在 1949 年度的农业所得税条例里,采取原则规定,灵活执行的办法,由各市县根据 1949 年当地作物的具体情况,折扣计算,大体上,甲类作物一般按 1948 年度的标准产量计算,不打折扣(个别情形例外),乙类作物全区原则分为四成、五成、六成三种年景,平均折合为 1948 年五成以上的年景,由各市县按具体情况规定区村年量和产量。

三、税率和成本的扣除

农业所得税是根据土地等级、标准产量,及每人的平均收获量,依累进率征收的。

每人每年平均收量自 120 市斤到 1 000 市斤者,按税率表计算征收,1 000 市斤以上者,平均产量每增加 10 斤,累进率增进千分之三(不足 10 斤者,不得照 10 斤税率计算),每人每年平均产量 1 200 市斤以上者,累进率不再增加,兹将自 120 斤至 995 斤的累进税率及实征计算,制表如下:

每人平均产量	税率	应征额	扣成本	实征额
120斤	%	斤两	斤两	斤两分
	0.90	1.08	0.11	0.97
125	1.00	1.25	0.13	1.12
130	1.11	1.43	0.14	1.29
135	1.20	1.62	0.16	1.46
140	1.30	1.82	0.18	1.64
145	1.40	2.03	0.20	1.83
150	1.50	2.25	0.23	2.02
160	1.70	2.72	0.27	2.45
170	1.90	3.23	0.32	2.91
180	2.10	3.78	0.38	3.40
190	2.30	4.37	0.44	3.93
200	2.50	5.00	0.50	4.50
250	3.50	8.75	0.88	7.87
300	4.60	13.80	1.38	12.42
350	5.80	20.30	2.03	18.27
400	7.00	28.00	2.80	25.20
500	9.40	47.00	4.70	42.30
600	12.70	76.20	7.62	68.58
700	16.30	114.10	11.41	102.69
800	20.25	162.00	16.20	145.80
900	25.25	227.25	22.73	204.52
995	30.00	298.50	29.85	268.65

凡出租土地收租粮者,对其租粮部分,按原税额增加百分之五十计算征收,但是所收租粮每人每年不足200斤,以及鳏、寡、孤、独、残废,确属无耕作能力,每人每年收租粮不足300斤,经区政府证明县政府批准者,可以仍照原税额征收。

自耕地一律从应征额内扣除百分之十,作为农具、种籽、肥料等等的成本。但是出租地、代管地、公有地,对土地所有者不予扣除。地主兼自耕农者,仅对其自耕部分扣除成本。佃户须由收获量内扣除地租后,再从应征税额内扣除成本。农户饲养

的耕畜：牛、驴、牝猪，每头每年从总产量中扣去食粮 100 斤，马、骡每匹每年扣去食粮 200 斤，以为它们的饲料。但若不是耕畜，如供运输用、乘客、马车、运货马车的牲畜，以及不能耕作的牲畜，都不得扣除饲料。至于牲畜贩，卖者饲养的牲畜，自然更不得扣除饲料了。

四、计算与征收

关于计算与征收，是以人为计算单位，户为征收单位，关于在家人口，各户不分男女老幼，均以《农业所得税条例》公布日（1948 年 9 月 20 日）户口簿记载的人口计算，参军及外调干部均按在家人口计算。依靠纳税者为生活的亲属，亦以在家人口计算（但须至农业所得税条例公布日吃饭满六个月以上者）。依靠家庭供给的学生，均以在家人口计算。雇用的一切长工，列入雇主家中计算。其他人员，如童养媳、妾及农村中的火夫、保姆、勤杂人员等，自《农业所得税条例》公布日，凡在家吃饭满六个月者，均按在家人口计算，凡领取薪俸的党、政、警、教、民等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医务人员、工程师、专门家、工人和中学以上的公费生（私费生不在此限）等，均不得按在家人口计算。土地委托他人代管代耕者，庙宇教堂寺院祭田等土地出租者，出租人全家外出而回家取租粮者，以及养老及小份子土地，均按一人计算。机关团体学校的公有耕地 20 亩以内者按一人计算，40 亩以内者按二人计算，60 亩以内者按三人计算，以此类推，如果户口查不清者，每户均按一人计算。一户在二个市县或二个市县以上有土地者，未按期向土地所在市县政府进行登记时，各该市县均按最高税率分别计算与征收之。

对于新立的果树园及已开垦的等外地折合计算办法是，新立的果树园自登记日起，三年内按原面积之半数计算，已开垦的

等外地,于免税期满后,按新规定等级计算。

各种作物统以扬净晒干的苞米为计算单位。缴杂粮者,可按下列折合苞米标准计算:

高粱	1斤5两
谷子	1斤6两
大豆	1斤
花生	1斤2两
稻子	1斤
白苞米	1斤2两

至于果树园、菜园等,可按苞米时价折合通币缴纳苞米时价,随时通告。

五、农村中的几种互助形式

农村生产中有三个基本条件,即土地、人力,和耕畜工具。在没有实行土改的地区,地主富农占有了土地和耕畜工具,但是缺乏劳动力,贫农有劳动力,但是缺乏土地和耕畜工具,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多打粮食,在农村中就必须提倡劳动互助。像在旅大地区,对于贫农,首先要解决他们的牲口问题,对于地主富农,要帮助他们解决劳动力问题,使缺乏耕畜的得到耕畜,缺乏劳动力的得到劳动力,使双方有利,互补长短,各方照顾,使大家来完成增产的任务。旅大地区,农村中的互助形式,大体上可有两种,一种是农村旧有的互助形式——掰犊,另一种则是合作劳动。从高度组织与发挥劳动力来看,后者当然比前者为好为进步,但一切社会制度都是跟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现在旅大地区,甚至东北其他广大地区,农村中实行的劳动互助,还是旧形式的占多数,不过使内容尽量合理,顾到各方面的利益,特别

要照顾贫农及中农的利益,不像过去那样,贫农帮一辈子穷一辈子,实际是给地主富农剥削,新的互助变工,必须自愿两利,公平合理。

大连县政府在1948年度曾有一个互助工作的总结报告,根据半年来各地群众的创造,提出几种互助形式,认为是各地可以参照使用的。第一种是分散帮工和合伙帮工的不同。旧式的帮工都是分散的帮工,这是过去贫农、中农、富农间进行劳畜力交换的主要形式,但在这种形式下,正如前面所说过的,贫农帮一辈子穷一辈子,帮上了工就成了地主富农家的长驻短工,什么时候用着就什么时候去,贫农全部为富农所左右。贫农不但耕种不及时,即使在劳力上也同样要先给牲口主做。有牲口的中农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对贫农的剥削,这种分散帮工,虽然有些改进,如对象固定了,不像过去的苦苦哀求,还求不到,贫农使用牲口,也不像从前一切任凭牲口主的调度了,但它的严重的缺点还是存在着的,譬如分散还工分散要工,有许多贫农还不起,因为要工都在生活(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要是还了牲口主的工,就不免要耽搁了自己的工。劳力强的变为常任短工或变相雇工,多被富农收买,劳力弱的,很少能够得到还工,种后还粮又还不起。在这种情形下,贫农在农村中一切都处于仰人鼻息的地位,而富农在农村中可以左右一切。

根据大连县政府的经验,认为合伙帮工的形式优于分散帮工。所谓合伙帮工,就是参加互助组的贫农,以有组织的优越劳力,团结成为一个单位,合伙的向富农帮工,使贫农成为一个力量,能够和牲口户站在比较平等的地位上,进行互助,形成双方互相有求于人,而不再是贫农求富农的局面。同时强弱劳动力可以得到调剂,弱劳力也有还工的机会。发挥了共同劳动的效能,还工与自己的工,都不致耽搁。组织集中,便于团结教育。

1948年大连县农村中已部分施行，群众的反映很好。这种形式对于牲口数多的地区，即以牲口为中心的劳动互助，均极适用。

但是有许多地方，土地多而牲口力少，单纯以牲口为中心的帮工，感觉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推行一种人畜变工的协作方式，大连由家屯曾推行过这种方式，值得各地参考。由家屯第八间共有39户，其中4户没有土地，两户拉马车，他们是不参加互助的，其余33户都有土地，共计307亩，其中又有13户是不能参加耕作的（六户鳏寡，七户工厂工人），其余20户合计14整个劳动力，有两户富农，雇两个工人，两犍牲口，13户不能参加耕作者，交全间捎种，平均每犍牲口负担土地153亩，每个劳动力平均担负20亩，全间原编为四个组，两个劳力组，两犍牲口组。春耕播种开始，全间即实行变工，重划为三犍组，两个牲口为一组，劳动力划为两组，大块土地用牲口耕，零碎土地以及牲口耕剩的地头地边，全由人力刨。送粪时，远距离的由牲口送，近距离的由人工送。播种时，245亩大田七日种完，人力组，牲口组，平均每日种40多亩地，相当于四犍牲口，全村也实行了类似的变工，全村的人力组和牲口组，凡较便于由人工代替的牲口工，全由人工负担，以与牲口工交换人力所不能胜任的，此外还有人帮牲口的小组，即牲口弱，由人帮助耕。

当然，由家屯这个办法只是一个雏形，并不是完整成熟的办法，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但这是一个好的方法。按照这种变工的方法，第一可以使中农满意，因为这就大大节省了牲口工，例如拉粪挑粪，近地用几个人挑，比拉粪效率还高。第二可使贫农用自己多余的劳动力换来需要的牲口，一面发挥了集体劳动，而节省了牲口工使用。不过这个方式应该注意的是：（一）变工需要等价，例如拉一堆粪与挑一堆粪，应等价，按照效率计算，不能只用一犍牲口工等于三个人工的办法。（二）着重与中农进行变

工,牲口富裕的地方仍应以前述合伙帮工为主。

关于伙养牲口,个别的贫苦农民所能养的牲口,只能是个小毛驴,在农作上作用较小,假如自愿结合合伙购买和伙养,就可以合并养活肥壮硕大的牲口。譬如大连县南关岭秦洪礼互助组六家贫农伙养了一头大牲口,牲口交一家富农代喂,叫富农说出一定标准,由六家按标准供他草料,只许肥不许瘦,马粪归代喂者。牲口出雇时,所挣的工资百分之二十五归车夫,百分之七十五归马料,另外又开公荒三亩。种豆子专供牲口料,并准备从牲口节余中秋后再添置一头。这是一个值得在一切贫农及贫苦中农中提倡的方法,因为这样,以贫农的分散资金,组织成为集中的资金,把各自不完整的生产手段变为完整,这是一种很好的合作方式。

(原载《观察》第6卷第5期,1950年1月1日出版)

其 它

致胡适的信(三封)

—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的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

徒然愤事。《观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1卷24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或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12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力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竿，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2卷的方针。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的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物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

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这个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鼓励和赞助,前辈也有鼓励赞助有希望的后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2卷第1期写一篇文章(2月15日前掷下),希望是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如何之处,伫候赐教。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

1947年1月21日,农历大除夕

二

适之先生:在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先生允为《观察》3卷撰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8月18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1947年8月12日

三

适之先生:

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

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 2.33 亿万。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了这许多。1 000 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 20 倍。我们有几件印刷品,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我想先生对办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

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穿了说,还是为了先生那一句话:“第一个五年先扶助北大、清华、中大、武大、浙大”。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先生的 10 年教育计划的原文,不知先生能否公开? 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否? 专此,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1947 年 9 月 22 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 1980 年 8 月第 1 版)

致傅斯年的信(二封)

孟真先生赐鉴:

手教奉悉,承赐鼓励,至为感激。一年以来,我们确是以全

力办此刊物,只是环境大难,我们只能以辛勤及忍耐应之。先生所云《观察》语调,缺乏共同性一点,我们也深切感动;并因这个原因,减少发言力量。我们应当有若干在基本观点及风度上相同的朋友,经常聚会,共同讨论,发为文章,易生力量。《观察》非无基本的写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与昔日之《独立评论》完全不同,这是《观察》极大的弱点,而一时无法可想。我们又不能在上海随便找些人叙会;这是我们主要的苦痛。我只能这样说:我自信能以相当长的时期主持这个刊物,长线放远筹,只好一步一步走。我是一个量力行事的人,我希望一切事情要“水到渠成”,慢慢的实现理想。目前,只希望这个刊物在大体上能立得住。假如能照过去的水准支持到两年以上,两年以后,我想可以发生一点影响。现在业务上可以自给,一般论者对于我们也都有很好的反应与感情。只要我们自己不自暴自弃,谨慎从事,这个事业或者可有成就。最近五六个月,我每天平均工作 12 小时,几乎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这个刊物上,如兜拉广告,买纸,调度款项,人事管理,核计账目,校阅大样,都是我的工作,虽然终日疲乏,但精神上还是十分宁静愉快,我们应当尽心尽力,替国家做一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

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政治局面下是苦闷并苦痛的,先生所言极其同感。我想我们最要紧的是立住脚跟,心无所求,假如不想做官,即无须迎合国民党,假如不想投机,即无须迎合共产党,心无所求,才能言所欲言,不偏不倚,不计功利,尽心为之。

目前最困难的还是稿子。稿子总不够,同时又要维持这个水准。回顾 20 期来,大体上还能维持原有水准。先生所附《内蒙自治问题》一文,应当使国内各方面都能读到,所以想在《观察》发表一下,先生想可同意(《观察》有四分之一的读者都在西

南西北各省),顺便附致薄酬4万聊申谢忱,务望哂纳。1卷即将告终,2卷正待开始,先生因病因忙,尚未为《观察》写过稿子,我们很切迫的希望先生能给《观察》第2卷第1期写一篇文章以为支持,并乞于2月10日以前掷下,务乞俯允为禱!

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

1947年1月13日灯下

二

孟真先生赐鉴:

在京晋谒,辱承留餐,畅聆教益,欣幸无似。翌日即返沪,未能再谒,甚为怅怅。金祸泛滥,纸价暴涨,印工倍增,本刊经营益增艰难。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如承俯允,曷胜感禱。敝刊第2卷第1期之最后付排期为2月22日,甚望先生能于20日前付邮寄沪。此次在京,无意中闻一谰言,谓本刊与孔有关。今日之世,乃恒以小人之心度人,鉴于本刊过去批评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并曾抨击宋子文,遂推测或与孔有关。此事原不足辩,惟觉先生文章中,能对孔亦施以激烈之抨击,则外间谰言本刊,亦将因先生之文可以洗清矣。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1947年2月16日

社址：上海吴淞路444弄11号

如承，先将题目示知，以便预告，尤感。

（选自《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1995年12月16日初版）

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

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

智之士抑或子小民都能融融乐乐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本文是储安平 1957 年 6 月 1 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据《光明日报》1957 年 6 月 2 日收入)

新疆
新
面
貌

新疆好地方

一提起新疆,人们便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这些巍峨的名字,给人们以一种无限高大无限雄伟的感觉;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戈壁以及苇湖碱滩这些字眼,又使人们掀起一种荒野冷峻的情绪。这一年多,我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漫游,看到那亘古不化的雪峰、葱郁深邃的林区、水天相接的湖景,以及远远看来永远像一片浩瀚的海洋似的平原,心胸开放,意气豪迈。就在这土地上、山岭间、湖滩边、森林里,出现着黄金色的麦浪,雪山似的棉堆以及那数也数不清的肥壮的牛羊,使人深切感到,我们的祖国辽阔而又伟大,美丽而又富庶。

很多人总以为新疆这地方很冷。这不是一句话可以笼统解释得了的问题。新疆的面积有 16 个浙江省大。在这样一个大面积上,气温不可能一无差别。有些地方,例如阿尔泰山一带,在冬天一般要比较冷些,但有些地方,如喀什、和阗一带,冬天就很温暖。我在南疆住过一个冬天。那儿,冬天不仅不用穿棉鞋,甚至不用穿大衣;不仅比北京暖和,甚至比上海还暖和。冬季在郊外旅行,比较冷些,在城市里住着,就比较暖和。寒流来时,当然要冷些,没有寒流的时候,就不一定很冷。所以新疆冷或不冷,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1954 年 11 月底,我在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正巧寒流侵袭,气温降低到将近零下 40 度,但我依然去郊外踏雪,欣赏祖国西陲的美丽的冬景。有一

天，在零下 16 度的天气里，我坐了一辆轻便马车，在满天的好太阳下，从察布查尔驶回伊宁时，那带着冰凌的马匹，在雪地上一路疾驶，发出轻微的金属似的响声，这样的旅行对于我毋宁是一次最优美难忘的享受。乌鲁木齐冬天户外的温度一般在零下 20 度左右，但即使最冷的日子，人们照样在街上来来往往，而孩子们也照样提着书包上学。

人们又以为新疆这地方很荒凉。新疆确是山岭多、戈壁多、草湖多、荒地多。总的说来是土地辽阔，人烟稀少。假如你意气萎靡，目光如鼠，满足于株守斗室之内，那么你到了新疆这样的地方，看到大漠连天，自然会兴起荒凉之感。假如你不是这样一个人，假如你劳动的热情很高，创造的精神很旺，满怀斗志，想为祖国做一番事业，那你就会感到你何幸而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更何幸而又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那迢迢千里、峰峦重叠的群山之间，不知道埋藏着多少宝贵的财富，正需要数以千计万计的青年男女穷年累月地去勘测钻探。那浩瀚的一望无边的肥沃的原野，也正等待着十万百万的人们去开垦经营，让这些土地从多年的沉睡中苏醒过来，使它们得到河水的滋润，恢复生命，开始为增强国家的力量而服务。意志坚强的人们，看了这些辽阔的原野，决不会发生荒凉的感觉；他们发生的感情只能是兴奋、骄傲和跃跃欲试。

过去人们对于新疆的许多看法和印象，今天需要从根本上扭转过来。例如自来论新疆的人都说新疆缺水。但在今天，可以说，新疆不缺水。新疆缺的不是水，而是对水的工程建设和科学管理。假如能开挖水渠，把河水引到田里，修筑水库，把不用的水积储起来，那么水的利用率就可以大大提高。一面开辟水源，一面减少水的渗漏浪费，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的日子里，新疆的水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基本上是不够用的。在过去的反

动政权统治时代,当政的人们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更不会认真进行水利工程建设。解放以后,在新疆的哈密、焉耆、阿克苏以及玛纳斯河流域各地,都兴建了很多的水利工程,在生产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政府一面继续进行各种水利建设,一面又教导人民合理用水。新疆缺水的旧观念今天应该完全改变过来。

过去人们以为新疆少雨少水,很多地方又都是沙漠,因而连带发生了许多片面的不正确的印象。有人以为新疆既然缺水,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河流,殊不知新疆的大河多得很。不仅河流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湖沼(当地统称为海子)。这些河流一向都是两岸人民生活的命脉,不仅广大的农田靠它灌溉,其中很多地方将来还可以利用水力发电,以供工业动力和市民照明之用;有一部分河道将来整理以后还可以通航。有些人以为新疆既然少雨缺水,树木一定不多。其实不然。天山山脉,东起奇台、西迄伊犁,迤迤千里,长着繁茂的云杉,这是目前新疆基本建设的一个主要木材来源。另外在阿尔泰山,也有着丰富的森林。在一般城市和农村里,树木也很茂盛;尤其在南疆。南疆农村树木之盛,只能用“多得像头发一样”那样略带夸张的形容,才能把实际的情况衬托出来。在新疆,兄弟民族大都有种树的习惯,而且他们种起树来,都是一种十几里,或者一种几千株,既多且密。无论在牧区或农村,凡是有水的地方,都一定有树。尤其在戈壁滩上,要是你老远老远看到前面有树了,那地方也一定有水,有人家。在南疆和伊犁各地,很多人家家里都栽植果树。在新疆,人民在他们的生活里很明显地感受着种树的好处:取荫、架屋、烧柴和吃果子。当我在新疆各地旅行时,常常一路浓荫夹道,林色不绝。而伊宁的树木之盛,一色白杨,又是这个祖国西陲名城的一大特色。

同样,当有些人听我谈到新疆多鱼的时候,也都表示惊奇。他们以为新疆既是一片沙漠,哪儿还会有鱼?可是事实上,新疆的一些主要河流,大都产鱼。这一年多,我就先后吃过伊犁河、玛纳斯河、开都河、孔雀河、塔里木河、阿克苏河、喀什河、叶尔羌河、玉龙喀什河以及阿尔泰山下的额尔齐斯河等河里的鱼。几乎新疆所有的河流里,都有鱼。不仅有,而且还多。当我过布尔津时,看到有人在额尔齐斯河畔钓鱼,把鱼钩往河里一撒,随手一拉,钩上就已有鱼。在乌鲁木齐,鱼摊上还有活鲫鱼卖。

人们总以为新疆这地方穷苦。过去新疆人民的的生活的确是很穷苦的,这主要是由于旧时代的封建反动政权的残酷压榨。实际上,新疆这地方不仅不穷,而且富得很。新疆地下的资源,虽然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勘测,还不能估计这些资源的数量,但是,新疆物藏之富,是可以肯定的事实。石油、煤、铁都有很大的蕴藏量,此外还有很多珍贵的有色金属。在农业方面,新疆的土地也是出奇地肥沃。今天中国好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全国最高单位面积产量都是在新疆创造的。新疆的小麦生产最高达到每亩1 373斤,水稻最高每亩2 205斤,棉花最高每亩1 677斤,玉米最高每亩1 925斤(棉花和玉米两项都是1956年的新纪录);这些高额丰产纪录虽然还只是在一些小面积上创造的,然而已经足够说明新疆土地的肥沃和它在农业生产上的潜力。在瓜果的生产方面,除了内地熟知的哈密瓜和吐鲁番葡萄以外,其他如梨、桃、杏、苹果、石榴、樱桃、无花果、西瓜、花生等,也无不既多且好。1954年夏天我游伊犁时,一角钱可以买到五个苹果。1955年初夏我在库车、阿克苏一带时,一角钱可以买到30只杏子。这些还都是从市上小贩的手里购买的,要是直接到果园里买,还要便宜。

新疆又是我国的主要牧区之一。这儿有很多天然的优美的

牧场。1954年我在伊犁地区的尼勒克、新源、巩留、特克斯、昭苏一带旅行，双目所及，非绿即青。那像地毯一样的绿草，无头无尽地铺盖在所有的草原上和山坡上。一片青翠，一片碧绿；碧绿青翠以外，几乎再见不到第二种颜色。甚至连人们所呼吸的空气，也仿佛是“青色的空气”似的，特别清新透爽。天山北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巴音布洛克以及阿尔泰山一带，都是美好的广大牧区。那些勤劳的牧民，就在这些高山草原上牧放着他们的牛羊。蒙古包、马奶子、冬不拉（乐器），再加上那无限美丽的牧区山色和清新舒爽的高山气候，构成了新疆地区那种充满着丰富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像诗一样的难忘的生活。

这一年多，我在新疆走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地方。每到一個地方，在当地工作的汉族同志总是对我盛称当地如何如何的好——物产如何富饶、风景如何美丽，只要劳动就能创造幸福的生活等等。这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没有来过新疆的人，受了旧时不正确的看法的影响，以为新疆这地方比较荒凉，没有什么引人之处，但是到了新疆、在新疆住定了下来的人们，又细细体会到新疆自有它的可爱可取之处，并深切感到这地方具有无限创造开发的前途。特别在解放以后这几年来，新疆在各方面都有很多新的改进和成就。在党和政府的积极的领导和帮助下，农业生产无论在改良种籽上、推广新式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上，都有相当的成绩。驻新疆部队所建造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劳动，更给当地各族老乡以很大的帮助和启发。1954年吐鲁番农民种的棉花，在36000亩的大面积上达到每亩生产籽棉331斤的纪录，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牧业方面，也有新的改进。牧民认识到政府推广的“新疆羊”，无论是毛、肉、乳，都比原来的土种羊好。在人工授精、接羔育羔以及割草搭棚过冬等各方面，牧民也得到了政府给予的各种必要的帮助。农牧生产的积极发

展,再加上农牧产品价格的提高和工业产品价格的降低,就必然使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各地的学校和入学人数普遍增加。医疗卫生事业和电影的放映,不仅已经到达了较小的城市,而且已经深入到较小的农村和偏僻的牧区,这在新疆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城市的面貌也有变化。就以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来说,这地方自从民国以来,被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国民党等前后统治了近40年,直到快被解放的时候,依然是一个“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的烂摊子。再没有比乌鲁木齐这样一个城市更容易使人明显地看出新旧时代的对比了。在这个城市里,凡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乎都是破烂的;凡是你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新的整齐的建筑,都是解放以后这几年内建造起来的;新造的建筑大都装有现代化的卫生设备和暖气设备。道路和市容也有很大的改进。目前乌鲁木齐的主要街道都已铺了沥青,并有了几条行驶公共汽车的市内交通干线。西郊明园一带,过去是一片荒滩,现在已经建设成为乌鲁木齐的一个相当现代化的新的市区。医院和剧场都有增加,它们的规模和设备都是头等的。更重要的是乌鲁木齐这个城市在解放以后已经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城市,而且使新疆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现代工业: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以及纺织工业等。这些现代工业正为发展新疆人民的生产和提高新疆人民的生活作出巨大的贡献。最近很多到达乌鲁木齐的外宾,看到在中国的西部边疆上有着这样一座相当现代化的城市,都表示惊奇。

为着支援边疆的建设,这几年来,很多爱国的青年男女不断地从祖国各个角落来到新疆。无论在部队里、工厂里、矿山上以及城市里,我们经常会遇见很多说话时带有山东口音、湖南口音和上海口音的年轻姑娘。她们的出现,标志着祖国各地人民对

于新疆兄弟民族和新疆各项建设的关怀和支援；标志着新一代年轻人的不畏艰苦、献身边陲的英豪作风。我们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力量和决心来开发边疆、创造新的历史，把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推进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毛主席的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民族政策，这几年来在新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大家融融洽洽，互信互助，的确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一样。这一年多，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去，甚至到最偏僻的小村，当地的兄弟民族都以无比的热情接待我，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给我充分的帮助和照顾，谈谈笑笑，毫不生疏。他们把我看作一个来自祖国的首都、来自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的可敬的远客。

1955年8月 乌鲁木齐

伊犁夜话

——民族关系是怎样扭过来的？

民族关系问题中的主要问题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要使少数民族热爱祖国、愉快地生活在祖国的温暖的大家庭里，首先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正确地改进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彼此之间的团结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加强国家统一的问题。

解放以前，在新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恶劣的，是不平等的、对立的、互相仇视的。解放以后，汉族和少数民族

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经变成成为一种平等的、团结的、友爱合作的新关系了。仅仅是短短几年,就基本上消除了由于历代反动统治所造成的长期的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使民族关系改变了根本的面貌,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具有头等历史意义的国家事件;同时,这也并不是一件轻易简单的事情。

在新疆,最能突出地表现这种多民族关系的地区是伊犁。当我在伊犁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夜晚,有一位同志来看我,我们谈起了民族关系的问题。他说,当他们初到伊犁的时候,情况也并不是完全顺利的。伊犁是三区革命的发源地,是一个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地方。当地各族人民曾经和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过英勇的斗争而终于获得了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当地各族人民热烈地庆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热烈地欢迎新疆的和平解放,热烈地欢迎共产党到达伊犁。这是历史的主要的一面。另外一面,由于历代汉族王朝对于少数民族所施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特别是盛世才反叛后及国民党反动派时期对少数民族的残酷统治,以及由于绝大多数的民族群众还不善于把汉族中的一小部分反动统治阶级和整个汉民族分别开来,因而在当地民族群众的思想里,便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反对汉族的情绪。过去当地民族习惯叫汉族为“黑大爷”。当人民解放军和新来的汉族干部初到伊犁地区时,很多民族群众在思想上都容易联系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好不容易赶走了一批黑大爷(国民党),为什么现在又让来了一批黑大爷(共产党)?”这确实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矛盾。

当地一部分民族上层分子和青年知识分子,由于过去的具体环境,他们和苏联的接触较多,和祖国内地的接触较少,因而他们对于苏联,比较了解信任,而对于自己的祖国,反而比较隔阂;特别是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性质、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党,

以及当时关内老解放区的一般情况,大都了解不够。再加上敌人乱造谣言,说共产党来了以后要消灭宗教、没收财产,少数在十月革命以后从苏联越界过来的人们,又传播着一些不正确的说法,这样,就使很多民族群众对于共产党、解放军以及新来的汉族干部,在思想上蒙上浓厚的混乱和不安,整个社会保持着很大的保留态度,甚至戒备的气氛。

不过,这些终于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仅仅是短短的几年,民族关系就根本上改变了面貌。现在,汉族干部下乡,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受到当地民族的友好的接待。随便什么地方,农村或牧区,汉族干部一人单骑独行,安全都没有问题。共产党和毛主席在各族人民中的威信,至高无比。无论什么问题,只要说是中央决定了的,或者党决定了的,不论哪一级干部,都绝对接受,决没有第二个意见。在县里区里,民族群众有什么困难,都喜欢自动地去找党委书记(汉族)谈。在这边疆地区,一个“区”有时要比内地一个“县”还要大,从东头到西头,骑马得跑上两天才能到。然而在这样一片辽阔的土地上,就只有一个区委书记是汉族,再没有第二个汉族,而就是这一个汉族干部,他在这一大片土地上,传达着党的各项政策,推动着当地的各项中心工作。党在群众中显然已经牢牢地扎了根,而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也真的血肉相连,都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了。

“这条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我问。

“当然,所以能够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就,首先是由于党和毛主席的正确的领导。民族关系的基本改观是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巨大胜利。”他说,“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像一盏明亮的灯,照耀着我们正确地前进。据我粗略的思索,这几年来,我们是经过了这样几个方面,才基本上扭转了过去的民族关系的。

“首先是部队。解放军到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来,就它

的政治影响说,要比在内地更突出,就它所遇到的困难和考验说,也要比在内地更严峻。部队是党在民族地区最先和各族老乡接触的先锋队。由于少数民族过去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解放军,他们听说解放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因此当他们最初见到解放军的时候,他们就要看看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究竟有没有什么不同,再从此推测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些什么不同。他们过去不喜欢汉族,而这批新来的部队又正都是汉族,这又自然地牵涉到民族问题,这批新来的汉族和过去他们所见的汉族又有些什么不同?在解放军一方面呢,到这一带来,既是人生地疏,又加言语不通。在内地,还可以用嘴巴来解释宣传,使老百姓了解他们,可是到了这儿,大家一下子仿佛都变成了哑巴,有一肚子意思也没法表达出来。

“有些民族老乡最初看见解放军时,心中害怕。他们躲得远远的,不和解放军接近。然而他们却在暗中观察。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这批部队到后,并没有什么人向他们借这样、要那样。既没有人要借住他们的房子、帐篷,也没有人要借他们的粮食草料,更不要说有什么人牵他们的牛羊、掳他们的家禽了。他们有的远远地在看:那些新来的汉族部队究竟住在哪儿呀,又干啥呀?啊!他们就住在地里,有的在地里挖个坑,有的就干脆宿在露天里。他们用着坎土镩在锄地!有些地方,好些人正在拉着洋犁犁地。人拉犁!这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传十,十传百,有些民族老乡就慢慢儿地来瞧这‘人拉犁’的把戏。由于党不愿增加民族地区人民的负担,所以命令部队一到当地就自己抓紧生产。部队初到时,一无马,二无犁,上级只发了几个洋犁。就因为部队不愿意去打搅民族老乡,向他们借牲口,所以只好每八个人合拉一架洋犁。慢慢地,民族老乡看出这一批新来的解放军和过去的国民党军队确是不同。他们对部队不再躲避,而是渐

渐地亲近了起来。日子久了,他们发现,解放军不仅不打扰他们,反而还帮助他们:给他们借籽种、借口粮、借农具,分水给他们浇,甚至有时还帮助他们春耕秋收。对于部队来说,既然言语不通,无法通过言语来表达自己,他们就只好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自己。解放军是党的一面旗帜。当各族老乡开始欢迎这个军队、歌颂这个军队时,各族老乡也就初步地认识了党,欢迎着党,并对新来的汉族干部开始进行新的估计。这是第一关。

“其次,是几个大运动,如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当刚刚展开这些运动时,有些民族老乡在思想上还是有很大顾虑的。在有些地方,如伊宁六区,减租反霸的工作队下去时,有些群众害怕得不敢出门,说是吃大肉(猪肉)的汉族来了,仿佛就将大祸临头一样。有一家正在结婚,也就慌慌张张地把结婚用的东西都藏了起来,婚也不结了。甚至给地主当了几十年长工而一无所有的一个叫沙吾提的雇工,当他听到汉族干部要找他谈话时,吓得连脸都变了颜色。然而这些运动都是为了各族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使许多老乡的脑筋在无形中逐渐发生了变化,因而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群众就能如火如荼地发动了起来。规模巨大的诉苦运动发生了一股极其深刻的力量,它不仅初步地启发了各族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同时也初步澄清了一些狭隘的民族仇恨。许多民族群众开始明白,过去压迫他们的并不是一个‘汉族’,而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在这样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使无数多少年来为地主下苦、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耕畜、农具、口粮,甚至分到了房屋;使他们开始成为自己的劳动的主人。经过这样一些大运动,广大的各族劳动人民一接触到实际,就完全认识,共产党是来解救他们的,新来的汉族干部是来帮助他们的。党、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从此在民族群众的思想

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民族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而这巨大的历史事实，又回过头来教育了一般民族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

“党无论到达一个什么地方，总是首先表示它是站在劳动人民的一面的。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在1950年4月，党的伊犁地方委员会成立时，许多来宾中有一位民族农民代表叫曹达阿虹的，正坐在伊犁专区专员的旁边。‘专员’，这在过去是多么大的一个‘官’啊！而凑巧，这位专员又是从前的‘伊犁王’的儿子。当曹达阿虹被请站起来说话时，他直发抖，他说一句，就对坐在他旁边的专员看一眼。我们勤劳可爱的农民，在长期遭受着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即使已经被解放了，但在刚被解放之初，还免不了怀有一些恐惧的不习惯的感情。然而党坚决地要解放他们，并把他们扶上他们本就应该处于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1950年在伊宁前后召开的两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半数以上的代表都是工农劳动分子。以后，每年在‘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这样一些庆祝大会上，都有劳动人民的代表在群众前面说话。当劳动人民，尤其是多半受着压迫的妇女，看到了有他们的代表在参预着国家的事务的时候，他们就十分自然地感到，在今天的国家里，也有着他们的一份的，这样就大大地鼓舞了他们对国家事务的关怀和责任感，大大地鼓舞了他们对发展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使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共产党在帮助着谁，又在反对着谁。并使他们深深地感到，在共产党教育下的外来汉族干部，和国民党那些军阀官僚有着多么大的不同！”

“使少数民族认识共产党以及使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用着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汉族，解放军已经起了一种重要的先锋启发作用，而这一系列的大运动，却是根本扭转民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党掌握了民族地区的基本群众，少数民族对汉族

的敌视、隔阂，基本消除。在民族之间萌长出来的新的感情是信任和友爱。

“第三是机关民族化。解放以前，新疆民族地区的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汉化了。主要的官吏都是汉族。公文是以汉文为主。机关里的一切作息时间都是根据汉族的习惯。解放以后，这种情况完全改正过来。公文的文字，有些地方是汉文和民族文字并用，有些地方则完全以民族文字为主。机关的作息时间以及过年过节的假日，都尽量遵照民族生活习惯办理。当然，机关民族化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大量培养、提拔和任用民族干部。

“不仅仅是要大量任用民族干部，更重要的是还要搞好汉族干部和民族干部的团结。搞好汉族干部和民族干部的团结，不仅成为搞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的首要关键，而且，假如这一层搞得不好，在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都将受到影响，甚至无法工作。然而对于这一层，我们初来时，认识是很不够的。我们初来时，有些单凭热情办事，不少工作像在汉族地区一样地进行，对于民族地区的情况，如历史残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语言的障蔽、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等，了解与认识得不够。例如一个汉族干部不带翻译，他就根本无法在民族地区展开工作，而有很多事情，由汉族干部去做就远不及由民族干部去做而来得事半功倍。汉族干部毕竟是外乡人；对于地方情况，特别是民族内部的情况，总还是民族干部比较清楚，摸起来也比较容易。通过民族干部去为民族群众办事，无论如何比由汉族干部直接去办来得合适顺利。许多活生生的事实教育着汉族干部，使我们逐渐认识到初来时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不对头，认识到培养民族干部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也就是更加深入认识了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

“少数民族有少数民族的特点。绝大多数的民族干部都是

解放以后新参加工作的,缺乏新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我们和民族干部在一起工作时,应当多和他们商量,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感情上生活上对他们多尊重多照顾一些。在制订工作计划和总结工作经验这些方面应当耐心地帮助他们。假如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困难,汉族干部必须给民族干部以更多的支持,并鼓舞他们去克服那些困难。假如大体上能针对这样一些特点去掌握处理,民族干部就容易和你接近,团结也就容易搞好,培养教育也容易收到较好的效果,而各项工作也就容易推动展开。

“第四是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加强民族团结、更好地推动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条件。然而这个经验,我们也是付了一定的代价才获得的。

“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们过去的缺点是突出的。我们初来这儿时,不了解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我们对民族地区的宗教影响估计不足。同时,我们对牧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的特点也认识不够。我们低估了民族上层社会在民族地区所具有的力量。这儿的少数民族中绝大部分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宗教对于人民的影响很大,甚至整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都和宗教分不开。例如,在伊斯兰教里面,结婚的时候要是没有请阿訇到场念经,则在大家看来,这个婚姻就算不得是一个正式的婚姻。要是有了丧事,也必须请阿訇来念经,才能把尸身移出去,否则,四周的邻居也会有意见。宗教在民族地区既有这样深刻的影响,宗教界中的一些上层人物如阿訇、毛拉等,在群众中间因而也就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于这些,我们初来时是估计不足的。

“在牧区,也有着同样的情况。牧区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部落社会。由于牧区的经济生活、地区限制以及血缘关系,在牧区中存在着许多大小不等的部落。这些部落头目牧主以及他

们的政治代表千户长百户长,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牧区的统治者,他们在牧区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在经济上,牧区的主要经济力量(牲畜)也大都掌握在这些大牧主手里。但是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认识这点。我们在1951年在伊犁的一部分牧区曾经企图进行一些改革,而在那些地方就发生了一些困难。例如要斗争一个部落头目,但是群众却不容易发动起来。我们逮捕了一个不好的牧主,然而群众却同情这个牧主,偷偷地给他的家属送茶送食。我们违反了牧民的基本生活方式(游牧),企图一下子把他们的人和牲畜集中起来(定居),致使当时一部分牧区发生了牲畜骤然下降的那种混乱的和损害的现象。

“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和教育下,很快地认识到了这些缺点,及时地批判了大民族主义思想,纠正了在工作中发生的一些毛病,除了在牧区普遍宣传并坚决贯彻执行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的各项政策以外,同时加强建立广泛的包括各方面的社会上层分子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经常和他们协商研究各项中心工作,帮助他们对政策时事的学习,把他们更好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例如在宗教方面,政府一方面宣布了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政府不干涉宗教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则要求宗教界的一切活动都不能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抵触。现在政府对宗教界人士的基本要求是爱国守法。自从宪草、宪法先后公布、颁布以后,伊犁各地的宗教界人士都自动地进行了学习讨论,纠正了过去一些糊涂想法,初步地区别了‘宗教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不同,并且认为,正如一个阿訇所说的:经典不能放在政府法令的上面。在牧区,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大力发展牧业。由于牧区里很大一部分经济实力仍然掌握在一些牧主手中,因而这就首先要很好地团结、教育那些大、中牧主,使他们能够解除各种思想顾虑,并由他们来协助政府向

群众宣传政策,发展生产;这样,对牧业的发展和牧区的安定就会收到更大的效果。

“以上所说的这些,大体上就是我们这几年来在改变民族关系中所走过并正在走着的一些道路。这些道路并不是完全顺利平坦的,这是经过一系列的尖锐的思想斗争并在一些失败的教训中逐步摸索出来的。”

1954年12月 乌鲁木齐

石河子新城

当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曾听人说过在新疆的戈壁滩上盖了一座新城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大,而这几年来各地所发生的新鲜事物又这样多,因而像在戈壁滩上平地盖城这样一件具有丰富启发性的事情,也只粗听几句,没有细问下去。当我到了新疆,再向人问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人们就不费思索地用手一指:

“噢,那是石河子新城!”

石河子在乌鲁木齐的西面约150公里,坐吉普车三个小时就到。从乌鲁木齐一直往西到精河,南面是巍峨的天山群峰,北面则是浩瀚无边的平原。那迤邐不绝的高山,那高山上亘古不化的积雪,那广袤千里的大地,那大地极边轻烟似的远色,这一切构成了一幅雄峻深远的大视界,驰骋在这样一个大视界里,使人胸襟开阔,意气豪放。

从乌鲁木齐到石河子这一路,庄稼和树木都很茂盛。过了

玛纳斯河,大约又走了 20 公里,就远远地看到了一幅动人的秀丽的景色。在那衬着豪壮的山色的背景下,在那比平地稍稍高一些的山麓旁,在那疏疏密密的墨青色的树林里,隐现着很多红顶白墙的新的建筑。那是多么广阔的一片,然而又是多么深邃的一片!它整个的色调鲜艳柔和,健康明朗。用不着驾驶员指导,就可以料到那就是石河子新城,那就是劳动人民凭着双手在这个荒滩上修盖起来的这座美丽的新城了!

石河子新城的建立,很多人都把它看成为一种奇迹。那些住在石河子附近数十里地以内、平时不大出门的农民,最初听到石河子建了一座新城时,是完全不相信的。他们说,一年以前,两年以前,从来没有看到也从来没有听到石河子有个什么新城的事。然而,当有的人在什么顺便的机会下来到石河子、亲眼看到这个巨大的改变时,一下子多少有些愣住了,摸摸自己的脑袋说:“这干得好,这干得好!共产党有办法!”

石河子这一带以前是怎样一个地方呢?清末民初经过这一带的人说,这一带多是泥淖草湖,茂木深林。就是当部队初到这儿时,这一带也还是满生着茂密的有着一人一手高的苇子和野生的青蒿杂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自有这片土地以来,这土地也许一直就是这样一片干干湿湿高高低低的苇湖硷滩。一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历史没有变化,土地也没有变化,没有人注意它、亲近它、器重它。只有那些梅花鹿、狼、野猪,以及野鸡、老鸦等长年地成为这片大地的主人,逍遥自在,毫无顾忌。当 1950 年部队进入这片荒地进行斩草、开路、测量、夜晚住在临时挖的地窝子里时,狼群还悄悄地拜访他们。

在战士们创造性的忘我劳动中,这片土地上的面貌一天一天地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座新城的建筑,正如新中国其

他地方的巨大的建设事业一样，都是劳动人民的无限的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所有的施工力量：木工、瓦工、铁工，都是生产建设部队自己培养训练出来的。所有的建筑材料，除了五金、玻璃和油漆以外，木料、石灰、砖头、沙子都是就地自给，自伐自运自制的。

这座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按着一个一定的计划进行建筑的。行政、工业、商业、文教、保健、住宅各区以及公园、林带等地，都有一定的范围。全城的核心是行政区，那儿目前已经建筑了一座办公楼，这是一座两层的门形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建筑；办公楼的中间部分则突高为四层。这突出为四层的高楼，仿佛成为全城的一座司令台，无论从东南西北，老远老远就能看到它；自然它也更看到四方八面更远的地方。除此之外，这座四层大厦在石河子还有它特殊的骄傲的意义，因为这样一座高的建筑，是完全由初学建筑的战士们在创造性的劳动热情下完成的。办公楼的前面是一个大广场，再南是文娱区，将来的戏院、电影院都将建筑在这一带。最南是商业区，预计将来的从乌鲁木齐通往苏联的铁路线将在这商业区的南面通过。城东和城西都是工业区。不过新城的外区将如何配合整个玛纳斯河流域规划的生产需要，还没有最后定案。目前已经建筑的一些工厂大都设在城西。大部分的住宅区则都围绕在行政区及广场的东西北三面，现在已经一幢一幢地盖了很多玲珑有致的小住宅。另外有一部分住宅区则邻近着工业区，以便利工人的上工往返。在邻近工业区的住宅区和工业区之间铺植了一条宽阔的林带，借以阻隔来自工业区的繁嚣的声音和混浊的空气。文教区则夹在住宅区中间，以便利孩子们的上学下学。医院和运动场则在城的东部。

城里的主要道路都是上下行的两条单行车道。两条单行车

道之间则是种植花草的路台。车行道的两旁是上下人行道。车行道与人行道之间以及人行道的最外端,都种植了树木。树木一般已经高过屋顶,再过三五年,萧萧白杨,都将夹道成林。按照以12平方公里为基础的初步规划,道路占了百分之二十,而绿地则占了百分之二十六。在明天的社会主义新社会里,人们将得到更多的空地和更新鲜的空气。富裕的空地将使每个住家都能养鸡种菜又栽花,而新鲜的空气和足够的阳光,将使人们更健康、更活泼,在劳动时有更充沛的活力。

当我在石河子访问的时候,这座新城已经大大小小盖了四百多幢房屋。假如把这些房屋集中起来,就足够形成一个适当的“市容”了。但正因为是按照计划建筑的,所以目前已经建筑的房子就不能不比较分散。然而这毫不影响我们对它的概念和对它的前途所怀有的信心。一个城市本不是一夜之间所能造成的,正如一颗麦子不是一夜之间能长熟一样。

我参观了新城的医院。这是一个较大的建筑。病房部分是一长条地朝南,一字排过去就有45间房,全部可容400张床位。将来还打算在病房前面布置一个花园。全部建筑都设置了地震隔离缝,在地震隔离缝处装置了防火门。楼上的地板和楼下的天花板之间都用锯木屑和泥做成隔音层。此外,在医院的后面及侧面远处,还分别建筑了产科病房和隔离病房。

我曾经访问了这个医院里的一个胃病病房和一个外科女病房。当我参观着这些病房时,我心中的确有一种混合着感激、喜悦和安慰的复杂的感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的生活将逐渐得到改善,这已经不是一种宣传,甚或是一种理想:这是已经切切实实地实现了的事情。当你想到在不久以前还是一片荒地,而现在却出现了这样一座巨大的医院时,你怎能抑止住心头的激动!

我又访问了那儿的新华书店，它是在 1954 年 1 月新开设的。每天下班以后，特别是星期天，书店里总是挤满了人。据说在 1954 年 1 月至 6 月间，平均一个月销书 5 000 册左右，其中理论书和文艺书占三分之二，技术书籍和通俗读物占三分之一。购书的对象主要是干部，通俗读物的读者则主要是战士。《斯大林全集》在这儿每卷都要销二百多册，上千册的《宪法草案》一到，一两小时内就销售一空。由于建筑新城又建筑水库，扩大垦区又大量植棉，所以对于农业技术、建筑工程以及企业管理这类书籍，都很迫切需要。

此外，我又参观了一些工厂，他们都在新城的西南角上。木工厂刚创建的时候，既没有人又没有工具。没有人，就临时从部队里抽出来一些战士；不会做，就边教边学，边学边做；没有工具，就买一些，自己再凑一些。现在这个木工厂里已有六个车间，近 500 个工人。其中一个锯木车间，是用机器锯的，有好几部锯木机，工人日夜分三班做，然而即使这样，还是赶不上工地的需要。面粉厂是目前石河子许多工厂中规模比较大的一个。一天可出 1 700 袋到 2 000 袋面粉，供应着玛纳斯、沙湾、昌吉、米泉和呼图壁五个县的面粉食粮。铁工厂的规模不大，它的主要任务是修理农具，但也搭配地自制一些洋犁及中耕器。我参观了铁工厂的宿舍。那是一幢幢的家庭式宿舍。一幢八间，分两头进出。间架要比北京的间架大，窗子也大，空气光线都好。要是一对夫妇，就分给一间，要是单身，两个人合住一间。每个工人都由公家发了一顶蚊帐。有些工人床上还折叠着绣花被头。有一个工人床边凳子上放了很多龙门书店出版的有关机械学理的书籍，人们给我介绍，说这是一位技术工人，是从上海来的。

晚上，我参加了他们的晚会。在新疆地区，文娱工作是一个

重要工作，它的需要性要比内地更高些。据说这里的文娱生活不算坏。在夏季，几乎每个人一个星期都可以看一次电影。一部片子来到以后，总要演上好几天，使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就在办公大楼后面的空场上，架上一个影幕，露天映，观众自己带小凳或麻扎。冬天虽然没有那样方便，不能每个星期都有，但也经常有得看。

晚会在小礼堂举行。小礼堂在办公大楼的后边。这是一座既玲珑又漂亮的建筑，米黄色的墙，衬着灰色的嵌条，门口有六个通直的圆柱子，建筑不大，估计可以坐七八百人。当我们走进小礼堂时，楼上楼下都是热哄哄地挤得那样满满的。仅仅是三四年以前，这儿还是一片荒滩，然而现在，在那一块小小的舞台上，就将进行一种属于高度文化活动的艺术表演。我从座位上回过头去看着黑黝黝的四周。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具有丰富的生命力量来开辟并进行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他们既能顽强劳动，又能愉快生活。

当我住在石河子的时候，我的窗子正面对天山，只要一抬头，就看到那白雪皑皑的山峰；薄暮西天的晚霞，又红又赤、又艳又烈；夜晚，月色皎洁，大地如洗，这些，大概都是自古不变，千年以前是这样，千年以后还是这样。然而有些事物就大大变了。我所住的那样一间舒适的房间，以前是没有的。前面那一幢一幢玲珑美观的小住宅以及住宅外面的小花圃，以前是没有的。夜晚，四处通明，电灯厂的马达发着轧轧的有节奏的声响，这光和这声响以前都是没有的。这儿本来是一片苇湖，然而现在却出现了一座新城，有了房子，有了花草，有了电灯，正如在那广阔的玛纳斯河流域大平原上，过去是一片荒滩，没有生命也没有财富，然而现在，在那些大平原上，开始生产着黄金色的粮食和雪

一样白的棉絮。河水苏醒了长睡的泥土,拖拉机冲破了原野的寂静。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要永远记载在人类活动史册上的巨大变化。然而又为什么同是一片苇湖,同是一片荒原,千百年来一直没有任何建设,而今天竟然出现了一座新城?过去一直荒芜连年,而今天却开始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粮仓和棉田?这历史究竟怎样解释?这里面的关键究竟何在?这一切不因为别的,只因为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正确的党,它教育了并组织了人民和自然进行斗争,发展生产,改变历史面貌,把人们的生活、思想和社会的秩序、制度都推前了一步。

1955年1月 乌鲁木齐

新疆大棉区的创造

新疆是我们祖国最好、最大、最有发展前途的产棉基地之一。但是新疆成为我们国家的主要的棉区,是在解放以后才开发创造出来的;它的创造又是和苏联对我国的真诚无私的援助分不开的。

新疆被奠定为我国巨大的国家棉区的关键是1953年天山北麓玛纳斯河流域垦区的戏剧性的棉花大丰收。新疆很早就产棉花,不过过去都在南路;习俗认为北疆地寒,不宜植棉。1950年,生产部队在玛纳斯河垦区试种了一些棉花,但产量都很低;个别单位每亩的平均产量还不满20斤(市斤,籽棉。下同),到1952年,全垦区的每亩平均产量也还只有120.4斤。就在这一年冬天,苏联农学专家提托夫教授应聘到达新疆。根据他自己

25年的丰富的植棉经验,他认为玛纳斯河垦区的棉花产量完全有可能大大提高。他提出了一个1953年在玛纳斯河垦区植棉两万亩、每亩平均产籽棉400斤的计划;他并在技术上保证达到这个丰产的目标。

提托夫教授提出的这个丰产计划,是完全有他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经验做基础的。但是对于我们刚刚踏上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边缘、技术落后、经验不足的部队来说,提出这样一个生产指标,在当时确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这个丰产计划就像一个猛烈的炸弹一样,在整个玛纳斯河垦区的部队里普遍地激起了掺杂着怀疑和焦愁的混合情绪。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从制订计划起,一直到各项具体生产操作,处处遭遇到群众性的顽强的思想抗拒。一开头,各个连在制订生产计划时,思想就打不通,订不下去。有些单位在讨论棉花的生产计划时,大家都不敢发言。有些人说,就是把棉花杆子也一起算在里面,恐怕一亩还收不到400斤。

党从来是正确的。党支持了提托夫的棉花增产计划。党在干部和战士中间进行反复的动员、教育和学习。党向战士说,毛主席一再叫我们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现在苏联派了专家到中国来帮助我们,正是我们诚诚恳恳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的最好机会。党具体地指出:学习提托夫教授所教导的各项生产技术就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党指示:提托夫提出的各项技术措施必须坚决执行。

我不打算在这儿详细地介绍提托夫的一套完整的科学植棉方法,但我将说一说他的先进方法和群众的落后经验相抵触的一些主要情况,因为1953年新疆玛纳斯河垦区的棉花生产过程,是我国发展农业生产中先进技术和落后技术、进步思想和保守思想激烈斗争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例子。按照提托夫的办法,

要使棉花丰产必须实行密植。他提出每亩一般应密植 6 000 株。棉株多了,结的棉桃自然就相对增加,棉花的产量也就因此提高;这本是十分通达的情理。但是战士们最初思想搞不通,有些种过棉花的战士说:“我们过去种了几十年棉,没有见过这样密。这样密,保险不结桃。”按照他们过去的经验是:此枝不碰彼枝。他们有这样的谚语:“不稀不稠,棉花地里卧条牛。”又说:“不稠不稀,两千六七。”这就是说,一亩棉田大概植两千六七百株。现在听说一亩要植 6 000 株,思想上总是通不过。植棉时,刘学佛小组原规定行距是 65 公分,株距是 14 公分,每亩密植 6 500 株,定苗时,一律要用定苗尺。可是有些战士却把定苗尺插在腰带里不用,问他时,他说他的手和眼睛就是尺,没错儿。当领导上用定苗尺复量时,那些没有用定苗尺的,每亩却只植了 4 000 多株;实质上是战士不相信密植。他们很多都是这样想法:太密了,出不了桃。(1955 年 9 月,提托夫教授在新乡、石家庄、南京等地考察当地的植棉工作,觉得内地棉花的产量相当低。新乡、石家庄那些地方过去每亩只植 1 500 到 1 800 株,现在虽然号召每亩植 3 000 到 3 500 株,但实际上只植了 2 000 多株。有些地方,过去每亩不到 2 000 株,现在增至 2 500 到 3 000 株,便认为很好了。提托夫教授考察后的意见是:密植才能丰产,棉株的密度一定要大大提高。他认为不同的地区可有不同的标准。目前在内地推广新疆的株数虽然较早,但有的地方可以不少于 5 000 株,有的地方可以不少于 6 000 株。玛纳斯河垦区在提托夫教授的指导下,1953 年,大田一般是每亩植 6 000 株,刘学佛的丰产田每亩植 7 236 株,他的高额丰产田每亩植到 7 687 株。1954 年,大田一般是每亩植 7 000 株,丰产田每亩 8 500 到 9 000 株。提托夫教授总结这几年来玛纳斯河垦区植棉的经验时说:“可以断言,要得丰产,每亩至少保苗 7 000 株。”

他在1955年11月回国以前,建议玛纳斯河垦区自1956年开始,在一部分棉田上,行距改为55公分,这样,每亩可植8000株。1957年,行距改为50公分,这样,每亩可植8500株。单位面积产量将可随着更为提高)。

在棉花的灌溉问题上,先进的科学方法更受到保守的经验主义的强烈而复杂的思想抵抗。提托夫对棉花的灌溉是反对大水漫灌,主张实行沟灌;1954年又更提高一步,要求实行细流灌溉。在新疆,过去都是大水漫灌,把田垅开一个口,让大股的水冲进来,把地都浸满了水。先进的科学方法反对漫灌,要求实行沟灌。所谓沟灌,就是要在行与行之间,开一道沟,水由沟里流进,再渗入土中。这个方法最初受到群众的激烈的反对。他们认为:第一,沟灌就要开沟,不只是一亩地或一块地开一道沟,而是行与行之间都要开一道沟,很麻烦,要花费很多人工。其次,棉苗还小,假如用开沟机开,把土翻动,容易把两旁的棉苗压死。第三,顾虑水从沟中流过,渗不到两旁所植的棉株的根里去。

但是提托夫指出,事实和大家都顾虑的恰恰相反。首先,大家最顾虑的是沟灌比漫灌慢,以为实行沟灌要费很多人工,而事实上,沟灌比漫灌快,实行沟灌反而比大水漫灌还节省劳动力。棉花在生长中的要求是“上顶太阳脚踏水”。棉花要水,但是不需要大水或过多的水。实行沟灌,水从沟中慢流,正可细细渗入棉株的脚根。棉株与棉株之间一般不需浸水。假如大水漫灌,棉株与棉株之间的土壤势将因为浸水而发生板结,这样要花费人工在株与株之间松土。这种松土的工作非常费时,因为必须十分小心,以免损伤棉株。通常一个人一天只能松三分或四分地。但是实行沟灌之后,不许水漫过沟顶,这样可使土壤保持疏松,松土的人工就可完全节省。再说,实行沟灌既节省了水,也可减轻土地的碱化程度。此外,大水漫灌时,由于水势大,常

常容易把进水口一带的棉苗冲坏，实行沟灌以后，这种现象也可避免。

沟灌的好处是解释清楚了，但很多人一方面因为没有把握，一方面因为费工夫、怕麻烦，所以在思想上总是有抵触。有些人说，沟灌的方法虽然好，但是在苏联适用，在中国未必适用。有些实际领导田间工作的干部，表面上虽然不好再反对，却强调客观困难，例如说地势南高北低，坡度大，开沟困难等等。在刘学佛小组里，有些人说，三百多亩地，每一垅里都要开沟，要开多少沟呀！大家不乐意。在领导坚持之下，那个小组第一天用马开沟，开了五亩，他们就用开了沟的五亩和另外没有开沟的一亩，来试一试，究竟是漫灌快还是沟灌快。结果，那五亩沟灌的都灌好了，那一亩漫灌的还没有灌完，因为那没有开沟的一亩，地有高有低，低的地方已涝，高的地方还没有到水。这样，大家才同意实行沟灌。在另外一个单位里，也证明了沟灌比漫灌快。那个单位在 1951 年的 1 112 亩棉田上，大水漫灌，18 天才浇完；1953 年在 1 180 亩棉田上，改用沟灌，只花了 6 天时间就浇完。

上面是谈浇水的方式。在浇水的时间上，也遭遇到保守思想的抵抗。先进的浇水思想是以作物的需要为中心。作物要水，就给它水。但在保守的经验里，则习惯于按照过去的老办法办事。过去的老办法是对幼苗不给水，有意要“旱它一下”。“旱它一下”的目的是：幼苗既然不能从上面得到水分，它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很自然地要把根往下伸长，以争取地下的水分，这样，可以使得棉苗的根深一些，长得牢一些。这个办法在术语上叫“蹲苗”。河北有这样的谚语：“有钱难买 5 月旱，6 月连阴吃饱饭。”意思就是说棉花 6 月需水，水足丰产，但是 5 月里，即正在幼苗时期，却要“旱它一下”。在先进的方法里可没有“蹲苗”这一套，要水就给水。所以第一次给棉花浇水，比老习惯要提早半

个月。很多战士对此不习惯。按照老规矩，棉花立秋以后不能再浇水，认为这时浇水，会影响棉桃的成熟，使棉桃不吐絮。1953年9月8日，提托夫到刘学佛小组棉田上检查，建议他们在某一部分棉田里再浇一次水，可以帮助棉桃发得更大些。但是战士们按照立秋后向例不浇水的旧习惯说，现在已9月初了，怎能还能浇水？党为了教育群众，决定在刘学佛小组的大田和丰产田里都再浇一次水，但特别留出3亩不浇水。结果，没有再浇一次水的那3亩，一些小桃都干瘪了下去，而浇了水的，小桃都变成了大桃，丰产田的棉花更加大开。在另外一个单位里，也有同样的情况。有一个连的棉田在9月初旬，最后还可以再浇一次水的，但由于保守的经验主义作祟，那个连无论如何不肯再浇，结果发生了落花落桃现象。另外一个连最后一次浇了水，不但落花落桃现象减少，并且所有的棉桃都成熟了。

群众对于每亩产棉400斤的怀疑和顾虑，在进入生产过程的后期，已经完全消除了。当棉株开始结桃，结得又多又大的时候，大家开始有了信心，并感到“事情真能这样”。1953年玛纳斯河垦区的棉田，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苏联专家提托夫的认真无私的指导帮助下，在兵团首长的严密督促下，在全体干部和战士的忘我劳动下，终于造成了两万亩大面积每亩平均生产籽棉402斤的辉煌大胜利。其中刘学佛小组的高额丰产田中，有1.61亩每亩产棉1349斤，创造了全国棉花单位面积产量的最高纪录。

这个大胜利说明了些什么、发生了些什么影响呢？

首先，这是为人人所能看到的，这次玛纳斯河垦区的突出的棉花大丰产是先进科学技术对于落后保守思想的大胜利，是对苏联的先进经验从不完全相信到绝对相信的大胜利，是党的正

确领导的大胜利。棉花丰产之后,很多人自觉地检查了保守思想和经验主义,说要是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指导,单靠自己摸索,可能再摸五年也还摸不到这样的成绩。经过了这一次教育,大家对于苏联的先进经验,完全相信了。自此以后,提托夫教授说什么,大家就照着做什么。

提托夫教授所介绍的一整套的苏联植棉方法,不仅在技术上是先进的,而且还都包含了先进的丰富的科学思想,充分表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具有的优越性。提托夫教授不仅教会了我们这些先进的栽培方法,而且通过对这些先进的栽培方法的学习,使我们很多干部和战士在耕作思想上也得到进一步的启发。提托夫所介绍的苏联的先进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不仅已经贯彻了棉花作物的一个范围,就是在其他作物方面,也在这种深刻的教育下发生了显著的影响。冬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种植冬麦上,过去也是素来主张大垅,反对密植的。过去每亩株数,从 16 万到 24 万株,一般在 20 万株左右。在棉花丰产的影响下,玛纳斯河垦区在 1953 年冬麦播种时,就普遍改为密植,有些单位采用了每亩 35 万株的标准。1953 年,全新疆部队农场的丰产面积只有两万亩,丰产作物只有棉花一项;但在 1954 年,全新疆部队农场的丰产面积就扩大到 56 000 多亩,丰产作物除了棉花以外,还增加了小麦、玉米、大豆、高粱和水稻五种作物。在 1955 年,仅玛纳斯河流域及乌鲁木齐区两地的部队农场的丰产面积,就扩大到 132 000 多亩。1955 年,玛纳斯河垦区的棉花又庆丰收,在八万多亩的大棉田上,有 11 000 多亩平均产量在 600 斤以上,其中刘学佛小组的高额丰产田 1.05 亩平均每亩产棉 1 392.86 斤,打破了他们自己在两年前创造的全国纪录。

1953 年玛纳斯河垦区棉花丰产的杰出成就,虽然是生产部

队创造的,然而这毕竟是发生在新疆土地上的事情,因而这个成就又刺激了新疆地方民族的生产情绪,同时明朗地并提前地肯定了新疆地方在全国农业生产上的经济价值和重要地位。毫无疑问,新疆将永远是我们祖国的一个巨大的优秀的棉粮作业区。新疆植棉的前途尤其远大。棉花的理想环境是:无霜期要在150天以上,生育期的平均温度为摄氏25度,日照要长,成熟时水分不宜过多,而新疆的各种天然条件都很理想。灌溉地区是最宝贵的农业区,因为它的水量可以完全由人控制,而在新疆,现有耕地的95%都是属于灌溉区,水量全部可以受人控制。我们国家现在需要更多更多的棉花,但是在内地,假如再增加棉田的面积,就会相对地影响到粮田的面积。同时,在内地也不能像在新疆那样容易找到这样大的大棉区。玛纳斯河垦区肯定地将以植棉为主。他们计划中的草田轮作制,本来是由棉花、粮食、苜蓿等作物轮作的,但是由于国家交下的任务加大,棉田所占的比重,更将提高。提托夫最近又建议从玛纳斯河垦区西北角的车排子一带,再向北推进50至100公里;假如在那些地区可以植棉,则将来还可以再在更北的地区试种,以逐步扩大北疆的棉田面积。至于在南疆,吐鲁番盆地是一个突出的植棉地区,按照提托夫的意见,将来吐鲁番应以棉花、无核白葡萄和苜蓿三种作物为主;在棉花种植上,主要是种长绒棉。在南疆的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麦盖提、莎车、巴楚、墨玉、和阗等地,都很适宜植棉。按照提托夫的建议,凡能种棉花的地区可多种棉花。新开荒的土地在头两年不宜植棉,正好用以栽种粮食。新疆以后每年新开的荒地很多,因此粮食的播种面积是不会因扩大棉田而受影响的。照现在的估计,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新疆的棉田将扩大到一千几百万亩。

生产部队在新疆进行农业生产,对于当地民族老乡的农业

生产,在耕作面积、耕作技术以及单位产量上,都发生了积极的有利的影响。1954年,吐鲁番农民在36000亩的棉田上,平均每亩产棉331.15斤,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在吐鲁番访问时,曾经努力了解:1953年玛纳斯河垦区的棉花丰产对于1954年吐鲁番农民的棉花丰产有没有什么影响?当然是有影响的。除了在植棉的耕作技术上介绍了一些新的经验以外,更重要的是1953年玛纳斯河垦区棉花的大丰产,使领导农民植棉的干部,消除了一部分保守思想,提高了增产的情绪和信心。1955年,吐鲁番1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棉花每亩平均产量是350斤;位于玛纳斯河流域的沙湾、玛纳斯、乌苏三个县里的1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亩平均产量也提高到300斤以上,其中最高的丰产纪录为每亩717斤。1954年冬,乌鲁木齐的八一农学院派出了一个南疆工作组,在南疆许多地区先后给15000多个农民作了技术指导。南疆地带的耕作方法,过去一向是比较粗率的,但1955年南疆几个重点植棉县的棉花产量一般也得到提高,其中巴楚县在25000多亩的棉田上平均每亩产棉312斤,其中最高的丰产纪录为每亩800斤。

最近中央农业部决定,在1956年,以河南安阳、江苏大丰、山东临清、山西运城、河北石家庄及陕西泾渭等地的农场为重点,进行棉花大面积丰产的示范性试验,积极推广新疆部队棉花大面积丰产的经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业已抽派全国植棉能手刘学佛等八人在上述部分地区协助这种推广工作。将来八一农学院并将抽派教师轮回地到内地的一些农场去指导帮助。全国各个棉区以及试验机关、教育机关和大农场,也将派人到玛纳斯河棉区学习丰产技术。正如提托夫专家回国以前在某一次的报告中所说的:“新疆过去在农业上是落后的,现在它由于各种作物的大面积丰产,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上的先进的地方

了。”而这一个巨大的成绩，又是和苏联对我国真诚无私的帮助，以及生产部队全心全意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分不开的。

1956年1月 乌鲁木齐

访前景壮阔的克拉玛依油区

1956年5月11日，石油工业部负责人在北京宣布：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克拉玛依地区已经证实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大油田。就在这同一天，我从乌鲁木齐赶了四百多公里路，专程访问了克拉玛依。

先循乌伊公路到独山子。从独山子，有一条新修的公路向北直达克拉玛依。这条长达160公里、在几个月以前才开辟的公路，就像一柄利剑似的笔直地刺入了准噶尔盆地。当我们快要到达天山、阿尔泰山之间的中心地带的时候，就远远看到那条称为成吉思汗山的山岭从西迤东蜿蜒在准噶尔盆地的西沿。这条青色的、不很高的、山脊齐整得就像一排城墙一样的山岭，给准噶尔盆地增添了不少妩媚。而这新近发现的振奋人心的克拉玛依大油田，就铺展在成吉思汗山的南麓。

我们在这条新辟的公路上行驶，除了一片戈壁和万里云天以外，什么都看不到。没有树木，没有水，没有村庄人家。直到快近成吉思汗山山根，我们陡然看到了好些井架威严地竖立在那旷远的原野上。它们的出现向人们预报：在这片酣睡千年的大地上，就要掀起历史性的变化，使祖国出现空前壮阔的石油工业。

我们终于驶进了目前矿区临时办公的地点；那儿拥挤着很多卡车、帐篷、地窝子以及一排一排可以移动的小木房子。井钻得这样快速，油喷得这样汹涌，使一切思想上的和设备上的准备都跟不上去。兴奋、紧张、局促，交织成一片像火一样炽烈的情绪，弥漫着整个矿区。人们都以无限饱满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定地、夜以继日地在那儿战斗，并且满腔热情地期待着全国范围的人力物力技术的大支援。

中苏石油公司（今新疆石油公司的前身）成立以后，在苏联专家的领导下，曾经在克拉玛依地区进行勘探，初步探明了几个储油构造。1955年7月，新疆石油公司从独山子矿区组织了一支顽强的青年钻井队，在克拉玛依开钻了第一口井。那时，克拉玛依的工作条件是异常艰难的。首先是没有水。水要到六十几公里以外的小拐地方去拉。拉一次水，一往一返要七个小时。有一次，拉水汽车走到一半，由于天气太热，水箱里的水干了，车抛锚在戈壁，等了好久，还是没有等到一个过往的人或一辆过往的车。最后，那两个拉水工人只得冒着戈壁上的灼热的太阳，走回克拉玛依报信求援，司机则困守在车座上守着汽车。那两个工人走了六小时才走回克拉玛依，可是一到克拉玛依，两个人就干渴得昏倒在地上。那时克拉玛依也没有一间房子，睡就睡在露天里，蚊子和牛虻咬得人睡不着。没有伙房，用三块石头架着一个锅烧饭。柴要到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打。那儿又常常刮大风。大风一来，井架都被刮得摇摇荡荡。有时钻杆起了上来以后，被风刮得东摇西摆，对不准口，放不下去。人在风里睁不开眼，要是两手不攀住什么地方就会站不住脚。然而这样艰难的环境没有压倒那些勇敢的青年钻井队员。他们到达克拉玛依以前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且提出了坚决的保证。1955年10月30日，这第一口井终于喷出油来了，这使那些青年钻井

队员的勇敢行为获得了最大的报酬。那天本应该夜晚 12 点下班的班，下班以后都不肯回去休息，他们在井架不远的地方烤起火来，大家围着火，兴奋地谈着祖国如何需要更多的石油和克拉玛依油田的光明的远景，一直谈到上午四点钟，才回去睡。

这第一口井出油的消息，立刻震动了所有关切着这一块地区的命运的人们。从今年起，新的井架一个接一个地在这荒漠的大地上竖了起来。4 月 23 日，第二口井又自动喷出了油。5 月 7 日，又有第三口井出了油。第二口出油的井的出油量比第一口井大四倍，而第三口出油的井的出油量又比第二口井大二点四倍。我在克拉玛依访问的时候，参观了才在几天以前出油的那口七号井，那深褐色的浑厚的原油正一股一股猛烈地在管子里自动喷射出来。

从石油工业的角度来说，克拉玛依是一个具有很多有利条件的石油地区。它的地质情况比较简单，钻探条件也较优越。在克拉玛依钻井，很少发生“卡钻”或井壁塌陷的事故，也很少遇到高压气水层，泥浆的比重也较小，而且大都是浅井。到 6 月 5 日止，克拉玛依已经有九口井出了油，其中有一口井，从开钻到出油还不满一个月，四口井从开钻到出油还不满两个月，另外两口井从开钻到出油不满三个月。井浅，井钻得快，油出得快，因而也就使国家的投资相对地比较少。同时，这一地区的油量也非常丰富。以截至 6 月 5 日止、已经出油的九口井中的七口井所占的 27 平方公里面积（这一带被称为“南黑油山”）的储油量说，就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所给予新疆石油公司的全部可采储量的任务了。

在南黑油山东北约八公里的南小石油沟地方和东北约 13 公里的深地沟地方，也开钻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现在都出了油。

另外,在南黑油山的东南角上,正在钻一口较深的井。目前这口井虽然还没有钻完,但是根据岩心及电测的结果,已经证实地下有油沙。在这样的情况下,储油面积将更扩大;正如石油工业部负责人所宣布的:“如果以今年(克拉玛依)的勘探地区计算,那么(克拉玛依的)储油量就将超过玉门老君庙油田好几倍。”

不仅如此,在克拉玛依东北约 100 公里的乌尔禾地方,也已发现了长达 30 公里的露头油苗,同时经过浅钻也探明那一带有油沙。在克拉玛依和乌尔禾之间的一些地带,也钻探到相当厚的油层。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北长达一百几十公里、东西宽约三四十公里,整个油区的工作面积可能扩展到 4 000 平方公里。

目前整个的形势是:在从克拉玛依南头偏西到北头偏东的乌尔禾这一条直线上,像数箭齐发地正分几条线向东南方向钻探着。以上都在玛纳斯河的西岸。现在还计划在大拐和中拐之间的玛纳斯河东岸也钻一口井。假如在玛纳斯河东岸也能钻到油层的话,那将逐步伸入整个的准噶尔盆地;那时规模之大,就更难想象了。

以上就是新近被证实的克拉玛依地区的石油资源的一个轮廓和前景。在这样一个大面积的油区中,将来可能找出不止一个而是几个油田。同样,在这个大面积上,将来可能出现不止一个而是几个新兴的石油工业城市。克拉玛依有希望成为一个“可以满足国家需要”的大油区。

就当前克拉玛依地区最最迫切的问题来说:第一是水的问题。矿区已经打了一口水井,但只能供应工业用水的需要,人吃的水附近没有,而眼看人又将在很短的日子内像潮水一样地汹涌而来。1955 年底,在克拉玛依工作的不过几十个人,而现在已经接近 1 000 人。在两三个月以内,估计立刻会增加到四五千。水的问题急切需要解决。目前计划从克拉玛依西南 50

公里的青柳沟敷设钢管,把水引过来。将来还要从东北 70 多公里的地方敷设钢管把艾里克湖的水引过来。其次是公路问题。从独山子到克拉玛依的 160 公里的这条新公路,路面还只铺了一半,其余一半还是土路。鉴于运输任务的日益繁重,不仅急切要把全路修好,而且要把公路的修筑提高到相当高级的水平上去。此外,从克拉玛依到乌尔禾大约 100 公里的公路也需要很快地修筑起来。第三是房子问题。目前计划先修 35 000 平方公尺的宿舍和 30 000 平方公尺供发电、修理、库房等用的建筑物。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克拉玛依的加速开发有决定性的影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用很大的力量来支援克拉玛依地区的开发工作。他们拨了一支建筑部队到克拉玛依去修路盖房。几万平方公尺的建筑要限三几个月内完成,而绝大部分的建筑器材又都要从外面运去,这个任务是相当紧急沉重的。此外,自治区又拨了五百多辆卡车,以加强开发克拉玛依地区的运输力量。地方当局,已经尽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是这些力量还只能解决当前一部分的紧急需要。克拉玛依的开发规模太大了,就以今明两年来说,要有几十万吨的器材运进去。他们所需要的运输车辆不是以百计,而是以千计。不仅要车子,还要配备司机。他们明年至少要修建几十万平方公尺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的建筑,这就需要庞大的建筑队伍和数量巨大的建筑器材。他们需要新的大型炼油厂的设计力量和承造力量,他们需要长达几百公里的输油、输水管线的设计力量和敷设力量。在机械方面,他们要数量很多的浅钻机、内燃机、各式储油罐以及各种锅炉等等。还要一个机器修理厂;既要有跟工作规模相适应的设备,还要配备好足够的工人。他们需要巨量的钢板、钢管和其他各种钢材。他们需要地质、钻探、采油、炼油和运输各方面的技术力量,还需要巨大数量的行政干部。而这一切都不是新疆石油公司或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所能解决得了的。

当我离开克拉玛依的时候,那儿的同志们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在这儿动员一切力量,尽我们一切努力坚持下去。但是我们更迫切地期待全国人力物力技术的巨大支援。必须依靠全国的力量,才能把这样规模巨大、前景壮阔的克拉玛依油区加速开发出来。”

1956年5月于乌鲁木齐6月增补

阿尔泰山一带

1955年秋天,我在阿尔泰山一带旅行了一个多月。这一带是祖国西北角上最靠北的地带。过去人们把这一带看成为一个荒寒可怕的地方,实际上,这儿却是一个十分诱人的富庶的地方。我一到阿勒泰,就登上了阿尔泰山的一个主峰。那天云多,我们看远远的阿尔泰山,山云相接,分不清哪儿是山,哪儿是云。秋天游山,本来最美。山间一路都是树木,下面大都是杨树、桦树和云杉;高处则是原始的落叶松。在这秋末冬初、已冷未寒的时候,山上到处是瑰丽的彩色:除了依然闪着光亮的葱绿以外,还夹着嫩黄、鹅黄、绛红、赭红和枫叶红。有时,那满山长着的小灌木冻得发紫,远看就像整个山头都铺着玫瑰花似的。在阿尔泰山,不仅林色美,而且岩石也美。一路经常看到巨大的岩石,奇形怪状,自成格局。岩石上大都长着多年的斑斓的赭红、雪青或草黄色的藓苔。林色和石色相交,使人们远远眺望,高低远近的山峰都成为彩色奇丽的花台。当我登达山巅,纵目四望,我就

看到那条我从小时候起就听到的远不可及、高不可攀、而且被人神奇地称为“金山”的阿尔泰山，那样桀骜不驯地、也那样和平安静地蹲伏在一望无际的最最靠北的国境边缘上。真是峰峦重叠，山连着山！没有再比在高山看万山那种壮阔雄伟的气势使人感到心胸豪放、意气舒展的了。人们向东北方指着一个最高的尖峰说，再过去，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了。向西北，则又毗连着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向南边看，那一片辽阔无边的准噶尔盆地平平地铺展在一阵轻烟似的远雾里。当太阳好时，人们在这山顶上还可以看到从福海海子里泛出来的月白色的水光。

去阿尔泰山一带旅行，最好是在7、8两月的夏季；我去时已经迟了一步，然而毕竟仍然看到了阿尔泰山迷人的山色。这种美丽的山色也不仅仅在阿勒泰一带是如此，后来我到富蕴、青河一带时，所见的景色也都是同样的迷人。我在青河时，遇到一位曾经在富蕴、青河一带山里穿行多次的同志，他说，从青河到阿勒泰，一路都是绵延不绝的大森林。在天山，只有山阴生长树木，但在阿尔泰山，山阴山阳都是树木。森林是这一地区的富源之一。只是到目前止，人们还没有开始很好地利用这一个富源，并且也还说不清楚阿尔泰山的森林面积究有多大。阿尔泰山的森林有百分之七十都是红松，又称落叶松。阿尔泰山的红松和别地的红松还不一样，特别坚硬。阿勒泰的木匠拿到红松，常常要把它先在水里泡一下才能刨，干的刨不动。这种红松，做铁路上的枕木或者建筑上的大材最好，因为它不怕水，不容易腐烂。此外就是云杉、桦木、杨树、柳树和沙枣。桦木也是一种名贵的木材，这一带很多，但也受交通的限制，不能外运。这儿有些哈萨克人和蒙古人喜欢把桦木镂成碗，碗刨得薄薄的，使桦木的花纹极其动人地显示出来。有钱的人还用银子把这种木碗包起来，夏天用以盛马奶子喝，真漂亮。此外还有一种榛树，俗称黑

柳，木性坚韧，最适宜于做一些工具的把手。在布尔津的哈那斯和红帽河两个地方，还有一种果松，专门结着可吃的松子。

阿尔泰山是有名的出金子的地方。据说，阿尔泰山就是“金山”的意思。在旧社会里，黄金被人们看成为最珍贵的东西；你要是看过卓别林的《淘金记》，对此大概会引起更多的荒诞的想象。阿尔泰山产金确是名不虚传。不仅在阿勒泰，就是在富蕴，过去也有很多人采金。除了私人开采以外，在盛世才统治时期，还在阿勒泰（那时叫承化）开办过金矿局。金子虽然值钱，淘金可并不是轻快的生活。淘金的工人天一亮就要下沟，一直干到天上星星出现才收工，整天站在有水的金沟里，不管刮风、落雨、下雪，即使全身淋湿，也不能休息。老板雇着工头，永远扬着鞭子在金沟边来回巡逻。很多初干淘金的工人，吃不消，干了几天就倒下了。淘金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三钱金子，然而即使这样，老板还要在工地上开着小铺子，把靴子、袜子、衬衫这些东西卖给工人，先记账，再在工资里扣，既可少拿金子出去，又可从中多进行一次剥削。他们还在工地上开设赌局，勾引工人入赌。不过根据几个从前的淘金工人说，那些想发横财的金客子后来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因为这次挖金可能暴赚一饱，但下次挖金也可能亏赔一空，因为他们找寻“金线”全凭经验，没有科学根据，所以常常开了个空。

在阿尔泰山一带，现在却展开了一种“挖宝石”的工业。这种“挖宝石”的活动，已有 10 年历史。最近三四年来，这种生产逐渐在扩大。在富蕴，摊开新疆地图看，那是地位很偏僻、交通很不便的一个角落，正是由于这项生产，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生的工业城市。新建筑之现代化和集中化，在新疆，除了乌鲁木齐和独山子以外，就要轮到富蕴了。当我一到富蕴，我就立刻感到这地方充满着活力和紧张。那喋喋不休的风镐声、粗犷的拖拉机

声、震人心弦的爆炸声以及那仿佛有着一肚子怒气的从水电站里汹涌而出的激流声，这一切声音都回荡在这四周是山的可爱的城市中。夜晚，灯火通明；我初到时，那远远山头上的电灯，使我几乎疑为天边的星星。简直不能相信：在那荒凉的戈壁边缘上的山窝里，竟然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有声有色的新城市。

这种生产，虽然主要由国家开采，但同时也鼓励民工（私人）开采。这项生产不仅吸收了边疆各族很多劳动人民，使他们得到了新的工作，而且在阿勒泰、富蕴、青河各地，“挖宝石”也成为一部分牧民和农民的重要的副业。特别是在青河，民工采矿的工作很发达，对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甚至当地政府对于某些较富的矿，安排人民轮流去采，借以调剂一部分贫苦牧民的生活。民工开矿对于国家是具有一定的作用的：一方面，在生产上他们是国家的助手；另一方面，在矿藏的普查上，他们也成为了国家的义务勘察员。山深岭高，国家的勘察力量有限，不可能处处跑到，但熟悉本地地形的、吃苦耐劳的、英勇善骑的哈萨克族，他们只要带上 10 天到半个月的干粮，就可以单骑入山，寻觅矿苗。民工采矿的发展，在又一个意义上也等于为国家培养着更多的熟练的采矿工人。他们对于怎样就可断定有矿、矿脉是如何走的，以及分辨矿石种类等，有些人已经很有经验。再说，有些小矿产量不多，还不够条件由国家来开采，在这种情况下，鼓励民工开采，对于帮助国家完成生产也是有利的。

阿尔泰山一带是我国有名的牧区之一。全专区 11 万人口中，论民族是哈萨克人最多；论职业是牧业最多。我从塔城经过和布克赛尔到阿勒泰，后来又从阿勒泰去富蕴、青河一带，一路上经常看到大批的羊群、马群和骆驼群。一群羊就有五六百只，那是太普通了，有时甚至一群就有上千只羊。当羊群听到远远的汽车声音时，就乱兜乱兜地抢着跑开去，在这时，你就会看到

那肥壮的群羊和那又圆又胀的羊尾巴,那种臃肿的样子使你忍不住要发笑。一只肥羊单单它那尾巴上面的一块油,有时就有25斤甚至30斤重。据说还有这样的事:有些羊太肥了,以致伏在地上以后,简直站不起来了,要人扶它一下才能站起来。阿尔泰山一带的骆驼也特别多。我在伊犁牧区中看到牧民搬家时,主要是用牛搬家,但在阿勒泰地区,主要是用骆驼搬家。骆驼的外貌虽然极其魁伟,但它的性格却很驯良。由于它的个儿很高,所以当人们要把东西驮到它的背上,或人要骑到它身上去时,它总是驯良地先四脚伏跪下来,等人们把东西在它身上扎紧了或人骑好了,招呼它起来时它才站起来。新疆的马奶子大家都已闻名了,而比马奶子更珍贵的东西是骆驼奶子。即使在骆驼较多的阿尔泰山一带,人们也不是很容易喝到骆驼奶子的。一则骆驼的数字究竟比马群要少,二则骆驼要两年才怀孕一次,瘦弱的母驼甚至要三四年才产羔一次,所以骆驼奶的产量远较马奶子为少。在较富的牧主家中,即使有骆驼奶,也只让孩子和老年人喝。在青河时,由于我是一个从祖国首都来的远客,因而才有机会尝到这稀罕的骆驼奶子。

在阿勒泰地区,有一个名字是十分引人的,就是“游牧上”。例如找不到一个人,问到哪儿去了时,就有人会说:“到游牧上去了。”谈到当地的民性风俗时,就会说“游牧上”如何如何。古称西域有“行国”与“居国”之别,“行国”就是指游牧生活。牧民终年逐水草而居,所以在“牧”上面加一个“游”字,实在既美妙而又切当。在解放以前,阿勒泰地区牧民一般是在冬窝子过六个月,在春秋窝子共过三个月,其余三个月在夏窝子。近年来,当地政府帮助他们做了一些更合理的安排,主要是劝导他们稍稍迟些进入冬窝子,同时也稍稍迟些上夏窝子。过去,牧民过早地进入冬窝子,常常使得冬季还没有过完,冬窝子里的草早被吃完,因

而发生牲口没草吃的灾难。现在，政府一面领导牧民在入冬以前就多打过冬的饲草，一面又劝导牧民稍稍推迟进入冬窝子的日子。同时，也把上夏窝子的日子推后一些，使大山上的草能长得更茂壮一些。

冬窝子一般是在一些比较暖和的地方。常常在一些有山屏障、或有较多的树林、可以挡风的地方。在我们这些外地人，有时很难分出冬窝子和春秋窝子的区别。至于夏窝子，则大都在高山之上。据说，苏联的学者说，高山的夏窝子生活对于哈萨克民族的健康和生存，是有着很重要的关系的。在冬季，这些哈萨克民族，或其他以牧业为主的民族，有好几个月都住在很矮小的房子里，空气不流通，日光不够，而且吃不到新鲜的食物。按照哈萨克族的生活习惯，在入冬以前，都要“宰冻肉”。通常，大户人家要宰一匹客马，做马肠子（哈萨克族把马肠子看为最好最珍贵的食物），再宰几头或几十头羯羊（即去势后的绵羊，一般甚肥）。中户人家宰一条牛，再宰几头山羊或不生羔子的绵羊。小户人家宰一条牛。当然，还有很穷苦的牧民连什么都宰不起的。他们把这些牲口宰了，大都还要架起松木火来熏一下，然后挂在屋子里，要吃上一冬天。他们不仅一整个冬天吃不到新鲜的食物，而且他们每天吃肉的时候，大都在夜晚，有时要到深夜十一二点光景，吃上一顿肉，喝上两碗肉汤，就立刻倒下睡觉。这种习惯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这种冬季生活对于人们的体质和健康非常不利，起很大的腐蚀损害作用。然而只要雪一化，他们出了冬窝子，就又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特别是在夏季一段，气候是清爽的，风景是美丽的，空气是新鲜的，日光是足够的，喝的是刚挤出的奶子，吃的是刚宰的羊肉，使他们为冬季的阴湿的、窒塞的生活所损害了的健康，经过这三个月，又恢复了他们的饱满精力。

从冬窝子到夏窝子,像在阿尔泰山那样辽阔的地带,路程常是很远很长的。有一位老汉叫阿布力海牙脱的告诉我,他的冬窝子靠近布尔津县,但他的夏窝子却挨近着蒙古人民共和国。从冬窝子到夏窝子,要搬七次,也就是要走七天。实际上还有比这更远的。在我们看来,搬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在牧区里,搬家被看为一件十分简便而又寻常的事情,就仿佛我们每天要铺一次床,扫一次地一样。不仅从冬窝子到春、夏窝子要搬家,就是在同一个春秋窝子和夏窝子里,也经常是隔几天搬一次家。牲口在这一块地方吃了几天草,就想换一个地方吃草,人们也只好跟着移动。

在阿勒泰专区,在1949年时,全区只有38万多头牲口,到1955年,已发展到107万多头。牲畜的发展有这样的成绩,当然是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做了一系列工作的缘故。从1952年起,肯定了党在牧区的不分、不斗、不划阶级以及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以后,无论在专区或各县,都召开了很多有代表性的牧民会议,并组织很多干部深入牧区,把这个政策普遍宣传,使牧民思想上不再有什么顾虑,安心大力发展生产。政府经常派干部下去帮助牧民配种、接羔;教他们怎样用新法剪脐带;介绍改良品种,进行人工授精;组织并发挥民间兽医的力量,使他们更好地为牲畜治病;领导牧民割储冬草,组织牧民打狼,调解牧民之间的草场纠纷。对于十分贫苦的牧民则发放“救济羊”,帮助他们建立家务,长期生产。这一切具体措施,都促进了牧业的发展。但是除了这些具体措施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秩序的安定。

社会秩序的安定是阿尔泰山地区解放以后的最最巨大的、主要的、具有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之所以是巨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因为这个变化牵涉到每个人的生产和生活,牵涉

到整个地区的改造和建设。过去,人们形容这一带地方说: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反!这短短10个字,包含了多少眼泪、恐惧和死亡!然而从1952年起,这一个40年来一直沉沦在变乱、灾难和苦痛中的阿尔泰山地区,终于走进了一个新的、安定的、一切都在欣欣向荣的新时代。

这个地区过去变乱的情况,在这篇短文里无法细述,只能简单地讲个轮廓。1921年,沙皇将领巴克西带了1万名白俄,流窜我国,占领了承化(今阿勒泰)。当地的守官不敌自杀,部下溃散。白俄勒索与掠夺并行,这势必成为当地人民的一大浩劫。1933年,回人马仲英作乱,福海的沙林巴克副总管煽动群众附和,回族势力占据了承化数月。回、哈两族为一边,汉、蒙两族又为一边,彼此进行了残酷的民族大屠杀。那年秋天庄稼没有收,冬天又是大雪,人畜饿死的很多,又是一次大劫。1940年,盛世才强收民间枪枝,官逼民反,就在富蕴爆发了武装反抗,富蕴、青河两地参加反抗的人有二千多。阿尔泰山人民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政权,实自此时开始。但人们更难忘记的是1946年以后的乌斯满叛变。乌斯满和国民党勾结,反对三区革命,并在国民党的帮助下,在1947年一度占领了承化,到处烧杀抢掠。在阿尔泰山一带,越是深入群众,越能体会到乌斯满匪帮给当地人民所造成的灾害的巨大。我在阿勒泰和布尔津访问一些牧民时,几乎个个人在谈话中都要牵涉到乌匪的罪恶。那一带,有很大数目的牧民都曾被乌匪俘掳到东山去过(当地称富蕴、青河两地为东山)。当他们被掳走时,都是有不少牲畜的,但那些牲畜有的被乌匪宰吃了,有的被抢、被偷了,有的因为长途奔走病死了,很多人当他们从东山回来时,只剩了很少很少一点牲口,有的仅仅只剩了自己骑着回来的一匹马,或一头牛,甚至还有不少人只好步行回来,生活困苦到了极点。然而更其残酷的是,当后来三

区革命军把乌斯满打出承化，并继续向东追击时，乌匪就把富蕴、青河两县几乎全部的以及福海一部分的牧民，强迫他们搬到国民党统治下的昌吉、阜康、奇台、木垒河和巴里坤一带去；甚至还有被迫搬到甘肃去的。在青河，1948年和1949年前后，全县只剩了17户人家，然而即使整整一个县只剩下了十几户人家，这十几户家中有些人还是饿死了。在富蕴，基本上也成为一空县。绝大多数的牧民是不愿意离开他们可爱的故乡的，但在当时，不服从乌斯满的命令，就将失去自己的生命。他们苦痛地赶着自己的牛羊，越过几百公里长的无人的戈壁沙漠地带，一路上都造成很大的混乱和伤亡。那时富蕴、青河一带不仅所有的生产活动被迫停止下来，整整两个县都陷入了可怕的空虚和死亡的状态。

解放以后，乌斯满终于在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海子附近被捕。他部下的一小部分人，由于过去长期地听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于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因而继续在阿勒泰地区进行扰乱和破坏的活动。主要是以谢尔的曼（乌斯满的儿子，他们是富蕴人）为首的一股，以富蕴为中心，扰乱着四近各地，有一度还居然流窜到阿勒泰城附近的哈拉松一带。另外以胡山音为首的一股，骚扰着青河一带。党为了早日解除人民的苦痛，早日安定社会秩序，早日发展地方的生产，宣布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不再危害人民，遵守国家法令，改过自新，努力生产，就从宽处理，不再追究他们的过去，并在生活上给他们出路。由于过去盛世才、国民党的一再欺骗当地人民，因而使他们对于党的宽大政策，最初仍然有着很多疑惑和顾虑。政治争取工作是在极其细致、复杂和忍耐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牧区工作，耐心尤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经过好几个月的往返，在1952年9月，谢尔的曼等人终于感激党对他们的宽大，并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归顺政府，

亲自到达阿勒泰谒见地方上的党政首长。谢尔的曼表示以后一定好好做人,努力生产,以赎过去的罪过。另一个头目胡尔曼表示,以后如再为非作恶,就不如畜牲。谢尔的曼等人归顺政府不久,盘踞在青河一带的胡山音一部分,也跟着归顺政府。阿尔泰山一带多年的变乱不安,在党的正确的政策和坚定的努力下,从此结束。党领导阿尔泰山地区的人民进入了新的、安定的、发展生产的时代。

社会秩序安定的效果,首先在一些数字上表现的是:1950年时,全专区的人口还不到7万人,1955年已增加到12万左右;1949年全专区的耕地还不到12万亩,1955年已发展到30多万亩。牲口的数字前面已提到过,1949年时全专区的牲口只有38万多头,1955年已发展到107万多头。这些数字像铁一样地证明着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阿尔泰山地区解放以后第二个历史性的变化是当地的粮食生产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自给自足。有史以来,这地方的粮食一直是仰求外区供应的;过去主要是依靠塔城、沙湾和奇台等县及苏联的接济。由于仰求外区供应,再加上当时官、商的操纵,过去阿勒泰一带的粮价很高。据说在1933年以前,一只羊只能换到五杓子麦子(大约10公斤上下)。1933年以后,由于苏联的帮助,粮价降低,但一只羊也只能换到50公斤上下的麦子。1955年阿勒泰的面粉一公斤售五角九分,但在1949年,一公斤要售一元一角。所以过去这一带只有城市里有粮,山区里根本没有粮;只有少数牧主富户才能吃得起粮,绝大多数的人都吃不起粮。1950年,干部到游牧上去时,很少看到有人吃面粉,顶多吃一些塔尔米(糜子),但也只有在秋收以后,秋冬两季有吃,到春夏两季就连塔尔米也没有得吃了。当有些干部带了一些用面粉做的饊或馍上山时,一般牧民都视为上品。

在解放以前,阿勒泰专区西面四个县,阿勒泰、布尔津、哈巴河和吉木乃的部分地区,稍稍有些农业生产基础,至于东面福海、富蕴、青河三个县,则可以说没有什么农业生产基础。在民族分配上,过去当地的汉族、回族以及少数维吾尔族种些地,哈萨克族则很少有人种地;而在阿尔泰山一带,主体民族就是哈萨克族。过去哈萨克族不种地的原因是多种的,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民族习惯,但更主要的还是没有人领导。有些人说哈萨克族只爱吃肉,不爱吃粮,这是不正确的。爱吃肉是事实,但未必就不爱吃粮。我访问过的一个哈萨克族老乡说:“过去我们不种地,很少吃粮。看到别人吃粮很新鲜、很羡慕。可是我们既没有力量买,又没有人领导我们种,所以我们吃不到粮。”

在旧时代,由于多年的民族习惯以及对于生产事业缺乏正确的观点,在哈萨克族里是看不起种地的。在那个时代,假如一个哈萨克人竟然不得不去种地,那是一件十分苦痛的事情,因为只有一点牲口都没有的人才被迫去种地,不管他是给自己种还是给别人下苦。然而现在,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情况完全变了。现在,阿尔泰山地区很多从事牧业的哈萨克人都同时兼种一些地了。甚至过去不管怎样也非去夏窝子过一下高山清凉生活不可的哈萨克族,现在有些也留下来照顾田地的生产,不上夏窝子了。我问他们夏天不上山习惯不习惯,他们笑着说:“最初一两年确实不太习惯。可是生产要紧,现在已经习惯了!”这一带很多互助组现在都是一部分人带着牲口上山,一部分人则留下来照顾田里。

阿尔泰山是牧区,应以发展牧业为主。但提倡农业并不就是不要发展牧业,正相反,提倡农业生产正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牧业。过去,由于没有粮吃,就势必增加肉的消耗。多吃肉就要多宰羊。此外,一切生活上的需要都要依靠出售牲口来解决。但是现在种

了一些地以后,不仅自己吃的粮食解决了,粮食有多余时还可以换购其他生活用品,这样,就大大地减少了发展牲口中的障碍和负担。阿勒泰二区有个大牧主苏来曼,他现在的羊子已经发展到三千多只。这几年来他一直听从政府的指导,兼搞农业生产,一切生活都依靠农业生产来解决,用不着宰羊卖羊。大家都说共产党这个办法好,道理对,领导正确。过去看不起种地也不会种地的哈萨克族,现在都对农业生产有了兴趣,并且学会了如何种地。甚至像富蕴、青河那些过去对农业生产没有什么基础的地方,这几年也有了很好的发展。在富蕴,1949年全县的耕地还只有一千一百多亩,1955年已增加到一万九千多亩。在青河,以前简直很少有人种地,1955年也发展到了一万三千多亩。

过去人们以为阿尔泰山一带气候较冷,不适宜发展农业生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一带冬天要比他处冷些,然而春天来得并不迟。解放后这几年来,一般在4月上旬或中旬,就都开犁。一般早熟作物此地大都能种。在过去,此地只种了一些春麦和糜子,但解放以后,这地带的作物种类已经增加很多,除了春麦和糜子以外,还种了冬麦、大麦、燕麦、玉米、谷子、豌豆、胡麻、葵花、菜籽等。在阿勒泰的农业部队甚至还试种了水稻。我在访问那个生产部队时,就吃过他们在当地种的大米,很好。今年他们又试种了东北大豆,也是成功的。除了粮食以外,蔬菜的种类也大大增加,种了大白菜、莲花白、茄子、洋芋、黄瓜、西红柿、萝卜、菠菜、辣椒、豆角、西葫芦、南瓜、大葱、大蒜、甜菜、韭菜等。在果树方面,也正在移植试种之中。阿勒泰的森林分局在1951年从塔城移来了一百多株苹果苗,从1954年起都已开始结了果子。

阿尔泰山地区不仅可以发展农业生产,而且还有着很多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在阿尔泰山地区,发展农业不能妨碍牧业,

但这一带土地多,农牧的矛盾不大。土地大,同时也就容易使用新式农具。这一带的水不仅不缺,而且很富裕,实际上人们还没有很好地充分地利用当地的水。由于此地是牧区,畜力不缺,这对于使用新式农具是一个有利的条件。牲畜多,肥料也就多,积肥也没有困难。在农牧结合的政策下,农业在阿勒泰地区是有发展的可能的。

一个半月在阿尔泰山的旅行,给我的总的印象是愉快的,具有生命力的,并令人时时回忆着的。当我从和布克赛尔翻过层层大山,终于在那高峻的山岭上看到那远远的像一条白蛇一样的额尔齐斯河时,它是多么美丽而又多么雄壮呵!这是阿勒泰地区的一条主河,从富蕴向西流,经过布尔津、哈巴河流入了苏联。所有哈巴河县的哈巴河、布尔津县的布尔津河、阿勒泰县的克兰河、富蕴县的库颜尔德斯河以及还有很多大小河流,都自北向南地流入了这条额尔齐斯河。当我们从布尔津去富蕴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条河的南岸的山坡边走着的。额尔齐斯河的鱼在新疆是有名的。从布尔津到阿勒泰是120公里。阿勒泰躲在一个山凹凹里,山紧紧地抱住这个城市;别处冬天冷,但阿勒泰冬天仍较暖和;克兰河流过城的中央。当我们穿过山口,初入市区时,那激流、卵滩、杨林、木桥……构成了一幅美丽而有诗意的林景。富蕴也和阿勒泰一样,处在一个深深的山窝里。我们翻过了20公里纵深的乌恰大坂,又在吐尔公盆地中穿行了20公里,再翻过一个小山梁,就到了富蕴。四面是山,当中是库颜尔德斯河,河边是密密的桦木林,夏天尤其美。在青河,在我们到达城区以前,也见到一大片桦木林。我们在桦木林里穿过,又渡过青格里河,一切都十分美丽动人。过去从内地到新疆来的人不多,到阿尔泰山一带的人更少。现在情况变了。在阿勒泰,在银行及贸易系统中,南方人特别多。最近阿勒泰的贸易公司

到了一批新从上海来的女孩子,她们叽叽喳喳,蹦蹦跳跳,就像一群小鸟一样。食堂里只要她们一来,就显得更热闹起来。在富蕴,从内地来的青年学生很多。在我所接触的一些青年中,有的就是在北大、清华等校毕业的。我们再不要用旧脑筋看新事物,以为阿尔泰山一带是一个荒凉的无所作为的地方。在这一带,无论是工业、牧业、农业,都是有着广大的发展前途的。

1955年11月 乌鲁木齐

流散哈族的救济

富蕴、青河在新疆的东北角上,是以哈萨克民族为主体的两个牧业县。由于前面一文所叙述的历史变乱,在解放前几年,这两个县都成了“空县”。

解放以后,在1950年和1951年,就有一部分流散在外地的富蕴、青河一带的牧民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故乡。但是大部分仍然滞留外地,没有回乡。有些人,由于过去长期地受了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党还不够了解,因而采取着观望的态度。又有些人,他们过去曾经跟着乌斯满在阿尔泰山一带做过一些坏事,害怕回去以后要被追究,所以不敢回去。1952年9月谢尔的曼的放下武器、归顺政府,消除了很多人的疑惧和顾虑。“连谢尔的曼都被政府宽大了”,很多人这才放下了心,相信党的宽大政策是真的。同时,解放后几年中,他们通过自己亲眼看到的许多事实,对党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觉悟到过去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党来后要消灭宗教、没收财产、没吃没穿以及屠杀少数民族这一类说法都是一

些没有根据的谣言。因之,从 1952 年冬起,过去流散在奇台、巴里坤一带的哈族,便一批一批地自动地返回故乡。

这些在外乡流散了多年的牧民,饱受忧患,他们回乡时,有很多只剩下了很少几只羊子,有的甚至连一只羊也没有了。还有的,连自己骑的马也没有了,只能徒步走回去。党对于这些流散的穷苦的牧民非常关切,并且集中了很大的力量来安抚他们,救济他们。很多地方,当那些流散牧民回来以后,就有干部下去,或者是挨户,或者是以阿乌尔(相当于自然村)为单位,进行慰问,并了解他们的困难。对于那些极其穷苦的牧民,除了进行了紧急的救济以外,还从多方面来帮助他们。有的介绍他们到金属公司矿上去挖宝石;有的组织他们去伐木卖柴;有鱼的地方(如福海)组织他们去打鱼,打了由贸易公司收购;有骆驼的,组织他们去外地参加运输。救济工作在 1952 年就已开始。那一年,在富蕴发放了 3 万多斤粮食,在青河发放了两万多斤粮食。在 1953 年,党和人民政府在阿尔泰山地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救济工作。那一年,阿勒泰专区一共拨付了 37 亿元(旧币,下同)的救济款项,其中一半以上都用于富蕴、青河两县。第一次救济在冬末春初,那时陆续从外地迁回的一些贫苦户,还没有找到工作,又没有口粮生活,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发放了救济粮和救济金。第二次救济是结合春耕进行的,除了发放救济粮以外,还贷放了很多籽种,解决了一部分牧民生产上的困难。除了这些临时性的救济以外,为了比较彻底地帮助贫苦牧民长期建立家业,发展生产,党和人民政府在那年 7 月又进行了第三次救济,发放救济羊。救济羊的发放工作是十分认真和细致的。事前一面召集了游牧头目和积极分子座谈,一面又纷纷召开了以阿乌尔为单位的群众会,讲述发放救济羊的意义和发放的等级标准,然后再由下而上地一级一级评上来。被评为一等的最

穷苦的牧民，每个人可以领到五只救济羊。在富蕴，最多的一户领到了33只救济羊。事前政府派了专职干部到塔城一带买了大批羊群，再分送各地分别发放。党是要切切实实地使那些被救济的贫苦牧民真正能够在党的帮助下发展生产并建立他们自己的家业的。

在1952到1954这三年中，富蕴先后救济了六次，发放了救济羊三千六百多只，救济粮五万四千多斤，救济金九千多万元，被救济的有950户。在青河，这三年中一共发放了救济羊二千三百多只，救济粮三万六千多斤，救济金一千六百多万元，被救济的有668户。这两个县，在上述三年中，受到政府救济的牧民，大体上占到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对于那些在政治上争取回来的争取户，党还另外拨了专款救济他们。其中关于救济羊一项，平均每人得到了五只大羊和三只小羊。这样，就使得那些多年来在山里流散不定的人们，也能安下心来从事生产。

很多得到救济羊的贫苦牧民都说：“过去财主没有给我一只羊。父母兄弟也没有给我一只羊。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给了我羊。我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我终生不忘党和毛主席。”他们都保证要好好爱护羊，好好牧放，决不宰食，一心发展生产。就是不是直接得到救济羊的人们，看到党这样深切地关怀着人民的生活，也为之衷心感动。青河县的桑德克和衣巴特两位老人说：“国民党对我们说，共产党不要宗教，要没收财产，害得我们有些人逃到青海，流落甘肃，甚至亡命印度。在戈壁滩上，渴死了饿死了很多人。去年（1952）我们回到青河，看到各种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国民党所说的那个样子。党和人民政府几次救济我们。这次又给我们庄子两户穷人发了救济羊，我们都很高兴。政府救济的虽是两家，实际上是救济了我们大家，因为我们

哈萨克族有句谚语：‘一个人肚子挨饿，全部落受到影响。’我经过了几个朝代，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好事。”福海县有个牧主雅开斯说：“政府为了搞好救济工作，干部不怕山高、水深、路远，深入到游牧上每一户去了解，务使真正的穷人能得到救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由此也证明党在牧区的政策真正是提倡发展畜牧业和不斗不分的，这也就同时消除了我那怕斗怕分、对党的政策的怀疑顾虑。”

在富蕴，在给争取户发救济羊时，富蕴县的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沙都瓦哈斯毛拉（哈族）对那些争取户说：“今天政府救济你们，并不是害怕你们，而是表示关怀你们。1952年我叫你们归顺人民政府，那时你们顾虑政府不会对你们宽大，怕受了骗。今天你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政府究竟是怎样待你们的。今后你们要好好发展生产，报答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对你们的关怀。”谢尔的曼最后代表受救济的全体人员感谢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他说：“今后我们一定遵守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规，努力发展生产，建立幸福的生活，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谢尔的曼现在担任了阿勒泰专员公署畜牧科的副科长；原在他部下的另一个头目胡尔曼担任了富蕴县人民委员会畜牧科的副科长。我在阿勒泰和富蕴两地时，曾想访问他们，不巧他们都下乡了，等了好久没有等着。后来我在青河时，访问了原属胡山音部下的千札达、汉札达两兄弟，他们都是青河人。他们兄弟两户一共15口人，1952年回来时，什么东西都没有，只剩了一个木碗和一把小茶壶。在1952~1954这三年中，政府一共给他们发了九百多斤面粉、二百多斤麦子、19块砖茶、60米布、900万元，以及112只羊子。汉札达说：“我们刚回来时，心里想，只要政府宽大，不追究过去，使我们夜里能够好好安睡，就已心满意足了，做梦也没有想到党和政府这样关怀我们，一再救济我们。

党对我们的恩情，真像我们的头发一样，数也数不尽。”千札达说：“过去国民党欺骗我们，使得我们害怕共产党，在山里跑来跑去，当土匪，拿枪打政府。要是在旧政府的时候，我们这样回来了，我们的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早就被宰掉了。现在党不仅宽大我们，而且还救济我们，这才使我认清自己过去的错误。今后我们只有完全相信党，听毛主席的话，才能走向幸福的道路。”

在富蕴，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热合木的，本来是谢尔的曼的部下，可是归顺政府以后，仍不好好劳动，经常在富蕴偷盗一些牲畜去奇台出卖，又从奇台偷盗了一些牲畜赶回富蕴出卖。这事情被他的本部落知道了，他的部落便把他押送政府，要求政府叫他好好劳动改造。可是后来这个热合木在劳改中溜逃了，他又想鼓动人们上山作乱。他去看谢尔的曼和胡尔曼。谢尔的曼和胡尔曼都对他说：“你要上山，你一个人上山去吧，现在再没有人跟你上山了。”结果，谢尔的曼和胡尔曼把这个热合木押送回政府。这是1953年的事。在1955年春天，热合木又溜跑了。有一天傍晚，他悄悄地从外面什么地方溜了回来，可是当晚就给他部落里的头目知道了。第二天一早，那个头目就来报告政府，这样，又把热合木押了起来。头目对热合木说：“从前是‘官迫民反’，现在党和政府待我们这样好，不仅不杀我们的头，反而还救济我们，我们还反什么？你自己不好好劳动，你对得住党、对得住毛主席、对得住你自己、对得住我们大家吗？”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历史的秘密和党的真正的伟大。在阿尔泰山地区的具体条件下，党首先争取社会安定的宽大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接着，党又集中了很大的力量来帮助人民安家生产。在这样一个英明的党的领导下，人心怎还会“思变”，社会又怎会不欣欣向荣地一天比一天繁荣昌盛呢！

1955年12月 乌鲁木齐

在阿尔泰山之巅

我一到阿勒泰，就去访问了阿尔泰山的一个主峰。上山那天，下面还是好好的天气，可是走到半路上，便落起雨来，接着在雨中飘着疏疏落落的雪花，再上去则风雪弥漫，放目四顾，尽是白茫茫的一片了。那时还没有到中秋，可是我们都已穿戴上皮衣皮帽，俨然严冬景象。到了目的地，看到山上盖着好多幢虽然很小然而饶有风趣的木屋。山上尽是岩石，没有树木。山坡很陡，没有一点平地。每幢木屋都是在山坡的乱石中铲平了一小块地面盖起来的。

这地方一年12个月，倒有九个多月在风雪的世界里。雪要到6月中旬才化完，但到8月底9月初，又开始下雪了。冬天的雪很厚，一次要下一公尺左右。有时积雪厚达三公尺。要是在一些低洼的山腰里，风把别处的雪也刮了来，甚至会有十几公尺深。有一年有一次，一夜醒来，窗子和门都被雪埋了，人们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屋子里走出来。不仅雪大，还经常刮风。1955年4月刮了一场大风，把几座房子的屋顶也刮掉了。黑板报被刮得在200公尺高的天空中飘。连有五六百公斤重的铁斗车也被风刮倒了下来。在大风之中，雪就变成像冰糖那样的结晶体，把人们的脸打得热辣辣的。大风大雪常常使得整个的山头沉沦在一片浓得化不开的迷雾里，有时甚至连一公尺以内的东西都看不见。7、8两个月是这山上比较晴和的日子，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夏天”，人们也不能离开棉衣。在这两个多月里，虽然不下雪，但却经常下雨。

有时山上满天的好太阳,但下面的山沟里突然有一股黑云卷上来,云到雨也到。雨势凶暴,还夹着很大的冰雹。

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无情的、在自然条件上极其突出的地方。这是一个要求人们以极大的勇敢、智慧和忍耐同自然进行搏斗的地方。这是一个考验并锻炼每一个人的心志体魄的地方。然而在伟大的党的教育下,人们总是能够经受考验,在困难中锻炼自己,并创造出艰巨的业绩的。1951年秋天,当人们勘探矿藏初到这个山巅的时候,山上除了岩石以外,什么都没有。他们五六十个人密密地挤在两个帐篷里,锅灶安置在露天里,山高天气冷,经常煮不熟饭;有时苏联专家也只能陪着大家啃冷馍。由于山上没有树木,无论是烧的柴火或是架屋的木料,都要到下面的森林里采伐了再背上来。他们大都下了班就下山去背木料,一来一回五小时,回上山时已快午夜了。1952年,到了两部空气压缩机,可是运不上山来,要把机器拆成零件,再用牲口驮上山。机器装好了,还要燃料,也得用马驮。但是山上雪厚,牲口也只能驮到离山头八公里的地方,再往上就得改用人背。那时专门抽出了一部分人背油,每天背的也只够每天烧。特别在化雪季节,背油更困难,底下的雪化了,面上的雪还没化,有时一脚踏下去,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拔起脚来。所以只好改在夜里背,因为夜晚气温低,冰比较厚,从午夜1点出发,到早上9、10点钟才能背到。但是为了不使生产停止,没有一个人在困难前面屈服。

1954年,金属公司在这深沟、险坡和悬崖的山岭间开辟了一条公路。但是有了公路也保证不了山上山下终年通运。在10月以前,10轮卡车扣上铁链,还可以勉强上山,10月以后,雪大封山,汽车就不能直达山顶了。由于气候的限制,通常矿本部总要抓紧在6、7、8这两三个月里把矿上一年中需要的生产资料,如机器、燃料、爆炸器材、各式零件以及所有职工一年中的食物、木柴和生活

用品都运到山上。这并不是一个简单轻易的任务。这条新公路是在1954年9月1日通车的，但通车不久，就进入了雪季，以致一部分物资没有能够在限期以前全部运足。以后继续用汽车、兽力、人力分段运输。在汽车不能到达的地方，改用牛拖。牛也拖不上的地方，再用人背。但是用牛拖也仍得人先在前面踏出一条路来。假如没有人先替牛开道，牛就会掉进路旁的雪窝里去。1955年1月下旬起，山上连续落了半个月雪，燃料的供应被迫中断，影响了生产。党发动了所有山上的和阿勒泰城里矿本部的职工参加了伟大的扫雪斗争。一头从山上扫下来，一头从山脚下扫上去，花了六千多个人工，终于在从三公尺到十几公尺深的积雪里打通了一条八十多公里长的走廊。1955年2月里，由于另一件迫切的任务，山上的人要下山，但是路上雪厚，人在雪里走，雪虽已陷到胸口，而脚还没有着地。党组织了一个三四十人的开路突击队，第一个人先把身子向雪地上一扑，把雪压下了三十多公分，再把腿向下面一跪，又把雪压下了三十公分，然后才能抬起脚来前进一步。就这样，气力大的也只能连续开五公尺路，气力小的就只能开两三公尺。第一个人气力用完了，就倒在路旁休息，再由第二个人如法接着前进。就这样，这三四十个人花了四天工夫，才把从二道房子到大桥之间的九公里路打开。人们就是这样英勇地在党的领导下同险恶的自然环境进行着顽强不屈的斗争。

在生产上，情形也是一样。工人们都是日夜三班地不停息地生产着。无论天气如何严寒，除了遇着特大的风雪以外，一般都坚持工作。有时，大雪把铁轨埋了，党就立刻派人在每一二百公尺之间现下现扫，来维持清砂的运输交通。有的就在轨道两旁竖上许多木桩，钉上木板，借以挡拦两边的风雪，就像挖成了一条白色的战壕一样。风大的时候，两个人推不动铁车，就再加上两个人一起推。天气确实是寒冷的，但是劳动着的人，仍然一身是汗。

很多工人下班的时候，帽子上衣服上都挂着冰凌，胡须、鬓发甚至汗毛都沾着冰霜。不仅没有人抱怨天气，天气反而成了伟大工人阶级忘我劳动的最亲切的证人。

上山第二天，清早一醒，我就忙着看天，深怕又像昨天那样，满山迷雾，什么都瞧不见。所幸那天满天太阳，也不刮风。我们住的地方大约海拔二千七百多公尺，要到山顶上的采矿场，还要上行二百多公尺。有一个雪崖，又陡又滑，沿边竖着一些木桩，上面系着粗大的缆索，供人攀援。我一把一把攀着缆索奋力走上去，神经和肌肉都紧张到极点。然而不管怎样困难，只要不中途掉队，就是胜利；我终于到达了 this 高峰上最高处的采矿场。

矿场上的情景是生动的。我们先看到一个很大的凹了进去的露天窟窿，这是已经开采过的一个露天采矿场。现在另一个更高的地方正在被开采着。我们到达的时候，刚爆炸过，看到很多推运工人正在忙碌地把被炸开了的石块装进铁斗车里，通过轻便铁轨推送到选矿的平台上去。另外还有一些工人攀登在很高很陡的山崖上，用铁杠把那些可以用人力扳下来的岩石扳下来。在选矿的平台上，有着很多手持小锤的男女选矿工人在守候着。他们从矿石里细心挑拣；常常一铁斗车倒下来，拣到的只有很少很少一点。那些堆积废矿石的地方被称为“矿尾”，很多矿尾就像一条一条齐整的长堤，向天空延伸出去，为这高山构成了另一种新的奇景。我们参观了露天矿以后，又看了一个地下矿。隧道的入口处挂满了冰凌。隧道里有一个地方打了一口很深很深的竖井，在竖井底层进行着更深一层的钻探工作。我穿行在那隧道里，看到在黑暗中到处都发射着点点闪亮，这情景仿佛一下子把我带进了一个神话的世界里，那样美又那样充满着神奇的意味。我们从隧道里出来，再回到山顶，看到远近山脊上长着的嶙峋的

巨石,有的就像锋利的刺刀一样刺入天心。云在山下不断地穿浮,放眼所及,满目都是旷无际的千山万壑,这是何等旷达、雄伟而又壮丽的景色!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荒寒的大山之巅,却出现了一个现代化机械化的工业场地,勇敢的人们在那儿不懈地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小时候,夏夜纳凉,常听老年人讲述一些寻觅宝石的神话,而现在,我经历了千万里的路程,登上了3 000公尺的高山,终于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幅生动而伟大的挖宝图。这既不是怪诞的神话,也不仅仅是一两个探险家的活动,这是真切的现实,这是为国家创立下的不朽的勋业。

我在这高山上住了三天。在这短促的访问中,我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在前面叙述过的那些故事所代表着的那种无比坚韧的战斗意志,以及我所接触过的那些人在谈话中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些年轻小伙子,嘻嘻哈哈,边说边笑,一切困难的事情在他们的谈吐里仿佛都变成了最轻松的故事。“我们这儿不能和内地比呀,我们是在祖国的边疆,我们是在开发祖国的边疆啊!”他们说,当他们一想到这些,就感到自己的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从而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当大风雪袭来的时候,他们就想起《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一书中的那些英雄榜样,阿列克塞、丹妮亚、根卡等人的英雄形象立刻呈现在他们眼前,使他们格外勇敢坚定。……然而这一切感人的印象又引导我进入一种更深沉的感念:越是边域遥远、地方荒奥、山深岭高、风雪袭人,就越使人深切感到强大的党的强大的力量!在我们的国家里,在新生的时代中,最最深刻巨大的事情是这个强大的党的强大的光芒在全国无所不达!我们不能想象:在祖国边疆这样一个深奥的大山中,自然条件这样险恶,要是没有党、没有党的领导和支持,人们会在这样荒寒的地方创造出这样光辉的成绩!我们更不能想象:

在今天中国,不论是怎样一个荒僻的角落或者怎样一座峻险的高山,怎会没有党的光芒的照耀!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党,就有英勇的斗争,就有创造性的劳动!在这个高山之巅,正因为有了党、有了党的领导和党的不断的教育,人们才能认清自己工作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党不仅领导人们同自然搏斗,党还领导人们教育自己;党不仅组织人们生产,党还教导人们如何生活。在这个大山之巅,正如在祖国其他地方一样,也有着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也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在山上,一天有三次广播,既有新闻,又有音乐。每星期有两次电影,有时周末还有舞会。山上有图书馆,有医疗所,有邮电代办所,有矿区贸易公司。条件虽然艰苦,但生活全凭自己创造。

多少年代以来,我们的国家一直沉沦在黑暗的、有劲使不出的、近乎瘫痪的境地,可是解放以后,全国就像久阴初晴的原野一样,到处阳光焕发,生意蒸长。每个人,每块地方,都在劳动着,创造着。他们既创造财富,又创造历史。阿尔泰山上的战斗只是全国万里战场上的一角;它所缔造的诗篇也只是时代大合唱中的一行。三天山巅所见,使人更加坚信,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必然日趋强大,并将按步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

1955年11月 乌鲁木齐

欢乐的库尔班节

我到达伊宁的第三天(1954年8月10日)就碰上伊斯兰教的库尔班节日。伊斯兰教每年有两个节日,一个是开斋节,一个是

牺牲节；在新疆，前者被称为“肉孜节”，后者被称为“库尔班节”。在这两个节日中，回族习惯上把肉孜节视为大节，库尔班节视为小节；但新疆除回族以外的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则把库尔班节视为大节，肉孜节视为小节。

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规，回历每年九月是斋戒的月份。在封斋期间，日出以前进餐礼拜，一直要到日落以后再进饮食，白天不准饮食。根据教义，真主因为感到人间贫富悬殊，为使富有的人也能体会穷人的痛苦，所以命令所有的教徒一律每年斋戒一月。在封斋期间，并须对穷人施舍救济。一月期满，即行开斋，所以开斋节都在回历的十月一日。

在开斋节(即肉孜节)的后70日，即回历十二月十日，是牺牲节，即库尔班节。这个节日的来源据说是这样：当时有一个“圣人”依不拉引，祈求真主给他一个儿子，许愿每年宰牲祭祀。不久，他的妻子果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司马义。但是当司马义已经长大到七八岁时，依不拉引并没有履行他的宿诺，因之有一天依不拉引在梦中见到真主责他失信。依不拉引在梦中就说愿宰100峰骆驼献祭，后来又增到200峰，真主仍不同意，并启示依不拉引应该宰一个他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为祭。第二天，依不拉引便把他梦中所见告诉他的妻子萨拉，并说准备把自己最心爱的儿子司马义宰献真主。他的妻子和儿子听了以后，也都愿意遵从真主，牺牲自己。当依不拉引正要动手宰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真主知道了他的诚意，就立刻遣派天使杰不拉衣带了一只羊送给依不拉引，说他既然如此诚心，可以宰羊以代。自此以后，每逢回历十二月十日，全世界的伊斯兰教徒，都虔诚地宰牲祭祀，过这个神圣的牺牲节，即库尔班节。

这两个节日的日子，虽然在回历上是固定的——每年的十月一日和十二月十日，但是一合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公用的阳

历,这两个节日的日子就每年不同了。例如 1954 年的库尔班节是 8 月 10 日,到 1955 年的库尔班节就会在 7 月底的一个日子。这是因为阳历和回历的算法不同的缘故。回历本来也有太阳年和太阴年两种年法;供宗教仪式用的大都采用太阴年法。太阴年法以月亮圆缺 12 次为 12 月,一年只有 354 天。但是阳历一年有 365 天。回历太阴年法每年要比阳历少 11 天。因此这两个节日在阳历的月日上就每年都不相同。

但是这两个节日虽然在回历上是固定的、一致的,而各地过这两个节日的日子,又会彼此不一致。原来在回历九月开始斋戒时,必须在八月二十九日的夜晚先看看天上有没有新月。回历太阴年各月的大小,本来都是规定的:逢单,月大,30 日;逢双,月小,29 日;八月逢双,本来应为小月,仅 29 日。假如八月二十九日的夜晚,见到天上有新月,到第二天就开始戒斋,而八月仍为小月;但是假如这天晚上不见新月,则必须第三天开始戒斋,而把八月改为大月。同样,在九月二十九日也须先看天上有没有新月,如有,则第二天开斋,过开斋节,而九月即改为小月;如不见新月,则第三日开斋,九月仍为大月。由于各地天气不一,有阴有晴,甲地看到新月,乙地未必见到新月;因此在甲地可以明天过节,而乙地可能要在后天过节。在新疆来说,各地都由当地的阿訇会商决定。常有因为连着几天不见新月而推迟几天封斋或开斋的。

对于伊斯兰教徒来说,库尔班节之于他们,犹如阴历年之于汉人。这是他们一年中最愉快的日子。现在在新疆,每逢过库尔班节,所有的机关、学校、团体和企业,对于民族干部和民族学生,一律给假三天,使他们能够和他们的家人欢度这个隆重的节日。在这三天之中,不准说任何不愉快的话或者提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同时,在这三天之中,彼此互相拜节,使平时不大相叙的

亲戚朋友,在一年之中至少也有一个叙旧团好的日子。这犹如汉族社会在过阴历年时去家家拜年一样。按照维吾尔族的风俗,在库尔班节的前一天,家人都应该到祖先的坟上去念经,回来以后,在家里还要念一段经。要是自己不能念,则也要照样跪在地上听别人念。在节前的晚上,长辈还要给子女小辈过节钱,这和汉族社会在大除夕长辈给小辈发压岁钱一样。

在库尔班节那一天,大家起身很早,起身后首先净身。但这种净身和普通的洗澡不同;假如在过节前一天在澡堂里洗了一个澡,这并不能就算净身,因为澡堂里的水是不洁净的。通常,净身大都采用像淋浴那种方式,有一个水罐或水桶悬吊在上面。这种水罐或水桶,底下有一个小孔,附有塞子,洗身时,把塞子拔除,水就由小孔中流下。这样,凡是净身用的水都是干净的,而洗过身子的不干净的水则已随时流去。伊斯兰教这种用水的方式确是人世间最洁净的一种用水的方式。有些礼拜寺里,都设有专备教徒净身的地方。这种净身又分大净和小净两种。大净在经语上称为“乌斯里”,就是用淋浴的方式从头到脚洗净全身;在宗教节日,或参加宗教祭祀,都须实行大净。无论男女,在同房、遗精、月经及生育以后,也都须大净。另外一种是小净,仅仅洗一下手、脸、脚及生殖器,经语上称为“阿布代斯”,在做礼拜以前,都须小净一下。必须净身以后才能进入礼拜寺,这叫做“身上带了水”。

在库尔班节那天,我刚一醒来,就听到市内远近礼拜寺所发出来的鼓声。这种鼓声初听起来,异常单调沉浊,它是用大鼓和班鼓两种鼓按照一定的简单的节奏击奏出来的。然而当你久久地听着这样的鼓声时,你会逐渐感到这鼓声虽然单调,却很肃穆。我匆匆地洗了脸,就到一个最大的礼拜寺去参观。这个大礼拜寺就在我住的斯大林街南面的一条街上,很近。在礼拜寺的大门旁边,矗立着一座有三层高的亭楼,上面插着国旗,挂着毛主席像,

还插着其他很多颜色的旗帜。这座亭楼，在教会里称为“邦克楼”；那招呼教徒前来礼拜的鼓声就是从这座高高的邦克楼上发出来的。进入大门以后，是一个有树木的院子。礼拜和讲道用的礼拜殿则位居院子的正中。这座礼拜殿大约七间开阔，十六七间进深。礼拜殿里铺满着一条一条长的地毯，教徒就整齐地一排一排地跪在这些地毯上。礼拜殿里面什么装饰都没有。伊斯兰教做礼拜叫做“乃玛子”。他们做乃玛子时，和其他宗教不同的是，他们不要在他们面前有任何陈设。例如佛教，做佛事时总是要悬挂许多佛像。内地民间信佛的人，在屋子里或者供奉释迦牟尼佛像，或者供一个观世音像。基督徒则都大多挂着耶稣的像。但是伊斯兰教什么像都没有，而且什么东西也不挂。他们做乃玛子时，都是朝西。假如在野外，只要在他面前是一片空旷，则朝西就可以做乃玛子。假如在屋子里，只要朝西前面是一堵白墙，他也可以面壁祈祷。所以，我们在其他宗教的寺庙里，常常可以看到悬挂着很多的神像，但在伊斯兰教的礼拜寺里，都是四壁空空，没有神像，没有装饰，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什么都没有。因为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只有在你面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才直接面向了呼大（波斯语，即真主——原注）。

我到那个礼拜寺的时候，时间还早。看到东、南、北三个门，一批一批的教徒结伴而来，经常是七八人或十几人一批，他们大都是同住在一条街上的。年老的走在前面，年轻的走在后面。有的年老的人还用白布缠着头。用白布缠头，平时在伊宁的街道上并不常见，这时在礼拜寺里，看到的比较多一些。这些由老年人领导的一批一批教徒进入门口时，常常一进门就站住，先念上一段经，大约两三分钟光景，念完后行了一个“接都瓦”礼，再继续前进。“接都瓦”是伊斯兰教中一种通行的礼节，用两手摊开，左右手指相接，使两手摊成90度角，然后扬至额角，从鼻部、口部徐

徐下抹，连抹两下；这也是一种祷告的意思。

教徒进寺以后，就静静地走进礼拜殿，跪在那里。也有就在殿外的走廊上，或南、北、东面的院子里跪下来的。有的人自己带了一条毯子或白布来，以作垫膝之用。此外，还有一些孤苦老弱的乞丐，跪在大门入口处的树下，他们大都衣服破烂，苍老憔悴，其中女的则用布蒙着头部，不让别人看到面庞，有的还带着孩子跪着，这些乞丐都在等候着教徒们在礼毕后对他们的施舍。

7点半左右，乃玛子开始；那时估计已经到了二千多人。那天到礼拜寺的人一般要比平时多一些，因为这一天是一年一度的大节日。很多民族干部这一天也到礼拜寺去做乃玛子。不过妇女还不能入礼拜寺，只能在家做乃玛子。

乃玛子开始，阿訇在上面领做，一忽儿全体俯腰前拜，一忽儿又大家跪下，全身伏地。如此前后好几次。虽然不懂阿訇念的是些什么，但是我看到整个礼拜寺的空气异常庄严肃穆，大多数都闭着眼睛，没有一点儿杂声。

做乃玛子的时间并不很长，只有10分钟光景，做完以后，大部分教徒起立外出，他们在院子里，互相握手问候。还有一小部分教徒则仍留在礼拜殿里，听阿訇继续讲经。

在库尔班节，只要境遇大致还可以的人家，差不多总要宰一个羊过节。所以一个库尔班节过下来，要宰掉不少羊。在解放以前，每逢要过库尔班节，一些私商便乘机垄断市场，高抬羊价，使很多穷苦市民买不起羊；甚至有时即使出了高价还买不到羊。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尊重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对于当地人民过库尔班节，不仅不加干涉，并且还采取了关切和爱护的态度。库尔班节还没有到，贸易公司早就做好了供群羊子的准备工作，按照平常市价尽量供应，务使要宰羊过节的人都能买到羊。按照当地的宗教习惯，各家宰羊以后，都要把羊皮赠送给礼拜寺里的

衣麻木(礼拜寺里领导教民做乃玛子的阿訇——原注)。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政府常常只出市价一半的价格,向各礼拜寺强行收买这些羊皮,以图厚利。现在,这种情况再也没有了,各礼拜寺都把教徒赠送它们的羊皮转售给贸易公司,贸易公司按照牌价收购,并且一律支付现款。

10点半,我就跟当地的一些汉族领导同志一起出去拜节。我注意到他们首先拜访的一批,都是当地宗教界的一些有名望的领袖人物。

我们去的第一家是维吾尔族大阿訇阿不都木太阿里海力凡的家里。进大门后先是一个套院。套院一面是马厩和堆积饲料的楼房,另一面似乎是下房。从套院走进内院,院里种着一些花草树木。我在伊宁到过不少人家,但看到有套院的这还是第一次。房子是平顶的,前面有一道走廊。这是维吾尔族的民族建筑格式。伊犁地区的房子,除了过于简陋的以外,在房间前面大多都是有一道阔阔的走廊的。先由大阿訇的儿子把我们引导到客室里。屋子里铺着厚厚的地毯,地毯中间铺着一块很大的洁白的白布,上面放着各种糖果饼点。在房子的上角,有一座玻璃书橱,里面放着一些书籍;靠窗的一个角上,放着一张小书桌,上面摊着几本经文,我们先盘膝坐下来。等了一会儿,老阿訇出来了。他已经有八十多岁,穿着一身淡黄的绸质的袷袂,长统皮靴,带着小帽,胡子很长很白。他的儿子则端着茶进来飧客。此地一般都不用茶杯。在整个伊犁地区,除了在个别机关、部队里,我很少看到茶杯,一般都是以碗盛茶。他们倒茶并不倒满,一般只倒半碗光景。那个大阿訇的儿子看上去也有四十岁上下,他把茶分送客人后,就自己跪在客室的门外,偶尔把头抬起来偷看一眼客人,发出欢欣而又羞涩的表情。老阿訇精神还好,只是毕竟年龄大了,多

少显出一点疲乏的神色,不过这 80 高龄的老人,居然仍能一个子蹲坐下去,又一个子用两手一撑站起来,也就很不容易了。

我们接着又拜了几个民族不同的阿訇。后来到了一个回族阿訇的家里。这个回族阿訇,就住在他主持的清真寺里。这座清真寺还是乾隆年间修造的,距今约有一百九十多年,但是木料房架都还很好,屋顶上的瓦脊和屋头上的飞檐,都是雕花的。整个大门和大殿的结构和内地的一般庙宇相差无几。院子里还有两株苍老的榆树,枝荫四蔽。回族阿訇说的是汉话,回族的生活一般也接近于汉族。在他家里,就不再是席地而坐,而是有桌有椅的了。而且,在他家的果盘里,有着瓜子和花生,而这两样东西,我们在其他各家都是没有见到的。

最后,我们到了一个“琼阿訇”家去拜节。维族称“大”为“琼”,所以“琼阿訇”就是大阿訇。这一位琼阿訇头上缠着白纱,身上穿着一件白底金条闪闪发光的织锦袷衫。他的气色甚好,满脸红润,两眼矍矍有神,胡子很长,完全雪白,已有 70 岁,然而风度犹若只有五十岁上下。他向来客欠身作礼,既庄严而又谦和。他的名字叫翟里甫卡力阿吉,是乌孜别克族。他的经学很高,是第一个把可兰经译成维吾尔文的人。他客室里地毯上所陈列的糖果碟盘,也特别琳琅美观。我数了一下,大概近 40 件。其中有他家里做的草莓糖酱和樱桃糖酱,我们特地尝了一下,很美。

到阿訇家里去拜节,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既不能饮酒,也不能吸烟,而且主客庄端,仪礼甚重。向阿訇们拜完节后,我们就向地方上一些民族负责同志如专员、厅长等拜年。到了这些人家,空气比较活泼轻松起来。拜年拜到这个时候,大概每家的羊肉也大都烧好了,所以每拜一家,都要坐下来吃一点羊肉;在有几家,还喝了伏特加酒。羊肉是一大块一大块煮的,放在大盘子里端出来,主人就用刀子当着客人一片一片地削起来。另外一个碗里放

了一些掺有香料的盐水,以供渍食。

在我们去拜年的这些人家中,有三家的主妇是塔塔尔族。在主妇是塔塔尔族的家庭中,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维吾尔族家庭多少有些不同。一方面他们家中都有桌有椅,另一方面他们饕客的饼点也不相同。大概塔塔尔女子都能做很好的点心。在这一天,我观察到,这几家塔塔尔主妇的家庭都做了很好的大蛋糕。大蛋糕有方的有圆的,里面有馅,一般是苹果馅,因为这时正是苹果当令。蛋糕的四边还做着精致美观的花纹。有两家还做了很好的什锦蛋糕,馅里放着核桃仁、杏仁以及葡萄干等,拌着很多的鸡蛋和牛奶,做得又软又香。

我们拜节一直拜到下午四点多钟。我们接触的 these 家庭,都是民族社会的上层分子,生活比较优裕,文化水平较高。我注意到这些人有着这样一些共同现象:屋子里都有一定的陈设,铺着较好的地毯,挂着窗纱,放着长方形的西餐桌,桌上铺着美丽的桌布;而椅子的式样和质料一般都很精致。在汉族人家,在客室里面是不放床的,但在此地,我看到有好几家都在客室里放了一张铺着洁白的床单的床,据说他们实际上并不睡这张床,似乎把床也当作了一种陈设品。这儿还有一个共同现象:大多数家庭里都挂着几百万分之一的欧洲、亚洲地图,都是俄文的,印得很精致;挂汉文的世界地图或本国地图的则不多。此外,和闾出的地毯也成为了一种装饰品,悬挂在墙壁上。每家都有很好的一两亩大的果园,种的主要是苹果和葡萄,偶尔也有种梨和杏的。每家人家都有盆花。玫瑰花在这一带很普遍,而且长得好,又盛又香。

整个的城市在这个库尔班节是欢乐的、活泼的,并富于色彩的。我一生之中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生动鲜艳的城市。满街来往着马车,上面坐着一车子一车子的穿着五颜六色的妇女和小孩。兄弟民族平时本来就是讲究穿衣服的,现在过节,自然打

扮得更美更漂亮。尤其是妇女,很多颜色和花色,在内地一般妇女穿不出、不敢穿的,这儿却是百花齐放,炫耀夺目。那像石榴花的火红色,那像金子一样闪着光芒的金黄色,那像罌粟花一样的洋红色,那像铜锈生绿那样的浓绿色,而且配着一身是胆的大花式,带着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使你竟不得不停下步子来向她们夺目而视。另外,则是一些极其文静的色调,像天色甫明那样鱼肚白的淡蓝色,像还没有成熟的苹果那样的嫩绿色,淡淡的像一阵轻烟似的淡紫色,那娴静的嵌着小白花的藏青色,这一切,在你身边过去,又好像一阵清风似的使你感到一种凉爽的感觉。这儿的女子,她们常常兼具东方与西方之美;既丰满而又窈窕,即活泼而又柔和,她们行走在树荫下,风姿绰约,遗留给人们以一种深长的记忆。

1955年3月 乌鲁木齐

路中邂逅

——记一个维吾尔农民的谈吐

1955年5月下旬,我访问了巴音郭楞蒙族自治州以后,从焉耆去库尔勒时,打算顺便游览一下离开焉耆不远的古迹“千间屋子”;据说这可能就是焉耆古国的遗迹。千间屋子在焉库公路的西面,从焉库公路上的紫泥泉子地方进去,大约不过10公里光景。可是我们在紫泥泉子附近往返找了几次,都没有能够找到去千间屋子的小路。最后只好停下车来,向附近的一个维吾尔族老乡打听。

这位维族老乡看来是去过千间屋子的，因为他指点得很详细。可是照他的指点，我们估计仍然不容易找到。我的翻译就和他商量，问能不能在这个村子上找人带领我们去一下。不料这位维族老乡很热情地自愿把我们这个要求接受了下来。

这一带土地不好，地下水位很高。我们的车子在草丛、硷滩和沙窝中艰难地前进；有的地方连寻常的车辙也没有，全凭这位老乡指点。走了快一个钟头才走到。我们游览了这个古迹和附近的千佛洞，可是一个不小心，车子却陷入了一块淤沮地。这块淤沮地一共不过两三间屋子那样大，除了在地面流着一些发着油光的黄水渍以外，并没有其他任何引人注目的征象。当我们嘴里连声说“不好”而把车煞住时，车子已陷在里面动弹不得了。司机同志想挣扎前进或后退，可是车子越挣扎，车身陷得就越深，终于四只车轮完全陷在淤泥里。这地方，附近10里方圆以内没有人，在人力及工具上都得不到援助。我们已经担心当晚要被迫露宿在那个荒野里。可是经过整整三个小时的努力，最后终于把车子从淤泥里拔了出来。

结束了这个大难以后，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假如我们那时直接去库尔勒的话，可以少走十几公里路。但是我们应该首先把这位给我们带路的老乡送回家去；这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当我们告诉他先送他回家时，他非常高兴。来的时候，他已经介绍过他自己的名字叫阿合买提，这时，我们又知道他是一个互助组的组长，并且是和硕县三区七乡的乡人民代表。

这位阿合买提老乡，小个儿，黑黑的脸，长着一点胡子，一直是很沉静的，带着一种热情、关切而又谦和的神情陪伴着我们。当我们送他到家时，他的大门正反扣着。他敏捷地跃上一条短墙，用熟悉的口哨招呼他那个正在田里的妻子回家。他是要她回来给我们烧一点茶水。我们大伙那时也当真渴得厉害，就坐在

他的炕上，把带着的一些糕点摊开来，一面等茶喝，一面和他聊了起来。

我说：“阿合买提同志，你今天花费了很多劳动的时间，带我们去游览千间屋子，我们非常感激。你最初并不知道我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你就自动地愿意为我们带路呢？”

他说：“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当我最初看见你们时，我想，你们要不是从中央来的，也是从乌鲁木齐来的。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需要汉族老大哥多了解、多帮助。过去国民党时代，没有人关心我们，现在汉族老大哥关心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很感激。你们既然找不到千间屋子，那地方我又去过，我就应该帮助你们。今天我本来也要劳动，但我今天耽误了，明天可以补一补，你们的时间性比较迫切，假如今天去不成，以后就可能没有机会再去了。

“同时，你们对我的态度很好，这也是我愿意给你们带路的一个原因。你们请我和你们一起坐上小车子；这样的小车子我过去从来没有坐过，很快。国民党时候，他们也叫我带过路。他们自己骑在马上，叫我在前面跑；有时我拚命跑，还追不上他们的马。有一次，他们明明多一匹马，可还是不让我骑，宁可叫我牵着那匹马走。而现在，情况就完全改变了。

“还有，我知道你们游览了千间屋子以后是要去库尔勒的。我心上一一直盘算，大概你们游览完了以后，就直接去库尔勒，我自己要一个人走回来了。可是没有想到，车子陷在泥里已经多耽搁了三个多钟头，你们还要先送我回家。这样的事只有在毛主席的时代才能有！”

我说：“当车子陷在泥里的时候，你心里有些什么想法？”

阿合买提说：“首先，我感到我路没有带好。当车子陷了进去以后，我心中十分难过。我几次向翻译同志建议，让我到附近的

九乡去找人来帮助。你们大概因为路太远，一往一返有二十几里，不愿我走这许多路，所以没让我去。同时，我看到车子陷进去以后，你们就大家都动手：挖泥的挖泥，找土块的找土块；你们自己做，却又不叫我做。在国民党时代，要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一定不动手，而只是叫我们做了。你们既不叫我做，我就只好自动地学你们，你们做什么，我便帮着你们做些什么。”（阿合买提曾自动地脱去鞋袜，帮我们挖泥。）

“你看见我们弄时，信不信车子会弄出来？”我问。

他笑了起来：“我最初看到车轮子一转再转，不仅车子不能出来，反而车身越陷越深，我心上就想：糟了！所以我当时心中一味想到附近去找人并找些工具来。可是后来我见到你们拿出了一个小东西（千金），一扳一扳，虽然吃力，终于把车身和轮轴一点一点抬高了起来，最后使车子开出了泥地。我心里想，汉族老大哥毕竟是有办法的啊。”

我们的谈话转到他们乡里的情况。阿合买提说，这几年来，他们乡的面貌改变很大。他们这儿一带的农民，过去都不是本地生长的，大都是在十几岁时从外地来到这儿的，解放以前一直受着封建地主的剥削。稍为好一些的粮食都给地主拿走了，他们自己只能吃一些玉米。常常很多人家都断粮，要是有了几个饅，就要好几家分分吃。可是现在呢，他说：“毛主席把我们大家都救了，我们再也不怕挨饿了，而且我们再也不会有挨饿的日子了。过去我们吃的是玉米饅，现在我们吃的都是白面饅了。”

农村面貌改变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他们是这些从前被压在底下的劳动人民，现在都翻身当了主人了，因而现在很多事情，大家都抱着主人翁的态度来处理。他说他们这儿有几条水渠，过去浇的都是地主的地，所以大家都不大愿意去挖渠，地主便用鞭子打他们，强迫他们去挖。可是现在呢，一到了应该要挖渠的时候，大

伙儿都自动地来询问,并且积极报名,参加挖渠。

我问他他们互助组里种了多少地?他说种了4500斤种子的地。“种了些什么?”“棉花、小麦、芝麻、玉米、水稻、瓜。”“是冬小麦还是春小麦?”“两种都有。”“你们过去不是一向不大种棉花、冬麦和水稻的吗?”“过去这儿一带的确不种或不大种这些。国民党不关心人民的生活,他们从来没有指导并帮助我们发展生产。再说,过去的地都是地主的,我们这些下苦的人更作不了主。今天,我们自己有了土地,党和政府又号召我们发展生产,提倡种植多样作物。政府有示范农场(部队的农场)领头种,我们跟着学。焉耆地区向来是缺粮的,要靠外地接济,可是自从解放以后,没两三年,到1952年,粮就够吃了;1953年起,反而还有多余的粮外运了。现在不仅粮够吃,而且作物的种类也很多,除了粮食作物以外,还有很多经济作物了。”

当我问他政府在生产上对他们经常有些什么帮助时,他说:“在生产上和生活上,政府都给我们很多帮助。从春播到秋收,政府一直像父母照顾子女似的照顾着我们:地怎样犁,水怎样浇,用什么种子,以及怎样拔草中耕等,真是从头教到脚跟。过去我们收割后,总是把粮放在场上搁几天,认为庄稼既已收割了下来,放在场上搁几天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大伙儿先想歇一歇。可是政府指示我们,说放在场上,鸟吃、鼠搬,有损失,号召大家把粮早早入仓。这样细心叮嘱,还不是为了我们好!政府经常派干部下来帮助我们生产,但是除了应缴的公粮以外,政府并不需要我们负担任何额外的费用。相反,过去粮食不够的时候,政府就运粮接济我们;为了帮助我们克服生产上的一些困难,经常举办农具贷款和籽种贷款等。这些,在过去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政府宣传互助合作,对我们也有很多帮助。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大家都分到了土地。但有些人,分到的土地不大好,有些人农具不够,有些人

劳动力也有困难。政府号召我们互助合作,这是指导我们走的最好的道路。以我们这个村子来说,现在只有两户单干,其余都已经组织了起来。过去没有力量办的事情,自从组织了起来、实行互助合作以后,就都有力量做了。”

我们谈到这里,时间已经不早了,即使立刻动身,到库尔勒时也快要天黑了。我们告辞时,阿合买提说,这次的相识和相谈,都是意外的,然而他却感到非常愉快。他说:“我经常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表达我们少数民族对他的感激恩情。但是在全中国的农民中,像有我这样的意愿的人是太多了,当然不可能个个都能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好好劳动。这次大家选我做乡人民代表,也就是因为我劳动好的缘故。我应该用更好的劳动来争取有一天能够去北京见毛主席。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更好地团结各族农民,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早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我对毛主席的敬礼和保证。希望你回北京的时候,把我这点小意思带给毛主席,并祝他老人家长寿万岁!”

1955年8月 乌鲁木齐

在塔里木河的下游

1955年6月,我在塔里木河的下游访问了一个小村。这个村子的居民过去终年捕鱼为食,并且吃草根;他们穿的是粗糙的麻袋布,见了外面去的陌生人拔脚就跑,一下子都躲进了芦丛或沙山。由于很少人知道通达这个村子的路径,我们只能一站一站地换人带领。我们从尉犁县城出发,沿着孔雀河的北岸东行。一路

都是野生的梧桐，纤绿可爱。后来渡过孔雀河，穿过群克尔村，道路就穿行在许多小河和湖沼中间。那些小河里鱼很多，有些还浮生着娇艳的野荷花。越往南走，戈壁的景象越发浓厚。有些地方尽是沙墩，沙墩上长着黄绿相杂的红柳。经常看到雍容的天鹅遨游湖边，而两眼矍矍的大鹰，雄踞路旁，直到我们车子驶近，才突然惊飞。向西南远方看去，见有旋风上卷，一柱冲天，这又是戈壁中常见的景色。

我们最初是在通往塔羌的大道上走着的。到了卡拉，便离开大路朝西向着塔里木大戈壁的东部边缘前进。从卡拉，经过英可尔，通往客拉切其，一路都是草丛、杂木和沙窝。路径若连若断，使人不辨进退。我们在那烤人的戈壁太阳下驶行了八小时以后，终于越来越接近蜿蜒在塔里木大戈壁东沿一带的沙山。沙山不很高，然而另有风致。那像被熨斗熨过了似的齐整的山棱和贴平的坡面，给我一种极其单纯、新鲜而又深刻的印象。就在这蜿蜒的沙山脚下，流着来自千里以外、历史上久享盛名的这条旷达的、豪壮的，同时也是桀傲不驯的塔里木河。

当我们还没有到达客拉切其的时候，汽车马达的声音已经把这个平静的小村扰乱了起来。村里的人们，都怀着讶异、新奇而又紧张的心情，伸着脖子四面探望。有人发现在远远的沙窝里有着一个黑色甲虫似的东西一点一点向他们驶近。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我们一定是走错路了，因为自有这个村子以来，就没有到过汽车，也没有到过专门去访问他们的客人。当他们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是专门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人群里马上腾起了一片欢呼。人们争着涌上前来和我热情地握手，即使最年轻的妇女也不感到一丝害羞。

这儿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那些平平的沙地，而是被风吹成波浪似的一道一道的沙岗。沙岗不很高，大约两三公尺光

景。沙岗上间或露着一些从沙子里挣扎出来的红柳或苇子。整个村子就被包围在这样一望无边的沙浪里面。

我们被引导到村子东头的一排矮小的屋子里。屋子是用土砖砌成的,只有两扇门,没有窗子。屋子里砌着一个有一公尺半高的、可以通烟到屋顶上的壁灶。后来主人们在屋边没有太阳的沙地上铺了毡毯,我们就在那儿围坐下来。他们特地煮了新鲜的塔里木河的鱼招待我;多年以来,鱼是他们活命的恩物,现在又成为他们饕客的佳肴。由于天热,村子上的人们都露宿户外;那一晚我也陪着他们睡在那旷畅的沙浪上。当他们以为我们已经入睡时,便轻轻地走动,轻轻地说话,想尽量不惊扰我们。虽然夜晚的大空是静默默的,然而在默默的大空中,我一样感觉到民族之间互信互爱的亲切的感情。那天正是阴历十三,繁星满天,皓月当空,我放眼四望,深深感到这个时代的豪壮,虽则已很疲惫,但还强自振作,细味这难得的丰富的境遇。

很久很久以前,这一带本来也是水足草茂的地方。后来,在塔里木河的上游,有些地主恶霸任意截拦河水,就使下游一带水源日见枯竭。我们在路上曾经看到一个地方残存着很多像被大火烧过似的枯死的大树,据说这就是“水走了”的遗迹。多年以来,像我所访问的那一带地方,都已沦为“洪水漫浇地”,平时没有水,要到大山化雪,上游发着洪水的时候,才有水流到这儿来。由于地势高低不一,水势有强有弱,每年的水漫到哪儿就是哪儿,没有一定。水漫到了,大家就把那块地的一些低洼的地方堵起来,把水堵住。到第二年春天,水已经渗入地下,于是就在地上撒种,这样,那块地就算种上了。过去,即使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封建地主乡约仍然不放松他们的残酷的剥削。由于每年究竟哪些地漫到了水、可以种,没有一定,所以每年春天都要分一次地。我访

问过一个叫作白拉提的老汉，他说：“洪水来时，拦霸堵水这些苦工都是我们做的，但是分地的时候，全由乡保长作主。好一些的地，都由他们占了，分给我们的地，又少又不好。我们不能不种，还要向他们鞠躬道谢。在过去，我们这些穷人每年最多只能分到种 50 斤种籽的地，但是那些地主乡保长占的地，却可以种到 1000 斤种籽以上。他们自己不劳动，那些地还是要我们大伙儿分着帮他们种。”

在农民分到的这一点小土地上，要是年成好，可以收上三四百斤粮，要是年成不好，那就收多少算多少。可是年成好不好，实际上和农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要是多收了些，乡保长就来了，摊派这个又摊派那个，到头还是送给他们了事。“像我们这些苦户人家，那时一年能够有上 100 斤玉米面，那就是够好的了。”那个白拉提老汉接着这样说时，又用手指了指塔里木河那边的海子（湖沼）说：“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一带的人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反正我们从小时候起，就是整年靠吃鱼吃草根过活的！”

塔里木河下游海子很多，海里大都有鱼，据说大的有大到两抱半的，一般也有我们的腿子那样粗。这一带没有树木，村民们到一天路程以外的地方背回了巨大的树干，把它刨成独木船，再用野麻织成鱼网，到海子里去抓鱼。他们整天、整月、整年地一日三餐吃的都是鱼。他们吃鱼也没有什么调料，只是用白水把鱼煮熟，浇上一些盐水。秋收以后，当他们得到了一点点可怜的玉米面时，有时便在鱼汤里撒上一把做成面糊汤喝。在野沙枣熟了的时候，有的也用野沙枣和玉米面煮汤喝。我尝过他们的野沙枣，颗粒只有黄豆那样大，皮里就是核，仿佛里面什么都没有，然而他们形容那沙枣汤时说：“甜甜儿的，酸酸儿的，味道可美哩！”这些就是他们整年中最好的食物。鱼是热性，吃多了，心中发躁，所以他们经常又吃一些长在海子边的、浸在水面以下的那一段比较软

嫩的、发着白色的、据说可以解热的蒲草根。在他们的用具中，除了锅是铁器以外，其他如盛水的桶、洗东西的盆，以及碗和匙等，都是用木头做的。他们用两只木叉再加上两三片木板就造成了一架简单的织布机。他们很早就能利用野麻的纤维织制麻袋布；也赖有这种智慧，才使他们蔽体有物，免于寒冻。新疆几乎到处有盐，他们可以在不远的地方挖到发着晶光的盐块。火也不愁，因为家家都有上代传下来的打火石。他们过去把自己的生活保持在很大程度的自给自足的原始状态之中。他们那时也满足于这样。他们害怕并躲避和外面的世界来往。

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外面的世界所能给他们的只是更大的灾难。他们形容过去地主乡保长的可怕的情景时说：“他们每次到村上来，都是骑着马，扬着鞭子，一言不合，见人就打。他们没事不上村，上到村来不是要这，就是要那。”有的说：“有时还有一些富人跟着乡保长来，他们经常把村子上的人抓走，带到别的地方去下苦。”以后，他们一见老远老远有着骑大马的人来时，全村就像一阵风似的都躲了起来。他们说：“难道那些富人上村子来还有什么好事？”只要能跑，他们总要想办法跑开，村子跑得空空的。

这种苦难现在终于结束了！解放以后，这地方起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虽然由于这一带都是“洪水漫浇地”，不存在土地所有权问题，因而也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然而那些封建地主乡保长的恶势力，却很快地被解放后的劳动人民赶跑了。解放不久，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就选出了自己的乡长和村长。过去，他们每年分一次地，现在，他们仍然每年分一次地。可是过去分地是由地主乡保长支配作主，农民不敢说一句话。现在分地，即由乡长领导，区上还派干部来参加，先由村上研究协商，大家同意后再分。这一带的最大的困难是缺水，可是在1952年，解放了还不到三年，

一件历史性的的大事在这一带人民的生活里出现了：尉犁县人民政府为了照顾塔里木河下游一带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在那年春天，领导很多群众在上游筑了一个大坝，使塔里木河的河水不再流入孔雀河，使河水仍循塔里木河的故道流到下游来。水的回来，使下游各地人民的生产情绪大大提高了。在1953年，那一带竟然出现了一次多年未有的大丰收。

“水比从前富裕了，分到的地也比从前又多又好了，就拿我说，我今年分到种500斤种籽的地。像我这样只有三口人的一户人家，能分到种500斤种籽的地，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白拉提老汉一扯到他们村上这两年来生产情况，就格外兴奋：“过去我们种地，种了以后从来不再浇水，什么都不管，只等秋收。有收即收，没有收成也就算了。现在可不同了。由于再没有人压迫我们、剥削我们，收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了，大家对于生产就比过去积极得多。前年乡政府号召拔草时，有些人还不大愿意，说过去从来没有拔过草，而且草拔了以后还是要长出来，何必白费劲。那年只有五六户拔了，可是拔了草的，长出来的庄稼确实不同：麦子长得高，麦穗结得大，所以从去年起，大家都相信政府的话，愿意拔草了。过去，穷人很少有牲口，牲口大都是地主乡保长的，他们的牲口踏了或者吃了我们地里的庄稼，谁也不敢哼一声。现在，除了拔草以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些青年在地里巡逻，看看有没有牲口或者野猪吃庄稼。最近又组织了一支水利队，正在挖一条水渠，想把更多的水引上来，好扩大生产。”

在我和白拉提谈话的时候，一个叫阿西木的中年汉子闯了进来。这位阿西木是这个小村子上仅有的一位在外面跑过的人物。阿西木一家15口，其中有三个妇女会用羊毛和野麻编织口袋（装粮用的），织了口袋，就由阿西木拿到焉耆一带去卖。在1952年以前，阿西木每年总要赶着几个小毛驴，带上几十个口袋，到焉耆一

带去,把口袋卖掉了,就换一些玉米驮回来。可是1952年以后,阿西木就再没有出去过,甚至他们连口袋也不再织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过去我们没吃的,不得不把一些羊毛都织成口袋,拿出去换粮驮回来。我们屋子里一直只能铺些苇席,我们过去就整年地睡在苇席上。从1952年起,政府照顾我们,在上游筑了大坝,河水流回下游,我们这一带的水源大大增加,大家的生产都提高了。生产提高了,我们就想把自己的生活改好一些,都想打些毡毯铺在地上。我们村上牲口本来不多,这样一来,我们这点点羊毛连自己用也不够了,再没有多余的羊毛拿出来织口袋了。而且,我们也不再需要拿口袋去换粮食了,从1952年起,我就没有再从外面驮回粮食过。正相反,去年我们响应政府出售余粮的号召,我还卖给政府1500斤小麦和400斤菜籽呢。”

塔里木河下游是盛产野麻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正是野麻花盛开的季节,土红色的野麻花,给那荒芜的戈壁地带添上了不少春色。这一带的老乡很久以来就知道利用野麻织布织口袋。我还看过他们用野麻织成的毯子,又厚又结实。他们并且把野麻染上几种不同的颜色,织出一些简单的条纹,另具一种引人的民族风格。可是过去的反动政权从来不知道利用这项原料。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提倡下,野麻竟然成了一种高级纺织品的宝贵原料。我在新疆亲眼看到过上海寄来的用野麻纺织得很好的纺织品。政府从1953年开始,大量收购野麻。剥野麻现在成为这一带的老乡、尤其是妇女的主要副业。野麻这东西过去一向被人们铺屋顶、垫路基、当柴烧。很多人说,共产党来了以后,不值钱的东西现在也变得值钱了。一个妇女剥上十天野麻,就可以换购一身衣料;她们一谈到这个问题,都显出一种特殊的兴趣。她们都把长得好的卖给政府,短的次的留着自己家里用。

我虽然在那儿只耽了两天，然而却看到了这个小村子所发生的变化。我问他们现在还吃不吃鱼，他们带着很得意的神气说：“1950年的时候，已有少数人吃到粮了；1951年，很多人都吃粮了；从1952年起，我们这儿再没有人把鱼作为主食了。现在再没有人吃草根了。现在我们一星期还吃两三次鱼，但是鱼不再是我们的主食，而是副食了。”在早上夜晚（沙漠地带早晚特别凉），我还看到一些老年人身上披着他们从前穿剩下来的破烂的粗糙的麻袋布褂衫，当我有一次端详着一个老汉身上的这种衣服时，他说：“过去我们就是穿的这种衣服。你别瞧它粗，可结实着哩。在过去，我们最好的衣服是褡连布（很粗的土大布），可是褡连布也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有人穿。而现在，人们只有在地里劳动时才穿褡连布了。”说着时，正巧有两个妇女走过我们身边，那个老汉呱呱嘴：“你瞧那些娘儿们，现在她们都穿上红颜色的花布了。”在这村上，麻袋布和褡连布还是看得到，可是更多地看到的是各色棉布，有些年轻小伙子身上还穿着带条纹的衬衫。

我看到他们用木桶、木盆、木碗、木匙。在河边，我看到他们的独木船。在有些用苇子遮着的荫棚下，我看到有些妇女仍然用着那由两个木叉和三片木板构成的织布机在织布。然而我也注意到他们生活中已经出现了瓷茶壶、瓷碗和铁皮桶。他们爱喝茶，可是过去没有人知道一块茶到底要多少钱，现在他们大人小孩都喝茶。再没有人去理会那些为他们过去生活里一日不能缺少的打火石了，现在大家都用火柴；一匣火柴有10包，才要五角钱。我说：“你们还养鸡！”阿西木说：“这也是这两年的事。从前，要是你养鸡，那是你自己招乡保长来麻烦。而且从前我们人还没吃的，拿什么来养鸡啊！”

这个小村子过去没有小学，从1954年秋天起，村里也有了小学了。阿西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解放以后，村里群众都要求办

一个小学。时代不同了,不识字就等于瞎子。不仅不能读报,甚至上面来的文件也看不懂。在这样一个戈壁滩上,要是没有人识字,上面来了文件又到哪儿去找人来读啊。这个问题在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提了几次都没有解决。1953年11月,我们这儿进行了普选,我们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后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提出。1954年秋天,我们这个村上就有了小学。这使大家格外感到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的好处。”

村子里有好些人都聚拢到我们那一间小屋子里来,安静地并津津有味地旁听着我们的谈话。后来我看到一个有着很长的白胡须的老年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贾马利),由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扶着,一步一步摸索到我们屋子里来。看样子好像他要和我谈什么似的。大家帮着招呼他从人丛里走过来。他的眼睛没有瞎,然而他眼珠子里发出来的光,就像一个瞎子那样不集中在任何地方。他仿佛是在凝视我,但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有些颤动。他说话也仿佛很困难似的。他说:“过去乡保长来,骑大马,拿着鞭,见人先抽几鞭再说,要把我们抓到别的地方去作苦工。现在,再没有打我们的人了。我听说毛主席派了人来问我们好。我看不到毛主席,我要来看看毛主席派来的人。我没有什么话要说,我只是要向毛主席道谢。”他这样说时,忽然一下子扑到地上叩起头来。他那严肃的、诚恳的、老态龙钟的表情,强烈地感动了我。他那突然的动作一下子使我紧张到极点。我立刻肃穆地跪下来回拜他,亲切地并带着一种晚辈的心情把他扶起来。屋子里所有的人这时也都立了起来。这一带人民在旧时代里所遭遇的侮辱、灾难和苦楚,以及解放以后对党对毛主席从心底里激发出来的纯朴的恳挚的感激,都在这个肃静的、感人的、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场合中透彻地表达出来了。

1955年8月 乌鲁木齐

一个村子的诞生

1955年6月我在阿克苏时,特别去访问了乌什县的英阿瓦提村。乌什是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以产水稻著名。英阿瓦提在乌什县境的北端,紧靠在中苏毗界的山群下面。我们到乌什县城东北约20公里的衣麻木地方换乘了高轮大车,花了一个小时才渡过了那河道漫阔的托什干河。过河后穿过一座小山,向北约摸走了两小时,便远远看到英阿瓦提的白杨林梢了。

这是一块好地。几百年前蒙古人曾在这儿开垦过,筑过一个蒙古城。后来清朝的部队也曾在此屯垦,并也筑过一个城。它们的废墟都还隐约可见。其后本地的大地主阿衣甫伯克和买买提阿吉都曾招了农民先后在那儿挖渠、开垦过。我访问了在解放时英阿瓦提仅有的一户居民,79岁的买木苏衣麻木。他是在买买提阿吉时代就到了这地方的,他说在英阿瓦提东面有一条库马力克河。过去地主招了农民从库马力克河开渠,把水引上来了,大家就在此住下种地;后来河床日低,水引不上来了,就弃而他去。买买提阿吉在这儿前后剥削了22年(1915~1937),后来水上不来了,农民被迫四散,只剩下了他一户。他仅仅依靠了在山洪暴发时才灌满了的两个小池子,种了七亩地;这样地生活下来,一直到解放。

1950年3月,党到达乌什后,就号召人民发展生产。当地群众都知道英阿瓦提是块好地,土肥,只要有水,就是良田。过去他们也常想挖一条渠在那儿生产,只是没有力量。党来后,群众相

信党一定有办法,所以向党反映,要求党领导大家到那儿去开荒。1951年3月,有960名各族农民自动报名参加了英阿瓦提的挖渠工作。从3月初挖到5月中,一共挖了三万一千多个工,终于挖通了一条长达45公里的渠道,把水引了上来。但是第一年引的水量有限,而可耕之地很多,所以第二年(1952),另外再挖了一条新渠,这一次参加挖渠的多到二千七百多人,在35天以内挖了六万二千多个工,把更多的水引了上来。

1951年党领导群众去英阿瓦提挖渠开荒的时候,英阿瓦提除了一片荒芜的干燥的土地以外,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间屋,甚至也没有一棵树。政府在1951年拨了10万斤粮食作为挖渠伙食,另外组织了30峰骆驼日夜运输,输送粮食、油、盐、菜、柴、木料和生产工具。

党一面发动群众去英阿瓦提挖渠,一面就组织一些无地农民、小商贩、旧军人和二流子前去英阿瓦提开荒。自愿去的,才去,政府不强迫。第一年去开荒生产的有一百几十个人,包括了八个民族。那年一共开了5560亩。开荒的组织工作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特别在第一年。那时去英阿瓦提开荒的人,都是两手空空去的。其中只有两三个人自己带有锅碗,只有极个别几个人身边还带了几个罐去,其余的人连锅碗都没有,都是一到英阿瓦提,从当天的晚饭开始,就要政府救济的。那一年政府帮助的口粮和籽种共达76000斤。

第一年因为挖渠引水,下种比较晚,只种了一些玉米。由于劳动力是新集合起来的,一部分人不懂耕作技术,各种条件比较困难,所以第一年收成不好,只收五成光景。但是这一带土地很肥,即使只收五成,每亩平均也还收到一百二十五斤上下。秋收以后,有30名家眷也被接到了英阿瓦提。

由于旧社会人民的生活太苦,很多农民没有土地,生活没有

着落,现在看到党和政府对于贫苦群众这样地关怀帮助,只要有一点期望,大家就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苦撑下去,所以第一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是第二年(1952)英阿瓦提的开荒人员比第一年增加很多,从167人增至793人。他们大都是些无地或地少的维吾尔农民。其中一部分是来挖渠的,渠挖好后,看到这地方有指望,就留了下来。

第一年是编队集体劳动的,那时大家不知道究竟分不分地,所以劳动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第二年决定分配土地,一个人10亩,两个人15亩,三个人20亩,以此类推。在分地的同时,进行了互助合作的宣传,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当时一共组织了26个实际上还只是一些变工性质的互助组。大部分人因为农具少,认为彼此互助有好处。但是也有少数,当春麦种下地以后,就散了伙,各干各的了。

在生产上,一般说来,第二年比第一年进步。第一年是先播后犁,其中有100亩水稻田,根本就没有犁过,只是放满了水,撒了种,把脚在水田里踏上一阵就了事。也没有选种,也没有上肥。用的犁都是土犁,草翻不下去。拔草也不勤,田里草很多。第二年就先犁再种,选了种,也施了肥。第一年村上耕畜很缺,政府动员了一部分富农中农支援了308个牛工,才勉强解决了耕畜不足的困难。可是第二年,全村就新购了37条牛、42匹马、9只驴。另外,政府又贷了226个坎土镭、70把镰刀、20个铧和一部洋犁。那年生产部队也到了英阿瓦提开荒,农民又经常向部队借用一些洋犁。这一年的玉米每亩平均产到230斤,水稻280斤。只是春麦因为自然灾害,普遍生了黄疸病,每亩只收到125斤。但各种作物折合小麦,平均每亩仍收到180斤,情况比第一年好。

群众初到英阿瓦提时,大家都住在地窝子里。1951年秋收以后,政府就运了大批木料、橡子、苇席,贷给群众盖房子。政府收

购木料时,说明是贷给英阿瓦提群众的,为了表示支援,所以收购的价格很低,等于半价光景。那年冬天,又进行了植树,政府供应了一万多株树苗。1952年分了地,群众的心更踏实了,很多人把家眷都接了来,安心在英阿瓦提落户了。更多的群众要求政府拨地盖房子。政府拨了盖屋子的土地以后,群众又要求再多拨些地给他们种果树。兄弟民族都习惯在自己的家宅旁边有个小园子,种些果树和菜蔬。政府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第一年栽树时,大家还不十分关心。第二年栽树时,群众知道栽在自己地上的树就是自己的,所以栽树的劲头特别大,最初运来的树苗都不够分配,那年冬天政府先后供应了三万二千多株树苗。植树的成活率达到90%。房子也盖得很多,三分之二的群众这时都有了自己的房子。在1952年的下半年,英阿瓦提就逐渐出现了村庄生活,有了女人和小孩,大家种菜养鸡,有的开始放牧,发展牲畜,村上还办了民校。房屋的加多和大批植树,很自然地衬出了街道的形式,奠定了村子的基本轮廓。

但是困难还是很多,一部分混乱的现象还是存在。第一年在生产中和秋收后,陆续有人搬走。第二年的生产虽然比第一年好,前途也更见到光明,但仍然有些人不安心,想离开。有些小商贩过去没有劳动过,嫌苦,说回到城里收入还可以多些。有些二流子,习惯于过一天算一天,不习惯作长期打算地搞家务过日子,还是想走开。有些好吃好玩的人,说这儿生产虽好,但没有巴札(赶集),不热闹,不愿留下来。虽然经过教育劝导,还是走掉了一部分。但是正派的农民都没有走,而且劳动情绪很高。他们说:“党已经教育了我们两三年:劳动创造新生活。再不好好劳动,实在对不住党。”英阿瓦提的自然灾害较多,经常发山洪、打冰雹;夏天又热;但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英阿瓦提的生产逐年提高。1953年的

产量比 1952 年高,麦子每亩产 180 斤,玉米 250 斤。1954 年又比 1953 年高,麦子 242 斤,玉米 320 斤。此外,劳模胡大白提 1953 年的三亩冬麦丰产田每亩产 620 斤,1954 年五亩半冬麦丰产田每亩产九百七十多斤,创造了乌什全县冬麦产量的最高纪录。胡大白提从 1952 年起,一直带头领导互助组。那时党号召互助,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主要是怕吃亏。胡大白提认为必须增加生产,才能扭转大家的顾虑,所以他就用心学习附近生产部队的生产方法。他从 1953 年起就逐渐实行了条播,又学习了部队沤肥的办法。他看到部队种的庄稼长得好,知道这和用洋犁犁地有关,他就学习使用洋犁。他的组里,有牛的人最初不肯把牛借给没有牛的人用;要用,得先付现款。胡大白提就把自己的马借给没有耕畜的组员,并且不要报酬,这样,使有牛的组员自己也不好意思。他乘此在组内进行了教育,说:“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耕畜,都是党帮助我们的结果。大家饮水思源,不要忘本,应该好好地听党的话,团结互助。”靠他这样,才把那个组巩固了下来。1955 年春天,他到乌鲁木齐去出席全省的劳模大会。他最初以为自己的劳动也差不多到家了,可是一听别人的报告,就感到十分惭愧。他说:“我们这儿的棉花每亩还收不到 100 斤,但别地的棉花已经超过了 400 斤了。”他又说:“别的人都是‘社’或‘集体农庄’了,可是我还是‘互助组’。”那次的会对他有很大启发。1955 年 6 月我去访问时,他的组已经正式转了社了。胡大白提从 14 岁起就给地主下苦,一直苦到解放。不仅什么没有得到,而且还挨饿挨打。他说:“我除了没有吃过粪以外,什么都吃过了;除了没有披过树皮以外,什么都披过了。”1951 年他响应政府的号召来到英阿瓦提开荒。他来时什么都没有,还在本乡欠了 15 口袋粮的债。他一家六口,按说可以分到 35 亩地,但是因为家中只有他一个劳动力,所以他自愿少要,只要了 20 亩。但即使只种了 20 亩,在四年之

内,除了全家六口的衣食以外,他还清了15口袋粮的债,还买了两匹马、一头牛、一只驴,盖了四间屋子。他说:“要是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哪能有今天的日子?我在1954年售给国家2800斤余粮。单这一件事,就可以说明这几年党领导我们在英阿瓦提开荒生产的业绩了。要不是我的生活真正有了改善,我哪儿会有那么许多余粮售给国家?”

我又访问了一个汉族李仁厚。他领导的那个组,最初组员只有七户,大都是汉族的旧军人,1954年春改为常年组时,发展到十六户:汉族七、回族七、锡伯族一、维吾尔族一。汉、回、锡伯三族说的都是汉语,在一起工作比较方便,但另外有一户维族自愿要求加入他们一组。由于全组只有这一户维族,所以大家处处都特别照顾这一户维族。李仁厚这一组在生产上也是好的。1953年他们一组的麦子每亩产235斤,1954年提高到421斤。生产提高了,生活自然也改进了。李仁厚说:“我1951年来时只有一匹马,此外什么都依靠政府的帮助。但是我现在又有了一辆大车、一只羊,还盖了三间屋子。1954年我一个人出售了1680斤余粮,我们全组出售了23000斤余粮。组里七户汉族,论生产收入,只有一户不及我,其余五户都比我强。像山东老汉徐华,已经七十多岁了,可是身体还健壮。他一个人,没有家室。这几年努力生产,已经积上了八九百元了。”

我在英阿瓦提时,还访问了好几个群众。他们都说自己开初来时,都是两手空空,仅仅短短四年,现在已经有了牛、马、羊、驴和屋子。村子上已经形成了三条宽阔的道路,两旁都栽了树木。有了供销合作社,开了一家饭馆,还有了小学。这253户能够安心落户下来,就说明这几年来党领导的开荒生产有成绩,并且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那天我们到英阿瓦提时,已近傍晚。刚进村,就看到有二百

多人，拿着红旗，排着队，唱着歌，远远地走过来。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揹着一个坎土镩，就像一队士兵揹着枪支一样。队里还有人带着笛子和手鼓，一面走，一面吹打着。一种勇敢的、愉快的、孕育着无限活力的气氛，弥漫了整个村子。这景象给我们初到的陌生客人以异常深刻难忘的印象。原来这是附近库曲村的农民，他们带着馍，带着还没有熟透的杏儿，带着吉祥，有的还带着自己的毛驴，前来支援英阿瓦提修渠的。他们后来就在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里歇了下来。他们虽然紧张地劳动了一天，然而他们依然兴致勃勃。在夜晚，他们就在月色下围了一个圈子，边打边唱地跳起舞来。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74岁的老汉买买提。他也是在买买提阿吉时代就在英阿瓦提种过地的。买买提阿吉垮了以后，他就从英阿瓦提搬到库曲地方住了下来。库曲用的水并不是由英阿瓦提流过去的，他们对于英阿瓦提的渠道并不负担任何义务。但是自从解放以后，农民在党的教育下，知道了“天下农民是一家”，已经有了彼此互助的精神。买买提老汉说：“1954年我们库曲发生山洪时，英阿瓦提的农民也来支援过我们。这次英阿瓦提的渠道被山洪冲垮了，我们也就自动来支援他们。我们一共来了220人，内中还有三个妇女。政府本来批准我们来帮助两三天，结果我们帮助了四天，明天再干一天我们就要回库曲了。从前，我们有了什么困难，只好千求万求地主。可是现在，我们再不用去求地主了，我们农民能够彼此帮助了，党把我们农民团结成为一家了。”

我在英阿瓦提住了三天。这地方本来是一片荒野，现在却生产了粮食，出现了村庄；居住在这村子上的人们过去本来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现在却有了技术，有了家业，能够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农民有了困难，农民内部能够自发地进行互助。这些现在看来都是一些很平凡的事情，但是仅仅在六七年

以前,却是说来不能令人相信的事情。

1956年1月 乌鲁木齐

优先照顾民族老乡的利益

1956年春节前夕,我在阿克苏南面的沙井子地方访问。这一带本来是一片荒滩,自经部队开垦以后,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10万亩大面积的胜利农场。1950年部队初到这儿的时候,当地的民族老乡有很多顾虑。有的把东西藏了起来,有的把房子锁上走了,有些人害怕部队来了要侵占他们好不容易才开垦出来的耕地。可是部队不仅没有动老乡的一草一木,反而还帮助那些跑走了的老乡扫院子、喂牲口。部队一到就投入生产,男的女的都背着小筐出去拾粪。那种起早睡晚艰苦辛勤的劳动作风深深地感动着老乡。这样使老乡们逐渐认识并亲近解放军。部队看到老乡缺水,就建议协助他们修挖原有的一条较小的水渠,把阿克苏河的水引进渠来,好发展生产。最初老乡都不相信。沙井子乡的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衣米尔说:“从前国民党部队老说要帮我们挖渠,可是他们只收钱,不挖渠。解放军到了才不久,也说要帮我们挖渠,我们那时都不相信。后来渠终于挖通了,水来了,而且水来了以后,部队总是先让我们用,这时我们才相信解放军确实是帮助人民的。”

部队为了扩大生产,从根本上解决水的问题,从1951年起,花了两年多时间,穿过坚硬的戈壁地带,开凿了一条长达67公里的胜利渠。部队一面挖渠,一面进行农场的规划工作。在规划范围

以外,部队已经开垦了一些质量较好的土地,为了便于机耕和水利管理,需要把这些土地和在规划范围以内的 261 户民族老乡的共约 7 200 亩土地进行交换。老乡们听到要交换土地,最初都不愿意。有的因为和部队相处几年,得到部队很多帮助,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愿离开部队他迁。有的怕在交换土地和搬家之中吃亏。有的误会部队把胜利渠开成了,便想把老乡赶跑,不让他们再在这一带种地。各级党委和部队首长都很重视这一个群众土地的处理工作。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决定在通过群众自愿、照顾群众利益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原则下,把各族老乡的利益放在前面,尽可能优先满足他们的要求。部队首长协同地方民族干部分别向群众解释了建立国营农场和交换土地的意义,深入进行了调查,并保证部队继续帮助老乡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各种困难。一般老乡经过了开会座谈及个别访问以后,大都了解了建立国营农场的意义,愉快地友善地和部队商量交换土地的具体问题。有些老乡说:“现在国家要建立农场,还先来和我们商量;若是在国民党时代,他们早就把我们的锅灶也拆了。”

我在沙井子时见到了一个叫贾马利的维吾尔族翻译,他一直参与过那次的土地交换工作的。他说在那次土地交换中,部队处处照顾着民族老乡的利益。老乡们的好地固然换到好地,就是荒地,也换到了好地。部队先带领老乡到各处去看地,老乡希望交换哪儿的地,部队就尽可能换给他哪儿的地。有一个老汉叫肉孜哈萨夫,他因为别处还有土地,交出了土地以后,硬不要再交换。部队首长认为,不能无偿地收受人民的土地,便派贾马利和袁天祯两人带了 10 只肥羊和 2 400 斤玉米送到肉孜哈萨夫的家去。这个老汉感动得哭了起来,说他过去常常挨饿,现在生活好了,都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惠,应该帮助解放军建立国营农场。况且他的地已经荒了多年,地又不好,怎能接受这样的厚礼。他

硬不肯收。后来贾马利把维族乡长请来帮同劝说,老汉这才勉强收了下来。另外有个老汉叫肉孜街长的,家里没有劳动力,所以他把沙井子的地交出后,也不要再交换。部队送了他5000斤麦子。他就用这5000斤麦子在附近的阿英克巴札上开了一个卖馕的铺子。后来他每次看到路过的穿黄军衣的战士,都要拉他们进铺子喝茶吃馕。他说:“这馕就是你们部队送给我的。”

有些土地在交换时已经长了冬麦苗,部队就按那些地最高能产多少斤冬麦的标准,用麦子算还给老乡。地上要是有树苗的,部队就按政府规定的价格,用现款付给老乡。此外,部队还把自己种的七千多株杏树苗和桃树苗送给了老乡。那些交的地多、要的地少的人,部队也都分别送了坎土镩、镰刀、犁等农具。

在那261户有地的民族老乡中,有45户是住在沙井子的。对于这45户,部队无条件地给他们修盖新的屋子,帮他们搬家。房子盖在什么地方、要怎样盖,事先都分别征求了本主的意见。我访问了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技术员木沙。木沙住的本来是两间旧屋子,另外有一间草房,一间马圈和一间破牲圈。修房时,部队派了一个翻译和一个设计员去问他要怎样修。木沙说:“我根本没有想到,我那两间破屋子怎还够得上专门派人来问?后来我选定了地,那个设计员就按照我的意思,门开在哪儿、炕砌在哪儿,一一画成了图样。设计员问我窗开在哪儿?我说不要窗子。他说趁新盖屋子开一两个玻璃窗多好。我说我们这一带的少数民族不习惯在墙上开窗,只要在屋顶上开个天窗就够了。这样,他也尊重我们的习惯,照我的意思办了。政府一共给我修了五间好房。两间住人,一间做仓库,一间装草,一间圈牲口。”

部队给老乡新盖的房子,比原来的又宽大又结实。木料都比原来的好。烂门框都换了新门框。原来的房子,木头直接搭在土墙上,墙塌了,房也倒了。这次新盖的房,都用了柱子。部队里的

战士本来不会砌炕，他们就向老乡们现学现砌。部队首长经常去现场检查修建的工程。无论是牲圈、草房、瓜窖，或者涝坝，不管老乡原有的有多么简单破陋，只要原来有的，都要给老乡新做，做得好好的。

老乡搬家时，部队还发动了一些女同志先去把老乡的新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部队赠送的许多图片都贴在墙壁上。还组织了秧歌队欢送，组织当地的民族老乡佷郎欢迎（就是跳着维吾尔族舞来欢迎——原注）。部队拨出很多辆用四套马拉的大车帮助老乡搬家具、搬草料、搬肥料、搬木柴。

部队来到沙井子以后，军民关系——同时也是民族关系，一直是好的。部队初到边疆垦地，条件困难，在吃、住、生产工具以及带路看地各方面，都得到当地老乡很大的帮助。在部队这一面，这几年来，无论是种籽、农具、用水以及耕作技术各方面，也一直给当地老乡以热情的帮助。尤其是用水。胜利渠挖通后，部队把一干渠的东一支和东二支这两条支渠专门划给沙井子的老乡使用。部队初到沙井子时，当地只有几十户老乡，由于部队来了，水也来了，从各地搬到沙井子来的人就渐渐多起来，现在已经增加到三百多户了。部队的大规模垦荒也带动了群众，这几年来沙井子的老乡也开了不少荒地。这一带老乡的耕作技术过去比较粗率。他们过去一直是撒播，部队来了就教他们条播。这一带过去本来没有施肥的习惯，老乡也不懂得施肥的好处。他们最初看到部队背着小筐到处拾粪，还觉得奇怪，后来看到部队施了肥的棉花，棉桃结得很大，他们才相信施肥的好处。现在老乡们也开始积肥和逐渐改用条播了。

1954年9月起，沙井子老乡在部队的帮助下，先后成立了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用“胜利”作为社名。胜利一社成立的时候，部队送给他们四架洋犁和两个摇耩。老乡最初不习惯用洋

犁,说洋犁马拉不动,宁愿仍旧用土犁。部队就派了战士去教他们掌握洋犁。过去他们用土犁犁地,犁得浅,草翻不下去,用洋犁犁地犁得深,一下子把草都翻下去了。后来大伙儿就都抢着要用洋犁犁地。部队不仅帮助训练他们的人,并且还帮助训练他们的马。1955年春天,部队把马拉10行播种机借给老乡使用。他们的马不会拉,部队就一面把自己的马先借给他们拉,一面再帮合作社训练他们的马。

部队对于老乡的技术援助是全面进行的,不仅指导他们选种、条播、中耕、沟灌、施肥、除草,还指点他们进行秋翻冬灌和春耕保墒等项操作。部队经常把播种机、中耕机、追肥机、喷雾器等借给老乡使用。部队举办短期训练班,也都吸收合作社的一部分社员参加学习。现在在棉花、小麦、玉米这三项主要作物上,一般老乡都已掌握了基本的耕作技术。1955年胜利一社的16亩丰产棉田每亩生产了籽棉529斤,比单干户的产棉量提高很多。那年秋分以后,社员的收入要比社外农民平均增加49%。有一个老乡叫吐逊,一家二口,往年一年只能收到480斤粮食,连吃都不够。1954年入社以后,1955年秋分时,分到1200斤麦子,720斤玉米,还有苜蓿等副产品的收入250元,比入社以前增加了好几倍。社外的单干户和互助组看到合作社这样显著的成绩,都想入社。

现在部队正在帮助原有的二社、三社转办高级社。部队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地方工作科”,派了专职干部帮助老乡办高级社。生产部队的政治部的同志对我说:“我们在思想上把老乡的合作社看成为我们自己的生产单位一样,尽一切力量全面地帮助他们。我们将帮助他们进行全面规划工作。过去我们已有两条支渠专门划出来给老乡使用,现在我们将再帮助他们规划斗渠和农渠。将来沙井子也可以不必另设拖拉机站,部队的拖拉机可以就

近帮他们代耕。我们对于帮助他们办好高级社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1956年2月 喀什

南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南疆的农村真美。今年清明节后，我在疏附县的色满区住了一个多星期。村子里到处是翠绿的杨树和艳丽的桃花。很多农民的家宅旁边，都有一个一二亩大的园子，里面盛开着桃、杏、梨、李或者苹果各色鲜花。我每天早起后，总要爬上屋顶，眺望一会那南面远远的昆仑雪峰，以及那四望皆是一片葱郁的、彩色缤纷的、孕育着无限富裕、活力和美丽的南疆春天的农村。

有一天，我去访问五乡五星合作社的第二队队长牙生乌受尔。他不在家。他的母亲尼沙汗看到我们去访问，很高兴，说：“从前我们在墙根子下蹲了10天也没有人理会，现在感谢毛主席经常派人来看我们。”我们就在他家走廊上坐下聊起来。尼沙汗指指她的院子说：“我们乡里第一个合作社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成立的。”她说她的儿子在减租反霸时就入了团，一直很积极，“只是我自己年纪大了，思想保守，最初常常扯我儿子的后腿”。我问她这话怎么讲。她说：“1953年冬天普选以后，有一天，我的儿子叫我把毡子拿出来铺在院子里，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啥。过一会，就有好些人到了我家里，有老乡，也有干部。他们就在我院子里开

起会来。我听不清楚他们究竟在讨论些什么。后来看到我儿子站起来说：‘我同意。我一定要参加。我一定要好好劳动，发展生产。这样我们才能富裕。’大家的情绪越来越高。很多人都嚷着：‘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我心中很纳闷，不知道我的儿子‘同意’了什么，又要‘参加’什么。后来会散了，我才知道，我儿子要加入合作社。我一听，就引起许多心事，一肚子不愿意。我说，我们好容易托毛主席的福，分到了土地，现在又要加入合作社，万一搞垮了，将来怎么办？那年我家种了五亩冬麦地，长得特别茂。我一想到要把长得这样好的麦地加入合作社，就心痛。我和我儿子闹了好几场。后来他说：我们虽然入了社，但是这五亩麦地没有人。这样，我也就平静下来。可是后来麦子结了穗，快要熟了，有一天，我看到几个干部和我儿子一起在我麦地上鉴定产量，我心上一下子明白了：我的儿子骗了我，那五亩麦地也一定入了社。我当时就闯到麦地里大叫大闹，说这五亩麦地不入社。我儿子一看我这样，就硬把我拉了回来，把我关在屋子里，门也反扣了起来。‘你人小心不小，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地都入了社！’我那时这样想，越想心越气。”我插口问：“你那时认为那五亩麦地可以收多少呢？”“那年我那五亩麦地长得特别秀，”她指指坐在她身边的媳妇说，“她一下麦地，连身子也看不见了。这样茂的麦子，我想五亩能收12口袋（一口袋约200斤）。可是事情真想不到。有一天，我儿子跑回家拉我一起出去，原来合作社要进行预分了。我一听我家里可以分到15口袋，这把我兴奋得整整一夜没有睡着。第二天，我们就带了毛驴和口袋去领粮，一口袋一口袋都搬到了自己家里。我轻轻地问我儿子：‘怎么我家分到这么多？’原来是我家劳动好，所以才能分到这么多。这样一来，我心里的结完全解开了。加入合作社对我们确实有好处。所以这次大家转高级社，我也不怕了。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只要劳动好，还

怕什么呢？”

色满区是南疆的一面旗。早在1951年，这个区就出现了一些互助组。1954年2月开始办合作社。那时参加合作社的人虽然有几十户，但是大家多少有些思想顾虑。最近提升为五乡乡长的阿里莫斯泰因说：“那时我虽然也参加了合作社，可是心里总还有些问题放不下。首先，我担心入了社会不会吃亏？我自己有六亩地。解放以前，这六亩地打小麦只能打5口袋。1952年打到九口袋。1953年每亩打到六百多斤，一共打了18口袋。产量逐年提高。但是入社以后，是不是会增加收入？或者反而还不及单干呢？我还有些牲口。过去单干时，收的粮自己吃，副产品牲口吃。入社以后，是不是还能分到副产品给牲口吃呢？再说，合作社要留什么公积金、公益金，那时上面派了六七个工作组干部在我们乡里，我心里疑虑，会不会这些公积金、公益金都是为他们设的，将来都给他们花了呢？可是那年夏收，我分到了23口袋麦子，还分到很多麦草和一些现款。到了年终，社里又公布了账目；公积金有多少，公益金有多少，用掉了多少，怎样用掉的，一笔一笔都有明账。公积金里买了一些牲畜和农具，公益金里订了一些报刊，帮助大家学文化，又资助了一些困难的社员。这样，我们知道这些公积金、公益金也都是为我们自己花的。那年夏收以后，我们社里开过一次座谈会，大家暴露了思想，当初各人心里顾虑的都差不多。但是一年来事实，不仅把我们的顾虑完全消除了，而且使大家对办社的信心格外提高了。”

1954年2月，色满区先在五、六两乡建立了四个社。那年的夏收，对于后来合作化运动在色满区以及在南疆各地农村的顺利展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农民一方面相信党和毛主席的话，但是对于没有实验过的事情，总带有几分疑虑。即使是已入社的，也还有些试探性质。要是办得好，继续参加。要是不好，下年散

伙。至于社外农民，观望的成分更大。他们说：好也罢，不好也罢，要收了再看。好，就入；不好，就不入。有些农民怀疑将来合作社的粮食国家会不会收去一部分。有些农民怀疑将来分配时会不会公平合理。还有些农民认为合作社一定垮，将来一定搞得乱七八糟，大闹一场，不欢而散。那年那四个社无论是夏收秋收，社内社外农民都很关心。收割时，很多社外农民都到合作社地里参观。有些农民还有意地把自己的麦场开在合作社的麦场旁边，想和社比一比高下。有些老汉，一连几天整天地坐在合作社麦场旁边看着。那年那四个社各项作物都增了产。解放以前，色满区的小麦每亩约产 150 斤，高粱 165 斤，玉米 140 斤，水稻 170 斤，棉花则只产三十多斤（籽棉，下同）。但是五乡新路社 1954 年第一年，小麦每亩就产 377 斤，高粱 511 斤，水稻 283 斤，棉花 130 斤。五乡前进社的棉花每亩产到 208 斤。这些产量比同年的互助组和单干户也都高得多。但是社外农民不仅要看生产是否增加，还要看分配是否合理。分配时，有时一直要分配到深夜 12 点钟，社外农民也就看到夜里 12 点钟。他们都亲眼看到收割的粮食都是分给了社员的，很多劳动好的社员，二十几口袋，三十几口袋地把分到的粮食往自己家里搬。在分配中，社员都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的高兴。社外农民都承认分配是公平合理的。四个社 75 户社员中，有 67 户都增加了收入。很多社外农民思想里的结都解开了，于是到处都纷纷要求入社办社。

二

那年夏收以后，那四个老社立刻由原有的 75 户扩大到 238 户。可是周围很多农民入社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有好些没有被吸收入社的，都逗留在乡政府前面不肯回家。那年秋收以后，

全区又新建了一批社，一共发展到 26 个社，达到乡乡有社。

社多，问题也多。特别在 1955 年夏收前后，由于一部分社干还缺乏经验，预分方案订不出来，会计又弱，账也结算不出，麦子堆在场上分不下去。有些坏分子造谣说：今年生产好，国家要抽一半，只有一半分给社员。有些社员听了心中着慌，就在夜里偷偷地到麦场上来搬麦子；有的被社干发现了，就打起架来。有几个社在推广乌克兰种小麦时，由于技术指导不当，下种太早，越冬以前生产过盛，冬季管理又不好，以致 1955 年减产，引起部分社员对社埋怨。同时，个别社员在生产上不够负责，某些社内耕作粗糙，个别社组织涣散……这些个别混乱现象，使一部分区乡干部在思想上有了顾虑，心中害怕，认为社发展得太快了，没有办好。1955 年春天在全区建立了 26 个社以后，区上曾又订了一个在当年下半年再发展 30 个新社和普遍扩大老社的计划。但在夏收前后，看到 26 个社接连不断地发生问题，这个问题刚解决，那个问题又来了，再加上那时上级又把派到色满区去帮助工作的一部分干部抽调了回去，区领导上对发展 30 个新社的计划，便有些动摇。色满区区委副书记刘世英说：“当时我想，单单领导这 26 个社就够受了，加上秋后老社还要进行年终分配，现在社的问题这么多，怎么还敢再大力发展新社？当时我想，如果还要大力发展新社，上级就得给我们增加干部。如果上级不增援，我们一定搞不来。与其将来办坏，还不如少建新社为好。”部分区乡干部对再发展新社也信心不高。

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色满区领导上打算把原来再发展 30 个新社的计划收缩为再发展 12 个。可是上级不同意。疏附县委提出：“你们区上办了一年半社，难道办 30 个新社的干部都没有培养出来？”南疆区党委也指示：老社要整顿，新社也要办。要区领导不要眼睛单向上看，想上面拨干部。也不要仅仅依靠区干

部。应当把眼睛向下看,发动村乡干部来办社。

南疆区党委驻色满区工作组的负责干部听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传达报告以后,将主要精神向色满区区委作了传达,区委及工作组的干部们得到很大的启发。区领导在上级党的指示下,决定改变领导方法,先下去摸一摸村乡干部的底,看看究竟有多少村乡干部有能力办社。他们逐乡逐地地摸。先从上摸下去,再从下面摸上来。每到一乡,就先和乡支书、乡长谈,问他们乡里的互助组的情况,过去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对于建社问题,如建社分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哪些问题应该怎样处理等等是否熟悉。根据乡干部的汇报,再召集一些互助组组长座谈,看看他们有没有转社要求。同时,又访问一些准备转社的骨干,问他们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土地、农具、耕畜的报酬如何规定,担任一个社主任应该具备哪些条件等等。这样前后摸了半个多月,使区领导上对于乡村干部的办社实力,心中有了底。根据各乡干部的报名,当时决定在那年秋季再建 25 个新社。

区上布置这个再建 25 个新社的任务时,自以为对群众的情绪是作了适当的估计的。但是事实证明,这个估计仍然落在实际后面。建社的消息传出以后,群众就汹涌地把乡干部包围了起来。有的村全村要求办社,有的乡全乡要求办社,仅仅在两三天以内,每个社的报名人数都超过了原定的控制数字。例如一乡一村,只打算建一个社,吸收 30 户农民,但申请入社的却有 96 户。那些没有能入社的农民虽然被先布置在互助组里,答应到冬季建社时再吸收他们,但是他们仍然不满,说:“你们平时宣传合作化的道理,要我们加入合作社,可是我们真要加入时,你们又不让,这是什么道理?”有的则说:“党的政策是目前不要地主富农入社,我们既不是地主富农,为什么不要我们入社?”乡干部向他们解

释,说人太多了,社太大了,社干部领导不起来。群众就说:“农业合作化是我们农民自己的事,社是我们农民自己的社,社干部力量不够,我们大家来帮助社干部办社好了。”

更突出的是四乡一村农民自发办社的故事。我到四乡一村第二自然村访问时,四乡乡长坎吉肉孜说:“四乡一村有两个自然村。第二自然村一头邻近第一自然村,一头邻近第四村,四乡四村在1954年秋建立了一个和平社。打那时起,就吸引了第二自然村农民很大的注意。他们看到自己村上虽然办了一个互助组,但是无论在哪一项耕作上,他们都深深感到组的力量赶不上社。1955年和平社夏收预分时,他们最初也以为不一定会分得公平。想不到和平社社员比一家人还分得好,公平团结,没有一点纠纷。第二自然村在四村建社时就想加入,但是他们不是四村人,没有加入成。1955年9月,区上决定在四乡一村第一自然村建社,我们在第一自然村宣传办社、组织群众学习时,第二自然村也一起来听课,后来他们就要求同时建社。我们说上面只批准第一自然村建社,第二自然村要再慢一步。可是他们不乐意,说:‘难道第一自然村是毛主席的亲儿子,我们是毛主席的后儿子?你们为什么不一视同仁?’‘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听毛主席的话,实行互助。现在我们要求转社,你们干部为什么不肯?’‘我们不比第一自然村落后,为什么不让同时建?’我们就说:‘建,迟早都要建,只要求你们再等一下。’可是他们都不满意,说:‘要是上级不答应,我们就自己建社。反正建社的样子有。第一自然村怎么办,我们也照着怎么办好了。’我们看到他们的情绪这样高,要求这样恳切,也很受感动,就打了一个报告给区上,请示可否批准在一村同时建两个社。但是区上没有批准,我们也就不敢擅自答应。”

正谈到这里,那个“自办社”的主任和加西尼亚子也走了来。我就请他谈谈为什么他们不愿再等。他说:“我们在1954年就

有入社的愿望,也向领导上要求过。1955年秋天我们学习后,大家更迫切地要求建社。当时合作化运动发展很快,四邻都办了社,我们感到很孤立。我们前后写了三次申请书,为什么上级一次都不答应?我们犯了什么罪,要存心使我们孤立?乡干部说我们基础不好,我们哪一点基础不好?他们说我们没有党员、没有骨干。我们虽然没有党员,但是我们有骨干,一定能起带头作用。他们怕我们办了社不能巩固,我们表示了决心,一定能把社办好。我们当时的思想是:建社总比不建好,早建总比迟建好。现在谁愿意落后?谁不争着早一天踏上社会主义的大路?”

听他这样说,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乡长说:“他们说要自办,可真的自办起来。他们把地块如何划分、劳动力如何编组、土地报酬如何规定、劳动工分如何计算、农具和耕畜如何使用、入社应带多少肥料和种籽等等具体问题都一一讨论决定,甚至对社主任和社务委员的人选也作了酝酿。不仅如此,他们还一口气合力种了60亩冬麦,表示建社的决心。社叫什么名字,他们也想出了一个好名字,干脆就叫‘自办社’(维吾尔文是康耐拨起卡社,其意为‘水自己沸了’)。正巧区委会的负责干部下来检查工作,这样的事实放在面前,区上也就只好批准了。”

就在群众这般要求入社的热情下,区上原定1955年秋天新建25个社,结果建了29个社。

三

这一次建社的特点,就是这29个社的建立都是乡村干部领导的,区干部只作了巡回检查的工作。从9月18日开始,到10月初,前后只有半个月时间,29个社的建社工作都基本结束。这次建社,不仅时间短、组织快,而且在政策上没有出大的偏差,

有不少具体问题比过去解决得更妥当。群众的建社情绪始终是高涨的。

我问坎吉肉孜说：“你们听说那一次的建社工作要你们乡村干部包下来的时候，心里怕不怕？”他说：“那时我们虽然缺乏经验，心中没底，但是接到这样的任务时，心中并不害怕。解放后这几年，我们这一带的工作一直都是依靠上级派来的干部。1954年建社时，我们乡干部只是从旁做一些事务工作，没有自己动过脑筋。可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永远依靠上级。现在有这样一句话：‘干部落后于群众。’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检查自己，我们当乡干部的确实落在群众的后面，所以大家在思想上也都感到非切实努力学习不可。我们听到那样的任务时，情绪都很高，都希望通过实际的锻炼来提升自己。”

我说：“建社的具体工作虽然要你们包下来，但是上级有没有给你们一些帮助呢？”

坎吉肉孜说：“当然有的。要是上级不帮助，我们这些拿坎土镬出身的人，这样的任务怎能完全背下来？”当区领导到各乡去摸底时，就已经和各乡干部研究了如何选择建社基点、如何物色及培养骨干以及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积极性这些问题。在建社工作开始以前，区委会根据老社的经验和群众的意见，并照顾到乡干部的水平，又拟订了一个简单明确的解决有关建社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发给各乡。后来又把各乡干部集中到区上来进行了学习，使他们一方面进一步领会了合作化运动中的自愿互利政策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另一方面又学会了如何运用这些政策原则来解决具体问题。区上又指导他们如何使用村干部及老社干部的力量。通过这次学习，乡干部领导建社的信心大大提高。他们回乡以后，就组织建社力量，并遵照区上的指示，强弱搭配，一个熟手带引一个新手。在建社过程中，根据工

作进度情况,各乡都组织建社干部进行有关建社工作的学习。此外,又发动老社干部向建社干部和新社社员介绍老社经验。有些老社干部一谈就谈了十几个问题,比干部还谈得深入具体、细致生动。

坎吉肉孜说:“上级对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帮助,就是指导我们实行集体领导。我们下村以后,有些问题我们有把握的,就当时办了或答复了;没有把握的,就记下来,回到乡支部里大家研究后再决定。再不能决断的,就向区上请示。”由于考虑到乡干部虽然学习了建社政策,但是缺乏建社经验,假如光依靠乡支书一个人领导或者各个乡干部孤立把守一村一社,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考虑不周、认识不足而造成工作中的缺点,因此在这次建社工作开始以前,区领导就强调了乡支部集体领导的问题,所有建社基点、干部分工、工作步骤、各社户数、社干人选,以及建社中其他一些重要问题,都先在乡支部委员会里讨论决定,再统一布置执行。不仅乡支部加强了集体领导,就是区委会也贯彻了集体领导的精神。在区领导干部之间实行了分片包干,轮回到各乡检查(一般各乡每隔三天都有区委到乡了解情况),解答问题。区委回区后,彼此交流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做法。

我所访问过的一些乡干部都说,经过这次建社的实际锻炼,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都有了提高。三乡支书吐松阿不都拉说:“经过这次锻炼,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独立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可以自己解决一部分问题。不再像过去那样,一遇到困难,就不知如何是好,非得依靠上级解决不可。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政策思想上进行领导,同时也能在生产技术上进行领导。党经常教导我们说:我们不应该摆出一个‘领导人’的架子来领导农民,我们应该用亲自动手的方法来领导农民。现在农民都在学习使用新式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我们当乡干部的,也就应该领

先学会这些新鲜事物。我现在已经学会了許多新东西,农民问什么,我都能答得出,或者亲自做给他们看了。”

参加这一次建社工作的有乡干部 26 名、村干部 29 名、老社干部 28 名;他们都已学会了独立办社的本领。这又为这一个区 1955 年底的大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在 1955 年底,色满区在全区群众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之中又建立了 52 个新社,至此全区一共建立了 107 个初级社,入社农户占全区总农户的 81%,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合作化。

四

和此同时,原在五、六两乡建立的老社农民,又要求从初级社转高级社。1954 年冬天,有些老社农民就有转高级社的要求。那时他们还没有听到“高级社”这个名称,但是听到在苏联还有一种更好的生产合作组织叫“集体农庄”。他们感激党解放了他们,分给了他们土地,又领导他们组织起来互助合作,1954 年建社后都增了产,社员也都增加了收入。但是他们通过实际生产,总感到还有一些问题阻碍着大家高度发挥自己的劳动潜力。在 1955 年下半年全国农村掀起了巨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通过干部的宣传介绍,他们更确切地知道了还有一种比初级社更为完善的高级社,主要生产资料归全社所有,统一经营,于是大家就更倾向早日踏进这个富裕幸福的社会主义大门。

五、六两乡农民在工作干部的帮助下算了算细账,算出初级社有八大矛盾:1. 土地私有和组织劳动力的矛盾;2. 小块土地和利用土地、节省劳动力的矛盾;3. 小块土地对改进农业技术和进行农业基本建设的矛盾;4. 耕畜私有和使用耕畜的矛盾;5. 耕畜私有和喂养耕畜的矛盾;6. 大副业私有和实行多种经营的矛盾;

7. 土地私有和国家计划的矛盾;8. 低级社与社员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矛盾。其中一般农民感觉最深切的就是土地私有和组织劳动力的矛盾。我在色满区所接触过的农民,谈到为什么要转为高级社的问题时,大家首先提到的就是土地报酬问题。在色满区,初级社的土地报酬定为百分之四十。有些土地较多的农民,名义上虽然加入了合作社,但是因为有依靠土地报酬生活的思想,不愿好好劳动。另一方面,那些土地较少,劳动积极的农民,看到自己劳动出来的果实,有一部分被土地较多的农民分去,心中不平,因而使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以五乡的新路社来说,全社有男女劳动力 216 个,在 1955 年就有 40 个劳动力不经常参加劳动。同时,假如按每一个劳动力每年平均做 90 个劳动日计算,全社一年应做 1 9440 个劳动日,而实际上,1955 年全社才做 9 000 个劳动日,这说明有一半以上的劳动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有些土地较多的农民,即使社主任亲自去催促他,他也不好好下地劳动。例如五乡有一个老中农叫乌斯满屋不拉阿吉,全家六口,有男劳动力一,女劳动力二,一家三个劳动力全年才做了 67 个劳动日。原来他家有土地 24 亩,每亩可得土地报酬 130 斤,24 亩共可得 3 120 斤。乡长去劝他好好劳动,他公开对乡长说,他的土地收入已够全家一年吃的了,再加上少许劳动日,也就够全家一年用的了。另外有一个叫买提明沙吾提的,有两条耕牛,一年可得 2 000 斤的耕畜报酬,还有 18 亩地,一年可得土地报酬 1 200 斤,共合 3 200 斤,成为全家生活的主要依靠,所以全家虽然有两个男劳动力、三个女劳动力,可是大家劳动都不积极。对于这样一些不合理现象,农民意见很多。我在五星社七队访问一个叫司马义买木提的农民时,他的弟弟穆汉默德买木提正在旁边。土改时,穆汉默德买木提在喀什卖烤肉,所以没有分到土地。司马义买木提分到了四

亩半地,后来他们兄弟两人都加入了合作社。可是穆汉默德买木提看到他们兄弟二人才四亩半地,别家地多的多到30多亩,自己一年辛辛苦苦的劳动,很大一部分都被别人拿去了,他就不愿再生产下去,后来退了社到伊犁当伙夫去了。这次乡里成立了高级社,他才回来,仍然加入了高级社。

在五、六两乡老社社员的积极要求下,领导上决定在1956年1月帮助这两个乡转高级社。办高级社的首要条件是要把主要生产资料归全社集体所有。在酝酿转高级社时,两个乡的农民对于这点不仅没有意见,而且极力拥护。他们说:多劳多得,劳动才光荣,不要再依靠土地。关于耕畜问题,农民说:耕畜入社还折价,更是公平合理,也没有问题。五乡在转高级社时,甚至对于耕畜如何折价的具体问题还没有讨论清楚,有些社员就把自己的耕畜牵到了社里来了,逼得社干部赶快进城去打听各项耕畜的市价,以便照价折算。在讨论一个乡究竟是建一个、两个甚至三个高级社时,大家都赞成干脆合并建一个,因为假如分建两个,土地的连片和渠道的整齐,仍旧不能彻底。一些社员早已看到土埂多、水渠多、土地浪费大的现象,认为要是把田块合并、渠道合并,就能扩大耕地,将来还可以进行机耕。

那时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弥漫全国,再加上五、六两乡转了高级社,色满区其它几个乡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说:五、六两乡已经进入了高级社,为什么我们不能也进入高级社?当时有五个乡的乡支书都写信给区上要求也跟着转高级社。十一乡五村全村八十多户也联合要求转高级社。这十一乡在1952年土改时曾上书毛主席致敬,并曾接到毛主席的复信,所以他们不甘心落在后面,也要跟上去。

那时整个色满区真是一天一个情况,到处弥漫着社会主义热情。就在1956年1月下旬,色满区12个乡全面展开了转高

级社的工作。在半个多月内,全区 107 个初级社合并建成了 33 个高级社,入社农户达到全区总农户的 95%。

五

全区全面地建成了高级社之后,农民的劳动热情格外高涨。我问五乡五星社的主任阿不都卡迪尔司马义说:“你乡成立了高级社以后,有些什么新气象?”他说:“作为一个社主任来说,我第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每个社员都能自发地积极地劳动起来了。在初级社时,我们当干部的最头痛的,就是对于一小部分社员领导不起来。他们依靠着土地和耕畜,不好好劳动。你去督促他,他爱理不理,或者阳奉阴违。社管会的布置有时也贯彻不彻底,下面爱做就做,不爱做就不做。成立了高级社以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大家的劲头大,劳动率高,社管会的布置能够贯彻到底。过去妇女向来不下地劳动,解放以后,特别是成立了初级社以后,一部分妇女也参加了劳动,而现在,有劳动力的妇女差不多都参加了生产劳动了。现在我们不仅要提高耕作技术,增加单位产量,而且还要扩大耕地面积。全社有 1 070 个劳动力,地才四千五百多亩,由于人人劳动,劳动力反有剩余。所以社里决定抽出一部分劳动力到 70 里以外的地方去开荒。派了 29 个人去,本来计划开 200 亩,他们却一口气开了 600 亩。本来规定半个月一轮的,可是去了的人都不愿回来,说要把地种上后才回来。这样的现象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

我在三乡访问时,他们那儿转高级社以后,在耕作各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改进。在积肥方面,1954 年冬天三乡从城里运来的肥料一万五千多口袋,但 1955 年冬天运了四万二千多口袋。这个乡过去从来没有买过油渣,一则不习惯用;二则农民穷,买不

起；但今年为了肥水稻田，买了三万一千多斤油渣。今年各项耕作时间都比往年提前一些：过去开犁最高的是3月初，而且也只有地富人家犁多畜多，才能开犁得这样早，一般农民要到3月下旬才开犁，但是今年3月初，全乡就普遍开犁了。往年到4月初才种胡麻，由于下种较晚，常常不易熟透，瘪的多，影响产量，可是今年3月21日就开始种了。过去棉花要到4月底才种，今年4月7日就开始种了。过去这一带不很重视植棉，植棉的人家也只是把下地种棉花，或者在地头边上种些，有的甚至还和高粱混在一起种。种的都是土棉，棉株只有一市尺光景高，一株只结三个四个桃，一亩一般只能收上二三十斤，丰产的也只收上五六十斤，农民已是欢天喜地的了。可是解放以后，植棉技术和棉花产量逐年提高。1953年改用了苏联棉种，今年又都按技术要求，实行了条播和密植。往年要到桑子成熟时才种高粱，今年比往年提前了一个月下种。往年要挨到3月中旬才往地里拖沙，今年2月15日就开始拖沙。再如耙地，过去三乡从来不耙地，今年全乡1432亩冬麦地全都春耙了一遍。过去，要是两家合着一条田埂，谁家和田埂自己的一边多铲了一些泥，对方就会大闹大吵不同意，可是今年，自从转高级社以后，全乡已经废除了212条田埂，填平了110条渠道，估计增加了50亩耕地……这一切的改进，都只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一心一意要努力完成增产的计划，为高级社成立后的第一年创造出社会主义的辉煌成绩。

色满区酝酿及建立高级社时，正是冬天。按照往年的习惯，这一带的农民一到冬天，就爱留在村子里打打“举尔提”（纸牌）、晒晒太阳。要是下了一点小雪，大家就更不愿出来劳动了。可是去年冬天完全两样。从色满区到喀什城里一共有三条路，条条路上整日整夜地毛驴往返不停，给高级社驮肥料。1956年1、2两月全区的积肥量要比1955年同期的积肥量多出三分之二，

出勤率增加 60%。使用新式农具的比例也骤然上升。去年还有不少农民使用土犁,从今年起,土犁完全绝迹,甚至五寸步犁农民也不爱用了。大家都喜欢用 23 号单体犁和双轮单铧犁了。过去农民强调水稻田不能用步犁,只能用土犁,但今年也都改用了七寸步犁和 23 号犁。

色满全区建立了高级社以后,领导上为了示范试验,打算先帮助五、六两乡作出一个从 1956 年到 1962 年的七年规划。领导上动员社员酝酿这个七年规划时,先把中央颁布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发给大家学习。领导上也先拟了一个两乡七年规划的底稿,但没有先在群众面前摊开来。两乡社员在学习那 40 条《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很自然地结合到他们自己乡的具体情况讨论了起来。出乎许多干部意外的是:在讨论酝酿中,凡是领导上想到了的,农民也都想到了,有些个别地方领导上没有想到的,农民也都想到了,有些地方,领导上认为已经够放手了,但是农民提出来的意见更放手。例如生产指标中的玉米一项,玉米虽是高产作物,但是这一带过去玉米的产量不怎么高,所以领导上提出的指标到 1962 年是每亩 800 斤,但是农民提出的却是 1 200 斤。农民提的数字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内中曾有人去北疆玛纳斯河垦区参观过。他们说:“我们这儿的水比玛纳斯河垦区多,地也比那儿好。我们过去产量低,主要是因为玉米的品种不好,技术落后。假如改换了良种,再提高技术,一定可以增产。”(后来订为 1 000 斤)讨论到其他一些作物指标时,农民都是 700 斤、800 斤、900 斤、1 000 斤那样提。有些干部说:“你们过去的产量这样低,将来怎能提得那样高?”农民说:“再不要拿过去做底子了,大家的眼睛应该朝前面看。”领导上虽然拟了一个产量指标,但如何达到增产的方法还没有提出来,农民却先提出来了,他们认为每一个农民都应该

有一个劳动定额，他们提出的定额是男女平均每人每年作 200 个劳动日，比《四十条》里提出的指标还高。谈到全乡的规划时，哪儿是耕作区、哪儿是住宅区、哪儿是拖拉机道、渠道、林带、排水沟，他们都谈得头头是道。关于扩大耕地，例如五乡，领导上的底稿是扩大 500 亩，但五乡农民认为可以扩大 2 000 亩，而且他们说得很具体，哪儿有多少荒地，平埂填渠后又可增加多少，能够开出一笔账来。至于文教福利方面，农民也无一不想得周全。仍以五乡为例，后来拟定在七年以内，要使 12 岁至 18 岁的学龄儿童有百分之九十都能上学，小学毕业生中的百分之三十能够读完初中。要培养出一个农业专家、15 个农作技术员、15 个机械士、五个拖拉机手、两个医生、三个护士、一个调剂员、一个兽医。要有一座可以容纳 3 000 人的俱乐部，要有社办公所、图书馆、托儿所、医务处、体育场，此外还要有澡堂、缝纫部、分销处、轧花厂、石炭窑、砖瓦窑和可以容纳 150 只乳牛的乳牛场。领导上的底稿中没有提到买卡车，农民建议要买一辆卡车。他们说：“为什么其他地方都想到机械化，送肥料就不想到机械化呢？”他们还要装电话、电灯和广播器，他们说：“将来可以用广播来调度田间的劳动。”他们并且规定在 1957 年内扫除文盲，至于社干部，则争取在一年以内完全扫盲。

在讨论中，有的农民要求政府赶快把拖拉机开进来。干部就说：“拖拉机开来容易，你们谁能开？”有一个党员阿不都克日木沙吾提说：“只要拖拉机一来，我们在一两个月就能学会驾驶。我们乡支部向你们提出保证。”在我去色满区的前几天，两部崭新的、刚从苏联进口的拖拉机真的开到了色满。由于拖拉机站还没有建成，两部新拖拉机暂时停在一个桃花盛开着的园子里。这轰动了很多人前去参观。区上也立刻从各乡抽调了 22 名青年农民到区上来学习如何掌握拖拉机后面的农具。有一次，

我和那其中的 21 位在那花园里座谈了一个下午，他们不仅学习了技术，而且在思想上受到了相应的启发。这些青年农民都能对我说出一篇细账，例如拖拉机和人工的生产效率的比较以及两者成本的比较，使他们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威力和重要。他们说，经过这次学习，更想到要好好学习文化，提高技术，这样才能大力发展生产。我在这农村里访问，无论到哪儿，都看到农民群众的情绪完全放开，集中努力生产和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1956 年 4 月 喀什

帕米尔高原上的牧业社

我在祖国最西部的帕米尔高原上旅行了几天。那宽阔深远的河谷，那磅礴矗立的岩崖，那层层不绝直入云霄的高山，以及从山巅到山根的不化的积雪，都给人们一种高原旷迈的感觉。勤劳淳朴的柯尔克孜民族就在这一带世代相传地牧放着他们的马匹、羊群和高原特有的牦牛。

我所旅行的一带正在国境边缘上；我两次投宿的地方都离中苏边境不到一公里。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曾在那一带驻扎了一个边卡大队；这也就给当地牧民带来了不绝的灾难。在解放以前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上了脚镣关了两年、解放后才被释出狱、并且担任了那个乡的乡长的吐尔达列说：“我们这个乡本来有 200 多户。自从盛世才叛变、国民党来了以后，人民不堪压迫，逐年逃亡外地，到解放的时候，只剩下 83 户了。国民党军队要我们乡每月供应 30 只羊，每户每月供应 1 500 ~ 3 000 斤柴，每

户每天供应两缸子牛奶。好一些草场的草,三分之二都要供应国民党军队,我们自己只能用三分之一。就是那剩下的 83 户中,有 70 多人都被强迫担任了国民党的边卡情报员,探听苏联的军情,并且在本民族中互相监视。那时候大家生活困难,没有粮吃。一只上好绵羊只能换到 60 斤小麦,而且还只有向国民党军队才能换到。解放以后,人民在共产党的温暖的安抚下,才陆续回乡。现在我们乡已经有 177 户。解放的时候,那 83 户共有 2 807 头大小牲畜,到 1955 年底,已经发展到 8 647 头,比 1949 年增加了两倍多。”

这个乡在 1955 年 2 月建立了一个红光牧业生产合作社,这是新疆全区第一批试办的三个牧业生产合作社中的一个。我访问这个社的时候,有些社员坦白地说,他们最初入社的时候,还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那时候大家主要的顾虑是怕入了社以后,牲畜归公,不能自由处理,不能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例如怕过库尔班节的时候不能宰羊过节了,有远客来也不能宰羊款客了。有些坏分子还造谣说:“合作社要用 80 公尺布做的大被子集体睡觉,要用 40 个耳朵的大锅(当地最大的锅有四只耳朵)集体吃饭。”可是一年来事实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击破了坏分子的造谣。过节要宰羊的仍旧可以宰羊,去年过库尔班节,社里就有七八户宰了羊。社员艾衣库鲁有一个亲戚从苏联来探望他,他仍和没有入社以前一样地宰了一只羊款待他的远来的亲戚。另外一个社员戈德瓦衣的父亲死后,他家仍旧按照民族风俗宰了一匹马请四邻吃饭,此外社里还给他贷了 50 元济急,供销合作社又给他贷了给死者缠身的白布。还有些牧民到附近的农村里去打听了一下,知道农村里的合作社并没有大家在一个大被子里睡觉,也没有集体吃大锅饭的事情。

这一个新疆地区第一期试办的红光牧业生产合作社在第一

年生产中的总的情况是好的,说明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合作化道路是正确的,合作社是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的。社员阿力格许说,他体会到的合作社的好处很多。他自己有牛有马又有羊,牛马羊吃的草不一样,习惯上不能把它们合群放牧,因此他过去总是顾了这顾不了那,使牲口放不好。在春天接羔的时候,一个人也忙不过来。由于劳动力不够,过冬以前也不能充分割储冬草。可是这些问题在参加合作社以后大都解决了。他现在的分工是放山羊,他说他现在不仅不比入社以前忙,反而感到轻松得多,可以集中精神放好山羊。由于大家分工、各有专责,去年接羔的情况也很好,羊羔的成活率在95%以上(同年单干户的成活率最高的是85%,互助组的成活率是92%)。过去入冬以前无力多储冬草的,入社以后,就有能力多储冬草。这一年来大家的牲口都有发展。阿力格许入社时只有三头牛五匹马20只羊,现在他有了四头牛九匹马和45只羊。他说过去单干的时候,除了依靠自己牲畜繁殖以外,再不能增加自己的牲畜;可是去年他在社里,因为劳动好,又学了兽医,替社里治好了250头病畜,单单在劳动分红方面就分到了12只半羊羔。他说:“一年来的事实使我充分认识,社就是我的家。离开了社,再没有富裕的道路。”

社主任阿比沙里和其他社员告诉我,去年一年合作社除了放自己的牲畜以外,还代外地的农民放了200只羊,代国营牧场放了300只羊。去年入冬以前全社一共打了21万多斤草,平均为每只羊储冬草120斤。接羔时期是牧民一年中最紧张的季节。建社以后,他们改变了过去挖土窖育羔的老习惯,改用草帘搭成的小棚圈育羔。白天实行跟群接羔,夜间轮班起来三次接羔。为了照顾小羔的发育,一般都对母畜推迟挤奶15天(这是指挤给人吃的奶),或者原来一天挤两次的,改为一天只挤一次。此外还进行了改良草地、栽种苜蓿、栽种青稞、打柴打猎、组织

妇女抓山羊绒、组织骆驼队给供销社运输货物等，以增加社员
的收入。

去年红光社年终分配的时候，社外一些互助组和单干户亲眼看到户户社员的收入都有了增加。二乡常年互助组组长库鲁说：“你们办了一年社，指出了牧业生产合作社是我们牧民过幸福生活的道路，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明年也要转社。”

在我访问的那一部分高原上，除了去年建立的红光社以外，今年又建立了一个红旗社。当我们翻山到达另外一个草场访问红旗社的时候，红旗社的主任提勒克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他们的新社在接羔工作上有些什么样的新进步。他说他们在接羔以前先作出了接羔计划。他们专门搭了一个蒙古包安放羊羔，使人畜分居，使羊羔能自由活动。白天把蒙古包的顶毡掀开，使羊羔得到更多的阳光。把10天以上的羊羔和不满10天的羊羔隔为两群，以免大的把小的踏伤。除了白天跟群接羔外，夜晚轮班守夜，随生随接，以免小羔冻死踏死。剪脐带的时候，也实行了先把脐带结紧然后再剪的科学方法，以免病菌传入羊羔肚里。

提勒克是一个年纪很轻的贫牧。他一直笑眯眯地接待着我们。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又很文静。我问他：“大家选你当社主任，你愿意不愿意？”他说：“我过去一直不懂得人是为了什么而工作的。现在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大家要我多为大家服务，我是很愿意的。”我说：“办一个社，当一个社主任，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你怕不怕困难？”他说：“困难是有的，但是我不怕困难。在劳动上，我自己可以苦干带头，来推动大家。只是我没有文化，在组织劳动力和制定生产计划上，我便感到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一面请求党的帮助，一面经常和群众商量。我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时我们同行的同志问他阿图什县今年新建的将尼奴尔牧业生产合作社向南疆各牧业

生产合作社、互助组提出增产挑战，“你们应不应战？”提勒克迅速而肯定地说：“应战。”这一个初看起来仿佛很柔弱的、然而意志却很坚定的小伙子，他的谈话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

在红旗社里，我们会见了新社员朱凯。朱凯去年曾经和红光社社员沙仁挑过战。沙仁告诉我们说：“去年朱凯劝我不要入社，说入社以后牲畜就要充公了。我因为相信共产党，仍旧决心入社。朱凯就说，你入我不入，各走各的，看谁的牲畜发展得快。”那时他和沙仁各有三头牛 10 只羊。沙仁入社以后，生活上的困难都有社照顾，一年的结果，牲畜发展到五头牛二匹马 20 只羊。但是朱凯因为刁羊摔伤了腿，休养了三个月。他的 10 只羊只生了五只羔。为了解决一年的吃用问题，他宰了五只羊又卖了五只羊，到去年年底就只剩了三头牛五只羊了。朱凯说：“我认输了，我现在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了。合作社确是好，所以我今年也决心加入了社。”

我在访问红光、红旗两个牧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都看到了他们那辛勤的生动的育羔劳动。每天清晨和傍晚，牧民们都亲热地抱着自己所接的小羔送到母羊身边吃奶。柯尔克孜牧民有着异常敏锐的记忆力，尽管他们每户都接了几十只小羔；但是他们都能够一一记清楚哪只小羔是哪只母羊生的，毫不弄错。他们吹着轻盈的口哨，呼唤着一只一只母羊前来喂奶。那些小羊羔，一忽儿一啻一啻地吮吮着它们的母亲的乳汁，一忽儿又在草场上乱蹦乱跳，活泼鲜健。生双羔的母羊很多。牧民们顾虑生双羔的母羊乳汁不够，就用牛角做成“奶瓶”，用人工给那些双生羔喂奶。有一个妇女生产组组长阿衣夏，她去年接了 26 只羊，其中有八只生了双羔，一共生了 34 只羔，全部成活。今年她接了 70 只羊，成绩也很好。牧民们都知道，牧业生产的发展主要是通过牲畜繁殖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大家都非常重视每年一季

的接羔育羔工作。

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和它所取得的初步成就,给牧民指出了一条幸福的道路。今年那一带有许多牧业互助组都要求转社,很多单干牧民也要求入社。在我离开那儿的那一天早晨,一乡的常年互助组组长托吾提买合木提还特地请我代他向县领导机关反映,要求早日批准他们转社。虽然是在祖国极西的边陲,虽然是在雪峰连绵的高原,但是党和毛主席所指出的合作化道路,也同样像一盏明灯照耀着祖国边陲高原上的牧民。

1956年4月 喀什

和阗的缫丝女工

和阗的蚕丝生产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那儿也是新疆蚕丝生产最集中的地方。1941年是新疆历史上蚕丝生产最盛的一年;那年全省发蚕种10万盒(25公分装),和阗一地即发75000盒,生产生丝300多吨。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阗的蚕丝生产逐年下降,到解放初期(1950年),年产生丝已不足五吨了。

解放以后,南疆人民一再要求党和政府帮助他们发展蚕丝生产,并希望修建现代化的缫丝工厂。1953年,政府在和阗兴建和阗缫丝厂。这个厂已在1954年的国庆节投入生产。当旅客到达和阗近郊10公里的地方,就能看到那占地200亩、建筑着一幢幢新式厂房和办公楼、耸立着很高的烟囱和水塔的和阗缫丝厂了。

政府一面施工建厂,一面选派了七十多名少数民族女工到

苏州去学习缫丝技术。当我和阆缫丝厂访问那些去过苏州的维族女工的时候，她们一提起在苏州学习的那一段情况，都引起一种无比温暖的和幸福的回忆。在苏州学习期间的学习模范白西汉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家里用一个小木车缫丝，要好几天才缫出一斤丝。后来听说沿海有很大的缫丝厂，我就想，要是和阆也能有这样一厂，多好啊！解放以后，政府决定在和阆建筑缫丝厂，还要送我们到苏州去学习技术，我听到了就高兴得不得了。到了苏州，我们刚在苏州第一丝厂门口下车，便被许多汉族大姊抬了起来。虽然言语不通，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犹如亲生姊妹好久未见似的那种强烈的火热的感情。我们参观车间的时候，只见机器转动很快，汉族大姊动作敏捷，简直使人瞧不见丝在什么地方，那时我们心中又有很多顾虑，怕自己学不上。但是汉族大姊一直耐心地帮助我们。她们先教我们如何打结、穿磁眼、做鞘、捻添等等基本动作，技术员又给我们上理论课，接着就把我们一个一个分配到车间实习。言语不通就用手比，实在说不明白的事情，便用实物来说明。下了班在路上也是边走边解说。新疆本来没有工业，现在汉族老大哥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建立工业，汉族大姊又这样热心教我们，所以大家都很感激，一致保证要把技术学好。”这批民族女工在学习上是认真的，尤其那年冬天学习了总路线以后，思想提高一步，学习进步更快。她们最初是两个人管一台车，后来逐渐可以一人管一台车了。她们最初缫出来的丝都是一些次品，后来她们的成品也达到了双A级的标准，同汉族女工的成品一样了。

和阆缫丝厂的工会副主席买合木提，1953年曾经陪同那批女工一起去苏州。他说：“沿海汉族老大哥对从和阆去的女工关切照料，无微不至。和阆女工到达苏州不久，就入夏季。她们不习惯江南暑天的炎热，领导上便特别让她们在中午休息一个时

候。江南雨多，地气较湿，有些女工开始脚肿，领导上便立刻派医生给她们治疗。维族习惯吃馕，但是苏州没有馕。想自己做，又没有馕灶，也没有人会砌馕灶。后来领导上多方设法，终于找到了一个回族同胞，专门砌了馕灶，做馕给她们吃。维族喜欢吃抓饭，苏州不容易买到做抓饭用的黄萝卜和羊肉，领导上就专门派人到上海去买。过肉孜节和库尔班节的时候，领导上给维族女工放假三天，同时动员汉族女工代替她们生产，以免影响整个厂的生产计划。过节的时候，按照维族的习惯给她们宰了羊，又请她们看电影。平时一到星期日，很多工厂、学校、机关争着和她们联欢，带她们上家里或风景区玩。有一个女工叫奴尔尼莎，怀孕七个月小产了，领导上特地把这个不足月的孩子送到医院里去用特备的养气箱保育。那个医院里虽然有四只养气箱，但都有小孩占用着。为了特别爱护兄弟民族，医院就把其中一个快要好的小孩提前抱出，把那只养气箱腾出来让奴尔尼莎的孩子睡。医院还专门派了一个护士看护这个孩子，用牛奶喂他，这样在医院里保育了五个多月，一直保育到这批女工学习完毕，才把孩子交给奴尔尼莎带回新疆。在学习上，厂方不仅派最优秀的汉族女工耐心教她们，还经常派人来了解她们的学习情况，征求她们的意见。”买合木提说：“这些事实使大家深切地体会到，这就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具体表现。”

这批少数民族女工在苏州学习了一年，1954年春天回到和阗。以后厂里陆续招收了好几批少数民族女工，就由这些从苏州学习回来的女工和部分汉族女技术员教她们。白西汉说：“我一面教那些新招的女工学技术，一面就给她们讲苏州汉族同胞是怎样热情地帮助我们，这样大大鼓舞了她们的学习情绪。”我看到全厂450名生产工人中，大部分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女工。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在汉族女工的帮助下，她们已经基本上能

够独立掌握缫丝作业中的主要操作了。

在和阗女工从苏州回新疆的时候,有80名江南女孩子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陪同这批维族女工到和阗来支援兄弟民族的缫丝生产。她们有些是杭州纺织工业学校和苏州浒墅关蚕桑学校的毕业生,有些是无锡一些丝厂的熟练女工,有些是新招的并在无锡受过短期训练的青年女工。她们大都只有十八九岁。她们初到和阗,正如和阗女工初到苏州一样,在各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女孩子从小都是吃大米长大的,一下子吃蒸馍和面条,吃不惯。羊肉也吃不来。当时厂房还没完工,宿舍还没造好,饭厅还没修建,大家只好在露天里吃饭,一阵风把沙子也刮进了菜碗饭碗。后来工厂投入生产了,但她们看到茧子小、茧层薄,丝时常断,水又浑浊,影响丝色,这一切都使她们感到工作不好做,对前途发展缺乏信心。再加言语不通,人生地疏,所以有些人思想波动,不能安心生产。我会晤了厂里两个先进女工过凤英和朱玉兰。过凤英说:“我过去一直有不正确的想法,认为这里发展慢,要进入社会主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心里老想在这儿做上三年,帮助厂里培养出一批新的民族女工以后,就回无锡。我又怕越是工作做得好,将来越难脱身,所以初来时工作总不够积极。自从1955年2月厂里开始整党学习以后,我的思想斗争很剧烈。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终于认清:我既是一个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安心在这儿工作,并且要带头搞好生产。尤其现在全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高潮发展得这样快,我们工人更应该加紧努力。现在我们厂里就要实行双班制,还要扩建,增加车台,听到这些消息大家都很兴奋,感到边疆的发展也很快。”朱玉兰说:“北京青年志愿去黑龙江垦荒的新闻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们比我们更艰苦。我最初以为我们不懂少数民族语言,在生产上很难帮助维族姊妹。后来领导同

志说,只要我们汉族女工生产得好,也就可以激发维族姊妹向我们看齐。领导同志的话说得一点不错。维族姊妹总是那样虚心地向我们问这问那,她们那种虚心的学习态度鼓舞并教育了我们汉族女工,使我们格外要把生产搞好。”

从江南来和阗的一些汉族姑娘中,像张顺和、马丽娟、许品梅、姚冰澄等都已经能够直接用维吾尔语言指导维吾尔族女工操作了。张顺和是技术员,我问她是怎样学习维语的?她说:“我在苏州的时候,上级就分配我帮助维吾尔族姊妹学技术。后来和她们一起来新疆,在路上我就一点一点学习她们的说话,并学着吃羊肉。到了和阗,厂里招收了一批新工人,也派我担任教员。那时领导同志鼓励我们学维文,我就决心想把维文学好。我和翻译阿乐布江同志合作,上课以前我先把讲课的内容告诉他,我把一些有关的维文名字先在簿子上记下来,这样我便跟他一起去上课。由他讲,我旁听。听不懂的地方我就记下来,下了课再问他。后来教操作,我就先学这样一些话:身体应该立直些、眼睛应该看哪儿、手应该放开些、手应该放拢些……先从和工作有关的话学起,说的次数多了,也就容易记住了。那些姊妹们看到我能说几句维语,都特别高兴,我们之间就格外容易接近。她们在学习上有什么困难,总是主动地来找我问我。每天下班后,也总有许许多多民族姊妹们跑到我房间里来,亲昵地和我谈笑。”

在党不断的教育和关切下,这批从江南来的女孩子,现在都已安心在和阗工作了;其中有些已经在和阗结了婚。青年生产组长韦玉林说:“我们起先对新疆的建设不够关心,可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新疆的建设,看到祖国边疆的各项建设也发展得这样快,都很兴奋。现在我们在这儿都作长期打算了。说个笑话吧:从前我们买暖壶,都只买竹壳子的,现在,买起暖壶来,就都

要买铁皮壳子的了。”

1956年3月 喀什

民族师资的培养工作

——新疆学院访问记

我在乌鲁木齐的时候访问了新疆学院；这是新疆的最高学府。从1958年起，这个学院将扩大成为新疆大学。

由于新疆过去遗留下来的历史原因、现在的客观条件以及民族地区的各种特点，在新疆发展高等教育，具有许多为内地所没有的困难。成立一个学校的最主要的条件是学生和教师，而这两者在新疆学院都成为问题。解放以前，除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以外，新疆全省只有六所维吾尔族中学。盛世才时代曾经在迪化办了一所蒙哈中学，可是到国民党时代，这所蒙哈中学也停办了；此外，除了三区，新疆全省没有一所哈萨克中学。那时新疆的一些中学，大都是初级中学，高中很少。这也就格外影响到学院学生的来源。1945年，新疆学院曾经因为没有学生而一度停办。后来从内地调了一批汉族学生到新疆学院来。在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时，新疆学院一共有学生379人，但其中民族学生只占到38%。女生数目也很少；在民族学生中，没有一个民族女生。

由于过去高中很少，既影响了学院学生来源的数量，又影响

了学生来源的质量,因而不能不降低标准,招收一部分初中毕业的学生。1951年伊犁阿合买提江专科学校(相等于高中)的学生182人转入了新疆学院,这是新疆学院吸收的学生在质量上比较好的一批。由于新疆情况的特殊,对于民族干部的需要极其迫切,新疆学院在1952年时规定两年毕业,到1953年才改为三年毕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将改为四年毕业。由于学生程度不齐,第一年常常主要是给学生补习若干基本课程,余下只有两年,再加上翻译困难,学生实际学习到的东西有限,这样就必然影响了教学水平的提高。到1956年暑假,新疆在解放以后新设的高级中学开始有学生毕业,以后新疆学院将能够保持它吸收学生应该保持的标准。

学生在质量上虽然受到一些限制,但这几年,新疆学院的学生在数量上一般是发展的。到1955~1956这一个学年,新疆学院的学生已经从1949年的379人增加到1247人,其中有女生239人。1247名学生中,民族学生占到96%;维、哈、回、蒙、汉、锡伯、塔塔尔、塔吉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等民族都有。民族学生占到绝大的比重,这是完全符合在民族地区设立民族学校培养民族学生这一正确的目的。

学生的来源固然有困难,而师资问题更其严重。在1950~1951这一学年中,全院有学生336人,而教员却只有13人。其后内地支援新疆,陆续来了一些汉族教师。可是新的汉族教师的支援并不能真正解决学院在教学上所存在的困难,因为新来的汉族教师由于语言的隔阂,不能直接给学生上课。每个人都需要配备翻译,而又没有那么多翻译可以调配;况且一般性质的翻译和教学上的翻译有很大的区别。当时也曾经从校外调进一些翻译,可是由于他们缺乏专业知识,例如化学、物理、数学这些课程,便很难翻译。那时学院里因为民族师资太少,翻译力量也

不足,因而在课程比重上,曾经出现过政治课和语文课开得较多,专业课开得较少的现象。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将影响新疆学院的正常发展,因此民族师资问题成为了新疆学院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52年春天,学校开始采用培养“实习助教”的办法来逐步解决培养民族师资的问题;这是新疆学院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从毕业班中挑选了四十多名优秀的学生,分到各系或各教研组去,以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培养。主要是适当地减少他们一些一般性的课程,而对他们加强专业学习的指导。培养的方式主要采取由教师给他们上课的方式。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育学、教育史、普通心理学、遗传学、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农业经济、达尔文主义、解剖学、棉花学、农机学、中国史、世界进化史、苏联文学、地质学、水利学、素描学、民族舞等课程,都由有关教师编好讲义分别给本专业的实习助教上课。给实习助教讲课的教师中也有少数苏联教师和民族教师,但主要是汉族教师;他们平均每周一周要给实习助教上14小时的课,有时还要专为某一个实习助教补开某一项他没有学过的专业课程。在老师这样的培养下,成绩好的实习助教,能够独立掌握某一门课程的,即由这个实习助教直接去给学生上课。假如还不能独立上课的,则由教师陪着他去上课,仍由实习助教讲,教师坐在旁边听,必要时给他一些指导和帮助。假如这样还不行,则教师和实习助教共同备课,由教师主讲,实习助教翻译,使实习助教通过备课和翻译的工作,能逐步培养到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给学生讲课的程度。因此,在新疆学院,教师都有双重的任务,既教学生,又教实习助教。通过这几年来实际工作,大家清楚地看到,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不能永远由汉族教师来负担,要大批培养民族学生,首先要大批培养民族师资,因此对于汉族教师来说,培

养民族师资是他们更主要的责任。从长远来看,假如他们能教好一个实习助教,就等于解决了一门功课,教好两个实习助教,就等于解决了两门功课,教好实习助教比之教一般学生,效果更为实际深远。

目前民族地区民族学校的教学工作除了由民族教师、包括民族助教、直接授课以外,还有一部分课程需要由汉族教师或苏联教师通过翻译的方式进行教学,而这种教学翻译,要比寻常一般性的翻译困难,既要具备一定水平的语文程度,还要具备适当的专业知识。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一方面是急切需要更多的教学翻译,另一方面是很不容易找到适当的教学翻译;反过来说,教学翻译须具备有关的专业科学知识,可是某一个人真的通达了某一门的专业科学知识,他就不会再当教学翻译。教学翻译也是民族学校教学中的一个困难,而要解决这个困难,没有别的道路,也只有自己培养。

在培养教学翻译方面,新疆学院过去曾经走过一段弯路。过去新疆学院曾经在语文系增设过一个以汉族学生为主的维文班和一个以民族学生为主的汉文班,规定三年毕业,经过三年的语文学习以后,再留校分到各系去进行专业培养,担任专业翻译。但是这个办法费时多而效果坏。因为那些语文班学生,经过了三年的语文训练,毕业后还要从头学习专业知识,在情绪上都不安定。因之现在新的办法,基本上和培养实习助教相似,从各专业班中挑出一些专业基础和汉文基础较好的学生,减少他其他若干课程,让他着重学习汉文,使他在语文和专业两者相并发展,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就可顶用。同时,这种对教学翻译的培养也可以和对实习助教的培养结合起来,通过教学翻译的训练,最后使那个翻译也能成为可以直接授课的实习助教。

这种培养民族师资的方针,现在在新疆学院已经取得了肯

定的成就。在 1952 ~ 1953 年度挑出的 40 多名实习助教中,目前已经有 13 名,像我后面要介绍的哈密提那样,能够独立开大学专科一二年级的一门至两门课程了。在过去三年中,新疆学院先后培养了 113 名实习助教。这 113 名实习助教已经成为了目前新疆学院教学工作上的一支主力和骨干。现在全校每周授课 1 107 学时,其中由实习助教开课的有 654 学时,占到 60% 左右。1955 ~ 1956 年度全院所开 270 门课程中,有 174 门由实习助教在教师的辅导下直接讲课。现在全院 37 个班中,其中 35 个班的班主任都是由实习助教担任的。这一支新的民族师资队伍的成长,为新疆学院以及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的更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我在新疆学院访问时,花了好几天时间访问了一些担任培养民族实习助教或教学翻译的汉族教师和被培养的实习助教和教学翻译。

有一天我访问了数理系的物理教研室主任王怀德和他所培养的实习助教哈密提。哈密提是伊犁人,原在伊犁阿合买提江专科学校读法律。1951 年 2 月,那时他还是八年级(即高中一年级),即从阿合买提江学校调到新疆学院学习,改读数理。学了一年半,到 1952 年 10 月,学校里便把他抽出来教书。1952 年下半年,他教的是初中物理。1953 年上半年改教高中物理。学校里并派汉族教师王怀德培养他。

哈密提说:“1953 年上半年要我教高中物理时,我自己也才等于高中二年级的程度,心中很害怕。学校里虽然派王怀德同志帮助我,但我那时的汉文,连日常生活里的一些话还不十分会

说,更不要说课程上的问题了。我那时想,学校派汉族教师帮助我,也不一定有什么结果,还不如我自己直接从俄文课本上自修来得有效。我讲课时,王怀德同志就去听课,对我经常提出意见:哪些地方不系统,哪些地方不深刻,甚至哪些地方讲错了。那时我们彼此语言不通,有时用手势来表示,有时在黑板上用画图来表示。要是我讲错了,经他改正后,我就在下次上课时更正。但是我觉得老是这样更正也不是办法,后来我便和王怀德同志一起备课,以便先弄正确了,再去上课。

“那时我教的高中物理学,王怀德同志有汉文本,我有俄文本(实际上是乌兹别克文),我们就一句一句互相讨论。王给我的帮助很大。有些地方,我本来以为已经懂了,经王一说,才知道我并没有真懂。这样,就使我逐渐感到兴趣,觉得汉族教师的确实对我们有帮助。以后我们天天晚上都在一起进行备课。在王怀德同志的帮助下,我讲课的质量大大提高,学生大都表示满意,我的汉文程度,这时也有进步,很多汉文的物理学上的名词我也知道了。

“后来,王怀德同志更进一步让我看他的汉文讲义;不懂的地方,他给我解释。在他这样热心的帮助下,我后来竟然能够把他的汉文讲义译成维吾尔文。这时,王怀德同志不再跟我天天去听课,只是隔一两个星期偶尔去听一次。当他觉得我对于课程本身问题较少的时候,他便转而在教育法上多帮助我,如指导我讲课应有系统,应该分出一般和重点,以及如何使理论联系实际等等。

“我现在已经可以教大学专科二年级程度的物理,并且可以领导做二十几种不同的实验了。”

哈密提谈完后,我便请王怀德同志谈谈他的体会。他说:“1953年学院领导上要我们担负起培养民族师资的任务,我们

也觉得,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老是汉族教师讲,翻译翻,不是办法,应该从根本上把民族师资培养成长起来,他们才是将来民族地区民族教育事业的真正骨干。至于哈密提同志,那时他自己才只高中二程度,已经要担负教高中物理学的责任,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好好地帮助他。那时学院培养民族师资的工作还只是一个开端。我们系里决定重点培养哈密提,并把他交给了我。我开初感到很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语言。那时哈密提虽然认得几百个汉字,可是并不真正了解那些字的意义。他只能听懂很少几句话。我们在一起备课时,常常要借用手势来表达彼此的意思。有时,遇上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我们好几个汉族教师同时用了各种方法,用尽力量,还是没有办法使哈密提听懂。后来我知道他有一本乌兹别克文的物理课本,而我又有了汉文物理课本,两个本子的内容相同,这样,就由我一句一句读,他一句一句听。但是乌兹别克文的文法和汉文的文法不同。我读的,他在他的本子里有时找到了,有时找不到;我们先把找到的肯定下来。我重复再读时,他也就渐渐把最初没有找到的找到了。最初每句我都要读上五六遍他才懂,后来进步到读一两遍他就懂了。我们每天至少要在一起读两个小时,有时甚至要读到五六个小时。这样读,读了半年。那时他一面直接向学生讲物理,一面又当了我给实习助教上课的翻译。口音腔调,各人不同。他最初只能听懂我一个人的话,又经过了半年多,他慢慢地也能够听懂别的汉族教师的话了。

“哈密提虽然能听汉语,但还不能读汉文。1954年,学院要他教大学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学。由于没有俄文课本,必须自编讲义。最初由我编,读给他听。他一面听,一面记下来;根据记下来的备课去讲课。后来哈密提说这样不好,既费时间,对于他的提高也没有帮助。他建议由他直接阅读我编的讲义。我同意

了他的建议。由于我们多年相处,我知道他哪些汉文较熟,哪些汉文较生,所以尽量挑他熟悉的字写,尽量写得通俗简单。我并且努力按照维文的文法写成句子,尽一切可能使他容易看懂。这样试了一两个月,以后便在讲义中逐渐加上一些较新的字和较深的句子,并且把新字先注出来,教他先学一下。这样,生字逐渐加多,又过了几个月,他就能够看懂我一般编写的讲义了。

“到1955年初,不再由我编写讲稿。我只在事先和他研究这一堂课的目的,应该分几个过程来讲、举哪些例子、画些什么图等,讲稿主要由他自己编写。而到1955年初夏,一般的意见我也不再提了。哈密提同志经过逐年的锻炼和提高,他已经能够独立担任这门功课了。”

三

我接着又访问了畜牧兽医系的助教王殿兴和他培养的教学翻译乌布里·哈斯木。哈斯木是1955年8月新疆学院语文系汉文班毕业的学生。由于学校决定哈斯木毕业以后把他分配到畜牧兽医系当教学翻译,所以在1954年11月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畜牧兽医系就叫助教王殿兴培养他,先教他“农畜繁育学”一门功课。教了三个月以后,哈斯木就担任了王殿兴的教学翻译。哈斯木担任翻译工作时,遇到很多困难,主要是因为他过去在语文系学汉文,对于畜牧系的功课完全不接头;不仅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一点都没有,甚至很多名字和术语也都不懂。那时班上有些同学是刚从兰州的民族学院调来的,他们的汉文基础比哈斯木还好,哈斯木心中格外害怕,本来会说的,可是一上课堂,心里一阵慌张,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因此同学对他有很多意见。他那时感情上很苦闷,不愿再搞这个翻译工作。可是王殿兴同志

总是安慰他,告诉他什么工作最初都会遇到困难的。王殿兴对他说:“我们汉族教师到新疆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帮助你们培养兄弟民族的高级师资,而翻译是培养工作中的一个桥梁,你做这工作对于本民族是一种贡献。”就在王殿兴同志这样既热情又耐心的帮助下,哈斯木的汉文程度和专业知识都逐步提高。哈斯木说:“我初学汉文的时候,许多字不识,后来识了,又不会写。很多汉字,外形差不多,例如‘困’‘团’‘因’,不容易区别它们的意义。有些名词,在不同的地方,意义完全不同,例如‘组织’,说‘组织起来’是一个意义,说‘身体上的组织’又是一个意义,最初很难掌握。1954年我初跟王殿兴同志学习时,认识的汉文很少,草字一个也不识。王殿兴同志写的都是正楷,后来也逐渐加上两三个草字,现在他写的草字我也全认识了。1954年我听王殿兴同志说话时,只听懂40%,现在,可以听懂80%到90%了。我初担任翻译时,同学对我的意见很多,有些人甚至说我条件不够,现在,同学们对我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意见了。”

王殿兴是1954年夏天在兰州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组织上分配他到新疆学院工作。他最初以为既要他上课,学校里一定会给他一个翻译的,没有想到翻译要他自己来培养。最初他培养哈斯木时,感到很大困难,主要是因为哈斯木没有专业基础。在备课的时候,一个很寻常的名字或者一句很寻常的话,王殿兴也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使哈斯木了解。王殿兴那时想,这样培养,不知要培养到什么时候。后来学院领导上一再纠正这种不正确的思想,说关于民族师资和教学翻译的人才,上级不可能派给我们,校外也不可能派给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想法从下面挑对象,进行培养。

“我们培养的翻译,一般说来,大都汉文差,专业基础差,而又年轻急躁。”王殿兴先总结他的一部分经验说:“在培养他们

时,有些具体的东西,他们容易了解,有些抽象的名词或理论,就很难解说清楚,例如生物有机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质变与量变问题、泌乳量和含脂率的换算问题、家禽在产蛋时色素如何消退问题,甚至一些名字如什么叫‘遗传性’、什么叫‘变异性’等,很不容易解说清楚。有时,有些字眼对于说明某一个意义,出入很大,不能随便改变,例如‘渗入’不应说成‘进入’、‘细嫩的’不应说成‘细小的’、‘促进它发育’不应说成‘使得它发育’、‘尽可能’不应说成‘一定’、‘避免’不应说成‘不能’、‘抱孵性’不能说成‘抱小鸡的性情’等;用字改变了,意义就不同了。但是翻译同志因为不容易了解,有时就希望把难译的地方删掉。每当我写完一段讲稿以后,常常要查很多次字典,我指导他们哪些名字查一般字典,哪些名字查专业字典;先查汉俄字典,再查俄维字典。有时他查来查去,没有查到,就会烦躁。为了省事,他们常会随便译上一个不切当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极大的耐心,既要不厌其烦的反复解释,又要鼓舞他们的情绪。他们查字典查不到,我就帮他们查。

“此外,我们还要照顾到翻译同志在学生中的威信。例如哈斯木,最初学生对他意见很多,要求调换。有时学生当场指出他的错误,使他下不了台。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把哈斯木译错的责任,由我自己担当下来,说是我对他的帮助不够,并且告诉学生,哈斯木确实已有很大的进步,将来可以有更大的成绩。下课以后,我另外约哈斯木个别谈话,帮助他改正错误。当他知道我在学生面前如何照顾他的时候,就会使他更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业,增强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团结。”

关于具体的培养过程,王殿兴说:他最初先给哈斯木解释了一些一般常用的畜牧名词,如“营养”“饲料”“乳腺”“乳静脉”“分娩”“妊娠”“性成熟”“发情”“品种”“调教”“卵细胞”“胚胎”“鉴

别”“系数”“指数”等，哈斯木懂得了这些名词以后，他就容易了解这门课程大概包括哪些内容，然后再把与“农畜繁育学”有关的名词如“有机体”“遗传性”“变异性”“获得性”“繁殖”“培育”“育种”“杂交”“有性杂交”“无性杂交”“同化作用”“异化作用”“新陈代谢”等解释给哈斯木听。但当时的困难是，即使哈斯木懂得了这些名词的意思，也不一定能找到适当的维文名词，因此必须再查字典，或者去问其他经验较多的民族翻译。为了使哈斯木容易记忆，王殿兴就帮他写了一个“名词记忆本”。王殿兴用汉文正楷写，哈斯木把它们一一译成维文。王殿兴写的时候，尽可能写得系统化，把同一类的名词写在一起，例如“羊毛的构造”“毛囊”“脂肪腺”“毛乳头”“粗毛”“细毛”“落毛”“两型毛”等，都属于羊毛一类，就写在一起，以便哈斯木容易翻查。王殿兴写讲稿时，也全部用正楷，少用长句深句，多用短句浅句。王殿兴说：“我们平时写行草惯了，一旦要写正楷，又慢又吃力。但用正楷写，哈斯木容易认识，并且容易据此翻查华俄字典。但假如我永远只写正楷，他就永远只认识正楷，所以隔了一个时期，我在讲稿上慢慢写上几个草字或简笔字。一年以后，我写的草字他已认识了80%，到现在，我写草字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了。”

在每次讲课以前，王殿兴都和哈斯木在一起备课，先由哈斯木把一些新的名词查出来，记在他的“名词记忆本”里面，然后再看讲稿，把不了解的地方提出来，由王殿兴解释。解释工作有时进行得很复杂细致，王殿兴举了一个例子说：“由于哈斯木同志最初不懂百分比如何计算，因而不懂如何计算‘含脂率’，我便先使他懂百分比如何计算。我先举例子问他：现在有100个学生，内中维族50名，回族50名，我问他维、回族学生各占学生总额百分之几？这他很容易回答：维族学生占50%，回族学生占50%。但是我又问他，现在有七个学生，其中维族四人，回族三

人,各占百分之几?他就说不出来了。这样,我就告诉他如何算法:一个是 $\frac{4}{7} \times 100$,一个是 $\frac{3}{7} \times 100$ 。当他懂得如何计算百分率以后,然后再引导他计算含脂率。”

在备课时,常常有些问题王殿兴讲了好几遍,哈斯木实际上并没有懂,可是觉得不好意思,只好说懂了。王殿兴为了试验他到底懂了没有,就提些问题反问他。哈斯木说,懂是懂了,只是不能用汉语表达出来。最初王殿兴信以为真,可是后来发现学生问哈斯木时,哈斯木答不出来,王殿兴才知道哈斯木并没有真懂。王殿兴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恳切地劝导他在每次备课后,用汉语说一遍给我听一下。他最初说的时候,也确实困难,例如把‘吃饭’说成‘饿了’,有时文法说错了,有时发音发错了。发音错了,我就用国音字母给他拼,文法错了,就帮他更正。困难虽多,但我总是一直帮助到他真的懂了时为止。”

教学结合生产

——八一农学院访问记

我访问了新疆学院以后又访问了八一农学院。这一个农学院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的。它一方面成为了新疆生产部队和新疆各族农民的技术顾问,另一方面又是大批培植新疆农业生产技术骨干的专业学校。它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从部队抽调出来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解放以后各地参军的青年。当我在新疆很多地方的部队农场访问时,经常遇到这个农学院的教

师带领着学生在那儿进行生产实习。这个农学院的教育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这一教育方针的推行和前文叙述的新疆学院对于民族师资的培养,是新疆高等教育中两个比较突出的教学特点,并且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成绩。

我在八一农学院访问时,主要是要了解他们“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这一个教育方针的实施情况。八一农学院现分农学、林学、水利、土壤改良、畜牧兽医、农业经济五系和一个农业机械班。我先后访问了在该校担任昆虫、园艺、棉花、牧草、水利等课程的教师。农学系的教师朱懋顺自从1952年八一农学院成立以后,几乎历年都带领着学生到部队农场进行生产实习。他们一年之中有半年在农场里;一般是3月底或4月初下去,一直到秋收以后才回学校。朱懋顺同志说:“生产实习对教师、学生和生产部队,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当教师的,通过这种生产实习,可以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来充实我们的教材,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对于学生来说,生产实习不仅可以使他们在课堂里、书本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生产活动密切地联系结合起来,而且通过一次生产实习,可以使每一个学生农业生产上从播种到收割的生产程序,能够完整地加以掌握。对于我们去实习的部队农场,他们不仅不感到是一种负担,正相反,他们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实习。他们感到我们去实习对于他们也有很多帮助。学生每次到部队里去,总会带一些新的知识去,从而提高部队的生产技术。很多战士都得到学生的帮助和指导,所以在部队里,战士都叫学生为‘老师’。生产部队和八一农学院成为血肉相关的两兄弟。农学院利用部队农场的各项条件来训练他们的学生,搜集实际的资料以丰富教师的教材,同时农学院的整个教育工作又都是为新疆的生产部队,更广泛地说,是为新疆的农业生产而服务的:帮助部队农场

解决他们生产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为生产部队培植大批的技术骨干力量,研究新疆农业生产上的重要问题,并根据研究的结果更进一步地改进新疆的农业生产。”

下去实习时,教师先把学生带到师、团,先由师、团首长介绍一般情况,然后再把学生分配到连。那时地上还没有化雪,学生分配到连以后,就立刻参加部队即将举行的对于备耕的检查工作。这种检查工作对学生有很实际的教育意义:使学生看到哪些处理是合理的,哪些处理是不合理的。例如有些单位把播种机不加遮盖就放在露天里,这样对农具保管就是不好的。有些单位把种子堆在阴湿的地方,也是不好的。检查种子的发芽率时,先用一个碗,盛着沙,放着水,把种子放在沙里,然后把那些碗放在火墙旁边(按照技术要求,气温应在摄氏 20 度左右,火墙旁边一般有十五六度),一般三四天就开始发芽。10 天之内检查发芽率的高低,一般都在 80% 以上,但也有只达到 20% 或 30% 左右,这就因为种子收时较湿,后来没有晒过的缘故。遇上这样的情况,就必须换种。在检查各项农具的准备工作时,检查在两个桶的旁边是不是已准备着一根扁担? 之字耙的螺丝是不是松了? 耙齿的方向是否一致? 播种机有没有安装好? 锄和铧够不够锋利? 朱懋顺同志说:“这些小问题,我们过去本来也不大注意,后来看到苏联专家提托夫检查工作时,非常细致,连这些小地方也都一一检查,我们后来也就学习他的先进方法,小地方也不放过。”

1954 年起,八一农学院农学系的棉花和粮食两个专科规定每一个参加生产实习的学生都要负责 200 亩丰产作物的技术工作,地上化雪以后,学生就纷纷下地,先划定自己的丰产田的面积,了解田地的种植历史,然后就把这一块地的土壤做许多剖面测定,分析这块土壤的质地和结构,过去的耕作情况、肥料翻埋

情况和墒度情况等,以便掌握今年耕作措施的参考,并据此在一个星期内拟定出自己的生产实习计划。实习学生不能离开部队单独去搞一套,因而他们的实习计划必须在连的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制订出来。学生的计划须先送给连看,并由带领实习的教师批准。一切技术措施由学生提出,但仍由连领导。

计划批准后,就立刻开始工作。这时正是进行春耙的时候,学生要首先检查耙地的质量。按照要求,要对角线耙地,耙到四至五公分深。假如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学生就得要求连里再耙。但是春耙是一项突击的和十分细致的工作:地还湿,不能耙,因为一耙反而耙成沟痕;地干了,又失去了耙地的意义。对丰产会有影响。最好是在地面上稍稍有一些干的时候耙。所以在春耙的时候,必须随时观察,随干随耙。在耙地的时候,学生进行着科学的测定工作。例如用温度表来测量已耙地和未耙地之间的不同的影响:耙了的地,土松了,容易吸收日光,因而地温较高;没有耙过的地,地温较低,一般要相差一度到两度。科学的测定工作,可以使学生在书本上获得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完全得到了证实。

接着就是春播,这是一场紧张的战斗。对于这一年的整个生产来说,这一场战斗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我们现在以种棉花为例:春播前第一步工作是棉籽处理,如晒种、药剂拌种,都由学生指导处理并亲自操作。因为要提高产量,促使棉花提早成熟,部分棉籽用春化处理。在最初一个时候,部队还不会处理种子的春化工作,所以由教师作总的指导,学生做具体工作,部队则跟着学生学习春化的技术。种子春化时,一面加温,一面喷水。学生通过实际的操作,获得很多实际的经验。例如喷雾器必须事先检查,否则如临时发生故障,不能给种子喷水,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水的供应也要注意。在大规模的春化情况下,

水的需要量是相当大的,种子在春化的过程中不能临时缺水。朱懋顺同志举了一个实例说:“1954年我们在乌拉乌苏农场做春化工作时,把两口井的水都用完了,早春渠水因山雪未融,水源枯竭,意外地发生了水荒。部队紧急动员全团的战士用脸盆和木桶从一两里路以外供应水源,才算安全渡过困难。那次虽然没有造成事故,但已经搞得非常紧张,这都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事先估计不够充分的缘故。像这样的经验教训,在教室里是讲不出的,而且也是预想不到的。经过这样一次实际的经验,将来再拿到教室里去说,就更生动具体,具有更大的说服力了。”

在播种时,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播种的质量。学生不是仅仅在田里看一下就算,还要跟着播种机走;这时有些值班的学生满身扎了50至60公分长的芦苇短杆,假如播种机有漏播的地方,就随时在漏播处插上一根苇子,以便补播。另外一些学生还要检查种子的深度和密度。一般要求一公尺地播70粒种子,假如距离这个标准太多或太少,就要停机检查。还有些学生在棉田地上进行种子拌沙的工作,使种子能够均匀地播下来。再有一些学生则参加农机的技术测定。实习的学生没有一个不是在紧张地工作着。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每经过一个段落,就要做一次总结。春耙以后要做一个春耙总结,春播以后又要做一个春播总结等。累积各阶段总结后,最后还要做一次生产实习总结,全面地运用实习中所搜集的材料加以分析。这种总结,对学生学业的提高,帮助很大,因为他们亲自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理论联系了实际,对于许多问题更容易获得深刻的体会。

春播完毕以后,就进入田间管理的阶段。当棉苗稍稍显行的时候,就要中耕,以便提高地温。接着进行查苗补苗。棉株已生长一两个真叶时,就要间苗定苗。部队每年都有新来的战士,

学生就做了几十根尺子带领这些新来的战士做这些工作,教他们怎样的苗算好苗,怎样的苗算坏苗,以及怎样留苗。一般的中耕、追肥、整枝、灌溉等实际操作,都由部队担任,学生的任务主要是掌握技术,例如中耕的深度、追肥的时间、整枝的时间、田间的墒度、要不要灌溉等等,都由学生掌握,并和连长商量执行。学生对于作物的生育情况也须及时记载,以供连、团的参考。但在这一个阶段里,学生和部队之间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经常会有些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程序是,学生把提出的意见先交小组长,再由小组长报告教师和连长。连长对学生提的意见,有时接受,有时不接受。连长不接受时,小组长便再向教师反映,假如教师同意学生的意见,就向团提出,团调查后,再作出决定。但是这样的程序,有时会引起连的意见和误会。因此教师和学生深切地感到:要使连信任学生,首先要自己做出成绩来,有了成绩,部队对自己自然信任。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当棉苗生长后,蚜虫也出现了,接着就要展开防虫的工作。杀虫药水按规定是用烟草半斤、熟石灰半斤、水 60 斤的比例配制的。但是 1954 年农学院的学生在玛纳斯河流域某一个部队农场实习时,发现如法配制的药水,效果只有 10%。学生很着急。后来经过反复检查,才知道烟草还是 1952 年的,因而性能不足。学生建议改变配制的比例,改为烟草一斤,熟石灰 0.75 斤,水 30 斤,以加强药水的效力。但是连因为这个比例是上级规定的,不同意改变。学生就反映给教师,教师和团都同意改变配制的比例。后来按照学生所提的办法重配以后,杀虫药水的效力提高到 82%,那一个农场的蚜虫因此得以基本消灭。同年还有一个例子:那年玛纳斯河流域垦区在苏联专家提托夫的指导下,要求把灌溉的方式从沟灌再提高为细流灌溉。在苏联,细流灌溉是用橡皮管子灌溉的,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农学院二年级学生刘世

伦,创造性地设计了一块小木板,把木板插在每一条沟口,在木板上开一个小孔,水由小孔里慢慢流进来。最初战士们对这个办法都认为没有什么意思,不好。但是刘世伦整天地在田里试验的结果:

普通沟灌 一人一天可放水 11.2 亩地

用有孔木板细流灌溉 一人一天可放水 14.4 亩地

用刘世伦的设计进行细流灌溉,比普通沟灌的效率提高 27%。刘世伦并因此得到师、团的物质和名誉奖励。1955 年,农学院的学生朱光熹、汤剑夷、杨宝丰三人认为原来的单管喷雾器所花费的劳动力太大,建议连里修改,并由他们三个人合力设计,在教师张学祖、张新寰的指导下,把八个喷雾器放在一起,用马拉,在轮子上做杠杆,利用轮子走动,杠杆一上一下,进行喷雾,工作效率提高五倍。这些事实都说明,学生用实际的成绩来赢得部队的信任,从而更进一步帮助部队,提高他们的生产。

7 月麦收以前,各个农场都要做一次冬麦鉴定的工作。这种鉴定工作比较复杂,一般战士还不能担任,所以通常都由实习的学生来做。学生做这种鉴定工作时,还要连带做很多科学的分析工作。例如有些麦田每亩产量 450 斤,有些只产 250 斤,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这里面就要进行一系列的分析研究。例如用牲畜耕的和拖拉机耕的有什么不同?春耙过的和没有春耙过的有什么不同?幼苗时曾经倒伏过的和没有倒伏过的有什么不同?缺水的和不缺水的有什么不同?施过磷肥的和没有施过磷肥的有什么不同?在不同时期收割的有什么不同?这样细致的分析研究,就会使学生发现很多问题,搜集很多材料。例如经过这种分析,他们知道春耙过的土地的产量比没有春耙过的高 6.2%,这样就使学生对春耙的重要性更增加了认识,并使他们以后指导他人春耙时,可以用这种具体的事例来说服他人的

反对。

科学的分析研究工作贯彻在整个的生产实习里,而教师则负更大的责任。1955年春天,某些农场的冬麦死亡率很高,部队就问教师:要不要翻种?当然,究竟翻种不翻种,这个问题应该由部队自己决定,但是带领着学生到部队农场实习的农学院教师,他们同时担任着师或团的农业生产委员,对于部队提出来的疑难问题,应该负责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教师的意见会很大程度影响部队的决定,因而教师们回答这种问题时,感到所负的责任很重。但是这种问题既不能完全依靠理论和书本,也不能完全依靠过去的经验,主要要调查现场的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教师根据所得到的材料,认为那年有些冬麦的死亡,主要是由于耕作技术不当所致,因而加重了冬麦受雪腐病的危害。教师一面分析研究,一面把怎样测定分蘖数和分蘖节入土深度的方法以及如何检查雪腐病的方法告诉学生,叫学生也到现场进行调查。学生通过实际的工作学会了怎样测定的方法,同时他们测定以后也可以提出他们的意见。学生测定的结果和教师测定的结果一致,这就更加强了材料的可靠性。教师根据调查的材料,认为有些分蘖还可发芽,只要加强田间管理,可以毋须翻种。他们提出加强田间管理措施后,结果每亩获得了200斤的产量。在新疆,不仅1955年发生冬麦死亡的现象,过去也经常发生冬麦死亡的现象,所以教师不仅具体地帮助部队解决了那次要不要翻种的问题,而且通过实际的调查,搜集了很多资料,以便回学校以后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八一农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根据教师们的实习报告,就把这个冬麦死亡问题列为1956年的研究题目之一。这种研究工作既可提高教学的质量,又可为新疆农业生产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八一农学院师生在部队农场进行生产实习,对部队生产和

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很多贡献。1955年春天,教师关晋杰和学生郭宽子经过多次的挖掘,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在秋耕秋灌地的田埂的南坡三公分至五公分的地方,藏有棉铃虫的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过去一直找不到棉铃虫的蛹究竟潜藏在什么地方。一个蛹一般可产800个卵,假如能及早消灭一个蛹,就等于消灭了800个棉铃虫。后来部队即照这个经验在全师展开了挖掘棉铃虫蛹的工作。另外昆虫学的教师张学祖在荒地调查时,发现在一种紫草科植物上有棉铃虫的寄生。根据这个发现,再检查棉田中的紫草科植物上,也同样有棉铃虫的存在。过去以为棉铃虫都在天仙子植物上,这时才知道紫草科植物上的棉铃虫比天仙子上的棉铃虫还多,因而建议部队农场消灭棉田中的一切紫草科植物。

八一农学院教师通过指导实习,对提高苜蓿产量和利用芦苇做青储饲料,也是有贡献的。在北疆一带,通常苜蓿只能年收二次。但根据八一农学院的试验,认为可以年收三次。在苜蓿每次开花时收割,不仅可收三次,增加产量,而且质量也好,因为开花时收割,质地较嫩。1955年在玛纳斯河垦区中推广后,原来每亩年产800斤的,可以提高到年产一千斤以上,有的甚至可以年收四次。关于利用芦苇做青储饲料,1954年夏天也试验成功,在部队推广时受到广泛的欢迎。当芦苇长到七个叶子或八个叶时,割下铡成约二至三公分长,入窖密封,使之自然发酵,产生乳酸,牲畜吃了很容易消化。新疆各地的芦苇很多,用芦苇做青储饲料,既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又可减低牲畜饲料的成本。假如用玉米秆做青储,每100斤的成本约为一元,但用芦苇,每100斤的成本只有三角。1954年把芦苇青储喂养乳牛的结果,提高了乳牛产乳量的26%,现在南疆有些地方也在推广这个经验。

我在八一农学院访问时，访问了教师以后，又访问了农学、林学两系的好几位同学。他们过去大都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进了八一农学院以后，最初虽然从书本上获得了一些理论知识，可是初下去实习时，还是经常闹笑话，许多具体问题一下子摸不到头绪。后来经过亲自操作，才一步一步把实际和理论联系起来，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增加了很多实际的经验。他们举了一些生动的例子，说明八一农学院的“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对于他们有很大的益处。农学院四年级的方孝庭同学说：“有很多问题，虽然书本上也说到了，教师在课堂上也讲了，但不经过实际操作，还是搞不清楚。书本上说的只是一般的原理，具体做时，还要灵活处理。”例如喷药，书上只说用药水喷杀蚜虫，但怎样喷法？什么时候喷效果最好？这些问题书上都没有说明。他们经过实际的摸索，知道早上喷要比中午喷效果好些，因为早上气温低，大气下降，喷的药水容易下沉。到了中午，地上晒热了，空气上升，药水就不容易下沉。要是经常在棉田中杀虫，就会摸索出害虫究竟在棉花的上部、中部或下部。例如盲椿象一般都在棉花嫩的地方，而红蜘蛛开始在棉花的下部，后来则慢慢爬到了棉花的上面。喷药时，假如只是一面走，一面喷，这样还是打不死蚜虫，要来回往返地喷，“生长点”上还要特别多喷些。方孝庭同学还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们喷药时，正巧前一天田里刚刚灌过水，地没有干。按照他们原来的规定，一亩地是喷三斤六六六，但那次他们一亩地喷到五斤上下，这就因为地湿不好走；走得慢，药也就费得多。这种经验只有从实际操作中才能体会到。

又如绿肥的问题，书上只说绿肥可以肥土，以补畜肥的不足。但绿肥的肥力如何计算？书上没有谈到。后来他们在教师的指导下，实际学习了如何测定绿肥肥力的方法。他们计算出

每一平方公尺内茎叶和根的重量,然后得出每亩的重量,也就是测出每亩可产多少肥力。绿肥开花的时候,肥力最大。所以通常都应该在绿肥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翻入土中,因而测定绿肥的肥力,也应在它开花的时候测定,而不是等它结了荚再测定,这些他们都在实践中得到了实际的经验。

书本上说:小麦如灌水过多,茎秆因之发软,麦秆容易倒下。假如小麦在灌浆时期、乳熟时期倒下,对于产量就将有较大的损失,因为麦秆倒下以后,养分就不容易充分输送到麦穗中去。有一次方孝庭他们看到一块地里的冬麦都倒了下来,他们就问战士:这块地上的冬麦是不是在同一个时候倒下来的?战士说,有一部分地方的冬麦是在拔节时(即开始长茎时)倒下的,有一部分是在乳熟时期才倒下的。在那次收割的时候,他们就把在拔节时候倒下的、在乳熟时期倒下的以及没有倒下的冬麦,每种取一平方公尺若干点,作了一次比较研究。结果是:假如没有倒下的代表正常,作为100,在拔节时候倒下的,仅损失5%,而乳熟时期倒下的,损失达到58%。方孝庭同学说:“书上说到小麦如倒伏,产量有损失,也曾说过,某种情况的倒伏,损失小,某种情况的倒伏,损失大,但是究竟小到什么程度?大到什么程度?书上没有说明。我们经过这次分析实验,就得到一个概念,同时也就知道,在小麦灌浆时候,对于小麦的灌溉以及田间管理,都应更加注意。”

农学系的学生都学过农机(包括拖拉机动力和农具部分)和植物栽培这两种课程,而进行中耕时候,就要把这两门课程密切地联系起来。关于中耕器入土的角度,书本上只说:入土的角度愈大,翻土愈深,但在调剂中耕器的深度时,究以何种深度为恰当,书上就没有说明了。理想的中耕是:前面中耕器走过,开成一沟,后面复土器走过,就把两旁的土覆盖,正好把地盖平,而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境地,就只有通过实际操作,逐步摸索。又如中

耕时,要经常注意马的休息,不使过分疲劳,而这种地方,书本上是根本没有提到过的。

方孝庭同学叙述了很多的事例以后,总结他和他们一班同学的学习时说:“我们经过四年来在八一农学院所受的训练,现在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学习一定要联系实际,并且把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为解决实际问题而服务。我们初进八一农学院时,对于农业生产什么都不懂,这几年来在党的培植下,我们成长起来了,我们就应该发挥自己的能力,全力发展新疆的农业生产。我们现在都在准备我们的毕业论文,而我们在选择我们毕业论文的题目时,首先考虑的一点,就是在部队农场中是不是存在着我们打算研究的那个问题?我们最主要的是想把我们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一些具体问题上。例如我们有一位同学搜集了车排子、炮台、乌鲁木齐一带的气象材料,他搜集这些材料的目的,乃是使他自己可以独立思考来研究一个问题,而他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北疆的棉花播种期究以怎样一个时候为最适当。我们现在要使自己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养成独立思考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我们这一班在1956年都要毕业,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想在技术上、工作上、思想上全面地准备自己,希望毕业以后走到具体的工作岗位上去,为发展具有无限前途的新疆农业生产而努力。”

新疆远景

新疆是我们祖国的一块宝地。但在过去的岁月中,它一直

沉沦在冷落的被人漠视的命运里。它的土地辽阔,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不多;它的景色壮丽,但称道并欣赏它的景色的人很少;它的物藏富庶,但认识它开发它的人更少。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这一大片土地逐渐活跃起来,它逐渐受到人们的注意,为很多爱国青年所向往,并被一致地认为它有着极大的开发前途。它的突出之点,不仅是由于它的土地广大,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具有多方面的开发价值。

新疆目前还是一个农业地区。在将来,新疆也永远是我们祖国的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农业基地。谈新疆的农业,得先谈新疆的水利。自古论新疆的人都有这样一句话:有水斯有土。在农业生产上,灌溉地区是最可珍贵的农业地区,因为水受人力的控制,不致遭受天然的灾害;而新疆的农作区几乎都是灌溉地区。新疆每年究竟有多少水量?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水文资料很少。这几年来,陆续在各大河流设立了六十多个水文站,今年计划再增设 100 个水文站,到今年冬天,大体上可以摸出一笔水利账来。按照目前的估计,新疆全年地面上的水量约为六百多亿立方公尺。除了地上水以外,新疆还有着巨量的地下水,将来也须加以利用。但新疆的地下水究竟有多少,必须先做好水文地质调查工作,而且要把新疆的地下水源全部搞清楚,才能算出这笔账来,目前还不容易估计出一个近似的数字。

这些水能够灌溉多少土地,首先决定于一亩田要消费多少水。这就牵涉到土地的灌溉和水的管理是否科学合理的问题。目前新疆水的浪费是很大的。一方面是灌溉浪费,一方面是损漏很多。苏联水利专家沃洛宁 1954 年在新疆玛纳斯河流域视察时报告,包括渗漏和蒸发等损失在内,每亩地消费的水量约为 750 立方公尺。但是这每亩消耗 750 方水的计算,按照近年来的观察,其中只有十分之三上下真正灌溉了土地,其余十分之七

上下都是走漏损失掉了。我在1955年1月27日的新疆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玛纳斯河和奎屯河的水约百分之八十都是流失了的。随着国家对农业生产管理的日益加强和农业技术的日益提高,国家对水的管理必将逐步提高,灌溉日益合理,每亩的平均用水量可望逐步降低,同样数量的水将来就可以灌溉更多的土地。例如乌鲁木齐河的水量,在解放前灌溉6万亩土地还嫌不足,解放以后,由于上游兴建了水库,又用石块铺砌渠道,减少了渗漏,现在已经可以灌溉23万亩土地。新疆的全部面积为170万平方公里,约等于25亿亩,其中可耕地,过去一般的估计是一亿一二千万亩,近来估计约为2亿亩。假如一方面增开水源,加强水的管理,一方面合理灌溉,减少水的浪费,新疆的水和新疆的可耕地,大体上也还是可以求得平衡的。

到1955年底,新疆全区的耕地面积是2552万亩,播种面积是2238万亩。预计在12年内要开荒六千多万亩,到1967年,新疆的耕地面积将扩大到8600万亩,播种面积扩大到7500万亩。但要扩大耕地,须先兴修水利。为了要把不用的水蓄起来,以使用之于需用之时,就要建筑很多水库;为了要把水从它所在的地方引送到需要它的地方,便要建筑一系列的渠道;为了要进一步利用地下水源,将来还要更多地运用坎儿井、自喷井和深井抽水等等方式。现在新疆正在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全自治区的河流普查工作,编制流域规划,新建和改建各项水利工程,以创造大规模发展农业的条件。现在我在这儿谈一些简单的轮廓。先说天山北麓。天山北麓的主要农业地区之一是玛纳斯河流域垦区。这个流域东起玛纳斯县的塔西河,西至乌苏以西的四棵河,可耕地约为500万亩。在这一流域里,将修建一系列的水库。目前已修好及正在修的,从东往西,有大泉沟水库(蓄水4000万方)、车排子水库(蓄水2000万方)和柳沟水库(蓄水

7 000 万方)。计划要修的有夹河子水库(蓄水 12 000 万方)、磨姑湖水库(蓄水 20 000 万方)、安集海水库(蓄水 5 000 万方)、奎屯河水库(蓄水 4 000 万方)和钟家庄水库(蓄水 2 000 万方)等。这些水库,预定在 1960 年前都要修完。天山北麓的另一个农业区是乌鲁木齐河流域。这一流域东起奇台,西至玛纳斯县,可耕地约为 400~800 万亩。在这一地区,已修了红雁池水库(蓄水 5 000 万方)、猛进水库(蓄水 6 500 万方)和八一水库(蓄水 3 000 万方)。还要修头屯河水库、三屯河水库以及乌拉伯水库。另外可能再在达板城修一水库,但那是打算给吐鲁番地区送水的。在天山南麓,计划中的大工程之一是开都河的改道。目前开都河的水流入焉耆东面的博斯腾湖,再由博斯腾湖经哈满沟流入铁门关以南的孔雀河。博斯腾湖沿湖一周约为 300 公里,开都河的水在这个湖里绕一个圈子,要半年以后才能流入孔雀河。博斯腾湖的湖面很广,水的蒸发量很大,从开都河流入湖里的水,三分之二以上都被蒸发掉了。同时,湖的水位高,开都河下游和沿湖地带的地下水位也即随之提高,从而增加了土地碱化的程度。目前计划在焉耆西面的阿拉毛墩地方开一条新河,把开都河水直接引入孔雀河。这样,一可以避免河水因盘旋于博斯腾湖而被大量蒸发,二可以降低博斯腾湖的水面,使滨湖地区增加 100 万亩左右耕地,三可以降低开都河下游的地下水位,减轻那一带土地盐碱化的威胁。

开都河水直接流入孔雀河以后,将从孔雀河再开一条新渠道,经过尉犁县的东面流到从尉犁到塔羌之间的铁干里一带。在历史上,那一带曾经有一个时期,也是一个水足草秀,农牧并茂的地方,后来由于塔里木河的改道,水走了,土地遂被遗弃荒芜。计划中的新渠道开辟后,那一带的土地将重新苏复过来,估计将可开垦 300 万到 400 万亩。这条新渠道将长达 200 公里以

上,河面宽,水流量大,将来并且可以通航。

在开都河的上游,将建筑一个大水库,称为鱼勒都斯水库。水库的库盘已经找到。目前全国水库的库容以官厅水库为最大,计21亿立方公尺,造价也以官厅水库最低。计划中的这个鱼勒都斯水库,库容和官厅水库相似,但造价比官厅水库还要低些。此外,当把开都河水通过铁门关引入孔雀河时,也将利用地形发电。

天山南麓的另一个大计划是要使阿克苏河流域和渭干河流域连接起来。阿克苏河的水量较大,它的年净流量有60多亿立方公尺。目前生产部队在阿克苏河的西面开了一条长达一百公里的胜利渠,把阿克苏河水引到沙开子和哈拉库勒一带,开了三个胜利农场。还打算把胜利渠的水引到阿克苏河下游南面的乌鲁桥一带去。胜利渠全部将负担灌溉大约100万亩的耕地。在阿克苏河的北面,即从阿克苏、温宿、拜城,一直通到沙雅和新和,这一大片土地上有一千万亩以上的荒地可以开发。计划中要从阿克苏开一条长达三百公里以上的渠道通到库车。这条新渠道规模很大,它的流量将达到100~150秒立方,将来也可在渠道中通航。目前库车到阿克苏的公路,是从库车西北翻山经过拜城县到达阿克苏的。这条公路线不久即将改道。新路线将向南移,离库车后即向西南方面通到阿克苏。改线的目的是为了更便利这一大片处女地的大规模的开发。同时,将来在库车还要修筑水库,并把新的渠道继续东开,一直延伸到尉犁。

以上就是在可以望见的短短几年以内将要实现的天山南北改变自然面貌的巨大计划的一部分。按照这个伟大的改造自然的计划,在天山的北麓,从奇台到精河这长达六百多公里的一长片原野上,将有自有历史以来荒芜至今的一千几百万亩土地,被开垦变为良田。仅仅是解放以后这几年,我们在天山北麓这一

条公路上走过时，已看到公路两旁的面貌有着很大的改变。那一带不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荒漠连片，很多地方都已变成了肥沃的棉田和粮田，作物和防护林给人们带来了象征着生命和希望的翠绿的颜色。很多地方出现了一幢幢新式的建筑，夜晚走过还看到闪闪耀目的电灯。要是再过五年十年，这一带必将出现更多的规模巨大的国营农场和新的农庄。水库和渠道将接连成为一个有机的灌溉网。公路和电线四通八达，将成为这一片土地上无数活血的脉络。不仅农牧产品有巨量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工业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

在天山以南，自然面貌的改变将比天山以北更要显著突出。在阿克苏河、渭干河和塔里木河这一块三角地带，一向是一片苇湖、草滩和丛林的处女地，现在将被英雄时代的英雄人们英勇地开垦出来。另外，从尉犁到铁干里那些素来被人遗弃的地方，由于新的渠道的修建和巨量土地的开发，不久将会出现新的城市。两地的垦荒工作，都将在规模巨大的、完全正轨化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机械化的情况下进行。而且由于那些地带过去荒无人烟，所以在开发过程中将不会发生任何土地纠纷问题。开都河的改道工程 1956 年即已着手进行，从阿克苏开一条新渠到库车的计划，1957 年就要进行。这些计划实现以后，那两个原来是荒芜冷落的地方，将变为富庶热闹的地方。这确实是巨大的可以自豪的历史改变。将来还有可能从阿克苏河流域通过新建渠道，一直通航到开都河流域，这也是前人做梦也不会想象到的事情。至于那条历史上久享盛名的塔里木河，在这伟大的改造自然的计划下，也将改变它的命运和地位。这一条河将来虽然仍将存在，但是不再成为南疆的一条主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它也将负担起新的历史任务：它主要将成为那一带巨大的农业区的一条总排水道，并容纳来自天山的特大洪水。

根据上面所谈的轮廓,可以预见到新疆农业生产上的广阔前景。到1967年止,新疆年产各种粮食共达205亿斤。7500万亩的播种面积中,棉田面积将为1500万亩,1967年棉花的总产量约为十六亿斤皮棉。在作物的品种上,除了小麦、棉花、水稻、玉米、高粱以外,还要扩大大豆、油菜、芝麻、薯类、甜菜、烟叶、麻类等作物的种植。棉花生产中,长绒棉将占到百分之十左右。新疆的瓜果也是有名的,要大大发展葡萄、哈密瓜、苹果、香梨、桃、杏等的园艺生产。瓜果的种植面积要从1955年的65万亩扩大到1967年的550万亩。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使新疆有能力解决将来自区内数倍于今日的人口的粮食、瓜果和蔬菜的供应和将近6000万头牲畜饲料的供应,并有条件供应一部分轻工业所需要的经济作物原料,为新疆大规模发展工业创造有利的条件。

新疆地域太大,国家的地质勘测力量有限,对于新疆的地质调查工作还是一个开端;要把新疆地下资源摸出一笔初步的账来,也还要经过一个相当的时间。对于新疆工业建设的远景,现在只能谈一个轮廓。先说石油。新疆的独山子油矿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人们很早就知道新疆出产石油。最近在准噶尔盆地的西部、独山子北面约160公里的克拉玛依地方发现了规模巨大的油田,引起了全国极大的注意。这个地区的地质情况简单,油层浅,油出得快。关于这一个油区的开发前景,我已在前面《访前景壮阔的克拉玛依油区》一文中叙述过了,现在国家正在大力加速开发这个油区。公路正在积极修筑,房子正在大量修建,巨量的器材和人力正像潮水一样从各地输送进去。不要很久,在那荒芜的原野上就将出现新兴的石油工业城市。但在新疆,石油资源并不仅限于天山北麓,从乌斯泰经独山子到安集海以至更东这一条山前洼地线和从克拉玛依到乌尔禾这一个台台区。

在南疆,在库车、拜城一带和喀什、莎车、巴楚这一个三角地带,地下都有石油。吐鲁番盆地也有石油。新疆的石油资源是丰富的,有着很大的开发远景的。

煤也是工业的主要动力原料之一。新疆煤的资源也很丰富。在天山北麓,东起奇台,西迄乌苏、精河一带,这一条煤线长达五六百公里,煤层的厚度厚到 100 公尺以上,含煤系数达到 18%。现在乌鲁木齐市的地下,就是一个大煤田。乌鲁木齐市过去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河的东面,由于地形的限制,不易发展。现在再加上市区地下是一个将待开采的大煤田,这个城市将有计划地向西北移动发展。哈密地区也有煤,目前柴达木盆地用的一部分煤就是由哈密供应的。伊犁也有煤,可供将来当地发展工业的燃料之用。在天山南麓,从库车到阿克苏和从莎车到和阗这两条煤线,都长达 300 公里以上,煤的储藏量很大。阿尔泰山一带的煤田较少,目前仅知额尔齐斯河南面的和布克赛尔山中有煤。其他散在天山南北各地的零星煤矿也还很多。将来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的一部分用煤也将要由新疆供应。

新疆铁的储量也是丰富的。伊犁地区尼勒克的赤铁矿是有名的,成分也好。在富蕴和和靖也有巨大的铁矿。鄯善的硫铁矿质量也很好。吉木萨尔和乌鲁木齐则都有菱铁矿。到 1967 年,尼勒克将成为祖国最西部的一个综合性的钢铁工业基地。

除了石油、煤、铁以外,新疆还有很多矿产,如铜、铝、铅、锌、钨、锰、重晶石、盐、石膏、硫磺等等。南疆的库车、拜城、乌恰、蒲犁一带都有铜矿。尼勒克也产铜。铅锌矿的分布很广,主要在乌恰到莎车一带。焉耆一带也有锌矿。过去钻井泥浆所用的重晶石都是从苏联运来的,最近在伊宁发现了重晶石矿,并已生产。至于新疆的盐,几乎到处皆是。在阿尔泰山地区,还出产稀有金属。

在轻工业方面,新疆将成为祖国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前面说到,到1967年,新疆将年产皮棉16亿斤,大约可供五百多万纱锭之用。按照新疆的具体条件,不可能设置五百多万纱锭。在12年内可能设置大约二百几十万个纱锭,可以消费本地所产棉花的半数,其余半数供应内地。按照现在国家的要求,一个纺织厂最适宜是设置9万个纱锭,每六个纺织厂为一组,再加上一个印染厂、一个热电厂、一个化工厂,构成为一个联合企业。到1967年,新疆将建成四个组,其中一个组设在石河子,两个组设在库尔勒,一个组设在阿克苏。石河子的纺织厂1958年就要开工。库尔勒的在1960年开工。

除了上述四大工业以外,新疆当然还将有很多其他较大的工业。农业生产既然在一个巨大的规模上发展,必然随之要建立一些农业机械厂和拖拉机修配厂。在伊犁,将建立玻璃制造厂。在乌鲁木齐,除了现有的水泥厂以外,将再建立一个规模较大的水泥厂。为了配合南疆的发展,南疆也将建立水泥厂。在和阗、莎车、阿克苏,将分别增建缫丝厂。此外新疆还要修建毛纺织厂、麻袋厂、榨油厂和制糖厂等等。

将来我们从东往西看,在新疆的中路,哈密、乌鲁木齐、石河子、乌苏、尼勒克、伊宁都将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哈密地势开阔,位居新疆东口,在内地对新疆进行物资供应的交通线上占有有利条件,将来这儿会出现若干大的工厂。石河子将成为北疆的一个以纺织工业为重点的新的轻工业城市。除了纺织工业以外,由于它有着整个玛纳斯河流域垦区作为它的原料基地,因之它还可能有的制糖工业、榨油工业和食品加工工业。独山子、克拉玛依和乌苏可以联成一个单位,这一带将成为石油工业及其附属工业的一个工业地带。在新疆的南路,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和阗将成为一条未来的工业城市线。库尔勒也是以

纺织工业为中心,铁门关的水力发电对于那儿的工业建设是一个有利条件。将来莎车的发展前途也很大,因为它的燃料和水力的条件都比喀什好。在新疆的北部,富蕴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城市。

配合这样规模的工业建设,就应该有相应的电力工业。伊犁河、开都河、玛纳斯河、阿克苏河、渭干河等河,都可以水力发电。再加上火力发电,新疆将来的电力是十分充足的。

新疆地方辽阔,交通问题是自有历史以来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不要说从前骑马或步行的时代,就是有了汽车以后,在新疆旅行,也还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现在坐运输公司的汽车,从乌鲁木齐到伊宁要走四天,从乌鲁木齐到喀什要走七天。过去从兰州到乌鲁木齐要走十二三天。可是这个历史上一直未能解决的交通问题,在12年以内大都可以得到解决。目前兰新铁路日益西进,预计1958年可以铺到乌鲁木齐。1959年可以和苏联通车。这一条铁路基本上解决了从内地到新疆的交通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将从吐鲁番延伸一条铁路,经库尔勒、库车、阿克苏而达喀什。这条铁路预期于1967年以前通达喀什。这条铁路通车以后,加上早已通车了的兰新铁路,基本上解决了新疆自治区内部的主要交通问题。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内,还要从喀什向东修一条铁路,经过莎车、和阗、且末、婣羌通到新疆和青海交界的金鸿山口。由此再分两路,一路东向经茫崖和柴达木盆地的铁路衔接,另一路向东北经敦煌和甘肃安西衔接。另外,再从库尔勒修一条铁路经铁干里到达婣羌,这样,南疆的交通问题就全部解决,而且环成一圈,声气呵通。至于北疆,将从乌苏修一条铁路翻过天山通达伊宁。另外要修一条铁路到阿勒泰。由于最近克拉玛依油区的发现,通达阿勒泰的一线将由独山子附近延伸出去,通过克拉玛依油区而达阿勒泰。

这条路线并将提前修筑。这样,北疆的交通问题大体上也算得到了解决。

目前新疆的航空交通已经相当普遍。从乌鲁木齐到兰州每星期有五次飞机;通过兰州可以和国内其他大城市通航。在自治区内部,乌鲁木齐到伊宁,到库车、阿克苏和喀什,每星期都有两次飞机。最近南疆的航线又扩展到了和阗,使从和阗到乌鲁木齐公路长达二千四百多公里的路程,乘飞机一天即可到达。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的航线最近也已开航,这样,新疆各主要城市就都能在一天的时间内到达乌鲁木齐。

在旧时代,由于政治腐朽、生产停滞、文化闭塞、交通阻隔,新疆和内地在经济、文化和行旅的交往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就内地来说,大多数人对于新疆的情况不了解,对于新疆真正巨大的价值不认识,并由此在感情上对新疆不关切,不向往。旧时代偶尔从新疆回返内地的人们,常常片面地夸大新疆落后的一面,以致长时期来,人们受着那些片面的不真实的传说的影响,一提到新疆,便以为那儿除了寒冷、荒凉、贫穷、落后以外,一无可取。其实,在新疆,在冬天,天山以北虽然较冷,天山以南却很和暖。像喀什、和阗一带,过冬可以不穿皮衣,不穿棉鞋,比北京的冬天还和暖。就新疆的面积来说,北疆只占 1/3,南疆占到 2/3,也就是说,新疆的冬天,冷的地方少,和暖的地方多,可是从来只听到人说新疆冷,很少听到人说新疆暖;即此一端,可见过去对新疆的谈论,偏而不全。又如很多人以为新疆有大戈壁、大沙漠,既然戈壁沙漠都是不毛之地,便以为那儿出产很少,地方很穷,生活很苦。实际上,新疆地利之肥,矿产之富,土地之广,前途之大有可为,都是极其吸引人心的。虽然改造沙漠戈壁要花很大的力量,但目前新疆除了真正的沙漠戈壁地带以外,等待着人们去开发的处女地还很多,除了 2 亿亩可供农业耕种之外,还有 4 亿亩可供发展牧

业之用。新疆的工业资源,不仅储量大,而且品种多。这些都说明新疆有着巨大的综合开发价值。兰新铁路通车以后,全国对新疆的人力、物力、技术的支援就可以在较大的规模下源源西移。这几年来党在新疆的努力,等于为开发新疆写下了一页序言。一个巨大的、崭新的、划时代的建设局面接着就要广泛展开。在新疆,要走几十、几百里才能遇到一个村子的那种荒凉的景象将逐步成为过去,而物质和文化繁荣富庶的程度则将与日俱增。各兄弟民族在党的领导和汉族的帮助下,将更大地发挥他们在建设祖国边疆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力量,用自己光荣的劳动来创造富裕幸福的生活。而数以千万计的毛泽东时代的优秀的爱国男女,在党的爱国主义号召下和民族政策教育下,也都庆幸自己能够获得光荣的机会在那广阔无边的大地上纵横驰骋,为祖国的边疆建设贡献自己的才能智慧。这个各民族结成的铁的巨人正在豪迈地奔向一个一个的新的胜利!

1956年7月 北京

天山上的红领巾

当我访问石河子新城的时候,我抽出一天去游了天山。先在紫泥泉子和石场两地参观了生产部队的种羊场和休养所以后,便一弯接着一弯地徐徐上盘,要翻过达子庙高峰。当车子越上越高的时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境界也就越开阔浩壮。纵目北望,看到那铺展在我们脚下的、直到解放以后才创造成为祖国的一个杰出的大棉区的玛纳斯河流域大平原,这时已是莽莽苍

苍,成为一片烟雾了。我们祖国的大地是无极无终,我们祖国的富藏是无竭无穷。然而那样美好可爱的土地,过去竟然荒芜连年。现在历史改变了,在这片广阔肥沃的大平原上,拖拉机在安静的旷野上开始发着粗犷的声响,泥土在河水的滋润下不断吐出芬芳的气息。粮田和棉田的面积,一年比一年扩大。不要很久的时间,铁路就要在这大地上通过。铁路将像一支输血的针管,当它一扎进了这枯竭多年的土地,就将使这片大地更加跃动起来。

当我们终于到达达子庙高峰峰顶的时候,另一幅震人心弦的巨大的图景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啊,这就是天山!当我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我就听到“天山”;中国有多少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中国有一个“天山”啊!而现在,我终于第一次站在它的面前。虽然从达子庙峰顶到对面的山岭,中间依然隔着好几公里的浅谷浅坡,然而那开阔的浅谷不仅没有冲淡对面山岭矗立的深度,而且仿佛格外衬托出它的豪迈浑厚。山上长着满山的云杉,姿色挺秀,色调森严,而在那长满着云杉的山岭后面,是层层雪峰,上接云天。浅谷中随处扎着一些蒙古包,使这深邃幽致的山林里更增加了边疆的民族情操。在这旷大的山凹里,一个蒙古包远看起来只剩下白白的一点,而这白白的一点又反过来衬托出山林的深大旷静。

我们越过峰顶,不久就到了林场。天山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地带。最上一部分称为雪线,中间一部分称为林带。从奇台西迤伊犁,绵延千里,都长着这种绰约多姿、既高又直的云杉。天山的树木,只长山阴,不长山阳;不长山顶,不长山麓,只长山腰。这一带的林木,最高的达到四十公尺以上,一般也都在三十公尺上下。直径最粗的有七八十公分,平均直径约在二十公分左右。林区最稠密的地方,一平方公里中有一千六百多株。这绵延千

里的丰富的木材,成为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巨大的富源。

正当我和林场的工作同志谈话时,蓦地听到背后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伯伯您好!”

这一句问候使我在刹那间完全忘了我是在石河子、在天山。我以为我是在北京的街道上遇见了什么亲眷。然而当我接着听到那像倾盆大雨跌落而来的你一句“伯伯您好”、他一句“伯伯您路上辛苦了”的时候,我的神志立刻回复过来,原来我被几十个少先队员包围了起来。他们的骤然的“袭击”竟然解除了我的思想准备,使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他们每个人都争着和我握手,前面的孩子不肯让,后面的孩子又争着挤过来。

我那时完全沉浸在热情的海洋里。孩子们是那样天真热情地欢迎着一个生客,因为这个生客是从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来的,是从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来的。

他们集中了所有热情问候毛主席。他们的脸涨得红红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是那样自发地而又一致地问候毛主席好。实际上,他们不仅关怀毛主席的健康,他们还关怀着毛主席的一切。他们是多么想更多地知道毛主席一点事情。你听他们问:“毛主席每天吃些什么?”“毛主席睡不睡午觉?”“毛主席不看电影?”他们是多么天真,又多么真挚,当我告诉他们毛主席的个儿比我还高还魁梧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兴奋地鼓着他们的小手掌,嘻嘻哈哈直乐!他们是太清楚他们自己和毛主席的关系了。他们今天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幸福,都是同毛主席的名字分不开的!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在他们的一生里,他们将永远地跟着这个伟大的领袖走,遵循着伟大领袖所指示的道路,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自己的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孩子们蹦蹦跳跳,要我讲北京的故事。可是北京的故事该从哪儿讲起呢?幸而一个女孩子给我解了围,她要我讲讲北海。于是大家就安静地在水面上坐下来,我给他们讲北海:讲琼岛白塔、讲九龙壁、讲五龙亭,说五龙亭后面有一个“少年之家”,说北京的少先队队员经常在星期日去北海过队日,有的还划着小船和海军联欢。我又说北海的南面有个中南海,中南海里长着密密的树林。在夜晚,你从那用汉白玉砌成的、有着五个桥洞的、像一条玉带似的横跨在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金鳌玉螭桥经过,看到南面那远远的倒映在海里的堤岸灯影,美得真像一个神话似的境界一样。我们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那儿辛勤地劳动着。毛主席从来就关心我们的下一代,嘱咐你们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他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将来争取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模范旗手!我问:“你们的身体好不好?”“好!”“学习好不好?”“好!”“生活过得好不好?”“好!”“谁给你们带来了幸福?”“共产党、毛主席!”“你们大了能不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一定能!”

我们这样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说说笑笑,就像一盆水在地面上泼开了似的,孩子们都乐开了。

这些孩子就是我前一天在石河子新城参观的第一子弟小学的学生。他们是由几个老师率领,自己带了米、菜、衣、被,翻山越岭,到这林场来度夏令营生活的。这地方一面是葱郁的森林,一面是绿油油的草坡,孩子们在这儿爬爬山、讲讲故事,生活得多么轻松愉快!孩子们上天山过夏令营!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这就是新中国的生活,这就是新中国的气派!当我要回石河子的时候,孩子们又涌了上来。车轮在人海中一寸一寸地移动,每个人都在扬着手,扬着手帕,扬着红领巾,每个人都热情地、一再叮咛地托我回北京时问候毛主席好。

我们循着原路下山,出山口的時候已快8点。那时候,西方虽然还泛着鲜红的晚霞,而薄薄的暮色却已掩近大地。远边的原野就像一个蓝色的海洋,那无边的海洋和无数的红领巾,将永远是我们国家的不朽的财富。

1955年1月 乌鲁木齐

从内地到新疆来的年轻人

这一年多我在新疆旅行,无论在矿山、工厂、部队、农村或者城市机关,都接触到很多来自祖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在党的爱国主义教育下,他们都具有不辞艰苦的勇敢精神。虽然各人的工作不同、所在的地区不同、担负的责任不同,但他们都热爱新疆,热爱新疆的兄弟民族,忠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兢兢业业地献身于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在独山子油矿会见了在苏联专家培养下第一个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钻井技师王炳诚(我在下面一篇文章里还要专门介绍他,现在先简单地谈一谈)。1951年王炳诚在北洋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独山子工作;和他一起到独山子的还有其他一些大学毕业生。他们到独山子后,苏联专家一开头就要求他们从工人做起。这对于当时怀有许多不同想法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王炳诚遵循了苏联专家的指示,每天在井架上扫地板、搬东西、擦机器、洗泥浆槽子、给机器上油。有时还要到井架下面去洗井口,或者爬到那四十多公尺高的井架上去清洗冰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一直做着这样简单

的体力劳动,没有接触到技术。王炳诚说:“苏联专家指示的道路是对的,党要求我坚持下去是正确的。”由于从一个普通工人做起,这就使王炳诚在实际的工作中熟悉了钻井技术每一个大小粗细的操作过程。王炳诚也搭过井架,安装过机器。他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学,使他后来在升任为钻井技师、去年又升任为独山子油矿的代理总工程师、担任了钻井工程的领导工作以后,体会到许多深刻的益处和意义。不仅在技术上,王炳诚因此掌握了钻井工程的全部环节,而且,由于他和工人在一起劳动、一起开会、一起生活,穿一样的衣服,讲一样的语言,怀着同样的感情,因而缩小了他和工人之间的距离,工人把他看成了自己的一个伙伴。王炳诚这种从根本做起的踏实作风,推动了矿上其他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使大家后来也都走了同样的道路;在王炳诚以后,又有更多的中国青年钻井技师在苏联专家的培养下成长了起来。

在新疆金属公司的富蕴矿、阿勒泰矿和康苏矿上,我都遇见很多从内地来的青年学生。在富蕴矿时,我遇见了清华和北大毕业的张稼栋和刘履中。他们都是学电机的,最初都被分配在水电站工作。富蕴冬季比较冷,从10月开始,水上就有浮冰。为了不让滤水纱被冻住,要经常用棍子扒冰、打冰。张稼栋说,那时他们人少,每人每天都要工作12小时,也就是要打12小时的冰。打冰时,水沾在衣裤上,衣裤就结成冰;水沾在铁棍上,手也会冻在铁棍上。有时涡轮叶被冻住了,还要进入水深及膝的安装水轮机的竖坑里去工作。张稼栋经常要带头下水,推动大家。刘履中刚到富蕴时,做的也大都是一些体力劳动。他第一次拉大锯时,不是拉不动,就是锯歪了,搞得满身大汗。为了不使新铺的洋灰地面冻裂,发动大家抬木屑去保护地面,他抬不多久,就腰酸气喘。可是尽管筋疲力尽,他还得咬紧牙关干下去;

即使已经下了班,但别人不走,他也不好意思走开。这些都是他俩在 1951、1952 年年初到富蕴时所受的考验。凡是劳动好的人,他总会得到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多地为祖国服务的。当我访问富蕴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已经担任了矿上一部分的领导工作。

解放以前,新疆没有现代工业。解放后这几年,乌鲁木齐陆续建立了钢铁、电力、纺织、农具制造、汽车修配以及面粉、水泥等工业。很多青年工人从内地前来支援新疆的工业建设。像我访问过的八一钢铁厂、七一纺织厂和乌鲁木齐农业机械厂,大部分的工人都是从内地来的。八一钢铁厂建立以后,它基本上供应了这几年新疆在基本建设、水利工程、农具制造以及民用方面的钢铁需要。乌鲁木齐农业机械厂从 1952 年到 1955 年一共制造了大小农具 14 万件,对于这几年新疆农业的增产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而那 14 万件农具 70% 的原料,也就是八一钢铁厂供给的。七一纺织厂建立以后,使兄弟民族能够买到更多更便宜的布匹。内地工人到新疆来不仅支援了兄弟民族的经济建设,而且还帮助了兄弟民族学会生产技术。在许多工厂里,很多兄弟民族工人在汉族工人的帮助下成长了起来。民族工人大都来自农村,过去没有见过机器,没有在工厂里生活过,没有集体劳动的习惯。他们初到工厂时,不仅在技术上,就是在生活上,也需要汉族工人随时随地关照他们。我在七一纺织厂访问时,一个织布车间的维族女工库里娜说,她的老师赵富华(汉族女工)不仅在车间教她,下工后还到宿舍里去教她,有时教到很晚很晚。库里娜学了三个月就能独立工作,她现在已经能管 24 台织布机。库里娜当学时,津贴较少,有一次她把钱花光了,没有饭票,只好不去吃饭。赵富华知道了,就去买了几块钱饭票送给库里娜,叫她去吃饭。另一个精纺车间的维族女工布沙衣说,她

的老师姜保兰耐心地教她各种操作方法，教她怎样才能少出废花，怎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姜保兰不仅教她技术，还在政治上帮助她，鼓励她立功，鼓励她入团。现在布沙衣可以一个人管600个纱锭。她参加了工会，参加过乌鲁木齐的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且加入了青年团。另外一个汉族女工王淑英，她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人带了五个徒弟，其中有三个是民族女工。有一个叫艾孜追的维族女工，恳切地要求拜王淑英做老师。后来艾孜追每次领了工资，都交给王淑英，由王淑英帮助她先买足了饭票，再买手巾、肥皂、牙膏这些日常用品，有余钱，再帮她买鞋子、做衣服。艾孜追对人说：“我的老师比我妈待我还好。”王淑英最初怕影响自己的产量质量，教了一个不想再教第二个，教了第二个不想再教第三个。但是党对她说：“为了满足新疆各族人民的需要，我们厂里就要增加机器。假如我们不能耐心培养更多的民族女工，我们就不能给全疆人民供应足够的布匹。”在党的教导下，王淑英不仅一连带了五个徒弟，而且由于她和她所教的民族女工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她说：“我现在愿意再多带几个民族姊妹。”

在新疆军区农业生产部队里，也有很多从内地来的青年参加着各项生产建设。当我在玛纳斯河流域大泉沟水库工地参观的时候，会见了好几个在1952年响应政府号召到新疆来工作的山东姑娘。她们本来没有什么文化，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机器，可是现在她们都成了很好的拖拉机手。有一个叫周长兰的，她在学习驾驶拖拉机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什么前轮叫“引导轮”、后轮叫“主动轮”，又是什么“前后横轴”、“中横轴”，单单这些名字就把她搞得头昏脑胀。但是困难虽多，她终于还是学成功了。另外一个女拖拉机组长李庆云，不仅学会了驾驶拖拉机，还学过驾驶挖土机。她所领导的一个组在当时的大泉沟水库工

地上是有名的：团结好，分工好，工作质量好，机器保养好，而且事故少。李庆云说：“回想我在山东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普通妇女。到了新疆以后，在党的教育下，我也能够驾驶着现代化的农业机器来参加国家的建设了。这将永远使我感到安慰和自豪！”在生产部队农场里，经常有八一农学院的学生在那儿实习。这种生产实习，既可以使这些学生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同时对于部队农场来说，也是一种技术上的帮助。这些八一农学院的学生将是新疆发展农业生产中未来的技术骨干力量之一，而这些学生大都是解放以后从各地参军后而被分配到新疆来的一些青年。

在阿勒泰、塔城、伊犁、乌鲁木齐、吐鲁番以及南疆各地，都有从内地来的青年农技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当地农民改进各项农业技术。仅在南疆的喀什、叶城、和阗三个地方，我就见过浙江农学院、华中农学院、西南农学院和西北农学院四个学校的毕业生。在吐鲁番葡萄沟，我曾经遇到一个园艺干部，他一个人负责整个葡萄沟的技术指导，不懂话，要学话；还得自己做饭吃。在阿勒泰，我看到两个农技干部，屋子里没有一张桌子、椅子，他们要绘图或写材料，就伏在地上做。他们的艰苦的劳动，对于这几年来新疆农业生产的提高是有贡献的。在和阗地区，还有一批从江南来的蚕桑干部，其中一部分是苏州浒墅关蚕桑学校毕业的。她们有的在和阗缫丝厂工作，有的在和阗蚕桑试验站工作，有的就直接深入乡间帮助农民育蚕。1955年和阗县一般农民平均每盒蚕种（18公分装）产茧31市斤，但是有蚕桑干部指导的重点社，平均每盒产茧50市斤，其中最高的达到75市斤。这说明她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上海的女孩子，特别在最近一两年来新疆的很多。她们有一部分分配在医药卫生工作岗位上。我曾在乌鲁木齐的军区医

院住过一个时候,那儿的护士绝大部分都是从上海来的。上海女孩子更大部分是在财经贸易系统工作。在新疆,无论到什么地方,在贸易公司、百货公司这些单位里,你都会遇见这些活泼美丽的上海姑娘。她们的长处是机灵细心,很适合于做售货以及会计、统计等工作。这一批十七八岁的江南姑娘成了目前新疆商业系统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此外,这些女孩子还活跃了当地的一部分社会生活。举行舞会要是有了这一批“生力军”参加,会场就更显得欢腾活跃。

当然,还有很多从内地来的青年在新疆担任了机关行政工作和党的工作。其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许多区委书记同志。新疆地方辽阔,常常一个县比内地的一个专区还大,一个区比内地的一个县还大。从一个区的这头到那头,常常要骑马走上两三天。就在这样一大片地面上,所有关于党的政策方针的宣传、传达,以及上级规定的任务的布置、推动和检查,都要通过并依靠这一个区委书记。区的编制中没有翻译,区委书记不懂维文也得硬逼着学,否则就无法工作。区委书记不是在农村,就是在牧区,生活作风更得民族化。这些区委书记,忠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地为边疆建设服务,为兄弟民族服务,数年如一日。知道他们的人不多,但他们做的工作却不少。

这些从祖国各地到新疆来建设边疆的青年男女,大都赞美、满意新疆的风光、生活。他们都安心在新疆长期工作下去。在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教育下,他们都能够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和兄弟民族团结得很好。靠了他们和全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这几年新疆在各方面的建设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整个新疆的面貌已是焕然一新。同时,这些勇敢有为的爱国青年,他们自己在实际的锻炼中也茁壮地成长了起来。

1956年5月 乌鲁木齐

从工人做起

——记独山子油矿青年钻井技师王炳诚的成长

一

我到独山子的第二天，就在 130 号井上会见了独山子油矿在苏联专家培养下成长的第一个中国钻井技师王炳诚。

我是在夜晚到达独山子的。1954 年 11 月 4 日下午 4 点，我从石河子新城出发，过安集海大桥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不久就看到远处摇曳着一丛灯火。驾驶员指着那灯火处说：“那就是独山子。别看前面就是灯火，走走还得一小时哩。”我们真的又在公路上疾驰了一小时，才离开乌伊公路向南折入去独山子矿区的支路。

进矿区时，哨兵向我们盘问了一下，并给我们指点去矿务局办公大楼的方向。我们看到很多一排排或一幢幢新盖的漂亮的宿舍和办公大楼。明亮的灯光透过各种花色的窗布投射到马路上，给我们外来的旅客挑引起不少美丽的感情。虽然是夜晚，但是载重汽车和拖拉机，仍在马路上来来往往，紧张地输送着各处井上所需要的器材。广播器柔和地播送着音乐。这一切使我的思想都集中在这样一个感觉上：这毕竟是一个工业城市！

第二天上午，我们便到矿上去周游各井。矿山在矿区的南部。从宿舍区或行政区向南看去，就像一条山岗一样。但当我们奔上这条山岗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片开阔平坦的

场地。从东向西，疏疏密密，到处是高耸的井架。井架构成了矿区的主要景色。

当我们的车子经过井段段长的办公室时，引导我参观的那位同志招呼驾驶员把车子停了下来。“王炳诚的马在这里，我下去看看他在不在。”没隔上几分钟后，他真的带着一个人出来了。是一个小个儿，脚上套着一双长统胶靴，穿着一身泥渍的青色棉制服。那位引导同志开了车门，说：“这就是王炳诚。”

我们在老远就能判别哪一口井是 130 号井。因为在所有的井架上，只有 130 号井架顶上飘着一面红旗。我们很快就到了 130 号井。在井架北头四五十公尺地方，有着一间小木屋。这是王炳诚的工作室。他请我到那间小房子里先坐一下。

那时，井段段长苏联专家库拉科夫同志也来了。他是来收井架上的工作自动记录表的。他每天上午都要亲自到一个一个井上去收集这种自动记录表，通过这种自动记录，了解各井每天的工作进度以及在工作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库拉科夫同志中等身材，瘦瘦的，但是脸色红润，显得和蔼诚恳。在谈话中他特别向我介绍了王炳诚。当他提到王炳诚和沙布林诺夫挑战的一段，他得意地说：“沙布林诺夫是王炳诚的老师，可是王炳诚却向他挑战。结果王炳诚打破了沙布林诺夫所保持的一昼夜（24 小时）钻 204 公尺的全国最高纪录，创造了一昼夜钻 231 公尺的全国新纪录！”

二

七年以前，王炳诚中学毕业。他是天津人，他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学的采矿系采煤组。1949 年全国解放。党看到石油工业干部的缺乏，在 1950 年，北洋大学的党就号召一部分同学转学

石油系。要王炳诚从采矿系转入石油系，他在感情上是有些摆不开的，因为他在采矿系已读了三年，多少学到了一些底子，现在转学石油系，等于要从头学起。但当时王炳诚的班里，只有他一个人是党员。他终于响应党的号召，带动了其他几个同学一起转入了石油系。

1951年王炳诚在北洋大学毕业，组织上分配他到独山子油矿工作。那次，北京、天津被分配去新疆工作的学生有好几十个。到了西安，又会合了从中南和西南来的一批。他们虽然都被分配到新疆去工作，然而各人脑子里却有着各种不同的想法。

那时的独山子相当荒凉，一共才有10座砖盖的宿舍。大部分人都住在地窝子里面。他们第二天到井上去参观，走了半天才看到一口井，又走了很久才看到第二口井。事实上，那时独山子油矿也就只有两口井。

就在同一天，公司领导上约他们谈了一次话。那一次的谈话对于那一次到达独山子矿区工作的那批青年学生在日后的学习和工作上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王炳诚。首先是中苏石油公司苏籍总经理德·聂列金讲话。聂列金一开头就宣布了一个明确的思想：这次中方来的同志都应该被培养成为将来的中方的专家。帮助中国培养技术干部是苏联的党和政府给来中国的苏联专家的主要任务之一。聂列金询问这些青年学生已经学了些什么，他们把他们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告诉了他。聂列金说：“你们学的东西太多了。”有些学生听到聂列金这样说，很高兴。但在王炳诚看来，聂列金显然是说他们学得不专门。聂列金又征求他们的意见，到独山子以后希望怎样学习？这些青年学生就说，第一希望学什么，第二希望学什么，第三……他们充满着热情，希望一下子就能学到很多东西。关于学习的方式，他们希望苏联专家给他们讲课，这些年轻的刚出学校大门的

学生，依然习惯于学校里那种学习的方式——听课的方式。

在这个问题上，聂列金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忠实的批判。他说每个人应该在一门具体的工作中从头学起。要钻下去，要学得透，将来在工作中要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并使工作达到百分之百的正确。他严肃地要求大家采取苏联的学习方法，而不是那些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学习方法。苏联的学习方法的主要精神就是亲自动手，从头做起。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专家”，不仅仅能嘴里说，指挥人，而且还要能自己动手做。理论必须和实际结合。所有的苏联专家都是在这样一种方法下训练出来的，在这样一种方法下训练出来的人，才能实事求是，结实顶用。

什么叫“从头做起”？“从头做起”就是从普通工人做起。先当普通工人，做一个普通工人所应该做的一切工作。这样做法对于那些刚从学校里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聂列金讲话以后讲话的是中苏石油公司党委书记钱萍，他号召大家在思想上行动上放下包袱，积极地按照聂列金同志指示的去做，亲自动手，从工人做起，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够成为真正的工人。这个号召引起了一系列的尖锐的思想斗争。有些人对于今天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做的永远是一些体力劳动工作，感到非常单调。“这些工作又何必需要我们来做呢？”这就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最典型的想法。有的人认为这样学下去，恐怕要学20年才能成为一个工程师。有的人要求可否改为实习半天，理论半天。对于王炳诚，当他听了聂列金和钱萍的讲话后，他是很激动的。他检查了自己，他发觉他自己过去只是在理论上认识了共产党，而在感情上，还没有能够真正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决心响应党的号召，按照聂列金指示的，钻下去，从工人做起，并带动大家。

钻井工程本身就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一个井开钻了以

后,就需整日整夜钻旋不停。别的工作有星期日、有节日,但钻井工作是没有休息日的,过年也好,过节也好,都须按时上班。在夏天,为沙漠地带所特有的那股蒸人的热劲袭击着他们,使他们多么容易感到疲乏和烦躁。冬天更坏。经常是零下二三十度,有时没日没夜地飞着密密的雪花,他们没盖没遮地在井上工作,连续八小时不进任何食物,脚上穿着毡袜,毡袜外面再套上毡筒,身上在小皮大衣外再加上一件大皮大衣,戴上皮帽皮手套,整个人就弄得像一个圆圆的大冬瓜似的。即使这样,还是寒冷彻骨。尤其夜里,要是站久了,鞋子就会在地上冻住,要是坐久了,就会站不起来,胡子眉毛都会变得白白的,就像在黑刷子上粘着一些白糖一样。有时要是身子长久不动,一动时,就会把冻得硬硬的衣服都折裂了。……

对于一个没有一定的锻炼的人,一下子把他投入整整八小时的不停止的体力劳动工作,也委实是够乏死人的。王炳诚初上井时,他每天做的工作就是扫扫地板、搬搬东西、洗洗泥浆槽子、擦擦机器、给机器上上油。他每次到下班时,都已累得要命。他一面坚决地遵守领导上的指示,从普通工人做起,然而一面在思想上又有着一些矛盾:为什么一定非做这些不可?一天一天尽是扫地、擦油?

尤其是上井架,那委实是各项考验中的最尖锐的考验。这样一个仰头望去就像触着了云天的四十多公尺高的井架,仅仅是由一些稀疏的钢条架起来的,使人一看就已经有些胆寒了,而还要沿着在这样空疏的钢架外面所附设的单薄的铁梯爬上去,那简直是令人心悸胆裂的事情。当王炳诚第一次往梯子上爬时,他的心不能控制地卜卜地跳动着。他的两条腿自发地软了下来,就像两条泄了气的车胎再没有气力前进一样。他皮孔里冒出了一粒粒的冷汗。他全身紧张,甚至有些发晕。他那时心

里尽管明白：这有什么可怕的呢！然而却有一种不是用理性可以解释的畏惧的气氛包围着他，仿佛他那时整个的身子临空地悬挂在生死莫测的深渊里。

有一天夜晚，井里喷出瓦斯，水和泥浆都喷得很高，井架上很多地方都结成了冰块。假如不把那些冰块清除，机器一旦开动，井架上的冰块掉落下来，就容易把人砸伤。钻井技师叫王炳诚上去把井架上那些冰块清除掉。那时正是深夜两三点钟，黑呼呼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一级一级的扶梯只装到24公尺的地方，再上去就不是梯子而只是一格一格钉在井架上的一些扶手了。王炳诚就一格一格地在这些扶手上爬上去。那时有一条冰块，王炳诚看来好像是一个扶手，可是一把抓住时，冰一碎，扑了一个空。幸好他另外一只手还没有放开，他的身子在空中剧烈地颠荡了一下，总算没有摔下来。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以后连着好几天，连梯子都不敢看一眼。

在冬天时，经常要到井架底层去清洗井口的泥土。井架底层四周没有一点遮蔽，又没有太阳，风特别大，特别寒冷。但当领班通知大家下去洗井口时，别的工人说下就下，王炳诚总不免迟疑了一阵。有一次，他刚穿上一件公司才发的新的工作服，就要下井洗泥，他觉得穿着这样新的衣服去洗泥，委实有些可惜。晚上他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时，他就感到：“啊，我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我和真正的工人之间还有多大一段距离啊！”

王炳诚决心要按照党和苏联专家指示的道路，从普通工人做起，然而他有时又感到一些空虚软弱。天天是扫地板、擦机器、洗泥槽，而且言语不通，学到的东西多么少啊！工作忙的时候还好，一下班，就困在黑夜和风的世界里，又是多么寂寞啊！……然而每当王炳诚感到烦恼、徬徨的时候，党总是安慰他、鼓励他、坚强他的信心。党说：“当前的环境对于你来说，确

是一个陌生的、困难的环境：工作是生疏的，地方是生疏的，天气确是冷，……然而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党的任务是要改变自然的面貌，改变历史，把地下的财富搬到地面上来，把荒凉的地方变成繁荣的地方。党的政策，党的理想，就要通过每个党员来实现。特别是在独山子矿区，从部队转业来的战士比较多，从学校里来的学生比较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你，就更需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起带头作用。我们必须扭转过去知识分子习惯于坐在屋子里做一些上层工作的那一套旧的做法。那套旧的做法已经和旧的时代一样，永远是过去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然后再从群众中出来。这不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是牵涉到很多知识分子的问题。在独山子，你如坚持下去，坚决地走工人的路，别的知识分子就会跟着你走，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变为真正的工人。”党要求他更坚强地坚持下去，把自己的工作和去朝鲜的战士的艰苦战斗联系起来：那儿流的是血，这儿流的是汗！

党的指示是简单的，然而是有力的。每次王炳诚听了党的谈话回来，在内心里都生长起一种巨大的力量，感到有一股热劲像电流似的通过全身。“为什么我和工人之间总有着一些什么不同？我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为什么苏联专家就和工人一样在水里泥里干活？……”王炳诚这样质问着自己，又这样提醒着自己：“我不要忘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当一个人变得坚强起来的时候，本来感到的一些困难都会悄悄地溜走，正如太阳上升了，黑夜就自然地消失了一样。有一天，王炳诚去接班，还没有走近井架，就看到井上又发生了事故。所有在井上工作的人都被喷得一身是泥。苏联专家也是一样，在那儿紧张地忙碌地工作着。王炳诚那天正巧刚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脚上穿的又是一双新棉鞋，然而当他一想到自己是个共产

党员，他就立刻走上井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整个的身心都投进那水和泥的世界里去了。

在党的教育下，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王炳诚勇敢地面对着摆在他面前的严峻的考验一步一步走过去。那时王炳诚做的始终只是一些体力工作，他还没有接触到技术性工作，然而，在那冰天雪地之中，他终于能和其他工人一样做了一些事情，在那巨大的工程中，也有着微小的一份，他对此开始感到一种愉快。他觉得他和工人之间的距离一点一点缩小了起来。当他和工人在一起做着一些普通工作的时候，他不仅不再感到委屈、感到没有意思，而且，他开始感到这是一种光荣。这完全是一种新的感情，这是他过去没有体会过的感情！当他满意于自己的工作，当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一种愉快的时候，他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单调和疲乏了，甚至忘掉了疲乏。

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在来以前无法预料、来了以后又无法控制的变化。就说泥浆吧，王炳诚初上井时，看到在自己的工作中既离不开黑黝黝的机油，又离不开黄糙糙的泥浆，“为什么非有泥浆不可？”有一天他对自己简直问起这样可笑的话来。泥浆确是讨厌，搞得一年到头井架上都是水、都是泥。然而现在，泥浆已经成为王炳诚生活里的一部分，而且将和他的生命同时活动下去。当他用手撩着在泥浆槽里流着的泥浆时，就像缝衣工人扬着布料、印刷工人掀着纸张、油漆工人搅着油漆一样的自然，不再有什么生硬的感觉。他并且可以从井口里出来的泥浆的颜色和质量，判断井里的现象是不是正常。当井里的现象是正常的，他便会说：“你瞧，那泥浆多漂亮，亮光光的。”但是井里要出了些毛病，泥浆里掺进了一些油或瓦斯时，王炳诚便会说，“像坏了的豆腐一样，多难看！”

由于从头做起，从一个普通工人做起，就使王炳诚在实际的

锻炼中熟悉了钻井工程里每一个大小粗细的操作过程。他自己搭过井架,安装过机器,甚至还搭过那种小木房子。他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学,使他后来在升任为钻井技师、担任了钻井工程的领导工作以后,体会到很多想象不到的益处。

王炳诚不仅在技术上能掌握了钻井工程里每一个具体工作,更重要的是,工人都把他看成为自己的伙伴。王炳诚和工人们在一起劳动、一起开会、一起生活,穿一样的衣服,讲一样的语言,怀着同样的感情,向着同样的目标努力。王炳诚秘密地发现,每一个工人在业务上几乎都有各人独特的一套。于是他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了很多东西,学习到很多窍门。他既认识到他们的能力,又认识到他们的品质。工人们都知道王炳诚是一个大学生,然而他们并不以一个“大学生”看待他,他们不再把他看成是一个外人。“感谢党,”王炳诚说,“我在工人之间不再是孤零零的了!”事实上,他自己已经是工人之间的一个了。

三

王炳诚的学习是艰苦的。在王炳诚的艰苦的学习过程里,人们可以看出,苏联党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帮助是何等的真实和诚恳。

王炳诚初上井时,首先碰到的困难是语言。那时,整个的钻井处一共只有八个人能说汉语,至于王炳诚所编入的一个班,不是苏联专家,就是兄弟民族,而他们两者的语言王炳诚都一句不懂。王炳诚初上井时,受苏籍钻井员衣格利的指挥。苏联同志是最讲究工作效率的,假如衣格利单纯地为了工作效率,那末有些事情最好由他自己来做,或者叫其他一些懂俄文的兄弟民族来做,而不必一定叫王炳诚做。正因为要培养王炳诚,所以衣格

利总是热情地教王炳诚做这做那。常常是这样：衣格利要他拿锤子，而他却去拿了绳子，弄得两个人非常尴尬，旁边的人都捧腹大笑。由于言语不通，有时衣格利就硬是拉了王炳诚的手，放在什么操作把手上，扶着他的手教他，像老师扶着小学生的手握着毛笔练习写字一样，一面说一面教。就是这样，教了还是不懂。后来，王炳诚就把衣格利说的俄文，用中文注音记下来，或者叫衣格利教几个工具的俄文名字，记下来，在走路的时候，在下班的时候，总是像念着符咒似的，嘴唇嚅嚅微动，默念着这些生字。从一些简单的俄文名字记起，一直到慢慢地懂得苏联同志说话，并且自己也能勉强用不连贯的俄文答话，这样地学习下去。

第一个教王炳诚钻井的实际操作的是苏联钻井技师莫可尔前。莫可尔前不仅要教会王炳诚关于钻井的整套操作技术，而且还要训练王炳诚成为一个独立的钻井技师。因之在培养的过程中，莫可尔前就用各种在技术管理上允许的假动作来锻炼王炳诚。有时，他有意把什么东西弄坏了，要王炳诚修；有时，正在王炳诚冷不防时，他在王炳诚身旁弄出了一个巨大的震人的声音，来观测王炳诚是否能够镇静地照样工作下去；有时，他使钻井工作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迫使王炳诚运用智慧来解决这种虚构的问题。莫可尔前要训练王炳诚的是：不仅能操作，而且还要能安全操作，还要能独立解决问题。凡是在生产上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他都告诉了王炳诚。当他最初让王炳诚独立操作时，他不下班，不回去休息，他经常逗留在王炳诚的身边，观察王炳诚操作，不断地提出意见，答复疑难的问题，以提高王炳诚的技术水平。他保卫了同时又鼓励了王炳诚，使王炳诚在初次独立操作的过程中，变得勇敢、沉着，而在勇敢的学习中终于一步一步地能够自己独立站起来。

另一个苏联钻井技师沙布林诺夫也用着同样的风格来训练着王炳诚。那时王炳诚已经升为副钻井技师，他担任了沙布林诺夫的副手。沙布林诺夫在交代工作时，先把一切说清楚，要王炳诚去独立执行，然后他来检查。有时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沙布林诺夫胸有成竹，然而总要叫王炳诚先提出处理的意见。在王炳诚初次尝试独立操作时，在工作中一定是会有一些漏洞的，而沙布林诺夫就来指出这些漏洞，这样，使王炳诚获得了充分的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机会。

苏联专家在工作中所表现的高度的忘我劳动和勇敢负责的精神，使王炳诚受到深刻的教育。王炳诚在过去从来没有听说一个人可以连续工作 24 小时、48 小时、72 小时，甚至 96 小时，然而他终于在独山子矿区亲眼看到了这种伟大的崇高的品质。在钻井工程中，每钻到某种深度时，就要下一次套管，以防井壁地塌倒。每次下的套管，都有几百公尺长，一个接一个地从地面上送到地层里面去，所以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王炳诚亲眼看到一些苏联钻井技师，因为下套管或其他意外事故，常常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一直留在井上，一直等到工作完成或者问题解决后才离开井回到自己的寓所去。他看到苏联钻井技师库拉克也夫和莫里阔夫等，他们都已五六十岁了，然而竟然能在井上连续工作到三天三夜，甚至四天四夜。有一次，当莫里阔夫做完了他的工作时，他已疲惫得连话都没有力气说了，然而当别人劝他先回家休息一下时，他坚决拒绝，一直要等工作搞好后，才肯休息。

每逢有些井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故时，苏联专家总是奋不顾身地参加抢救工作。有一次，68 号井的水泥还没有钻完，钻杆还没有提出，就发生了喷井事故，原油从井底喷出，无法制止，形势非常严重。钻井处的总机械师瓦亭临时亲自画了图样，并亲自到修理厂去做好了个铁套子，想把这个套子套到套管上

去,以便制止原油上喷。但是铁器碰上铁器,容易冒出火花;这样,要是遇到瓦斯,就要引起爆炸,造成很大的危险。所以套套子的工作不能随便交别人做,仍由瓦亭亲自来盖。瓦亭在抢救的工作中,不仅从头到脚溅了一身油,而且两只眼睛被油和瓦斯熏得赤红,无法张开。但是他跑到旁边的救护车那里用药水洗了洗眼睛以后,又继续到井口去安装套子。一直搞到夜晚才把喷井制住。又有一次,80号井瓦斯上喷,那时因为井上正在进行修理,所以上面挂了一盏机灯。上升的瓦斯把那盏机灯冲得东西摆动,最后把机灯的玻璃荡碎,以致引起冒火。那时井架高头还系了打泥浆用的橡皮管子,这东西是最容易引起燃烧的。井段段长米哈依洛夫和钻井技师康姆卡特依,就爬上井架去把橡皮管子拆下来。当时的形势是危险的,因为下面已经烧了起来,假如火再大一些,他们上了井架以后,就可能下不来了。然而他们两人是那样勇敢,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抢救公家的财物。这些事情,有的是王炳诚亲眼看到的,有的是听到很多同志都这样说的。苏联专家不仅在先进的科学技术上教导着王炳诚,并且也在思想品质上滋养着、熏陶着王炳诚。

四

1953年9月,矿务局领导上批准升任王炳诚当钻井技师。这是独山子油矿在苏联专家培养下成长的第一个中国青年钻井技师。王炳诚开始独立担任钻井的领导工作了。

王炳诚开始独立担任领导工作时,心中多少有些忐忑的、不踏实的感觉。他第一个领导钻的井是第25号井。他当时领导的那个队的政治情况并不怎么好,只有一两个积极分子,而且其中有些人,王炳诚当普通工人时还向他们学习过。队员对于王

炳诚也没有什么信心,有的人抱着观望态度:要是王炳诚领导得好,他们就做下去,要是不行,他们就想转到由苏联专家领导的队里去。

王炳诚接受了钻 25 号井的任务的第一个思想是必须首先和全队团结好。党多年来这样教导着他:和群众团结好,依靠他们,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但是当你想去依靠群众时,群众并不是一下子就给你依靠的。群众根据他们自身多年的经验,常常先要试试你,然后才能和你有交情。当王炳诚最初订出计划、说明理由、征求大家的意见时,大家并不表示意见,只是说,“技师”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好了。然而当群众了解了你,肯定了你的态度是真诚的时候,情况就会改变过来。王炳诚在团结全队的工作中,首先是团结好队里的几个钻井员。他们是实际掌握钻井操作的人,什么事都先和他们在一起共同研究商量,并通过他们更好地团结并推动全队,使大家的责任感逐步提高。

在钻 25 号井时,开头还比较顺利,但是后来,机器常常出毛病,发生卡钻的现象,使得王炳诚很苦恼。他的经验限制着他,看看不困难,做做真困难。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那时他还没有结婚,除了下山吃饭以外,其余的时间整天都守在井上。有时连脸也没有心思洗,只是呆呆地徘徊在井架上,苦苦地思索着怎样解决井上所发生的那些问题。他想:假如不是由他而是由别的人来领导,这个井就不会发生这些毛病,也就不会使国家财产蒙受损失。他又想到:他是独山子油矿的第一个中国钻井技师,然而连这样一个浅井所发生的困难都解决不了,这是多么可耻的事情,苏联专家一定会笑我们!有一夜,他苦恼得竟然哭了起来。责任心、能力不够、惭愧、焦急……这一切都集中地向他攻击着,他一直哭到夜晚 4 点钟,整个的脑袋好像要爆炸开来似的。他打电话给党,说明他的能力不够,要求党另外派人来领导

这个井。当党在听筒中听到他在哭泣时，就安慰他，告诉他一个人在开始工作时总会碰到很多困难的；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不是在一天一夜间生长起来的，必然要在很多困难甚至失败中逐渐磨练出来。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遇见困难时，正确的道路是努力去克服那些困难，而不是设法逃避那些困难。关于苏联专家会讥笑我们的问题，党严肃地给他指出，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党说：假如由于我们经验不够，工作中出了一些问题，因而想到苏联专家会讥笑我们，那是把苏联党和中国党、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对立起来了。苏联专家是在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之下帮助我们的，他们把我们看成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党要他冷静一点，要他再好好地想一想。

党对他的指示既温暖又冷静，既简单又明确。他放下了电话。他的脑袋本来像一个鼓鼓的皮球似的，这时却一下子平静了下来，好像一个小孩大吵大闹以后，被母亲的软软的手一抚，唱了一段歌，就一下子变得平静舒服起来一样。“该死！”他突然想道，“我怎么这样幼稚，这样冲动！这是夜晚4点钟，硬生生的把负责同志吵醒！正如党说的，假如天下的事情都那么顺利，那为什么还要有共产党员？”他又想到苏联专家会笑他的问题，这显然还是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想法！他回想起，当组织上决定叫他独立工作时，苏联专家是多么热烈地庆贺着他，同时又关心着他啊！他们常常跑到他井上来看看，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而他呢，却想到人家会不会讥笑他！他想到自己是多么狭隘啊！“党是正确的，党是正确的……”当他这样反复体会着时，他终于在长期的紧张和疲倦之后睡着了。

经过党的指示后，他变得勇敢和坚定起来。他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解决了他井上的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不久也就很顺利地完成了25号井的钻探任务。当他回想他最初这一段经历时

说：“当你下了决心的时候，好像钢铁也会对你让步似的。”

他接受的第二个任务是钻 84 号井。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1942 年，在离这 84 号井 20 公尺的地方，曾经进行钻探，发生过喷井事故。当时瓦斯已经从井内出现，井口的防喷器虽然总算被关住了，但是由于这一地带地下的瓦斯压力太大，瓦斯竟然穿过地层，在山腰里穿了一个大洞仍然喷了出来，后来用了许多水泥才把喷出的瓦斯堵住。这是 10 多年以前的事情。这个 84 号井不仅离地下的瓦斯很近，而且还有泥浆漏失现象，同时可能还会发生井塌现象。这样一个情况比较复杂的井，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钻井技师，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于王炳诚来说，可以说是一次考验。王炳诚这样想：“领导上要我领导钻 84 号井，是不是在考验我？”钻井处处长依凡金米达维基说过：假如这个并能钻好，其他的井就都能钻了。

在技术上，钻 84 号井困难的关键在泥浆的比重问题上。泥浆是由水、泥、小苏打、煤、烧碱和重晶石这些成分构成的。在一般情形下，泥浆和水的比重是 1.8 比 1。但是王炳诚为了预防井内瓦斯的上喷，必须考虑用一种比重很大的泥浆，以便这种泥浆注入井内后，能够封住井壁，从而防止可能从井壁冲出的瓦斯。王炳诚考虑要用 2.3 比重的泥浆，而这样比重的泥浆在独山子矿区还从来没有用过。但问题是：假如泥浆的比重不够，正如上面所说的，恐怕不容易防止瓦斯；但是泥浆里的重晶石成分要是太浓，则泥浆就容易沉淀，一沉淀，钻杆就可能拉不出。同时，泥浆太浓了，又要影响泥浆的正常循环。王炳诚整日整夜地思索着这个问题。后来，在他苦苦的钻研下，并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他总算避免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安全地完成了 84 号井的钻探任务。当 84 号井终于出了油时，大家都祝贺王炳诚，说他“大考及格”了。

王炳诚钻完了 84 号井后，又钻完了一个 52 号井，又开始钻 89 号井，这时王炳诚所领导的钻井队，政治质量已经提高，他自己和全队同志在技术经验上也都比从前丰富成熟一些，全队的团结也比过去更坚强了。这些使他有可能响应领导上的号召，要求大家展开社会主义的爱国运动竞赛，班与班挑战，个人与个人挑战。而作为整个一个队来说，他和他从前的老师沙布林诺夫所领导的一个队挑战，他要超过他们的成绩，并为全国创造钻井进度的新纪录。

那时沙布林诺夫领导的一个钻井队，由于采用了苏联的先进的快速钻井和用三个吊卡接单杆的方法，创造了一昼夜进钻 204 公尺的全中国高纪录。这个方法王炳诚在书本上曾经看到过，但不会运用，所以就向沙布林诺夫讨教，沙布林诺夫丝毫没有因为王炳诚是在和他挑战，因而就不愿把他所知道的一切教给王炳诚。正相反，沙布林诺夫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王炳诚，并且对他说：“你要超过我的纪录，也非采用这个先进的方法不可。”

王炳诚向沙布林诺夫学习以后，就回去把自己的钻井队组织起来一起学习。他知道，任何一个成功的工作不能单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他要把大家的力量有组织地都发挥出来。他整天整夜在井上领导着全队学习、研究。他在沙布林诺夫所传授给他的方法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提高一步，使每次接杆的时间由 15 分钟缩短为七分半钟。这七分半钟时间的节省，有着巨大的效果。所谓接杆，就是钻井的钻杆每次从地面上钻下去，快完的时候，就要接上新的钻杆，这样一根一根地接着，一直钻到地层一千几百或二千几百公尺。假如一昼夜要钻二百多公尺的深度的话，则大体上要接 20 次左右的钻杆，假如每接一次要 15 分钟的话，就要用到五小时，也就是说，一昼夜 24 小时中要

停止工作五小时,这个百分比是很高的。假如把接杆时间从15分钟缩减为七分半钟,一昼夜接杆的时间就可以从五小时减为二小时半,而这节省出来的二小时半,就可用在钻探工作上,借以增加钻探的进度。

此外,王炳诚又把井架上两部柴油机的运用组织得更为合理。在过去,每当因为接杆停止钻旋的时候,两部柴油机也同时停下来,以便加油加水。现在王炳诚设法不让两部柴油机同时停下,而是这一部停下来加油加水时,另一部仍在发动着;把这一部油水加足而发动了以后,再把另一部停下来。这就是说,在任何时候,不使井架上的动力停止。这样,当钻杆一旦接好时,就可立刻开动钻旋,不受动力停止的影响,并因动力经常在开着,所以在动力的速度上也经常保持着充分的速度,这些,都帮助增加钻旋的进度。

除了上述两点外,当我在单独访问沙布林诺夫时,他还给我补充分析了一个原因。他说,王炳诚在钻89号井时,根据“地质技术施工单”的规定,钻到某个深度时,是应该在泥浆中掺用重晶石的;但是由于王炳诚研究了具体的地质情况和地层厚度,他当时没有用重晶石,用的仍是轻泥浆,这样,一面减轻了井架设备的负担,一面也可以加速钻井的进度。沙布林诺夫说,这样大胆的试验,是王炳诚的勇敢的创造的结果。

王炳诚就是这样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他所领导的钻井队全体的团结努力下,在他自己的刻苦细心的钻研下,终于创造了一昼夜钻进231公尺的全国新纪录。

所有的苏联专家知道了王炳诚这个新纪录后,都非常高兴,他们热烈地祝贺着王炳诚。他们说,这是王炳诚的光荣,是中方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的光荣,也是他们苏联专家共同分享的光荣。

五

王炳诚认识到,像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需要培养的钻井技师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几百个、几千个。特别在新疆民族地区,更需大力培养兄弟民族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作为一个钻井技师,又是一个共产党员,王炳诚不仅在技术上业务上领导着全队,而且还须在政治上思想上领导着全队。每当他接受一个新井任务时,他首先要把全部计划向全队报告一下,使大家对于即将开始的工作有一个全局概念。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这个计划如何完成,如何钻法,泥浆的比重应该如何,钻到什么地方可能遇见什么情况,到什么时候大概要下什么套管等等。他经常在井上和大家一起开会,研究业务上的问题,启发大家热烈讨论,提出意见,使大家在思想上对于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有着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并且集合大家的智慧,来克服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困难,提高大家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创造性,使钻井任务完成得更好更快。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并团结兄弟民族,除了俄文,他又学习了维吾尔文,以减少语言上的困难,增加他和民族同志之间的团结和了解。在他现在所领导的“青年钻井队”里,他已经培养了四个副钻井技师,其中一个为维族,一个是哈族。另外又培养了一个哈族钻井员、一个维族副钻井员、两个维族架工、一个维族女柴油机技工。他除了对大家进行业务教育外,又经常进行政治教育,讲民族政策、阶级教育、党的历史等。由于他自己也成了工人,大伙儿不再把他当作外人看待,因此就大大便利了他在工人间的活动,使他能够更好地完成党交给他的各项政治任务。现在他的队里已经有了三个党员和好几个团员,全队的战斗性非常坚强,这个“青年钻井队”已经成为独山子

矿区的一面旗帜。

我会见过王炳诚领导的钻井队里一个维族副钻井技师阿尤甫。他是1939年到达独山子矿区的，那时他还只有12岁。当时盛世才在招募工人时，欺骗工人，说学三年就可以做工程师，而事实上，他在独山子矿区一共干了五年，什么都没有学会。他说他在那五年中只学会了三样东西，就是喝酒、赌钱、打架。他说他们维族本来不会打麻将，然而他在那几年中，连麻将牌都学会了。旧社会不培养工人，而是毁灭工人。全国解放以后，他在1951年6月第二次到独山子来工作，在最近这三年中，他从普通工人、副钻井员、钻井员，一步一步被提拔到副钻井技师。他说过去民族不平等，他们少数民族根本没有被培养的机会。就是稍微学到了一些，也什么事都轮不到他们。自从共产党来后，民族平等了，他们不会，汉族同志就帮助他们。过去他不会写俄文，也不会说汉话。自从他在王炳诚领导下工作后，因为一天到晚和王炳诚在一起，慢慢地连汉话也学会了。他现在的汉话大体上还说得不错，我和他谈话时，就是直接谈的，没有用翻译。他过去不会写俄文，现在也勉强能写了。他现在就用俄文把井上每天的工作记下来，王炳诚帮助他修改。过去他不会填自动工作记录表，王炳诚教他如何填。过去井架上的工作向例是由钻井技师支配的，但是在王炳诚的领导下，总是先问副钻井技师和钻井员的意见，要他们先动脑筋，以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阿尤甫说，王炳诚经常和他谈党的历史、党的政策，有空时谈，下班在路上一起走的时候谈，有时上他家里去谈，使他的政治认识逐渐提高，并在1954年6月介绍他入了党。

王炳诚不仅关心着他自己的井，而且也关心着别人的井。他不仅帮助自己一队的同志，并且还帮助别的井上的同志。当他向沙布林诺夫同志挑战时，沙布林诺夫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

知道的快速钻井法传授给他。这种伟大的无私的友谊是多么感动着王炳诚,并使王炳诚受着多么深刻的教育啊!所以,凡是王炳诚自己学到的什么东西,他也是毫不吝啬地愿意告诉别人的。当别的井上一些年轻的中国同志来找他去看看什么时,他总是很热情地去看看他自己能不能帮助他们一些什么。

王炳诚每天从井上回家,第一件事情告诉他爱人的是这一天又钻了多少公尺。后来,当他每天从井上回家时,他爱人便先问他这一天钻井的进度。他的爱人钟珊告诉我:“他是那么地全神贯注在他的工作上,即使回到家里,他脑子里想着的还是他的工作。作为他的爱人,我首先关心他的应当是他的工作,假如他一回来,我首先问他的工作,他就显得兴致勃勃,要是我忘了问他,他便显得不那末得劲似的。”

是的,对于王炳诚来说,工作是他的第一生命。除了他平常的工作时间外,不论是在深夜,不论是在刮着多大的风、下着多大的雨或雪,只要井上需要他,他总立刻就到井上去。除了在节日或一些特殊场合外,他总是终日穿着在井上工作时穿的工作服。他说,换来换去多么费时间!有时难得要去看一场电影,也要估计估计井上会不会有什么事情。有一次,他换了一身新衣服,正和他爱人要上什么地方去,突然接到井上的通知,他连衣服也不换,拔脚就向井上奔。这情况就像波列伏依在《雾中》叙述的热涅奇卡的丈夫的故事一样。

王炳诚是在1954年2月和他的爱人钟珊结婚的。结婚只有四天,他爱人便因为工作而从独山子调到乌鲁木齐去了。1954年4月31日,王炳诚领导钻的第52号井正巧钻完,领导上为了照顾他,劝他到乌鲁木齐去休息几天,看看他的爱人。他说:“没有时间啦!”井段段长库拉科夫说:“我给你七天假期。”而且,库拉科夫就用自己的吉普车把王炳诚送到了乌鲁木齐;那是

5月2日的事。就在那天晚上,他和他爱人一起去看电影,那天演的电影正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他看到石油管理局局长巴特曼诺夫、总工程师别里捷、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以及一些积极分子如丹妮亚、罗戈夫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英勇地斗争着:在大风雪中输送油管、架设电话、开凿海峡……他是多么受到感动和鼓舞啊!然而只看到一半,王炳诚忽而显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突然想到,他所领导钻的52号井,虽已钻完,但是还没有正式交给油田处。对于一个钻井技师来说,一个井从开始钻的时候起,一直到正式交给油田处止,他始终是应该负责的。而现在,井是钻成了,但还没有交给油田处,而自己却跑到了乌鲁木齐来!万一井上出了什么意外,谁在那儿负责?这样想时,他简直连电影都看不下去。“到乌鲁木齐来玩玩!看看爱人!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以上!我是多么的糊涂啊!”他这样无情地在内心里谴责自己。他决心第二天就赶回独山子去。他要对井负责,对公司负责,对国家负责。我问钟珊:“他第二天走成了没有?”钟珊说:“他决心要赶回去。第二天就带着他的手提包到石油公司运输站的门口去等车,终于在第三天的早上,他搭到便车回到独山子去了。”

1955年1月 乌鲁木齐
(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编 后 记

《储安平文集》得以编成，首先感谢谢泳先生的支持。谢泳兄前几年用力于储安平研究，亦有心于有关资料的搜集；我着手此项工作之始，即写信向他请教，从此不断给他烦难。谢泳的真诚、热心和具体的帮助是我在做这项工作过程中感受极深的。而我们至今还没有见过一面。还有几位未曾谋面的先生也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湖北荆州市京剧团的程朝富先生提供了储安平有关书信的影印件和抄件；重庆市图书馆的曾健戎先生、四川大学中文系的陈厚诚先生、北京《中华读书报》的萧夏林先生也都为这部文集费过心、出过力。

贾植芳先生、贾英女士、陈思和老师、张业松兄，都是我编文集遇到困难时常请教和麻烦的人，他们帮助我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周涵嫣小姐也承担了一些具体难耐的工作。

乔向东兄多年来一直给我很多帮助，编这部书时也是一样。

在此谨向所有为促成这部文集的问世而费心费力的人表示感谢。还特别应该感谢东方出版中心所做的大量工作，并且感谢储安平先生的子女对此项工作的支持和授权出版这部文集。

张新颖

1997年3月7日